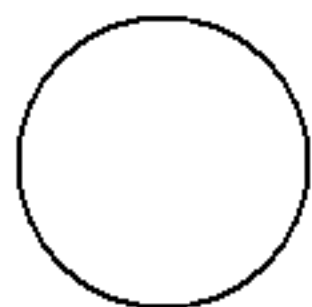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9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九期 ★

目 录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

- 西藏人民的新生 章 鲁(1)
-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柯庆施(8)
- 大型厂矿的“综合经营” 牛中黄(18)
- 科学与生产 刘仙洲(22)
-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胡 绳(30)
- 农业中学大有可为 陈 光(35)
- 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比喻 唐启运(41)
- “醒来吧, 美国!” 杨重光(46)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 西藏人民的新生

章 魯

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策动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他们所控制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发动了背叛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他们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

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和爱国进步的中、上层人士，是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维护祖国统一的。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支持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则蓄意撕毁协议、分裂祖国统一。在维护祖国统一和破坏祖国统一这两种力量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西藏叛乱事件的平定，表明维护祖国统一的力量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一九五一年五月所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协议。协议第一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第二条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中央派往西藏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八年来坚决执行协议，在团结西藏人民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英帝国主义在一九〇四年攫取了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的通商特权，英帝国主义后来是印度政府在以上三地派驻官员、军队，开办邮政电报、学校、医院，沿途设立驿站，并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这些特权，在一九五四年经过中央人民政府与印度共和国政府的外交谈判，全部取消了。英帝国主义挑唆尼泊尔王国进犯西藏所取得的各种特权，经过中尼两国政府的外交谈判，也在一九五六年取消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人民摆脱了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命运，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尽管受到上层反动集团的多方阻挠，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由于国家的帮助和兄弟民族的支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西藏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以及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人民建设新的生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仍然没有放弃侵略西



藏、奴役西藏人民的野心；一贯勾结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对于西藏的和平解放也死不甘心。他们狼狽为奸，从协议签订之日起，就蓄意进行破坏，企图把西藏地方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八年以来，以鲁康娃·泽旺饶登、索康·旺清格勒、赤江·罗桑益西、帕拉·土登为登、柳霞·土登塔巴、仔本夏格巴、嘉乐顿珠、宁妥·札西顿珠和威萨坚赞（功德林札萨）等为首的叛国集团，在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支持下，进行了一连串的叛国阴谋活动。一九五一年冬天，当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西藏的时候，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代理藏王）、叛国首领鲁康娃和罗桑札西领导下，一部分反动分子在拉萨组织所谓“人民会议”，公然反对协议，叫嚣要人民解放军退出西藏。后来因为受到中央的严正指责，原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宣布反动的“人民会议”为非法，并撤销鲁康娃和罗桑札西的司曹职务。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分裂祖国的反动活动没有因此停止。一九五六年底，他们又利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的机会，企图劫持达赖喇嘛，不让他返回西藏，同时阴谋在拉萨发动叛乱。

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中央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这些反叛分子，中央并没有直接出面处理，而只是责成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制止和惩处，并且再三申明，只要他们改过自新，仍可不予既往。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对于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竟然无动于衷。他们不仅没有丝毫的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西藏各地疯狂地裹胁一小部分被裹胁的群众，扩大叛乱队伍，到处截击汽车，破坏公路，杀戮干部，残害人民，袭击人民解放军，终于在三月十日在拉萨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提出了“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并且劫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长期以来，聚集在印度噶伦堡，勾结帝国主义特务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进行罪恶活动的西藏叛乱分子，在这时候，也更加疯狂地活动起来，把噶伦堡作为指挥叛乱的中心。与此同时，印度的一切扩张主义分子大肆进行干涉我国内政的活动，叫嚣什么“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中国政府平定叛乱是“侵略行动”。西藏叛国集团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这种一唱一和、里应外合，暴露了这次的叛乱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策动的。他们所策动的这次叛乱，同帝国主义在印度尼西亚、伊拉克以及其他民族国家所策动的破坏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是什么母子关系，那么，西藏的一小撮认贼作父的叛国分子的确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亲骨肉，而且他们都是从小英帝国主义一脉相传下来的。在西藏叛乱平息之后，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如丧考妣，两行眼泪流个不停，这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吗！

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声明”，说什么“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说什么“有些时候，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活动的”，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的信口胡说。从十三世纪以来，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甚至达赖喇嘛



的封号、地位、职权，都是由历代的北京朝廷陆续规定的。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一九四〇年“坐床”，也是由当时的中央政府派人到拉萨去主持的。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都知道，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是由英帝国主义者和他在西藏的走狗叫嚣出来的。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喜绕嘉措、阿旺嘉措等代表，根据丰富的历史事实，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这种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谬论。

英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西藏已将近一个世纪。一八八六至一八八八年英军第一次向西藏边境侵略，占去了哲孟雄地方（锡金）。一九〇四年英帝国主义又向西藏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攻陷了拉萨，从腐败的清朝政府取得了在西藏的各项特权。西藏人民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决抵抗，使英帝国主义者感到单靠军事侵略不能达到奴役西藏人民的目的，在一九〇四年以后，英帝国主义者对西藏的侵略就转而采取了更为阴险、更为恶毒的办法。他们标榜“帮助”西藏民族“独立”，以迷惑西藏人民，转移西藏人民的斗争目标，企图使他们由反对帝国主义转而反对祖国。为了实现这一阴谋，英帝国主义就在西藏大农奴主当中物色了一批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把他们扶植起来，攫取西藏统治地位，执行英帝国主义者交给他们的任务。这样，早在二十世纪初叶，英帝国主义者就在西藏内部培植了一批代理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积极插手侵略西藏。一九四七年以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干涉和分裂政策。从此，英帝国主义在西藏多年培植起来的一批走狗，就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三重奴才。这一批奴才，一方面代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西藏大农奴主的利益。他们所以死心塌地甘当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走狗，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同残酷剥削西藏人民的反革命阶级利益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让我们看一看这次组织西藏叛乱的一些首恶分子的来历，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索康·旺清格勒，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他家几代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从小就在英帝国主义者在江孜所办的英文学校读书，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一九四一年西藏地方政府曾经派他向英帝国主义购买军火。一九四七年，他和另一个噶伦拉鲁屠杀了西藏的爱国分子热振呼图克图。他在西藏和平解放前逃亡印度，一九五二年又回到西藏，执行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交给他的破坏祖国统一的反动任务。索康·旺清格勒的父亲，就是英帝国主义者培植起来的走狗，西藏和平解放前任过“外交局”长，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有密切的联系。索康·旺清格勒的弟弟索康·拉旺多杰，在印度大吉岭英文学校和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训练，一九四七年以“西藏商务代表团”团员身分去过美国和英国，西藏解放后一直住在噶伦堡，进行叛国活动。



赤江·罗桑益西，一般称“赤江活佛”，他出身于西藏大贵族凯墨家中，同时又是一个大买办，在西藏买办商业机构喜马仑公司中有大量股金。他是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前藏王大札的亲信。西藏和平解放前，曾经到印度“游历”，勾结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西藏和平解放后，一贯在幕后策划反对祖国的罪恶活动，是西藏叛国集团的重要“谋士”之一。一九五五年他随达赖喇嘛从北京回西藏路过四川藏族地区的时候，到处点火，煽动所谓康巴人进行叛乱。

帕拉·土登为登（僧官），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卓尼（达赖喇嘛的副官长）。他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是前藏王大札的亲信爪牙。解放以前，他在自己的家乡江孜与印度驻军有密切联系。他是一九五二年的“人民会议”反革命组织的策谋人之一。他弟弟帕拉·多吉才旦也在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训练，曾经担任古松代本（达赖喇嘛警卫团团长），是这次叛乱的骨干。

宇妥·札西顿珠，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理噶伦。他曾在印度受过英帝国主义的军事训练。一九四八年，他代表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帝国主义订购军火。一九五〇年，西藏地方政府曾经任命他为赴英“亲善使团”团长。西藏解放后，他往来于印度噶伦堡和拉萨之间进行叛国活动。

鲁康娃·泽旺饶登，是西藏和平解放前的代理藏王，是英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忠实走狗。西藏和平解放后，他忠实执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命令，组织“人民会议”，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撤职后，逃亡印度的噶伦堡，成为流亡在噶伦堡的西藏叛国分子的头目。这次西藏武装叛乱发生后，他曾率领所谓“西藏代表团”向印度政府请愿，他们在给尼赫鲁总理的“呼吁书”中奴颜婢膝地说“跪在你的面前”祈求帮助。

仔本夏格巴，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全藏财政、人事、俗官训练等事务的重要官员。他曾留学英国，是经过英帝国主义者长期培养的一名忠实走狗。一九四八年，西藏地方政府派他担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去美国和英国活动，要求美国的“援助”。一九五〇年，他又被任为“西藏亲善使团”团长，准备再去美、英活动，要求英、美、印度、尼泊尔出面干涉，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他一直住在噶伦堡与嘉乐顿珠、阿乐群则等反动分子结合在一起，进行叛国活动。

这一群由英帝国主义培养起来的走狗，是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西藏的政治上的代理人，同时又是外国侵略者在经济上掠夺西藏的大买办。他们垄断西藏地方和国外的贸易，英帝国主义以及它的继承者通过他们榨取西藏工业原料（如羊毛、硼砂、皮张、鹿茸、麝香、药材等），倾销剩余生产品（布匹、毛织品、烟草、糖、五金等等），致使西藏市场在解放前完全由外货占领。

这一批外国侵略者的忠实走狗，都出身于西藏的大农奴主家庭。他们每家占有的农奴，多的一万人以上，最少也有一千多人。他们每家从农奴身上压榨来的地租，多的



一年达到三万多克(一克约合二十五市斤),最少的也有两三千克。他们为了永世保存西藏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度,需要帝国主义作他们的“靠山”;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为了奴役西藏人民,为了阻止西藏人民的觉醒,也就尽力维护西藏的农奴制度,尽力维护这批卖国贼对西藏人民的残酷统治。

西藏的农奴制度,比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制度还更野蛮、更黑暗、更反动。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制度下,西藏的全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都由贵族、寺院和地方政府所占有。西藏贵族总共二、三百家,大农奴主有二十多家,而最大的只有七、八家。政府占有的土地可以分封给贵族和寺院,贵族和寺院占有的土地可以互相赠送、布施、抵押,但不能买卖。西藏的农奴主就是依靠这些土地的占有对西藏的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拿出很少的土地,作为给农奴的份地,使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每年要以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进行无偿劳役。农奴主只拿出种子,至于耕牛、农具、劳动力等等都由农奴负担,从春耕、夏耘一直到秋收、冬藏,完全由农奴承担。农奴在农奴主的土地上劳动的时候还要自带伙食。农奴的劳动,一般都是在贵族的管家监督和鞭打下进行的。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如果逃亡被抓回来,就要受很重的处罚,甚至被挖眼、割鼻或砍去手脚。农奴生下子女,贵族立即登记在帐簿上,当做财产看待。贵族为了镇压农奴反抗,在很多的庄园内都设有监狱和刑具。贵族可以将农奴连同庄园一起赠送、抵押或者布施给别人,还可以把农奴作为陪嫁的财产。

所有农奴还要担负贵族、寺院和西藏地方政府各种沉重的差役。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来往,都要由沿途农奴无偿供给乘马和住宿,要送牛羊肉、酥油、豌豆、糌粑等礼品,并且要派年轻女子侍候。地方政府的军粮调拨、物资运输,都要由农奴派出牛马和人力无偿转运。地方政府的房屋,也由农奴无偿建设和修补。贵族和寺院的农奴除了担任地方政府的差役之外,还要担负贵族和寺院的各种差役,如修理房屋、运送粮食和货物,以及背水、砍柴、扫地、饲养马匹等等家务劳动。因此,农奴剩下来在自己的份地上劳动的时间就非常少了,他们的份地很多都荒蕪了。

农奴为了生存下去,常常只好靠借债过活。据在拉萨以北的朗塘、卡则、林周、旁多等四个宗(相当于县)的调查,旁多有一百六十六户,全部负债;林周二百二十七户,有二百一十七户负债;卡则二百一十五户,有一百八十五户负债;朗塘五十户,有四十户负债。负债户一般占户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些负债户中负债一万克粮食以上的十二户,五千克以上的十四户,一千克以上的一百五十九户,五百克以上的一百零六户,一百克以上的二百六十六户。这些农奴的债务,都是上辈遗留下来的,据说有的已经有一百二十年,有的已经有三辈的历史。

原西藏地方政府就是农奴主专政的工具。农奴不但根本不能参与政治,而且不能与贵族平起平坐,不能与贵族通婚,甚至服装样式、说话用的许多词汇,也是不能和贵族



相同的。在宗教界，出身于农奴和牧民的广大贫苦喇嘛也不能参与政治，也受着宗教上层的压迫和剥削。

对于这样一种野蛮、反动、黑暗的农奴制度，全世界一切进步人类都认为应该改革，只有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集团才想要把它千年万代地保留下去，让西藏劳动人民子子孙孙永远过牛马的生活。当然，这只是一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梦想。

实行社会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规律。但由于各个民族具体条件不同，社会改革的时间、步骤和方式，是可以不一样的。早在一九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对于西藏地方应该进行社会改革，就已经采取了肯定的态度。但是根据西藏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为了使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人士有充分的考虑时间，中央认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慢一些进行，并且可以由人民和上层人士经过民主协商去和平地解决。一九五六年，中央又根据当时的西藏情况，宣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在一九六二年以前，西藏可以不进行社会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再决定。对于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根据党和国家关于宗教信仰的基本政策，更是作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下，中央派往西藏的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一贯地坚决地执行协议和中央的上述规定。西藏的农奴制度原封未动，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照旧受到尊重，不论什么教派的喇嘛寺院一律受到保护，他们的收入没有作任何变更，他们的宗教活动照旧进行。所有这些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但是西藏叛国集团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想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胡说什么这次叛乱是由于中央在西藏进行社会改革所引起的。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说，无非是要掩盖叛乱分子背叛祖国、出卖西藏民族利益的丑恶面目，掩盖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侵略西藏、干涉我国内政的可耻阴谋。

与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叛国集团的愿望相反，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叛乱的平息，促进了祖国的统一，促进了西藏人民的新生。他们企图用武装叛乱来堵塞在西藏实现社会改革的道路，堵塞在西藏实现有人民参加的民主的地方自治的道路，但是结果却激起了西藏广大人民的义愤，使西藏劳动人民被压抑已久的对于实行民主改革的愿望，迅速地昂扬起来；在中上层人士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而叛乱的平息，原西藏地方反动政府的被解散，也为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扫清了道路，这就将导致西藏民主改革的提前实现，使西藏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民主的地方自治。西藏今后的民主改革将按照西藏人民的意志，照顾西藏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办法，逐步进行。在改革中和改革后，一切爱护祖国统一的贵族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包括





新生 (国画)

黄胄作

贊成改革的进步人士和經過說服可以同意改革的中間人士，都将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受到妥善的安排。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締

造和发展的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农奴制度的束縛，才使它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阻碍，使絕大多數的西藏人民陷于极端黑暗的地獄般的生活。現在，西藏大农奴主横行不法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西藏人民摆脱农奴制度的新时代已經到来了。毫無疑問，粉碎了这些套在西藏人民身上的重重枷鎖以后，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在西藏高原上建設起人間的天堂，西藏民族一定同国内各兄弟民族一样，成为一个經濟繁荣、文化发展和生活幸福的先进民族。一个光輝灿烂、无限美好的前途，已經展現在西藏民族的面前。一切爱国的进步的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团结起来向着这个美好的前途前进！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柯庆施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的国家将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建成为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六中全会之后，我们常常盘算这个问题：从现在开始，在完成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斗争中，上海的奋斗目标应该是：鼓足最大的干劲，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最快的速度，生产数量更多和质量更好的产品，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输送更多的技术力量，来支援全国各地。当然，首先是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国家今年交给上海的任务，保证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胜利实现。

一九五八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为一百七十一亿三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点三（不包括郊区十一个县的工业产值），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八十五点八，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四百五十三点五。这一年增加的产值为五十七亿三千万元，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工业产值增加的数字。根据国家今年分配给上海的各项任务，今年上海工业总产值计划为二百四十八亿元，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完成国家计划是上海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上海人民应尽的责任。我们不但要保证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而且要争取超额完成。用什么方法完成呢？我们确定在全面开展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和基本上做到不增加工人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这就要使今年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四十五，也就是说，要使上海今年一个工人生产的产值，相当于去年的一个半工人生产的产值。我们认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是今年发展上海工业生产、实现大跃进的主要途径，而且是今后高速度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只有这样，在完成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上海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发展 上海工业的主要途径

为什么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主要途



径呢？能不能办到呢？

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中，对于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主要采取增加工人，还是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一部分同志偏重于增加工人；但是大多数同志觉得，就上海实际情况来看，应该以不断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为主。

增加工人是发展工业生产的途径之一。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国经济落后的标志。所以，我们的国家今后必须继续兴办许多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继续扩充和壮大工人阶级队伍。这在全国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就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来说，由于它地处沿海，距离原料、燃料产地和内地市场过远，为着工业布局合理和改变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上海新建、扩建项目不宜过多，增加工人也很有限。因此，增加工人不应当

成为今后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主要途径。

不断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发展工业生产的途径。对发展全国工业生产来说是如此，上海工业生产的发展，尤其必须采取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途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由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和所消耗的劳动时间的对比来计算的。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但却节省更多数量的劳动时间；或者是消耗同样数量的劳动时间，但却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这都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个工厂增加一个工人，只能增加一双手，或者是八个劳动小时。如果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节省，虽然这个工厂没有增加一个工人，但也无异于增加了一只手、一双手、更多双手，或者是四个劳动小时、八个劳动小时、更多个劳动小时。这样，纵使减少了一部分工人，总产值也不会减少，或者还可以增加。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例一：下面所举的国营第二印染厂，一九五八年的职工人数，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四，但是产值和净产值反而都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国营第二印染厂		职工人数	产 值 (元) (每一职工平均)	净 产 值 (元) (每一职工平均)
	一 九 五 七 年	1,142	52,330	8,825
一 九 五 八 年	1,100 (注)	70,245	12,065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七年增减的百分比	-3.68%	+34.24%	+36.71%	

(注) 一九五八年还抽调出部分人员用以建立化工车间和汽车修理车间



例二：下面是去年十二月上海鋼鐵一厂和三厂的三个炼鋼車間的比較。上鋼三厂老轉爐車間的劳动生产率最高，这个車間平均每一职工的鋼产量几乎比上鋼一厂新轉爐車間多一倍。

車 間	設 备 (座)	車間本月 总 产 量 (吨)	車間本月 职工总人数	劳动生产率(实物)	
				每人每月 (吨)	每 人 工 吨 数
上鋼一厂新轉爐	碱性 8 吨 6 座	20,685	2,181	9.48	3.27
上鋼三厂老轉爐	碱性 6 吨 4 座	27,172	1,488	18.26	1.70
上鋼三厂新轉爐	碱性 8 吨 6 座	29,403	2,046	14.37	2.16

根据上海冶金局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統計資料

例三：去年上海某些主要行业，由于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時間的节省，每一个工人平均产量提高很多。如下表：

		电 力 (万度)	汽車輪胎 (条)	金 笔 (支)	卷 烟 (箱)	紙 张 (吨)	棉 紗 (件)
每 年 平 均 工 产 量	一九五七年	59.1	197	2,985	89	19	17
	一九五八年	79	306	5,773	94	21.6	21.8
	一九五八年較 一九五七年增 长的百分比	33.67%	55.33%	93.4%	5.62%	13.68%	28.24%

从前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劳动生产率愈高，意味着单位劳动時間内所生产的工业产品量愈多，也就是說，用以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資料和用以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生活資料愈多；同时，也意味着活劳动、物化劳动（原料、燃料、机器折旧費用）愈加节省，单位产品的成本愈加降低，也就是說，用以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有可能愈来愈多，生活資料的价格也有可能随之相应降低。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社会物質財富、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源泉。进一步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

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是降低劳动强度、逐步縮短劳动時間、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馬克思曾說：“社会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它就贏得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其他物質的或精神的生产。无论对于个人或社会，其发展、消費和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馬克思、恩格斯文庫”，俄文版第4卷，第119頁）所以，列宁說：“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終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卷，第90頁）



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有利条件

今年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四十五是不是可能呢？我們的答复是完全肯定的。我們的根据是：

一、九年来，由于上海工人阶级的努力，工业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比起工业发达的国家，我們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国内許多先进的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也比我們高。这就告訴我們，在这方面还有潜力可以挖掘。这一情况提醒我們不能滿足于已有的成就，并且鞭策我們要迎头赶上去。

二、上海拥有近百万的产业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具有丰富的劳动經驗和熟練的生产技能的老工人。上海还拥有一支很大的技术人員队伍。这些技术人員經過整风和大跃进的实践，政治觉悟和革新精神都有所提高。去年一年中，在领导人員、技术人員和工人互相結合之下，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有了很大的开展和成就。这就为今年上海工业大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創造了有利条件。

三、上海是个老的工业城市，但是許多企业的設備比較落后，机械化的程度也不高。根据初步統計，在全市工厂企业的九十万工人中，从事机械化操作的仅占百分之二十七，半机械化操作的占百分之三十六，手工操作的还占百分之三十七。各个行业的情况是这样：在冶金系統机械化操作

占百分之十五，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二十五，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六十；机械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三十五，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五，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六十；化工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五，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七十，手工操作占百分之二十五；电机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二十五，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十五，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六十；紡織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四十，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十五，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四十五；輕工业系統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十，半机械化操作占百分之五十，手工操作占百分之四十。

設備好坏，机械化操作、半机械化操作或手工操作，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很大的。以下是一部分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一九五八年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比較：

生产机床的明精机器厂为一万零七百六十八元，普陀机床厂为七千零三十一元，前者为后者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三。

生产电綫的大来电綫厂为七万二千四百五十元，丽华电綫厂为五万零八百六十三元，前者为后者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二。

同兴袜厂电动織袜为八千三百七十九元，培德袜厂手搖織袜为二千三百九十元，前者为后者的百分之二百五十。



萃众織造厂电織毛巾为一万零九百六十五元，統一毛巾厂手拉脚踏生产为四千七百十四元，前者为后者的百分之二百三十。

从以上的材料来看，虽然形成劳动生产率高低差别的因素不止一个，但是机械化程度的高低有重要的影响。目前上海全市工业中手工操作平均占百分之三十七，有些部門还占到百分之六十。如果把机械化程度提高一点，劳动生产率是可以相应地提高的。

四、上海工业各行业比較齐全，便于进行生产协作和經驗交流。生产协作不仅可以做到充分发挥生产潜力，而且可以創造新的生产能力。

五、現在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状况是不平衡的。一九五八年各工业部門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号召下，都創造了不少先进經驗，生产效率有显著提高，但是，同等条件的先进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間还有較大的距离。例如：

鋼鐵工业中平爐利用系数（即每平方公尺爐底面积昼夜平均产鋼量）：

最高企业	13.665吨
最低企业	9.982吨

机械工业中鉄鑄件成品率（即合格成品量占投料量的比重）：

最高企业	97.43%
最低企业	37%

鋼鑄件成品率：

最高企业	67.05%
最低企业	48.50%

造纸工业設備利用率：

最高企业	91.44%
最低企业	64.51%

卷烟工业中卷烟机設備利用率：

最高企业	52.50%
最低企业	35.68%

紡織工业中每千紡錠每小时产紗量：

最高企业	31.72公斤
最低企业	26.11公斤

我們應該認真地总结去年各部門中創造了先进指标的企业的經驗，并且組織其他企业来学习和推广这些經驗。只要每个工业部門中落后的企业努力赶上或者接近先进企业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以上的一些分析来看，我們的条件是很有利的。但是，要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轉化为现实，还需要坚决地依靠群众，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資产阶级主要是采用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和加重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的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不关心的，因为不論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帶給工人群众的总是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条件的恶化和工人的更加貧困化。与其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們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都是从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出发的。而提高



劳动生产率、迅速发展生产的目，又是为了建设无比幸福美满的新社会，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工人群众在党

的领导下认识到自己劳动的崇高意义，所以自觉地积极地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奋斗。

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措施

为着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搞技术革命。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办法。

技术革命，包括技术革新在内，从低级的一直到高级的，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去年全市技术革新的建议一共有四十七万条，已经实行的有二十多万条，有一万五千条比较重要。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这几个方面：工艺方面，包括工具、操作方法方面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设备方面的革新和革命；产品设计方面的革新和革命；原料、材料方面的节约，代用和新的原料的制造。从以上这四个方面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就可以减少工时，减少物化劳动的消耗，同时也可以降低劳动强度。去年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同一九五七年比较，按职工计算，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八，按生产工人计算，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六。这个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结果。而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不论是创造革新，或者是总结推广，都还大有可为。只要我们继续发挥职工群众的冲天干劲，把敢想敢说敢作的精神和尊重科学的实事

求是作风结合起来，继续贯彻执行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互相结合的方针，我们今年就一定能够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第二，不断提高机械化的程度。前面分析过，上海工业机械化的程度是不高的。怎样提高呢？主要靠自力更生。去年我们贯彻执行了洋土结合方针，全年自制的土机床和简易机床四千八百零八台。例如，前进机模厂工人二十天内自行设计制造了十多部大部分用木料做的土机器，用机械操作代替了锯、刨、切、磨、车、铣、凿等几道主要工序的手工操作，全行业普遍推广两个月后，超额百分之三十三完成任务。机械工业部门则采取“蟹吃牛”的办法（也就是“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加工大型设备，克服大型机械不足的困难。今年同去年一样，必须进一步贯彻洋土并举的方针。与此同时，上海绝大多数厂也应该有计划地进行设备更新，采用新的技术，新的设备。

第三，改进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过去几年，企业中非生产人员太多，去年下放了许多，调动了不少，但是，管理人员所占的比例还是大了一些。非生产人员一多，既浪费了宝贵的



人力，又增加了管理費用，增加了生产成本。在生产工人当中，由于劳动組織得不合理，有些工人忙得很，有些工人則往往“打一天魚，晒两天网”，閑在那里，沒有事情做，劳动力浪費很大。劳动組織不得当，也牵涉到生产組織不能因时制宜，合理調整，上下工序之間不協調，我等你、你等我，或者是你来我往，甚至奔波終日，尙未解決問題。因此，必須随着生产的发展，及时相应地把劳动組織，生产組織加以調整，以便每一个人充分地發揮他的作用。

第四，認真地、持久地、深入地開展为技术革命服务的文化革命；进一步貫徹执行領導人員、科学技术人員和工人的互相結合的方針；提高工人、艺徒的技术熟練程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工厂的业余学校一定要办好。凡是办得好的工厂业余学校，大都由于在師資上、教材上、教授方法上貫徹了老工人和技术人員相結合、書本知識和生产經驗相結合、課堂講授和生产实践相結合的方針。我們的老工人，有丰富

的生产經驗，有英勇的創造精神，如果再提高文化的基础上用科学知識武装起来，就必然会在生产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并且会出现不少优秀的科学家。我們不但应当加强科学研究机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同时，每个工厂企业也应该开展科学研究。

第五，在加强对工人群众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根据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則，适当地重視物質奖励，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重大的意义。

从以上几个方面去努力，肯定地說，一定会有良好的結果。不过，为着保證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高，我們还要注意很好地安排生产。安排生产是一种艺术。掌握得不好，就不能按时、按量、按質地完成生产任务，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削弱或者抵銷了上述各項措施的成就，致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得不多甚至降低。掌握得好，則可促使劳动生产率更快地提高，保證生产任务的完成和超額完成。

安排生产方面的几个問題

在安排生产方面，最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第一，从上海全市到每一个工厂，都要把生产任务、生产計劃布置好，安排好。安排生产，首先要抓重点。必須集中力量，保證重点过关。綱举必然目张。重点是生产計劃的中心。抓起重点項目、重点

产品，其他各項才有可能带动起来。其次，要抓得具体。生产計劃从制訂到完成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不断前进过程。不同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領導人員必須經常地深入地了解情况，发现矛盾的各个側面及其主要方面，才能对症下药，解決問題。不这样，远远地



望一望，就动手解决矛盾，这是很危险的。

在安排生产任务和生计划时，必须注意克服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例如，机械工业中的浇钢和锻压等，必须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因此，在挖潜力的同时，要抓紧这些薄弱环节的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突击，保证如期完成，以改变目前浇钢、锻压赶不上而影响生产的情况。

此外，还必须注意搞好各方面的协作关系。上海工业企业中全能厂很少，各方面的协作关系很复杂，这里有市内的协作和全国的协作，这些协作关系都要安排好，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第二，原料、材料供应的问题要认真抓好。今年上海原料、材料的供应在第一季度还是有困难的，第二季度也还会有些困难。可是从全年来看，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的材料供应情况将要比去年好得多。去年钢材只有几百万吨；今年上千万吨。还有许多原料、材料，今年在生产方面都有很大的增长。值得重视的是：去年大家千方百计地创造出许许多多节约原料、材料、找代用品的经验，这对今年有很大的用处，要更好地运用它。在每个工厂仓库里，材料和废料是不不少的，要很好地利用起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年在原料、材料的供应上什么困难都没有。怎样解决原料、材料供应问题呢？

首先，要积极组织原料、材料的调运和生产。中央分配给上海的原料、材料，我们要积极地到各地去组织调运工作。人家有困难，我们帮助别人解决，不要坐着等人家送

来。中央没有分配的，我们要自己组织生产。没有电石，就生产电石，“三酸”“两碱”不够，就去组织生产；洋设备没有，就搞土法生产。总之，要积极发展原料、材料的生产。

其次，要大力节约原料、材料，切实进行原料、材料的综合利用。上海市委提出要节约原料、材料百分之十，这是完全可能做到的。要节约原料、材料，但是决不允许偷工减料，必须保证质量，而且要使质量越来越好。节约原料、材料的门路是很多的。要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出发，改进产品设计，改变操作方法。在节约原料、材料当中，特别要注意废料回炉，变无用之材为有用之材。许多土铁土钢，只要掌握它们的性能，配料比例适当，多化点焦炭，经过回炉，就可以变成好铁好钢，增加钢材。所以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来节约原料、材料。有的同志说，实行“全国一盘棋”以后，“机动性”少了，以物易物不行了，千方百计也无法可施了，这是不对的。以物易物是不允许了，可是，还是有计可施的，还是可以在保证质量前提下用同样的原料、材料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从下列一九五八年若干主要产品在同一行业中单位消耗的比较，就可以看出节约原料、材料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电力工业中每度电标准煤耗量：

最高	0.597 公斤
最低	0.474 公斤

钢铁工业中每吨平炉沸腾钢耗用生铁：



最高 855 公斤

最低 824.36 公斤

每吨平爐沸騰鋼耗用廢鋼量:

最高 218.91 公斤

最低 100 公斤

橡膠工業中每千雙膠面膠鞋耗用橡膠量:

最高 178.513 公斤

最低 145.62 公斤

造紙工業中每噸凸版紙用漿量:

最高 1,097 公斤

最低 857.42 公斤

每噸膠版紙用漿量:

最高 946.56 公斤

最低 844.59 公斤

紡織工業中42支棉紗每件用棉量(混用棉):

最高 225.55 公斤

最低 201.05 公斤

每千公尺2321市布用紗量:

最高 142.45 公斤

最低 133.75 公斤

原料、材料的綜合利用的工作,應該切實地廣泛地進行。許多原料、材料可以綜合利用。例如,上海木料的利用率最初不到百分之五十,去年抓了一下,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了,但是還有百分之三十浪費了,

還要想辦法去綜合利用。任何一個工廠,不分大小,原料、材料如果能綜合利用,潛力是有的,只是大、小不等而已。

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節約原料、材料,綜合利用原料、材料,就是節省產品的物化勞動,用一定的原料、材料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就是加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內容之一,千萬不能等閑視之。

此外,還要儘可能採用代用品,製造新的材料。

有些工廠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如果一時不易解決,那就應當利用生產不太緊張的情況,秣馬厲兵,進行設備調整,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準備在原料、材料問題一旦解決之後,更好地進行生產。

第三,在安排生產中,還必須抓緊、抓好產品質量問題。產品質量不合規格,就不可能全面貫徹多快好省的要求,就要造成最大的浪費。保證產品質量合格和不斷提高,首先必須發動群眾,人人負責,從車間、科室到小組、個人的生產計劃中都必须規定保證產品質量的具體措施。其次,必須切實執行產品檢驗制度。凡是不合格的产品,一律不許出廠。

把群眾的革命干劲進一步發動起來

我們主張的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質上就是多快好省地發展工業生產力的問題。同樣數量的工人,經過技術革命、設備更新和改進生產組織、勞動組織之後,

就能用更少的勞動時間(包括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節約),生產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產品(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從而為擴大社會再生產和提高人民福利創造物質基



础，这难道不是多快好省嗎？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鼓足革命干劲，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格的问题，也是发扬科学分析精神，掌握客观规律的问题。试问干劲不足，迷信不除，科学分析精神没有树立起来，怎能做到多快好省？当然，归根到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开展一个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才能求其实现。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不易之理。

当前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鼓足干劲的问题。

目前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群众的干劲很高，不待领导发动，他们就敲锣打鼓热烈响应市委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号召，动起脑筋来了；相形之下，有些干部有点落后于形势。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群众的干劲很高，我们应当积极地赶上去。不然群众就会不满意。二是有些干部，自己的干劲很高，但是不知道怎样把群众的干劲更好地鼓舞和组织起来。他们自己有了干劲，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不多，又不去放手发动群众大家一道来找关键、想办法。他们有的是心急如焚，但是不知从何下手；有的是急不暇择，做事不和群众商量，光想用发号施令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这都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我们要有干劲，我们的干劲同群众的干劲结合，又可以把群众的干劲进一步地发动起来。我们的同志都需要学会在新的形势下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我们党提倡的干劲是苦干、实干、巧干相结合的干劲。只有苦干、实干、巧干相结合，才能达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没有苦干的精神是不行的。但是，苦干主要是指同困难作艰苦斗争的气概和毅力。“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没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是不行的。有的同志把苦干只是看成不分白天晚上地干，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实干是什么呢？就是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地干，不是空喊，不是浮夸。所谓冲天干劲，就是说，干劲是冲天的，但无论如何要脚踏实地。这也就是“顶天立地”。不顶天，不立地，两脚吊在半空中，随风飘荡，那怎么能行呢？我们坚决反对个别干部用专做产值高的产品，甚至用偷工减料、降低质量等投机取巧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的提高，是虚假的现象，而且根本违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巧干，就是集中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我们要把苦干、实干、巧干这三者结合起来，这种干劲越大越好，有了这种干劲，我们就能百折不挠，无往而不胜；不但能够实现一个人作一个半人的事、一小时作一个半小时的事，而且将来还能够“以一当十”，“以十当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基本上不增加工人的条件下，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途径，一定可以使上海的工业生产在一九五九年继续用高速度向前发展，实现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



大型厂矿的“综合经营”

★ 牛 中 黄 ★

在去年我国全面大跃进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经济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很多新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工业方面，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就是其中的一个。

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工业的大跃进，对于人力和物力提出了大量的需要，而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却不能充分地满足这种需要，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需要作许多方面的努力，而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则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大型企业根据需求和可能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可以使它更加合理地利用人力和物力，增加产品产量，发展多品种生产，以适应大跃进的需要。

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扩大、改建或者新建本厂的某些车间、工场，增加新的产品；另一种是办“卫星”工厂，为扩大本厂的生产服务，这种“卫星”工厂，一般多是小型的。许多大型企业向联合性的综合企业发展，往往兼有这两种形式。而不管哪一种形式，它们都同本企业的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利用本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出的废材、废料、废气、废水，进行加工，制成有用的成品，满足本

企业的需要和供应市场的需要；第二，过去依靠外厂协作生产的某些附件和配件，现在根据可能的条件由本企业组织力量来生产；第三，本企业所需要的某些原料、材料，如果就地可以取得，即由本企业组织力量自行采掘和进行初步加工，不象过去那样完全依靠外厂供应。

这里，可以举出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例子。

这个工厂在去年大跃进中发展多品种生产和举办“卫星”厂的情况如下：

在发展多品种生产方面，制成四百厘米的轧钢机一套，正在安装，另一套六百五十厘米的轧钢机正在制造，同时，还制成四点五瓩的电动机一百部，制成总容量为二千七百千伏安的变压器，制成三百部简易机床。这些都是这个厂从来没有生产过的新产品，它们基本上是靠现有的车间，或者对现有车间稍加扩充以后生产出来的。

这个工厂从去年十月份起，还陆续举办了一些“卫星”工厂。这些厂大部分是在利用废料的基础上办起来的，厂址大部分设在本厂，工人几乎全部都是本厂的职工家属，少数技术工人由本厂抽调支援，材料费和人工费由“卫星”厂单独核算，管理



費用与本厂分攤。

这个工厂所办的“卫星”厂，主要有以下一些：(1) 酒精厂，利用本厂木材加工过程中所出的木屑制造酒精，可以满足本厂的需要；(2) 棉紗卷厂，利用本厂的废油棉紗翻新，基本上可以满足本厂的需要；(3) 废銅洗选厂，利用本厂的废銅末，加以洗选利用；(4) 电石厂，平均日产量两三吨，能够解决本厂大部分需要；(5) 矽铁厂，由于缺电，产量不稳定，質量稍差，能满足本厂一部分需要；(6) 水玻璃厂，平均日产量一点五吨，能满足本厂大部分需要；(7) 炼焦厂，日产十余吨，基本上可以满足本厂需要；(8) 水泥厂，利用本地的石灰石烧制，为本厂的扩建服务；(9) 炼鋼厂，在去年大炼鋼鉄的运动中兴办起来，有一个五立方公尺的炼鉄小高爐和一个电爐、一个轉爐在进行生产。电爐和轉爐都是用本厂加工后的碎鋼鉄作原料。

从长辛店机車車輛厂以及其他許多工厂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优点：第一，它克服了本企业在原料、材料和附件、配件供应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使生产得以大跃进；第二，它生产了許多新产品，不但满足了本企业的需要，甚至还以一部分供应其他单位；第三，它广泛地吸收了职工家屬参加生产，把消費者变为生产者；第四，它充分地利用了本企业的废物，变无用为有用。同时，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在一个企业内部具体地体现

了党的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样，就使上面所說的那些优点更加能够充分發揮出来。

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的趋势，毛澤东同志早在去年九月間就已經預見到，他在武汉視察时就指出过：象武汉鋼鉄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綜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鋼鉄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①毛澤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很快就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巨大的物質力量。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当然，这也不是說，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是一帆风顺的。这个新事物，同任何新事物一样，当它最初出现在人們面前的时候，总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怀疑。例如，有人把它看做是“不务正业，妨碍本行”；看做是“权宜之計，不能持久”；甚至認為这种做法“不合科学，一定失败”。

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是不是“不务正业”，会不会“妨碍本行”呢？这要看是怎样的做法。如果只顧“副业”，不顧“正业”，或者放松“正业”，这当然会妨碍本行。例如，有的棉紡織厂不是首先集中精力紡好紗，織好布，而是用大力去生产机器，生产水泥，这样做，显然是不适当的。但是，如果为了发展“正

^① 見 1958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报第 1 版。



业”而发展“副业”，那末，这种“副业”的发展，就不但不会“妨碍本行”，反而还可以促进“正业”的更大发展。許多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正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大型的鋼鐵企业，它的主要产品当然是鋼鐵，但是，它要进行大规模的炼鉄、炼鋼的生产，就需要大量的焦炭，就要有很大的炼焦厂。而有了炼焦厂，就可以从炼焦的过程中回收許多种有用的化学工业原料，来办各种化工厂。同时，炼鉄的高爐，每天都要排出大量的爐渣，这种爐渣，对鋼鐵企业本身來說，是一种废料，但它却是制造水泥的极好的原料，办个水泥厂来利用这种“废料”是再合算不过了。还有，每个大型鋼鐵企业，都附設有很大的机械修配厂，这种机械修配厂不但能够修理冶炼設備和軋鋼設備，而且，稍加发展，还可以自行制造一些机械設備，如此等等。象鞍山鋼鐵公司、武汉鋼鐵公司、太原鋼鐵公司这样的大企业，它們的主要产品虽然是鋼鐵，但是，它們同时又生产化学肥料、焦油、苯等多种化工产品，生产水泥，生产机器。这种綜合經營，不但不妨碍鋼鐵工业的发展，反而有利于它的发展，并且还可以合理地利用物質資源。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呢？

是不是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是一种“权宜之計”或者“不合科学”的事情呢？我們的回答相反。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

許多大型企业之所以要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这不但是为大跃进的形势所迫，不但是因为綜合性的联合企业比一般

的企业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而且还因为企业的专一性是相对的，专一和綜合或者联合是对立的統一。

拥有現代科学技术的大生产，日益向着分工愈細的专业化发展，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它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任何一种現代工业产品，它的生产过程，都是各种专业的联合过程。专一和联合，这是所有現代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中矛盾的統一。例如，象前面所列举的长辛店机車車輛厂，它的生产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即以机車車輛的制造而論，它不但有鋼鐵結構，而且还要有木結構。鋼鐵結構的制造，就需要有炼鉄、鑄鉄，炼鋼、鑄鋼，热加工，冷加工等过程；木結構的制造，也需要有干燥、鋸木、刨光、成型、油漆等过程。由此可見，生产日益向专业化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种专业进一步密切結合的过程。生产愈专业化，愈要求綜合化和联合化，这就是生产的专业化和綜合化、联合化的辯証关系。这种关系，我們在任何一个工业生产部門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那种把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看做是一种“权宜之計”，看做是“不合科学”的事情，是沒有根据的。

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在不同的工业部門是各具特点的。比如，根据可能的条件，鋼鐵企业可以办点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工业、机械工业等等；机械工业可以办点炼鉄、炼鋼的工业等等。也就是說，每一种工业部門的大型企业向綜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都是同該部門



的生产技术的特点相联系的，而不应当“样样求全”，想办什么，就办什么，这也要办，那也要办。目前許多大型企业为了解决原料、材料和配件的需要，大办各种“卫星”工厂，这种干劲是好的；但是有些企业不顾本部门工业生产技术的特点和可能的条件，存在着“样样求全”的偏向，甚至根本没有条件去办的事情也要去办。例如，有些企业的所在地区，既没有煤，又没有铁，但却硬要去办钢铁工业，这就是不妥当的。这样做，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方向发展，一定要注意可能的条件，一定要注意就地取材，就地取人，做到经济合理。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有的同志认为他们所办的土法炼焦厂和耐火材料厂不怎样经济合理，就是因为资源和运输条件不利。炼焦厂的煤要从河北省的峰峰煤矿和开滦的沽冶煤矿运来，而且都是原煤，需要自己洗选，运量大，费钱多，出焦少（约三吨原煤才能炼出一吨焦炭），并且质量也不好，影响铸铁的质量。耐火材料厂用的矸子土，要从山西省运来，也不合算。这种看法是完全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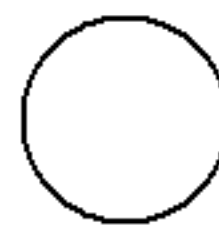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既要考虑需要，更要注意可能。只看到需要，不看到可能，这是一种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使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不能做到经济合理。只看到可能，不看到需要，这也是一种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同样使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不能经济合理。因为不根据需要生产

是一种盲目性的生产，它同计划经济的原则是不相容的。很明显，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本企业不需要，社会上也不需要；或者虽然合乎需要，但是浪费极大，成本很高，那么，这样的生产是不能继续下去的。

在考虑需要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本企业的需要，而且要考虑社会的需要。有些企业的废料加工，从本企业来说，不一定是迫切需要的；但是，从社会来说，却是非常需要的，不能因为本企业不需要，就不积极利用这种废料进行生产。同时，不但要考虑到今天的需要，而且要考虑到将来的需要。有些是今天需要的，将来就不一定需要，有些是将来需要的，今天就不一定需要，要按照轻重缓急，分别对待。例如，有些企业所需要的原料、材料或者协作件，由于大跃进，暂时改变了原有的供应关系和协作关系，但是，在过一个时期之后，原有的供应关系和协作关系还可能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卫星”厂或者扩建本厂的某些车间，就要十分慎重，不能因为一时的需要而盲目发展。

在考虑可能的时候，也要区别现实的可能性和非现实的可能性。对于那些目前客观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做不到的事情，就应该积极地去创造条件，而不要立刻勉强地去做；对于那些经过努力确实可以做到，而且又比较经济合理的事情，就应当努力去做。

总之，要把需要和可能辩证地统一起来，使大型企业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真正做到经济合理。



科学与生产

刘 仙 洲

科学这一个名词，在欧洲文字中的原义是“知识”。而知识的基本来源是人们生产活动的实践。人们在生产活动的实践中，随时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主观愿望上想着怎样做，而力量上做不到。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远古的人类开始先创造出简单的石刀石斧等原始工具。从那个时期起，人类就掌握了具有“刃状”的工具能够帮助他们做工的知识。就科学上的意义说，从那个时期起，人类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掌握了“尖劈”这一种简单机械可以“用小力发大力”的知识。后来许许多多的具有刃状以及具有锥形的工具，都是从这些知识发展出来的。到了农业时期，因为播种和收获都具有季节性，需要了解天时，而天体运行及寒来暑往等现象，又最容易为人类所观察和感觉，于是初步的天文历法等知识就首先发展。所以就自然科学的发展史看，在任何民族中，天文历法等都是发生最早的。埃及在纪元前四千多年已有使用历法的记录。我国在殷代（纪元前1401年到纪元前1122年）遗留下来的甲骨文里边，也有

不少有关天文历法的简单记载。在我国几千年的科学发明里边，发展的水平比较高，发展的时间比较早，至少在十四世纪以前，总占在世界领先地位的是水力浑天仪和天文钟。从汉代张衡开始，唐代僧一行、梁令瓚更进一步，宋代苏頔，元代郭守敬等继续有所增益。他们的主要目标，都是要准确地制定全年的季节，以便“授时”，即指导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适当时期。因为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需要寻求天时周期的规律，以便适时的播种和收获。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这是科学来源的极其正确的论断。

我国现在仍有传本的古代数学书，最重要的一种是“九章算术”。它的内容包括二百四十六个应用题目，分别隶属下列九章：第一章，“方田”，主要是关于地面面积的算法；第二章，“粟米”，主要是关于由粟求米、由菽求豉及粮食交易等的算法；第三章，“衰分”，主要是关于按等级比例配分的算法；第四章，“少广”，主要是开平方开立方等算法，也是有关计算面



积問題的；第五章，“商功”，主要是关于体积的算法；第六章，“均輸”，主要是关于政府征收食粮的算法。其余三章，“盈不足”、“方程”和“勾股”，也多是直接間接和生产有关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对算术和初等几何的产生有这样的說法：“和其它所有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們的实际需要上产生的；是从丈量地段面积和衡量器物容积，从計算时间，从制造工作中产生的。”我国数学的发生恰恰合乎这个論断。

在我国历史上，对于耕种技术和农具等有不少发明創造的人應該首推汉武帝时代（紀元前140年到紀元前87年）的赵过。在“前汉書”“食貨志”上說，在汉武帝末年（約紀元前90年左右），因为連年用兵的原故，国家积蓄很少，他下詔力求增加农产，使赵过为搜粟都尉（相当于我們的农业部长吧）。赵过发明了輪种制度，并在中耕除草的同时，逐漸向苗根培土，使作物能耐风、耐旱。在农具方面，他对于耕田、耘草和播种等方面也都有新的創造。結果能使一亩的产量比按照旧方法耕种的增加五斗以上，有的甚至能增加一石以上。到昭帝时（紀元前86年到紀元前74年），开辟的土地和粮食的积蓄就都大量的增加。到宣帝时（紀元前73年到紀元前49年），連年丰收，谷的价格每石低到五錢。^①根据这一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赵过的发明創造完全由于当时国家对农业增产的要求，后来他也确乎是达到了大量增

产的目的。我国对于利用水力为原动力的发明，應該首推东汉光武帝时代（紀元25年到紀元57年）的杜詩。在“后汉書”“杜詩传”上記載着，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的时候（紀元31年），杜詩被調到南阳当太守。他节俭清廉，又善于計劃，爱惜民力。因为当时鑄造鉄农具的任务很大，用人力鼓风費人力过多，他就創造了一种用水力为原动力的“水排”来鼓风。用力很少，收效很大。^②就科学上的意义說，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能够发明利用水力拉风箱，帮助冶鑄，大量鑄造农器，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使他做出这样发明的动力，也是因为当时有大量生产鉄农具的需要，用旧日的人排和馬排（用馬力拉风箱）已有相当困难的原故。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科学能够有高速度的发展，恩格斯也是归功于生产。他在“自然辯証法”“科学历史摘要”一节中

① 前汉書食貨志：“武帝末年，……下詔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畝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苗生叶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尽而根深，能风与旱。……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隴田隴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至昭帝时，……四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賢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錢。”

② 后汉書杜詩传：“（建武）七年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善于計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鑄为农器。（原注：冶鑄者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地。郡内比室殷足。”



写着：“如果說，在中世紀的漫長黑夜之后，科學以夢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並且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末我們也得把這個奇跡歸功於生產。”

去年我國農業部編印的“農具圖譜”，其中共有：動力機械、排灌機械、施工、運輸、加工、畜牧、林業等各方面的農業機械三千五百多件。據統計，其中百分之五十八，即兩千件以上是最近一兩年工具改革運動中群眾改革創造出來的。而且無論就數量和質量說，都超過過去兩千年的成就。這也是因為在農業合作化以後，全國農業生產大躍進迫切要求的必然結果。

根據清華大學過去在工程技術方面科學研究工作的情形看，也完全可以證明生產是科學的豐富源泉，是推動科學向前發展的巨大動力。離開生產的推動，科學研究就難做出成就。從一九三二年清華大學成立工學院起，到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的十七年中，教師們在工程技術方面共發表了大約一百五十篇論文。這些論文絕大多數是對已有的科學成就的介紹和綜述，其中有實驗結果的不到十分之一，有七篇完全是翻譯的。解放以後，國家經過了三年經濟恢復工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就對於學校的科學研究工作有所推動。首先是水利系，因為它一開始就接受了若干對國家工業建設有關的研究試驗題目，如官廳水庫、丰满水電站、包鋼沉沙池及劉家峽水利樞紐等。其次是土木系、機械系和電機系，也是因為接受了若干對

國民經濟有迫切需要的研究問題。自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參加科學研究的教師人數和科學研究的項目都繼續有所增加。並且有一個極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各系和各教研組所選的科學研究題目，凡是結合國家生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都得到比較好的成績；不結合國家生產的，結果成績就很差，甚至毫無成就。到一九五八年，因為全國工農業大躍進，學校貫徹執行了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就更好地推動了學校的科學研究工作。因為工農業生產不斷向學校科學研究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促使學校科學研究工作加速發展並為它服務。同時生產實踐又不斷豐富科學研究的內容和向它們提出新的要求。這樣互相推動、互相促進，就使學校科學研究工作走上無限廣闊的道路。有不少科學研究工作的成果，都是在工農業生產大躍進以前所不能想象的。生產能夠推動科學的發展，就過去幾年，尤其是去年清華大學的科學研究工作的情況看，又得到了一次充分的證明。

二

以上是說明科學的發生和發展，主要依靠於生產的發展。但是當人類掌握的科學成果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時，其中有一部分尤其是所謂基礎科學的理論部分，有時不是很緊密地或立刻地和生產聯繫在一起的。它往往是或遠或近地走在生產的前



边，为新的生产任务探索道路，或是使我們的理性知識提高到更高的阶段。几年，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以后，經各方面科学进展的融会貫通和各方面实际需要的迫切要求，才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类的生产服务。在科学发展史上，这样的实例是不不少的。例如：原子核物理，在一八九八年，当居里夫妇初发现放射性物質时，談不到对当时的生产有多大关系。但在今天它影响的范围竟是如此广闊，而且正在发展。再以半导体的发明和发展为例：早在十九世紀末期，半导体硒的整流及光导等作用已被发现，但是一直到几十年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无綫电雷达技术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新的高頻检波器时，才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在各种科学的領域里边，尤其是它們的基础理論部分里边，常常能由一个极簡單极整齐的定律或公式，表达一个极其广泛的定理。有时更能互相启发、互相推演，由原有的公式导引出其他新的公式来。它們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們有的是由生产实践开始，有的即使不是直接由生产实践开始，也是在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經過实验証明，然后总结出来的。这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联系实际的理論”。因为它們是联系实际的理論，就一定經得起实践的考驗，而且經過一定的時間以后，它們一定会直接或间接地为生产服务。

就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論为例，它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早在相对論提出以前，

就已經有人根据电磁波传播的实验結果，証明不能用原有的理論（牛頓的速度合成定理）来解释，并且指出，为了解释得通，除非是否定绝对空間和绝对時間的概念。爱因斯坦就是根据这样的論据，勇敢地对經典力学和传统的对時間空間的概念提出怀疑而完成他的相对論的。可以想見，如果没有实验，新的理論是不会凭空成立的。

李政道和楊振宁对于量子力学方面三十多年来被大家公認的宇称守恒定律加以修正，也是由于有一些实验事实，从宇称守恒定律的观点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并且知道：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定律是經過許多实验得到了証明的，但在“弱相互作用”中，只是按照推广的看法，認為它也是适用，并没有实验的依据。因之，就怀疑到在“弱相互作用”中可能就不守恒。后来經吳健雄把鈷60冷却到绝对温度 0.01° 的低温之下，得到証实，这一修正才完全成立。

由以上所述的情况看，可知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当开始和繼續推进时，主要是由生产上的需要。到科学成果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有一部分所謂理論性的科学发生，但是它也必须是在原有的經過实践或实验証明的基础上，再一步一步地經過实践和实验的証明，也就是說“理論必須联系实际”，才能成为真正有价值的理論。而且这种理論，或迟或早总可直接或间接地达到为生产服务的阶段。



三

过去几年以来，我国有一部分科学家，尤其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科学家，对于科学和生产的關係抱着完全錯誤的看法。在他們看起来，理論是同生产实践不相干的，凡結合生产的科学研究問題都沒有創造性。他們接受了过去一两千年我国讀書人的传统偏見，存在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坐而論道謂之士”等錯誤观点；他們多是出身于地主或資本家的家庭，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劳动的实践；有的更加上接受过欧美資本主义国家个人主义的科学研究訓練。他們輕視生产，提出所謂“生产低賤論”，認為“生产是粗活”，認為科学研究題目一結合了生产，就会降低水平。結果即使遇到对社会主义建設或对国民經济有十分迫切需要的問題，他們也認為理論性不高，不願担任这种問題的研究工作。甚至需要实验工作較多的題目，他們也不願意作，認為这样的題目都不够“理論”。例如：在一九五七年，我国东北丰满水电站为了提高輸送到沈阳工业区的电力容量，要进行一些試驗研究。这本是对国民經济有相当意义的問題。但是，当电力工业部派人来清华大学接洽时，有关教研組的主任却認為他們用的电压只有二十二万伏，没有什么新理論問題而拒絕接受。而他自己却选了有关四十万伏电压的电力輸送問題作为科学研究題目。結果只是作了若干

不切实际的假設，推导了許多数学公式，并不能解决对当时來說有迫切意义的問題。总之，他們是把科学怎样发生和怎样发展的正确传统完全抛开，認為只有脱离实际的“理論”才是科学。他們宁可在資本主义国家杂志夹縫里边去找題目，也不願研究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問題。更加严重的是他們为了快出論文，就从自己的头脑中任意地不切实际地“假設条件”，再根据自己假設的条件作些数学游戏，使外行人看了，真是“莫測高深”。这样就使科学研究工作整个离开了正确的方向。例如：清华大学水利系某个右派分子一向不承認“知識的来源是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所以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只是一些“紙上談兵”，作些“数学游戏”。一九五六年，为了申請科学奖金，他竟用所謂“相关法”創造了一个“汉口夏季雨量的公式”，即：汉口夏季的雨量 = $0.35 \times$ 上海五月間的风速 - $0.49 \times$ 长春四月間的气温！把三个相去几千里不同時間和不同性質的数据主观地硬凑在一起，算做他新发明的一項規律！

应该深刻地引为教訓的是：在党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到反右派斗争以前的一段時間里，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于科学研究的評價，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些人的欺騙，过于重視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理論，而对于真正对国民經济有很大貢獻的科学研究成果反重視不够。結果对于大部分青年学生和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研究方向和方法，发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自从反右派斗争和进行科学研究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以来，对于前边所说的一部分所谓“科学家”轻视生产，专门重视不切合实际的理论，只注重个人名利，不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多数科学工作者的头脑中，错误观点已得到了大大的纠正。为了不致再发生偏差，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应当经常加以注意和批判。但是又有少数人偏到了另一个方面去。他们认为：既然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决定于生产，那么，只有生产中能出科学，理论的研究就不必要了。清华大学自去年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有少数人在思想上就发生了这样的错误想法。他们认为学校大搞生产劳动，既可为国家生产必要的产品，又可提高科学研究的质量，那么，纯理论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甚至理论课程的学习都可以不要了。有少数学生也确实发生过轻视课堂理论课程学习的现象，这种偏向很快得到了纠正。

在科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只要是结合实际，联系实际的，只要是一步一步地实事求是地根据实验证明来的，那就是应当重视的，这在前边已经说过了。在学校中学习理论课程，则更是不应轻视。因为任何一门课程里边的正确理论（不正确的当然应加以批判）都是经过前人的实践及实验所总结出来的规律，学生学习了它，可以省去不少自己摸索的时间。这正是国家建立学校以培养后一代的主要原因。若认

为任何知识都要自己从头由生产实践中去摸索，那当然是错误的。

又有个别直接担负生产任务的人错误地认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既是由生产所决定，那么就专心致力于生产工作好了，不必再搞什么科学研究工作。这也是错误的。因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虽说是由生产所决定，但是科学的成果却会转过来大大有助于生产。在人类整个的历史上属于这一方面的实例是很多的。科学与生产有互相启发，互相推动的作用。人类社会愈进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愈高，需要科学研究工作的范围也就愈大。因为，过去科学的成果是自然规律的知识的积累和间接知识的宝库，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又是进一步向前摸索的工作，它们对于目前和今后的生产都有极重要的关系。就各种工程技术科学说，它们都具有创造新产品和扩大生产力的作用，因之也就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蒸汽机的发明促进了欧洲的工业革命，任何一项技术革新或工具改进，都能够提高生产率几倍到几十倍。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我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下，这一类实例很多，不待详述。就有关农业的各种科学来说，如农艺、植物生理、育种、土壤、昆虫、化肥、灌溉等，更是直接有助于农业生产的。一种小麦育种的研究成功，每年就能够为国家多生产若干亿斤的小麦。所以直接担负生产任务的人，更是决不可轻视科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不然，就和少数轻视理论课



程学习的学生一样，也偏到另一方面去了。

四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和社会制度有密切关联的。根据生产上的需要和要求，在科学上有所发明或有所发展，当一开始的时候，总会对于生产有提高的作用。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和政治的权力操在剥削阶级的手里，凡有显著利益的事，总容易被剥削阶级所注意并设法抓到他们的手里去。我在整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过程中，发现在我国封建时期的晋唐两代，对于水碓、水磨、水碾等能提高人民劳动生产率的发明，有很显著的垄断事实，以致大大引起人民的不满。我国利用水力当原动力以帮助人民作工，自东汉初年即已开始。前边说过的杜诗发明用水力拉风箱和桓谭“新论”（桓谭也是东汉光武时人）上记载的“役水而舂，其利百倍”，就是证明。不久，到了晋代（第三世纪前后），不但发生了被大官僚和大富豪垄断的情形^①，同时更发生了只愿剥削阶级的利益，对人民反而有害的结果^②。到了唐代，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根据“唐会要”及“旧唐书”上的记载，这些本来是有助于人民生产的发明，被当时的“王公”、“公主”和“寺观”等加以垄断^③。可见，在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往往是服务于少数有权力的剥削阶级，对多数人民有时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在资本主义的开始阶段，科学与生产的相互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即生产上的要求，大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转过来也推动了生产的前进。但是当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科学与生产之间的相互推动，一方面虽说仍发挥着它的一定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下列几种弱点，就发生了一定的“停滞和腐化的趋势”

- ① 晋书王戎传：“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太平御览卷762引晋书：“王戎为司徒，好治产业。周遍天下，水碓四十所”。世说：“王戎既贵且富，区宅水碓，洛下莫比。”王麟农书引王隐晋书：“石崇有水碓三十区。”
 - ② 晋书卷46，刘頔传：“……转任河内。……郡界多公主水碓，逼塞流水，转为浸害。頔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
 - ③ 唐会要，卷89，碾碾条：“开元九年（721年）正月，京兆少尹李元叔奏，疏三辅诸渠。王公之家，碾渠立碓，以害水功。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至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户部侍郎李栖筠，刑部侍郎王翊，充京兆少尹崔昭，奏请折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碾七十余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粟稻三百万石。大历十三年（778年）正月四日奏，三白渠下碾，有妨台废拆，总四十四所，自今以后，如更置，即宜录奏。其年正月，坏京畿白渠八十余所。先是，黎千奏以郑白支渠碾碾阻隔水利，人不得灌溉。请皆毁废，从之。时升平公主，上之爱女，有碾两轮，乞留。上曰：‘吾为仓生，尔识吾意，可为众率先’。遂即日毁之。”
- 旧唐书郭子仪传：“大历十三年（778年）有诏，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碾，以防民溉田。升平公主有脂粉碾两轮，郭子仪私碾两轮，所司未敢毁彻。公主见代宗诉之。帝谓公主曰：‘吾行此诏，盖为仓生。尔岂不嫌我意耶？可为众率先。’公主即日命毁。由是势门碾碾八十余所皆毁之。”



(参考“列宁全集”第22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多成了各个资本家的“专利”,不能广泛地被人民所采用。有的资本家甚至买了专利权,加以封锁冻结。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用。(二)科学家们从事研究工作,往往从自私自利的个人名利出发,相互隐瞒,这样就很难采取集体研究的方式,但是晚近以来,凡是重大的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工作,又决不是少数人,甚至决不是少数专科所能胜任的。(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为资本家的高额利润服务,因之很难动员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因为具有这些根本性的无法克服的弱点,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到一定的阶段以后,科学技术是很难再有高速度的发展,他们将越来越落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后边。

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进步的科学技术成就都能被广泛地采用,成为全民的财富。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更是大力提倡集体方式,甚至尽力吸收所有有关群众的智慧。而人民又因为认识到这些工作都是为集体谋利益,为社会谋利益,为国家谋利益,甚至为全人类谋利益,所以积极性就能大大地提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具体表现,是历史上任何社会所不能有的。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高速度发展,远远地把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抛在后边,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国在过去几年中,尤其是在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中,各方面的科学技术都有高速

度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我国目前正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这一伟大事业的完成,不仅关系着我国繁荣富强的前途,关系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它还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帝国主义阵营力量的对比和全人类进步事业的早日实现。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的条件主要是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大大提高。这样,一方面就形成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推动力,一方面也就需要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加倍努力,以推动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回顾建国后十年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在科学工作方面的领导和所指出的方针都是十分正确的。这在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聂副总理历次对科学工作的报告和发言中,都可以看出。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人数和应担负的任务相比是很不够的,所以总的科学研究方向,应当主要是为当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一部分科学家从事和当前的生产实践没有直接关系的科学研究,为新的生产任务探索道路,也是同样的重要。这种研究,当然是要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下进行。直接担负生产任务的人,也有必要同时注重科学研究工作。我相信,在我国社会主义工农业高速度发展的推动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对科学发展无比优越性的条件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一定会得到辉煌的成就。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清华大学副校长)



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

——紀念“五四”四十周年——

胡 繩

新中国建立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广大知識分子，不断地开展着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通过这个运动，多数知識分子有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并不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才发生的。早在四十年前，五四运动的时期，已經有一批知識分子摆脱了他们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离开了他们所出身的阶级，走到了工农群众中间。他们是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进行自我改造的第一批中国知識分子。以后，許多革命知識分子繼續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因为他们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的压迫，渴望改变落后、贫穷、被压迫的中国现状；而他们发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离开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知識分子中的先进分子都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

思想和哲学思想支配下面。五四运动发生在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經宣告失败，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經开始，中国无产阶级已經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所以从五四运动开始，历史就向中国的爱国知識分子提出了一个自我改造的任务。

五四运动以来，最先进的知識分子，不顧反动統治势力的残酷迫害，克服了走向工农群众中去的种种困难，勇敢地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们中有許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中国革命知識分子的光辉模范。

但是，在旧中国，大量的知識分子仍旧束縛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中间。他们中的許多人，虽然在一个时期由于他們的爱国热情和政治敏感而参加了革命，但是因为他们有害怕人民的倾向，并且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往往又退出革命，而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犹疑不定。有一小部分人甚至走进了反革命营垒，成为人民的敌人。在那时候，也有不少坚持民主主义立場的知識分子，通过自己的经历而逐渐看出



了；如果不去依靠工人农民群众的力量，他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

全国解放以后，阻碍知识分子进步的反动统治势力已经灭亡。资本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资本家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也逐步地在基本上消灭了。知识分子亲眼看到了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看到了只有依靠社会主义、依靠共产党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成为一个广大的潮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愿意积极地为改造自己而努力。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在自己思想中的一个革命，在改造过程中，不免要经历许多矛盾和困难。这是新生之前不可避免的“阵痛”，在克服这种矛盾和困难之后，就会真正感到心情舒畅。当知识分子保持着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往往并不是舒畅的。在旧社会，人们常常说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其所以痛苦，就因为他们在革命以外彷徨，而听任旧社会安排自己的命运。在新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积极地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改造，那就是长期保留着自己的落后思想和周围蓬勃发展的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面前，也往往会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和在积极地改造自己思想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是根本不同性质的。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懂得了人们必须服从客观真理，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道

理；积极地进行自我改造，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和执行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共产党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同时积极地帮助他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改造。有人以为，既要团结，又要批评，这是自相矛盾。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向知识分子指出了他们的长处，也指出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无产阶级尊重知识分子，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尊重他们所掌握的文化科学知识，尊重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而对于他们身上的个人主义的坏东西，当然不能加以尊重，而且要通过思想斗争帮助他们克服这些病毒。这种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不免是尖锐的；但是尖锐的斗争仍然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共产党诚恳地帮助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因失败而沮丧的时候，勉励他们前进；当他们有了某些成就而得意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骄傲；当他们迷失道路，彷徨无措的时候，为他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所以许多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懂得了共产党是他们的最好的诤友和唯一可靠的引路人。

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想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尊重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文化知



識，而是竭力頌揚知識分子身上脫離人民群眾的各種惡習，鼓勵這種惡習，以便宜於加以利用。前兩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也是用的這種方法，他們裝模作樣地把知識分子說得好象身上每一個細胞天生都是聖潔的。實際上，他們是想把知識分子拖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骯髒泥坑中去。

在一九四九年，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擁護人民共和國；而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發動的風潮中，結果是一小撮右派分子在廣大知識界中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事實證明，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以及他們的代理人是徹底失敗了。這就是因為，真理並不在他們的手裡。無產階級是依靠真理，把廣大知識分子吸引到自己這一邊來的。跟着真理走，這是中國的愛國的正義的知識分子的光榮傳統。

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因為過去的教養和經歷的不同，以至受年齡等等的限制，在自我改造中能夠達到的水平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在全國解放後，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首先集中在一個問題上，就是劃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同人民大眾之間的界限。對於許多知識分子，認清帝國主義的面目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隨着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進展，又進一步產生了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了在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判別是非的六條標準，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和黨的領導這兩條。這些標準也正是對廣大知識分子在自我改造中的最基本的政治要求。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曾經在右派分子進攻時發生了程度不等的動搖，他們從反右派鬥爭中受到了比較深刻的教育，看出了要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中站在“中間”地位，是毫無出路的。

反右派鬥爭還使人們看到，為了徹底解決政治立場問題，重要的是要克服那種看一切問題都從個人利益出發的習慣，克服那種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的態度。有不少知識分子為了克服自己的缺點，已經在去年工農業大躍進中開始深入群眾，定期下廠下鄉，參加勞動，從而開始改變了對勞動人民的態度，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覺悟。這無疑是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一種必要的方法。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自己的業務工作中，有一部分人具有認真切實的好作風。但也有一部分人濃厚地表現着資產階級的惡劣作風，例如妄自尊大，強不知為知，把學術當作私產，偶有所得，就企圖加以壟斷，有個別分子甚至嫉恨別人的進步，剽竊別人的成就等等。這種壞作風是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集體生活不能相容的。人們當然不應當保留這種壞作風，而應當在明確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改變了脫離群眾的狀況的前提下，努力克服這種壞作風，才能够好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



毛澤东同志說：“凡是真正願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識分子，我們都应当給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关系，帮助他們解决各种必須解决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积极地發揮他們的才能。”这是我們党和国家确定不移的方針。

知識分子自我改造中的更进一步的問題，是要逐步地抛弃資产階級世界觀而树立无产階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觀。为了达到这一点，就应当認真地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真正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有志的知識分子都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而只要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有些知識分子已經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已經基本上从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轉变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但是对于許多知識分子說来，还需要一个較长的时期才能做到。因此，知識分子如果以为自己不需要繼續进行改造，停止不进，这是不对的。同时，如果在世界觀的問題上要求过急，为求速效而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那也是不对的。

世界觀的彻底改变，不是簡單的事情。承認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有时并不等于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觀。馬克思主义是最革命的，也是最科学的世界觀。它从来依靠自己的正确性而使人信服。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往往是經過了这样那样的怀疑，然后才信服了馬克思主义。这样的信服是真正的信服。如果不是把馬克思主义当作真理，而是在实际上用自己的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的世界觀来歪曲馬克思主

义，那显然是不利于思想改造的。有的人正在努力学习馬克思主义而还没有学好，他們同那些根本不願意接受馬克思主义的人当然是不同的。但即使对于某些不願意接受馬克思主义的人，我們也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毛澤东同志說：“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終不願意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不願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們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們就应当給他們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学术問題上，有不少在資产階級学术界做过工作的人，現在开始努力运用馬克思主义来进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这是很好的事情。繼續进行这种工作，不仅对于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有益，而且是为发展我国学术工作所必要的。无产階級为要建設社会主义，就必须批判地吸取資本主义的一切科学和文化成果。过去，中国資产階級学术界缺乏一个很大的发展，他們在翻譯介紹外国的学术和自己进行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他們并不是一无所。把資产階級学术界的成就全部抹煞，是不对的。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一切前人的成就固然都不能簡單地否定，在社会历史、文学艺术方面，資产階級学术界所作的某些資料整理工作和某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是对我們有用的。当然，在吸取他們的成就的时候，必須注意清除各种資产階級的偏見和謬見，并且克服其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用



資產階級權威的名義來阻止人們繼續前進，則是我們堅決反對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應當是科學地審查資產階級學術界的成就，不忽略其中有意義的東西，同時對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認真的批判，用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來批判和克服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這種批判，如同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

在科學和藝術工作中，我們要在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基础上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社會主義的藝術工作和學術工作都應當是具有豐富內容的大花園，凡是確實在某一方面具有專長的知識分子都可以作出自己的有益貢獻。在許多學術問題上，還可以而且需要各種不同的學派和不同的見解，以便經過充分的自由爭論，達到正確的結論。馬克思主義也一定要通過對各種錯誤觀點認真地展開辯論，來克服各種錯誤觀點，這樣，才能不斷地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並且使馬克思主義在各方面的學術工作中得到發展。過去在學術研究上有所成就的舊知識分子，一旦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他們的學問就有可能發出更大的光輝。有些舊知識分子，雖然還沒有學好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仍能在學術工作中提供在一定範圍內有意義的成就，也應當鼓勵他

們進行這些工作。同時應當看到，在今後學術界中還會有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觀點和其他錯誤思想出現。馬克思主義者不害怕它們的出現，而應當在它們出現的時候，給以科學性的批判。這樣，才有助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也有利於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有利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在四十年前開始在中國傳播，當時只是為極少數先進的知識分子所掌握。在這四十年中間，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發展得多么迅速！現在，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已經成為我國知識界的共同的武器。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正在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以求進一步改造自己；一批批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培養的新的知識分子正在不斷地生長起來。我國的知識界的面目已經開始發生根本的改變。無論是正在進行自我改造的舊知識分子或是年青的新的知識分子，都應當在政治上和業務上不斷地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努力克服自己的缺點，不斷地向前進步。一個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掌握了現代科學文化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巨大隊伍一定能夠逐步形成起來。為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須建立這樣一個知識分子隊伍。在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的時候，我們應當為更好地完成這個任務而努力。



农业中学大有可为

——陈光——

最近，我們在江苏省江阴县参观了利港农业中学和后悔农业中学的教学工作，并听取了申港农业中学校长关于该校工作情况的汇报。这三所学校的基本情况，大体上相同。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教师、学生都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干劲足，热气高，艰苦奋斗，蓬蓬勃勃，显示了农业中学这一新形式学校的旺盛的生命力。从这

几所学校的办学情况，可以看出农业中学广阔的发展前途，使我们增加了无限的信心。

江苏省的农业中学，自去年三、四月间迅速大量地发展起来之后，五月份就转入巩固提高的阶段。经过整顿，多数学校已经上了轨道，一般比较巩固。利港、后悔和申港农业中学在开办之初，和全省其他农业中学一样，在物质设备、师资条件方

面，都远远比不上全日制的普通中学。当时有些人对农业中学能不能办得好，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可是在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和师生共同的努力下，这些学校的面貌，都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在公社化运动中，学校又适当地进行了集中。利港农业中学由原来的七所并为四所，后来又由四所并为一所。现在全校有六个班级，学生三百零三人，教师十一人，公社派来指导生产的老农和技工七人。后悔农业中学由原来的九所并为一所，现有学生五百零九人，教师十七人。申港农业中学由原来的七所并为一所，现有学生三百零六人，教师九人。学校过小，不利于教学和生产；过大，也不利于领导和管理。适当地把一些过小的学校加以合并集中，是完全必要的。一般说来，农业中学的规模，以一社一校（大社一社数校），二、三百人左右较为适宜，最多不超过五百人。学校从分散到集中，从单班到多班，有利于教学，有利于生产，好处很多。由于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师资加强了，教学研究活动增加了，学习和生活的条件改善了，这样，师生的干劲和信心更足，公社党委更便于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学校的思想工作、教学工作和生产工作，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农业中学是以语文、数学为重点课程。现在，利港农业中学、后悔农业中学和申港农业中学的教学质量，较初建时都有显著的提高，生产工作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上学期结束之前，江阴县文教局曾组织利港农业中学初一春季班（因为无秋季班）的学生和利港普通中学初二秋季班的学



生，就語文、数学两門主要課程进行統一測驗。測驗結果，以总平均分数計算，語文成績：农业中学为八十点四五分，普通中学为七十四点四分；算术成績：农业中学为七十四点二分，普通中学为六十八点九分。这一次測驗的結果，使許多人感到意外。經過这次了解，我們觉得并不是偶然的。农业中学在教学工作上有許多特点。在这些学校里，开始建立起同志式的新的师生关系，教师、学生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互相交心，互敬互爱，問难释疑，亲密无間；他們都是青年人，都有强烈的共同的求知知識的欲望，因而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共同促进，教学相长。这是一个特点。学校教师大都是新的高初中毕业生和从小学教师中抽調出来的，他們的基礎較差，缺乏教学經驗，自知知識不足，教而后知困难，肯虛心学习，刻苦鑽研。他們在教学工作中受資产階級教育观点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很少，在教学內容和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能联系实际，所以教学效果良好，这是又一个特点。农业中学的学生貧雇农子弟較多，一般年齡較大，学习自觉性較高，加上一面学习，一面劳动，在学习中劳动，在劳动中学习，相互推动，相互渗透，因而理解能力較强，运用較快，知識容易消化，容易巩固，这又是一个特点。因此，教学質量能够較快的提高。同时，普通中学对农业中学教师在教学业务上的具体帮助，及时解决教学工作中的困难問題，也是提高农业中学教学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业中学在教学上应当向普通中学看

齐，使自己逐漸接近和达到普通中学的水平，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因此，今后农业中学必須繼續同附近的普通中学挂鈎，参加他們的教学研究活动，虛心学习他們的教學經驗，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学业务水平。同时，普通中学，也必須积极地毫无保留地認真帮助农业中学的教师提高教学水平，而且应当学习农业中学的有益的經驗，共同提高，共同进步。

农业中学实行半耕半讀制度，不仅要教学好，同时也要生产好。青年一代接受了現代农业科学知識，掌握新的生产技术，才能有利于发展生产力，逐步地使农村摆脫貧困落后的状况。这儿所农业中学在生产劳动上所获得的成就，充分地說明了这一点。

农业中学在开始进行农业生产时，干部和群众几乎都不大相信他們能搞好，少数人甚至采取否定的态度。他們說：“种田佬仍旧学种田汉的东西，有什么用哩！”利港人民公社的社、队干部就担心农业中学学生搞不好生产。有的群众說：“农中农中，两头是空，学习不好，荒田祖宗。”但是利港农业中学的全体师生，不但沒有泄气，反而更加鞭策自己，鼓足更大的干劲，將社里拨給他們的一百四十亩秧苗不壮、土質瘠瘦的三类田，改造成为一类田。他們的措施是：首先打破了認為水稻直播田不能中耕的迷信，进行了七次除草；自制土化肥，采取高温速成堆肥法，先后追肥五次，使水稻生长茁壮；在水稻成熟期中，发生了稻热病，发现了稻椿象虫，他們又自制土农药，同病虫害进行了四次搏斗。他



們终于获得了平均亩产干谷一千一百一十四斤的成績，超过了全社的平均产量。这一胜利，不仅鼓舞了全体师生搞好生产的信心，而且在技术推广上也对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梅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大队大队长周錫洪看到农业中学学生在生产上的作用，兴奋地說：“农业中学既能学到知識，又把知識推广給社員，看来看去，就是好在这个地方。”下村有八个学生在后梅农业中学上学，回家就向社員講解新的生产技术，社員称頌他們是“小八仙”，神通广大。現在利港的群众，再也不譏嘲农业中学学生是荒田的祖宗，而滿意地贊揚他們是“农中农中，又专又紅，学习真好，生产先鋒”了。

这些学校不仅取得了农业生产的初步成就，而且也发展了手工业生产和副业生产。例如利港农业中学，他們为了适应公社化后对技术人材的需要，在校内分班設了农具制造、农艺、畜牧兽医、建筑、园艺、蚕桑等六門专业課，同时分专业进行生产。他們在生产上能够取得以上成績，是由于他們政治觉悟提高和用现代农业科学知識武装自己的結果。

利港农业中学和后梅农业中学能在短短一年中，做到語文、数学两門主要課程达到普通中学的水平，农作物的产量达到或超过当地的一般水平，这对我們展望农业中学的发展前途，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駁斥了所謂半耕半讀的学校学不到东西，提不高教学质量以及搞不好生产等等的論調。农业中学和全日制的普通中学一样，都应该提高，而且可能得到提高，怀疑农业中学不能提高，是没有根据的。

总的說来，这几所农业中学的巩固和提高，是与党委的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分不开的。公社党委对农业中学采取三抓一检查的办法，进行具体领导。所謂三抓，就是抓政治、抓生产和抓生活。这三所农业中学的校长，都由公社党委書記兼任，并且配备了党员副校长。現在已經开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建党、建团工作。利港农业中学在去冬水利工地上，就发展了一名党员，二

到东西，提不高教学质量以及搞不好生产等等的論調。农业中学和全日制的普通中学一样，都应该提高，而且可能得到提高，怀疑农业中学不能提高，是没有根据的。



西 野 作



十名团员。农业中学的生产，由党委委托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负责领导，督促检查，并经常帮助解决工具、耕畜等具体问题。在生活上，教师的工资按月发给，学生膳食也由公社加以解决。所谓一检查，就是公社党委把农业中学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在检查中心工作的同时，检查农业中学的工作；规定公社党委委员到农业中学所在的生产大队工作时，必须检查农业中学的工作，并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由于党委加强领导，就保证了这些学校能够循着党所指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康庄大道，胜利前进。

在短短的一年中，这三所农业中学能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也是与全体师生发扬艰苦朴素精神，认真贯彻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方针分不开的。这儿所学校的校舍，都是比较少而陈旧的，但是利用率却很高，课堂、宿舍、猪圈、羊栏，安排得井井有条。房屋坏了，自己修建；校舍不够，就自制砖瓦，动手兴盖。他们精打细算，克服物质条件上的种种困难。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目前，这三所农业中学的师生正以坚强的战斗意志，旺盛的劳动热情，采取有效措施，满怀信心地向着经费三自给的方向努力。这里所说的三自给，就是教师工资、学生伙食费、学杂费和簿本费通过全校师生的劳动由学校自给。这是农业中学发展中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农业中学经过努力逐步达到经费部分自给、大部分自给或全部自给，有没有实现的可

能呢？从利港农业中学去年的情况来看，是存在这种可能的。一九五八年利港农业中学养蚕收入四百元，羊毛收入七十六元，养猪收入二百八十元，养兔收入十一元，搓草绳收入二十五元，打芦席收入三百元，化肥、农药收入一千一百元，加上农业收入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三点四元，合计全年收入一万六千零十五点四元（这是校内劳动收入，义务劳动收入未计在内）。全年学校经费开支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二元。收支相抵，该校经费自给三分之二以上。利港农业中学由于取得去年经费自给三分之二以上的经验，今年又订出新的生产规划，全体师生一致表示要实现吃饭、工资、办公、书籍全部费用自给。他们的原则是农业、副业同时并举。要求吃饭靠农业，用钱靠副业。具体规划是：种植三麦一百三十五亩，水稻一百二十一亩，大豆五亩；手工业和副业，则从事种菜、植麻、养猪、养羊、养鱼、养鸡、打芦席、缝纫等，争取全年农副业生产总收入三万零八百九十元。实现了这一规划之后，该校就可以付出学生全年伙食费二万二千六百零八元（按每人每月平均伙食标准六元计算），教职员工全年工资五千一百六十元，办公添置费用一千一百元，学生书籍簿本费用一千二百十二元，合计三万零八十元。收支相抵，尚有盈余。当然，要实现这个规划，还必须经过一番努力。公社必须把这一规划纳入统一的生产规划之中，加强公社对农业中学的具体领导，并负责解决原料供应与销售问题。校内必须配备两个专职副校长，一个抓教学，一个抓生产，促使教学、生产两



高涨。我們相信，在今明两年內或者再稍为长一些時間內，在一切有条件的农业中学，做到經費大部自給或全部自給（包括教师工資、学生伙食費，学杂費和簿本費），也是可以办到的。

从利港等农业中学的情况来看，农业中学是大有可为的。农业中学是一种新形式的学校。它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产物，是在教育事业中破除迷信，进一步发展群众路綫，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的产物。我們說农业中学大有可为，就是說，这种学校可以满足我国人民学习文化、学习专业知識的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的。它在今后較长的時間內，还要繼續发展，而且是要有較大数量的发展。全日制的中学当然也将有很大的发展，数量将逐年增加。但是国家办学，必須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相应地发展，不可能一下子发展得太快。所以必須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大办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一九五八年利港公社有应届高小毕业生一百一十二人，考入利港全日制初級中学的只有三十三人，其余七十九人都进入利港农业中学，才得到繼續学习的机会。一九五九年江苏省将有应届高小毕业生四十三万人，全日制初級中学招生二十二万人，其余将近一半的高小毕业生都要进入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学习。

我們要逐步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农村迫切需要大量的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和各种技术力量。这些技术力量，要全部依靠全日制的

学校来培养是不能完全满足需要的。这就需要通过半耕半讀的学校和业余学校来培养，农业中学在这方面要担負很大一部分責任。根据利港人民公社的初步計算，要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需要各种农业技术人员六百人，工业技术人员三百九十人，共九百九十人，占該社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八。在他們的规划中，农业中学要为农业、工业輸送技术人员五百四十五人，占整个需要的技术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五。当然，这只是該公社的初步规划，数字是不够精确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今后农村对技术力量的大量需要和农业中学在培养各种技术人员中的責任。这种培养技术力量的任务，随着跃进形势的发展，将越来越显得重要。

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看不到这种重要性，認為农业中学占有很多劳动力，不加分析地主张把农业中学的超龄学生一律动员轉入生产队。这样做，我看有研究的必要。农业中学原則上規定吸收十三岁到十六岁的高小毕业生入学。但在农业中学創辦初期，为了充分滿足农村高小毕业生升学的要求，曾經吸收了一部分过去三年沒有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入学。这里面有一批超龄学生，他們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應該承認，这批人的入学，和解决当前劳动力的紧张，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的。这次，我們对这个問題，进行了一次調查，細細地算了一笔賬，发现农业中学所占农村的劳动力实际上并不很多。利港农业中学学生三百零三人，为利港人民公社全社人口二万零五百人的百分之一点四八。也





永远跟着毛泽东

月老作

就是说，在一百个人中，只有将近一个半人在农业中学学习。学生入学年龄在十七岁以上的八十六人，如果这些人都当作整劳动力，那末，则占该社劳动力总数六千二百人的百分之一一点四，这八十六人每天还要以半天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如以减半计算，为数更少；全社有八十三个生产小队，平均两个小队只分出劳动力一人。根据利港农业中学学生座谈，他们在家整日劳动，平均每人每天得七分工，现在进入农业中学，半天劳动，平均每人每天可得五分工，只差两分工。因此，从劳动生产率

来看，该校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实际所占的劳动力，就为数更少了。我们相信，让他们继续学习下去，对今天的农业生产并无多大影响。因此，农业中学现在在校的超龄学生，自愿回家生产的，可以转为业余学习；如果学生坚持学习而所需生活费用又能通过劳动收入全部自给的，可以让他们继续学习。我们必须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考虑，把生产物质财富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统一起来考虑，这样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矛盾。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毛澤东同志著作中的比喻

唐启运



毛澤东同志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比作紙老虎，确实是十分鮮明的比喻。这个比喻使人們形象地認識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那种虛弱无能、外強中干的本質特征，使人們受到了深刻的政治教育。

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中，許許多多的比喻都是十分鮮明的。他曾經把日本侵略者比作妖精，比作驢子，比作野牛，比作瞎子和聋子。把帝国主义比作怪物，比作大山。如：

“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三，884頁）^①

“使宅（引者按：指日本侵略者）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陣，我們一声喚也要把他吓一大跳，……”（二，501頁）

“我們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們变成瞎子和聋子，……”（二，482頁）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一，156頁）

“現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

封建主义。”（三，1102頁）

曾經把美帝国主义比作野兽，把各国反动派比作渣滓，比作蠢人。如：

“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計劃，象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及其他地方乱窜，集合了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話。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

曾經把那些当帝国主义走狗、站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爭权夺利的大小反动派軍閥比作大狗、小狗、飽狗、餓狗，把頑固分子比作狗屎堆，把反动派比作粪坑。如：

“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引者按：指国民党內部之間的斗争）之間的一点特別有趣的爭斗，……”（一，143頁）

^① “三”是“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下同例。凡不是选集中的例句，另在句后注明。引文內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假如赫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三，1116页）

“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頑而不固，頑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二，731页）

从上面这些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野蛮、愚蠢、肮脏、卑鄙的东西，他们就是腐臭面和阴暗面的代表。他们的本质注定了他们是见不得光明的，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曙光所照亮的世界里将最后失去其立足点而死亡。

在另一方面，另一个极端，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比喻中却看到了光明世界的代表，他们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人的人民群众，是烧毁腐臭面和阴暗面的人民军队，是引导人民前进的共产党，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一，134页）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三，1102页）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爐，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一，67页）

“它（引者按：指中国革命高潮）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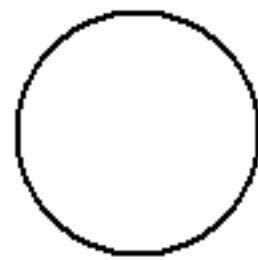
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嬰兒。”（一，110页）

“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二，462页）

从这些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和他的军队，和他所热烈拥护的社会主义，和他所衷心爱戴的共产党是多么的坚强有力，他们是铜墙铁壁，是上帝，是如来佛的手掌。他们又是多么的美丽可爱，他们是光芒四射的旭日，他们是光明美好的象征。

从上面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比喻中，我们可以晓得，比喻并非是单纯的語言技巧问题。当然，不懂得語言技巧是不能写出好的比喻的，然而这不是毛泽东同志善于比喻的根本原因。我们在这两种比喻中，觉得它之所以能使人产生无穷的鼓舞力量，之所以能使人受到极其深刻的政治教育，首先就在于它鲜明的思想性，在于它飽和的感情，分明的阶级的爱憎，在于它精湛的論断和科学的預見。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首先在这里探讨了毛泽东同志比喻中的鮮明性。

其次，要談的是毛泽东同志比喻中的形象性。比喻的特殊作用，本来就是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远处的东西近处化，把深奥的事理浅显化。較难理解或較难掌握的概念和事理通过比喻而显现于眼前，



使人产生实感，引起共鳴，叫人明白。但是作喻的事物，由于各人不同的选择，就会使各人的比喻具有不同的特色。毛澤东同志用来作喻的事物，是人人共知的，以及与这种人人共知的事物相适应的浅显通俗的为人民群众所欢迎的詞語。这和某些人追求奇詞僻語的比喻是完全不同的。

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时常要談到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怎么个样子呢？如果从抽象的理論上来論述，則非浩浩蕩蕩长篇大論不可，但是毛澤东同志只用了两个平凡的詞就把它特性具体地說清楚了。他說：“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一，206頁）

非一条直綫那样发展的战争形态，自然是錯綜复杂的，但是錯綜复杂到什么样子，毛澤东同志用“犬牙交錯”一語就把它說穿了。在說到抗日戰爭时，他說：“犬牙交錯的战争形态，就是頗为特殊的一点，……”（二，461頁）

游击战争有不同于正規战争的特殊性，在一定的情形下，游击部队迅速轉移就是其特性之一，但是迅速到什么程度呢，在毛澤东同志的笔下，就把这个程度一語道破了。他說：“如果敌情特別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象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二，406頁）

解放以来，人人都談批評的意义，无不举医生治病一語来作比喻，这个比喻就是毛澤东同志最先用的。这确实是比喻得浅显明白，真是三尺孩童也能領会。毛澤

东同志說：“但是我们揭发錯誤、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闌尾炎，医生把闌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三，829頁）

把沒有解决的思想問題和沒有放下的精神負擔喻为包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却未必人人都知道这也是毛澤东同志的比喻。毛澤东同志說：“为了爭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三，951頁）

把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缺点比作灰尘，也是毛澤东同志首創的比喻。他說：“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滿了灰尘；脸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滌。”（三，1097頁）

东风压倒西风也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这是毛澤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上发言时所用的。东风是清新的风，使人和气象蓬勃的感觉联系起来，而西风是凄冷的风，只能使人感觉到寒意。

望遠鏡和顯微鏡、犬牙交錯、流水和疾风、医生治病、包袱、灰尘、东风和西风，这些都是人人共知的平凡事物。毛澤东同志就是把它們用来使許多抽象的概念



或事理形象化了。

拿流传广泛的諺語、成語、典故来做比喻，是毛澤东同志比喻的形象性的另外一个特点。

“对于他們，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三，863頁）“錦上添花”是喻提高，“雪中送炭”是喻普及。

“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样罵也是空的。”（三，866頁）“阳春白雪”也是喻深入、提高，“下里巴人”也是喻通俗、普及。

“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倫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說所蒙蔽，而不知道他們笑里藏刀的可怕。”（二，585頁）“笑里藏刀”是喻外和易而內阴險的伪善者，张伯倫及其伙伴就是这样的伪善者。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內潰，……”（二，496頁）

“他們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猻散，全局就改現了。”（二，773頁）

“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二，848頁，指自由主义的表現之一。）

这些諺語、成語、典故，是汉族人民許許多多的智慧花园里的一两朵花。正因为这是汉族人民所特有的，所以用来作成的比喻就富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使人看了

特別感到亲切。

再次，我們要談到的是毛澤东同志比喻中的多样性。

几个能喻者來說明一个被喻者，这是比喻的多样性的表現之一。“长征是宣言書，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一，145頁）同是长征，但用了三个能喻者來說明。“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一，280頁）“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这样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一，278—279頁）“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釘子。”（一，301頁）也都是用三个不同的能喻來說明同一的被喻者，用碰壁、跌交子和碰釘子来喻犯錯誤。

此外，毛澤东同志所比喻的詞語，或者是口語，或者是諺語，或者是成語，或者是典故，这也是他比喻中多样性的一种表現。

毛澤东同志的每一个比喻都是經過認真的推敲和着力的錘煉的，被喻者和能喻者之間的本質联系是十分恰当和十分准确的，并不是現象的堆砌，随便作喻，而是对被喻者和能喻者之間的某方面的共同点作了高度的概括，以及与这概括性相适应的是那唯一能准确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詞語。

毛澤东同志把馬克思主义比作箭，把中国革命比作靶。他說：“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



(三, 821 頁) 就是說, 馬克思主義的箭不能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靶而亂放, 要有的放矢, 理論要和實際相結合。一個不是那麼容易懂得的理論, 由於毛澤東同志用了準確的比喻, 也就立刻懂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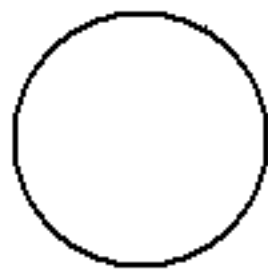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一, 127 頁), “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齋粉”(二, 684 頁), “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一, 150 頁), “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点是東風壓倒西風”(1957 年 11 月在蘇聯的發言), “中國領土台灣、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國在外國的軍事基地, 都是套在美帝國主義脖子上的絞索。”(1958 年 9 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這許多都是準確地選用了最恰當最凝煉的詞語來作比喻的; 句子的形式又是那末的直截了當, 干脆利落, 簡明精煉, 確是準確性和精煉性的巧妙結合。

通過同一事物否定式的比喻和肯定式的比喻這兩方面的對照, 更明顯地看出了毛澤東同志用語的準確性和精煉性。他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是做文章, 不是繪畫綉花。”(一, 18 頁) 革命是“暴風驟雨, 迅猛異常”(一, 13 頁); “這些作風不正, 并

不象冬天刮的北風那樣, 滿天都是。”(三, 814 頁) “這不過是一股逆風, 一股歪風, 是從防空洞里跑出來的。”(三, 814 頁) “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 大築其烏龜殼, 以為這是他們的銅牆鐵壁。”(一, 134 頁) 等等。這都是對同一件事物的兩種比喻, 兩種比喻代表兩種不同的看法, 從兩種不同的看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選用比喻所應有的思想性和正確的立場觀點。毛澤東同志的比喻所以那麼準確和精煉, 所以那麼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這和他高度的思想性和鮮明的立場觀點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總而言之, 毛澤東同志的比喻是鮮明的、形象的、多樣的、準確的、精煉的。毛澤東同志不但是偉大的人民領袖和思想家, 而且是傑出的語言大師和修辭家。不少同志都說不用看作者的名字, 看了文章也知道是毛澤東同志寫的。毛澤東同志的語言是有他獨特的風格的, 而獨特的風格所由表現的方法之一, 就是他那鮮明的、形象的、多樣的、準確的和精煉的比喻。

(轉載自“中國語文”一九五九年四月號, 轉載時, 略有刪改)



“醒々吧，美国！”

——从美国失业工人大会看到的

楊重光

业斗争中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当今年美国生产指数已有回升而汽车工人的失业问题仍然不能解决的时候，受害最深的底特律汽车工人就曾经要求向华盛顿进

四月初，华盛顿已经是春天了。成千上万的旅行者拥塞在街头的人行道上、林荫道上和公园里。每年四月的第二个星期，这里的人们都过“樱花周”，观赏日本的樱花。但是在今年这个传统的节日里，华盛顿却充满着不宁静的气氛。好几张当地报纸都写着：让今年的樱花周称为“美国的失业周”吧！因为四月八日，美国失业工人大会在这里召开。从美国十五个严重失业地区来的上万个失业工人代表，他们内心充满着忧愁和焦虑，哪有闲情逸致来看花呢！

他们带着成千成万失业工人的希望、不满、抗议和各种委托来到华盛顿。很多失业工人为了让他们的代表能来开会，让美国的政府大员们听听他们的呼声，曾用尽办法募集旅费。他们代表着多少美国失业工人的情绪和要求啊！

这次大会的召开并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汽车工人早有召开这样会议的要求。在一九五七年开始的这次美国经济危机中，汽车工人受到的损害很严重，他们在反失

行抗议性的请愿，并要求“劳联—产联”尽快召开失业工人大会切实解决美国工人的失业问题。失业工人的激昂情绪，使上层工会领袖不能不加以考虑。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华尔特·路德，在密执安州兰星举行的“劳联—产联”立法会议上就许过愿，他说准备率领失业工人大规模地列队到华盛顿请愿。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也发出了一个行动计划，提出了请愿和召开就业会议的要求。这个正当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劳联—产联”以主席米尼为首的上层领袖的完全支持。不久前在圣儒昂召开的“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上，米尼等害怕失业工人群众性斗争的开展，否决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提出的失业工人到华盛顿集体请愿的要求。但是他们又怕完全无视失业工人的要求会使自己在群众中孤立，于是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召开这次大会。

根据美国“劳联—产联”的决定，大会只限美国东部和西部十五个严重失业地区五千名失业工人代表参加，但是结果却来了将近一万人。这次失业工人大会是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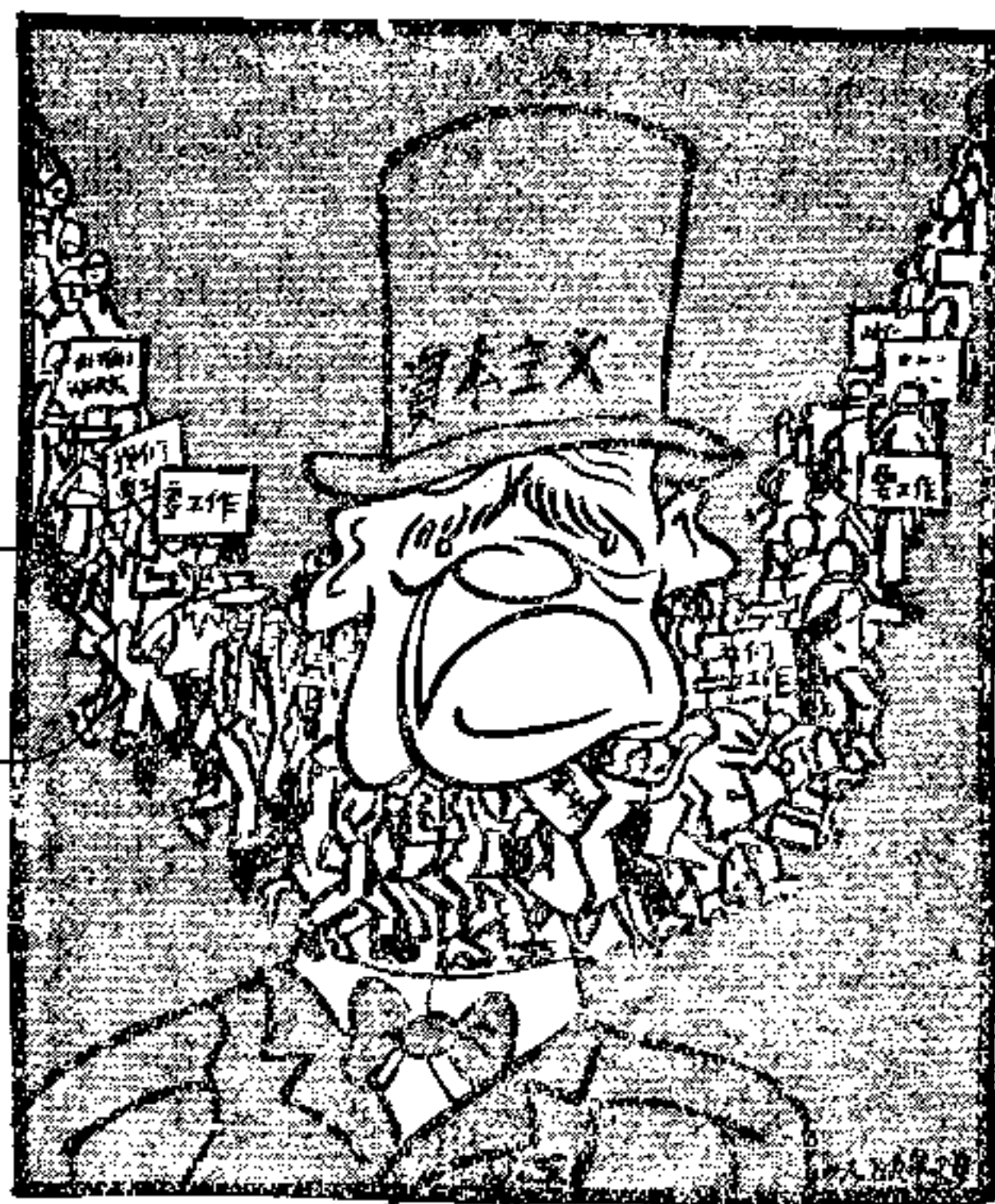


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那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美国工人反失业的大会。在大会开幕那天，天刚亮，华盛顿的街头上出现了很多穿着工作服，头戴白色纸帽的失业工人，纸帽上写着：“我们要工作”。早上十点钟，在华盛顿市郊的一座大楼——国民卫队军械局大厦的入口处，不少失业工人举着标语牌守候在门口。标语牌上写着：“醒醒吧，美国！”，“让所有人都有工作”，“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充分就业——美国人最大的愿望”，“美国有二百六十七个严重失业地区”。

美国失业工人这种焦急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美国官方用尽各种美丽的词藻也掩饰不了美国失业问题的严重。在美国的重重新闻封锁下，也不能不漏出一些失业的真相：底特律每七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失业，匹茨堡每八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失业，个别特别严重的地区失业工人占全部劳动力的比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二十六。三月三十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当你在宾夕法尼亚州旅行的时候，你到处都会发现由于矿山的关闭或伐木地区的萧条而造成的死气沉沉的‘鬼域’。”

当人们看到最近美国报刊所刊登的关于这个大会的消息

时，脑海里就会涌现出一幕幕美国失业的景象：失业救济所门前蜿蜒的长蛇阵，躺在路旁打瞌睡的失业小伙子，华盛顿的小巷里那些穿着有窟窿的皮鞋疲乏地徘徊着的人们……。在这支庞大的失业大军中，有出了学校在军队中服了三年军役的大学毕业生，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对于劳动力市场过剩的垄断资本家来说已经是“太老”了；有失业的电气工人，他害怕自动化已经永远排除了他被复雇的机会；有失业的假钻石镶嵌工人，她该领的救济金都已经领完了。……。尽管最近美国不少的工厂的烟囱里重新又喷出了浓烟，失业的数字



也是一条绞索

华景武 作



却没有很大降低。上个月美国工业公司董事长斯奈德就说过：“我认为全国生产率和生产量将增加，但是整个劳动力不需要大大的增加。……目前工业的趋势是向着改进和提高生产设备的效力和能力的方向发展，的确，为了生存起见也不得不如此。对于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依赖是越来越少了。”这几句话就是垄断资本家对当前美国失业问题的描绘。看来，随着自动化趋势的越加发展，美国的失业问题也将越加严重。

这个会议并不是进步的人士所召集的。在参加会议的人群里，除了失业工人外，还有工会领袖、政治活动家和政府官员，其中不少人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维护人来参加的。美国劳工部长米契尔也出席了大会。尽管如此，这次会议却反映了美国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广大阶层对失业的巨大恐慌。

看看“劳联—产联”主席米尼在开会词中说什么吧。他说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集中全国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第一号问题就是群众性的失业”。他承认美国的失业是“人间的悲剧”，“群众性的失业对我们的国民经济来说，成为日益增长的威胁。失业不仅对失掉工作的工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对工业和农业也是这样。”米尼是美国垄断资本的一名忠实的卫士，但是迫于失业工人群众高涨的情绪，在这次发言中，他也不能不尖锐地指责了美国国会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他指出，不久前国会通过把发失业救济金的期限延长三个月，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无济于事”的。米

尼认为政府有关方面对就业问题的乐观表现，不过是“夸大的宣传”。美国官方发布的三月份失业人数四百三十六万二千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去年以外三月份的最高数字。他说，工业生产已经回升到危机前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工业中的就业只回复到百分之四十。

华尔特·路德代表汽车和航空工业工会发言，他用沉重的词句描写失业工人的悲惨遭遇：“作为一个人，没有人能和失业工人受到的煎熬相比，当他成天找工作而徒劳往返，当他把失业救济金用得精光，而当他必须回家，眼巴巴地瞧着自己饥饿的孩子们，想着他们将用什么话来问他的时候……。”他率直地承认，“经常的群众性失业——这是民族的灾难。”他不能隐瞒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痼疾：“成百万工人没有工作，而我们生产潜力的重要部分却没有发挥出来。”“美国有二百六十七个失业严重的地区，失业超过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六，这里还不算那些只做部分工作和政府没有统计在内的人。”大批熟练工人都被垄断资本家抛掷在街头上，在某些汽车工厂中，二十年工龄以上的老工人都被解雇了。他引用了“华尔街日报”的材料说明美国工人由于实行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是更多的工人却因此被迫失了业。“华尔街日报”说：“劳动生产率成长着。新设备使更少的劳动力做更多的事。今天不到一千一百九十万工人所生产的产品比起一九四八年一千二百七十万工人的产品来，还多上百分之三十五。”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技术革命



和技术革新对工人的处境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不断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劳动变成是愉快的事情，工人的生活更加幸福；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却不可避免地打破了很多工人的饭碗，使更多工人成为失业的后备军。

美国铁路工人工会主席乔治·哈里逊在发言中也指出了当前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同工人失业数字增加成正比例的现象。他说，一九五九年头三个月，美国铁路的载货量比一九五八年同一时期多百分之六，但是铁路上的就业数字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有一百五十万铁路工人，到一九五〇年减少到一百二十五万，一九五六年只剩下一百万。而一九五六年铁路载货量却是战前的二倍。“铁路上的失业成为经常性的不治之症。成千上万熟练的和经验丰富的员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抛到街头上。最近十八个月，就业显著缩减，由于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已有许多工人失了业，因而问题就特别严重。”在失业工人受尽痛苦的同时，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却不断增加。哈里逊在发言中指出，尽管失业是这样严重，根据一九五八年最后四个月的情况，铁路的收入一年中将有纯利十亿美元，这个数字大于战后大部分的年代，并且和收入最高的年份接近。

严重的失业引起了美国正直的政治活动家的不安。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保罗·陶格拉斯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在我们国家中有许多穷人，但是政府却千方百计地

力图用充气的玫瑰水写的指示来掩饰这个事实……”，“当我们的仓库把食品装得满满的时候，人民却在挨饿。这是多么野蛮啊！”他指出了这个令人注意的事实：“大批失业的存在对企业主们是有好处的，因为这可以使工资和物价保持低的水平。”

美国劳工部长米契尔也在会上发了言。他在发言中不能不承认：在今天的美国，要完全解决失业问题，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会场上也不乏反劳工的言论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美妙”的歌颂。但是失业工人代表们都用“嘘……”“蒲……”之声来回敬这些“妙论”，米苏里州共和党议员卡尔底斯发言时就受到这样的“欢迎”。

这次会议在政府和工会右派领袖的控制下，并没有对积极解决失业问题采取切实的措施。他们主观上只是为了给失业工人以暂时的“欣慰”，从而力图限制美国工人群众反失业斗争的进一步扩大，力图麻痹他们的高涨的战斗精神，因而会上只通过了两个内容比较空洞的决议：要求美国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束失业；要求美国总统召开工人、农民、企业界人士和政府代表的会议，来讨论如何解决失业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美国广大的失业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痛苦和悲惨的处境；美国工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对垄断资本家把危机转嫁给工人的罪恶行为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和控诉。资产阶级政客、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战后时期大事宣扬的关于“人民资本主义”和阶级合作的谎言，在事实面前不能被彻底击破了。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0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期 ★

目 录

短 论	包产一定要落实.....林一舟(1)
	农业生产措施要同群众商量 决定.....洪禹(3)
	为了追求真理.....施东向(32)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薛暮桥(7)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翦伯赞(21)
	关于水电和火电问题的讨论.....李锐(34)
	自动化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杨重光(45)
	编者的话.....(31)



包产一定要落实

林一舟

领导农业生产，组织今年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要抓许多环节；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包产。

包产，是公社和生产队、社员之间的一种协议，一种合同；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公社根据包产数字拟定农业方面的收益分配方案。公社以下的核算单位（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根据包产数字来支配由自己管理的各种收支。超过包产的部分，绝大部分或几乎全部归包产单位的社员群众所有。包产数字又是国家分派农产品征购任务的一个重要依据。通过包产数字的拟定，就使一年的生产和分配的轮廓更加明朗化，使生产的增加和生产者收入的增加更直接地联系起来，使国家利益、公社集体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包产体现出来的这种清楚明白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农民熟悉、妇孺皆知。根据过去的经验，只要处理得好，就会对生产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包产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包产指标是否落实。包产指标不应当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空想出来的。在确定包产指标的时候，决不能以愿望作为根据，以感想代替实际；不能以为指标定得愈高愈好，不能把亩产在实际上只能达到五百斤的，定

成一千斤，一千五百斤，甚至更多，实际上做不到。必须对去年当地各种土地上的产量多少，去年比前年增产多少，今年能够增产多少，有什么可靠的增产措施，等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分析。在切实估计到当地人力、物力、财力的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既要看到各种有利条件，又要看到实际存在的困难条件，并要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使计划指标尽可能地符合实际或接近实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共同作出决定。因为一般群众对当地土地和生产上各种实际条件的了解，比干部是会要清楚些。当然，其中也有某些有保守观点的人，但是，一般说来，农民群众对自己耕种的各类土地要采取什么措施以及因此可能达到的产量的估计，是比较实际，比较可靠的。而且，要克服群众中的某些保守观点，也只有依靠实际的经验，首先是依靠一批试验的结果。

经过群众讨论，才能反映群众要求，集中集体智慧，使包产指标成为领导与群众共同决定的指标。这样，包产指标才能真正为群众所掌握，真正成为群众实际行动的奋斗目标，才能鼓舞他们的干劲，激励他



們的生产积极性。包产指标能否达到，全靠社員的双手，全在于他們干劲的大小和积极性的高低。經驗証明：凡是群众不同意、不接受的計划和指标，勉强实行，硬着来做，往往是行不通、办不到的。

有人担心，这样一来，群众会把指标压得很低。当然，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小集体和大集体的矛盾，这是需要相当時間才能逐步解决的問題。这种矛盾，有时表现为小集体的本位主义，有时表现为大集体的过分集中。当前情况必須注意的，是某些上級的干部对生产指标层层加码，要求过高，同时，对小集体的利益照顧不够，对生产的领导过分集中。因此，必須說明：包产指标如群众不同意就不能算数。小集体和大集体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种利益的一致性是他們共同商量問題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是能够达成一个大家都比較滿意的协定的。

包产中有一个留有余地的问题。現在很多地方在包产的时候，把包产指标定得比实际可能达到的产量低一些（例如低百分之十到二十），給包产的生产小队或者生产队留下超产的余地，使他們真正有可能超产，因而有奖可得，从增产中得到較大的实惠。我們認為这种办法是完全对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大大鼓励和刺激农民群众的增产积极性。切实关心群众的利益，时刻想到使我們的政策措施适合群众的要求，这是我們党和毛澤东同志所一貫坚持的原则；我們必須在确定包产指标这一类的問

題上，認真贯彻执行这个原则。至于群众当中有少数或个别的人可能产生的指标愈低愈好、留的余地愈大愈好的、不尽合理的、本位主义的想法，通过共同商量討論，在群众对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一致性認識的思想基础上，是可以克服的。对增产的实际可能性估計不足，把指标定得太低，因而使生产措施松懈下来，这种偏向也是要尽可能地防止和糾正的。

我們強調包产指标要切合实际，也就是为了使自己的两脚踏在实地上，使生产跃进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我們的工作才有把握，基层干部和社員群众才会真正下决心、有信心去完成和超额完成所定的指标。指标愈切合实际，他們这种决心和信心也就愈強，跃进的劲头就会更大。相反地，如果超过实际可能，自己根本无把握，群众根本不相信，这同真正的跃进是毫不相干的。过高的指标，脱离实际的指标，不但不能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反而会挫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指标定得过高，誰也达不到，只是說說而已；如果定得切合实际，是經過努力可以达到的，群众就会認真对待，爭取实现。

包产指标落实以后，我們对产量就有个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把握，国家征購、公社积累、社員分配等等的绝对数字，就可以比較实际地預定下来。这样，干部心中有底，工作主动；群众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干活有劲，許多事情都会好办得多。这样，我們整个計划指标的实现，就会更有保証。



农业生产措施要同群众商量决定

洪 禹

农业生产措施是否恰当，是一个对于作物生长和收成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问题。福建日报一篇通讯所提供的材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福建南安县卫星公社满山红大队的生产措施，由于同群众共同商量决定的结果，实行了“丘丘田地合理密植”的科学方法，因而使今年早稻的生长情况十分良好。这篇通讯说，现在那里已经是“丘丘葱绿、丛丛粗壮”，而且每丛稻苗分蘖达到“二十多本”（按：本，即枝或条）。

根据他们的经验，生产措施应该适应不同的条件而有所不同。比如密植问题，他们全大队一千零八十亩早稻田，就有六种不同的密植规格。有一个小队的七十三亩早稻田就分为三类，而且每类田根据土质肥瘦、地势高低、作物品种特性等不同条件，又分出各种不同的插秧规格。对于肥沃的田地，由于促使秧苗分蘖的力量较强，密植程度就要低些。分蘖力强的品种，每丛秧苗就要少插些，而容易倒伏的品种，就应该插在较瘠瘦的土壤上，等等。有的田比去年插得密些，有的和去年一样，有的比去年疏些。总之，种植太疏了不好，

太密了也不好。

象满山红大队这种细致地、一块块土地分别对待的生产措施，决不是少数人坐在屋子里凭着好心的愿望可以想得出来的，而是采取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组织了当地的老农、青年、壮年、妇女、干部，采取了小会讨论、登门访问、田头商量、大会定案等一系列的办法得出来的。可见，具体的生产措施问题，决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作硬性的规定，而是应该集中当地农民群众的意见，共同商量决定，因为群众最熟悉当地自然条件的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情况，最熟悉每一块土地应该怎样耕种。

由于这些生产措施是经过群众商量决定的、是群众自觉采取的，因而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正如这篇通讯所说的，满山红大队的社员们，由于生产计划、生产措施是同他们商量决定的，所以他们“口通、心通、手通”，满怀信心地进行中耕除草，加强田间管理，掀起积肥高潮，积极抢救受灾的庄稼。那位半夜冒着暴风雨到山田里排水的老大说：“现在生产是共同研究、共同决定、共同负责、共同执行的，还能眼看庄稼受灾不救吗？”社



員們認為，今年密植規格有他們的“一份主張”，他們“一定要力爭各項措施的實現”。這些情況說明，滿山紅大隊的社員們是在以他們堅定的意志和積極的行動，力爭今年早稻的丰收。

此外，我們看到有一個關於福建海澄縣蓮花公社密植措施的材料，其中說：該縣要求農民群眾插秧時執行硬性規定的統一密植規格，弄得群眾和幹部都很為難。但是，五一生產大隊的支部根據當地的情況和群眾的要求，變通了縣級的規定，決定按照當地的合理密植規格插秧，群眾非常高兴，渾身是勁，原來計劃清明以後七、八天才能完成插秧，後來他們自己提出了保證，要在清明前完成任務；本來規定早晨五點起床，有的人一點多鐘就起來干了。

可見，在絕大多數的場合下面，並不象有些人所擔心的，同農民群眾共同商量決定生產措施，會產生“落后、保守”，會使群眾“缺少干劲”。

從滿山紅、五一大隊和其他各地的經驗看來，由於土、肥、水、種、氣候、地點等等自然條件的不同，以及農民耕作經驗、技術水平和田間管理水平高低的不

同，農業生產的技術措施，決不能千篇一律。象滿山紅一個地方就有那麼許多差別情況，至於全國各地當然更是千差萬別。比如蕃薯究竟插雙行還是單行的問題，我們從其他材料上看到，福建省的另一個公社，去年的經驗是：沙質地里的薯塊又大又美，粘濕地里的薯塊不大又有臭薯。根據這種經驗，他們今年就採取分別對待的辦法，沙質地插雙行，粘濕地插單行。可見，農業的具體生產措施，甲地的規格，對於乙地就不一定適宜。

有些人以為，生產措施的規格是愈統一愈好，他們沒有估計到，一種統一的規格不可能適應於千差萬別的耕作條件。而且，密植等類措施，如果不和農民商量，不注意當地當時的條件，不注意他們的具體經驗，正如前面所說，不只會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還會很大地影響幹部同群眾的關係，也影響幹部本身的積極性。經驗證明，為了使我們的農業生產計劃指標具有充分可靠的現實可能性，同時，又使農民群眾對於實現指標具有高度的積極性，從而達到增產的目的，一定要將生產措施問題，連同生產指標問題，一起經過同農民群眾充分商量，再作決定。

附：滿山紅大隊幹部和群眾 共同制訂密植方案

南安衛星公社滿山紅大隊，制訂早稻密植方案和生產計劃時，與社員

共同商量、共同決定、共同負責、共同執行，做到生產民主，措施落實，



社員心情舒暢，生产搞得很好。

反复商量，干部、群众 共同制訂密植方案

这个大队今年为了繼續大跃进，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发动社員广泛討論、总结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的經驗，来制訂今年繼續大跃进的生产规划和合理密植等增产措施。在制訂早稻密植方案时，各生产队以食堂为单位分別召开了好几次社員大会，发动社員各抒己見，暢所欲言。挺进小队老农尤世川說：“上級号召我們农民要增产，农业‘八字宪法’每个字我們都拥护。”但怎样贯彻农业“八字宪法”，他認為应该大家商量办事，密植不能千篇一律。如火泰境的一片平原田，去年插得过密，丛行距 3×3 寸（按：被乘数是行距，乘数是从距。下同），結果亩产才二百斤。比同等田地插 6×4 寸的产量差了一大半。經過充分討論后，全大队的社員初步提出了八种密植規格。为了統一意見，把密植方案訂得更切合实际，党支部組織各队选派老农、青年、壮年、妇女、干部等各方面的代表，集中討論，根据地区土地、品种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和去年的成功經驗，共同商量密植的丛行距，决定采用 5×4 寸， 5×5 寸， 6×4 寸， 6×5 寸， 6×6 寸， 7×6 寸等六种規格，然后又拿到社員大会上再度討論，最

后定案。社員們看到干部再三征求群众意見，十分高兴，連老人、妇女都相繼参加討論，七十三岁的老社員尤世象兴高采烈地抱着小孙子到会上参加討論；过去很少說話的老农尤世川也一手提灯、一手扶拐地来到会上积极发言，他說：“生产講民主，有我一份，我怎能不作參謀呢。”挺进生产队的社員們，晚上討論后，連夜拿着尺子到田里認真測量計算，确定合理密植規格。在社員再度討論的同时，各队干部还挨家挨戶登門訪問、征求意见，有的在食堂，在田头，甚至在跟社員一起拾粪时，也和社員共同商量，征求对这六种密植規格还有沒有修改意見；直到大家同意后，才最后定案。东方紅生产队社員陈貴长說：“今年密植規格有我一份的主张，也是大家出的主意，我們一定确保各項措施的实现，力争早稻大丰收。”美滿生产队老农陈季匣說：“生产大事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商量，这样人多計謀深，才会考虑更周到，粮食大丰收才更有保証。”

群众口通、心通、手通 丘丘田地合理密植

滿山紅大队和社員共同制訂密植方案后，又在插秧之前，召开社員大会，放手发动群众，討論了因地制宜地合理密植。因此社員心情舒暢，主动



認真執行密植規格，做到了口通、心通、手通。挺進小隊有七十三畝早稻田，社員把它分作三類：第一類是平原田，分三種不同規格插秧，在塘口一片黑土壤，土質好，插 6×5 寸和 6×4 寸；在壩內一片也是黑土壤，但土質更肥沃，分蘗力強，則插 7×6 寸。第二類是半山田，也分兩種規格插秧，在墓後一片是赤土壤，土質比較差，不易分蘗，就插 5×4 寸；在高建的一片同樣是赤土質，但地勢比較高，分蘗力比較強，則插 5×5 寸。第三類是沙質土的山田，也分兩種不同規格插秧，有的插 4×4 寸，有的插 5×4 寸。全大隊一千零八十畝早稻田地，在社員自覺執行密植規格下都因地、因品種、因自然條件合理密植。在五百五十九畝山田和半山田，有的田地比去年插得密一些，有的田地維持去年的密植程度，有的田地還比去年插得更稀一些。例如三十五畝肥沃的門口田和溝頭田，去年採用 5×3 寸密植，由於插得過密，結果每畝平均只收四百九十斤，比山田的產量還低，今年根據老農意見稍為放寬些，按 7×6 寸密植，結合加強管理，合理追肥，促進大量分蘗，以保證每畝有一定有效穗數。

各種稻田除了分別採用了不同密植規格外，還根據各種條件，因地制宜地採用了不同本數，如南特號分蘗

力較強，每叢插八至十本；粳稻和紅米早分蘗力較弱，每叢插十至十二本。容易倒伏的南特號，插在較瘠瘦的田地，不易倒伏的粳稻插在較肥的田地，促使各種品種都能在適宜的田地上正常成長。

稻苗挺秀，社員滿懷信心 心爭取夏季大丰收

滿山紅大隊放手發動群眾推行合理密植後，全隊插秧進度很快，比去年提早一個季節插完早秧。目前丘丘蔥綠、叢叢粗壯，稻苗每叢已分蘗到二十多本。社員們滿懷信心地在稻田里中耕除草、加強管理，並掀起了積肥新高潮，每天積制火燒土、綠肥、衛生肥等二千多担，準備給早稻田增追更多的優質肥料，爭取夏季大丰收。石橋生產隊以老農、技術員為主組成田間管理專業隊，認真研究稻子生長情況，保證管好稻田，前幾天一個午夜，突然刮大風下暴雨，挺進生產隊老農尤傳貓被風雨吵醒後，立即點着燈、拿着鋤頭跑到一里多遠的山田去排水，直至下半夜一時排完了田水才回家，使稻苗免受損失。他向老伴說：“現在生產是共同研究、共同決定、共同負責、共同執行的，還能眼看庄稼受災不救嗎？”

（福建日報，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薛暮桥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向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就是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所发生的作用。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出版，在我国引起对上述问题的学习热潮。当时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还广泛存在，这是没有问题的，谁也不会怀疑。但是，在当时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生产，除受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外，是否还受国家计划控制？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对它们是否也起作用？对这些问题却是有争论的。

在一九五六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又进一步展开。当时讨论的中心是：国营工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是不是商品？商品生产的范围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有多大？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中是否还占重要地位？这些问题经过几年的讨论，虽然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但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无疑是显著地提高了。不用说，这些问题在理论上的正确解决，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是有重要意义的。

人民公社的诞生，使商品生产有了若干新的变化，有些人在认识上曾经一度陷入混乱状态。有些同志认为，人民公社已经接近于全民所有制了，而且快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因此他们认为商品生产快要消亡，价值规律也快要不起作用了。他们的根据是：第一，既然人民公社实行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大体上满足公社和全体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中的需要，因此就不需要再发展商品生产了。第二，既然人民公社实行了工资制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随着供给部分的迅速扩大，而供给部分又采取实物形式，因此不久以后，就没有必要采用商品



货币的形式来进行消费品的分配了。第三，有些同志認為，只要“政治挂帅”，农民就再不会計較收入的多少，国家同公社的交换就不必要遵守等价的原則，甚至可以无偿調用公社的产品和劳动。这些混乱思想如不迅速澄清，将为国家和公社带来重大的損失。因此，在这时候，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的研究，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着叙述上的便利起見，我对这个问题的說明，将先从社会主义的交换关系的具体分析开始，說明我对商品交换和价值規律問題的一般的看法，然后回到人民公社化以后所提出的关于商品生产的一些問題。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种性質的交换

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劳动产品，除了一部分自給性的农产品外，一般都要經過交换过程，才能从生产領域达到消費領域，完成从生产到消費的全部过程。社会主义的交换关系，是由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决定的；但交换关系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交换关系的研究，将使我們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获得更具体的認識。

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产品所以必須互相交换，不仅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必須有数以万計的企业来分工生产各种社会产品，这些企业在生产中必須互相交换其产品；更加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种生产資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且还存在着按劳动的数量和質量来进行分配的制度。这样就使这些社会产品的交换，一般地还必须遵守商品交换所通行的原則。在社会主义社会，大体上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質的交换。

第一，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或公社）之間的交换，或者这一个合作社（或公社）同那一个合作社（或公社）之間的交换。交换的双方，是生产資料和产品的不同的所有者，它們各自以自己的产品去同对方进行交换；經過这种交换，产品就从这一个所有者轉移給另一个所有者。这样的交换，是沒有资本家参加的，不是以获得利潤为目的的交换，因而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的性質根本不同。但是，由于它还是两个不同的所有者之間所进行的等价交换，所以它同一般的商品交换还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第二，国家把国营企业所生产的消費品和从合作社（或公社）購買来的消費品，經過交换分配給千百万消費者，这是另一种性質的交换。这种交换与前一种交换不同，不是产品同产品的交换。在这里，消費者并不提供任何产品，他們提供的只是一定数量和質量的劳动，和由此取得的一定数量的货币。交换的过程不是“产品——貨



币——产品”，而是“劳动（为自己劳动部分）……货币——产品”。因此这种交换，实质上是消费品的一种分配方式。但是，这种交换同样要遵守等价（等量劳动）的原则，而且消费品经过这种交换，就从国家所有变为消费者个人所有，可以由消费者来自由支配。因此，这种投入市场的消费品，同一般的商品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第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形式上同第一种交换类似，但实质上经过交换以后，商品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仍然是国家所有。不过在现行的经济管理制度下，由于这些国营企业都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都必须各自计算盈亏，所以在交换时候，一般地仍然必须遵守等价的原则。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交换同一般的商品交换也有部分类似的地方。

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时候，把这三种交换关系明确区别开来，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并通过交换来达到不同的目的。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对待这三种不同性质的交换。

第一，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1）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主要属于全民所有制，农业生产主要属于集体所有制。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国家才能够取得集体所有制经济所生产的农产品，从而掌握全部社会产品，进行有计划的调配；集体所

有制经济才能够取得国营企业所生产的工业品（包括它们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它们的社员所需要的消费品）以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2）在存在着两种所有制的条件下，只有等价交换，才能保证交换双方的应得的利益，才能最有效地鼓励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产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要按照国家计划，用商品的形式出卖给国家。在交换中价格的高低，对人民公社的收入多少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在现阶段，这种商品交换仍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即使农村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不会改变产品的交换部分继续扩大的趋势；不过由于所有制的改变，这种交换的性质也将跟着改变，即从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性质的交换，变为第三种性质的交换了。

第二，国家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由于按劳分配制度的存在，也显得十分重要。只要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提供劳动要取得报酬，领取各类消费品要支付代价，这里就存在着等价交换的必要性。在按劳分配制度下，社会产品还不丰富，劳动人民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别，以及各人的需要和嗜好不同，不通过商品货币形式而直接进行实物分配，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所以大部分采取实物分配的形式，这与目前农业中自给性的生产还占优势有关。经过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产品中的商品性部分不断扩



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需要也更加复杂的时候,就有必要逐步缩小实物分配的部分,扩大通过商品货币形式进行分配的部分。从最近苏联集体农庄逐步改行货币工资制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这种趋势。只有到将来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可以过渡到按需分配的时候,通过商品货币形式来进行分配的办法才有可能逐渐消亡。

第三,国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間的交換,也是完全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国营企业互相依存,必須互相交換其产品才能不断地进行再生产。同时,为着保证生产的不断发展,必須督促各企业进行严格的經濟核算。为着經濟核算,各企业在互相交換其产品的时候,也必須采取等价交換的原則,使它們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能够得到补偿。这种交換关系一旦中断,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够繼續生产。如果交換时候不采取等价的原則,价格想高就高,想低就低,就会使国民經济陷入混乱状态。

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等价交換,与国营經濟和集体所有制經濟之間的等价交換,国家和消費者之間的等价交換的性質是不同的。在后两种交換中,价格的高低,都会影响某些劳动人民应

享受的物質利益。比如,农产品采購价格的高低,不但会影响公社的收入,而且会影响它的社員——农民的收入;消費品零售价格的高低,也会影响工人、職員和农民的收入。因此,等价交換是为保证劳动人民应得的利益,是为保证按劳分配原則的正确实现。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价格高低虽然也影响各企业的收入,但除小量的奖金外,基本上并不会影响企业中职工的收入;因为他們的工資标准,同企业盈利的多少无关。但是,在两种所有制并存,和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的条件下,前一种交換和后两种交換总是要互相影响的。特別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为着督促各国营企业增产节约,改善經營管理,也采取了各种物質鼓励的办法。各国营企业在努力完成国家所規定的生产計劃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完成盈利上繳的任务,并力争超額提奖。它們在互相交換中,也不願意讓自己吃亏。因此,各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从整个国家來說,已經是国家內部的产品分配所采取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商品交換的形式来实现产品的分配;但从各个企业來說,它們在交換中同样必須在一定的程度上計算各自的物質利益,因而同一般的商品交換也沒有十分重大的区别。

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政策

前面講的三种不同性質的交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都采取等价交

換的原則。只有等价交換,才能保证集体所有制經濟在出售其产品以后,能够換回



同量价值的产品；保证劳动人民用他們的货币工資，能够換回同他們提供的劳动（扣除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相等数量的消费品；保证各国营企业在生产中消耗的生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能够得到补偿。所謂等价交换，就是每一种产品都按照它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交换。

社会主义国家各类产品的价值，还必须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因而还必须为各类产品规定适当的价格。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政策，基本上应当以各类产品的价值为基础，尽可能符合于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但是，由于各类产品的价值难于精确計算，而且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中，价值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还是不断会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也可能使价格在一定范围内背离价值。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必要经常研究价格政策，必要时也要用调整价格的办法，来调整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銷售数量，调整积累和消費的比例，以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具体办法是：

第一，利用价格政策来影响某些产品的生产数量，以保持各类产品供需之间的平衡，和各生产部門之间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各类产品的生产，基本上是由国家计划来調节的；但国家在調节各类产品的生产数量的时候，必須正确掌握价格政策。特別对集体所有制经济所生产的各类农产品，正确掌握价格政策更有重要意

义。社会主义国家必須正确规定工业品同农产品的比价，和各类农产品相互之間的比价（如粮食同棉花的比价）；必要时可以用調整比价的办法，来影响各类产品的生产数量。过去几年，我們曾經稍稍提高棉花的价格，来奖励棉花的增产；也曾稍稍提高猪的价格来奖励养猪，这些措施都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經驗告訴我們，假使我們把某一种产品的价格定得太低，这一种产品就会减产，就会完不成国家的生产计划。

有些同志認為，社会主义国家各类产品的生产，都是由国家计划来調节的，国家在調节生产的时候不需要考虑价格政策。这样的認識显然是不对的。不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別是在公社化以后，国家利用价格政策来調节生产的事实似乎愈来愈少了。但这并不是說价格政策已經不起作用，而是由于我們的价格經過几年来的調整，已經大体上合于比例，能够保证国家所要求的工业同农业之間，和各类农产品之間的比例关系的实现。价值規律是“无所在、无所不在”的东西，当你沒有违背它的时候，它似乎并不存在；如果违背了它，它就立刻出現了。可以設想，假使我們真的把一吨棉花的价格降低到同一吨粮食的价格相等，那会产生什么結果呢？結果一定是种棉花的合作社或公社大量亏本，因而不得不改种其他作物，否則就会因此破产。总之，棉花的产量就会大大减少，就会迫得国家不得不提高棉花的价格。



我們的社会产品种类繁多, 数以千計, 每一种产品还可能有許多种不同的規格和花色; 我們現在只能够把几百种重要产品列入国家計划。在工农业生产中, 列入国家計划的主要是重要产品, 这种产品种类很少 (当然, 列入計划的都是大量生产的产品,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 有很多种次要的工业品、农产品和土特产等不列入国家計划, 国家主要通过加工訂貨合同等办法来进行調节。对于这部分产品, 价格政策就起比較大的作用。即使对于列入国家計划的产品, 也必須規定适当的价格。各国营企业在完成了国家的生产計划以后, 总願意多生产获利比較多的产品, 少生产亏本的产品, 价格的高低对企业生产某些产品的积极性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 对于国营企业的生产, 在規定了适当的价格以后, 国家主要通过国民經济計划和訂貨合同等方式来进行調节; 对于人民公社所生产的主要产品也是这样, 濫用价格政策也是不适当的。

第二, 利用价格政策来影响某些消費品的銷售数量, 通过流通过程来保持各类消費品供需之間的平衡。国家在出售消費品的时候, 也可以利用价格政策, 有計划地来扩大或縮小某几种消費品的銷售数量。例如我們在白糖过多的时候, 曾經減低糖价, 使白糖的銷售数量显著增加; 在白糖不足的时候, 也曾經适当地提高糖价, 来限制銷售数量。許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利用提高烟酒价格的方法, 来限制烟酒等产品

的銷售数量; 有些国家还用提高某些高級消費品的价格的办法, 来限制这些高級消費品的銷售数量。对于粮食 (面包) 和某些葯品、書籍、文具等, 則往往采取薄利广銷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購買力虽然可以由国家計划来控制, 但消費品的品种和花色, 則讓人民自由选择; 因此, 通过价格政策来影响各类消費品的銷售数量, 便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許多种消費品的供应常常滿足不了需要。因此, 不可能也不應該濫用提高价格的办法来限制这些消費品的銷售数量。特別对于人民生活十分必需的消費品, 更不能輕易提高价格, 以免在实际上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种場合, 就必須采取定量供应的办法, 来限制銷售数量, 使这些消費品的分配达到公平合理。我国目前对粮食、食油和棉布等的定量供应制度, 无疑地是完全必要的措施。如果不是这样, 而采取提高价格的办法, 則对收入多的人民所起的限制作用不大, 而对收入少的人民則是相当沉重的負担, 有可能因此而使他們不能滿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因此, 利用价格政策来影响某些消費品的銷售数量, 也象利用价格政策来影响某些产品的生产数量一样, 是可以利用的一种办法, 但不應該濫用这种办法。

第三, 利用价格政策来調整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 特別是調整工人同农民之間的消費基金的分配。消費品的价格, 同



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人民的货币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就等于提高货币的购买力，从而就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在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的时候，通常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提高货币工资，另一种是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采取后一种办法，不但提高了职工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等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也就相应地降低一些国家的积累。因此，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是调节国家积累和人民生活的极重要的杠杆。社会主义国家为着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适当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但是，在降低消费品的零售价格的时候，除不使这些消费品因降价而脱销外，还应当保证国家的积累仍然能够不断增长，从而有可能不断地扩大建设规模，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在存在着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条件下，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是调节工农生活水平的极重要的杠杆。农产

品采购价格的高低，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农村人民公社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到它们的社员——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调整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是调整农业税，另一种是调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我国在过去几年，由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显著地低于工人。国家为着调整工人同农民之间的生活水平，除适当控制职工的工资标准外，还有必要把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原来的基础上稍稍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就把各类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分别提高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因而使农民除了从农业增产方面增加的收入外，还从价格方面多得了几十亿元收入，使农民生活得到了相当显著的改善。到将来农村人民公社逐步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将要不决定于公社收入的多少，而决定于国家统一的工资标准；那时通过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调节农民生活的作用，也就跟着消失了。

根据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经济核算

社会主义国家为着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必须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马克思说：“簿记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比它对于手工业经营及自耕农经营的分散的生产，更为必要；它对于社会共同

的生产，又比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资本论”第2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45页）我们的经济核算是要核算什么呢？首先是要核算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生产中的各种物质消耗），要



使各个企业按一定的价格出售其产品所得到的货币，能够充分补偿生产中支出的工资和各种物质消耗；此外，还能够取得一定数额的盈利来作为国家的积累。在这里，产品的价格和在生产中所消耗的材料和燃料（这也是其他企业的产品）等的价格，就十分重要，是决定着核算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为着正确进行经济核算，在規定各种产品的价格的时候，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根据呢？这是政治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国营企业各种产品的价格的唯一可以采取的依据，就是价值，就是生产这件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是不是可以采用别的依据来决定价格呢？不能。因为只有价值是各种产品共同的、可以互相比較的东西，而且我們经济核算的目的，也是为着节省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是不是可以把各个企业在生产这件产品的时候所消耗的个别的劳动量，而不把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价格的依据呢？也不能。这样就不能奖励先进的企业，鞭策落后的企业；而且这样就会由于各企业的价格沒有共同的标准，而使各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无法互相比較；也就是說，无法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国家为着使各企业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得到补偿，必须基本上根据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規定各种产品的价格，各企业在互相交换其产品的时候，也必须基

本上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的各国营企业，必须用基本上符合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价格，来互相交换其产品。如果这些产品的价格，有的显著地高于它的价值，有的显著地低于它的价值，那末有一些企业就会得到額外的盈利，有一些企业就得不到应得的盈利，甚至还会亏本。如果根据这样的经济核算，来評定各生产部門和各企业经营的好坏，就会由于受不合理的价格的影响而作出錯誤的結論。某些产品的价格过高或过低，不但会影响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核算，而且会影响使用这些产品的企业的经济核算。如果煤炭的价格定得过高或过低，则不但会影响全体煤炭工业的经济核算，而且会影响大量使用煤炭的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等的经济核算。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将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核算陷入混乱状态。

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利用基本上符合于其价值的价格，来进行生产中的经济核算，而且利用同样的价格，来计算投资的效果，并根据它来考虑投资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对各经济部門的投资分配（也就是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的分配），是通过国家计划来实现的。但是，在决定究竟什么样的投资比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最有益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样地也必须通过价格来进行经济核算。比如，我們要决定多发展煤炭工业，还是多发展石油工业（如果資源沒有問題），对国家更有利益，



就必須正確規定煤炭和石油的價格。如果這兩者的價格，一個是顯著地高於其價值，一個是顯著地低於其價值，那末根據這樣的價格所作出的經濟核算，就一定是不正確的。如果據以決定國家的投資方向和投資的比例關係，就有可能使國民經濟受到重大的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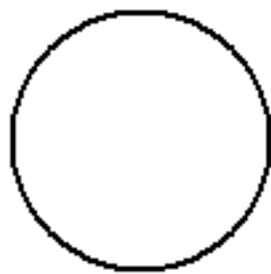
社會主義國家對某些非生活必需的消費品，有時需要採取高價政策，即以高於其價值的價格出賣給消費者；象煙酒就常常是高價出售的。在這場合，國家可以把價格高於其價值的部分，作為貨物稅或周轉稅另行徵收，使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仍然只能得到一般的盈利。社會主義國家有時還需要用低於其價值的價格，把某些農業機械出賣給農業生產合作社或農村人民公社，這時國家可用正常的價格向工廠收購這些產品，然後低價出售，差額由國家來補貼。採取這些辦法，使生產這些產品的工廠，仍然以大体上符合其價值的價格出售其產品，是很有利於國家的經濟核算的。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核算，還必須以價值為根據，各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還必須遵守等價的原則。有些同志機械地根據國營企業同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所有者沒有改變這個事實，來否定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利用商品、貨幣、價值等形式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重要意義；甚至認為，在這樣的交換中，“等價交換的原則已經失去意義”。這樣的認

識，無疑地對我們的經濟工作是十分不利的。

社會主義國家國營企業的經濟核算，是建立在按勞分配制度的基礎上的。企業的產品的價值，如果除去物化勞動部分（生產中的物質消耗），就是職工所提供的活勞動。而所謂物化勞動，也是由其他許多企業的活勞動構成的。職工所提供的活勞動，大体上等於企業付給職工的工資和企業的上繳盈利（包括稅款）。既然職工的工資大体上等於職工所提供的勞動的為自己的部分，而盈利則大体上等於他們所提供的勞動的為社會的部分，那末，企業的生產成本（工資加物化勞動部分）加上繳盈利，就應當同企業的產品的價值相等。因此這種經濟核算，還是同按勞分配制度密切聯繫的；也就是說，同勞動者個人利益的計算密切聯繫的。到將來共產主義時代，情況就完全不同。勞動者的收入不決定於他們所提供的勞動的多少，而決定於需要。在企業的經濟核算中，就沒有工資這一個項目。這時企業在核算勞動消耗的時候，就同勞動者的個人利益絲毫不發生關係，純粹是社會內部的核算了。從這個意義來講，共產主義時代雖然同樣也要進行經濟核算，在企業同企業之間可能也要計價算賬，但同物質鼓勵已經脫離關係，因而它同社會主義時代的經濟核算和等價交換，已經性質不同了。

以上對價格問題的研究，同時也說明了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價值規律所起



作用的問題。列宁曾經指出：“价格是价值規律的表現。价值是价格的規律，即价格現象的概括表現。”（“列宁全集”第20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4頁）可見价格政策問題，也就是如何利用价值規律来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問題。价值規律是客觀存在着的、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东西；而价格政策則是主觀規定的、是人們对价值規律的具体运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还存在，价值規律就一定要起作用，要它不起作用是不可

能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規律不是作为不受人們支配的自发力量而起作用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价值規律的作用已被国家自觉地、有计划地利用，利用它来达到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当然，国家在利用价值規律的时候，还必须遵守产品的价格必須大体上符合其价值的規律。如果我们严重地违反了价值規律，那末价值規律就仍然有可能违反人們的意志而自发地發揮它的作用。

农村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換

我国农村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商品生产仍将繼續发展。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自給性的生产还占优势。这种情况，并不表明我国的农业已經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表明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还没有完成从自給性生产到商品性生产的轉变。目前我国粮食的商品率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就是說，要用四分之三的人口来进行农业生产，才能保證全国的粮食供应。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以后，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大大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可以降到四分之一，甚至更少一点，粮食的商品率自然就要大大提高。在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以后，农业生产所消耗的机械、石油、电力、化学肥料等都会大大增加，其中絕大部分是不能由公社自己生产的，因而也有必要出售大量的粮食

和其他农产品，来換回这些生产資料。总之，生产的技术水平愈高，生产中需要互相交換的产品也愈多，愈需要較大范围内的分工协作。那种認為我国的农业生产可以朝着自給自足方向发展的想法，显然是违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觀規律的。

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后，种粮食的农民可以大大减少，人民公社就可以抽出大量的劳动力来发展多种經營，发展工业生产，从而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又将繼續扩大。有些同志認為，农村人民公社执行了农林牧副漁、工农商学兵相結合的方針，就会朝着自給自足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幻想。由于各个地区的生产条件不同，把人民公社发展成为一个自給自足的单位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經濟上是不合算的。事实上，人民公社决不可能生



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and 消费品，大部分要靠国家和其他公社来供应。而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又大部分远远超过自己的需要，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可能是自己不需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人民公社可以不要努力发展自给性的生产；公社的自给性生产也要发展，应当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公社及其社员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 and 消费品，凡是有条件自己生产，而且在经济上又合算的，都应该尽可能自己生产。但因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不同，在共同发展中仍需要有分工协作，互通有无。过分强调自给自足，不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国家和公社都是不利的。

跟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将逐步提高，农民生活资料中商品性的部分所占比重也将愈来愈大。现在我国农民的全部生活开支中，单单粮食一项就占一半上下，因此自给性的部分占着很大的比重。若干年后，跟着生产的飞跃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情况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他们就会愈来愈多地需要现代工业所生产的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单单依靠公社所生产的一部分工业品，显然是不可能完全满足它的社员的全部需要的。而且，随着公社工业的发展，在公社内部也必须发展商品交换，而不可能完全采取直接分配的办法。因此，不仅从生产方面来说，就是从消费方面来说，也有必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有些同志认为，农村人民公社现在已经采取了工资制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如果供给制的部分渐渐扩大，消费品的分配通过商品货币形式的部分就会渐渐缩小。这也是不合于实际情况的。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低，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基本上采取按劳分配的制度。即使在农村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只要社会产品还没有丰富到能够满足全体人民一般的生活需要，就必须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制度。在今后若干年内，工资部分不但不会缩小，而且还要适当扩大。即使供给部分，也可能要采取商品货币的形式。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他们的生活需要就愈来愈复杂；为着满足人民多种多样的需要，就必须利用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进行分配。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采取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进行消费品的分配，比较容易得到消费者的欢迎。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农村人民公社快要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后，公社的产品也归全民所有，因此就用不到发展商品生产了。实际上，农村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需要一个过程。即使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公社的产品也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仍然必须互相交换，仍然必须等价交换。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不能改变产品中需要交换的部分继续扩大的趋势。现在许多大规模的现



代化的国营企业，有哪一个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单位呢？在目前，国家同公社之間必須保持等价交換的原則，承認价值規律还起作用。就在公社內部，为着进行經濟核算，公社同各生产队和社营企业之間也有必要进行等价交換，各計盈亏。否則，就会使国家和公社的經濟核算陷于混乱，造成极大的浪費，甚至还有可能損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除規定的农业稅外，不应当无偿調用公社的产品；公社一般也不应当无偿調用生产队和社营企业的产品，調用时都必須計价算賬。

总之，在农村人民公社普遍建立起来

以后，我們还有必要发展商品生产，繼續执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換的原則，还有必要繼續遵守价值規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說：“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繼續发展商品生产和繼續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則，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經濟是两个重大的原則問題。”过早地否認商品生产、商品交換、貨幣制度、价值規律等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錯誤的。

对几种不同意見的商討

几年来，我国的經濟科学工作者和經濟工作者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方面，有些同志認為，只有两种所有制之間的交換才是商品交換；国家同消費者之間的交換已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換；各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就已經不是商品交換，只保存商品的外壳了。有些同志認為，上述三种交換基本上都是商品交換，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因为上述三种交換，既然交換双方都还必須在不同的程度上計較各自的物質利益，因而都必須基本上遵守商品交換所通行的原則，即按照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等价交換，那就應該承認这些交換都还基本上保存着商品交

換的性質。

有些同志認為，对商品交換所作的后一种解釋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于許多經典著作中的說法。應該說明，我們討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而不是私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更不是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換在数量上仍将繼續增长，但这时候，在質量上則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的內容正在逐步消失。如果一定要內容十分完整才算商品，那末連两种所有制之間的交換也不能算是商品交換。如果有商品的內容就承認它，有几分就承認几分，那末前面所說的



三種交換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商品交換的性質。一方面承認它們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它們的差別性。指出這三種交換不但與私有制度下的商品交換根本不同，而且三種交換方式的本身，也各自存在着不同的性質，應當區別對待。我認為，採取這樣的研究方法，比較容易解決實際問題。

在價值規律所起的作用方面，有些同志認為，所謂價值規律還起作用，是指它對產品的生產或銷售還起調節作用。因此對國營工業所生產的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已經不起作用；對人民公社所生產的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也只起很小的作用；只有對不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才起比較大的作用。有些同志認為，只要產品還必須按照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來進行等價交換，就證明價值規律還起作用；因此即使對國營工業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也起作用，因為它仍然必須遵守按照社會必要勞動量來進行等價交換的原則。

我認為，上面所說的價值規律的兩種作用，實際上只是一種作用的兩個方面。價值規律要求各種產品的價格，都必須以它的價值，即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為基礎。^①這是價值規律所起作用的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某種產品的價格高於或低於它的價值，那就會影響它的生產數量或銷售數量（反過來，如果產銷不平衡，也有可能影響產品的價格）；也就是說，

價值規律對這種產品的生產或銷售（或價格）起調節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規律的前一種作用，必須受到普遍的重視，即使國營工業列入計劃的產品也不能例外（至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價值規律的後一種作用，只有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才能充分發揮出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它已經受到國家計劃的嚴格的限制。但這並不是說價值規律已經不起作用；它還是在起作用，在沖擊着我們的國家計劃。如果價格和價值背離過大，它的沖擊力量仍有可能影響生產和銷售數量，甚至有可能破壞國家計劃，破壞供需間的平衡。特別對於集體所有制經濟和不列入計劃的產品，價值規律的沖擊力量所發生的破壞作用就更大。這時國家仍有必要用調整價格的辦法，來保證國家計劃的實現和供需間的平衡。

價值規律是客觀規律。既然是客觀規律，它就不能由人們的意志來改變。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圖，有意識地運用客觀規律，是完全可能的，但必須以遵守客觀規律為條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有可能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而不使其自發地調節生產，發生破壞作用。但從可能變為現實，還必須認識它、掌握它。假使你違反了客

^①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所作價值規律的定義是：“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的經濟規律，按照這一規律，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是以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為基礎的。”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9頁。



觀規律，它就仍然要自發地起作用。天空中的閃電是自發地起作用的，電燈里的電就是聽從人的指揮發生作用的。但如果你違反了電的自然規律，就是已被掌握^的電，仍然會違反人的意志，燒死人，燒掉房子。價值規律也是如此。現在我們已經基本上能夠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使價值規律聽從我們的指揮，這是我們主動地遵守了價值規律的結果；而不是說我們可以任意違反價值規律，也不是說價值規律已經不再發生作用。

當然，我們也不贊成對價值規律的作用作過高的估計。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問題上，如果認為上述三種交換都是完整的商品交換，沒有必要加以區別，也是不妥當的。在三種交換中，只有第一種交換（全民所有制經濟同集體所有制經濟之間的交換）是比較完整意義上的商品交換，第二種、特別是第三種交換已經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商品交換了，但仍然基本上或部分地保存着商品交換的性質。就連第一種商品交換，也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而是社會主義的商品交換了。由於三種商品交換性質上有差別，所以雖然都要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但其目的不同。在第一種場合，等價交換是為鼓勵集體所有制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第二種場合，是為正確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在第三種場合，是為保證生產中消耗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能夠得到補償。這三者是顯然不同的。

在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上，如果無限制地利用價值規律來調節生產，調節消費品的銷售，而否認國家計劃的作用，象現代修正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這顯然是十分錯誤的。在社會主義國家，對各種重要產品的生產和流通，必須用國家計劃來調節；當然國家在調節生產和流通的時候，仍然必須掌握正確的價格政策。對各種次要的產品，如果不可能通過國家計劃來調節，也可以由國營商業機關通過供銷關係來進行調節，即通過國營商業機關的供銷計劃，通過國營商業機關同各生產單位所訂立的加工訂貨合同，通過某些消費品的定量供應制度，在必要時並以調整價格作為輔助的手段。國家既不應當不考慮價值規律的作用，任意違反等價交換的原則；也不應當濫用價值規律來調節各種產品的生產和流通，更不應當拋棄了國家計劃而依靠價值規律來進行調節。

在目前，我國的經濟科學工作者對於商品和價值規律等範疇，還存在着不同的認識，其中有些爭論僅僅是概念的爭論，而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我認為，單純概念的爭論是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為着避免卷入概念的爭論，我把問題的實質——例如幾種不同性質的交換，價格政策的幾種具體運用等——提出來，並提出我自己的看法。至於如何用商品和價值規律等範疇來說明這些問題，我說得很不完全，而且也不一定能夠令人信服，這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討論。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問題

★ 翦伯贊 ★

一 古与今的問題

在过去的历史教学中，許多人过分強調古代史的重要性，甚至对古代史发生迷信，認為这是一个史学家必須通过的炼獄，至于近代現代史則不值一顧。一直到整风运动以前，还有一些史学家“禹行而舜趋”，“呼先王以欺愚者”。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是中国資产階級历史学的特点。我們反对了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并且針對这种情形，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方針，这是必要的。

厚今薄古的方針提出以后，在全国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引起了广泛的討論，在討論中揭发出来的厚古薄今的倾向是十分严重的。有些高等学校在七門中国史必修課中有五門是古代史。在十一門选修課和加修課中，只有兩門是近代現代史。面对这样的事实，大家都認為厚今薄古方針的提出是及时的，必要的。但是对于厚今薄古这个方針的理解还是有些問題。

照我个人的看法，古今厚薄問題不是什么別的問題，它是史学家对待现实問題

的态度在历史学上的反映，是隱蔽在历史学中的史学家的政治倾向性和階級意識的表現形式，而古今厚薄的分歧則是历史学上两条路綫的斗争。然而現在有不少的人把厚今薄古当作分量問題或先后問題。

有些高等学校过多地削減古代史在通史中的比重，个别学校削減到百分之三十。古代史在通史中的最大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五，沒有达到百分之五十的。中学的情况也是一样。有些省市新編的初中历史課本，把一年講完的古代史，压缩在一学期講完。小学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种种情况說明了有些人把厚今薄古理解为压缩古代史的分量問題。

我以为把厚今薄古理解为分量問題是不对的。就历史学方面來說，厚今薄古只是說要以更多的力量，更大的注意来加强近代現代史的研究，并不是說我們就不要好好地研究古代史。它並沒有反对古代史本身的意思，它所反对的只是过分強調古代史和为古而古、頌古非今的那种資产階



級历史学的傾向。这是一个思想問題，不是多少的問題。

只要历史学家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了資產階級反动的历史观点，建立无产階級的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抱着古为今用的目的去研究古代或传授古代史，这并不算厚古薄今。反之，如果思想問題沒有解决，口里講近代現代，心里想的是古代，厚今薄古的問題还是沒有解决。

應該着重講授近代現代史，这不仅因为近代現代史具有比古代史更丰富更复杂的内容，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史，更重要的是近代現代史是我們当前的历史和接近我們当前的历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但是历史是一种貫通古今的學問，为了更深入地闡明近代現代史，必須在通史中給古代史以适当的篇幅，讓学生能够知道我們的历史是通过了一些怎样迂迴曲折的进程走到現在的。

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都沒有象中国这样保存了将近三千年的完整的編年史和历史人物傳記。我們既然保存了世界稀有的完整的古代編年史，为什么不进行認真的科学研究呢？只要我們方向正确，进行認真的科学研究，可以断言，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将作出一定的貢獻。

中国的古代史，并不是研究得太好，而是太差。一般地說来，中国历史的研究，只有殷周史和近代史作过一些馬克思主义

的專門研究。自殷周以后至鴉片战争以前，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还需要大大地努力进行深入的專門的研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写出一些断代的专史，如秦汉史、魏晉南北朝史等等。然后在这些专史的基础上进行綜合的研究，写出中国原始社会史、奴隶社会史和封建社会史。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綜合研究，才能写出一部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中国通史。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专史，如土地制度史、手工业发展史、商业交通史、城市发展史、法制史、文化思想和艺术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都要写出专史来。不完成这些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就想大笔一揮在中国史上划出一条階級斗争和生产发展的紅綫，那是办不到的。

当然这不是說，我們在历史教学中就不應該貫徹略古詳今的精神。略古詳今是應該的，問題就是詳略的程度，要有个限度。这个限度的大小，可以規定一个大概的比例，但不應該任意規定，而應該决定于历史的内容。古代史可以从略，但應該略其所当略，不能因为要符合于比例而略去不应略去的部分，略得太多就会使学生在古代史方面得不到基本的甚至是起碼的知識。在另一方面，近代和現代史可以詳細一些，也應該詳其所当詳，不應該为了湊足比例而把不必要的史实硬塞进去，如果过分的繁蕪就会把学生引进鬧市，其結果是使人目迷五色，无所适从。



貫徹略古詳今的方法也值得研究。合理的办法是逐步加詳。例如中国猿人可以少講一点，殷周就要詳一点，秦汉又要比殷周詳一点。这样从古到今，从略到詳。当然这不是說后一时期必須比前一时期詳細一些，假如后一时期沒有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比前一时期簡略一些。但一般說来，历史的内容总是愈到后来愈复杂，因而逐步加詳是合理的。但是我們現在不是逐步加詳，而是突然加詳。好象鴉片战争的前一天都不重要，可以从略，鴉片战争一开炮，历史就重要了，就要加詳。因而鴉片战争的前几年，可以用几百字交代，一到鴉片战争的那年，就是洋洋数万言。这种突然加詳，直綫上升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关于这一点，應該向司馬迁学习。司馬迁写史記，就是用逐步加詳的办法来貫徹略古詳今的精神。他写五帝則共为一个本紀，写夏、殷、周則各为一个本紀，写到了秦汉，則每一个帝王一个本紀。作表也是一样，对三代只作世表，对六国、汉兴以来諸侯王、功臣以及将相名臣，則作年表，对楚汉之际則作月表。

另一种情况是把厚今薄古当作先后問題，即用先后来表示厚薄。有些高等学校，先教現代史，再教近代史，最后才教古代史。这种先今后古的办法，对于那些具备了通史知識的历史研究者是可以采取的，因为他們可以从近代現代史找到打开古代史大門的鑰匙；但是如果采取这样的办法講授通史，却是值得研究的。因

为通史的目的，是要使学生得到一种貫通古今的基本历史概念，它不仅要闡明每一历史阶段自己发展的过程，及其所独有的历史特征，而且要闡明从一个历史阶段过渡到另一历史阶段的变革过程，例如講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或者講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必須按照历史发展的順序才能闡明。因为“所謂历史发展，最后的形态总是把过去的形态看成是向自己发展的步驟”^①，前一历史阶段中孕育着后一历史阶段的因素，在后一历史阶段中残存着前一历史阶段的断片，不了解前一历史阶段，对于后一历史阶段就无法說明。

在講授历史的时候，貫徹古为今用的精神是对的，但如果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古今类比，那是錯誤的。例如把古代农村公社和我們现在的人民公社类比，又如把明代在朝鮮进行的抗击倭寇的战争和解放后的抗美援朝类比，这都是不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历史事件，必然具有不同的内容与性質，我們不应该因为某些表面的类似就抹煞它們本質上的差异，而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現在。古为今用，不是历史类比，而是要求教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方法总结历史上各种有用的經驗，如生产劳动的經驗、階級斗争的經驗以及抵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的經驗，用这些經驗来进行生产

^①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經济学批判”，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8頁。



劳动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总而言之，厚今薄古的问题，既不能用过多地压缩古代史的办法来求得解决，也不能用先今后古的办法求得解决。思想问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即必须在广大的历史学工作者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不这样做，就不能从

思想上解决厚今薄古的问题。列宁说过：“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①列宁的这几句话，对历史学也是适用的。为了从思想上解决厚今薄古的问题，必须做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的信徒。

二 历史的必然性与个别历史人物的问题

过去在历史教学中，过多地或者不恰当地强调了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讲得不够，对于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讲得更不够。这种现象，已经受到批判。但在目前历史教学中又出现了一种避免提到个别历史人物的现象。有些教师把商鞅变法改为秦国变法。凡是讲到汉高祖的地方，都用“汉初二字代替他的名字。讲林则徐焚毁鸦片，也认为可以不提林则徐的名字。甚至讲儒家学说，有人不提孔子。在世界史讲授中也有这样的现象，个别的教师把亚历山大东征改为马其顿东征，把革拉哥兄弟的改革，改为农民为保持土地而斗争。理由都是一样，即认为上述历史事件和学术思想，都是历史的必然性或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所引出的结果，和个别历史人物没有任何关系。

着重说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对的，因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过程揭示它的客观规律性，或整

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实现出来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历史就会具有非常神秘的性质。”^②

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偶然’情况，其中也包括有象起初领导运动的人们的性格那样的‘偶然’情况。”^③列宁也说过，“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④因此，全部否定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而把经济规律性或历史必然性绝对化、偶像化，这是错误的。如果把任何历史事件都说成

①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4页。

②③ 马克思：“致留·库格曼”，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65页。

④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9页。



是和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而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必然性的结果，或者用历史必然性解释一切历史问题，那就正象恩格斯所说的：“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演算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了。”^①

过分地强调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以至把他们说成是不受历史规律的支配，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可以为所欲为，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胡说。但是如果不承认个别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乃至避免提到个别历史人物的名字，也是一种严重的片面性。全面地讲述历史，应该是在肯定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下，承认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因此在讲述历史时，就不必避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名字，包括帝王将相在内。

避免讲孔子，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黑格尔也是一个大唯心主义者，马克思却公然承认他是这个大思想家的门人。避免讲汉高祖，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帝王；拿破仑也是一个帝王，恩格斯却认为他是被战争弄得疲弱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不讲商鞅，不过因为他是一个将相；俾斯麦也是将相，而恩格斯却恰如其分地肯定了这位有丰富的、实际的阅历而又非常狡猾的人物，实行了和普鲁士希望一致的民族统一。林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解放黑奴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但是马克思却说“他是具有伟大成就而又心地善良的出类

拔萃的人物之一”^②。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但因为他违反了自己的阶级同情，以毫不掩饰的赞赏去述说他的政治死敌——圣玛利修道院街的共和主义英雄们，而恩格斯就称赞他是“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③。

历史人物是可以讲的，因为遮蔽人们的眼睛，让人们看不见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不是历史人物本身，而是历史学家过分重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那种资产阶级思想。如果不清除这种思想，即使不讲个别历史人物，也不一定就能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问题不在于讲不讲个别历史人物，而在于如何讲法。假如我们从阶级观点出发来讲述个别历史人物，那就正象马克思所说的，他们“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④用这样的观点讲述历史人物，则不但不会妨碍阐明历史规律，而且还可以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反映出他们生存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若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89页。

② “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信”，“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3页。

③ 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初版序第5页。



于情况，有助于历史规律性的阐明。只要我们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古人，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物是可以讲和应该讲的。领导农民去轟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农民革命领袖，和英勇地保卫祖国的独立，击退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们固然应该讲，对于那些在历史上作出出色的贡献，并且因为他们的贡献而加速了我国历史的进程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应该讲。就是帝王将相也不应一概抹煞，秦始皇、汉武帝固然要讲，就是李后主、宋徽宗，也不能从文学艺术史上抹去他们的名字。妇女也不要除外。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妇女，例如缙成“汉书”的班昭，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的完成者；宋代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应该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的一颗珍珠。此外，如象王昭君、乌孙公主、文成公主等，也不能抹煞她们在汉唐时代的民族友好关系上所起的一定作用。

坏人也要讲，因为他们曾经起过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

总之，在讲授历史的时候，应该着重地讲述历史上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也要讲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

和历史学恰恰相反，过去的考古学只是讲古物的形制花文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相互比较，确定古物的年代，因此在考古学的教学中，主要的是讲器物排队，学生所接触的是石器铜器陶器等等，从来看不见人。

研究古器物的形制是重要的，但不论怎样重要，也只是考古学的手段，不是目的。考古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古器物来说明这些器物制作者和所有者的生存时代的社会关系，亦即要发现隐藏在這些古器物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最后发现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从古器物中去寻找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是困难的。例如我们曾经发现古代的谷物，其中有小麦，但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小麦的滋味不能告诉你，它是谁栽种的；同样我们研究这个过程的时候，也不能看见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管理人的残酷的鞭下么？在资本家的注意的眼下么？是象辛辛拿达在他的小田园内生产一样么？是象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一样么？”^①

和小麦一样，其他出土的古器物，都不能告诉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然而我们的目的却是要知道上面所说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可以找出来的。考古学家如果注意那些和罐罐罐罐一同出土的生产工具，就有可能发现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因为这些生产工具都表现着社会生产力的一定水平，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们“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②

现在考古学的讲授又有些相反的情况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0页。

② 同上书，第195页。



况，好象考古学要离开物的研究来讲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考古学上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与物结合着作为物而出

現的，换言之，是物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考古学应当努力要通过古器物找到人与人的关系。

三 統治階級与人民群众問題

旧的历史学，都贯彻着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統主义历史观，因而它的内容主要地是写統治階級方面的活动。如果也提到人民群众，那是被当作历史上的消极的、被动的因素。

解放以来，許多历史教师已經承認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历史观，但由于传统的影响，个别的教师有时还是过多地不适当地讲述統治階級的活动。例如有一位教师把朱元璋說成人民的皇帝，因而使学生对朱元璋发生了衷心的崇拜，大作“洪武頌”。有些教师对宫廷生活很感兴趣，在讲述安史之乱的时候，不着重分析这个变乱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它所引起的后果，却大讲唐玄宗的宫廷生活，引导学生去欣赏霓裳羽衣之曲。这种讲法当然是不对的。

为了清除封建正統主义历史观，现在也有个别的教师避免讲述統治階級的活动，乃至避免提到他們的名字。例如个别的教师讲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治黄河、隋煬帝修运河的时候，既不提秦始皇、汉武帝、隋煬帝的名字，甚至也不讲秦王朝、汉王朝、隋王朝，而用几十万或几百万劳动人民代替这些皇帝的名字和王朝。我以为这样的讲法也是不妥当的。誠然，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

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沒有挑土，汉武帝沒有筑堤，隋煬帝沒有挖河，但是他們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組織者，不承認他們动员和組織工作的作用是不对的。馬克思在說到亚洲各国巨大建筑和公共工程时曾經引用了这样一段話：“那种种令人惊异不置的遺蹟所以能够发生，就因为該帝国的君主和教主，对于这大群人有指揮的权力。”^① 中国沒有教主，具有指揮权力的就是君主，而君主之所以具有指揮的权力，就是因为他們在封建地主制度的基础上掌握了劳动人民赖以生活的資料。

不仅公共工程如此。在以往的階級社会中，劳动人民从事任何劳动生产，都必须以各种被奴役被剝削的身分参加到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去，在他們的对面是各种各样的剝削階級。这些剝削階級掌握着当时的社会經济命脉、政治权力，强制劳动人民按照他們的意图去实现那些对于他們說来是必要的劳动創造。因此在講到階級社会的劳动生产时，就不能不講到当时統治階級的意图以及为了实现他們的意图而作出的具体措施。不講这些，就不能說明劳动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0頁。



人民是在怎样的关系之下来参加劳动生产的，亦即不能说明劳动生产中的剥削和被剥削、强制和被强制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阶级斗争的最基本的原因。

在讲述封建社会的历史时，也有人认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的改革，例如王莽改制都可以不讲。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王莽改制是为了缓和正在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但是他的王田、奴婢、五均、六筭政策，却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才爆发了赤眉、铜马、新市、平林的农民起义。不讲王莽改制，就不能说明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

还有人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如汉朝的七国之变，晋朝的八王之乱也可以不讲，因为这些变乱，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我以为这也是不妥当的。西汉的七国之变，西晋的八王之乱，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它们都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当时历史的主要内容的一个方面，怎么能不讲呢？不但七国之变、八王之乱要讲，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倾轧、宫廷政变也要讲。因为这些事变往往不是统治者个人的格斗，而是反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直接间接影响当时人民的生活，甚至引发敌对阶级间或民族之间的矛盾，例如八王之乱引起了西晋末年普遍发生的流人暴动，同时，替“五胡十六国”的局面铺平

了道路。

在文化思想领域内的进步和落后、反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贯通古今的。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深刻最原则性的表现形式。它不仅被动地反映阶级意识，并且往往被用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既然是斗争，就不能只讲斗争的一个方面，也要讲斗争的另一个方面，比如说不能只讲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要讲唯心主义的思想家。

由于统治阶级统治了物质生产资料和人，因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一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它同时也就是该社会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拥有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就拥有精神生产资料，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要听命于这个阶级。”^①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而凡是和这种正统思想对立的思想都被指为异端。当我们讲述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的时候，要讲述这种被指为异端的思想，也要讲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阐明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转引自侯士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98页。



总之，阶级社会的历史总是有敌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活动，阶级社会就由这敌对的两个阶级构成了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去掉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全面地说明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在我们讲授历史的时候，固然要着重讲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但为了更好地说明人民群众的历史，就必须无情地揭露人民群众的敌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用不同的形式剥削压迫人民的史实，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才能显示出人民群众的每一步前进都是残酷斗争的果实。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阶级社会的历史写

成漆黑一团，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恩格斯曾经批评过旧唯物主义者把中世纪的历史当作历史行程中由千年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中断，而忽视中世纪所作的巨大成就，是“没有对事物的历史观点”。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些发明都是生长在阶级社会中的发明家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因此，当我们讲阶级社会的历史时，要指出它的黑暗面，也要指出它的光明面。

四 理论与资料问题

过去在历史教学中，有一种过分强调史料的倾向，有些教师把占有史料当作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而以拾遗补缺作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甚至认为史料就是史学。由于过分强调史料，有些教师在讲稿中大量堆积史料，而没有进行应有的理论分析。科学研究也是侧重繁瑛考据。往往为了一些不关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或问题的考证而搜罗摘抉，穷幽极微。例如有一位教师就考证过帽子和雨伞。对于重大的历史问题，反而轻描淡写，不予重视。象这样的史学家就正象章实斋所说的：“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①

我们反对了把史料当作史学的说法，

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史料本身。现在有个别教师对史料不够重视。他们为了避免陷于繁琐主义，在讲授历史的时候，不根据具体的史实分析历史问题，只是空空洞洞地讲一些原理原则，或者干巴巴地讲一些发展规律，一再重复人所共知的道理。有些教师虽然也选择了一些史料，但并不是用原理原则来分析史料，而是把史料当作事例来注释原理原则。在历史研究中，没有任何事情比玩弄个别事例更容易的，然而这是毫无意义的。史料如果不被放在它的整体中，放在联系中，那它们就是一些孤立的历史碎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中)”篇。



片，任何問題也不能說明。

有些青年，也有輕視史料的情況，他們只滿足于一般的理論原則，而不去鑽研具體的歷史資料。但是恩格斯却反對這樣做，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經批評過當時的德國青年作家。他說：“一般說來，對於德國許多青年作家，‘唯物主義的’這個形容詞不過是一個套語，他們用這個套語去處理各種事物，再也不花什麼氣力去作進一步研究，也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籤貼上去，就以為一切都解決了。然而，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一個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種用以按黑格爾學派方式構造體系的手段。全部歷史都應該開始重新研究。……這領域極為廣大，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有很多的創造、獲得卓著的成績。”^①

不重視史料，或者企圖不通過史料的分析來說明歷史，是不對的。研究歷史必須從實在的具體的史實出發，不能從空話出發。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的這句話是對的。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反對史料，而且十分重視史料。馬克思不止一次告訴我們，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資料，不占有資料，分析資料，便不能對於現實的運動作出適當的說明。他曾經嘲笑那些輕視資料的人，說他們“認為知識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自然不需要這種努力。他們這些幸運兒為什麼要為一些經濟學的和歷史的材料自尋

苦惱呢！”^②恩格斯也曾經說過：“即令只要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揮唯物主義觀點，也是一種需要多年靜心研究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裡講空話是無濟於事的，這樣的任務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審查了的、完全領會了的歷史材料才可解決。”^③毛澤東同志也曾經教導我們要我們在研究問題的時候“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問題不在於史料本身，而是在於用什麼觀點和方法來對待史料。如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運用史料，則史料愈豐富愈好，史料愈豐富，得出的結論就愈益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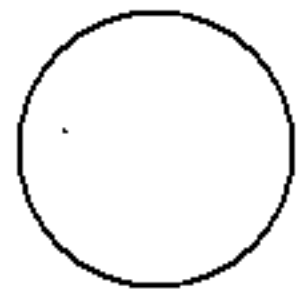
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論。不用正確的理論來分析研究，史料等於廢物。因為歷史學的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一樣，“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劑。那必須用抽象力代替二者。”^④要具有這種抽象力，即理論分析的能力，就必須學習理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現在我國歷史學教師都在學習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487頁。

② 馬克思：“給魏德邁爾的信”，《馬克思恩格斯給美國人的信》，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頁。

③ 恩格斯“論卡爾·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7頁。

④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初版序第2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是我們還是學得非常不夠，這主要地表現在我們還沒有學會怎樣應用理論去分析具體歷史問題，因而在講授歷史的時候，理論與資料不能很好地結合，不能把理論貫串在史料之中。只要碰到具體的歷史問題，理論和史料就分了家，史料歸史料，理論歸理論，分道揚鑣，各不相關。因此對於歷史學教師來說，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加強理論的學習。要學好理論，當然要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並且通過史料的分析，練習理論的運用。更好的辦法是通過百家爭鳴的辦法提出一些具體的歷史問題、事件或人物展開爭論，只有在學術的論爭中，才特別感到理論的重要，也特別感到資料和理論相結合的重要。

理論總是帶有普遍性、一般性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沒有替中國史上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事件或人物準備現成的結論，

就是毛澤東同志也只是教導我們怎樣研究歷史。因此要想對於中國史上的每一個具體的歷史問題、事件或人物都能找到現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論，那是沒有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認真地學習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對於歷史學上的一些問題、事件或人物作出創造性的概括或判斷。

馮援為孟嘗君收債，問孟嘗君說：“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說：“視吾家所寡有者。”我們的史學家，最好也檢查一下，自己缺少什麼，是理論、還是史料，然後補充自己所缺少的東西。我以為，對於許多人來說，最“寡有者”還是理論。因此，我們全國的歷史學教師都應該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歷史教學的水平。

編者的話

薛暮橋同志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和葛伯贊同志的“目前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兩篇文章，分別談到了目前經濟學界和歷史學界所討論的一些重要問題，我們發表出來，供大家討論。



为了追求真理

· 施东向 ·

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对于同一个问题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是常有的事情。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客观真理。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来不可能是平坦的；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从来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

前人在科学研究中所达到的正确的结论，当然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重复前人的结论，而是要在前人所未有或不可能接触到的领域内，在前人所未有做出正确的或完全正确的结论的问题上求得真理。在进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前人提出的正确的结论可以对我们起引导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而重要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做艰苦的努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所必须依靠的指南针；依靠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不犯大的方向错误，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真理。但是有了这个指南针，并不能使我们在还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上不费吹灰之力而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就是人们确实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而向前摸索真理，也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要在任何科学问题上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就必须详尽地掌握有关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越是复杂的问题上，就越是需要穷年累月的努力，才可能有真正的成就。但是经过努力而仍然得出错误的或部分错误的结论的情形也是可能的。

对于学术问题上的错误，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要分辨两种性质的错误。有一种人并没有花过收集材料、认真研究的功夫，只是从感想出发，随便说出些错误的意见。这种错误，应该说并不是在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而是根本不进行科学研究的错误，这种错误除了证明人们不应当这样做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人是认真做了研究工作，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掌握材料不完备或其他原因而作出了不正确的、不全面的结论。这种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往往是在达到真理的过程中所难免要经过的过程。科学史证明，在科学问题上提出正确的结论的人固然是有功劳的，而那些勇于在新的科学问题上进行试探，提出终于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了的假设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功劳的。各种假设，各种不成熟的见解，各种带有片面性的主张的相互争辩，这对于达到正确的全面的结论，往往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要坚持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的百家争鸣。



毛澤东同志說：“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討論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决。”

我們的共同目的是追求真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在学术問題上展开充分自由的討論。我反对你的意見，但是尊重你的发言权，这是在我們的学术討論中所应当有的态度。当然，为了辨清是非，尖銳的批評有时是必要的；但是人們都应当采取說理的态度，努力用科学的論証來說明是非。

参加学术討論的人，都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我們的社会，是真理能够开花結果的社会。但是有人却会因为自己的意見不被多数人贊同而动摇。如果自己的意見确是有錯誤，以至不被人贊同，那就应当修正自己的意見。但如果是正确的意見，即使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二人同意，也应当坚持。在学术討論中，真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的手里，而在少数人的手里。当然，只要的确是真理，那么少数人的意見也一定会慢慢地变成多数人的意見。

我們在有勇气坚持真理的同时，又必須有虛怀若谷的态度，要能够向一切人，包括向自己的爭論对手学习，接受別人的正确意見，修正自己的錯誤。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的人就会随波逐流，沒有主张。不虛心听取別人意見的人就会自以为是，坚持錯誤。这两种态度都是应当反对的。科学本身是老老实实的學問，它要求人們以

老实的态度对待它。討論的双方既然都是为了探求真理，发展科学，那么把对手那里正确的見解接受过来糾正或补充自己的見解，又有什么不好呢？

学术討論，是长期或短期研究成果的展覽和比賽。有些討論，半途擱淺，无法深入，这种情形正是反映了在所討論的問題上，大家还缺乏比較深入的研究。比較复杂的艰难的問題也往往不是一次討論所能够完全解决的。經過一次討論以后，虽然問題还没有解决，但是問題的症結可能暴露出来，我們自己之所以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弱点也可能暴露出来。这都是很有好处的。这就会促使我們更好地、更有目的地进行研究工作，努力去收集我們所必须具备的資料，去掌握我們所还缺乏的知識，去解决阻挠我們前进的疑难。这样，我們就能使討論一步步深入，使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一步步提高。浅尝即止，对于科学事业是永远不会有益处的。

学术工作者应当勇于参加热烈的爭論，也要甘于“寂寞地”进行切切实实的研究工作。不然，就容易形成“赶浪头”的現象。有一个寓言里說：有个木偶，听说海里有数不尽的珍宝奇麗，宛若仙境，于是便为自己安排了一次旅行。但当它在海面上飄浮很長的时间以后，却大失所望，因为他所看到的大海，除了一片汪洋以外，一无所有。我們最好不要做这个木偶，要获得“宝藏”，就得在真理的海洋里深入下去！



关于水电和火电問題的討論

李 銳

多发展水电还是多发展火电？这是长久以来頗有爭論的一个問題。

水电和火电是各有利弊的，在电力生产上是相輔相成的。一般說来，火电的特点是：造价低；建設時間短，又便于扩建；易于靠近用戶；年利用小时高；但是消耗煤炭多，運轉人員多，成本高；本身是个大用戶，即厂用电約占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七到八；運轉时起动慢，較易发生事故；設備制造耗用鋼材多，需要很多優質合金鋼；配套很复杂；基本建設用的鋼材也比較多。水电正大体相反：造价高；建設時間长；不能隨便靠近用戶；年利用小时比較低；枯水时电量要减少；但是成本低，只及火电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運轉人員也只有火电的十分之一；本身用电只占全部发电量的百分之一；運轉时起动灵活，很少发生事故；設備制造用的鋼材少，基本上不需要優質鋼材，有些部件还可用鑄鐵代鋼，配套也簡單得多，基本建設用的鋼材也比較少。

十年以来，我国电力工业的建設一直

是以火电为主、水电为輔的，水电的投資只占电力投資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現在火电占我国电力的四分之三以上，而且为了适应緊迫的用电需要，当前的电力建設仍然必須以火电为主。在今后两三年內，这一形势大体上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十年来形成火主水輔的根本原因，乃是用电急迫，而每年投資有限，必須將資金用于收效快的火电。但是，我国水电的发展，必然要随着国民經济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我国国民經济愈发展，愈需要大量的电力，大量的水电。另一方面，国家經济愈发展，也就愈有力量办水电；同时，我国丰富的水力資源是大量发展水电的有利条件。因此从长远說来，实行水电为主、火电为輔的方針，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是需要和可能的，当然，这个方針不是短期內能够实现的。

通过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水电建設的实际情况，对于我国水力資源特別优越的条件，大家有了更明确的認識；同时，水利工程必須和水电緊密結合，耗电工业的



发展有賴于水电的发展，水电設备国内便于制造，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也越来越清楚了。

現在将四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分別說明如下：

首先，最主要之点是：我国水力資源极其丰富，开发条件特別优越，利于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水电。

动力資源的条件，是影响世界各国水电和火电比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現在世界的总发电量中，水电約占三分之一。以水电为主的国家是不不少的。挪威、瑞典、瑞士、加拿大、朝鮮、新西兰、日本、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水电占到全部电力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有的国家甚至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国家水电之所以占了絕對优势，就是由于一方面水力資源比較丰富；另一方面又十分缺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动力資源。这些国家最好利用的水力資源，已經大部分得到了开发。

美国的水电比重长期停留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主要是由于煤炭、石油、天然气資源特別丰富，便于发展火电；同时，煤炭、石油、铁路資本家和农場主等，对发展水电也常有阻碍。但是从絕對数量說，美国拥有的水电容量，現在仍然是世界各国最多的，达二千七百万瓦。美

国的水力資源已經开发的約占全部蘊藏量的百分之二十七。

从动力資源來說，我国的水力資源和煤炭資源都是十分丰富的，因而在水电和火电之間，可以有較大的选择余地。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資源还在勘察之中，目前还不能作为发展火电的根据。在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內，我国火电的发展主要还是靠煤炭。

煤炭是一种重要的物资。它是冶金等重工业不可缺少的燃料，又是一种珍贵的化工原料，将来会逐渐成为解决人民吃穿問題的重要資源。因此，我們应当逐步改变用过多的好煤来发电的不合理的情况，逐步地用更多的劣質煤和洗煤用的泥煤来发电，使今后火电的发展更合乎經濟和合理的原則。

火电的发展决定于煤炭的供应。一百万瓦火电設备的生产，每年大約需要四百五十万吨左右原煤，运输問題是一个很大的問題。我国煤炭資源的分布，北方多于南方，煤炭生产也受到很大的地区限制。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的用煤要靠华北、东北两地区供应，形成了大量北煤南調和长距离运煤的現象，而煤炭长途运输的浪费是很大的。

在一九五八年，探明了的煤炭資源的蘊藏量有极大的增加，长江以南各省也探明了不少煤炭資源。煤炭工业部門正在努力改变产煤地区分布不合理的情况，准备在南方增建新的煤炭基地，争取各区用煤



能够逐步基本自给。但是这一努力还不是很快就能见效的。今后即使做到各地区用煤基本自给，但是在地区内部，仍然有相当的运输问题。

我国水力资源占世界第一位。根据这几年进一步的调查，按平均流量共蕴藏五亿八千万瓩，加上小河流的资源，当在六亿瓩以上。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沿海各省的潮汐水力。

更重要的是，在地理位置和地形两个方面，我国水力资源有特别好的开发条件。

在地理位置方面，水力资源分布在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工业城市都可以从水电站取得电力；估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个别水电站的输电距离需要达到五百公里。将来修建长江三峡水电站时，送电一千公里的问题才会提到日程上来。

在地形方面，我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高原、台地、山脉和丘陵，河流穿过它们奔向盆地和平原，其间造成许多陡峻的坡降和狭窄的河谷。因而水电站的坝址随处可见，容易集中落差，缩小工程量。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我国的长江，河流长度相差不大，但每公里的平均落差，长江为密西西比河的十二倍半。

水电站的造价主要受自然条件的控制，往往因自然条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工期的长短同自然条件也有重要的关系。火电站的造价和工期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则较小，单位造价变化的幅度也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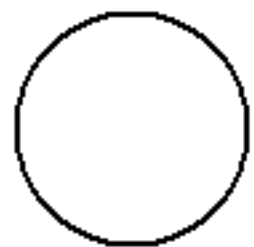
较小。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造价高和工期长是水电建设的两个主要弱点。各国水电站每瓩的造价，一般为火电的两倍到四倍，甚至更大；工期也比火电长得多。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我国水电的单位瓩平均造价只比火电高出十分之一，水电的平均施工期限也比火电约长三分之一。

我国水电站造价低的原因，主要是自然条件好，工程量小。同国外许多主要水电站的情况对比，我国水电站每瓩的混凝土工程量，一般只及国外的一半或者不到一半。除此以外，我国水电站造价低，也还有以下的原因：一是土建工程单价低。水电站的投资中，土建工程约占三分之二。我国土石方工程的单位价格，如以钢铁价格为共同的基数，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在混凝土工程和隧洞工程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二是施工准备工程简单，特别是南方更便于因陋就简。三是气候条件好，一年四季可以施工。再加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使设计和施工往往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造价。

在工期方面，外国建设一个中型或大型水电站，总要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才建成的也不少。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五万瓩左右的中型水电站，自正式开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一般约两年半；当时估计一个五十万到一百万瓩的水电站，工期在五年左右。这样的速度在



世界各国也算快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中型水电站的建設時間，已縮短到一年半左右，一般大型水电站也能縮短到三年左右建成。

新安江水电站装机容量为六十五万千瓦，是用“洋法”和“土法”相結合的办法施工的，开工以后不到三年就有可能发电。而美国哥伦比亚河上正在修建的普列斯脱滩水电站，規模同新安江相仿，施工是高度的机械化，在老板的巨額奖金和罰款的驅策之下，預計仍要五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发电。

水电站的施工最适于洋土并举，特别是在开工的初期和在土石方的处理上，可以更多地采用土办法。一九五八年开工的大中型水电站項目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八倍，施工的洋設備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这一方面說明了水电建設中施工設備的不足，但也可見土办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国，洋土并举是可以大大縮短工期的。当然，建設水电站一般工程量比較大，一定数量的洋設備仍是必需的。

根据上述动力資源，特别是水力資源的特殊有利情况，我們当然應該坚决执行又多又快而且能又好又省地发展水电的方针。

其次，积极开发水力資源，实现河流的綜合利用。

我国許多水力資源都具有巨大的綜合利用的作用。这些水力資源的开发，都能

同时滿足国家当前迫切的防洪、发电、灌溉、工业供水和航运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就可以用最經濟的投資取得国民經济各有关部門最大的綜合效益。綜合利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治理和开发河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則。

洪水灾害是我国广大土地上自古以来存在的問題，几乎全国所有主要河流的下游，都有輕重程度不同的洪水威胁。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等大河流的泛滥灾害，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河流，不仅洪水发生的次数十分頻繁，每次灾害所造成的損失也是十分巨大的。解放以来，我們在防洪工作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很大的成績，洪水灾害大大減輕了。譬如黄河在解放后十年內遭遇了四次洪水，一九五八年黄河下游发生接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都沒有发生决口。又如长江在一九五四年发生的洪水，比解放前一九三一年的洪水要大得多，但受灾情况却比一九三一年輕得多。当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些河流的洪水問題，仅仅依靠加强堤防等措施是不够的，还必须修建一些具有相当調节能力的大小水庫来削減洪峰。例如，經过丰满水庫的調节，曾将一九五三年松花江下游的最大洪峰一万五千秒公方減至七千三百秒公方，曾将一九五七年松花江下游的最大洪峰一万七千四百秒公方減至六千秒公方。这些水庫同水电站是一种孿生的关系。

我国河流开发的另一个重要問題是灌



溉。由于雨量分布得不均匀，往往不能及时保证农业生产的用水需要，几乎全国的各个地区，特别是西北和华北，都容易发生程度不同的旱灾。为了解决农业用水所修建的大小水库，也同样可以结合发电。

我国河流的航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许多河流上有险滩，枯水时更不便通航，需要对航道加以改善。水道运输是一种量大而价廉的运输方法。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航运的要求也正在日益增加。水电站的修建，在上游造成水流平缓的水库，在下游则增加枯水时期的流量，这对航运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当然，有的河流，在修建水电站时还必须同时修建通航设备。

工业给水也逐渐成为我国工业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和其他许多轻重工业，在生产过程中都要耗用大量的水。火电厂在生产运行中也有很大的用水要求。水库和水电站的修建，可以担负起工业给水的任务。

此外，渔业生产的发展，也是河流综合开发中可以同时结合解决的问题。

水电站的建设同这些方面的关系，是互相结合又互相促进的。官厅、佛子岭、梅山、三门峡、丹江口、青铜峡、密云等工程，正好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工程，即使不是为了发电，也是需要修建的。去年和今年各地修建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可以结合发电的就在二百万瓩左右。如果发电

设备能够赶上去，其中绝大部分都可以很快发电。

大家都知道，河流的综合利用为国民经济带来全面的长远的利益。与河流有关的各项国民经济利益，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和工业供水之间，对于河流的开发和水量的控制、使用，存在着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分清主次，防止片面，使各种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使各项国民经济利益都能获得必要的、适当的满足，总的效益达到最大的限度，是必须从自然界的各种条件（包括水文、地形、地质等），从政治、经济和技术各个方面，从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分项具体计算、详细比较分析和综合研究之后，才能求得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水能利用问题，即水力发电问题，是河流综合利用中情况最复杂和联系最广的问题，因为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电力系统（与火电的配合）、同河流水文（洪水和枯水）以及同工程结构本身的布置，都有着最密切的直接的关系。一般说来，具有较大水库的水电站，是能够统一解决各种矛盾，合理地实现河流综合利用的要求的。

第三，耗电工业的发展，要求有廉价的电源——水电来配合。

所谓耗电工业，就是指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电能的工业。这种工业产品的制造，大都采用电炉冶炼或电解过程。在黑色冶金方面，主要是各种优质合金钢、铁合



金；有色冶金方面，主要是輕金屬系統的鋁、鎂、鈦以及電解銅；化學工業方面，主要是化學肥料和合成纖維。生產方法的改變也可以使某些普通工業改變成為耗電工業，如電爐煉鐵代替高爐煉鐵，電爐煉鋼代替平爐、轉爐煉鋼，用水電解法代替一般方法製造合成氨。耗電工業的產品是現代工業和現代國防不可缺少的。因此，耗電工業的發展水平成為一個國家工業水平和技術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

耗電工業的產品成本中，電費占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甚至高到百分之七十。這一類工業，世界各國大都靠水電來生產。加拿大、瑞典、挪威等國的煉鋁工業，從國外輸入原料，再向國外銷售產品，這就等於輸出了水電。一座十萬噸的煉鋁廠，大約需要三十萬到四十萬瓩的廉價電力，這只有大水電站才能勝任。因此，在我國大量發展成本低廉的水電，才能促進耗電工業的發展。反過來，耗電工業的發展可以最好地同水電相結合，能夠在短期內使水電站的全部容量充分發揮作用，並且可以設法利用水電站的季節性電能，即洪水和豐水時期的電能。

這裡順便提一下成本的問題。降低成本，積累資金，是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遵循的經濟原則。不斷提高全國發電量中水電的比重，是降低電力成本最有效的一個措施；這對於降低各種用電產品的成本、加速國家資金的積累、乃至提高勞動生產率，都是有着重大意義的。

第四，水電設備比火電設備容易製造，容易得到發展。

這是由於水電設備在製造技術、金屬材料和配套設備三個方面，都比火電的要求低得多、少得多。以電站的主要設備來說，水電不需要複雜的鍋爐，也沒有高溫、高壓、高速的問題，材料上也就不需要優質合金鋼。水電設備所需的鋼材只及火電的一半，銅只及火電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而且絕大部分是用的普通鋼材；水頭不高的電站，有些部件還可以用鑄鐵，以至鋼筋混凝土代替鋼材。當前火電設備的一個難關是配套問題，這需要經過一個相當的時間和巨大的努力之後，才能逐漸得到解決。這方面，水電也簡單得多。因此，水電設備的製造比較容易推廣，一般機械製造部門都有條件來承擔。

綜上所述，從煤炭資源的情況，水力資源及其開發條件，防洪、灌溉等的綜合利用要求，耗電工業的發展，設備製造等這幾個方面來說，我國完全應當更多更快地發展水電，應當力爭在盡短的時間內，使水電趕上前去。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來看，算一算大賬，以水電為主、火電為輔作為電力建設的一個長遠方針，是完全合理的。

關於水電的好處，我國應當多發展水電，理論上一般是得到公認的。但在當前



水电发展上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在认识上和措施上得到解决，对于贯彻水主火辅的方针是不利的。

当前使人们对于发展水电引起怀疑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水电站枯水年的问题。

去年东北丰满和四川狮子滩两水电站都碰上了枯水年，去冬今春发电量特别减少，因而引起了一些议论。现在将这件事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去年第四季度，正当东北严重缺水的时候，丰满出力大大降低，只能有一台机组经常运转。缺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电力赶不上大跃进的形势。而丰满第四季度的出力降低，则是由于遇上了特殊枯水年，几个矛盾碰在一起造成的。去年丰满的年总水量只有六十九亿公方，不及多年平均水量一百四十四亿公方的一半；这是丰满有水文记载三十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枯水，从水文上推算，是超过百年一遇的枯水。丰满水电站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东北电力系统中最主要的供电电源，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供应了将近一百亿度的电量，为国家节省了七百四十万吨煤炭；由于丰满供应了大量廉价的动力，东北电力系统的电价在全国来说是最低的，这对东北地区电气冶金、电气化工等耗电大的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丰满水电站的设计中，曾考虑到遇上特殊枯水年时，最低发电量为十二亿度（设计中的多年平均

发电量为二十亿度）。这时就需要增加火电站的负担，动用电网中的备用容量，来补偿它少发的电量。去年四月初，中央气象台和丰满水电站曾经预测到要遇上枯水年，在水库调度上本来应该早作准备。可是在四月至七月间，为了满足东北电力负荷的增长，尽管来水量已经大大减少，丰满还是比往年同期多发了二亿度电。因水量收支不能平衡，把水库存水提前用掉，迫使丰满水位大大下降。到第四季度，来水更少，而且水头又很低，只能有一台机组经常运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一年，丰满仍勉为其难，发了十六亿度电，只比设计电量少发四亿度。去年四月至十一月间，东北电网的需电量增长百分之六十，而发电设备只增长百分之十三，这是缺水的最主要的原因。

狮子滩水电站去年也遇到了枯水年，约比平时少发电百分之二十六。可是，造成水库水位过早下降，和今年三、四月间发电量严重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去年估计当年的雨量不会少，为了避免洪水期间弃水，再加上为了降低发电成本，重庆的火电厂曾部分停止生产（一直到八月才带满负荷），让狮子滩比原计划多发了一千二百万度电。其后果是：提早用水一亿二千万公方，损失水头近四公尺，由于水头降低，损失的电量为六百三十万度。这时，狮子滩下游两级新建的水电站——下碛和廻龙寨正在装机，还没有运行，因而发生了弃水，让水不做工作，白白流走，共



損失電量一千八百多萬度。去年儘管獅子灘遇到枯水，重慶地區發電設備的增加趕不上電力負荷的上漲，但是在今年二月份以前，重慶地區的供電還是基本正常的。如果能夠按獅子灘原訂調度計劃正常運行，把去年早用掉的一億二千萬公方水留到今年來用（約可多發三千餘萬度電），並且早一些動用電網內的火電後備，早一些調整負荷，就是遇到枯水年，重慶地區今年三、四月份的電力也是不致於這樣緊張的。

水電站確有一個枯水的問題。如果這個地區只有一個孤立的水電站，或者是純粹靠天然流量沒有水庫調節的水電站，那麼，這個問題就無法解決。如果水電站不是孤立的，電網之內還有其他水、火電站，有備用的容量，有水庫調節流量，這個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河流的水文情況，有豐、有枯，這是一種客觀存在，也有它一定的規律。只要我們認識到這種規律，並且設法掌握和駕馭它，就不會造成大的困難或者損失。

丰满和獅子灘都是多年調節的水庫，可以對年與年之間的水量進行調節。去年兩地的來水量都比平水年少百分之五十，而由於動用了前年的存水，實際上少發的電量只是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十六。因此，應當反過來說，這是具有多年調節水庫的水電站的一種優點。當然，動用存水，要用得恰當，不到最緊急的時候不要去輕易動用。關於水庫的調度，一方面要求在豐水期多得電能，少棄水；另一方面又要

求在枯水期保證一定的出力，以滿足用戶需要。我們應當從去年的水庫調度和水火電站的配合上吸取教訓。

挪威、瑞典、瑞士、加拿大等以水電為主的國家，當然遇到過多次枯水，一般都是通過水火電合理調度和動用系統中原有的備用容量得到解決。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發生枯水而使水電建設的發展受到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仍在繼續大力發展水電。

不論水電為主或者火電為主的國家，電力系統中都需要一定的備用容量，以便在定期檢修、發生事故和負荷發生意外上漲的時候，不致影響正常供電。在特殊枯水年，就能利用這種備用容量以補不足。

我國在自然條件上同上述國家有所差別：我國國土廣大，氣候複雜，一年四季都有降水，各條河流的水文情況很不相同。去年東北松花江上游和鴨綠江遇到特殊枯水，而黑龍江卻遇到特大洪水；四川獅子灘遇到枯水年，而附近的大洪河卻是個豐水年。將來水電站修多了，電力系統也有了大的發展，相鄰河流的水電站豐枯水量互補盈虧，水火電配合運行，即使有的水電站遇到枯水，困難也是比較容易克服的。

當前有關發展水電的第二個突出問題，是關於裝機容量和發電量的平衡問題。

目前容量和電量都感不足，而電量的



不足，更成为主要的問題。有的水电站利用小时数較少，比同一装机容量的火电站，发电量要少得多。因而建設一个同样装机容量的电站，为了多得电量，在当前这样大跃进的时候，許多地方宁願多要火电，不要水电。并有所謂“两个瓦（水电）不頂一个瓦（火电）”的說法。

一个水电站装多少容量，平均年利用小时多少，是由它本身的条件和所担負的任务决定的。一般說，在一个以火电为主的系統内水火电站配合供电时，常由火电站担負一天二十四小时内比較稳定的用电要求（基本負荷），而由水电站担負一天内变化較大的用电要求（尖峰負荷）。例如，官厅水电站在京津唐电力系統中，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担任基本負荷的火电站相比，水电站的年发电量即年利用小时就少得多，这样的配合是經濟而又合理的。如果系統中沒有水电站，而以同样容量的火电站担負尖峰負荷，不仅它的发电量和利用小时也会同水电站一样小，而且在运行技术上要比水电站增加許多困难。此外，水电站的装机容量稍多一些，还可以利用洪水期的水量，多发出一些电量，节省煤炭。这个优点是火电站所沒有的。

在以水电为主的国家中，作为供电主要电源的水电站，其利用小时数是相当高的，一般达到五千小时以上。因为它既要担負尖峰負荷，同时也要担負基本負荷。在以火电为主的国家中，情况正好相反，

作为輔助电源的水电站，其年利用小时数可能低到二千小时。这些水电站，一方面主要是担負系統中的尖峰負荷；另一方面在遇到有发生事故的危險时，也可作为备用容量之用。

我国今后总的情况，水电要逐漸增多，所以水电站的平均利用小时数不宜过低（也就是装机容量不宜过大）。但就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而言，在某些水电較少，而火电較多的地区，水电站利用小时数稍小一些，装机容量稍大一些，也还是合理的。

对于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平衡問題，还要从下列三方面来認識。一是为了适应当前国家建設的发展对电力的急迫需要，虽然火电設備的制造要消耗更多的鋼鉄和有色金屬，但是仍然必須大力发展火电設備的制造。二是对水电的电量要認真算清楚，不要偏少，当然也不要偏多。三是水电建設時間虽然比較长，初期投資也比較大，但是为了逐步增加水电的比重，在今后长期得到廉價电力的好处，就需要在安排电力建設計劃的时候，对这一情况予以必要的照顧。

在具体措施方面，水电站机組安裝的进度，应当更好地与电量的需要相适应。在目前情况下，有的新建成的水电站，机組可以分期安裝，以緩和設備供应的紧张。这样，已經安裝的水电設備，可以开始发电，同时，又为今后的发展留出了余地。



当前有关发展水电的第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水电站同工业布局如何更好配合的问题。

现在有的地方，工业发展快，电站建设慢了；也有的地方，电站建设很快，土建工程已完成，设备也将交货，可是电力用户却没有能跟上去；也有的地方，本来已经严重缺电了，反而又增加了一些耗电大的工业，使缺电更加严重。这当然不仅仅是水电的问题，而是水、火电共同的问题。但是由于水电的建设时间究竟要长些，建设地点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更大些，在适应工业布局的变化上，困难也就比火电多。

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发生过。工业布局和水电配合不好的情况，是应当也是可能加以改善的。有许多工业的布置，主要决定于资源、运输、场地、供水等条件，用电关系较小，当然不能强调要它们来迁就水电。但是对于某些耗电大的工业，供电问题是这些工业选厂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尽可能地更多地迁就水电是有必要的。当然在规划水电电源的时候，也应当主动研究如何同这些耗电工业得到更好的配合。

水电和工业配合的问题也是水电的长远规划问题。水电的长远规划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许多水电站的建设，不仅具有发展电力的意义，而且往往能够促进一个地区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

业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因此，在水电规划中，一方面要有高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要求眼光要放远大一些；一方面要尽量避免所谓“远水不救近火”，努力使水电建设和当前的需要相结合，同时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决不应忽视和放松那些关系重大的远景目标。

在去年大跃进中，水电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五个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下，全国在施工中的大中型水电站总容量达到一千多万瓩。这就说明，我国水电建设已经迈开了很大的一步，已经搭下了一个很大的架子了。去年水电勘测、设计、施工人员创造了许多的先进经验和革命措施，使得水电站的施工速度加快了一倍，造价降低了一半还多。当然，目前水电建设中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是很紧张的，这种困难是我们的事业在高速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在设计和施工中更好地节约原材料，继续开展技术革命，贯彻自力更生的精神，善于从过去的工作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不是回避困难，而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我国水电建设今后是一定能够得到更大发展的。

世界水力资源的总蕴藏量约三十八亿瓩，七十多年来，已经开发的约一亿三千万瓩，主要在北美洲和欧洲；水力资源最丰富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可说基本上还没有得到开发。我国的水力资源目前只开发了不到千分之三。我们应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我们这一代，首先将最



經濟的最好开发的水力資源千千万万瓩地开发出来，讓水电站遍布全国，改造自然，造福人民。

当然，如上面說到的，水电为主、火电为辅，这是要經過长期努力才能够实现的方針，而不是在三五年之內就可以全部实现的方針。在目前，以至在今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內，为着适应国家建設对电力的迫切需要，我們必須积极发展火电。以为我們的长远方針是水电为主、火电为辅，就要在目前集中力量去大办水电，而忽視

火电的建設，其結果必然使我国电力的生产不能适应經濟建設高速度发展的要求，这种作法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因为目前时期为了适应国家經濟发展的需要，多发展火电，就不認真考虑发展水电的远景规划，不充分利用我国水力資源非常丰富的有利条件，不积极进行各項有关水电建設的准备工作，不进行目前条件下可能和必要的水电建設，以便逐步提高水电在整个电力生产中的比重，这种只顧眼前不顧将来的片面性，也是必須避免的。

附：名詞解釋

容量（瓩）

容量是計算电力生产能力的标准。常用的計算单位是“瓩”，每一瓩的发电能力等于一点三六“馬力”。一个电站的发电容量(也就是它的生产能力)，决定于电站內所安装的发电机的数目和大小，所以有时又叫做装机容量。

发电量（度）

发电量是計算电力生产数量的标准。常用的計算单位是“瓩小时”，通俗称为“度”。每一瓩的发电容量每小时可以生产一度电。每一度电可以供一盞二十五瓦（瓦是瓩的一千分之一）的电灯用四十小时，或供一馬力的电动机用一点三六小时。

年利用小时

年利用小时是計算发电设备利用程度的标准。每一瓩发电设备，在一年內如果生产了三千度电量，它的年利用小时就是三千小时。如果一瓩设备全年生产了五千度电量，它的年利用小时就是五千小时。因为一年內只有八千七百六十小时，所以发电设备的最高年利用小时是八千七百六十小时。事实上由于用电需要經常有变动，发电设备还需要定时的檢修，不可能全部經常得到充分利用，一般年利用小时远低于这个最高数字。各个电站的设备年利用小时是不一样的。有的高些，有的低些，这是由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运行方式所决定的。



自动化在帝国主义国家里

——楊重光——

在美国一家罐头工厂的车间里，横列着象火车一样的半自动化车床。车床的传送带长长地连接在一起，不停地蠕动。在“火车”的这一头，一个女工两手用每分钟三百五十次、每小时二万一千次的速度把切成小片的白铁皮飞快地推送到车床上。在“火车”的另一头，一听听密封好了的食物罐头不停地跳出来。女工们被机器的轰鸣声震得头昏脑胀，刚想把两手放下来休息一下，但是拿着计时表的监工在背后吆喝着：“赶快做！赶快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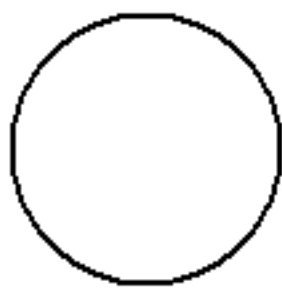
女工们每天九小时干着这种折磨人的劳动。当她在被折磨得衰弱不堪和半瘫痪的时候，她就被资本家抛弃了。于是一个新来的女工顶替了她的位置。在这个原来有好几百工人的工厂里，实行自动化以后，只剩下几十个工人了。很多工人被新机器排挤掉了。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有几百万失业者等候着工作做。老板们是不愁找不到年青力壮的劳动力的。

在现代生产技术飞速发展的过程中，自动化是重要的成就之一。自动化不仅能大量节省人的体力，而且生产管理中的某

些脑力活动也能被自动控制系统所代替。自动化能使劳动生产率一般增加两倍到十倍，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增长三十倍或五十倍。如果没有自动操纵，原子能研究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原子核反应堆的建造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自动化却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已经永远消灭，失业已经根除，任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都是有利的于劳动人民的。列宁在论述英国化学家南姆赛发明的从煤层中直接取得煤气的方法时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南姆赛的这种能‘解放’千百万矿工及其他工人劳动的方法，就能立刻缩短一切工人的工作日，例如从八小时缩短到七小时，甚至更少些。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条件更合乎卫生，使千百万工人免除烟雾、灰尘和泥垢之苦，能很快地把肮脏的令人厌恶的车间变成清洁光亮的、



人类所应有的实验室。家家户户有了电灯和电气取暖设备，就能使千百万‘家庭女奴隶’免于把一生的四分之三的时光消磨在乌烟瘴气的厨房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泛地实现生产自动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劳动条件，急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自动化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还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在自动化的条件下，可以根本地改变劳动的性质，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人的作用将归结为管理和调整各种自动机器和仪器，以及制定工艺过程的各种程序、制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自动化的社会后果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列宁在《论述南姆赛的发明的同一篇文章中》说：“这一变革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与这一发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产生的影响是绝对不能比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采煤的千百万矿工的劳动的‘解放’，必将造成工人大批失业、贫困现象愈益加重和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从这一伟大发明上所获得的利润，将流入摩根、洛克斐勒、利亚布申斯基、莫罗佐夫一班人的荷包，以及他们的随从如律师、经理、教授之流的资本奴才的荷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是机器的奴隶，劳动人民的尊严受到最大的伤害。自动化的运

用不能不把工人从劳动中排挤出来，抛到工厂的大门外，不能不使生产过剩的危机更加严重而尖锐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广泛采用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装备而来的，通常是大大加强劳动强度，因为每个工人所照管的机器增加了，机器的操作速度也加快了，工人的劳动条件更加恶化了。归根结蒂，自动化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各种矛盾。马克思说得好：“在现代的恶劣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免要加深社会的对立和加强社会的对抗。”（“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技术的进步反而使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利受到严重的威胁，自动化逼使更多工人丢掉饭碗。譬如：美国克利夫兰城一个日产一千架无綫电的半自动化工厂，一九五五年的时候雇用了二百名工人，一九五八年实行了完全的自动化，就只用四个技术人员来进行工作了。美国布雷福特城一家制造凝固汽油的完全自动化的工厂，原来有好几百人工作，现在一共只有五个工人，每天生产六十五万磅凝固汽油。这些工厂里多下来的工人到哪里去了呢？交了“好运”的到农场、小工厂打临时工去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只得在纽约城的失业救济所门前，在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工厂的铁栅门外，在华盛顿的街道上蹒跚地徘徊着……。最近尽管很多工厂的烟囱重又冒烟了，但是失业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

难怪最近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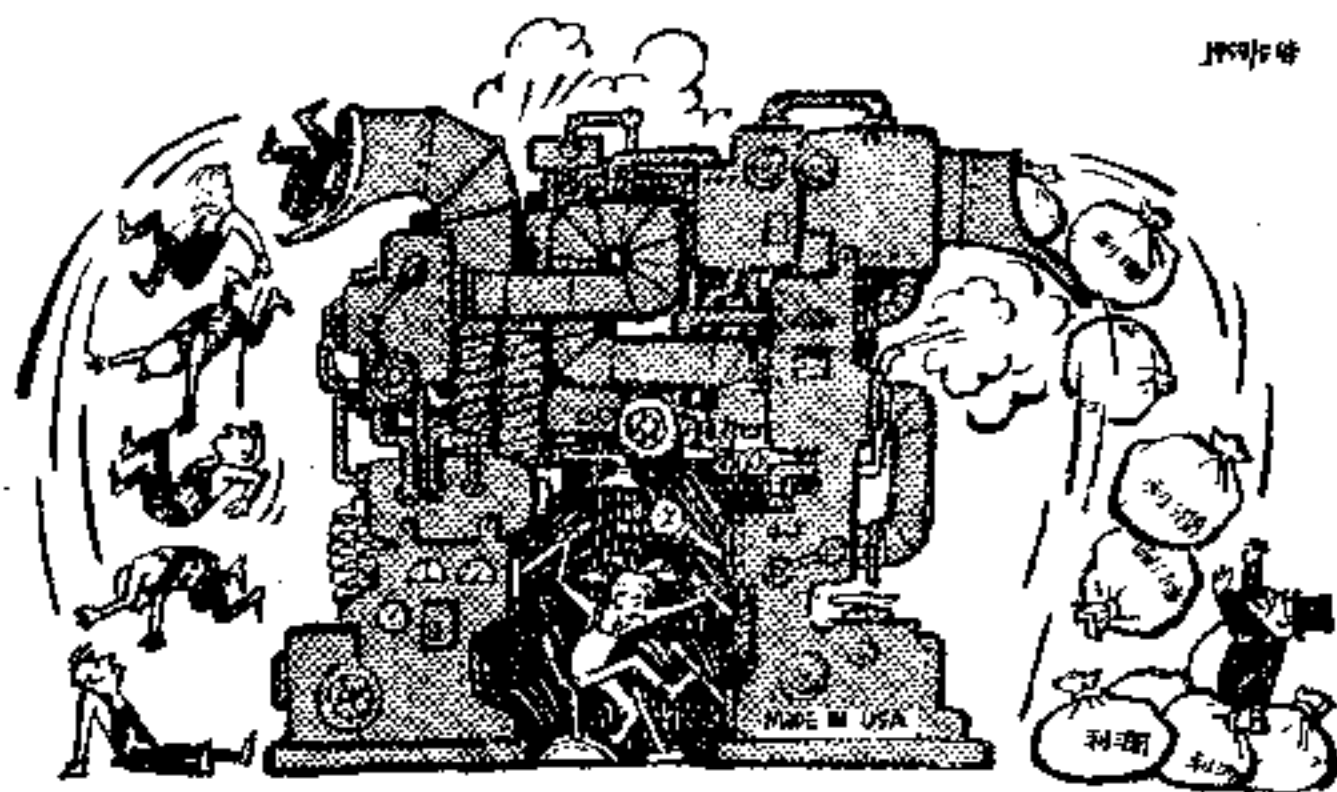


紙、刊物和广播，越来越多地談論着工厂实行自动化以后所引起的社会后果。三月三日英国“新聞紀事报”刊登一篇从华盛顿寄去的通訊中，冠以这样的标题：“再度出現繁荣(?)局面——但是机器窃走了工作”。文章承認：“这說明美国的一种残酷的新现象：在生产率上升的时候，失业人数也在上升。”又說資本家“并没有及雇工人，却是减少工人和大量进行超时工作，或是轉而实行自动化。”美国工业公司董事长斯奈德三月九日对記者說：“在現在登記失业的人中，大多数将依然失业，而且将失去受雇的可能。事实上他們的人数还要增加。技术的进步和企业单位的規模越来越大促使这种情况无法避免……。”去年美国“新共和”杂志在一篇文章中用确实的数字証明：假如在二十年的時間内，在美国全部工业系統中采用自动化的机构，平均每年只要增加百分之五，那么“每年就至少会有三百万工人失去工作”，結果将是“絕對失业和整个經濟的萧条”；即使按照目前采用自动化的速度，所造成的失业也会是“数字庞大、具有經常性而且从后果上說是絕對沒有前例的。”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在自动化企业中为每

一单位产品所偿付的工資比非自动化企业要少得多，这就使資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工人們受到进一步的剝削。正是在垄断資本家对利潤的貪得无厌的追求之下，在美国、英国、西德、法国等資本主义国家，近年来自动化趋势有了很快的发展。这在美国表現得特別明显。据不完全的統計，美国一九五四年購買自动化設備計三亿美元，一九五五年是五亿至六亿美元，一九五六年达十亿美元。而目前，据“劳联—产联”副主席路德說，“技术的加速度前进的运动正在繼續着”，加速实行自动化，“現在在整个美国的冶金工业、汽車工业、航空工业、紡織工业、电力工业、建筑工业——在工业的各个部門进行着。”

在自动化的工厂中，按电鈕的工作代替了大部分的体力劳动，人們通过仪表、灯泡之类来監視复杂的操縱盘。这样，照理可以大大減輕工人的劳动，但是在資本主



米 谷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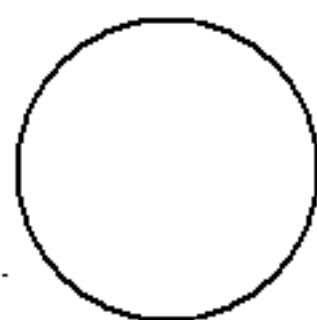


义制度下，情形恰恰相反。由于资本家追逐最高限度的利润，工人虽然是从事着操纵灯泡和管理各种仪表的工作，但是在机器速度加快的情况下，这种工作也会象最吃力的体力劳动一样使人精疲力竭。一九五六年，“纽约时报”曾用这样的话描写美国自动化车间的工作情况：“福特汽车工厂最后几根传送带上所装配的发动机，每十二秒钟就会掉落一个，在这样快的速度下，工人就只好用胳膊肘和肩膀交叉着动作，来完成这一严格规定的工作，这就活象在‘摩登时代’电影中卓别麟所演过的那个著名角色一样。”欧洲劳动生产率委员会公布法国雷诺汽车工厂自动化专家的报告说：“在自动化机床传送带上工作的技师，比一般正常的中等速度的工作要紧张得多。”美国耶鲁大学在一个关于自动化研究的报告中说：“新的机器消灭了令人痛苦的苦工，但是为了监视工作和指挥工作而需要的紧张使得工人‘神经不安、敏感’。……”资本家在工厂里推行的所谓“赶快制度”，使工人因过度紧张而产生极度的疲劳。例如法国的西姆卡汽车工厂，由于工人劳动过于紧张，以致要设立一种所谓“气体（氧气）室”，让那些被“赶快制度”弄得疲惫不堪的人恢复知觉。在法国的某些冶金企业中，为了使工人能够赶上压榨机的工作速度，竟将工人的双手捆在机器上。在这种情况下，工伤事故就大大增多。在美国，一九五六年死于工伤事故的工人有一万四千三百人，受伤的有四百三十五万人，其中有二百万人部

分或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在法国，一九五七年平均每小时发生工伤事故六百零七次，每天有八人因此死亡。意大利在一九五六年年的工伤事故中，死亡的达五千人，造成永久残废的达十五万九千人，受伤的有一百零一万人。由于工作过度紧张和疲劳，工人未老先衰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今年三月十六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失业男女来说，日历是一个敌人。尽管纽约和其他各州有种种成文规定，禁止由于年龄而加以歧视，但是那些超过三十五岁——甚至有許多在三十五岁以下——的人丝毫没有减少他们这样的看法：他们最大的障碍是他们变得成熟和学到本领的那些年头。”尽管技术已经变得熟练，资本家却不願雇用三十五岁上下的“老头”。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动化也是资本家反对工人运动的一种武器。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之一保罗·艾因济格就说过：“用机器代替人力有助于削弱工会讨价还价的力量”。

今天，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手段是更加巧妙了。四十多年前美国工程师弗列德里克·泰罗所发明的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和今天垄断资本家实行的那种“科学”制度相比，显然是望尘莫及了。这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艺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日益更加发展了那些使劳动人民陷于雇佣奴隶地位的



社会条件。”

自动化象一面鏡子，从这里人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資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自动化帶給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階級的后果，已經引起了資本主义国家工会組織和国际工会組織的广泛的注意。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世界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总決議中就說：“垄断組織，由于竞争与追求更大利潤的規律的驅使和促使資本主义矛盾尖銳化的工人斗争的威胁，正在工业、商业和机关内实行现代化和部分自动化（在某些国家里則实行农业机械化），其目的在于加重他們对工資劳动者的剝削，以便尽快从他們庞大

的投資中得到利益。这种情况对失业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工人在就业、工資、职业訓練、工业安全和健康等方面蒙受了严重的后果。工人階級必須靠統一行動来消除技术进步带来的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并制止过度的剝削，以便爭得較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階級面对着实行自动化的可怕后果，正在更加奋发起来，加强工人队伍的团結，进行反对压迫、反对垄断資本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



藏民的控訴（木刻）

李喚民作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1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 ★

目 录

短 论	一切经过试验..... 许辛学(1)
	必须优质高产..... 许辛学(4)
	认真地多读些书..... 施东向(6)
流动资金、信贷资金及其管理问题 ... 段 云(9)	
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 何 均(17)	
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	
价格决定的规律性..... 于光远(25)	
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 白寿彝(36)	
在“人民资本主义”幌子的背后..... 杨重光(45)	



一切經過試驗

許辛學

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找到了一條重要的工作方法，就是典型試驗、突破一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的方法。這個方法，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所說的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無數事實證明，採取了這個方法，工作就可以進行得比較順利，收效就比較大，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錯誤就可以減少。

先典型試驗、後逐步推廣的方法，多年來已經應用在我們的建設工作中。在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者在農業方面和其他方面，對於舊的管理制度的改革，新的生產方法的實施，以至新產品的製造和新工具的推廣，都是經過了認真試驗的；而且凡屬重要的事，在比較大的範圍內推廣之前，都要經過多次的試驗。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就是在工作方法方面重要的經驗總結。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廣大群眾和幹部在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號召下，在生產的實踐中發揚了偉大的革新精神，從而在各个方面都出現了许多新的創造，取得了許多新的經驗。多數地方和多

數單位在推廣這種新創造、新經驗的時候，也採取了經過試驗的方法。這樣，不僅使這種新創造、新經驗能夠適合於本地地方本單位的情況，而且使創造和經驗本身更加趨於完善。農業生產方面的八項增產措施，工業管理方面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等，都是群眾思想解放的產物，又是群眾實踐的產物。但是，我們也看到有些單位和有些地方採取了相反的方法，他們忽略了一切經過試驗這一方面，把一些並不成熟的經驗貿然實行，甚至貿然到處推廣。例如，有些企業在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時候，既不組織群眾進行認真的討論，也不選擇一兩個點進行試驗，而不加區別地破除一切規章制度，結果形成了無規矩可循、無法可守的狀況，造成生產秩序的混亂。又如，有一些新設計的產品，還沒有經過試制和試驗，就進行成批生產，以至在使用中發生很多毛病，有的甚至無法使用，徒然浪費人力、物力和財力。在技術革新運動中，對於設備和工具的改革，生產工藝和操作方法的改良，也發生了一些不經過試驗而草率從事的現象。當然，這類缺點，比起成功的方面，比起我們建設事業的偉大躍進，只是部分的和次要的，或者說只是十個指頭中一個指頭的問題。



但是，我們决不能因此而不正视这类缺点。因为克服了这类缺点，必然会加快我們建設事业的发展。

有些人在工作中不愿意采取先典型試驗、后逐步推广的方法，是有思想根源的。

有人認為，要一切經過試驗，就会妨碍人們解放思想，妨碍敢想敢說敢做。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不受各种錯誤的偏見、成見的束縛，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对于客观規律的正确認識。主观認識符合于客观規律了，人們的思想也就真正解放了。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是空想，而是不断的实践，并且从实践中总结新的經驗。这个道理，是馬克思主义認識論最根本的一条原理。毛澤东同志說：“只有人們的社会实践，才是人們对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論”）因此，决不能把解放思想同一切經過試驗对立起来。事实上，不尊重实践的人，不愿意認真試驗的人，他們的行动就难以符合客观規律，也就不会有思想的解放。迷信，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破除，但是不应当把尊重客观規律当作迷信；大胆設想、大胆創造，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但是不应当同毫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混为一談。为了在生产上創造新技术、新方法、新經驗，在实验之前作各种各样的假設，是需要的；在实验过程中失败，是常有的事，也是完全容許的。失败了，应当总结經驗，繼續試驗。但是不容許把那些沒有經過試驗証明其为确实可行的东西到处推广，因为那样做，必然会造

成很大的損失。从这个意义上說，所謂敢做，应当是进行認真的試驗，而不是乱碰乱撞。

一切經過試驗，当然不是說只試驗一次就行了。生产上比較简单的技术和方法，虽然只須經過少数几次的試驗就可以証实其为有效或者无效，但是为了使这种技术和方法得到提高，仍然需要不断地进行試驗。至于复杂的事物，属于科学規律的东西，就决不是少数几次的試驗所能解决问题的。世界上許多伟大的科学家，为了探求某一方面的真理，往往尽毕生的力量，进行几百次、几千次甚至更多的試驗。这种坚韧不拔、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态度。

有人認為，一切經過試驗的方法，是同大规模群众运动不相适应的；群众运动要求轟轟烈烈地前进，因而也就无法精雕細刻地进行試驗。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群众运动当然需要轟轟烈烈，但是要轟轟烈烈地推广的，应当是那些經過群众实践証明其为正确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缺乏根据的甚至錯誤的东西。要使群众运动轟轟烈烈地开展起来，必須首先精雕細刻地做好典型試驗。我們对于不熟悉的事物，只有在典型試驗中，才能具体地发现矛盾，了解矛盾的各个側面，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才能鉴别群众中的哪些意見是对的，哪些意見是不对的，从而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也才能修正原定方案中不适当的部分，使我們主观的設想进一步符合于客观实际。运动发展得越快，越需要



深入地細致地研究运动中發生的問題，也就越需要抓住典型，進行試驗。在這裡，無論是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或者是把領導者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拿到群眾中堅持下去，都不能離開典型試驗的方法。

還有一種意見也是不正確的，就是認為進行試驗，會延長時間，喪失機會。進行試驗，當然需要一定的時間。問題在於不花費這一段時間，以後就會花費更多的時間。一項措施，一個方法，一種經驗，在沒有經過試驗的狀況下，很難說它一定正確，如果把它普遍推廣，也很难保證不發生毛病。毛病發生了，往往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力量才能糾正。在一個單位試驗，即使失敗了，也只是一個單位花費時間，花費力量。如果把沒有成功的東西在十個單位推行，就要花十倍的時間，十倍的力量；推廣的單位愈多，花費的時間和力量就愈多。由此可見，不經過試驗，驟然看起來似乎快，實際上是慢；而經過試驗，使我們在試驗中取得經驗，然後去逐步推廣，驟然看起來似乎慢，實際上是快。如果把錯誤的東西推廣，那就不是快慢的問題，而是要造成很大損失的問題。至於說到要喪失機會，那麼，經過了試驗，喪失的將是多犯錯誤的機會，而不是什麼別的機會。我們有時會遇到這樣一種人，他們常常喜歡搶先，卻不願意下苦功夫，深入群眾和深入實際，把問題弄清楚，更不願意親自動手去做典型試驗。這樣的人，要避免錯誤，是很困難的。

我們所說的一切經過試驗，也包括運

用別的地方、別單位的經驗時要經過試驗在內。因為每個地方每個單位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況，別的地方、別單位經過了試驗證明其為正確的經驗，也不一定適合本地方本單位的情況。到底是否適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適合，那是要經過試驗才能解決的問題。當然，這決不是說可以不積極地運用別的地方、別單位的經驗，包括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經驗在內。如果借口特殊而閉門造車，當然也是不對的。

從這裡使我們聯想到，各地方各部門在召集關於推廣先進經驗的現場會議的時候，應當把各方面的條件老老實實地講清楚，而且，既要說明優點，也要說明缺點或者可能發生的問題，以便別的地方、別單位在運用現場會議上所推廣的經驗的時候，有一個全面的了解，而不致照搬硬套。在各種形式的宣傳工作中，對於新經驗、新技術、新方法的介紹，也必須這樣。應當看到，典型經驗，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都是受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所限制的，都不可能完美無缺。在宣傳中忽略某種典型經驗的某些局限性，主觀隨意地夸大典型經驗的普遍性，這是一種不嚴肅的態度，我們應當努力加以避免。

解放以後，我們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從中取得了不少的經驗。但是，比起我們正在進行的偉大建設事業來，我們的經驗還是十分不夠的，因此必須繼續努力學習。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是我們的工作方法，也是我們取得更多經驗的學習方法。



必須優質高產

許辛學

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最近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很多的部門、地方和企業單位，正在進行一系列有關爭取既高產又優質的工作。沒有疑問，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質量的重要性，這是大家知道的。用同等的人工和材料，製造同樣一種生活用品，或者同樣一種機器，如果質量好壞不同，它們的使用效果和使用年限是會很不一樣的。質量好的生活用品，可以使用好多年；而質量差的，使用很短的時間就壞了。同樣，質量好的機器，效率高，使用的年限長；質量不好的機器，則是相反。由此可見，高產必須優質。高產而產品的質量優良，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種最大的節約；高產而產品的質量低劣，對整個社會來說，則是一種浪費。所以，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就應當既要高產，又要優質。根據目前的情況來說，更需要強調優質的問題。發動群眾為提高產品質量而鬥爭，爭取優質高產雙躍進，是當前工業戰線上的一項重要任務。

國民經濟大躍進以來，我國工業產品的產量有了很大的增長，很多工業產品的質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應當看到，

不少工業產品的質量還是不很好的。黨所提出的“鋼要好鋼、鐵要好鐵”的要求，還沒有全部做到。今年已經生產的幾百萬噸生鐵中，還有一部分鐵的質量也不好。在機械工業部門中，由於一部分生鐵、鋼

材的質量不好，由於加工粗糙，有些產品的質量沒有達到標準。同人民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某些輕工業產品的質量，也不盡使人滿意。

不少工業產品的質量不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上級管理機關規定的任務過大過急，原材料供應上有某些困難，新工人增加過多，他們的技术不熟練，有些新建企業在技術的掌握上還沒有“過關”，有些新產品沒有經過試制就大量投入生產，這種原因，都會影響產品的質量。但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有些工業部門和企業的負責同志，強調了產量而放鬆了對於質量問題的注意，沒有經常教育職工關心產品質量，甚至把一些必要的技術管理制度以及有關原料、材料和產品的檢驗制度廢棄了，把一些必要的檢驗人員調走作其他工作去了，這樣，就不能不發生有些產品質量下降的現象。

因此，要提高工業產品的質量，就要全面地貫徹執行黨的多快好省的方針。多快好省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多是對數量的要求，快是對速度的要求，好是對質



量的要求，省是对成本的要求，这四个侧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我們所要求的高产是優質的高产；我們所要求的優質是高产的優質。高产而不優質，或者優質而不高产，对整个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設的健全发展，都是不利的。如果片面地強調質量，費很長的时间，費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星星点点的产品，当然不可能实现多快好省。反过来，如果不顧質量，片面地追求多快，追求节省，結果也必然会走到它的反面，变成少慢，造成浪费。例如，生产的生鉄，如果只有一半合乎質量要求，那么，要取得一定数量的合乎質量标准的生鉄，就要比在通常情况下多用一倍的矿石，一倍的焦煤，一倍的耐火材料，一倍的鉄合金，一倍的运输力量，一倍的人力，如此等等。这样做，結果就不是多了、快了、省了，而是少了、慢了、費了。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質量問題，具有决定的意义。“有了数量，就有質量”，这种說法是很不确切的。因为如果产品只有数量的增长，而質量达不到合理的要求，那么，这种产品即使数量增长很大，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产品的質量标准，应当根据需求和可能来提出，是經過努力可以达到的。如果脱离现实的可能性，而提出不合乎实际的質量标准，強人所难，显然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目前各个工业部門所定的質量标准，多数是按照我国现时的实际情况規定的，因而是比較适当的。这样的标准，是应当而且可能达到的。我們应当按照这

种标准来考核工作的好坏，以保証我們每一件出厂的产品真正符合社会的需要。

为了保証产品質量的提高，我們在制訂生产跃进計劃的时候，一定要有多快好省的全面观点，既要注意到高产，又要注意到優質。也就是說，不但要訂出高产的指标，而且要訂出優質的指标。在檢查計劃执行情况的时候，也是这样，不但要檢查产值、产量計劃执行的情况，而且要檢查質量計劃完成的情况。凡是質量方面完不成計劃的，都不能算全面地完成計劃。在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时候，不論是改进产品設計，节约或者代用原料、材料，也不不論是改进工艺过程 and 操作方法，都要看是否能够取得優質高产的經濟效果，决不能采取片面的措施，降低产品的質量。在生产新的产品和采用新的技术的时候，一定要反复試驗。在試驗成功、質量确实有保証而又經濟合理的条件下，新产品才能成批生产，新技术才能广泛采用。在完成生产計劃的过程中，当数量和質量发生了矛盾的时候，决不能牺牲質量，片面地追求数量。所有的工业企业，凡是原来产品質量好而降低了的，应当努力在最短期間內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并且繼續提高；質量一直不好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地逐步地加以改进。

当然，提高产品的質量，不仅是一个認識的問題。为了提高产品質量，要深入細致地进行一系列的技术工作和組織工作。上级管理机关要給各个企业正确地分配任务，帮助企业解决原料、材料供应的



困难。企业本身要加强对新工人的技术训练和工艺纪律教育，做好新产品的试制工作和新技术的试验工作，并且加强技术管理，贯彻执行工艺规程和操作规程，建立和健全保证产品质量的各种制度，特别是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检验制度和质量责任制，降低废品率、次品率。对于那些阻碍生产发展和群众积极性发挥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当然要进行改革；但是，对于那些能够正确地反映生产过程的客观要求和有利于发挥群众积极性的规章制度，特别是那些能够保证质量和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各种技术管理制度，则必须认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并且严格遵守，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地达到优质高产的目的。

提高产品质量，不只是少数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事情，而且是同每个工人都有密切关系的事情。要发动群众对于产品质量进行检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表扬真正好的成就，交流成功的具体经验，揭露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分析生产过程中的矛盾，通过抽查产品、举办展览会、访问用户等办法，找出提高产品质量的关键问题，拟定提高质量的具体措施。所有的技术管理制度和质量检验制度，都要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讨论，使广大群众自觉地遵守这些制度。只要我们的领导人员和全体职工都提高对优质高产的认识，人人都对产品的质量负起责任来，那么，就一定能够做到既高产、又优质，做到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的工业生产。

認真地多讀些書

——施东向——

我国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工作，在这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书籍出版的品种、数量之多，已经远远超过了旧中国时代。爱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已经不像在旧社会那样，只是一小部分人享有的特权。广大劳动人民在学习了初步的文化之后，开始体会到了读书的益处。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也越来越感到有多读些书的必要。在文化学术方面做工作的人，不用说，更加需要认真地多读些书。

我们之所以要读书，是因为书籍能够传

播先进思想，能够传播科学技术各方面的知识；通过读书，可以使我们扩大眼界，扩大知识领域，并且提高思想能力。

思想和知识的来源是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一代代的人通过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阶级斗争）的实践，不断地使科学知识向前发展。后来的人因为可以接受前人已经取得的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依靠新的实践而求得新的知识，所以后来的人就能够比前人更加聪敏，具有比前人更进步更丰富的科学知识。如果只是接受前人



的知識而不能在实践中繼續加以发展，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不去接受前人已經取得的知識和已經达到的科学成就，那么人类知識的发展也同样会停滯下来，当然也是不对的。要接受前人已經取得的知識和已經达到的科学成就，要使一个人的知識不局限于个人經驗所及的小范围内，就应当多讀些書。

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理論家，没有一个不是孜孜不倦的苦学者。馬克思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是最有天才的人，但他也是最勤奋的讀書的人。他不仅攻讀哲学、經济学、历史学、法学这些方面的書，而且在語言学、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也是博覽群書，并且在很多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詣。有一次当他生病不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还閱讀了好些生物学的書。当然，馬克思并不是死守着書本知識的人。如同毛澤东同志所說：“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論創造。”馬克思主义的創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馬克思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論的創造者，是与他从刻苦讀書中获得的渊博的学識分不开的。有志于做馬克思的一个小学生的人，应当在学习方面，坚持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原则，努力养成刻苦讀書的精神。

我們有些同志，并不真正了解認真讀書的意义。有人似乎以为，認真讀書就是迷信書本，就会脱离实际，讀書多了就会

变成教条主义。这种錯誤想法，無論对于学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者对于实际工作者，以至对于青年学生，都是非常有害的。

固然有些人，在讀了一些書以后，变成了書呆子，犯教条主义的錯誤。可是他們的犯錯誤，原因并不在于他們讀書太多，而在于他們的讀書方法是錯誤的，他們对待書本知識的态度是錯誤的。他們把書本知識看成万应灵藥，企图用它来“以不变应万变”，脱离了实际。用这种态度去讀書，多么好的書，多么有益的書本知識，在他們手里，也会成为有害的东西。但是，如果用相反的态度和方法去讀書，用理論联系实际的方法去讀書，用一种分析的态度去对待書本知識，那么，应当說，書越讀得多，人会变得越聰明，而絕不会越讀越呆的。高尔基曾經做过这样生动的描写：“几乎每一本書都似乎在我面前打开了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口”。“書越讀得多，書籍就越使我和世界接近”。凡是善于讀書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教条主义不是讀書的必然結果，更不是讀書多的必然結果。事实上，我們这里有些教条主义者，并不是讀書很多，而是讀書很少的人。知識偏狹，往往是某些犯教条主义錯誤的人的通病。这种知識上的偏狹，也助长了他們思想的片面性、主观性。当然，讀了很多的書，書本知識比較丰富的教条主义者也是有的。

我們党一向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



但是，我們黨却從沒有也永遠不會因此而不重視書本知識。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向來是一方面指出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書本知識的錯誤，一方面又一貫強調要用正確的方法學習書本知識。不僅學術工作者，而且一切實際工作者，都應該認真地多讀一些書，以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和工作能力，使自己善於分析和總結經驗，以便把實際經驗提高到理論，減少行動中的盲目性。

“迷信書本”和“不要書本”，是兩種不同的片面性。但犯這兩種片面性毛病的人有個共同之處，他們都不真正了解書本知識的性質和作用。“迷信書本”的人，似乎把書本知識捧得很高，但實際上他們不懂得書本知識歸根結底來自直接經驗，不懂得它是要不斷補充和發展的，尤其不懂得書本知識是服務於解決新的任務的工具，因此他們做了書本的奴隸。“不要書本”的人，則把書本知識看成是教條主義的淵藪，為了避免陷到那裏面去，卻因噎廢食，對書本知識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事實上，如果有人想用“不要書本”的辦法來反對“迷信書本”，用不讀書或少讀書的辦法來反對教條主義，那是不能戰勝教條主義的。只要讀書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讀書的方法是理論聯繫實際的方法，讀書的人又積極地關心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問題，那麼，我們就能夠成為書本的主人，而不是書本的奴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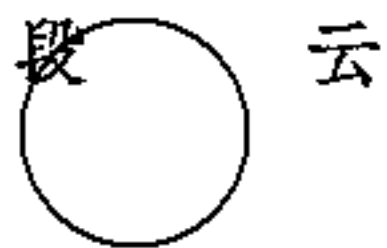
讀書，需要有時間，需要坐下來。有

人說，我雖然想讀書，但實際工作緊迫，沒有時間。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的確有這種苦惱。但是如果真正認識了讀書的重要性，能夠合理地安排工作和生活，總還是可以找到一點時間來讀書的。在舊社會里，許多先進的人們，往往苦於沒有讀書的條件，甚至得不到要讀的書。但他們還是千方百計，克服困難，非常認真地讀了很多書。我們今天的讀書條件，無論如何，比他們好得多，我們應當珍惜我們的時間。這一點，對於許多青年同志恐怕是更應當提出的。人們在青年時代多讀一些好書，只要方向正確，就能夠有長遠的好處。

讀書這件事，歷史上從來沒有象我們現在這樣被重視過，書本知識從來也不可能象我們現在這樣發揮它的力量。只有在我們所處的這樣的偉大時代里，書本知識才真正從少數人的手里奪過來，變成億萬人民尋求真理，尋求改造客觀世界的方法的銳利武器。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未來的共產主義建設，都要求人們有高度的文化科學知識。正因為這樣，共產主義者是歷史上最積極的讀書的倡導者和親身實踐者。這是歷史上任何“賢明的”君王和任何統治階級的文人學者所根本無法比擬的。列寧在“青年團底任務”那篇著名報告里說過：“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時，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應當努力成為這樣的共產主義者。



流动資金、信貸資金及其管理問題



編者按：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的管理，是一个重要問題。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里，資金的分配和使用一定要按計劃办事，流动資金不能用于基本建設，信貸資金不能用于財政开支，不能隨意賒銷商品和預付貨款。如果我們在工作中违背人民政府这种規定，就会搞乱資金的分配和使用的計劃。这篇文章企图說明这方面的道理，我們发表出来，提供給各部門、各企业研究和討論。

在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設当中，如何加强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的管理，如何合理地使用国家資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問題。流动資金是工商企业从事生产周轉和商品流轉的資金，信貸資金是銀行用以发放各种貸款的資金。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在国家資金分配当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国家資金运用上担当着一个重要方面。这部分資金管理得当，使用合理，对于扩大生产，扩大流通，加速国家建設，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日常工作和經濟生活当中，我們大家常常同流动資金、信貸資金直接間接发生着一定的关系，但是对于流动資金是什么，信貸資金是什么，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有什么共同特点，国家对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的管理原則和界限如何等問題，却

有时并不那么注意。因此，有些同志往往容易发生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流动資金和固定資金、信貸資金和財政資金要分得那样清楚？为什么流动資金不能用来进行基本建設，信貸資金不能用来作財政开支？为什么不能随意进行商品賒銷和預付貨款？等等。由于对这些問題認識不够一致，有些地方在实际工作中，也确实发生过若干混乱現象。看来，就这类問題作一些研究和討論，对于进一步弄清問題，統一認識，加强国家資金管理是有好处的。

（一）什么是流动資金？

它同固定資金有什么不同？

国家为了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每年拨出大量的基本建設投資，修建厂房，安装机器和設備。但是仅仅有了这些还不够，



为了进行生产，企业还需要多种多样的物资，需要原料、材料、燃料和包装材料等等；为了不間断地制造产品并且把产品銷售出去，企业的仓库中还要存有一定数量的原料材料儲备，各个車間要存有一定数量的在制品，推銷部門要存有一定数量沒有发送出去的制成品。厂房、机器、設備一般屬於劳动手段，它具有可以在較长时期內发生作用的性質，叫作固定資金。原料、材料和燃料等一般屬於劳动对象，工人用劳动手段，在劳动对象上加工，制造出产品来，产品銷售出去，再購買原料材料，再制造产品。这种用于購買劳动对象的資金，以及支付职工工資的資金，一般只在一个生产周期內发生作用，具有流动循环的性質，叫作流动資金。馬克思在叙述一般生产过程的时候曾經写道：“不問劳动过程的社会条件，每一个劳动过程的生产資料，总是可以分为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資本論”第2卷，第181頁）。沒有必要的固定資金，不能进行生产；沒有必要的流动資金，也不能进行生产。固定資金和流动資金都是保證企业进行生产必不可少的資金，它們的不同之点是，在生产过程中所担負的职能和任务不同，价值轉移的方式不同。固定資金可以較长期地在若干生产周期发挥作用，它們在生产过程中逐渐磨損，它們的价值随着磨損的程度，一部分一部分地用折旧的方式轉入制成品之中，直到損坏报废，更新設備为止。流动資金只参加一个生产周期，有

的加入制成品的成分之中（如原料、材料、半制品），有的則在生产过程中消耗了（如燃料），它們的价值全部轉入一个生产周期的产品之中。下一个生产周期又需要另一批劳动对象。劳动对象变成制成品，制成品銷售出去变成貨币，貨币再变成劳动对象，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样不間断地周轉的过程，也就是企业进行生产再生产的过程。商业的流动資金則是用貨币購買商品，商品卖出去，再換回貨币，这样进行着周轉流通，为生产和人民消费服务。

我們所說的流动資金，既包括生产領域的流动資金，也包括流通領域的流动資金；既包括工业流动資金，也包括商业流动資金。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資本周轉的时候，曾經反对把生产領域中的流动資本同流通領域中的流动資本（馬克思把这一部分叫作流通資本），包括在一个范畴以內，反对把生产領域中用于支付工資的部分（这一部分叫可变資本）同用于購買原料材料設備的部分（这一部分叫不变資本），不从本質上加以区分。因为那样，就会模糊只有生产劳动才能創造价值这样一个根本事实，掩盖資本主义生产和剝削过程的全部秘密。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却是另外一回事。社会主义經濟是建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权和生产資料掌握在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手中。在这里，劳动力不是商品，沒有剝削，也沒有資本这样的



經濟范畴。在这里，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社会的劳动是統一的，两个部分同样是必要的。因此我們不用“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概念，而用“固定資金”和“流动資金”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术语上的区别。在我們这里，虽然也存在着彼此不同的生产領域和流通領域，两个領域中的流动資金也有所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和流通都是按計劃办事，两个領域中的流动資金都反映着商品物資的实际运动，都是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服务的，把它們統一于流动資金这样一个概念之中，是有根据的。而且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工业部門的一部分供銷业务是由商业部門办理的。商业部門要对它們負責供应原料，包銷成品，因此商业部門实际上担負着一部分本来要由工业部門担負的儲备任务（商业部門还担負着一部分国家物資儲备的任务），把两方面的流动資金統一考虑，也有利于国家全面地掌握工业流动資金和商业流动資金的情况，有利于掌握整个流动資金的分配和流通过程。

（二）什么是信貸資金？

它同財政資金有什么不同？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設，滿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質文化需要，为了支付行政管理費用和国防費用，国家每年都要通过稅收和利潤的形式，集中一定放量的貨幣資金，然后分配給国家机关和国民經济各部門。这就是国家的財政收支，这些資金就

是財政資金。

国家机关和国民經济各部門在使用資金当中，总会有一部分資金暂时閑置不用，比如生产企业从銷售产品到購買原料发放工資，从提取大修理基金到进行大修理，总会有一部分資金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使用，比如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从收获之后集中出賣产品到分批使用資金，职工群众从按期領到工資到陸續花费这些工資，也有一段时间。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企业在生产和商品流轉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临时性的資金需要。比如工商部門在生产和市場的旺季，必須临时补充資金；收購部門在秋收以后集中收購农产品的季节，也需要补充大量的資金。这就是：一方面某些单位有暂时閑置的資金（这些資金，財政上不便收回）；另一方面某些单位又有临时的資金需要（这些需要，如果也由財政拨款就会造成資金的浪費）。这个单位閑置，那个单位需要，于是就产生了通过銀行信用以調剂資金的必要性。用存款貸款的方式，把各方面暂时閑置的資金吸收和运用起来，适应国民經济各部門的临时需要，这就是銀行信貸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些用来发放貸款的資金就是信貸資金。

国家財政和銀行信貸，都是动員和分配資金的工具，都是保證国民經济正常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只是它們取得資金和分配資金的形势不同，性質和作用不同。財政通过收支的形势取得和分配資金，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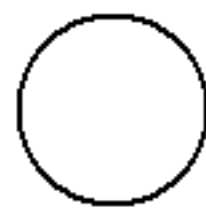
貸通过存款貸款的形式暂时地取得和分配資金。財政收支是无償的，收进来和支出去都不再返還（只有少数公債和国外借款是例外）；銀行存貸則屬於債權債務关系，存款要提取，貸款要归还，除了財政部門和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存款以外，存款和貸款还要有一定的利息。

我們发放的貸款，既包括对全民所有制經濟的貸款，也包括对集体所有制經濟的貸款（还有少数对个人的貸款）；既包括对工业和农业的貸款，也包括对商业的貸款。在我們这里，只有国家銀行即中国人民銀行才能办理信貸业务，同时，中国人民銀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机构，又是国家的貨幣发行中心，是整个国民經济活动的結算中心，是全国現金的出納中心。列宁在分析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曾說，随着銀行事业的发展 and 銀行組織的集中，銀行逐步变成万能的垄断者，成为資本主义經濟生活的中心和整个資本主义流轉过程的神經中枢（參看“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2頁；第25卷，第320—321頁）。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里，从形式上看，銀行业务同資本主义銀行业务是大体相同的；但是从內容和本質上看却根本不同。在我們这里，不存在借貸資本，信貸不是剝削的工具，不是为“百万富翁”服务的。在我們这里，資金的使用，不是依靠自发作用盲目地进行調节，而是根据国民經济計划的要求，有組織有計划地使用。在我們这里，銀行同其他部門的关系是分工协作的关系，銀行信貸是国营經濟和集体經濟、城市和乡村、生产和流通之間，通过

信用形式进行經濟联系的手段，是促进生产发展和流通扩大的一种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銀行已經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成为国民經济各部門的“公共簿記”。正如列宁所說，“大銀行是我們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我們可以把它当作現成的机关从資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們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把資本主义丑化这个絕妙的机关的东西斬断”（“列宁全集”第26卷，第87頁）。在社会主义国家，銀行失去了自己旧的职能，取得新的职能，保持旧的形式，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

（三）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的关系及其共同特点

流动資金是同固定資金相对立的，信貸資金是同財政資金相对立的，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不屬於同一个經濟范畴，但是它們却有着直接的联系，有着共同的特点。在我們这里，一方面，企业所需要的流动資金一部分或大部分由銀行貸款解决，一部分由財政直接拨款解决，或者拨交銀行再由銀行以信貸方式統一貸放。另一方面，銀行所有信貸資金，除了按照規定允許发放的农业基本建設貸款和短期小型工业基本建設貸款以外（这两部分貸款在整个貸款总額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主要是发放工业、商业流动資金和农业流动資金的貸款。这就是說，企业所需要的流动資金主要是由銀行貸款解决；而銀行所有的信貸資金又主要是用于流动資金的需要。这就是說，銀行所貸出的資金，从銀行方面看是信貸



資金，从用款单位看是流动資金，一套資金，两重身份。我們平常所說的加强信貸資金管理和加强流动資金管理，是密切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前一方面所講的是应不应该发放和如何合理发放的問題，后一方面所講的是应不应该使用和如何合理使用的問題。我們在这里把信貸資金和流动資金相提并論，也是这个道理。

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有着如下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流动資金象人身上的血液一样，不断地在流动、周轉、循环，从流通范围到生产范围，再从生产范围到流通范围，从貨币到商品，再从商品到貨币，反映着企业的生产、銷售、儲备等經濟活动的各个方面。信貸資金則是在各个地区之間，在国民經济各部門各企业之間，貸出去，收回来，再貸出去，从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从这个部門到那个部門，从这个企业到那个企业，按照商品流通的需要，不断地流通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商品的运动是沒有地域和部門的界限的，貨币的运动也沒有地域和部門的界限。有人說貨币是有腿的东西，它可以到处走来走去。流动性，这是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第一个共同的特点。

第二，生产和流通除了少数情况以外，一般带有程度不同的季节性，流动資金的需要也一般带有季节性，有时需要多，有时需要少。各个部門需用資金的季节是不尽相同的，有时这个部門需要多，那个部門需要少，这个部門有余，那个部門不足。比如农业生产春季需要資金多，秋季需要

資金少；农产品收購秋季需要資金多，春季需要資金少；其他許多部門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同农业有直接关系的部門更其如此。正是由于流动資金这种季节性的需要，表現在信貸資金上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季节性。一般是：上半年收回多，貸出少；下半年收回少，貸出多。也正是由于各部門需要資金的季节不同，往往是这个部門归还貸款的时候，正是那个部門需要貸款的时候，因此才有必要和可能通过信貸方式，用同一的資金为許多不同部門服务。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的季节性运动，就象浪潮一样，此起彼落，时起时落。季节性，这是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第二个共同的特点。

第三，使用信貸資金，必須按期归还，这是在前面已經說过了的。信貸資金实行有借有还按期归还的原则，不仅可以保証各方面存款的随时提取，保証信貸資金的周轉，保証貨币的正常流通；而且可以通过这种形式，监督企业的资金使用，促使企业改进工作，改善經營管理。信貸資金实行計算利息的办法，可以促使企业节约地使用資金，不是十分必要不向銀行借款，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經濟核算。不仅信貸資金是这样，在一定的意义上說，流动資金也具有返还的性質。因为企业使用銀行貸款是需要归还的；企业經常占用的一部分定額流动資金即使不能归还，也必須保証它的完整无缺，必須保証錢出去，貸回来，貸出去，錢回来，維持經常的周轉，不这样就不能正常生产和正常經營。返还性，这是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第三个共同的特点。



(四) 国家管理資金 的原則和界限

根据流动資金和固定資金的区别，信
 貸資金和財政資金的区别，以及流动資金
 和信貸資金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根据社会
 主义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和節約
 使用資金的要求，国家管理資金的原則和
 管理界限，应当是：全面安排，分別管理，
 統一調度。分开來說，第一，国家手中可以
 使用的建設資金，一般总是这样分配的：一
 部分用于基本建設，增加固定資產；一部
 分用于流动資金，补充生产周轉和商品流
 轉扩大的需要。資金是物資的貨幣反映。
 拿多少資金和物資用于基本建設，拿多少
 資金和物資用于生产周轉和商品流轉，这
 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建設速度的問題，是一
 个关系到生产和建設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
 問題，必須由国家通盤考虑，全面安排。
 这样才有利于保証基本建設投資和基本建
 設材料、生产規模和資金供应的平衡。第
 二，国家根据資金性質和用途的不同，把
 流动資金同固定資金分开，把信貸資金同
 財政資金分开，分別管理，限定用途，不
 許挪用。这是一种区别不同性質，經過不
 同渠道，分別管理的办法。这种办法有利
 于合理地使用資金，有利于保証固定資金
 和流动資金之間恰当的比例关系不被破
 坏。第三，国家用于生产周轉和商品流轉
 的資金，需要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門、不
 同企业和不同季节之間周轉流通，需要按
 照商品貨幣之間的供求关系，进行全国性
 的綜合平衡。根据这个特点，国家对信貸

資金，必須实行集中管理、統一調劑的办
 法，使国家金融机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統
 一調劑和調度資金。在这方面，应当更加
 貫徹全国一盘棋的原則，在这方面集中管
 理的程度应当比其他方面为高。

能不能随意动用流动資金进行基本建
 設呢？不能。国家规定基本建設和流动資
 金計劃，是根据資金和物資的条件，照顧
 了基本建設的需要和生产流通的需要的。
 計劃既經确定，如果把流动資金用来进行
 基本建設，增加固定資產，就等于把某些
 应当流通循环的部分，凝結和固定起来，
 就有可能在若干部位发生停滯，造成生产
 和流通的中断。計劃既經确定，如果把流
 动資金用来进行基本建設，也意味着必須
 在計劃以外占用建設物資，而建設物資是
 有限度的。这样作，就一个地区和一个单
 位來說，也許可以多拿到一点物資，多作一点
 基本建設；但其他地区和其他单位的基本
 建設却可能要受到影响，甚至还要影响国
 家的重点建設；这样作，从全局看并不能
 增加多少基本建設，而只是打破国家的全
 盤計劃，增大市場物資紧张的压力。如果
 流动資金真的多了，是不是可以調节呢？
 流动資金增加过多，一般說，就意味着国
 家工商企业的倉庫中积存着較多的物資可
 以动用。在这种情况下，多安排一些建
 設，主动加以調节是必要的。否則只有讓
 物資繼續积压，繼續占用資金，加速資金
 周轉的要求就无法实现。但是，調节必須
 由国家通盤考虑，必須按照統一的計劃去
 进行，而不能离开計劃随意进行。一个地
 方一个部門一个单位，自己感到資金有余，



就用来进行基本建設，其他地方其他部門其他单位需要資金的时候怎样办呢？自己在这个季节感到資金有余，到了資金需要較多的季节怎样办呢？大家錢多了不还给銀行，銀行不能統一調度，用什么办法来調劑資金的需要呢？人們都願意多搞一些基本建設，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們的建設一定要多快好省。各地方各部門各单位应当尽可能地改善經營管理，加速資金周轉，節約使用原料材料，節約使用資金，使国家能够用同样的資金和物資，生产更多的东西，增加更多的建設項目。節約使用資金就是对国家建設的支持。

能不能把銀行短期周轉的信貸資金用来作財政开支或者作长期的基本建設貸款呢？不能。銀行信貸資金的来源除了一部分財政拨款以外，主要是各部門各单位的存款和城乡人民的儲蓄。这些存款和儲蓄迟早是要提取的。由于人們一方面陸續存入，一方面陸續提取，存入和提取在時間上有一个距离，而且存入常常大于提取，这就使銀行有可能保持一个相当的差額，用来发放短期周轉性的貸款。如果銀行依靠这些資金来源发放长期基本建設貸款，或者把銀行貸款用来作了財政开支，使貸款不能及时收回或者根本不能收回，那么，結果必然会影响存款的提取，影响其他方面貸款的发放，甚至使国家被迫不适当地增加貨幣发行，影响貨幣的正常流通。国家规定，銀行发放貸款，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原則上要有物資保證。发放流动資金貸款，是讓企业用来購进原料、材料和商品的，購进的时候貸款，銷售的时候还款，

貸款和还款同物資的运动相适应，这种貸款可以說是有物資保證的貸款。发放长期基本建設貸款虽然可以增加固定資產，但是它不象流动資金貸款那样，能够立即得到可以用来周轉的物資，能够在一定时期內及时出卖物資，归还貸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說，这是一种沒有周轉物資作保證的貸款。銀行发放这样的貸款必須有长期的專門的資金来源，必須有严格的控制。那么，在整个信貸資金确实多了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主动地加以調节呢？应当說是可以的。信貸資金多了，一般說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倉庫中积存了較多的物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减少一些对銀行的信貸資金拨款，或者从銀行动用一点財政的上年結余存款，用来多安排一些建設支出。确实能安排一些建設支出不安排，就不利于加速国家建設事业的发展。但这也是需要由国家統籌考虑全面安排的問題。不能看到銀行的信貸資金一时比較寬裕了，就要拿来发放长期基本建設貸款或者用貸款作其他开支。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預算和銀行信貸是要統一平衡的。信貸資金的来源里面，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財政拨款和財政結余存款。銀行本身多吸收一点存款，財政就可以减少一点对銀行的拨款或者提取一点結余存款，增加一点建設方面的开支。所以一个地方一个部門一个单位經常把不用的資金存入銀行，人民群眾随时把不用的錢向銀行儲蓄，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建設的一种支持。可能有人这样想：銀行是有錢的地方，为什么有錢不讓人家多用一些呢？为什么不可以在信貸資金寬裕



的时候，多发放一点基本建設貸款，到了信貸資金需要較多的时候，另外多发些票子来使用呢？市場貨幣流通量可以随着生产和商品流轉的扩大而有适当的增加，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为了財政开支和基本建設投資的需要，而增加貨幣发行，一般說是国家政策不能允許的。因为发行貨幣并不等于增加物資，增加了貨幣不增加物資，結果就会引来市場物价的波动，或者使人們拿到貨幣，买不到物資。

能不能随意动用流动資金，进行商品賒銷和預付貸款呢？不能。商品賒銷是讓別人先拿貨，后付錢。預付貸款是讓別人先拿錢，后交貨。商品賒銷和預付貸款都屬於商业拖欠的性質，錢貨收回需要經過一定的時間，有的需要很長的時間。結果，企业不能按期归还銀行貸款，有的甚至进而要求銀行另外增加貸款。为了帮助人民公社发展生产，一些大型的农具、农业机器和其他某些重要生产資料，公社迫切需要而无力立即付款的，不是不可以考虑采取賒銷办法，讓他們迟一个时期付款；为了帮助人民公社解决生产資金的不足，或者为了指导公社发展国家所需要的某些农作物的生产，通过合同的形式，有計劃地預付一部分农产品預購定金，在收获以后收回农产品，这种办法也是允許的。但是，这种賒銷和預付，也必須由国家根据需求和可能，有計劃地加以安排。各地方各部門在国家計劃以外，認為有必要进行某些商品賒銷和預付貸款的时候，必須严格地按照規定，經過批准，并且严格加以控制。不能看到我这里什么东西多了，就去賒銷；

需要什么东西了，就去預付貸款。也不能一看到对方需要，就办理賒銷或者預付貸款。随意进行的商品賒銷和預付貸款，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国家資金和物資的分配，不过这种分配是离开国家計劃、离开資金監督的盲目的分配而已。列宁認為銀行是全国范围的會計机关，是全国范围内产品生产和分配的統計机关，他在十月革命前夕論述銀行国有問題的时候曾經說过：“只有实行銀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往来流动的去向，以及这种流动是怎样发生和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才能真正地而不是在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經濟生活的監督，做好对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監督，才能做到‘調节經濟生活’”（“列宁全集”第25卷，第321頁）。当然，調节經濟生活主要是依靠党的領導，依靠国家計劃。但是如果各个銷售机构，各个收購机构，都可以在国家計劃以外随意賒銷商品和預付貸款，随意盲目的分配資金，使商品流通同貨幣流通脫节，那么，国家資金和物資的分配如何有計劃地控制呢？国家根据什么来有計劃有組織地調节經濟生活呢？道理是非常明白的。

关于加强流动資金和信貸資金的管埋，这是一个很大的題目，需要講的方面很多。比如，如何加强計劃管理和定額管理，如何加强現金管理和信貸監督，如何改善經營管理、加速資金周轉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所以着重講了上面几条管埋資金的界限，是因为从目前情况看，这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着重解决了这些問題，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其他方面的問題。



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

何 均

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有一个时期，曾经在很多同志中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有人认为，按劳分配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这个制度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很少区别，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很快地把它加以改变。另外，有人则指出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大不相同，他们承认按劳分配有它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决不能离开生产条件来谈分配，分配的形式必然要由生产的条件所决定。根据上述的原理，他们认为要改变分配中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要实现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就首先要来发展生产。不能同意前面的一种意见，因为要是按照这样的意见来做工作，那么很快就会带来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可是，后一种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种社会制度，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公平合理的”；同时，按劳分配这个制度，现时在我国能不能就算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进一步地加以考虑。问题说到这里，人们会很快地指出，按劳分配这个制度不是一个完全公平合理的制度，马克思

早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已经加以论证，对于这一点不应该再有所怀疑。是的，“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对我们当前所要讨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不过，问题还在于怎样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发挥的思想。

这样，放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的问题就有这样一些：根据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应该怎样来看待一种社会制度；按劳分配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它同过去的分配制度有哪些不同；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是不是公平合理；最后，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分配制度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下面，让我们先从“哥达纲领批判”谈起。

一

对于“哥达纲领批判”，曾经有人有过这样一种了解，以为马克思同拉萨尔主义者之间所争论的只在于按劳分配这个制度是公平还是不公平，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争论所以发生，似乎仅仅由于拉萨尔方面把按劳分配说得太好了些，而马克思则相反，指出了它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方面。实际



上，問題并不这样簡單。为了正确地了解馬克思的思想，我們應該仔細地來研究一下，拉薩爾方面的錯誤，究竟在哪里。

“哥達綱領”里这样說：“劳动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劳动所得应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屬於社会一切成員”。“哥達綱領”里还說：“劳动的解放，……要求在公平分配劳动所得下集体調节全部劳动。”（以上均見“哥達綱領批判”）經過馬克思的分析，我們看到，在这些說法里包含着多少混乱和謬誤。但是，从根本上来說，問題是在于，拉薩爾根据一种抽象的法权观念，來說明未来的社会制度。恩格斯还告訴我們，拉薩爾“想証明：‘法权是一个从自身以內（这就是說不是从經濟前提中）发展出来的合理的机体’”（“論住宅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99頁）。因此，拉薩爾不是依据經濟关系來認識法权观念；而是相反，依据法权观念來判断社会制度，看它們是應該还是不应该存在。这样，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所指出的，他們要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因为，按照他們的看法，这是符合于“公平分配”和“平等权利”的原則的。馬克思問道：“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資產者不是断定說，現代的分配是‘公平的’嗎？并且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現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难道經濟关系是由法权概念來調节，而不是相反，不是由經濟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嗎？”（“哥達綱領批判”）

不仅拉薩爾，从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

者蒲魯东那里，我們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东西。蒲魯东是反对階級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他幻想通过交换制度的改变，来实现一种“永恒正义”。为此，他設想了所謂劳动券和交换銀行的办法，企图通过这些來使生产者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价值。恩格斯写道：“他（引者注：指蒲魯东）只是渴望着‘永恒正义’，再沒有别的什么了。每个人应当在交换中为自己的生产品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收入，得到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論住宅問題”，同上書，第544頁）恩格斯还指出：“蒲魯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正义’的标准來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認这些原理是以它們之是否符合于他所說的‘正义’为取舍的。”（“論住宅問題”，同上書，第597頁）

蒲魯东和拉薩爾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們都把生产者應該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成果，作为理想。但不同的是，拉薩爾是在分配上面打主意，蒲魯东則是在交换上兜圈子；另外，拉薩爾談的是法权标准，蒲魯东追求的是“永恒正义”。

其实也不仅蒲魯东，更早些时候，这类空想（就是：設計一种方案，使生产者得到自己全部劳动成果），就已經在不少国家流传。恩格斯告訴我們：这种空想，在一八三一年就为約翰格雷所系統地發揮过，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英国实际地被試驗过，一八四二年在德国为罗倍兒都斯所宣布，一八四六年在法国又被蒲魯东宣布为最新的真理（見“哲学底貧困”序言）。應該指出，在較早的时候，这种空想是有它的进步意义的。因为，尽管它是不切实际



的和不能实现的，但是，无论如何它表达了人们当时对现存社会的不满，表达了人们要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的愿望。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烈。这时，蒲鲁东再拿出这类货色来贩卖，就已经是反动的了。它起着迷惑工人阶级的作用，把工人阶级引向错误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而拉萨尔主义者又把这类东西塞在哥达纲领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才对这个纲领作了如此严厉如此激烈的批评。

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写道：“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了‘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人们一方面企图重新强迫我们党接受那在过去曾有一些意思，但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思想上的、法学上的以及其他的谎言，来歪曲那曾花费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但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人们这样做是犯了多么大的罪恶呵。”所以，在这里，我们所遇到的实质上是这样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是观念或意识决定社会经济形式呢，还是相反？按照唯心主义的观点，社会经济形式当然是为观念和意识所决定的。因为，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一切社会制度不过是人类头脑的产物。只是由于人类理性的发展，它才日益趋于完美的。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把“历史——不论是其全部或各个部分——被看

作是一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过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388页）。但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则同它相反，它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运动着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由某种神秘观念所支配，而是同自然界的现象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人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但不能任意地改变它。“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内一样，应该发现出现实的联系来把这些臆想的人为的联系排除掉。而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法则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发生作用的一般运动法则。”（同上书，第389页）问题既然是这样，因此，当我们来讨论按劳分配的问题时，也就不应该从什么“公平”“平等”之类的抽象原则出发，去判断它究竟是一种好的还是一种坏的制度，是不是需要早些把它改变以使用更“公平”更“平等”的制度来代替它。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社会发展过程去分析，找出其中的规律，从而更有力地要把社会推向前进。

二

按劳分配的制度，在我国现在是已经实现了。这个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它同过去的分配制度有哪些不同？要弄明白这些，我们应该具体地来谈谈。

谁都知道，在旧中国是不存在什么按劳分配的原则的。那时，同一切的以私有



制为基础的社会一样，人们的收入多少一般地是由占有不占有财产，占有多少财产，以及占有怎样的财产来决定的。但是，当生产资料不再成为私人的财产的时候，这个分配制度也就改变了。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国，正是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封建的财产关系被废除了，封建地租也消灭了；正是由于实现了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的合营，资本家的利润也就从原来的受限制，到留下一条定息的尾巴；正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私有制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按劳动日来计算报酬才成为农民中的普遍的分配形式。同时，当所有上述的改造过程完成以后，按劳分配的制度才最后确立起来，成为我国主要的分配形式。这样，在我国，分配制度就有了这样一个改变：过去曾经通行了几千年的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分配制度，转到以劳动作为尺度的分配制度。人们的收入多少不再决定于占有或不占有财产，而是决定于自己劳动的情况。

毫无疑问，分配方面的这样一个改变，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性的变革。经过这个变革，剥削阶级的利润和地租，都从分配过程中消失了。现在社会的产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公共基金，它被用作生产、扩大再生产和其他集体需要的费用。另一部分是社会各个成员的个人收入。这部分产品在社会各个成员之间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就是根据他们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的质量和量，来进行分配的。

曾经有人有这样一种看法，以为在社

会主义社会剥削收入是沒有了，但劳动者的收入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收入沒有多少差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收入，好象也是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实行分配的。对于这种看法，早有人指出，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的看法。其错误是在于它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只不过是出卖劳动力的价格。事实正是这样，由于人们忽略了这一个最重要的方面，结果就离开了整个资本主义关系，孤立地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他们忘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总要竭力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并且想尽方法从劳动力这个商品中榨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来。这样，工人的工资就不能不为这样的规律所支配：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维持劳动者生存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同时，一切技术方面的改善和新设备的采用，也都成为榨取工人群众的手段。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方面形成了庞大的资本积蓄，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工人群众的贫困。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极有财富的积累，同时对极，那个把自己的生产物当作资本来生产的阶级，就是贫困，劳动折磨，奴隶制，无知，粗暴及精神颓废等等的积累”（“资本论”第1卷，第818页）。要是我们不注意雇佣劳动同资本、工资同利润、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那种对立关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就会为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甚至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实质。



能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还是商品吗？劳动者的收入仍有一种竭力被压低的倾向吗？能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水平的提高只不过是一种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吗？在这方面，只要是一个没有任何成见的人，用不着费很大力气，就能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是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地联系着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工薪制度的废除，由于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人同人之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劳动者真正在为自己劳动，不再是资本的奴隶。

所以，必须肯定，按劳分配的制度同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这个制度是适应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这个制度当然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它的正义性或符合于公平的原则，就马上出现的。它的实现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过程。在我国，一切旧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要是不把它们推翻，就不能解放社会生产力。我们当然不会忘记，由于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由于各种剥削收入的废除，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大为高涨，而我国工农业生产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三

既然按劳分配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所以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它才会被另一种分配形式所代替。但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

的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而要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还需要更久一些的时间。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按劳分配还是我国的主要的分配制度。

不过，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有些人并不是这样看法。他们希望赶快结束按劳分配的制度。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制度有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看到它同资产阶级法权有关。

是的，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指出，按劳分配这个制度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式的法权范围。不过，我们应该怎样来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指示呢？能够因此认为这个制度还多少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吗？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制度同一切旧的分配制度，都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那么，它在哪些方面还同资本主义有关呢？实际上只不过是这么回事，就是在劳动者之间实行分配的时候，还不能不依据这样一个法规，就是等量劳动应该得到等量的报酬。而这不过是反映那个通行于商品交换中的原则：“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换。”（“哥达纲领批判”）商品交换的原则当然是同资本主义制度有联系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并且它的发展要以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必要的前提。可是，这个原则在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上，从来也不曾起过作用。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实行分配，资本家的剥削收入就不能存在，从而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整个地瓦解。所以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对于资产阶级



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他们在这里完全无利可图，资本主义也不会由此发生。不仅这样，如人们所知道的，现在在我国还要大力地来发展商品经济。同样，资产阶级在这里也捞不着什么油水。因为，这种商品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已经不能再为私人所占有，已经不再是剥削剩余劳动的手段。由此可见，在社会的经济性质已经根本改变的条件下，某些形式上相同的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可以从原来是适合于这个阶级利益的，变为适合于另一个阶级的利益。

既然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无关，并且也不会从这里产生出资本主义，那末，对它我们还有哪些不满呢？现在成为问题的是，实行这个制度，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免有差别。虽然剥削阶级是已经被消灭了，但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种天然特权”（“哥达纲领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根据其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种不平等的权利”（“哥达纲领批判”）。因此，在这种分配制度下，能力强、家口少的人，生活就会较富裕；能力弱、家口多的人，生活就要差些。不过，要知道，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差别，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地不是决定于分配的制度。要是以为只要把分配的办法改一改，一切事情就会变得美满起来，这只能是空想。在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时候，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不熟练劳动之间都还存在着差别的时候，就企图消灭人们的生活水平的差

别，不管采用怎样的分配办法，最后只能走向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它不过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种分配方法，对生产只能起一种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因此，为了改变人们生活水平仍然存在着差别的现象，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使我们当前的社会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的根本的物质保证。不管我们怎样热心于更公平更合理的分配，要是不从这个主要的方面来着手，事情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

既然，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产品还没有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还不免要有差别，社会产品的分配，也就少不得要拿劳动作为尺度。可是，在有些人看来，问题现在似乎已经成为这样：实行按劳分配只不过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终于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下面。

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证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灭亡以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他们告诉了我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指明了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而人类社会则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不断地发展的过程。只要能够正确地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也总能有力地迅速地把历史车轮推向前进。但是，如果因此就把未来的社会制度当作标准，用来衡量今



天以前的一切社会，那么不仅我们会对现存的社会大加不满，而且过去人类的历史在我们面前都将成为一片荒唐。拉萨尔曾经有他的法权观念，蒲鲁东有他的“永恒正义”。而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则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种社会制度，当它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时候，就是一种进步的合理的制度；当它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的时候，就是反动的不合理的了。按照这个观点，恩格斯甚至指出，奴隶制社会的产生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是适合于当时发展生产的需要的。可是，如果我们从抽象的“公平”“平等”的原则来考虑问题，就会得出同恩格斯完全相反的结论，把它当作是一种倒退。

能够认为按劳分配的制度现在已经过时，不适合于生产发展的需要了吗？要是现在我们就来废除按劳分配的制度，会发生怎样的结果呢？正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必须承认，按劳分配的制度是进步的、合理的。因为，这种制度现在还是一种适合于生产发展需要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设想，现在就把这个制度加以废除。马克思说得好：“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当它所给以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所

借以存在的那些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四

按劳分配的制度，在我国已经实行了一些时候了。经验表明，这个制度是有益于当前生产发展的。所以，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按劳分配的制度应该赶快结束。不过，这样的意见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就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分配的情况将是一成不变的，开头怎样，结尾还照旧；只等人们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再宣布一种旧的制度废除，一种新的制度来临。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从来也不曾出现这样的现象。

人们都知道，人类社会是处在一个不停止的运动过程中。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从一种性质的社会过渡到另一种性质的社会。不仅这样，就是在同一性质的社会制度下，它也不是绝对静止的。列宁曾强调地指出：“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8—459页）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它的分配制度在内，也就不能看成是一个凝固的东西。

拿我国的情况来看，在分配问题上，至少有以下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首先，



按劳分配的制度，在一个相当长久的时期内还是我国主要的分配制度。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人们的工资收入，总的趋势将不是差别越来越大，而是逐渐缩小。其次，国家用在社会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费用，是带有按需分配的性质的。这些方面的费用，过去每年都不断地有所增长，以后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加大起来。再次，去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在我国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一种粮食或者伙食供给制。它是一种带有按需分配因素的制度。应该指出：这个制度是随着我国农村生产的发展，是适应我国高速度发展生产的要求才出现的。这个制度，在提高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方面，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且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显然，分配方面的这些发展和变化，对我国整个分配制度将会发生影响。

在已有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某些属于共产主义萌芽的东西已在生长。在已有的事物中孕育着新的属于未来的某些因素，这是常有的事情。对于这些新的因素，只要它是真正适应客观需要发展起来的，就应该积极地给以支持。可以预见得到的，分配中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因素，将会逐步地发展起来，最后成为社会主要的分配形式。不过，对于这些新的因素，我们要是不考虑到客观情况，只片面地从主观愿望出发，就把它夸大起来，以为现在就可以用它来代替一切已有的东西，就一定会在实际生活面前碰壁。

在分配问题上，人们也已经承认，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将逐渐缩小。而这种发展趋势，是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的。由于工资差别的逐渐缩小，各社会成员之间的生活水平将越来越接近，这样将有利于按劳分配制度向按需分配制度的过渡。但是，这种差别的缩小，也同样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只有在广大劳动群众的技术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只有随着工业同农业、城市同乡村、熟练劳动同不熟练劳动、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渐缩小，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工资的差别，才有可能大大地缩小，以致最后消灭。很清楚地，这又要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为它的必要的物质前提。

所以，在社会主义阶段，分配的制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变化过程，也就是由较低级的按劳分配到较高级的按需分配的转化过程。这个转化过程的全部完成，将需要有一个较为长久的时间。看不到这个转化过程是不对的，以为这个转化过程可以一举实现也是不正确的。最后，还应该指出，这个转化过程的能否完全实现，不是决定于“公平”“平等”“永恒正义”等抽象原则是不是已为人们所接受，而是决定于生产。因此，当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一种分配制度是不是同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要考虑它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价值規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 价格决定的規律性

于 光 远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是当前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中一个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理論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認識是隨着社会主义建設經驗的丰富而逐步深入的，但是至今还存在着許多不同的意見，而且研究得还很不細致。一个政治經济学重要理論問題的解决，有时需要很长的時間。从資产階級古典政治經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賦稅論”的发表（一六六二年）算起，到馬克思“哲学底貧困”和“雇佣劳动与資本”的发表（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九年），中間經過將近二百年的時間，科学的價值論的基础才奠立了起来。象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这样复杂的理論問題，短时期內得不到彻底的解决，是很自然的事。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范围很广，現在我打算就价值規律和价格决定問題^①发表一些意見。

家的价格政策。但是必須首先研究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决定的規律性，价格政策問題才能从理論上得到說明。

价格决定的規律性同价值决定的規律性不是一回事。大家知道，“价格是价值的貨幣表現”（“資本論”第3卷，第442頁）。这是作为商品交換价值的一种特殊形态——貨幣形态——对价格所下的定义。因此，从量上說，“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資本論”第1卷，第97頁）。但是价格是可以同价值相背离的。“价格和价值量相背离的可能性，是存在于价格形态之內”，因为“虽然当作一个商品的价值量的指数的价格，

① 这里所說的价格决定的規律性，指的是价格是怎样被决定的規律性。“价格决定”一詞，在經济学著作中沒有見人用过。这里所說的“价格决定”这个名詞的意思，同苏联經济学界通常用的“价格形成”这个名詞的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指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据以制訂各种产品的价格和規定价格水平和比价时的客观根据。这里我所以用“价格决定”来代替“价格形成”，是因为后者从中文的字义来看，容易使人誤解这个概念只包括价格由哪些因素构成，不能够把这个概念的意思全部表現出来。

在討論中，許多同志說到社会主义国



是这个商品同货币交换比例的指数，但是一个商品同货币交换比例的指数，并不因此就是这个商品的价值量的指数”（“資本論”第1卷，第91--92頁，譯文稍作修改）^①。作为商品同货币交换比例关系指数的价格，不同于作为商品价值量指数的价格，它是可以因各种因素的影响，高于或低于商品內在的固有的价值量的。因此，如果說商品的价值，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因而价值决定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相同的規律性的話，那么，价格决定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既有相同的規律性，又有不同的規律性。不論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商品的价格量总是以它的价值量为基础，这是价格决定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相同的規律性；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价格有直接以价值为基础和直接以价值的变形为基础的区别，有随时涨落和比較稳定的区别，有自发地形成和由人們有計劃地規定的区别等等，这是价格决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不同的規律性。

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商品的价格都是以价值为基础呢？这是由于在这些制度下，价值規律都起作用的结果。价值規律，一句話說就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②。这就是說，不論个别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时消耗了多少劳动，社会上只承認这个商品凝結有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

必要劳动量。在商品交换中，如果进入交

①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解釋这一句話时接着說：“假設有二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表現在一卡德小麦上面和二鎊（約等于十鎊斯金）上面。二鎊就成了一卡德小麦的价值量的货币表現，或者說是它的价格。如果事情的变动，使一卡德小麦的价格提高至三鎊或降落至一鎊，那就無論一鎊和三鎊当作小麦价值量的表現会不会失之过大或过小，它們总归是它的价格。因为，第一，它們是小麦的价值形态，货币；第二，它們是小麦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在生产条件不变或劳动生产力不变时，再生产一卡德小麦就須支出和以前一样多的社会劳动時間。这种事情，既与小麦生产者的意志相独立，也与別种商品所有者的意志相独立。商品的价值量，表現一种必然的，內在于該商品形成过程中的，对于社会劳动時間的关系。价值量轉化为价格时，这种必然的关系，会表現为一种商品和那在它外部存在着的货币商品的交换关系。但这种关系可以表現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現比这更大或更小的量。在一定情形下，該商品就会依这更大或更小的量来讓渡的”。

馬克思还說：“价格形态不仅讓价值量与价格（即价值量与其货币表現）有可能发生量的一致，并且能够包藏一个質的矛盾，以致货币虽只是商品的价值形态，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表現。一种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能在形式上有价格。在这場合，价格表現，就象数学上某几种量一样，是想象的。”（“資本論”第1卷，第91--92頁）

② 目前經濟学界对价值規律有多种表述方式，我認为以“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这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这种表述形式最为确切。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找不到用上述定义的形式来表述价值規律的句子，但是在他們的著作中的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出这个意思。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204頁）中写道：“……每一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它的使用价值中对象化的劳动的量，由它生产上社会必要的劳动時間决定。这个規律（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在劳动过程当作結果得到的生产物为我們的资本家所有时，依然是适用的。……”为什么这样的表述最为确切，在这里不來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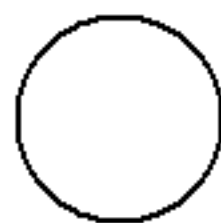


换的两个商品价值并不相等，那么随着商品变更它的所有者，交换双方占有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就因之可能发生变化：拿出价值较高的商品换回价值较低的商品的人占有社会必要劳动量就会减少，反之就会增加。只有在进入交换的两个商品价值完全相等的时候，在商品变更它的所有者之后，双方所占有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才不发生变化。因此，在商品交换中，价格的高低和交换双方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使得在商品交换中价格有接近价值的趋势，使商品价格不能不以价值为基础。在垄断前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价格不是直接以价值为基础，而是直接以生产价格为基础，以及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价格因供求关系有时上涨有时下落的趋势的一些事实，并不能否定价格仍以价值为基础这个规律性。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我们不多解释。

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价格有自发地形成和由人们有计划地来规定的区别，有随时上下涨落和比较稳定的区别，有直接以价值为基础和直接以价值的变形为基础等等区别呢？这种区别不能只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解释，因为价值规律是在这些社会制度下共同起作用的规律。这些区别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除了价值规律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经济规律，它们也在价格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价格之所以必然自发

地形成，就是因为在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情况下，社会分裂为无数独立的生产者，因而价格作为商品转让的条件，只可能由各个当事人在市场上经过相互比较商品的价值或者它们的生产价格来形成，不可能由某个中心来统一制定。在价格这样自发地形成的前提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看到，供求关系和因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引起的价值变化，就会直接在价格的涨落上得到反映。至于商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为什么会有直接以价值为基础或以价值的变形为基础的区别，自然也只有从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经济条件、不同的经济规律中得到说明。在小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价格之所以直接以价值为基础，就是因为简单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买而卖”，人们关心的是劳动能否得到等量的补偿。而在垄断前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价格之所以直接以生产价格为基础，是因为这时不同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各个资本家的同量资本，不论它投入什么生产部门，也不论各个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有多有少，但是只能依据自发形成的平均利润率取得平均利润。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原有的许多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仍然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的特有的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结果使商品价格脱离生产价格，形成垄断价格。

* * *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决定有它特殊的规律性，这是因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决定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计划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是计划价格，它不是在市场上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根据社会的利益，有计划地制定的。它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格是根本不同的。不但在垄断前资本主义制度下，谈不到什么计划价格，就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根本不存在价格的计划性。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卡特尔、托拉斯、康采恩等垄断组织，把许多产品的生产绝大部分集中到自己手里，打败竞争的对手，形成了垄断价格。垄断价格，是垄断组织残酷地剥削本国劳动者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的手段。垄断价格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反映了垄断资本家之间尖锐的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价格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保证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手段。计划价格，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有计划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能够而且必然是计划价格，这是因为，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从而产品由社会来支配，没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没有自由竞争。当然，计划价格不是人们主观任意决定的。尽管在制定价格中，表现出人的高度的主观能动性，计划价格的高低，仍由各种客观的经济条件

决定。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决定的第二个特点是直接以价值为基础。这个特点并不是经济学界一致公认的。有人认为价格与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更谈不上什么价格有直接以价值为基础的必然趋势。也有一些人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与价值间的必然联系，但是不承认价格直接以价值为基础的客观规律性。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有必要规定各部门平均资金利润率，作为计算投资的经济效果和实行经济核算的一个主要工具，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平均利润与由成本和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等经济范畴，而商品的价格将由这个生产价格来决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是否有向直接以价值为基础变化的必然趋势，是一个比较复杂、需要依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仔细加以研究的问题。^①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决定有直接以价值为基础这样一个特点呢？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交换

① 研究各社会主义国家价格变化的历史，研究社会主义各国在价格问题上的丰富经验，对研究社会主义价格是否有直接以价值为基础的客观规律性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已有的经验对解决所讨论的问题来说，似乎还嫌不够充分。价格有向直接以价值为基础变化的必然趋势，现在表现得还不够明显。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都还在争论这个问题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赖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一步的丰富。



主要发生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国家和职工之间以及国营企业之间，因此关于价格变化的根本趋势问题，也就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作一些分析。

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从旧的城乡关系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在革命胜利之前，城市剥削乡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还有帝国主义对广大农村残酷的剥夺——这种城乡关系，同许多国家工业品的价格高于价值，农业品低于价值的情况，是密切联系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新的城乡关系、工农联盟、按劳分配的原则的贯彻，要求工农产品的价格逐渐接近价值。就我国的情形来看，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全国工农业商品比价指数，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〇年缩小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三（见“经济研究”，1958年第9期第62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业产品有进一步接近价值的趋势。

在国家和职工之间的交换中，现在国家还需要自觉地运用价格杠杆，规定卖给职工的消费品的价格高于、等于或低于其价值，来影响某些产品的销售数量这种情况同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直接以它的价值为基础的规律性是否不相容呢？不是这样。因为，价格有直接以价值为基础的规

律性，并不是说价格与价值不可能发生背离。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就是如此。不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与价值如何符合和背离的规律性，同简单商品生产下原则上不同。至于某些特殊商品，如烟、酒和某些高级消费品，价格规定得要比它的价值高得很多的情况，也不能用来作为否认价格直接以价值为基础的论据。因为这样来规定价格的目的是，适当限制这些商品的消费，同时对一部分生活水平高的人起征税的作用，增加国家的收入。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习惯的改善，规定这些商品价格特别高于价值的根据，就会逐渐消失。至于某些产品（如某些医药卫生等用品）价格特别低于价值的情况，实质上是逐步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的步骤，也不能以此为根据，来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的价格有直接以价值为基础的规律性。

从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来看，更好地实行经济核算，也要求产品的价格逐渐接近价值。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经济运动时常以颠倒、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力的买卖表现为劳动的报酬等等。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客观规律性。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向群众掩盖经济运动真相的必要性，相反地，为了便于管理，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就要求通过恰当的



形式，把社会生产的实际状况尽可能明白地确切地表现出来。这就要求价格直接以价值为基础。在价格直接以价值为基础的情况下，价格就能比较确切地反映生产这个产品时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这个产品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就能比较确切地表现生产这个产品时所消耗的物化劳动；生产这个产品时付出的工资，就能比较确切地表示劳动者在生产这个产品期间所消耗的生活资料中的物化劳动；由产品的价格减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后的那个货币额，就能比较确切地表现生产这个产品时新创造的价值；而根据价格计算出来的成本、利润、资金、成本利润率、资金利润率等等也就都能比较确切地反映相应的经济关系。如果相反的价格不是直接以价值为基础，那么上述各种范畴都不能直接地反映出那真实的经济关系，这就会增加我们正确认识经济现象的困难。这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真实的经济运动应该得到最明白的表现形式的要求是不符合的。

至于生产价格，作为客观经济范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存在，我认为很值得怀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没有自由竞争，没有资金的自由转移，就不可能发生利润率平均化的倾向，因此也就不存在平均利润的范畴。但是有人认为，毋须有利润平均化的客观趋势，可以用某一个生产部门所有企业的资金总额，去除这个部门所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得出平均利润率

这个数值，并把个别企业的利润率同这个平均利润率加以比较，用它来反映投资的经济效果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状况。根据这一点他们肯定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的范畴是客观存在的，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直接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这篇文章中不能对这个问题充分展开讨论。但是这种说法中有一个困难，那就是：他们不好说可以对社会生产所有的部门计算出统一的平均利润率，因为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也就不存在生产价格的范畴。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决定的第三个特点，是有较大程度的稳定性。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较大程度的稳定性，指的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发展，或是供需关系变化很小而产生的那种稳定性，而是价格水平不依供求状况和价值变化而随时变动的那种稳定性。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的较大程度的稳定性，是由价格的计划性决定的。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生产无政府状态，不存在各企业间的竞争，不但生产是有计划的，而且个人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纳入计划轨道，因此在供求关系发生变动的时候，可以不讓价格自发地涨落。一时出现的供求关系同价格水平之间的矛盾，可以不采取涨价或减价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例如，可以有计划地增加生产（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或适当地缩减生产（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可



以重新調整物資分配計劃，實行消費品的計劃供應，適當增加或減少物資儲備等等。但這決不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供求關係對價格完全不發生影響，或者說，供求關係影響價格的規律性，根本不存在。在社會上還存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兩種形式的時候，在大部分消費品的分配還通過勞動者用貨幣收入在市場上自由選購的方式來實現的時候，在國家對價格管理還不十分嚴格的時候，價格完全不反映供求關係是不可能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可以暫時不顧價格水平同供求關係不相適應的狀況，對價格不作調整。在這時候，由於價值規律的作用，供求不平衡的狀況，對現有的價格是一個衝擊力量。但這種衝擊力量，可以歸於消滅，如果不久以後生產和消費狀況發生了改變，重新出現供求平衡的狀況代替了一度出現的供求不平衡的狀況。這種衝擊力量也可以比較長時期的保持下去，如果不能在最短期間從生產和消費上解決供需平衡的問題，但是供需間的不平衡，沒有大到使原有價格水平無法維持下去的程度。此外，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當供求不相適應的情況進一步擴大，對價格的衝擊力量大到一定程度，使原有的價格水平事實上無法維持下去。把上面說的這幾種情況歸結起來，我認為客觀上存在着這樣一個規律性是比較明顯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反映比較長期的供求關係，不象在小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

下那樣，價格跟着供求關係的變動隨時漲落。

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有較大程度的穩定性，還表現為價格不是隨價值的變動而隨時變動。某個商品的市場價值，是隨着技術進步，隨着適應社會對這個商品需要的狀況而引起的生產條件的變化而隨時變化的（請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10章）。但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格，卻不會隨着市場價值的變化而隨時變化的。如果價格每月每季都隨着價值變化而變化，那就根本沒有較大程度的穩定性可言了，而為了有利於國家對經濟管理，有利於居民有計劃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有必要力求價格有較高程度的穩定性。

當然，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的穩定性只是相對的。既然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有向直接以價值為基礎變化的必然趨勢，既然價格不能完全不受供求關係的影響，價格不變是不可能的。一般來說，隨着勞動生產率提高價格應該逐漸下降，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有較大程度的穩定性這個特點，只是要求這種下降不是隨時的，不是波動式的，而是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由國家有計劃地來作一次調整。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有計劃地調整價格就是必然的。把社會主義制度下價格所具有的相對穩定性理解為絕對穩定性，認為歷史上形成的東西，就完全是合理的，認為可以不去研究價格長期變化的趨勢，不去研究



短期中圍繞價格問題上的各種因素的作
用，及時地適當地對產品價格進行調整，
那是不對的。

* * *

上面对社会主义制度价格决定的一些
客观规律性，作了极其粗略的分析，现在
再来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政策问题。
所谓价格政策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领导机关，按照实际经济情况，正确
地运用经济规律，制定各种商品的价格，
使其结果符合于预定的有利于生产的发
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人民
的团结的目的。

关于运用正确的价格政策以达到我们
预期目的的情形，不外乎薛暮桥同志在“红
旗”第十期那篇文章中指出的那几个方面：
影响某些产品的生产数量，以保持各类产
品供需之间的平衡；影响某些消费品的销
售数量，以保持各类消费品供需之间的平
衡；调整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
工人同农民之间消费基金的分配。除此之
外，可以补充的是，正确地制定价格，还
可以达到更好地计算投资的经济效果、更
好地实行经济核算制、更好地进行计划统
计工作的目的。

为什么运用正确的价格政策可以达到
上面所说的这些目的呢？这是因为，尽管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必然以价值为基
础，而且还有同价值接近的必然趋势，但
是在不脱离以价值为基础的条件下，价格

水平究竟多高，是可以由国家来规定的。
如果一种产品只可能有一种价格，如果产
品的价格不允许同它的价值有任何背离，
那就根本没有价格政策可言了。价格政策
问题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对商
品价格有所选择，使得价格同价值相符合
或发生程度不同的背离。在制定价格时，
对我们重要的，也就是要能够科学地预见
制定不同的价格会产生如何不同的结果。
在这里正确地认识价格决定的规律性，正
确地认识价值规律以及其他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起作用的经济规律的作用，是十分必
要的。

在价格政策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红
旗”第十期发表的薛暮桥同志的文章中，有
一些说法我认为说得很好，我完全同意；
有一些说法我认为讲得还不十分完满，需
要作些补充；也有一些说法我认为不能同
意。在这里，我想说一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就正于薛暮桥同志，并且希望得到其他同
志的指正。

我完全同意薛暮桥同志那篇文章中关
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产品的价格不能脱
离价值，价格一定要接近价值本身的想法。
他在文章中认为，不论集体所有制经济单
位中生产出来用来同全民所有制经济进行
交换的产品，不论社会卖给个人消费用的
产品，不论国营企业间在生产中交换的产
品，它们的价格都是以价值为依据。特别
对国营企业价格，他的意见更加明显。他
说：“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国营企业各种产品



的价格唯一可以采取的依据，就是价值，就是生产这件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各国营企业，必须用基本上符合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价格，来互相交换其产品”。我认为明确地提出这些观点，对于从理论上研究价格决定的规律性，或是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都是有好处的。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在说到这些问题时，还应该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只是有向着直接以价值为基础变化的趋势，至于当前价格是否已经近似于价值，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各种产品的价格，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形成的，有的高于价值，有的低于价值，价格与价值一定程度的背离，今天还是普遍存在着的现象，而两者完全符合却是偶然的现象。今天各类产品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主要还不是由于各类产品的价值难于计算^①，和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引起的价值的不断变化，而是我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也不必要提出全面调整产品价格使它符合于价值的任务，因为如果要那样做，就会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非常大的影响，其结果未必是我们所期望的。今天提出在商品交换中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我认为还不就是要“每一种产品都按照它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交换”，而是如有些同志指出的，要“以社会公认的价格来出售和买进商品”(参看“红旗”1959年第10期第11页和“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第48页)。这个价格当然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但它同价值并不一定要符合，而可以有所背离。我认为，今天我们提出在商品交换中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目的还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对许多商品价格与价值有所背离的状况已经不能容忍，需要马上进行一番改革，需要马上按照价格与价值相等的原则来调整价格，马上要把这个背离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是为了针对一些人的错误想法，防止有人不依照通常的价格来换取公社、生产队的生产物，以致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有一些同志(包括薛暮桥同志在内)把在今天商品交换中实行的等价交换的原则，理解为根据同产品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来相互交换，而不是理解为根据以价值为基础，但是又同价值可以有所背离的价格来相互交换，于是就发生所谓价值规律的两种作用或价值规律作用的两个方面的问题。薛暮桥同志说：“价值规律要求各种产品的价格，都必须以它的价值，即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这是价

^① 价值的难于计算，特别是因为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在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在将来也是一个问题。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为计算价值开辟了某种可能性。但是在目前，这种可能性，还是从数学上和技术上看出。从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角度来看，是否能够依据这样计算出来的价值来制定价格，同可以从数学上研究上计算价值的方程式和作出在电子计算机上计算这种数值的程序设计，不是一个问题。将来到底能否根据计算出来的价值来制定价格，目前还很难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值規律所起作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某种产品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那就会影响它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反过来，如果产销不平衡，也有可能影响产品的价格）；也就是说，价值規律对这种产品的生产或销售（或价格）起调节作用。”这种说法，我认为不能同意。因为任何价格，不论高于、等于或低于价值，都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不能把价格与价值有所背离同价格以价值为基础这两者当作价值規律起作用的两个方面，来相互加以比较。同时，价格不论高于、等于或低于价值，都会对生产和销售发生影响；不能说在同价值相符合时，价格高低对生产和销售就不发生影响，只有同价值背离时，价格高低才对生产和销售发生影响。准确地說，——由原先价格与价值一致，变为价格与价值背离，或者由原先价格与价值背离，变为价格与价值一致，或者改变了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程度——而不是价格与价值是否背离这种静止的状态。

薛暮桥同志接着还说，“价值規律的前一种作用，必须受到普遍的重视，即使国营工业列入计划的产品也不能例外（至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价值規律的后一种作用，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已经受到国家计划的严格的限制。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規律已经不起作用；它还是在起作用，在冲击着我们的国家计划。如果价格和价值背离过大，它的冲击力量仍有可能影

响生产和销售数量，甚至可能破坏国家计划，破坏供需间的平衡。特别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不列入计划的产品，价值規律的冲击力量所发生的破坏作用就更大。”

这一段话的意思不容易看得清楚。从整段文字来说，这里所说的价值規律的作用，应该是在国家有计划地利用价格工具来影响生产和销售时价值規律所起的作用。如果那样，价值規律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发展的，不能说它冲击着国家计划。

应该承认，在我们的社会里，存在有对国家计划的冲击力量。但是不能脱离社会内部人与人的矛盾，抽象地认定价值規律就是这样的冲击力量。更不能抽象地把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看成是这样的冲击力量。对国家计划起某种破坏作用的冲击力量，应该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中去找。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既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又代表社会局部利益，既代表社会长远利益，又代表社会暂时利益的力量；但也还存在有脱离整体利益，脱离长远利益，只代表某种局部的（有时只代表个人）、暂时的、狭隘的利益的带有自发性的力量。后一种力量的不顾大局的行为，对国家计划起破坏作用。这种带有自发性的力量，并不一定是什么固定的社会集团，它可以是在某一个时间和在某一件事情上，由于脱离计划，脱离领导，而形成的一种力量。此外，有时人们由于不遵守客观经济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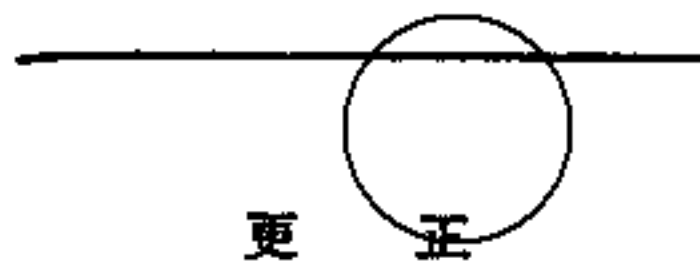
律的要求办事，犯了錯誤，例如制定了錯誤的价格，也会对国家計劃发生不利的影响。根据这种認識，为了使国家計劃不受破坏，就要同这种带有自发性的力量作斗争，就要努力避免犯錯誤。把对国家計劃的某些破坏性的作用，抽象地說成价值規律的作用，我認为是不妥当的。

把对計劃的冲击作用，抽象地說成价值規律的作用，是我国經濟学界很流行的一种說法。这种說法不是完全沒有根据的。这种說法所根据的是：当某些带自发性的力量在对国家計劃起破坏性的作用时，常常通过作为客观規律的价值規律的作用。因此有些人沒有經過仔細的分析，抽象地認定价值規律对国家計劃起冲击作用。我認为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时，應該把那种利用价值規律对国家計劃起破坏作用的社会根源找出来，然后才能找到克服这种破坏作用的有效办法。打价值規律的屁股，是找不到克服这种消极作用的途径的。

关于价格与价值背离与否、背离程度的大小，同国家計劃、同供需平衡的关系問題，我的意見是：不應該抽象地認定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程度越大，对供需平衡的冲击就越大。應該看到，决定对供需平衡冲击力量的大小的，不是抽象的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程度的大小，而是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程度同供求不平衡的程度两者不相适

应的程度。我們知道，有些供需平衡的状况是同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相适应的。例如烟、酒供需的平衡，就是在价格高于价值很多的情形下建立起来的。如果一下子讓烟、酒的价格等于价值时，烟、酒的供求平衡，国家在烟、酒等产品方面的計劃反而馬上就会遭受到破坏。

以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国家怎样利用价格政策方面，来討論价值規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的問題。价值規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的問題涉及范围很广，不仅表现在上述价格决定和价格政策上面。在确定投资和采用新技术的經濟效果方面，在組織經濟核算方面，在制訂发展国民經济計劃方面，价值規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从理論上探討和說明这些問題是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經濟工作要愈做愈細致，就愈要求我們深刻了解各項經濟工作的理論依据。我認为对这些問題加以認真的、具体的研究，是我国經濟学界的一項重要任务。



本刊一九五九年第七期第十七頁右栏倒数第九行中的“德国”，应改为“西德”。



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

白寿彝

“紅旗”第十期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問題”后，我約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十几位同志对这篇文章交換了意見。我們对于古与今的問題談得多些，現在想专談談这个問題。

一 社会发展規律的闡明

古与今的問題中心是古为今用問題。这里所說的“古”，实际上就是指历史知識；古代史是“古”，中世史是“古”，近代、現代史在这里也还可以說是“古”。“今”是指现实政治、现实生活。这和課程安排上所說的古今，所指不同。在課程安排上，“古”可以指古代、中世史，“今”可以指近代、現代史；也可以把“古”的范围更放大些，“今”的范围更縮小些。“古”和“今”本是相对的，并沒有一条截然的鴻沟。“古”“今”所指可以不同，“古”“今”的語意并沒有改变。

古为今用，在最本質的問題上，已經解决了。沒有解决的，是我們对这些結論的認識和我們的实践問題。

古为今用，首先是要闡明社会发展規

律。对古代、中世史如此，对近代、現代史也是如此。对中国史如此，对外国史也是如此。

列宁在闡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貢獻的时候，曾指出先前一切历史理論的两个主要缺点。一个是它們至多考察了人們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却“沒有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中的客观規律性，沒有認定物質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另一个是它們“恰巧沒有包括到人民群众的行动”。列宁說，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这两个主要缺点，并“指出了用科学态度研究历史，即将历史当作一个虽然十分复杂，十分矛盾，但終究是有規律的統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①

毛澤东同志在“实践論”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內，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則由于生产規模的狭小，限制了人們的眼

^① 列宁：“卡尔·馬克思”，“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26頁。



界。人們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認識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現近代无产阶级的時候，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①

能不能全面地認識社会发展規律，是无产阶级史学和剝削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点。只有以馬克思主义科学武装起来了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認識社会发展規律，从而解释世界，并且，“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苏联的經驗，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經驗和中国的經驗，都雄辯地証明了这一點。

历史上一切沒落的、腐朽的統治阶级，都害怕自己的死亡，一說到社会发展規律，就好象看到了已經掘好了的等待自己的坟墓，又惊慌，又仇恨。剝削阶级文人想出各种花样来否認客观規律。“五四”以来，胡适打着整理国故的幌子宣揚实验主义、奴才主义和投降主义；梁启超吹嘘“中国文明”及中国封建文化和西洋资产阶级文化的化合；傅斯年公然武断史学即史料学；錢穆頌揚封建道德和封建統治秩序。他們都无非各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祝福，想用否認客观規律的办法来为垂死的阶级添筹晋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的分期，在很短的时间內可以有几种說法，用意不过是在妄图暗示：社会发展阶段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因而社会发展規律是不存在的。同时，托派分子歪曲社会发展規律，把中国封建

社会說成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把当时的中国說成是资本主义时代，也无非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們的意思是說：既然封建社会早已不存在，就沒有反封建的根据了；既然当时的中国是资本主义时代，就不是半殖民地了，反帝国主义的根据也就不存在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什么“人文史观”出来了，“文化形态史观”出来了，都是把自己装扮成科学来反对真的历史科学，装扮成发现了一种历史規律的样子来反对客观存在的历史規律。他們的用意也无非是无耻地頌揚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統治。

反动文人也何尝不要古为今用。他們在这个問題上和我們根本的不同就在于：第一，他們是要古的糟粕、古的假象以及他們对古的編造，为他們的今——反动阶级的利益——辯护，給自己的反动面貌搽粉。我們是要透过古的假象，辨析是非，揭露历史发展規律，指出新生力量必然胜利，腐朽力量必然死亡。第二，他們不敢昌言古为今用。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傅斯年以史料为史学，却恰巧就是以为古而古的装模作样来进行其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活动。（当然，目前少数还有厚古薄今的意識的教师，一般是思想認識問題，和胡适等不同。）与之相反，我們是积极提倡古为今用，从而闡明社会发展規律，发揚馬克思

① “毛澤东选集”第1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72頁。

② 同上書，第281頁。



主义的战斗精神。

我們在討論历史教学問題的时候，一般地是知道注意社会发展規律的。但在說到古为今用的时候，触及到社会发展規律的时候倒少了。也許有人認為，闡明社会发展規律已是历史教师的常識，用不着再說了。如果真有这种看法，这是不对的。闡明社会发展規律，对于历史教师說，具有头等的深刻意义。不是怕說的太多，而是怕說的太少。認為不需要再說了的同志，就說明他把这件事情的意义了解得很不够。我們不是每天都是要吃两三頓飯嗎，还有什么事情比吃飯更熟悉更平常的呢？但我們並不認為，吃飯的事情可以不說了。为什么？这因为我們日常生活很需要它，不能离开它。一个历史教师对于闡明历史发展規律的要求，难道不應該这样嗎？为什么不要經常地談談呢？

闡明社会发展規律的工作并不是輕而易举的工作。現在我們对中外历史上很多問題說不清楚，对国内各种资产阶級史学观点的批判还没有系統地进行，对国外资产阶級史学还没有怎样交鋒，这都說明我們的工作远远跟不上需要。恩格斯說的好：“口头上承認这个思想是一回事，而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一个別場合和每一具体研究領域，却是另一回事。”^①我們不要說“在每一个別場合和每一具体研究領域”內都能闡明社会发展規律了，就是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我們也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近年，我国史学界曾經討論过的問題，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应如何划限的問

題，封建社会的分期問題，近代史的分期問題，封建土地制度問題，資本主义萌芽問題，汉民族形成問題，太平天国革命性質問題，都是比較重大的問題。这些問題的适当解决是有利于闡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規律的，但我們还没有都作出适当的結論。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如何划限，郭沫若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所作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中，就已經提出了他的看法。后来他又一再修改补充。現在有一部分同志同意他的看法，但如何尽可能地利用大量材料并从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历史来闡发这个看法，也还是有待于艰苦的工作的。

毛澤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提出过不少的历史問題，并且也有不少的原則性指示。我們历史教师对这些問題，不是了解得不够，就是研究得不够。比如毛澤东同志說：“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示。从历史上闡明农民个体經濟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础，闡明个体經濟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这就闡明了解放以前中国社会发展基本規律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增进对农业集体化的深刻的了解，有益于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这是一个有丰富科学意义的，也是有丰富現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1957年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34頁。

② “組織起来”，“毛澤东选集”第3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934頁。



实意义的工作。但一直到現在，在我們历史著作中，体现这一指示的精神的，似乎还不多。又比如，毛澤东同志說：“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繩索。”^①如何从經濟基础上闡明这四种权力产生、发展的直接間接的根源，闡明它們在封建社会史上所起的作用、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上所起的作用，也是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尽管我們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但悠久的历史所遺留下来的旧影响，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全消灭的。从历史上作有关“四权”的闡述工作，是有助于提高人們的思想認識的。显然我們史学界对于这一工作，也是作得很不够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論”里提到的历史問題就更多了。有待于我們工作的，不是沒有，而是太多了。

在馬克思、列宁的著作里，有不少关于东方的理論。这是我們應該学习的，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情况。如何学习这些理論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闡明，也还是有待于开辟的工作。

由于我們历史教师中的大多数，对馬克思主义理論还是小学生，許多历史問題还不能很快地得到解决，并沒有有什么奇怪。只有我們踏实地努力，問題总是会一步一步解决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千万不要認为闡明社会发展規律的工作已經不算什么了。我們要古为今用，首先还是要抓社会发展規律。

二 “历史的必然性与个别历史人物的問題”

伯贊同志的文章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論述历史的必然性与个别历史人物的問題。这和我們現在所正在討論的問題，是有关的。这里說說我們的意見。

伯贊同志說：“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实现出来的。”这话是对的。但他在下面說的一大片話并没有繼續把这句话加以發揮。有的同志認为，伯贊同志在下面說的許多話，很易使人感到：历史必然性和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是对立的。如他說：“如果把任何历史事件都說成是和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沒有任何关系，而简单地归結为历史必然性的結果，或者用历史必然性解释一切历史問題，那就正象恩格斯所說的：‘把理論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演算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了。’”把任何历史事件都說成是和个别历史人物的活动沒有任何关系，肯定地說，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不可以把历史事件归結为历史必然性的結果呢？用历史必然性机械地往历史問題上硬套的办法当然是不对的，但如通过繁杂关系（如果存在的話）的分析而得出历史必然性的結論，又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們認为，关于历史的必然性和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問題，恩格斯在另外一个地方，已說得很清楚了。他說社会发展史和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澤东选集”第1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33頁。



自然界发展史有一个根本不同，这就是在自然界起作用的是自然物，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则是人，而人是赋有意識的、經過深思熟慮而行动或受因热情驅使而行动、并且抱有一定目的的。”但是这个差别“絲毫不能改变历史进程服从內在的一般規律这一事实。”他說：“整个說来，在历史現象领域内同样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不过凡表面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終是服从于內部的隱藏着的規律的。全部問題就在于发现这种規律。”^①这可見，社会毕竟是人的社会，沒有人們的活动也就沒有历史的必然性了，历史的必然性正是存在于人們的活动中的。同时，人們的活动，不管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人，也不管它表示为什么样的事件，归根到底还是受历史必然性支配的。至于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人物，他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取决于他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規律及符合到多少程度而定的。我們應該把历史人物的作用包含在历史发展規律中来考虑，不應該把它們看作是对立的东西。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決議，指出：“按照历史年代的次序講述历史事件，且使學生必須牢固地記憶着一些重要的历史現象、历史人物和年代月日等，这是學生們能够切实領悟历史課程之决定的条件。只有这样的历史教程，才能保証學生們所必需的历史教材之易于理解性、明确性和具体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正确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历史事件（这都是使學生对历史走

向馬克思主义的認識）才有可能。”^②二十多年已經过去了，这个決議对于我們一点也不陈腐。这是我們在历史教学中闡明历史規律所应当采取的形式。我們說要闡明历史发展規律，决不是容許以社会經濟形态的定义来代替历史的講授，同时也必須反对以此为借口而抛弃馬克思主义原理，仅从事于罗列历史事件的講述。

三 文化成果的分析

古为今用的另一个重要內容，是对于文化成果的分析。伯贊同志的文章說，古为今用“是要求教师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方法总结历史上各种有用的經驗，如生产劳动的經驗、階級斗争的經驗以及抵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斗争的經驗，用这些經驗来进行生产劳动的教育、階級斗争的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他所說的这些經驗，作为历史的积累来看，都可以說是文化成果。在他說的这些以外，还應該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識等等在內。

关于文化成果如何对待的問題，大致有以下的几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态度是对于我国过去文化成果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主主义者因反对旧道德、旧文学而反对一切的古，他們有如列宁所說“启蒙者”对于封建社会的“一切产物滿怀着强烈的仇

① “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1957年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37—3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5—286頁。



恨。”^①他們这样作，是为冲破网罗的情感所支配的。但是，象吳稚暉要把一切錢裝書丟到厕所里，胡适要通过整理国故去証明我国的“事事不如人”，却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奴才主张。

一种态度是頌揚我国古文化。他們虽不一定說古文化都是好的，但主要是好的。梁启超、梁漱溟和錢穆，在表現上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有政客、教主和道学先生的区别，但对于封建文化的拥护是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們，想拿阶级成份作为文化成果取舍的标准。劳动人民的东西都是好的，统治阶级的东西都是坏的。这些同志們的用心是好的，但这种想法并不是馬克思主义的，对于繁荣我們的新文化有害而无利。

由此可見，在对待文化成果的問題上，因立場不同、观点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对这个問題，早已作出了結論。列宁在“論无产阶级的文化”中明确指出：“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經驗的鼓舞下，繼續进行工作，“才能認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②

毛澤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論”中，对这个問題作了全面的指示。他指出，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这里包含有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也还有資本

主义国家对我們有用的文化，同时要清理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可以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清理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無論对外国文化或对中国古代文化，都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頌古非今，而是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毛澤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还指出形式主义的害人。形式主义的錯誤，就在“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謂坏就是絕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謂好，就是絕对的好，一切皆好。”^③

伯贊同志的文章提出，“不能只講帶有唯物主义傾向的思想家，也要講唯心主义的思想家”，講异端的思想也要講統治阶级的思想。話說的不能算錯，但太籠統了。講是都可以講的，但應該注意，一直到現在，我們在历史教学中，还不是不講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問題，而是对唯心主义思想家講的不少，講唯物主义思想家还不是真多。

我們历史教师对于馬克思繼承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經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学說加以革命的改造，从而形成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約略地知道一些的。对于列宁的話，有很多人是讀过的。对于毛澤东同

① “我們究竟拒絕什么遺產？”，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頁。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3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3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833頁。



志的文章，大家都讀過不只一次了。但我們歷史教師對於批判地分析各種文化成果的重視，一般是不夠的。高等學校歷史教材中的文化部分，總是質量較差的，歷史教師在這方面的講授也多感到信心不足。在思想上把磚頭瓦塊當玉器的人是有的，因潑脏水而不惜把盆子裏的孩子一起潑出去的人也是有的，但究竟是個別的。比較多的人，除了對這問題重視不夠以外，是感到力量不足。講中國史的人，包括老教師在內，對於中國學術名著的研究工作還沒有怎樣展開，這就難要求他們作相當深入的講授。甚至於對重要的史學名著，如“史記”、“史通”、“通典”、“通鑑”、“通志”、“文獻通考”、“文史通義”等，除了介紹書名、卷數、作者生平和著作體例外，很少能作到較多的分析。至於講外國史的同志們，因條件的局限更大，接觸外國史上各種名著的機會就還要少一些。解放以來，我國各方面的科學工作者和出版界在這個問題上是作出了一些成績的，其中也有優秀的作品或譯本，但我們教師一方面還不能都來得及加以充分地利用，另一方面也感到數量的不多和範圍的不廣，還不能更多地解決問題。

我個人的意見認為，為了在歷史教學中把批判地分析文化成果的問題較好地解決，提高師資水平是帶決定性的。提高師資水平的工作是多方面的，要視不同學校不同教師的具體情況而定。一般說來，充實現代知識，提高理論水平是必要的。其次，也一定要掌握材料。馬克思說：“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在下等動

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動物的征象，反而只有在已經認識了高等動物之後才能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為古代經濟提供了鑰匙。”^①毛澤東同志說：“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②這兩段話是對我們提高水平的很好的座右銘。此外，參加生產勞動，擴大教師的眼界，在可能條件下，讓他多參加社會活動和多跑一些地方，可能都是比較有效的辦法。對於業務有相當根底的教師，在他所教的基礎課程外，再搞一門專史如史學史、思想史等，或搞一些專籍講授的課程，並作出相應的文章，是比專搞一門近代史或古代史，就更易提高些。因為斷代史的面比較寬，需要更多方面的專業知識，如想對每一個專門部分都有相當深的了解，往往在時間和精力上有較多的困難。並且專從一個斷代來考察某一專門部分，也往往是很不充分的。當然，搞專門史也另有其困難，但在業務提高的成效上似可更有把握些。對於青年教師，及時掌握語文工具，很必要。無論怎樣，語文的学习是需要記憶力的，青年時期学习比較容易，年紀大了，總要差些。古文的学习还是需要的。我國傳統的作法，一個人要先讀熟幾十篇文章。這個辦法也是一個較有效的學習方法，是可以試試的。

在課程安排上，高等師範學校歷史系的課程過於注重綜合性的課程。中國的和

① “政治經濟學批判”，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3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3版，第801頁。



世界的古代、中世、近代、現代各史，加上亞非史，共九大塊，幾乎就是全部的業務課了。這樣設置的好處，是可以和中學課程設置相適應，同學畢業後當中學教師比較方便。但它有顯著的缺點，即接觸歷史上學術名著的機會比較少，與歷史有關的輔助科目學得比較少，專業學習的深度差而知識領域又比較狹窄。適當地減縮九大塊課時的總和，增加文學課程、專門史和專籍選讀，這也有利於同學對文化成果的了解。

古為今用的內容當然不只是闡明社會發展規律和批判地分析文化成果，但這兩種當然是最主要的內容而且是最艱巨的工作。

四 古與今的比重、先後、類比

伯贊同志的文章中還提到課程的古今比重、先後和古今類比的問題。厚今薄古固然不能簡單地理解作課程比重的問題，但課程的比重還是可以體現厚今薄古的。一方面在講授內容上都要貫徹古為今用的精神，另一方面在課程與課程之間有一個適當的比例也還是應該的。因為，無論如何，古代史講得太多，近代、現代史講得太少了，總不能說是重視近代、現代史的知識，而近代、現代史的知識究竟是對於今天更為有用的。這就是伯贊同志所說的“近代、現代史是我們當前的歷史，具有重大的現實的意義。”此外，還應該說，近代、現代史是比古代、中世史更豐富的。世界史在這方面的情形很顯著。近代、現代史上的

世界擴大了，密切了，複雜了，不只出現了高度發展的工業和科學，還出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國際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陣營。中國的近代、現代史的年代較短，但“五四運動以後二十年的進步，不但賽過了以前的八十年，簡直賽過了以前的幾千年。”^①內容還是很豐富的。伯贊同志說，近代、現代史“不應該為了湊足比例而把不必要的史實硬塞進去，如果過分的繁蕪就會把學生引進鬧市，其結果是使人目迷五色，無所適從。”因為我們對近代、現代史的研究工作，時間還太短，這種情況可能是有的。但這只是由於師資水平的問題。並不是由於近代、現代史本身的貧乏。也不一定要求每一個同學都按照完全相同的比重，進行學習。在必修課中，古今的比重是固定的。在選修課中，可以活動一些，只要有課程可學，某些同學也可以多學點古史。培養少數專搞古史的人還是可以的。至於有的學校把古史壓縮得過短，感到教學上的困難，那自然是不適當的。

目前在廠史教學中先今後古的安排，正如伯贊同志所說，是不合適的。由古而後的安排，一方面是符合歷史發展的順序，便於闡明歷史發展規律，另一方面也符合學生學習心理的發展順序，由低級到高級的順序和由簡單到複雜的順序。改變這一作法，困難大，效果較差。如果先講中國現代史，也還是要在開頭交代中國近代史的主要情況和世界形勢，既多占時間，又

^①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96頁。



交代不清楚，就不如从古到今地講下去。

历史教学上的古今类比是否錯誤，要看具体情况。如伯贊同志所指責的，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現在來比，而抹杀它們本身上的差异，这当然是錯誤的。但事情的性質类似而时代不同、条件不同，古今对比，分析其同异，在历史教学上也可以有很好的启发。例如把商鞅变法、楊炎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康有为变法，結合他們的时代进行同异的分析，把陈胜、吳广起义、黃巾起义、王小波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也都結合他

們的時代进行分析比較，恐怕都还是可以作的。伯贊同志虽不贊成古今类比，但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就用了好几个类比，不只是古今类比，而且是古今中外的类比。他的这些类比，也还是有用处的。問題不在于是否要类比，而在于如何去类比。

历史教学上的問題不只是古与今的問題。古与今的問題也不只是历史教学上的問題。因讀伯贊同志的文章，吸收同志們交談的一些意見，写这一点点出来，請伯贊同志和别的同志們指教。

1959, 5, 23



毛主席和煉鋼工人 (木刻)

宛英毅作



在“人民资本主义”幌子的背后

楊重光

在美国紐約城的华尔街上，有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它里面的一切动静象电波一样快地传到美国的各个角落和美国以外的很多地方。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証券市場之一——紐約証券交易所。

在这个交易所里，墙上的电动股票行情表上的数字不停地变化着。千百架电话机不停地发出响声，不少人在电话机面前大声吼叫，向各个股票掮客商人报告行情。人们的命运很快被这些数字决定了：有些人在顷刻之间倾家荡产，也有人突然在几小时内发了一笔横财。每天在这个市場上有几百万份股票买进抛出。拥有百万、亿美元的大企业的老板們，在这里兴风作浪、投机倒把。他們是这个大賭場幕后的牽綫人。他們壟斷着美国的經濟生活，他們也有权随时向白宮和五角大楼发号施令。尽管他們在美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然而他們却恬不知耻地为腐朽透頂的資本主义挂上一个“人民”的幌子。正是在这个証券交易所的边屋里，举行着一个所謂“人民資本主义”的展覽会。紐約証券交易所董事长凱斯·芬斯登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紐約先驅論壇报”上大吹大擂說：“自然，以前有过一个时期只有很少一

部分人拥有一个不太富足和比較简单的国家的生产資源。然而，自那时以后我們就逐步倾向于实行一种真正的‘人民資本主义’，各地有几百万人民（其中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属于中等）拥有美国企业中带投票权的股票。而且，購買股票的人还将繼續增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現所謂繁荣的假象的时候，资产階級政客、改良主义者和他們的“理論家”們，从思想上对工人階級进行猖狂的进攻，大肆宣揚所謂“人民資本主义”的謬論。他們說什么“階級斗争已經过时”啦！“階級合作的时代已經到来”啦！資本主义已經“民主化”啦！資本主义社会“不会发生經濟危机”啦！工人和資本家已經“完全平等”啦！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对立“已經消灭”啦！等等。他們这种“理論”的主要根据之一，据說是很多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都买了股票，因而已經“成为資本家的一部分”，資本主义就具有“人民性”了。

垄断資本集团为了镇压資本主义国家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从来就是硬軟兼施，双管齐下。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結束，就制訂了使美国法西斯化的網



領。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反劳工法。这个法律几乎完全剥夺了美国工人在三十年代中期所取得的基本权利。此外，美国统治集团还通过一系列反动透顶的法案，镇压美国工人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但是，他们知道单用暴力对付觉悟正在提高的人民，只会引起更强烈的反抗；因此，除了残酷镇压外，他们又加紧从思想上向劳动人民进攻。特别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日益壮大，社会主义越来越吸引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时候，他们更加想用一个美丽的幌子来遮盖烂得发臭的资本主义制度。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幌子。

当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美国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的时候，“人民资本主义”的谬论曾一度销声匿迹。最近美国工业生产数字有了回升，“人民资本主义”的调调又经过资产阶级的宣传机器高唱起来了。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第一花旗银行”，最近在好几家报上登出整页的广告，说什么一百家大公司有着上百万个登记的股东。广告用大字标题写着：“人民资本主义在实现中”。在美国做这种广告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这正象商人推销玻璃丝袜、香皂、牙膏都要大作广告、胡乱吹嘘一样，“人民资本主义”就这样被廉价地推销着。

其实，资产阶级老爷们所推销的这种货色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早在十九

世纪末，修正主义的老祖宗伯恩斯坦就提出过所谓“资本民主化”的“理论”，说什么在劳动人民中间推销小额股票可以使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可见这种鬼话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也出现过所谓“新资本主义”的狂热宣传，当时资产阶级政客们鼓吹：“福特已经把马克思打败了”，“阶级斗争结束了”，“同雇主积极合作增加生产是工人的‘解放之道’”，等等。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这些谎言被赤裸裸地揭穿了。

在今天的“人民资本主义”幌子的背后，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学者和研究机关对这个问题的言论和分析吧。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参议院说到关于股票分配情况，他说：“最近一次调查表明：第一，美国家庭中只有百分之七拥有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第二，股东中的百分之八却拥有这种股票的五分之四。看来占美国家庭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有了证券交易所全部股票的五分之四以上。”美国莱特·密尔教授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财阀”一书中说：“以为管理经济的权力能够真正分给广大人民，这是某些人故意造成的一种幻想”。据美国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布鲁金研究所”一九五二年的统计，美国拥有股票的人数有六百四十九万人，只占美国成年人口的百分之六。而拥有股票的非熟练工人只占千分之二，半熟练工人占百分之一四，



熟练工人和工长占百分之四点四。值得注意的是在制造业公司的全体股东中，百分之二点四的股东占有这些公司的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七；在财政金融和投资业方面，百分之三的股东占有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三；在交通运输业方面，百分之一点二的股东占有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五十六；在公用事业（电话、煤气、电力等）方面，百分之一的股东占有全部股票的百分之四十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密执安大学一九五七年调查了国内股票持有者的情况。根据调查结果，在五千六百一十万个美国家庭中，百分之八十九完全没有股票；百分之四有少于二千美元的股票，百分之二拥有二千美元到五千美元的股票，只有百分之二的家庭拥有超过一万美元的股票。美国经济学家巴迪什在“人民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百分之六的小股东的资本不超过五千美元，他们在管理大企业方面的发言权实际上同百分之八十九完全没有股票的居民一样。”作者又说“真正控制美国经济的是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美国大垄断资本摩根集团所属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将近有一百五十万个股东，其中绝大部分没有能力出席在纽约召开的股东大会，因为出席一次大会所需要的旅费比他们的股票价值大好几倍。这个公司的股东大会通常只是在容纳几十个人的小房间里举行的。垄断资本家所以允许工人买股票，只是企图用一些小恩小惠，使一部分工人特别是待遇比较优厚的工人死心塌地地为

「傑作」 作



一九五七年五月



他們服務。資本家因此却不許工人罷工，不許工人參加工會，不許工人進行保衛生活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鬥爭。他們製造一系列騙人的假象，來麻痺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使工人脫離階級鬥爭，分裂工人的團結。

美國工會的某些上層領袖在“人民資本主義”糖衣炮彈的襲擊下，被壟斷資產階級用巨額利潤的一些微小的零頭收買了，他們對“人民資本主義”搖尾乞憐。美國聯合鋼鐵工人工會主席大衛·麥克唐納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該工會一九五六年的年會上致開幕詞時說：“現在我們才算真正有了一種貨真價實的人民資本主義，它和老的反動的資本主義極不相同。它是一種我們可以引以自傲的資本主義。”這個對資本主義歌功頌德的工會官僚，和其他工會上層領袖們在一起出賣了一九五六年美國鋼鐵工人的大罷工。這一年的七月一日，美國十二家主要的鋼鐵公司（美國鋼鐵公司、伯利恆鋼鐵公司、共和鋼鐵公司等）六十五萬工人為了保衛生活權利而進行了為時二十七天的大罷工，這次罷工涉及到占美國全國鋼的總產量四分之三的鋼鐵企業。在工會領袖的出賣下，工會和十二家大公司企業主之間簽訂了三年不罷工的合同，資本家則同意工人第一年平均工資每人每小時增加一角零五厘，第二和第三年每小時各增加九分一厘。這個例子清楚地說明，壟斷資產階級破壞工人運動的手段是多麼毒辣。

資本家推銷“工人股票”也是他們進一

步剝削工人的一種方式。工人買了股票，一部分工資就通過股票的形式而回到資本家的腰包里去擴大再生產；資本家並沒有什麼損失，工人卻只能在很長時期以後才能拿到一些紅利，有時還不一定拿得到。譬如美國大壟斷企業“通用電氣公司”好幾萬職工每星期的工資要被扣去七角五分到十元美元購買有價證券，規定五年內由公司支配有價證券的權利，五年以後才拿到以這家公司的股票作價的利息。美孚石油公司甚至聲明，工人購買股票的資金“只有當職工們退休、死亡或因其他原因而停止工作時”才能歸職工使用。列寧在二十世紀初論述所謂股票占有權的“民主化”時，曾一針見血地說：“實際上它不過是加強財政寡頭實力的一種手段而已”。

“人民資本主義”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垂死的社会階級力量同新興的社会階級力量的尖銳的鬥爭，反映了帝國主義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銳的鬥爭。赫魯曉夫同志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莫斯科加里寧選區選民大會上，對“人民資本主義”作了深刻而生動的分析。他說：“資本主義的辯護人為了掩飾資本主義的反人民和剝削的本質，最近製造了不少關於‘人民資本主義’的神話。他們用各種調子歌頌似乎現在存在於美國和一些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里的‘人民資本主義’。這些人甚至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儘管他們實際上是資本家的應聲蟲和僕從。那些象集市上雜耍場



雇傭的招引顧客的人一樣的‘社會主義者’現在叫嚷說：人民資本主義是通往社會主義的真正道路。他們說，請看看，資本主義國家的職工現在變成象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那樣的資本家。他們有股票，現在有權稱為工廠和其他股份公司企業的主人。可是，那些上了當的工人和職員，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儲蓄購買了若干小額股票而成為股東，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主人’，實際上他們的情況究竟怎樣呢？當危機現象來臨的時候，真正的主人就揪住這些‘主人’——股東的耳朵，把他們從那些有他們股份的企业中拋出去了。股東變成了幾百萬失業大軍中的一員。於是輪到這種‘主人’來殷殷期望：也許他有幸重新獲

得工作，也許他自己不致餓死和使他全家陷入絕路一條。有多少這樣的‘主人’參加罷工去反對工廠主、反對剝削階級和所謂‘人民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啊！這難道不是一個實例，足以說明資本主義思想家和修正主義者是多麼虛偽啊！”

紙是包不住火的。壟斷資本集團企圖用“人民資本主義”這件“美麗”的外衣掩蓋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不過是枉費心機。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帶給勞動人民的沉重的災難，使他們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實在並不美妙。“人民資本主義”這個“神話”，在冷酷的現實面前，不得不破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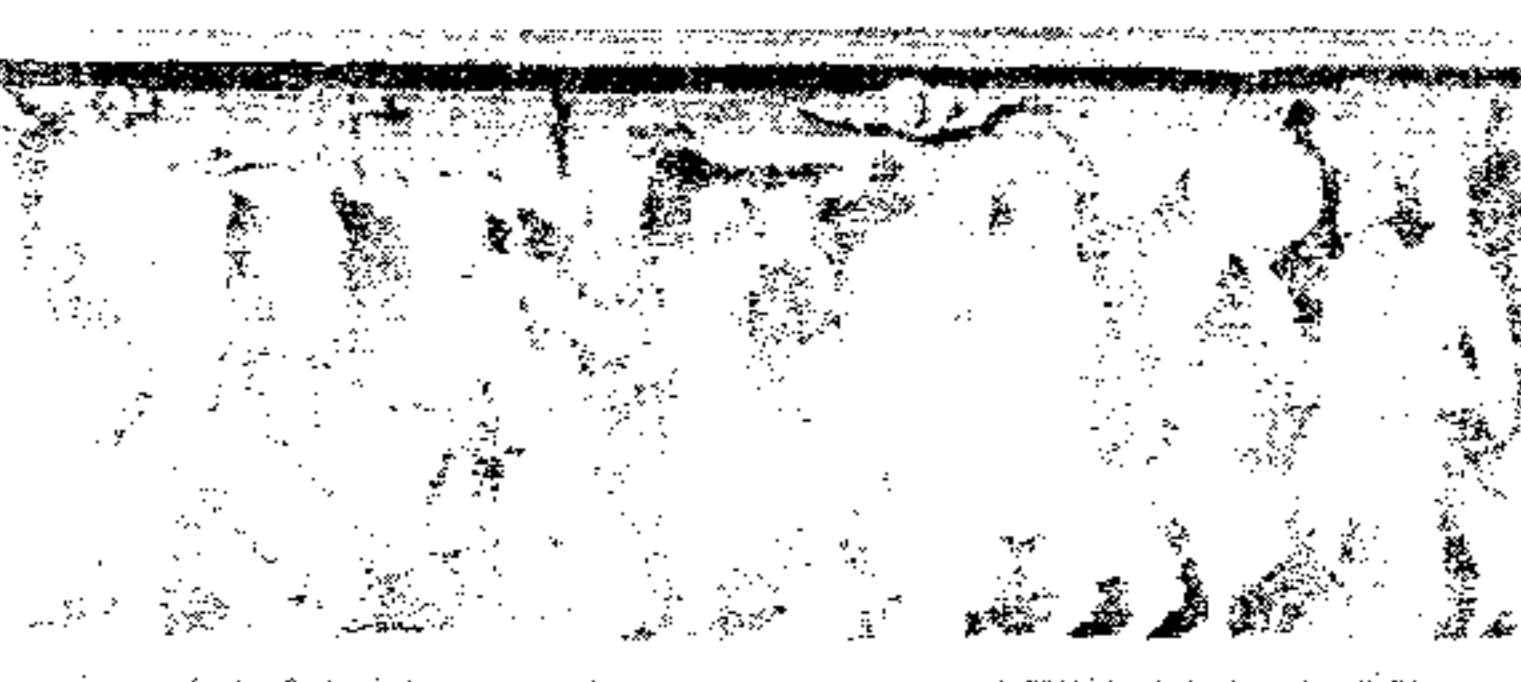
馴服黃河（木刻）

李禪作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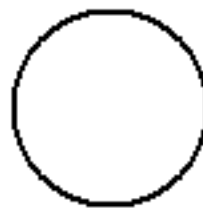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二期 ★

目 录



领导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曾希圣(1)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生产的关系 冀育之(9)

指标要切合实际 许辛学(18)

关于写文章 施东向(21)

治水工作的辩证观点 李凡夫(23)

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 邓 拓(30)

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 胡 钧(38)



领导农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安徽省农业生产的经验

會 希 圣

农业生产是党领导广大农民与自然界作战，向自然界索取财富的斗争。这个斗争极为复杂，而且强烈地受着自然界的影响。在农业生产中，要遇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土质，不同的作物，不同的气候。农业生产几乎与所有科学部门都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直接参加农业生产战线的人，在我国，包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而且战线极为分散。从农业生产受自然界的影响来说，一般农作物都怕旱怕涝，怕风怕雹，怕霜怕冻，怕虫怕病。而从我们本身的条件来看，技术还很落后，既少化肥、农药，更少农业机械。另外，为了团结全体农民积极向自然界作斗争，还要不断调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过程和其他共同活动中的关系。所以，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财富，使农业生产取得高速增长的增长，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提出“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同时，对农业生产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和措施，使我们在农业生产中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基本原则，抓紧抓好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性问题，以保证农业生产继续不断的大跃进。

从安徽的情况来看，凡是能够正确地全面地贯彻这些基本原则，抓紧和抓好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性问题，农业生产的增长就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十。不仅在正常年成能够增产，而且在一般的有灾年成也能增产。根据安徽几年来的实践，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經驗，我们认为要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大跃进，必须抓紧抓好以下四个问题。这就是：战胜自然灾害，挖掘自然潜力，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战胜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农业生产的大敌。在作物生长期間，一旦遇到灾害，如果不能有效抗御，那就会造成减产，甚至失收。安徽是一个多灾地区，对此我們体会更深。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六年的涝灾，都是在十天左右，一九五二年淹毁庄稼一千五百多万亩，一九五六年淹毁三千六百多万亩。一九五〇年及一九五四年的洪水，都是在七天左右，一九五〇年淹没庄稼三千多万亩，一九五四年淹没五千多万亩。一九五八年的旱灾，六、七、八三个多月不雨，受旱面积达六千多万亩。一九五三年的霜冻，在一个早上，冻坏麦子三千多万亩。一九五六年的风灾，高秆作物全部刮倒，中稻落粒严重。其他虫灾、病灾、雹灾每年都給我們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損害。事实很明显，如果不克服可能克服的灾害，防止可能防止的灾害，农业增产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特别是象安徽这种多灾地区，首先要抓紧的問題，就是战胜自然灾害。

只有战胜灾害，才能保卫劳动果实，这是容易理解的道理。但怎样才能抓紧和抓好这一工作呢？根据几年来的实践，我們深深感到，与自然灾害作战是一场十分浩大、十分艰苦的斗争。首先，应该在全党全民中树立起不屈不挠的斗志，不如此就不能长期坚持战斗。其次，要研究出簡便易

行、人人能作的办法，不如此就不能达到花力少、收效快的要求，就不能在灾害侵犯的情况下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也就不能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我們是采取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要求的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以治水为綱。安徽水灾最为严重，不消灭水灾，农业生产就不能得到保障。随着水灾的消灭，就可克服旱灾，克服了旱灾，即可減輕伴随旱灾而来的虫害和病害，又能根据气象预报，进行霜前灌溉，防止或減輕霜灾。这两年的霜冻沒有引起较大危害，就是由于进行了霜前灌溉，增加了地面温度的結果。水害是各种灾害当中的主要灾害，消灭了主要灾害就可結合防止許多次要灾害，所以应以治水为綱。当然，治水斗争也应实行簡便易行、花力少、收效快的原則。我們在治水方針上采取以群众自办为主，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要的道理，就在于此。

第二，是防治結合，以防为主。防患于未然，不仅能节省扑灭灾害的劳力和費用，而且更利于作物的生长。对于目前还不能控制的灾害，如油菜毒素病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灾害(台风、冰雹、霜冻等)，固然要大力作好預防工作，就是对那些可以消灭的病虫害，如豌豆象、綫虫病等，也应在全力将其歼灭之后，防止其死灰复燃。当然，預防还是相对的，所以必須防和治相結合。但治也要事前做好准备，才能治得及时，治得有效。今年的麦锈病



沒有蔓延，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事前做了防治的准备。

第三，是利用作物特性，抵抗灾害。作物的特性，有的耐旱，有的耐涝，有的抗病，有的抗虫。作物的这些特性，应该很好利用。几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在湖洼地区，改种了水稻和其他耐水作物；在丘陵易旱地区，把水稻改成旱粮；为了抵抗小麦吸浆虫和锈病，普遍推广了“南大2419”品种；为了抵抗油菜毒素病，正在推广“胜利”油菜。所有这些，都是利用作物特性来抗御自然灾害的有效措施。

第四，是利用作物生长季节，避开灾害。安徽很大一部分地区，在七、八、九月份往往非旱即涝，对农业生产威胁很大。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办法是增加夏收作物和多种早稻。因为这样做就可避开不利季节，争取在气候比较平稳的季节里多收粮食。这个办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付病虫害，因为一般农作物的病虫害都有它一定的流行季节，把作物的生长期同它的危害期先后错开，就可以减轻受害程度，甚至完全避免灾害。

第五，是用改善耕作方法来防御灾害。如深耕以保墒防旱，作畦田、台田以防涝防旱，挖排水沟以防渍防病，“烧包子”（是安徽农民习用的一种熏肥方法）积肥以除虫等等，都可以抵抗和减轻自然灾害。

从安徽的情况来看，自然灾害虽然严

重，但战胜自然灾害的办法是很多的。只要把这一工作抓紧抓好，在一般有灾年份仍能增产，这一论断已为许多有灾年份的增产事实所证明，更为一九五八年在干旱情况下仍能大跃进的事实所证明。

挖掘自然潜力

要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不仅要战胜自然灾害，而且要充分挖掘自然潜力。战胜自然灾害主要是保收问题，挖掘自然潜力，是进一步提高产量问题。只保收而不能进一步提高产量，农业增长速度，仍然是缓慢的。所以，挖掘自然潜力，是领导农业生产必须抓紧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农业生产的自然潜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天力，如日光、温度、空气；二是地力，如土壤、水分；三是物力，如肥料、种子等。要把这些潜力挖出来，就是要想尽办法，把它们效能尽可能地加以利用，不白白地浪费掉。古语说，“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就是这个意思。怎样才能把它们利用起来呢？我们认为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多种。办法是提高复种指数，扩大播种面积。因为这样做，就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就可以充分发挥日光、温度、土壤、水分的效能，达到增产的目的。有人认为，提高复种指数会“剥削”地力，这种想法是不全面的。虽然，由于提高复种指数，会多吸取土壤里的一些养分；



但如果实行秸秆还田和增种绿肥，那就不是“剥削”地力，而是增加地力了。有人认为，提高复种指数和扩大播种面积是一种过渡的办法，在达到高产以后就不宜这样做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还值得考虑。因为提高复种指数是提高亩产的有效办法，只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量之后，才能更好地实现“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在高产以后扩大播种面积，仍然需要，或许那时可以考虑少种粮食而多种其他作物罢了。当然，提高复种指数是有困难的，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例如，利用作物的成熟早迟，安排好“茬口”，就可错开播种时间，解决劳力的紧张；利用快速育秧争取早播早收，就可腾出土地增种晚秋作物；利用育苗移栽，就可错开土地的使用，争取季节。麦茬棉过去收成不高，人们不愿种，自从改成营养钵育苗移栽以后，收成与春播相等，麦茬棉的种植面积就大大增加了。所以只要我们想办法，土地的利用率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今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我们还应该使它进一步提高。

第二，实行合理密植。密植的作用就在于增加单位面积内的作物总株数，以充分利用土地和日光的效能。但密植必须合理，“不可太稀，不可太密”，应该“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我们认为，密植

程度的主要标准就是在作物成熟以前，还能通风透光，否则就不是发挥自然潜力，而是妨碍对自然潜力的利用了。间种或混种，是密植的另一种方法。禾本科作物和豆科作物间种或混种，禾本科作物可以利用豆科作物的根瘤菌所制造的氮肥。矮秆作物和高秆作物间种和混种，矮秆作物可以吸取从高秆作物中间透过来的阳光。这种办法只要搭配得当，都能发掘自然潜力，都能显著地提高作物的亩产量，而且这种办法在群众中早有习惯，只要抓紧抓好，是容易推广的。

第三，改种高产作物，选用优良品种。高产作物和优良品种的根系对养分的吸收能力强，茎叶对日光能的利用率高，所以能更有效地利用自然条件，达到增产的效果。如淮北改种水稻，就可比黄豆、高粱增产到几倍。在同样栽培条件下，优良品种比普通品种一般可以增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高产作物的优良品种，增产潜力更大。同一作物的优良品种，特性常不相同，有的早熟，有的迟熟，有的耐肥，有的耐瘠。只要我们吧品种的性能搞清楚，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就可以挖掘不同环境的生产潜力。

第四，发挥水、肥效力。水分是作物的“血液”，肥料是作物的“粮食”。要发挥水、肥的效力，关键在于开源节流、合理使用。安徽由于塘坝、水库、河网的兴建已蓄水不少，目前极需改进的是灌溉方法。如水稻的浅水勤灌和湿润灌溉，旱作的沟



灌、畦灌等等，不仅能节省用水，而且又适合作物的需要。几年来群众所创造的积肥十字诀（熏、烧、挖、换、扫、筛、温、堆、拾、捞），已初步解决了农业大跃进对肥料的需要，但目前肥料还是不够的，今后要特别抓紧的是进一步用种、养、制三个办法来挖掘肥源。种，就是多种绿肥。养，就是多养家畜家禽，多积粪肥，并养水生动物（如螺蛳、蛤蚌、草虾子）作肥料。制，就是制造化学肥料和细菌肥料，以增加肥料数量和提高质量。在目前肥料不足的情况下，不仅要抓紧制肥积肥工作，同时还要强调合理用肥，如秧根沾肥、带肥下种、看苗追肥、“烧包子”、叶面喷肥等办法，都可以使少量肥料发挥最大肥效。这些节约肥料的办法，应该大力推广。对那种把过多的肥料集中使用到一块田里的浪费作法，应该加以改变。

第五，精耕细作。精耕细作，是全面贯彻“八字宪法”所必须采取的一个根本办法，它的作用是使各种自然潜力的发挥和利用互相协调，以适应作物的生长。这需要有一系列的栽培技术，必须认真抓紧。经验证明，耕作愈细致，管理愈得法，就愈能发挥自然潜力，愈能提高作物的产量。所谓“多加一分工，多收一成粮”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自然潜力是无穷的，指导农业生产的任务，就在于把挖掘潜力的办法不断发展和提高。

認真解决劳动力不足問題

不論是战胜自然灾害，或者是挖掘自然潜力，以及其他各种生产事业，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实现。

目前的情况是：农业生产技术条件还比較落后，几乎全部是手工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就必然发生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因此必須認真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則就会使生产跃进计划受到影响。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据目前情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

第一，要合理分配劳动力。对劳动力的使用，如果听其自流，或分配不当，都会产生此多彼少，余缺不均，一边浪费，一边过分紧张的现象，所以必须进行合理分配。合理分配的原则是统筹兼顾，保证重点。但兼顾一般与保证重点是有矛盾的，往往保证了重点，就忽视了一般，兼顾了一般，又影响了重点。同时，重点与重点也有矛盾，保证了这个重点，又可能影响那个重点。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提出了首先解决各种生产计划之间的相互矛盾（如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林、副、渔、牧业，与服务业，与水利建设等等），再按计划制定各种劳动定额，进行分配。事实证明：凡是这样作了的，结果都比较好，既可避免因互相牵扯造成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又可使工、农、林、副、渔、牧互相竞赛，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第二，要合理布局。布局合理，就能大大节省不必要的劳动支付。例如：調整了插花地，就能够减少往返，增加劳动時間；合理安排社办工业、副业和經濟作物的生产場所，就可以便利产品、原料的調运；合理設置收購点、供应点和仓库，就可以縮短調运距离，消灭重复运输和便于群众購買；合理安排作物“茬口”，就能錯开农活時間，避免忙閑不均；合理安排农活，把能提前做的农活尽量提前，能推后的农活尽量推后，就可以集中主要兵力，用于主攻战綫；合理积肥、蓄肥和用肥（就地积肥，远地多上細肥，近地多上粗肥），合理安排木材生产（冬春砍伐，夏秋运输），都可节省大量运输力量。总之，在农业生产上只要精打細算，做到合理布局，对节省劳动力的效果是很大的。

第三，要合理組織劳动力。这就是說，要把一切能够劳动的人組織起来，在生产中实行合理分工和合理协作。劳动力組織得好，四个人可以起五、六个人的作用；組織得不好，四个人起不到三个人的作用。合理組織劳动力的任务，首先在于解决劳动力与农活的关系。对劳动力强的人要分配重活，劳动力弱的人应分配輕活；对經常性和技术性較高的农活，要固定专人负责。对季节性較强的农活，除組織临时队伍进行突击外，还要尽可能組織附近农活不忙的劳动力进行协作，以閑济忙，或者組織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进行支援。对大面积的农活要集体干活，对零星的农活，

应包工到戶。其次是解决劳动力与工具，劳动力与場所，工序与工序之間的互相关系。使工序与人数相称，不发生缺此缺彼的現象，使場所与操作相适应，不发生拥挤現象，使工序与工序相銜接，不发生等待現象。只要把这些解决得妥当，劳动力就能大大节约，劳动效率就能大大提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問題，特别是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应把它当成生产中的一門科学，經常进行研究和討論。

第四，要逐步进行工具改革。在目前这是提高劳动效率的中心环节。每一項成功的工具改革，都能提高工效一倍到几倍。如滑車运土器比人工挑抬效率提高六倍，封閉式水車比旧式水車效率提高两倍。事实証明，改革工具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大、最有效、而且又能降低劳动强度的好办法，必須認真抓好这一工作。首先要抓重点，也就是抓住那些生产上迫切需要、制造容易、能够节约大量劳动力的工具，加以改革，如播种、收割、提水、运输、加工等工具。在工具改革中必須抓重点。根据我們的經驗，要把工具改好，必須使机器厂的技术人員和农村中的鉄木匠相結合，前者有制造現代工具的技术，后者有长期制造农具的經驗，彼此共同研究，容易做出較好的工具。在推广改良工具之前，要反复进行現場試驗，証明确实可用，才能推广，否則必然造成浪費。在推广新式工具中，还必須加强技术传授，使群众会用会修。只有这样，才能使



新式工具迅速推开，才能发挥新式工具的作用。

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根本办法，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肥料化学化。对此我们必须根据需求和可能，逐步实行；但要完全实现，这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不能坐着等待。在目前，劳动力虽然很紧张，但只要我们认真研究，切实抓紧，从多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劳动力不足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要战胜自然灾害，挖掘自然潜力，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这一切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群众没有积极性，就不会有干劲，就不可能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打胜仗。所以，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领导农业生产必须抓紧抓好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现在农村已经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这种先进的制度，为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这种优越性仍要靠人去发挥。同时，人民内部存在着的矛盾，仍然需要我们正确地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因此，要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还决定于我们工作做的好坏。

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既不能靠空洞的口号，更不能靠强迫命令的方法。最主要的应当是，依靠不断地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依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因为只有如此，才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种局面，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大大地提高生产积极性。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认为必须抓紧抓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不断地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加强政治工作。只有加强政治教育，才能提高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只有觉悟提高，才能使群众懂得集体事业的发展才是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自觉地维护集体利益，为集体事业的发展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只有觉悟提高，才能使群众明确奋斗方向，看清幸福的将来，为更远的理想而奋勇前进。只有觉悟提高，才能使群众认识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充分地发挥积极性，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英勇奋斗。

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做好政治工作，同时，也要对个人给以物质利益的关怀。只有物质利益的关怀，而不做政治工作；或者只做政治工作，而没有物质利益的关怀，这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第二，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政策。党的政策都是从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大量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只有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政策，才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如果在执行政策时发生



偏差，不仅不能調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会損害群众的积极性。比如，包产指标偏高，以致无产可超，或者过分偏低，鼓不起干劲；积累与分配的比例，不分穷队富队，一律照規定生搬硬套，使穷队社員减少收入；实行密植，認為越密越好，以致作物生长不良；过早地实行“三三制”，减少土地利用，把明天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办，以致减少产量；抓生产就不抓生活；談鼓足干劲就不注意休息；談破除迷信就不尊重科学。所有这些偏差，都会影响群众的积极性。

要做到正确地全面地貫徹党的政策，防止偏差，一方面要認真学习党的政策，真正做到学全学透；一方面要深入实际，摸清情况，老老实实地反映情况。但也不能說由此就不会发生偏差了，一些小的偏差总是难免的，领导的責任在于及时发现它，及时糾正它。领导的艺术在于既能严肃地糾正偏差，又能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第三，要坚持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这是調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根本关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群众路綫問題对于干部來說，不单是一个根本的工作方法問題，而首先是对待群众的根本态度問題。應該認識到，在一切工作中必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員，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在一切場合都必須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現。只有从这一根本态

度出发，才能做到遇事和群众商量，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認真地种好試驗田，通过参加生产，来领导生产。运用任何一种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都必須以正确的群众观点为前提，如果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就不能貫徹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能收到調动群众积极性的效果。

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的問題，也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問題。一切工作，一切措施，都应当以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証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总的來說，要抓紧抓好农业生产，关键在于学习，在于調查研究，在于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規律。正象过去的革命战争一样，我們所以能够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战胜了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力量，正是由于我們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掌握了战争規律。現在与自然作战，尽管我們的技术条件还比較落后，但是只要掌握了它的規律，充分发挥我們的主观能动性，就一定能够繼續跃进，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生产的关系

龔育之

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自然科学工作占有重要的地位。为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是我国自然科学工作的根本方針。根据馬克思主义的原理，闡明自然科学同生产的相互关系，闡明自然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生产实践，又反过来指导生产实践，就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全面地理解上述的根本方針。我們必須反对脱离生产实际、为科学而科学的傾向；同时，要注意在以首要的力量从事于解决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科学技术課題的时候，对理論的研究工作和滿足长远生产需要的研究工作，給以足够的重視。

自然科学的发展 对生产的依賴关系

自然科学是人对于自然規律的知識，人依靠这种知識，按照自己的目的来进行改造自然界的活動。毛澤东同志說，“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赖于物質的生产活动，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与自然的关系”^①。他又說，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識的結晶。因此，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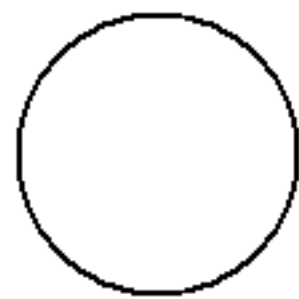
生产的依賴关系，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根本的規律性。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生产的依賴关系，我們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 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知識的源泉，是檢驗自然科学知識的标准。生产的发展給自然科学提供日益丰富的研究材料，开辟日益广闊的研究領域。

实践是一切知識的来源。人对于自然規律的知識，来源于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来源于生产斗争的实践。在古代，当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經驗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便获得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識。古代的自然科学，差不多是完全以直接的生产实践的經驗，以及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为基础发展起来，并且在生产实践中进行檢驗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生产的巨大发展。在近代生产实践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兴起了近代自然科学。在近代自然科学中，逐渐发展并大量运用了实验方法，扩大了自然科学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71頁。



的实践基础。但是,直接的生产实践,仍然是自然科学知識的重要源泉、檢驗自然科学知識的重要标准。广大的劳动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創造着和改进着生产技术方法,对自然界和生产过程进行着細致、深入和广泛的观察与了解,不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生产經驗。总结这些經驗,对于发展整个自然科学,現在仍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生产实践是人的認識活动中的一个极为活跃的因素。它經常是突破自然科学中的陈腐观念,推动自然科学前进的根本动力。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生产者获得了經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彻底解放以后,表现得最为明显。斯大林根据苏联在这方面的經驗,曾經反复強調:“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过时旧物,却很仔細傾听实践經驗的呼声。”^①“有时候,开拓科学和技术新道路的,竟不是在科学界著名的人物,而是在科学界全不著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实践家,工作革新者。”^②我国去年大跃进以来,在农业、工业、医疗等方面的許多实践的成就和发明創造,打破了不少科学上的陈腐观念,这些事实十分生动地表明了生产实践在推动自然科学前进中的巨大作用。

自然科学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但生产实践的經驗并不就是科学。自然科学要把生产实践的經驗加以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論,然后反过来用理論来指导生产

实践。自然科学理論指导生产实践又为新的实践經驗所修正、丰富和发展,然后在更高更广的角度上来指导生产实践,如此往复不已。这就是自然科学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道路。

生产的发展不仅給自然科学提供丰富的实践經驗,而且提供日益丰富的研究材料。自然科学从整个自然界中取得自己的研究材料。但是,自然科学并不是脱离生产实践来靜观地研究自然界,而是首先从生产实践中来研究自然界,研究人在生产活动中所改造的自然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材料,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日益扩大和丰富起来的。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十五世紀以来的欧洲,工业巨大地发展起来,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紡織、鐘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透鏡制造)新事实,这些新事实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近代力学、化学、物理学便是在研究由于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材料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

由于生产的发展,人的活动領域也越来越扩大,人所接触的自然界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十五、十六世紀地理上的发现,为当时的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

^① 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16頁。

^② 斯大林:“在克列姆林宮招待高級学校工作人員时的演說”,“列寧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0頁。



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前所未有的材料。只有在这样广大范围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后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才有可能产生。现在,人类正向宇宙空间跨出了第一步。随着人类日益征服宇宙空间,自然科学只能从地球上获得研究材料的局限性将被大大突破。可以预计,从宇宙空间将要获得的大量材料,会把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 生产的状况决定了自然科学研究的物质技术条件。

正如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进行生产,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使用什么样的仪器设备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没有望远镜就没有近代天文学。没有显微镜就不可能发现细胞和细菌,也就不会有近代生物学和医学。而望远镜和显微镜最初都是透镜制造业的产物。现代各门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更是取决于许多复杂而庞大的实验技术设备。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所需要的强大的加速器,要用数万吨重的电磁铁和其他极复杂的电气工程和无线电工程的部件,以及每秒能抽出空气几万公升的强大抽真空设备。高空和宇宙空间的研究所需要的人造卫星和火箭,更要有冶金工业、无线电工业、高能燃料化学工业和计算技术等一系列生产技术的高度发展。除了这些尖端部门以外,几乎现代所有各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都日益以各种电子学仪

器、光学仪器装备起来。技术科学各部门往往需要建立相当规模的实验基地。适应着这种需要,现代工业中甚至分化出了专门生产供科学研究用的仪器、设备、试剂、特殊材料的部门。

(三) 生产的需要是推动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恩格斯说,“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往后越来越是自然知识进展的主要动因”^①,“如果说,象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状况却就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了。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②恩格斯是从对自然科学发展历史的分析中得到这个结论的。他指出,古代天文学最早由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定季节的需要而产生;古代力学由于手工业发展、航海和战争的需要而产生;古代数学也是从丈量地段面积、衡量器物容积、计算时间等实际需要中产生的。他还指出,整个液体力学是由十六和十七世纪意大利治理山洪的需要所引起的;对于电,只有从电在技术上有用的性能(电池、电解等)被发现时起,人们才得到了一些合理的概念。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材料:十七世纪机器的应用,刺激了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95页。

② 恩格斯:“致亨·施塔尔肯堡”,同上书,第504页。



近代力学的发展；金属生产发展的需要，使化学转向矿冶事业而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蒸汽机的应用和提高热机效率的追求，促使热学的迅速发展；近代力学、特别是研究运动状态的力学的需要，又推动了变量数学和函数概念的产生，开辟了高等数学的新阶段。生产的需要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是十分明显。例如，航空工业和火箭发展的需要，推动空气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迅速发展；利用原子能的需要，促进原子核物理学、放射化学、放射生物学的巨大发展；新技术对于具有特殊性能的材料的需要，引起了对稀有元素及其合金的研究；雷达、通讯和自动控制的需要，推动了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和化学、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发展；技术和物理上的需要，成为计算数学、概率论、数理逻辑等一系列数学部门发展的动力。

当然，自然科学并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生产的需要。自然科学满足着生产实践中提出的需要，同时，它又以自己的发现为解决生产需要开辟新的途径，引起新的生产需要。例如，首先是自然科学研究清楚了电磁现象的规律，发现了在技术上利用电能（发电机、电动机）的可能性，然后才引起了在生产中运用电能的需要。又如，首先是自然科学研究清楚了原子核反应的规律，发现了在技术上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然后才引起了在生产中运用原子能的需要。这两个例子的情况，同热能研

究的情况便稍有不同。在热能研究的情况中，首先是生产中运用了蒸汽机，由于提高热能利用效率的需要，推动了自然科学关于热能转换规律的研究。但是，无论是电学的研究，还是原子的研究，它们都是因为初步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在生产中应用的端倪，然后才在生产的需要的强烈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例子并不是否定了，而是恰恰证明了生产的需要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这一根本原理。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生产的依赖关系的各个方面，简单的分析便是如此。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生产的依赖关系这样一个根本的规律性，是由马克思主义最彻底、最充分地加以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这个原理，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理解整个自然科学历史的钥匙，而且帮助我们自觉地遵循和运用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来正确规定我们现在自然科学工作的目的、任务和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生产的大跃进，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给予了极巨大的动力，提出了极迫切的要求。自然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必须密切联系生产实践，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必须积极地解决经济建设提出的各种科学研究任务，满足生产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必须反对脱离生产实际、为科学而科学的倾向。这便是我们应当作出的结论。



自然科学的发展对 生产的相对独立性

在分析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生产的依赖关系的时候，我们还应当看到，自然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还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当然，自然科学发展对于生产发展的独立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首先要强调自然科学发展对于生产的依赖关系，强调生产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它决定着自然科学发展的趋势、方向、速度和限度，即决定着自然科学发展的总进程。下面我们根据这个基本观点，仅就科学实验的作用和理论研究的作用这两个问题，对自然科学发展对于生产的相对独立性，作一点简单的分析。

（一）关于科学实验的作用问题。

社会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认识活动首先是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但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毛泽东同志在提到主要的几种社会实践过程时，在物质生产过程和阶级斗争过程以外，还提到了科学实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一种重要方法。自从近代自然科学中运用了实验方法，自然科学就开始不仅从生产实践中、从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中获得材料和经验，而且还从实验室里获得材料和经验，从而大大扩大了自然科

学认识活动的实践基础。在实验室中，人们处理的是人所控制下的自然过程，或简化了的、缩小了的生产过程；人们撇开了所研究的现象中的一些偶然的、次要的因素，控制着一些因素，变化着一些因素，增添一些因素，减掉一些因素，从而对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而在自然条件或生产条件下，各种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这种分析、比较和综合有时便难于进行。在实验室中，人们创造了许多特殊的自然条件（如特殊的高温、高压等等），研究着在地球表面的自然条件下没有的、或不常有的自然过程；人们运用了各种大大扩大了人的感官能力的研究工具；人们还利用了一些比较方便的实验材料（如利用繁殖很快的生物来研究遗传现象），等等。这样，人们在实验室中，取得了大量的材料和经验，这是从生产实践和直接观察中得不到或不易得到的。这就使得自然科学有可能凭借实验室中的材料，超过生产实践所提供的材料基础，走到生产实践的前面，更深入地进行理论研究，揭示自然的规律，为生产开辟新的途径。由此可见，实验方法在帮助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于生产实践获得更主动的地位，获得较独立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各门自然科学同生产实践联系的情况不一样，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不一样，理论发展成熟程度不一样，以及实验方法发展水平不一样，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在各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例



如，在現代物理學中和在農業科學中，科學實驗和生產實踐的作用便是不一樣的。隨着實驗方法的進步，作為一個总的趨向來說，科學實驗的作用總是愈來愈大的。

當然，我們不能把科學實驗同生產實踐對立起來，脫離開來，而是應當把它們聯繫起來，看到它們之間的互相補充、互相發揮與互相促進。那種以為有了科學實驗，自然科學便無需依賴生產實踐了，生產實踐對自然科學便沒有什麼意義了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無論如何，科學實驗只是研究的方法，不是研究的目的。自然科學的研究，連同它的實驗方法，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服務於生產實踐。科學實驗只是擴大了自然科學的實踐基礎，決不能排除生產實踐成為自然科學的唯一的實踐基礎。從少數的實驗中得到的經驗和材料，決不可能完全代替從大量的、十分複雜的生產實踐中得到的豐富多樣的經驗和材料。從實驗中得到的知識，當它運用到複雜的生產過程中去的時候，還需要由生產實踐的經驗來復核、豐富和發展；把生產實際情況簡化了和縮小了的實驗室的研究，還要同中間工廠的試驗研究、同生產現場的研究結合起來。而科學實驗水平的發展，歸根到底，又取決於生產的發展，取決於生產所提供的物質技術條件。

（二）關於理論研究的作用的一些問題。

認識有待於深化。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由經驗積累上升到理論概括，

由較低程度的理論概括上升到較高程度的理論概括，由零散的知識上升為概念和理論的系統，這是認識活動逐漸深化的過程。自然科學中有些理論概括程度較高、範圍較廣的研究工作，看來似乎並不與這項或那項具體的生產需要發生聯繫，似乎只是為了理論本身的需要，理論的系統化、理論基礎的闡明的需要。例如，門捷列夫關於化學元素周期律的理論概括工作，並不是為了解決某一項具體的生產需要而進行的，它的直接目的是滿足教學上的需要——將化學知識系統化以便對學生作最清晰的闡述。但並不能因此便認為這種理論概括工作是與生產實踐無關的。首先，理論概括要以足夠的材料積累為前提。正是在生產需要的推動下，在生產發展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某些自然科學部門才逐漸積累起足夠的材料，產生了進行理論概括的必要與可能。只是由於冶冶工業、化學工業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化學在這些生產的需要的推動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積累了足夠數量的關於化學元素的知識的時候，化學元素周期律這樣一個巨大的理論概括才有必要和可能。門捷列夫是在一八六九年作出周期律的理論概括的，那時化學中已經積累了約六十種元素的知識（自然界存在的元素約九十種）。在十八世紀便不可能作出這個理論概括，那時化學中知道的元素不過十幾種。其次，理論概括雖不是直接為了滿足這項或那項生產的需要，但它使人對於自然規律的認識大大深



入一步，从而对于生产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門捷列夫关于周期律的理論概括，成为现代化学和物理学的基础，至今在原子能利用，半导体技术，寻找和利用矿产资源(地球化学)，制造在新技术上特殊需要的金屬和合金材料(稀有元素化学)等重要方面，都具有理論指导的作用。

理論概括的过程，是一个認識活动內部矛盾发展的过程。这里包含着新的事实和旧的理論、概念、假設之間的矛盾，解释着这一些事实的理論、概念和解释着那一些事实的理論、概念之間的矛盾，解释着同一些事实的不同理論、概念之間的矛盾，等等。理論的发展便是通过这些認識活动內部矛盾的不断揭示和不断克服来实现的。認識內部矛盾发展的需要，推动人們去研究那些为現有理論所不能解释的新事实，去发展新的理論来解释这些事实。这些新事实的研究并不一定直接与这项或那項生产的需要相联系，但它是認識內部矛盾的焦点，解决这个矛盾便能把認識大大推前一步，因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例如，量子理論便是从研究黑体輻射能量的頻率分布这个令人寻味的为旧理論所解释不了的事实中誕生的。新理論的誕生成为物理学的新阶段的起点，人对自然的認識开始从宏观的領域推进到微观的領域。今天的新技术的奇迹，不論是原子能还是半导体的应用，离开这个由此发軔的新物理学，都是不可思議的。

在理性認識阶段，推理过程是一个重

要的認識过程。从现有的理論和概念出发，經過邏輯推演或数学推导，經過各种理論和概念的交相接触，人們可以获得新的理論、預見新的事实。当然，推理过程并不是与实践无关的，它必須以实践为基础。因为，作为推理的出发点的現有理論和概念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推理所依据的邏輯或数学規律也是从实践中概括出来、反映了客观事物間的关系的。特別重要的是，从推理中得到的結果，必須到实践中去檢驗，去証明或推翻。例如，第一个反粒子(正电子，即同普通的带負电荷的电子相反的、带正电荷的电子)的存在，便是由于把相对論概念引进量子力学中，建立了描述电子行为的相对論量子力学方程，然后从这个方程出发，經過理論推导而預見出来的。这个預見在当时甚至显得是不可理解的。但后来相繼在实验室中和宇宙綫中发现了正电子，这就从实践上証明了理論預見的正确。罗巴切夫斯基几何的建立，是理論推导作用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从理論上探討欧几里得几何的基础(公設系統)的过程中，罗巴切夫斯基取消了欧几里得几何的第五公設(即通过一点对一綫只能作一条平行綫的公設)，然后从理論上推导出了第一个非欧几里得几何系統。从非欧几里得几何中得到的結論，許多在当时也是显得不可理解的。但是，新的几何系統后来在相对論中得到应用，并且在天文学的觀察材料中得到了檢驗，这才証明了它的确是客观世界的空間形式的反



映,而不是純粹的虛构。这样,由于在物理学中应用的需要,它就大大发展起来。在这里有一个事实的对比,很足以說明实践对于从推理中得到的新理論的发展的决定作用,这就是:从推理中得到的非欧几里得几何,由于实践的証明和实际应用的需要而大大发展起来,但同样是从推理中得到的另外一些几何系統(如非阿基米德几何,非戴扎格几何),由于沒有得到实践的証明和实际的应用,始終沒有得到什么发展。

最后,在分析理論的作用的时候,还應該专门討論一下若干基本理論研究的意义。目前,关于物質基本粒子的研究,关于生命起源和生命本質的研究,关于意識的起源和意識活动的机制的研究,关于遗传机制的研究等等,都屬於这类基本理論研究的范围。人們对于自然規律的認識,常常只有达到了較为深入、較为成熟的时候,才能被用来按照人們的願望改造自然,才能在生产中發揮巨大作用。但人的認識总是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由探索趋于成熟的。当对某方面的自然現象与規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的时候,人在这些自然現象和規律面前便还是比較无能为力的。当对某些自然过程的研究还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整理和概括材料的阶段,或者还只是从表面上概括了一些現象的規律,但还没有深入到这些过程的内部机制,或者虽然闡明了这些过程的内部机制,但还没有找到控制和影响这些机制的有效方法的时候,这些自然科学研

究便还不能用于生产,或对于生产还不能有极大的帮助。前述的那些基本理論的研究,目前大体上都还处于这种不成熟的阶段。然而,尽管这些研究在今天对于生产还不能起多少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关于基本自然規律的研究經過逐步探索,一旦达到成熟的阶段,就会使人对自然界的認識大大提高一步,使人对自然界控制和改造的能力,大大提高一步,从而对生产发生巨大的作用。关于原子的研究的历史,最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这一点。四、五十年前,人們对于原子的研究,还处于摸索的阶段,对于原子内部的情况还知之很少、很浅,那时关于原子的科学研究,也看不出对于生产有多少作用。但随着人們对于原子内部結構、原子变化規律的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成熟,并且找到了控制原子变化的方法,結果终于取得了在生产中运用原子能这样极其重大的实际利益。以几十年前的原子的研究,来对照今天基本粒子的研究和其他的基本理論方面的探索性的研究,便可以充分表明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

基本理論研究的意义,除了从它們日后可能对生产发展起重大作用这个角度,即自然科学同生产的联系这个角度来考察以外,还应当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自然科学同哲学的联系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关于宇宙、物質、生命、精神,这些根本問題,历来是科学与宗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激烈斗争的場所。因此,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关于这些根本問題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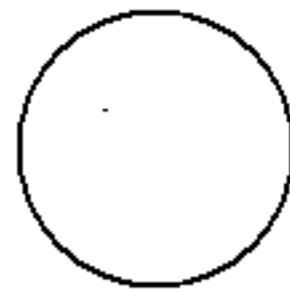
从支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服务于思想斗争的实际任务的角度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我们就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的作用这两个方面，讨论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生产的相对独立性的一些问题。这种相对独立性是客观存在着的，我们必须承认它，并正确地认识它和对待它。必须反对夸大和歪曲这种相对独立性，从中得出结论说：自然科学与生产没有什么关系，自然科学只是实验室里的事情，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与解决生产实践的任务毫不相干，理论的发展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它只是各种概念和定理的纯粹逻辑推演的结果，只是少数科学天才的偶然灵感的产物，等等。这是一种对待自然科学发展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成为“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倾向的理论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具体地说明，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完全错误的。当然，在反对前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也应当注意，不要采取简单化的办法，走到另一个极端，误以为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都是脱离实际的，误以为理论的研究必须全都直接地同解决生产实践中的任务联系起来，必须全都结合当前生产的需要，必须全都立即对生产实践发生作用。我们党历来在强调自然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时候，同时指出必须防止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化的理解，必须重视理论的研究、重视满足长远的生产需要的研究工

作。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曾经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今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又指出：在科学技术上“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任务，应当放在首要的地位。在生产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存在着千千万万的技术课题，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分工协作，为解决这些课题而努力。尖端科学技术也必须注意发展；对于条件还不具备的，目前应当从各方面准备条件。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根据这些指示，正确地理解自然科学与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全面地安排科学研究工作，就会使我国的自然科学健康地发展，对当前和长远的生产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

更 正

本刊一九五九年第九期第十一页右栏末行的“百分之二百五十”，应改为“百分之三百五十一”；第十二页左栏倒数第三行的“97.43%”，应改为“86.23%”。



指标要切合实际

許 辛 学

过去半年的生产发展情况表明，今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将实现一个新的跃进。全国很多的单位，都提出了很高的生产计划指标，并且正在千方百计地为实现这些指标奋斗。在去年大跃进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团结一致、和衷共济、艰苦奋斗，一九五九年必将成为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一年。

为了实现跃进，一切企业的指标必须是经过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指标。指标低了，不足以刺激人们的努力。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指标当然也不应当过高，不应当高到脱离实际的可能，以致人们虽然努力仍然不能实现的那种程度。那样的指标同样不足以刺激人们的努力。因此，定出正确的指标并不总是很容易的。这也往往需要经过一些反复。

最近，有些工厂、矿山和基本建设单位，有些人民公社，根据今年前五个月执行计划的经验，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讨论了今年的生产、建设指

标，把一些原来不切合实际的指标作了适当的调整，对这些单位的工作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步骤是正确的，它不但不会妨碍跃进，而且正是保证了跃进的实现。

指标不切合实际，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指标过低，落后于客观的可能性；另一种是指标过高，超过了客观的可能性。前一种情形，即指标过低的情形，经过一九五八年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和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实际生活的教育，已经大为减少，但是也不能说已经没有了，或者以后不会再出现。不过，当前也有不少另一种情形，即指标过高的情形。人们希望把事情办得多一些，办得快一些，这种心意是好的，值得称许的。但是有些人由于对当前客观条件的认识不充分，却使指标超越了客观条件的可能限度。这种过高的指标，同过低的指标一样，既然都是脱离实际的，就都会脱离群众，都会对工作造成损失。因此，指标定得偏低的，应当根据实际的可能，



适当地提高；而指标定的偏高的，也应当按照实际的可能加以调整，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落实”。

人們的主觀認識必須通过实践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客觀实际。拿經濟工作來說，在实践的过程中根据实际的情况和經驗，調整某些单位的計劃指标，这样的事情是难以避免的，特別是在我們这样从事大規模的社会主义經濟建設还不久的国家里是如此。正如毛澤东同志在“实践論”中所指出的：“一般地說来，不論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过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时候須反复失敗过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达于和客觀过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觀的东西为客觀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預想的結果。”

把指标“落实”，使之合乎实际，不但

不会妨碍群众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是說，指标落实了，群众的干劲不但不会小，反而会更大。例如，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鋼厂，这个厂子在过去几个月中，职工的干劲原来很足，但是由于原来的生产指标定得偏高，計劃完成得不够好，結果是上下心情不舒暢，感到“包袱”很重。后来，企业的领导人員和职工群众一起，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修訂了生产指标。这样，职工群众的干劲比原来更高了，产量步步上升，質量日有改进，超額完成了計劃，比修訂指标以前的实际产量有了很大的增长。由此可見，并不是任何高指标都能够保护群众的干劲；只有那种符合于客觀实际和群众要求的高指标，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

事实上，脱离了客觀可能性的过高指标，不仅会妨碍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就企业來說，还可能使人們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視質量和品种，忽視設備的維護和检修，忽視生产的安全，以至引起生产中的某些失調現象。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事与願违的結果：本来要快，結果反而慢了；本来要增加生产，結果反而不利于生产了。相反，只要把过高的指标調整到比較符合客觀实际的程度，我們就可以站得更穩，把工作做得更切实，也就有可能前进得更快，前进得更好。

指标的高低，首先不决定于人們的主



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可能。当然，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改造客观世界，是有极大的作用的，我们决不当把人的努力和客观可能对立起来。任何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过低估计，都会产生错误。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要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只有当人们正确地认识了客观条件，并且懂得怎样有效地改变客观条件的时候，才有可能。

有一些人对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就是把客观条件绝对化，认为人们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它是不可改变的；或者，只看到困难的条件，甚至夸大这种困难条件，而看不到已经大量存在的和正在出现的有利条件，也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片面的观点，当然是不正确的，是必须纠正的。但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决不是说可以不认真地研究客观条件。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应当既研究有利的条件，又研究困难的条件；既研究先进环节的情况，又研究薄弱环节的情况；既研究国民经济一个部门和一个环节的个别条件，又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一个部门内部的综合条件，包括协作的条件在内；既研究将来可能利用的资源条件，又研究现时可以实际利用的资源条件；既研究劳动力的条件，又研究生产设备的条件，而就前者来说，还要进一步地研究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合理分工，研究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

动在工业中的经济效果，就后者来说，也还要进一步地研究设备的配套和备份，维护和检修，研究原有设备和新增设备可能增加生产能力的情况；如此等等。把各种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同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任务和指标，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采取的方法。按照这样的原则，人们就能够定出正确的、既不偏低又不偏高的指标。按照这样的原则，人们就不至于以为任何企业的生产必须每年翻一番才算跃进，以为一个工业企业或农业企业每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不算跃进。大家知道，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对于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已经正确地批评过了。

毫无疑问，一个企业在调整生产指标的时候，必须坚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凡是可以实现的高指标，就必须争取实现，不去争取就不对；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必须努力去办，不努力去办就不对。在那些需要调整生产指标的企业中，只要领导人员全面地研究具体情况，密切地依靠广大群众，这些单位就一定能够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之下，顺利地解决调整指标的问题，从而在可靠的基础上胜利地实现工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



关于写文章

·施东向·

写文章，是交流思想、传播经验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还应当指出，写文章同时又是整理我们的经验和思想，使之明确化、条理化的一种方法。

古时候中国人对于写文章有两个基本要求，叫做“有物有序”。“有物”，就是要内容，“有序”，就是要有条理。

要写一篇文章，总是在作者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写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在工作中积累了某些经验，并且认真地考虑和总结了这些经验，或者是对于某个问题做了研究，达到了一定的结论。但是写文章并不只是把在头脑里的思想搬到书面上去的一个简单过程，而且又是这个思想逐步成熟、逐步完善起来的一个过程。

一般说来，一种思想只是在自己头脑里的时候，还不一定十分明确。把它说出来让别人听懂，这就比较明确了。写成文章，那就是更进一步了。每一个字，每一

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都摆在纸上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到底是清楚还是不清楚，是深刻还是肤浅，是严整还是杂乱，立刻都明白显示出来了。要写好一篇文章，就要讲究章法，也就是要考虑如何开头，如何结束，如何分层次，分段落，这实际上就是整理自己的思想，取得必要的条理。有时为了表达一个意思，要费许多周折，这往往是因为这个意思在自己头脑里本来还是比较模糊的，而在找到了最恰当的字眼和语句来表达的时候，这个意思才真正明确起来。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写不下去的情形，这是好事，因为这就暴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写不下去的原因，有时是因为我们对于书面语言这个工具还没有很好地掌握。但有时，并不是因为缺乏表达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自己虽然觉得已经弄通了，但其实这种思想还是比较杂乱，比较暧昧的，或者还只有个粗糙的轮廓，其中细节还很不周到。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写不成好文章。但是如果不写，也许还不能发现这种情形。

遇到这种矛盾怎么办？最好不要急于写下去。这时候，就应当进行各种必要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看书，和别人讨论等等），继续酝酿，继续思索，继续研究，使自己的思想脱离那种暧昧、混乱和粗疏的状态。材料充分了，观点明确了，论据完备了，条理清楚了，然后才能写好改好。



有时我們研究一个问题，起初未必能預見到它的广度和深度到底如何，到了写不下去的时候，才意識到它的复杂性。所以写作过程常常能引导着我們的思想进入新的境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苦恼和喜悅，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是常常会經歷到的。

“下笔千言”，“一揮而就”的情形也許是有的，但如果不是粗制濫造，那至少要有这两个条件：第一是对書面語言这种工具十分熟練，能够运用自如。第二，更重要的是，所表达的思想已經預先酝酿得十分成熟，連一切細节都考虑到了。但是，事实上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即使一次能写成的文章仍然可以繼續加以修改。通常我們写成一篇文章，总是要經過反复的推敲、修改，甚至几次重写。这是为了使我們的思想取得最适当的表現形式，而且还是为了使这种思想愈来愈明确和完备。

这样看来，把一个思想用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如果用个比喻來說，就好象一块生鉄反复地經過錘煉一样，——結果就成了熟鉄。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可以用写文章的方法来鍛煉我們的思想，提高我們的思想能力的緣故。当然，必須是用严肃認真的态度来写文章，才能收到这种效果。如果馬馬虎虎、隨隨便便，那就既起不了鍛煉思想的作用，当然也談不上交流思想、传播經驗了。

所以，我們反对不严肃的写作态度。

如果不管自己有没有值得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明确化，条理化，只是硬着头皮写下去，而且写出来就要发表，这种連作者自己也不知道是說些什么的文章，只能使人看着头痛，看罢后悔，是毫无可取之处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提倡大家来学习写文章，并且努力写出好文章来。不要因为自己的思想能力不高就不敢写文章，而应当用写文章的方法来訓練自己的思想。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把自己所有的某种思想清清楚楚地写出来，甚至也不努力把这种思想清清楚楚地說出来，那么这种思想实际上只是处于混沌的状态中。

为什么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应当尽可能把經驗总结写成文章呢？除了要把經驗告訴別人以外，还因为写文章的方法可以帮助我們更好地总结經驗，以至使經驗提升到理論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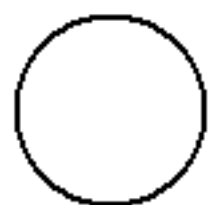
从事理論工作的同志当然更是离不开写文章。他們应当把研究成果写成文章，而且应当通过写文章来检查自己的成果，并且督促自己不断地提高研究水平。

好文章是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經過踏踏实实的研究才能写出来的。这种文章在义理、考据和辞章等方面，总是經過認真努力的。当然，要把文章写好，需要一个过程。起初写的文章不一定就很好，但只要經常地認真写下去，总是可以写好的。



治水工作的辩证观点

李凡夫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反映。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我们能够依靠辩证法这个武器，去找到工作的具体规律，并正确地加以运用，就能把工作做好，取得胜利。治水工作当然也不是例外。

人类和水灾作斗争，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我国大禹治水的故事，虽然属于史前的传说，但留传如此普遍与永久，不是偶然的。治水与我国人民的生存，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人民从来就非常重视治水的问题。从“左传”等古籍中可以看到，古人对大禹非常崇敬，认为没有禹，人们都变成鱼鳖了。安徽怀远县涂山上有一座禹王宫，据传已有很久的历史，历代都重修过，在解放前每年有两次庙会，每次到山上朝拜的群众很多。当地有些居民还能讲大禹治水的传说，说大禹在这里治理过淮河，凿通了荆、涂两山，使来自桐柏山的洪水流出去，等等。

我们的祖先经过长期对水的斗争，积累了不少治水的经验。据“江南通志”记载：“春秋时，阖闾伐楚，用伍员（伍子

胥——引者注）计，开渠运粮，今尚名胥溪（这是一条与荆溪联结，沟通太湖与石臼湖、丹阳湖以及长江的一条河——引者注）……自是湖流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尹繼善等修：“江南通志”，卷六十一，河渠志）。这就是说，在两千多年前，江南地区已有人开挖比较大的河道了。现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水网，就是劳动人民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造成的。但是，在剥削阶级统治下的社会里，由于剥削阶级只顾少数人的利益，漠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更谈不到自觉地利用客观规律来为人民谋福利。据历史记载，淮河原来是一条美丽的利多害少的河流，后来由于黄河屡次夺淮，到明朝、清朝以后，河道更加淤塞，统治阶级又不重视修理，于是水灾频繁，淮河流域成了多灾多难的地区。到了国民党统治时代，情况更糟。他们以“导淮”为名，滥借外债，搜刮民脂，用来镇压革命，养肥四大家族。这样，搞了二十来年的“导淮”，毫无结果。真正自觉地利用水的客观规律，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来防治水患，兴修水利，为全国人民谋福利，是在解放以后才逐渐实现的。

解放九年多来，安徽省在中央的领导下，对治水进行了全面规划，全面治理，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安徽境内，沿江有巩固的江堤，山地有无数的水库，平原有密布的河网。仅长江沿岸修筑江堤，就已完成土方一亿零二百八十万公方，石方五十八万公方。在水库建设方面，全省已建成大型水库四座，即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磨子潭水库、响洪甸水库；中型水库五十六座；小型水库三千五百四十六座。全省水利工程可以使五千五百多万亩地得到灌溉，大型水库的发电能力是

十二万七千瓩。

在治水工作中，最艰巨最复杂的是解决淮北的水利问题。我们党总结了过去治淮的经验教训，又经过几年实践的摸索，逐渐认识了治淮的规律，并根据这个规律制定了一套治淮的具体方针。这套方针就是：以群众自办为主，政府支持；以小型工程为主，大中型工程支持；以蓄水为主，多蓄少排；防洪与治涝相结合；治水与改种水稻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其具体办法就是河网化、水稻化。其奋斗目标就是把淮北变成江南。自从有了这套具体方针以后，淮北水利工作就有了重大的进展。过去淮北不但旱和涝的问题长期无法



移山造海（木刻）

王 琦



解决，而且也不可能多种水稻这种高产作物，因为一般在六月以前需要水的时候没有水，六月以后雨水又太多了。河网化把这种自然条件根本改变了。一九五八年是淮北河网化大规模施工后的第一年。虽然只完成了土方约四十亿公方（总任务约九十到一百一十亿公方），但是，在改种水稻、抗旱、除涝、增产等各方面，都显示了巨大的作用。一九五八年淮北改种水稻的总面积达五百二十四万亩。在六月以前干旱的时候，利用河网吸取地下水灌溉水稻，在六月以后雨量多的时候，利用河网拦蓄多余的雨水，这就保证了稻子的正常生长，使水稻获得了空前的丰收。阜阳专区过去是常常依靠政府救济的地区，被人们看作是国家的“包袱”，现在这个“包袱”已经变成粮仓，今年已运出大量粮食来支援全省和国家的建设事业。我们最近访问过阜阳专区阜阳县的程集、阜南县的柳林、涡阳县的纪伦寨、蚌埠专区濉溪县的卧龙湖、宿县的紫卢湖等人民公社，看到那里河网化的工程有的已大部分完成，有的已完成一半。淮北真是今非昔比，不仅河渠纵横，绿树成荫，不减江南景色，而且过去的荒草湖和低洼地都已经变成鱼米之乡了。在短期内按计划挖成的河网，比起江南在漫长岁月中自流地形成的水网，更加美观、更加有利于生产和交通运输。淮北的河网化，不但使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生产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过去群众一般吃不上大

米饭，现在吃上大米饭了；过去吃鱼很少，现在经常可以吃到鱼了；过去穿得很破烂，现在穿得较好了。当然，更大的变化还在后头。

我们认为，淮北治水的经验，不仅在实践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概括。我在这里只谈几点初步的体会：

第一，解决任何问题，不仅要知道一般的规律，而且还要找到事物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虽然是研究战争，但是我们认为，研究战争是如此，研究其他工作也是如此。在最初几年的治淮工作中，有些同志没有运用这种思想方法，去研究淮北的特点。淮北广大平原，地势低洼，天晴则旱，天雨则涝。过去有人用三句话来概括淮北的特点，就是“小雨小灾，大雨大灾，不雨旱灾”。在这种情况下，要根治淮河，就必须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就是既抗旱，又防洪、防涝。有些同志对这些特点认识不够，所以也就不能找出治淮的特殊规律。他们只因袭治水的传统观念，认为治水就是防洪，就是把水排泄出去，只要保证洪水不冲破堤防，只要下雨后能



把水排出，就算完成了治水的任务。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只注意防洪和泄水的思想，而忽视了群众除涝和抗旱的要求。他们沒有注意到，在安徽涝灾比洪灾的威胁还要大。洪水之害虽然严重，必須治理，但不是年年都有洪水；而涝灾在淮北則是年年不断。如果不把防洪与除涝結合起来，就不能解决淮北的治水問題。同时，涝灾与洪灾本身是連在一起的，积涝成洪，洪中有涝，先涝后洪，都是常常发生的。这种情况，他們都沒有注意。他們也沒有注意到抗旱的重要性。据历史記載，两千年来，沿淮地区大小灾害九百八十多次，旱灾約占一半，如果只注意泄水，而不想到蓄水，就不能解决抗旱的問題，更不能解决把低产地区变为高产地区的問題。我們只有把这些問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作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才能找到具体解决問題的办法。毛澤东同志說：“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治淮的經歷，又一次証明这是一条普遍真理。只有当安徽省委根据中央“根治淮河”的方針，研究了当地的具体情况，反复与群众商量，总结了群众的治水經驗和創造，才認識了治淮的特殊規律，并根据这个規律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方針，这样，才取得今天的成績。

現在，不仅在平原地区已初步形成了

河网，而且在安徽許多丘陵地区也开始挖了不少新河和渠道。平原地区的治水方針，在丘陵地区也是适用的；但在具体做法上，又必須注意到丘陵地区的特点。丘陵与平原不同，不但地势有高有低，而且也沒有平原那样丰富的地下水。因此，在丘陵地区治水，一般不能先挖河，而要先修水庫和河壩，把水拦蓄起来，然后才可挖河，河网必須与水庫相結合，还要与外水相銜接。这就是丘陵地区治水的特点。根据这个特点，丘陵地区治水的方法是：沿山修水庫，大庫套小庫（在丘陵的冲子里也可以修水庫）；拦河打壩，壩下开渠，渠下挖塘，塘下挖沟，洼地打围；在适当地点按等高綫开挖新河和横向的沟渠。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統。定远县蘆桥八一人民公社，就是采取了这种治水方法，获得了重大的成績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对立的統一。它們是互相区别的，同时又是互相渗透和互相联结的。平原地区的治水經驗，对所有平原地区來說具有普遍性；对于非平原地区來說，則具有特殊性。反之，丘陵地区的治水經驗，对所有丘陵地区來說具有普遍性；对于非丘陵地区來說，則具有特殊性。丘陵与平原，除了不同点之外，又有共同点，因此两种地区的經驗也可以互相参照。还要看到，在特殊之中还有特殊。同是平原，也有不同的地形，所以挖河网的方法就不应完全一样；丘陵地区的地形更加复杂，因此，丘陵地区治水，除了有



共同的方法之外，还应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方法。毛澤东同志說：“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变为普遍性。”（“矛盾論”）我們在研究問題时，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两方面的不同而又互相联結。如果我們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满足于事物的共同規律，不了解事物的特殊規律；或者只满足于事物的特殊規律，而不了解事物的共同規律；或者不能把共同規律和特殊規律联系起来去考察，都不能完滿地解決問題，做好工作。

第二，在治淮这件复杂的工作中，包含着許多带关键性的問題，需要正确地加以解决。主要是：在依靠誰的力量方面，是群众为主还是政府为主的問題；在水利工程上，是大型为主还是中小型为主的問題；在水的处理方面，是蓄水为主还是泄水为主的問題，等等。正确地解决这些問題，对于治水工作的速度和效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过去在这些方面是存在着意見分歧的。一种意見，主张依靠群众为主，政府支持，小型为主，大型为輔，蓄水为主，多蓄少排；另一种意見，則主张主要由政府包办，搞大型工程，泄蓄兼顧（实际的做法是多泄少蓄）。这是关于治水工作的两种方針的爭論。这个爭論差不多經過了八年之久，錯誤的意見，才最后被克服。在事后看来，似乎問題很容易理解，但是

真理在沒有得到实践的进一步檢驗以前，人們是不容易相信的。就拿依靠群众为主还是依靠政府为主这个問題來說，我們都会知道，一切工作都應該依靠群众。但是有些同志一遇到实际問題，却不依靠群众，不总结群众的經驗，而单纯依靠政府拿錢，依靠少数专家办水利。当然，水利工作必須依靠政府領導，也需要政府拨款給以支持，尤其是兴建某些大型工程，政府拨款就更为必要。同时，水利工作，特别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沒有技术专家的指导，也是不行的。但是，要真正解决广大地区的水利問題，要在广大地区实现河网化，主要还是依靠群众的力量。群众不但有力量，有智慧，而且有經驗。他們在长期与水灾作斗争中，对水的情况也最熟悉，正如古語所說：“近水知魚性，居山識鳥音”。如果我們不与群众商量，不調查研究，不总结群众的經驗，而只依靠政府和少数专家办水利，就不可能提出河网化的方針。河网化的概念，就是由于依靠群众，根据群众的要求，总结群众的經驗而形成的。我們党为了解决淮北的涝灾問題，首先研究了江南多雨不涝的道理，研究了水网、圩田、耕作方法与治水的关系，因而在淮北提出了种水稻的問題；在旱灾严重的时候，又深入調查了地下水的情况，因而又提出多挖水井和河沟，充分利用地下水源，后来又逐渐发展为河网化的思想。而所有这些問題的研究，都离不开与群众商量。至于河网化的实现，需要



开成千上万条沟渠，挖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土方，更不用说，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办到。

在依靠群众为主还是依靠政府为主，大型工程为主还是中小型工程为主，蓄水为主还是泄水为主等等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依靠群众为主还是依靠政府为主的问题，占着首要的地位。有些同志由于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也就不愿在水利工程的兴建上以小型为主；由于不愿以依靠群众为主，以小型工程为主，也就不能解决广大地面上的蓄水问题，在水的处理上，也就不会以蓄水为主。以蓄水为主还是以泄水为主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据“史記”和“尚書”記載，泄与蓄的爭論，远在大禹的父亲时就开始了。大禹的父亲名鯀，主张用“湮”的方法，即堵塞的方法，因治理无效，被流放到羽山去了。大禹否定了他父亲的方法，主张用“导”的方法，即疏导排泄的方法，治水有功，因而获得了极高的荣誉。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变化，大禹的主张一直占着优势。解放后还经过几年的爭論，直到最近，我們才给他的主张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我們主张以蓄为主，多蓄少排，不仅用水庫来蓄，而且在广大的地面上来蓄。这种蓄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又包含着排，不过不是排到长江或大海里，而是从田里排到广大面积的河网中。所以是蓄中有排，排中有蓄，主要是蓄。这样的治水方法，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这个治水的理論问题，到现在才算

解决了。但是，如果依靠群众自办为主的思想沒有解决，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调查研究，不总结群众的經驗，不把治水与生产结合起来（这正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以蓄为主的方針也就不会总结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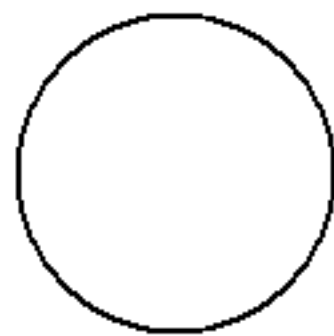
第三，大中小相结合是我们的水利建設方針之一，但是大、中、小型工程以何者为主，必須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不是根据主观随意决定，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毛澤东同志說：“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矛盾論”）可是这个道理，在实际工作中，也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在治理淮河的问题上，如果只满足于大型工程，而忽视中小型工程，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大型工程，如修大水庫，它的防洪作用很大，但这些工程不仅花钱多，收效不快，而且不能全部解决平原上的水利问题，因为大雨不一定都落在修有水庫的山系上。所以只治点不治面，显然是不对的。小型水利工程，不仅是群众性的工程，靠近村庄，兴修方便，群众的力量容易使用得上，而且可以解决广大面积的问题。在开始大搞河网化的第一个冬天和春天，淮北的土方工程不断加翻，群众情绪空前高涨，就是由于群众对这个方針积极拥护。但到了一定时候，又不能完全满足于小型工



程。去冬今春，安徽的水利工程，因为要以解决易旱易涝和改种水稻地区的水利为重点，所以大中型工程增多。在全省六处大型水利工程中，有三处与治淮直接有关。这三处就是蚌埠大闸、临淮岗水库、史淖杭工程，它们都是淮河中游的大工程。蚌埠大闸的作用在于抬高淮河水位，可以灌溉七百多万亩田；临淮岗水库可控制王家坝在流量一万秒公方以内安全排水，可灌溉一千二百余万亩田；史淖杭工程是解决史河、淖河、杭埠河三大流域的灌溉、航运、发电等水利综合利用的大工程，可以灌溉一千二百一十八万亩田，增加通航里程七百七十公里，可发电四万七千瓦，年发电量一亿三千万度，估计年产鱼可达五亿斤。另外，还兴建中型水利工程一百六十四处，其中有九条新河已全部动工。这些大型和中型工程对于解决淮北和其他地区大面积的灌溉和交通运输问题，都将起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今年安徽水利工程的特点。由于群众对水利工作已收到实惠，所以现在动员大批劳动力去兴修大中型水利工程，就比以前更容易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由此又可以看到，大、中、小型结合，到底应以何者为主，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绝不是永远不变的。我们必须看到矛盾是发展的，必须重视矛盾的对立面的转化，研究矛盾双方在什么时候互易其位，而不要以一成不变的眼光去对待矛盾。同时还要指出，治淮上的小工程，从分散来看是小工程，从综合来

看，从效果来看，则是最大的工程，因为整个河网化工程，比任何其他水利工程都要大。如果我们孤立地看问题，就看不出淮北小型工程的重要性。有些同志开始时看不起小的，只想搞大的，也就是由于他们是孤立地去看问题。当然，人们的认识要正确反映客观实际，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缩短这个过程，才能少走或不走弯路。

安徽治水的胜利，是党中央治水路线的胜利。在治水中，由于运用了辩证观点来考察问题，解决问题，才在实践中取得胜利，而实践又充实了我们对辩证法的认识。但是我们还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现在淮北平原的河网化工程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的经验还应该进一步加以总结。河网化的水利工程是万年大计。图纸和规划是可以修改的，但河网化完成以后就不好重新再挖一次了。所以河的大小，河网的密度和规格，河网形成后的管理工作和综合利用等等，都还要根据已有经验作进一步的研究。



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

· 邓 拓 ·

一 工农联盟的新情况

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人民大团结的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通过人民公社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跃进，这一联盟是愈来愈巩固了。现在也还有某些不属于工人农民的阶层。在继续加强工农联盟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将继续保持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这一段话简洁地说明了：我国工农联盟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在人民公社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形势之下；这个联盟，作为人民大团结的基础，必须使自己继续加强和巩固起来，并且以此为前提，继续保持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

人民公社运动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跃进，对于我们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显然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给我们带来了蓬蓬勃勃的全面发展的新气象。从工农关系上说，公社化和大跃进非

常有利于我们为逐步消灭城乡差别、逐步消灭工业和农业的差别创造条件；这也就非常有利于工农联盟本身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们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从现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个任务，正如决议所说，“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复杂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是紧紧地依靠工农联盟的力量，并且由此



进一步团结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那末，要想胜利地完成这样巨大而复杂的任务，将是不可能的。

现在，如何加强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亲密联盟，如何加强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了。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在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比过去更加巩固了。广大的农民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工人阶级和城市工业给予更多更大的援助；同样，工人阶级和城市工业也需要从农民和农业方面得到更多更大的援助。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们参加了石景山人民公社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成就的会议以后，议论说：“我们过去不了解农民兄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人曾经错误地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农民即便不拉后腿，也不会干出什么名堂来。哪里想到农民真的大踏步前进了！我们如果不努力增加生产，就要落到农民的后边了。”在最近开展红旗竞赛的时候，第一热风炉车间的工人们说：“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都需要拖拉机，可是我们的钢铁生产还不多，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必须好好提高生产效率，发挥社会主义工业的优越性，给社会主义的农业以有力的支援。”实际上，石景山钢铁厂党委和工会组织，已经领导工人帮助公社做了许多事情，如帮助进行基本建设、建立社办工业、参加农业劳动等等。公社的农民们普遍地表示：

“我们要是不加紧生产，真对不起工人老大哥对我们的帮助。”这只是从大量事实中举出的一个例子。这个事实已经足以说明，现在的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相互之间都迫切地需要对方的支援。

从北京市的材料看来，现在城乡互助、工业和农业相互间的支援正在日益增强。比如，一九五八年北京郊区各个人民公社总共得到城市工业支援的主要生产资料，有下面这许多：

排灌机械	3,250 台(共39,334匹馬力)
新式农具	14,544 件
化学肥料	2,971 万斤
药械	7,565 架
农药	459 万斤

这些主要的生产资料的供应量，基本上满足了京郊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在生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供应给各个公社的近四万匹馬力的排灌机械，约能浇地八十万亩。这些排灌机械的每一匹馬力，一天能浇地二十亩左右，与一个畜力水车一天只能浇地四亩相比，效率提高了四倍，成本反而降低。这是对于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的实际援助。一九五八年京郊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跃进，郊区各公社除了交给和卖给国家的粮食、棉花等以外，供应首都商品蔬菜十二亿多斤，猪二十七万头，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这些虽然不能完全满足首都迅速增长的需要，但是，比往年的供应量已经大为增加了。这里



仅就北京市历年上市蔬菜量，列举如下：

年 份	上市蔬菜量(单位万斤)
1954	38,526
1955	47,707
1956	59,204
1957	82,174
1958	126,177

事实证明，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发展城乡互助，使工业和农业互相支援，不断地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决定性条件。

但是，农民本来是有两面性的。他们

曾经同时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几年来经过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他们已经不再是小私有者了。然而，由于他们摆脱个体经济的时间还不久，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原有的小私有者的意识还不容易很快就完全扫除干净。同时，由于现在的人民公社乃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因此，农民和工人仍然不能不处在两种不同的阶级地位上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加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无疑地是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保证。

二 努力增强工农联盟的基础

作为两个阶级力量的联合，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必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今天我国工人和农民的共同利益是什么呢？这就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迅速地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这个共同的利益，工人阶级和过去一样将坚持奋斗到底，因为工人阶级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利益。至于农民眼前的特殊的利益，也完全可以同长远的

共同的利益结合起来。在过去人民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我国广大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也使自己获得了土地和民主权利。这就是说，在过去革命的时期中，农民的利益是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过去能够这样，现在更能够这样。现在的农民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觉悟，他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使农民永远免于贫困，才能使农民得到彻底的解放。

我们党和工人阶级过去领导农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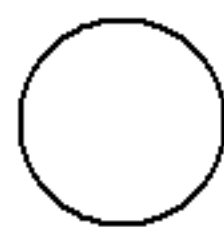
民分得了土地，并不是希望农民永远遭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而是按照我国的历史条件和农民觉悟的程度，首先用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去代替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然后逐渐创造条件，再从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一步一步地过渡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道路上来。事实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这完全适合于我国农民觉悟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使我国社会主义的事业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

不能否认，农民是不会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恰恰相反，农民在过去长久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小私有者阶级，而在小生产中是随时随地都在生长资本主义的。在人民公社运动开始以前，我们看到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展开了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的激烈的斗争。经过这一场斗争，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下来；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倾向受到了严重的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动摇情绪被克服了；少数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反动活动，遭受了有力的打击。这样就给现阶段的工农联盟奠定了更好的政治基础。今后为了继续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增强这个政治基础。

实际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村中原来的贫农和下中农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工人阶级在农村中最可靠的

基本力量。但是，他们当中也有少数人受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有从思想上、政治上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贫农和下中农才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坚决地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完全站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面来。至于富裕中农，经过批评和教育也是可以争取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过去那些动摇不定的富裕中农，逐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暴富而使多数人陷于贫困，那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他们根据亲身的体会，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劳动和劳动好的人决不会吃亏，因而他们终于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一些曾经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绪的富裕中农，经过了思想斗争又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基本上解决了思想问题，向左转了。另一种是过去有严重的剥削行为和从事投机的富裕中农，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自己是不利的，于是随着大势所趋，也投到社会主义的路上来了。无论他们的表现有什么不同，事实证明，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争取和团结他们的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随着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的扩大和增强，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地努力增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为要增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只有努力全面地发展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工业是主体；但是，绝不能因此而看不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一手抓工



业，一手抓农业。而工业和农业是互相促进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情况表明，农业的跃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迫切需要改进技术条件，这就要求工业给予

农业以新的装备和其他技术的援助。农业的迅速发展是促进国家迅速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但是，要促使农业迅速地发展，又要依靠工业的大力支援。

三 运用国家力量为工农联盟的利益服务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保证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促使工农业共同高涨，促使城乡关系的逐步融洽。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国家供应农业生产资料的数量不断地增长。例如，据北京市所属的朝阳、丰台、海淀、门头沟、昌平五个郊区的统计，一九五二年国家向这些郊区供应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总值是九十九万元。以此为基数，那末，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逐年增长，有如下表：

年 份	总值(单位万元)	增长率
1952	99	—
1953	412	4.16
1954	812	8.20
1955	868	8.77
1956	1,528	15.43
1957	988	9.98
1958	2,099	21.20

实际情形还不只是这样。由于国家的大力扶植和厂矿企业的积极援助，许多人民公社也兴办了各种小型的工业。一九五

八年北京郊区乡村出现了五万九千一百八十五个小型工业单位，后来经过各公社调整合并为八千一百七十八个单位，全年产值为三亿零七百五十一万元。许多乡村的小型工业在配合大工业和城市建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使城乡关系更加密切。例如，为了配合首都建设和钢铁生产，去年京郊有四百五十五个砖窑、瓦窑、灰窑、砂石场等，生产和供应了五亿五千多万块砖、十三万多吨石灰、一百五十多万立方公尺的砂石。

由于国家每年发放各项贷款，努力发展农业、林业、牧畜业、渔业和其他各种副业，特别是加紧进行有关农业的基本建设，使农村面貌迅速改观。解放以来，北京郊区水利建设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几年来京郊农田灌溉面积增加的数字如下：

年 份	灌溉面积(单位万亩)	增长率
1949	22.2	—
1952	37.3	1.68
1957	58.2	2.62
1958	237.2	10.68



在郊区农村中，許多地方已經沟渠縱橫，大片旱地变成了水田或者水浇地。去年能够灌溉的耕地面积为二百三十七万二千亩，已占京郊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广大农民越来越多地直接感受到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国家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是否采取正确的政策，这也是影响工农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五年間，农产品价格曾經逐年上升。一九五六年以后工业品和农产品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合理的比价。这是符合于我国工农业发展的要求的，因此，也十分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我們今后还要繼續通过价格政策，把工业的利益和农业的利益进一步結合起来。

工农业經濟的結合，實質上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結合。对于目前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應該过早地加以改变。按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所規定的方針，我們應該进行长时期的努力，使人民公社逐渐增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以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濟，在将来能够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

从北京郊区各个人民公社的情况看来，充分地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对于工业和农业經濟的进一步結合，对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有着十分重大

的作用。

郊区的人民公社由于認真执行了“統一领导、分級管理”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則，把生产責任制同按劳分配制度結合起来。这样做的結果，生产上已經出現了一片新气象，劳动生产效率大大地提高了。北京郊区各人民公社普遍地采用了“劳动定額管理制度”，作为計算社員个人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社員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一致地称贊这种劳动报酬的計算方法是公平合理的好方法。人民公社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共积累，扩大了集体福利事业，同时也保证了社員实际收入的增加。去年在北京郊区人民公社进行調查的結果，証明全郊区有百分之六十二点四的公社社員，已經达到或超过了当地原有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有百分之十的公社社員，刚刚接近于当地原有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有百分之二十七点六的公社社員，生活水平还低于当地原有富裕中农。再經過今年农业生产的繼續跃进，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将会进一步改善，公社的公共积累也将会增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将更突出地显示出来。

我們的国家是以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經濟的結合为經濟基础的；我們国家的各項政策必須为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而服务，也就是为工农联盟的利益而服务。



四 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关键

在建設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的伟大目标之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担负着艰巨的任务。而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又是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生产者。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工业必然要领导农业，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工农联盟如果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就将不可思议。这个道理是人所共知的。

农民小生产者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实践，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劳动者。所以加强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是非常必要的。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不可分开。要提高生产积极性固然要从经济政策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而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进行工作同样也很重要。

对农民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注意农民的特点和农业生产的规律，通过农民亲身的体验，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实际经验证明，组织农民参观工矿企业和工业展览会等，让农民直接访问工人，谈心交朋友，这是最简便易行而收效较大的方法。所有到大工厂参观过的农民，都异口同声地赞佩“工人老大哥真有本事”。他们回到社里干劲也大了。在农业劳动过程中，应按照需要组织协作。这对于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是有利的。去年秋季为了深翻土地，大规模组织劳动力的时候，许

多公社实行“大协作”，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由于郊区和城市的关系特别密切，城市的职工、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驻军参加生产劳动，给予郊区农民群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工人阶级为公忘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当然，这些人参加劳动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教育。

发展农村中的文化教育事业，无疑地是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经常的重要的方法。一九五八年北京郊区中小学学生在学人数，比一九五七年有显著的增加：小学学生从四十七万名增加到五十五万名；初中学生从六万三千名增加到九万名；高中学生从五千六百名增加到八千六百名。据丰台区农民子弟入学情况的典型调查，现在小学生在学人数为解放初期的二点三倍，中学生在学人数为解放初期的一八点五倍。今后随着农村文化教育的普及，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更将大量地涌现出来。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在农村的组织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党在农村的组织必须把人民公社领导得好。现在经过几个月的整社工作，干部党员的工作作风有了新的改进，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最近北京郊区农村各个人民公社先后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贯彻



执行了群众路线，并且使干部和广大群众又一次受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

经过这许多方面的努力，我们一定能

够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更好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深 耕 (国画)

赵 枫 川



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 商品价值形式問題

胡 鈞

編者按：有些讀者建議討論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換的問題。胡鈞同志在他寄來的“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問題”的文章中，對這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一種看法，為了展開討論，我們照作者的原文發表。我們歡迎大家參加有關這類問題的討論。

在我国目前，由于还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所以在全民所有制經濟与集体所有制經濟之間和各个集体所有制經濟之間还存在着商品貨幣关系，通过商品的交換来交換彼此的劳动，經過这种联系方式把工业与农业組成統一的国民經濟，保證整个社会主义經濟的迅速发展。只要集体所有制存在，商品关系就必然存在。不恰当地削弱或改变这种联系方式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客观規律的，因而就一定会有害于生产的发展。

除此之外，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也有着商品关系的形式，無論在国营企业之間的产品运动方面，或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都广泛地利用着商品价值形式。这种形式，

卓有成效地被利用来检查和監督企业的生产状况，它能使企业管理者了解到本企业的經營水平和劳动消耗状况，从而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們国家也利用价值形式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資料，以保證整个国民經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此外，在消費品的分配領域內，价值形式也被利用来計量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参加的部分，从而也計量各个人在共同生产物中可以消費的部分。它是贯彻按劳分配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我在这篇文章里就是試着分析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的本質，而主要是分析全民所有制内部消費品分配領域內这种形式的問題。



一 什么是商品关系

为了研究问题方便，先说明一下什么是商品和商品关系。

商品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不能仅认为是分配关系或交换关系，它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生产劳动的交换关系。但仅仅这样说还是极不够的。劳动交换在任何人类社会都是必然存在的，但绝对不能认为所有的劳动交换关系都是商品关系，只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劳动交换的这种关系才是商品关系，否则就不能称作商品关系。马克思就曾指出：“在商品生产者社会内，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形成的：他们把他们的生产物，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并在这个物的形态上，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来发生相互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62页）显然，作为一种劳动交换方式的商品关系与一切其他非商品关系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生产者是在物的形态上，把自己的劳动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来进行劳动的交换。而人们借以实现其劳动交换的物品就是商品。这也正是“商品一般”的质的规定性，也正是商品关系与其他方式的劳动交换本质区别所在。这种劳动交换方式是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决定的，而其结果就是把劳动生产物分裂为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的等量表现在物的等价上。

通过物的形态进行劳动的交换，交换双方所关心的就必然只能是生产物之间的比例关系，等量的同种物品就被看作是相同的等量的劳动。不管实际劳动耗费怎样，等量等质的物品就只能在市场上换得同量的其他物品，这是商品关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实际上，具有同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在同种的等量的物品内耗费的实际劳动往往是不同的。影响这一点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由生产资料的优劣所带给劳动者劳动效率的影响。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同等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劳动者，会因技术装备的好坏而花费不同量的劳动，因而在每件产品上就实际上凝结着不同量的劳动。可是，在真正的商品关系下，即通过物的形态来交换劳动的条件下，交换双方在交换产品时都根本不考虑（因为都承认对方是其生产资料的单独全权主人）也不可能考虑（因为是在物的形态上交换）这一点。这正是商品关系，即通过物进行劳动交换的关系，与直接劳动交换关系的本质区别之一。

假如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劳动者在交换劳动时，抛开了生产资料优劣所带给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只是根据劳动者本身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来等量交换，相同的劳动状况，工作同样的时间，就领取相同的收入，那么就可以肯定，这里的劳动交换



不会是在物的形态上进行的，而是一种直接的劳动交换关系；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抛开生产资料质量的影响，而只核算劳动本身的质量和数量。例如，在农业社中实行工分制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就只是根据劳动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那就正是反映了由于生产资料已属于同一个主人，他们的劳动交换已摆脱原来作为小生产者时那种物与物交换的形态，而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进行劳动交换，从而也就不再是商品关系。

所以，我认为不能把任何的劳动交换关系都看作是商品关系，同样，也不是任何等量劳动的交换关系都是商品关系。只有劳动的交换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从而劳动的等量表现在物的等价上，而交换双方的收入又是与这个交换的结果直接联系着，才是实质上的商品关系。只有体现着这种关系的物品，才是商品。

要确定一种关系是否商品关系以及讨论商品关系的消亡问题，是应当把握住这一点的。

二 国家与职工的关系和职工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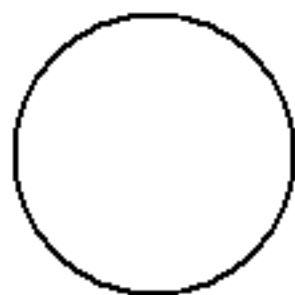
从现象上来看，消费品是通过买卖形式才进入职工消费中去的；职工从国家领得货币工资，然后到国营商店去购买适合自己需要的消费品。

有些同志，没有对这里的内部关系作深入分析，只是从这个现象出发，就肯定说这是个人与国家的商品交换关系。现在就来分析一下，看看这里是否存在真正的商品交换关系。

假如说，职工向国家购买消费品是国家与个人间的商品交换关系，那就是说双方是等价交换。可是，假若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与国家供应给他的消费品所包含的价值真的是相等的話，那就是说，他取回了他贡献给社会的劳动的全部。但是，这样就成了拉萨尔式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领回的

只能是在扣除为社会基金劳动的部分后的劳动部分。工人只是以这部分劳动，到社会上领取与这个劳动量相当的那么多消费品。可是这样一来，工人贡献给社会的与他所换回的就不能说成是等价的。所以，这里根本谈不到是等价关系。

又有的同志说，他们所指的就是在扣除社会基金部分后，工人实际领回的劳动部分与他们所购买的消费品是等价交换，因而与国家是商品关系。可是这也很难说得通。在这里工人所领得的货币，并不是与他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直接相联系的。从经济关系上来说，它不是工人所创造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内，货币并不是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下列事实可以说明：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同质的同量的同种劳动，虽然由



于設備好壞的不同，會製造不同量的產品，從而創造不等量的社會價值，可是他們却得到同量的貨幣工資。在這裡，同量的貨幣絲毫也說明不了工人創造的社會價值是多少和是否相等。這明顯地表明：在這個關係中，貨幣並不是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價值量的證明，而只是勞動者貢獻給社會的一定的勞動量的證明。由此可見，把職工用工資去購買消費品，說成是職工與國家的等價交換關係也是不恰當的。第一，假如這種等價交換，是指勞動與消費品的價值之間是等價的話，這不合理，因為勞動不具有價值，價值只是凝結的勞動；第二，假如說貨幣是體現着這部分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話，那麼，這裡同量的貨幣並不代表等量的價值，但它卻能購買等量的消費品。因此，這也不是等價關係。

實際上，按勞分配中的等量勞動交換關係，是指同一所有制內部（包括全民所有制內部和集體所有制內部）勞動者之間的勞動交換而言的。這裡發給工人的貨幣，就是作為計量各個勞動者貢獻給社會的勞動量的統一證明，每個勞動者貢獻給社會等量勞動就獲得等量的這種貨幣。因此，這裡的貨幣顯然不是表現個人與國家間的等量勞動交換關係，而是指勞動者之間等量勞動的交換關係。就是說，向社會貢獻等量勞動，就會取得等量的消費品。馬克思談到按勞分配是等量勞動的交換關係時，實際是指勞動者之間的交換說的。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指出：“說到消

費品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着重點是引者所加）的分配，那麼這裡通行着在商品等價物的交換里也通行的那個原則，即一種形態的一定數量的勞動可以與另一種形態的同量勞動交換”（“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第21頁）。

現在再來分析一下這裡的等量勞動交換關係，是不是商品關係的問題。

很明顯，在這裡人們並不交換生產品。馬克思在說明這種關係時就曾特別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者並不交換自己的產品”，因為這裡“個人勞動已不經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為全部勞動的構成部分存在着”（同上引文）。既然不交換彼此的產品，那麼產品怎麼就會變成商品了呢？

為了較深入地闡明這一問題，我們再試着詳細分析一下國家與職工和職工之間關係的本質。

國營企業的每一件產品都是全體勞動者的財產，每個工人把自己的勞動貢獻給全體，然後根據自己勞動的質量和數量從代表整個勞動人民管理經濟的國家取得收入。這種收入的多少，從積累與消費的關係，即從消費基金的總額多少來說，是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但就消費基金本身的分配來說，表面看來是個人與國家間的關係，實際上它首先直接是國營企業全體生產者之間的關係，是勞動者彼此之間的勞動交換關係。每個勞動者以一定形態的勞動貢獻給社會，同時換取另一形態的等量的他



人劳动。正由于他们都是这些产品的共同主人，他们的劳动又都直接是社会劳动，因此，他们的劳动就不是在市场上来证明是不是一般人类劳动；他们之间劳动的交换，也不会凭借商品的交换即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而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这里的劳动者，并不是以自己的什么“商品”与国家或其他劳动者交换，来换取自己需要的消费品，而是从国家取得一个自己在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的证明，这个证明是国家根据他的劳动，预先确定分配给他的消费品数量的证明，职工就以这个证明，向社会领取适合自己需要的消费品。马克思所以把这种消费品数量说成是“预先确定”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质量和数量，不是将在物的等价上即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被评价的，而是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就被评价了的。例如两个同等的劳动力，虽然由于使用的生产条件相差悬殊，因而产量差别很大，但却直接在生产中被发给大致同量的报酬，因而就确定可以取得同量的消费品。这种情况清楚地证明，他们的劳动交换，不是通过其生产物的等价进行的。这里的消费品，无论以什么形式表明它包含的劳动量，它都不是这里人们劳动交换所借以实现物品。假如在物的等价中去评价他们的劳动，那他们就不可能取得等量的收入。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作为交换根据的“劳动量”，与商品交换中所根据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虽然也是

指一般人类劳动讲的，但它却仅指劳动者本身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而抛开了由于生产条件的不同所带给劳动质量的影响。而后者却包含着生产资料好坏对劳动质量的影响。在按劳分配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会由于利用了较别人更为先进的设备而产生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全体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都是完全平等的。而在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却不是这个样子。这显然是反映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关系。

由此可见，在按劳分配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与商品交换关系是根本不同的。至于劳动者在取得消费品时采取什么形式，运用怎样的经济杠杆，都不能混淆这两种不同的关系的本质。按劳分配的形式，可能是直接标明劳动时间的证书，也可以象目前实际上所采用的货币形式，也可以是其他什么形式。但无论如何，它本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而只能是个人从国家领取自己贡献给全社会的劳动质量和数量的证明，再凭这个证明而由社会储备中领取符合自己劳动的适合自己需要的消费品。也正因为按劳分配关系与商品交换关系有这种本质的区别，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时，为了避免混淆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关系，都谨慎地避开了商品生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一些范畴。很多同志在谈到马克思论述按劳分配时未涉及到商品货币这一点时，总说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



預見到社会主义的具体情况，这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誤解。

为了深入說明这种表面上存在的“商品关系”的实质，我們还可以从其最简单的形态上去探索它。这就是暂时把货币抽去。我認为，为了能在更簡明的形态上探索生产关系的本质，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货币在这里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交换的手段，有它或沒有它，对商品关系的本质絲毫沒有影响，物物直接交换同样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在分析中抽去货币，絕不是忽視货币在目前經濟中的巨大作用，只是为了帮助我們看清人們之間关系的本质。

我們把货币抽去后，国家和职工的关系就表現得很明显了，这就是：每一个职工給社会贡献一定数量和質量的劳动，然后向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領取按照他的劳动預先确定分配給他的消费品。从这里，我們能够看到絲毫商品关系的影子嗎？显然不能。这里根本沒有商品的交换。我們再假設，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設想的，在能够直接用劳动時間計算劳动耗費的条件下，发給每个劳动者一个劳动量的証書——劳动券，劳动者再拿它去領取适合自己需要的消费品。显然在这里，人們也不会認为是商品关系。那么，为什么由于人們还未能够立即直接用劳动時間來計算劳动耗費的条件下，利用货币形式來进行分配，就成为实质上的商品关系呢？难道利用什么形式这点，也会决定人們之間关系

的实质嗎？

真正商品关系存在的地方，参加商品交换的人們的收入，是由交换的結果决定的。劳动的質量只能由交换來評价。但是，国营企业中工人的收入水平却与商品交换本身沒有联系。这表現在下面几个方面：

(1) 不論同一部門各企业之間，在生产同一种产品上耗費的劳动時間，是低于还是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時間，都不会由于这些产品的銷售是根据社会必要劳动进行，而使这些企业成員中同等劳动力（包括厂长等在內）的收入，有多少的差別。他們的收入只是根据他們的劳动技能、熟練程度和支出的劳动数量等决定，而根本脫离商品交换那种“等价原則”所引起的后果。

企业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費与規定的統一的出售价格的差額对生产者的收入沒有直接影响。有的同志提到奖金問題，好象这会表明人們的收入与商品交换的結果有联系。这是完全不对的。奖金只是对經營好的企业的物質鼓励，与其产品銷售的結果沒有必然联系。由于設備条件特差或其他原因而有很大的計划亏损的企业，只要它做到有更少的亏损，这就应当受到奖励，虽然它在“商品交换”中仍然是亏损者。

(2) 假如由于某种原因，国家规定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或下降了，它也絲毫不象真正的商品关系那样，表示着生产者間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說，这种价格变动，不会使这个企业的生产者的收入水平与其他企业发生什么新的差別。(3) 假如說职工收入



与商品价格有联系的话，那只是表现在职工货币收入与商品总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因为总价格水平会影响着一定的货币收入所取得的实物量。但这个联系，只不过是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间的比例关系的反映。这只是表明国家预定分配给职工的消费品的数量上的变化。这种联系并不反映劳动者之间劳动交换关系的变化。例如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就用降低价格的办法来提高劳动者的消费量。这清楚地说明，这里的“购买”，实质上就是实现国家已确定分配给每个劳动者的消费品数量的形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全民所有制内部劳动者之间是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商品关系的。

为了进一步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拿全民所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来比较一下。在这个交换关系中，即使把货币抽去，它不仅丝毫没有改变集体农民与国家之间原先存在着的商品关系，而且把关系表露得更清楚，这里仍然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交换彼此的劳动。当然，这种商品交换与在私有制条件下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它不再是在私有者之间进行的，不再是盲目、竞争和自发发展的，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商品交换。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生产 and 它与全民所有制经济进行商品交换的计划性，丝毫也没有改变通过物来交换劳动这种特点。劳动的等量

交换在这里仍是通过物的等价来进行。农民的收入就直接受到这种交换结果的影响（当然国家给予农民各种巨大的帮助，但其结果除了自给性的部分外，也是通过商品的交换表现出来）。农民所关心的，从根本上来讲，是他们的产品与其所换得的产品之间交换的比例关系。在这个场合，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每一种产品价格的变动，都会直接影响到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收入，从而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

那里是真正的商品关系，那里只是形式上的商品关系，这不是表现得很明显吗！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样一件产品，卖给国营企业的职工就只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形式，而卖给人民公社及其成员就体现着真正的商品关系，这不是诡辩吗？不是的。当然，我们若想从百货公司的货架上来观察这种区别，这是荒谬的，正象要从一件物品本身确定它是商品，或不是商品一样地荒谬。商品本来就是通过物而建立的一种生产关系，我们不当以表面的观察为满足，而应当具体深入到这种关系本身来分析。其实，同样物品体现不同的关系，这种事情在任何社会内都是存在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同一枚货币，可以是货币资本，也可以是一般的货币。在小农经济中也存在同样情况：生产的同样小麦，自己食用的就不是商品，而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就是商品。在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仅仅被利用来作为计算劳动时间以分配消费品的价值形式与实质的商品



关系，也是有着本質区别的。抹杀这之間的区别也是不对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分配的消费品，并不是体现着人們之間的商品交换关系。因为这里人們根本不是通过它来交换彼此的劳动。这里是直接的劳动交换。假如不是把一切等量劳动交换都看作是商品关系的话，那么就不能把按劳分配这种等量劳动交换关系看作是商品关系。这二者是两种本質不同的經濟关系，因而不能同时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既然消费品这种商品形式已經不是原来的商品关系的体现者，因此，就这个意义来说，它只是具有商品的形式，

或称作商品的外壳。假如認清这一点，就通俗称作商品，也是可以的。那么这种形式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全民所有制內部的关系来说，它的内容就是劳动時間。这里所具有的价值形式，仅是作为一种劳动時間的相对的计算方式。这种形式就是以相对的方式标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从而可以正确贯彻消费品分配方面的按劳取酬原則。正因为它只不过是计算劳动量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同样是按劳分配的关系中，可以利用它，也可以利用別的方式。例如在农业社中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内部，按劳分配就利用工分(劳动日)的形式来计算劳动量(这是劳动時間的另一种相对计算方式)。

三 全民所有制内部保留商品价值形式的原因 和这种形式的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人与人之間已不再存在原来那种商品关系了。这不是人为地消灭它的結果，而是生产資料轉归同一主人后的一个自然結果。恩格斯說：“一旦社会領有了生产資料，那么商品生产以及与之一起的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統治就将被消除。”(“反杜林論”，第298頁)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时人們的劳动交换不会再借助其产品的交换来进行，而只能是在生产过程中直接的劳动交换。

生产資料轉归同一主人和直接的劳动交换，就提供了直接用劳动時間计算劳动

量的經濟上的可能。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們正是从这种可能出发，考虑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則是借助于劳动券来实现的。

为什么目前在全民所有制内部，按劳分配仍然利用价值形式来贯彻呢？这主要是由于在現阶段，还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并存，就决定了在国营工业和集体农业之間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国民經济是一个統一的整體。既然在国民經济的相互依賴的两大部門中存在商品关系，那么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劳动耗費也就不可能直接用劳动時間



来計算，而必須借助于价值形式，使整个国民經济保持統一。也正因如此，在国营經济中，不論在生产領域內或消費品分配領域內，都利用价值形式。实践告訴我們，在目前阶段中，在生产日益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价值形式是計算劳动量的一种唯一最好的形式。人民公社各生产队內部，随着生产的发展，随着集体所有制的扩大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也必将逐步用价值形式代替其他的劳动量計算方式来进行核算和分配。在这里，正象我們前面所分析的，价值形式只是作为一种計算劳动量的工具被利用；它的存在絲毫不表明这里人們之間的关系，由于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間关系的影响，而变成了商品关系。

在全民所有制內部，既然必須利用价值形式来計算劳动量，那么劳动時間的重大意义，也就表现为价值形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規律的重大作用。馬克思曾指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時間的作用。他指出：“劳动時間将会有二重作用。劳动時間之社会的計划的分配，使不同的劳动机能，与不同的需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別方面，劳动時間同时又当作一种尺度，来計算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参加的部分，从而也計算各个人在共同生产物中可以消費的部分”（“資本論”，第1卷，第62頁）。这是馬克思假設已經可以直接用劳动時間計算的情况。但现实告訴我們，目前还不能做到这一点，而是仍然用价值形式来計算劳动量。因而上面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

時間的二重作用，也就必然表现为价值形式的作用。現在我們就是利用价值形式来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資料，使之建立必要的比例；同时也利用它作为尺度，来計算劳动者贡献給社会的劳动量和应得消費品的数量。既然利用价值形式，而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从而个别企业劳动耗費与社会必要劳动耗費就能进行經常比較，使企业管理者了解到本企业的真实經營状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須在各种产品之間建立正确的比价关系，以确切反映产品的劳动耗費，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企业的真正經營状况和彻底貫徹按劳分配原則。这里表明，价值形式和价值規律显然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因此，說它只是一种計算劳动量的形式，絕不意味着輕視它在目前的作用。但是，不應該把这些对生产的良好作用，理解为是价值这种特殊計算劳动量的形式本身所特有的。实际上，就全民所有制內部來說，正象馬克思所說的，这是劳动時間的作用，而不是这种价值形式本身的作用。假如当建立了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并且又能直接用劳动時間計算劳动量，上面所說的那些良好作用同样是有的。但是在还做不到这一点时，价值形式就是最好的形式，价值規律的良好作用就应当充分地被运用起来。忽視价值規律的作用，就是忽視劳动時間的作用，这会給生产带来极有害的后果。

利用价值形式将是很长時間的事情。



劳动差别的多样性复杂性，使得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即使建立了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严格计算劳动时间，又是发展生产和产品分配所绝对必需的。因此，价值形式就是一种唯一较好的形式，也是一种已经普遍利用而为人們所熟悉的形式。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在目前考虑改变这种形式。在整个实行按劳分配的过程中，它会被利用着；到实行按需分配时，由于这时在主要消费品分配领域内，不再需要以劳动为标准了，这种当作计算劳动量的一种形式，当然也就在这个领域内不存在了。不过那时，它还会被利用在生产上。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指出这一点。例如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說，在私有制消灭后，“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这个分

析，显然是完全符合客观发展的基本情况的。原子量的相对计算形式，既然这样长久地有效地服务于化学物理事业，为什么劳动时间的这种价值形式，就不能在需要严格计算劳动时间的场合，长久地有效地服务于生产的发展呢？只要我们認清，这里的价值形式——不論在消费品分配方面，或者在国营经济之間生产资料分配方面——只是被当作一种计算劳动量的形式运用着，它既不表明这里人們还存在原来那种商品关系，也不会阻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考虑什么时候和怎样来消灭它的问题。价值形式什么时候不再被利用，也是一个自然过程。只要出现了这样的条件：两种公有制形式变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且直接用劳动时间计算比这种形式更简便得多，这时，价值形式自然就成为多余的了。

四 对用按劳分配说明商品关系存在的意見的商榷

目前很多同志，力图从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关系某个方面寻找价值形式存在的根据，其原因就在于他們首先肯定了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真正的商品关系。显然，这种“商品”关系，是不能用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属于不同的生产者这一个商品生产存在的一般条件来解释的，因而就出现了很多的說法。有些同志用按劳分配来说明，有些同志用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来说明，等

等。既然大前提是不正确的，一切的論证和結論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不过，他們既然不是找到了别的，而是找到了这个理由，那就說明，除了其基本前提錯了以外，还必然有着其他的理論錯誤。下面我仅論述一下按劳分配为什么不能决定商品关系的存在。

这种論点錯誤的理論根源，簡單說来，就在于他們只表面地看到了按劳分配



与商品交换共同的地方，即它們都是一种形态的劳动与另一种形态的劳动的等量交换，但却沒有看到二者本質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按劳分配所要求的等量劳动的交换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商品关系所反映的等量劳动交换是在物的形态上的劳动的相互交换，即等价交换。二者的本質的区别，正如上面所說的，就在于这个“等量劳动”中是否包含生产資料的优劣所帶給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就这一点來說，它們反映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經濟关系。按劳分配所体现的等量劳动交换，是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現；而商品交换所体现的等量劳动交换，則只能是以交换双方互相承認对方是其生产資料的全权所有者为前提的。当然，商品交换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分配形式，但并不就是按劳分配。显然，誰也不能因为小商品生产者之間_的交换，是根据劳动进行，而認為他們之間的关系是按劳分配的关系。

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質的商品关系也是同样情况，例如目前各个农村人民公社之間的情况就是如此。各个公社之間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气候条件不同，每年所遭遇的其他自然条件也不同，这一切就使得各个公社花费等量的劳动而有不等的收获量。从而当他們拿到市場上交换的时候，相等的真实的劳动耗费，就不能換回等量的产品。由于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这种情况就使不同公社的社員之間，在花费等量劳动的条件下会有不等的收入。从商品交

换的双方的关系来看，虽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却不是完全的按劳分配关系，可是它却一点也不违背商品交换的原則，而恰恰是根据商品交换的規律（等价交换）进行交换的必然結果。因为在物的形态上交换劳动，人們只能根据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由此可見，在存在实質商品交换关系的地方，是不能完全貫徹按劳分配原則的，就統一的社会范围內，即就通过商品形式交换自己产品的双方的关系来看（不是就每个集体所有制經濟內部來說），是与按劳分配原則不一致的。这一情况不是足以表明用按劳分配來說明商品关系的存在是錯誤的嗎？他們虽然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按劳分配的产物，但真正的商品的等价交换却并不总是有利于按劳分配原則的貫徹的。試图把一种关系說成既是商品关系又同时是按劳分配关系，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用按劳分配說明商品生产存在的論点，主要是用要求严格計算劳动量，来直接引出商品形式的必然性。这种說法的缺陷在于，他們沒有令人信服地論証，按劳分配所要求的严格計算劳动在經濟上为什么必然要求商品形式，而这种形式又为什么是其他形式所根本不可能代替的。我們可以問：为什么不直接用劳动時間，而必然要用商品价值形式这种迂迴曲折的办法来計算呢？我們在具有社会分工和生产資料分屬于不同的所有者这种条件时，通过商品关系来联系是一种客观必然性，不是其他



形式所能代替的了，因為這不是個形式問題，而是一定的經濟關係。但按勞分配這種關係在經濟上卻沒有這種必然要求。

下列兩方面可以證明：（1）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按勞分配和消費品的個人占有是通過勞動券來實現的；（2）實際生活中，例如在農業社中，它的實現也不是通過商品形式進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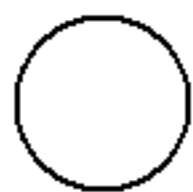
假如要想論證它是實質的商品關係或有商品的內容，那就必須證明它是按勞分配這種經濟關係的一種必然要求，但這就必須證明人們的收入水平是與商品交換的結果直接相聯系的，象真正的商品關係那樣。但實際上，職工的收入是在領得工資時決定的。當他們用貨幣工資去買消費品時，只不過是去實現預定分給他們的那一部分（指勞動量，而不是指品種）。這種交換形式本身並不決定參加交換的人的收入（這一點前而已分析過了）。既然如此，處在這種關係中的人們，為什麼就必須要求利用買賣的形式呢？這有什麼特殊利益可以是在利用勞動券或其他形式中所得不到的呢？顯然沒有。由此可見，這種商品形式就只不過是一種計算勞動時間的形式，

正象理論上和實際生活中所告訴我們的那樣，也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拋掉它而利用別的形式。當然可以論證，在目前條件下，商品形式是一種較好的形式；但為什麼是較好的，就不能用按勞分配來直接說明，而是要探討其他的原因了。

另外，若說為了嚴格計算勞動耗費，就必須有實質的商品交換，那這就不僅是按勞分配的要求，更重要的，它是生產本身的要求。生產本身永遠要求嚴格計算勞動耗費。那麼商品關係又怎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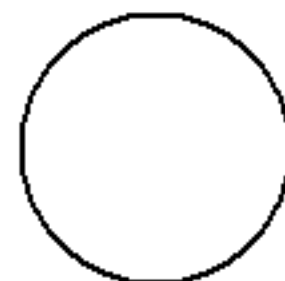
所以，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個人覺得主要是他們只注意了經濟現象表面上的聯系，描述了這些現象，並用因果關係把它們聯系起來，而忽視了從現象中探索經濟關係的本質。這顯然無助於人們對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本質的理解。而做到這一點，卻正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我們必須正確闡明全民所有制內部生產關係的本質，把這種本質揭示出來，使全體勞動者都清楚地認識到，從而更自覺地在這種關係中活動，以利于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

上面只是我個人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同志們指教。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3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三期 ★

目 录

学会更好地计算经济效果 许辛学 (1)

充分利用工业生产的潜力

.....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社论 (5)

共产党员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洪 禹 (14)

依靠群众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 冒第君 秦聿震 陈立言 (16)

速度快 质量高 曹葆铭 (20)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援助” 顾以信 (25)

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 陈伯达 (33)



学会更好地計算經濟效果

許 辛 学

社会主义制度同过去的一切社会制度相比较，是最能够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制度，它有利于我们在发展工农业的生产和建設中，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在解放以后，我国人民只用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經济，使工农业生产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接着，我国人民又用五年的时间，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我国这个事实，在全世界面前再一次地証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国国民經济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党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总方針。这条总路綫、总方針，要求我们能够更合理地用同样的资源和資金，进行更多的生产和建設，使生产和建設发展得更快更好；要求我們不断

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改进質量，不断地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节约每个单位产品內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因此，我們就必须在一切經濟事业中認真地做好經濟核算工作，充分发挥經濟效果。人們已經看到，我們在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創造性，改进生产技术，增加产品产量，提高現代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績，积累了不少的經驗。但是，如周恩来同志在今年四月十八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說，“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的时间还很短，实行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时间更短，我們的經驗还很不足，工作中的缺点还不少，必須繼續虛心地学习，沒有任何理由自滿。”而且，随着經濟建設事业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問題解决了，必然会出现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解决。

我們的任务既然是要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那么，一切方面和一切部門，一切企业单位和一



切人民公社，以及一切經濟工作人員，都应当在自己的工作中，十分注意發揮經濟效果。这里，我們提出当前大家共同关心的几个問題来討論一下。

在基本建設方面如何貫徹執行多快好省的总方針，如何發揮經濟效果，陈云同志在“当前基本建設工作中的几个重大問題”一文中，已經作了詳細的論述。他曾經說到，基本建設項目要分別輕重先后进行排队，这就是一个关系到發揮經濟效果的重要問題。我們的建設規模一年一年地在扩大，需要建設的項目很多。但是，在一定的時間內，建設的进行不能不受到資金、材料、設備的制約。假如不很好地考虑資源、材料、設備等条件，不很好地考虑到劳动力的适当安排，不分輕重先后，而把力量分散使用，就会使許多建設項目不能在短期內投入生产，使投資不能迅速地發揮效果。反之，如果我們很好地照顧到資源、材料、設備、劳动力等条件，适当地有計劃地集中使用力量，建成一批，再建一批，那就能够把我們需要的項目分期分批地建設起来，尽早地把投資效果發揮出来。当然，要达到充分發揮投資效果的目的，在进行基本建設的时候，还必须根据資源、运输等条件和国民經济的需要，具体地研究应当先集中力量建設的是些什么項目，其中大型的是多少，中小型的是多少，那些采取現代的技术，那些采取簡易的技术，以及它們如何布局、如何結合等等問題。忽

視对于国家工业化有決定作用的骨干工程，把資金过分地分散用于中小型工程，特别是用于那些資源缺乏、运输困难和将来生产中消耗原料过多、产品質量不能保証的工程上面，因而不能很好地發揮投資效果，这是不对的。另一方面，輕視中小型企业 and 簡易技术，不注意發揮它們在可能条件下能够發揮的經濟效果，同时，不适当地把国家投資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大型的現代化工程上面，因而不能迅速發揮投資效果，这也是不对的。

工业生产的增加和基本建設規模的扩大，是主要地依靠大量增加新的职工，还是主要地依靠改善劳动組織、改进技术，从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另一个关系到發揮經濟效果的重要問題。我們的国家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必須大規模地建設新的企业，扩建旧的企业，因之也就需要相应地增加工人的数目，当然，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我們必須切实注意遵守經濟原則，也就是說，要根据每个人都能够充分發揮劳动效率的原則，来合理地調配各个方面的劳动力。正是在这个問題上，有些同志的認識不是很明确的。他們不了解經過多年的經濟建設，我国城市中的失业現象已經消除，工人階級的队伍已經空前扩大，可以担負起当前的生产、建設任务；他們也不了解我国虽然有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資源，但是因为农



业生产还没有实行机械化，还缺乏化学肥料，要迅速提高农业的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不是感到过剩，而是已经开始感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把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战线上来，对劳动力的安排不注意工农业并举、重工业并举，是不适当的。因为那样做，一方面将妨碍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轻工业的相应发展，另一方面将妨碍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成本的降低，并且将过分地增加工资的支出，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同生活消费品的增长不相适应。

全国解放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技术水平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总的说来，工业劳动生产率还不高，提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如果我们不主要地从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去打主意，而只是简单地想到增加职工数量，那就不能按照劳动力统筹兼顾的原则，使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就难以贯彻执行党的多快好省的总方针。

在基本建设方面和工业生产方面，再一个关系到经济效益的重要问题，是兼顾数量和质量的问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工业产品不仅数量发展得很快，而且质量是不断提高的。许多企业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加以注意，做好工作，数量和质是量是可以同时跃进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思想上有片面性，就会或者发生

质量提高了而数量增加不多的现象，或者发生数量增加了而质量降低的现象。无论发生那一种现象，都不能使我们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有一些同志却有一种不正确的看法，认为解决了数量问题，也就解决了经济效益问题，而不认识质量的好坏对于经济效益大小的关系。比如，一个企业生产了一万个单位产品，全部合乎质量标准；另一个企业生产了一万二千个同类产品，可是其中合乎质量标准的只有八千个，其他的四千个，或者是次品，或者是废品。以这样两种情况作比较，究竟前者经济效益大，还是后者经济效益大，不是很清楚吗？质量的好坏密切关系到经济效益的大小，不也是很清楚吗？上面是就工业生产方面说的，至于说到基本建设，如果设计不合理，工程质量不好，有的就要返工，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有的会使企业的生产长期不合理，或者影响到产品质量的提高，造成更大的浪费。而这些，正是我们应当竭力地避免的。

我们还要说一說农业的生产。在最近期间，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还是提高全部已耕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且尽可能扩大播种面积，以达到农业上的最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还可以因地，因时，有区别地，有步骤地增加丰产田。但是，要避免那种把大量的劳动力、肥料、种子过分地集中投入少量的土地，因而使



其他大量的土地不能够得到合理經營的作法。至于为了进行科学研究和取得农业增产的經驗，在一个生产单位中用几分地或者一两亩地，反复进行多种試驗，那是有好处的。

总起来說，在經濟建設工作中，每兴建一項工程，每添置一台設備，每增产一种产品，每增加一个职工，每采取一項措施，每支出一笔資金，都必须根据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結合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它的經濟效果。这正是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要求。如果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經濟效果的大小、快慢，想怎样办就怎样办，以为办了就算完成了任务，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对党的总路綫、总方针的曲解。

党的总路綫所說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是要求人們在斗争中，在充分估計客觀可能性的条件下，發揮主觀能动性；“多快好省”，是要求人們在生产和建設中，充分注意發揮經濟效果，不断地增強社会主义的物質基础。前者主要說的是政治，后者主要說的是經濟，而政治和經濟是完全統一的，政治是为着經濟，鼓足干劲、力爭上游，正是为了實現多快好省的方針。我們判断那里的干劲足，那里的干劲不足，那里居上游，那里居下游，当然不应

当以摊子的大小、人員的众寡、花錢的多少为标准，而应当以經濟效果的大小、快慢为标准。也就是說，应当以是否完全实现多快好省为标准。那里用最少量的消耗取得最大經濟效果的，那里才是真正鼓足了干劲，真正居于上游。

当然，要在生产和建設中充分發揮經濟效果，并不是輕而易举的事情，是要积累大量的經驗才能够逐步做好的。对于我們經濟工作人員來說，重要的在于采取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高度負責的态度，認真学会精打細算。也就是說，要对自己所管的单位的經濟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經常找寻提高劳动生产率^①和降低成本的关键問題。在解决这类問題的时候，应当考虑各种方案，經過群众討論，認真地加以比較，选择其中最合理的方案，付諸实行，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和补充。同时，要建立和健全有关經濟核算的各种合理的規章制度，如定期进行經濟活动分析，加強成本管理，制定必要的技术經濟定額等等。我們在計算經濟效果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本单位的內部状况，而且要考虑同本单位有关的外部状况；不仅要考虑目前的效果，而且要考虑将来的效果；不仅要考虑局部的利益，而且要考虑整体的利益。一句話，要瞻前顧后，要照顧局部和全局的統一。



充分利用工业生产的潜力

·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社论 ·

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按其规模说来是整个苏维埃计划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这些数字极其生动地表明我国正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只要指出下面这点就足够了：今后七年内工业产品的产量，将等于我国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的整个时期内所生产的工业产品总产量。可以根据以下的事实来判断工业生产增长的状况：一九三二年工业产品增长百分之一，以现在的价格计算，为八亿卢布，一九五九年为一百一十亿多卢布，而一九六五年则将超过一百九十亿卢布。换句话说，七年计划最后一年的生产总额，以数字来表示，几乎为二万亿卢布。而且在一九六五年，工业产品增长额的四分之三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取得；在七年期间，每个工作者的生产量应当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如果把缩短工作日考虑在内，则产量的增加还要多些。这就是说，产品增长额大部分将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工艺规程以及生产组织的进一步完善来取得的。

基本建设投资的[○]任务也是宏伟的。仅仅国家的投资在七年内就为二万亿卢布左右，而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将接近三万亿卢布，即大约等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历年投资额的总和。这样巨大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国民经济的内部积累，而在建立这种积累中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各种消耗的节约。节约劳动消耗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除节约物质资源外，节约劳动消耗可以大大降低生产费用。仅仅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国营农场内减少生产费用，就可以节约大约八千五百亿卢布。

七年计划的鼓舞人心的数字使苏维埃人产生应有的自豪感。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就自然会考虑到：如何更好地保证完成七年计划，要超额完成七年计划有哪些可能性。正如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决议中所指出的，七年计划的根本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经济竞赛中最大限度地赢得时间”。

而超额完成计划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竞赛中赢得更多的时间，加速七年



計劃根本問題的解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給苏联工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賀詞中指出：“目前苏維埃工会的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是，动员广大劳动群众为努力实现党的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的历史性決議而斗争，为提前完成七年計劃和一九五九年（七年計劃的第一年）的任务而斗争。”

• 我們祖國全体劳动者都参加到爭取提前完成七年計劃的社会主义竞赛中来。列宁格勒机器制造业工人和仪器制造业工人，保証要超額完成一九五九年总产量計劃和完成超計劃产品一亿卢布。为此就要改进产品的設計，使設備現代化，采用流水作业法，更好地利用金屬，等等。仅仅組織鑄造、工具、电极、坑木以及其他大量生产的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一項，就可節約五亿卢布左右。

千百万群众展开了爭取提前完成七年計劃的运动，这个运动旨在更充分地挖掘国民經济内部的潜力，以使用最少的消耗，生产最多的产品。苏維埃劳动者——共产主义建設者非常关心这件事，他們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創造积极性。劳动者福利的增长也同动员潜力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知道，七年計劃規定，工人和職員的实际收入（按每个工作者計算）將平均增加百分之四十，同时大大提高最低工資和公共服务事业的开支，縮短工作時間，建設大量住宅和生活服务机关。我們愈深入地挖掘和利用現有潜力，那么劳动者福利提高的速度就愈快。

要最充分地动员生产的内部潜力，就

得克服許多严重的困难，解决許多新的任务。七年計劃在这方面規定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措施。但是，無論在哪个計劃里，尤其是在远景計劃里，决不能預料到可以用来为国民經济服务的全部潜力。群众的生动的創造性活动以及他們日益提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及时挖掘和实现生产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創造着必要的条件。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決議指出，必須更充分地挖掘各企业的内部潜力和可能性，以便在現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增加产量，不断改进工艺規程和生产組織，改进对設備、原料、材料的利用。

积极动员生产潜力乃是我国生产力增长的补充泉源，實質上是取之不尽的泉源。潜力的利用同技术的进步、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改进有关。利用潜力有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經济为动员潜力創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这首先是計劃經济制度，这种計劃經济制度可以对潜力进行系統的研究，可以采取措旆在生产中利用这些潜力。我国社会巨大的优越性还在于：人們对劳动和公共财产采取新的社会主义态度；劳动者有广泛的可能性来不断改进生产。我們可以利用这些方法取得特別巨大的成就。尼·謝·赫魯晓夫同志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农业工作者會議上說：“……我們由于改組管理而在工业中所获得的一切成就，按其規模和意义來說，大大地超过了我們在开垦荒地方面的工作。在工业中（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不是两块、三块荒地，而是更多的荒地……”，如果“把不可勝数的潜



力利用起来，那么我們的国家就会有更丰富的工业品、农业設備以及人們所需要的一切”。

的确，我們还远沒有实现改組工业管理所发现的一切可能性。但是下面的事实則是实现这一切可能性的一个預兆：产品的生产速度和产量不断地增长着，整个工业計劃在一切主要的指标方面都已超額完成，未完成計劃的企业大为减少。这就是新的管理制度无可爭辯的优越性的証明。毫無疑問，随着国民經济委员会的加强和生产领导的改进，我們的經济成就將愈来愈显著。

工业生产的内部潜力指的是些什么呢？第一，就是企业中（也是整个工业中）目前尚未被利用的、用生产不断完善的方法来改进技术經济指标的現有可能性；第二，就是未被利用的、消灭各种損失的可能性。因此，利用潜力，就是消除同不能完成計劃任务、同亏损以及各种非生产性消耗直接有关的損失。通常，这是明显的、可以考慮到的潜力。不断改进技术、工艺規程和生产組織，通常可以挖掘出隱蔽的潜力，这种潜力乃是生产发展的特別强大的泉源。生产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化学的加工方法，更新設備，使設備现代化，发展专业化和协作，采用流水作业法——所有这些蘊藏着多少未被利用的可能性！但是，在这方面我們还远沒有做到需要做到和可能做到的一切。今年六月苏共中央全会，将听取五个最大的国民經济委员会和苏联部长會議国家化学委员会有关这些問題的報告。全会的召开，乃是党不断关怀

技术进步，不断关怀动员潜力来进一步发展国民經济和提高劳动者福利的生动表现。

在一切工业部門和每个企业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内部潜力。計劃机关和統計机关对于这些潜力进行綜合的研究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可惜，还没有制定出挖掘和測定潜力的方法以及科学的潜力指标。这里尖锐地表现出我們經济科学的落后。

动员隱蔽的潜力的主要方面，就是在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来最高限度地强化生产过程。这实际上就是說，必須經常爭取在保証最高限度地增产的情况下以最少的消耗制造每一产品，使企业的一切資源（人力、物力、财力）最有效地被利用。因此便产生了下列任务：减少制造产品的費力工作，把废品減低到最少的限度，采用最新的技术、工艺規程以及最有生产能力的設備和工具。先进的实践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些任务可以通过不断完善企业生产經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来加以解决。

改进高爐有效容积利用系数是挖掘隱蔽的潜力的显著例子。一九一三年，这个系数全国平均为二点三，一九四〇年为一九一，一九五七年則为零点七九。在这方面，我們早已赶上了美国。但是，在我們的一些工厂里，这个系数比全国平均系数还要好得多。例如，在馬格尼托哥尔斯克鋼鐵联合厂，一九五八年这个系数为零点六一四。而該厂七号共青团員一青年高爐，則达到了世界上最高的指标——零点五



九二。显然，如果大多数企业达到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联合厂工人这样的指标，那么国家就会額外地得到大量的鑄鐵。

我們还可以举利用黑色金屬（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物質資源）为例。節約金屬可以大大增加机器制造业产品的产量，更好地保証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国民經济其他部門获得金屬。据統計，我国的机器制造工厂每年在鉋屑废料方面所损失的金屬达四百五十万吨左右。这些废料所造成的損失总共为二百五十亿卢布。鉋屑有时竟达金屬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已經給国民經济带来很大利益的各种節約金屬的方法是众所周知的。我們不妨举出各种節約鋼材的出产，压鍛、模压以及各种精密鑄造的采用，等等。在波多爾斯克机械工厂，据統計，由于建立了精密鑄造車間，仅九种零件的節約每年就达一千万卢布。例如，制造縫紉机的梭子，从前需要六十三道手續，而且鉋屑达到金屬的百分之八十；当精密鑄造时，手續减少到三十六道，废料也不多了，劳动生产率几乎提高了三分之一。

用压鍛法代替机械加工，可以節約金屬百分之二十五，騰出許多設備，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塑性变形法是非常进步的方法，这种方法暂时还没有在工业中得到充分的传播。然而采用这种方法来生产象鑽子这样普遍的工具，就可以節約金屬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騰出大量車床，可以使生产面积减少三分之二。要知道，許多其他产品也是可以这样来制造的！

在机器制造业中，所需要的全部金屬的百分之八十五，是用来生产大零件——机座、动力架等。在这里，節約的可能性（例如，用鋼筋混凝土代替鋼結構）还利用得很差。在科洛姆納車床制造厂曾建成了机座长达三十二公尺的一个龍門鉋床，它的大零件是用鋼筋混凝土制成的。这个車床所用的金屬共一百二十吨。如果它全部用金屬制成，則必須是三百六十吨。据統計，机器制造业中采用鋼筋混凝土，每年至少可以節約金屬消耗达二百万到三百万吨。縮减机器制造业中不必要的安全系数，包含着特別巨大的節約的可能性。例如，烏拉尔車輛厂由于明确規定了安全系数，便使有棚貨車的重量减少六百公斤，它的載重量則从五十吨增加到六十吨。

对于修复各种机器和机械的破损零件的可能性，我們还利用得很差。而这种修复的方法則是人們早都知道的。这就是噴鍍金屬、鍍銘、焊接等。例如，修理采矿設備的卡拉干达机器制造厂掌握了“鋼的硬化”过程，他們用电鍍法（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容易做到而便宜的办法）在两、三小时内就使鍍层厚度达一毫米半。广泛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大量節約金屬，并大大延长机器和机械的寿命。

关于必須增加木材（按其意义說来，它是各經济部門的第二种材料）的生产和必須合理利用木材的問題，在我国，人們写的和談的都不少。林业和伐木业組織需要大加改进。这可以使最寶貴的原料的巨大潜力用来为国民經济服务。經驗表明，可



以用比較简单的办法在同一面积上大大增加用材的出产量。例如，彼尔姆国民經济委员会的伐木工人，已經在今年預定用这种办法額外获得大約一百万立方公尺的木材，这就可以至少节约五千万卢布。

对伐木区的废料(树节、树枝、树桩、树皮)和鋸木厂的废料(板皮、木片、鋸屑等)的工业加工，可以挖掘出很大的潜力。目前在火柴生产和圓木生产中剩下的废料很多。这些为数几千万立方公尺的原料白白地丢掉了。然而可以用化学加工的办法由它当中取得各种各样的产品：布匹、工艺酒精(它至今都是由谷物和馬鈴薯制成的)、包装紙板、供住宅建筑和別墅建筑用的以及制造家具用的木屑板，等等(順便說一下，西德甚至从瑞典和芬兰輸入木材废料)：目前已經拟定了一些措施，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經過二、三年，仅仅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就可以把木材废料加工达四千五百万立方公尺。这就可以节约二十五亿到三十亿卢布左右。

在更合理地利用設備方面也有很大的潜力。在我們的企业中还有非常多的机器和机械，由于工作組織得不好和缺乏足够数量的备件而閑置着。例如，彼尔姆省森林工业局就有許多机器沒有动用。拖拉机履带环制造得非常少，履带环一到森林里很快就破損了。自然，沒有这些履带环，拖拉机是不能工作的，而拖拉机停止工作就意味着伐木計劃沒有完成。彼尔姆国民經济委员会甚至計劃在一九五九年年仅仅制造八万个履带环，而对履带环的需要則超过

四十万个。多少設備长期閑置而沒有动用！仅仅在俄罗斯联邦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就有将近六万台金屬切削車床和一万五千多套鍛压設備，无法安装。

消除工作时间的損失，是一个巨大的潜力。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企业都有工作时间的損失。各个企业之所以浪费很多工作时间，除了因为它们不注意細微原因、沒有很好地估計到停工和缺勤以外，还因为劳动組織得不能令人滿意以及存在着其他缺点。在許多場合下，这种損失是很大的。为了要消除这种損失，完全用不着采取复杂的措施。每个企业都能够搞好劳动紀律，改善劳动組織和生产組織。

在这方面，下面这个事实是值得提出的：許多年来有节奏地进行工作的问题，并未从議事日程上取消。在这方面，不能說任何工作都沒有做。許多先进企业都能够保証均衡地、正常地进行工作。但是也有許多地方，直到現在还存在着时松时紧的現象。这首先同物質技术供应的严重缺点有关，同不能及时获得一定形状、品种、尺寸、質量的材料有关。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沒有必要的儲备，它就不能按照計劃所規定的質量和期限均衡地生产产品。企业不均衡地生产产品，它們也就不能按照協作計劃供应半制品和制成品，結果，就产生了特殊的“鏈鎖反应”，使其他企业也不能完成計劃。为了改善供应組織工作，改进各个单位(从企业到国家計劃委员会)的供应計劃，还需要做許多工作。但是，正如經驗所証明的，有节



奏的工作多半取决于企业正确的生产組織。例如，莫斯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莫斯科汽化器工厂，乌克兰、列宁格勒和烏拉尔的許多工厂的供应条件同其他企业一样，但是它們却能有节奏地进行工作，这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显然，不是一切都取决于供应。哪些企业有正常的超額生产，哪些企业采用流水作业法，哪些企业的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做得較好，哪些企业能够对一切生产經濟活动进行系統的分析 and 預防检查，那些企业就具备按照工作計劃进行工作、有节奏地生产产品的有利条件。

上述这些例子証明，我們还没有随时随地实现我国由于社会主义經濟制度所創造的可能性。为了保証更充分地發揮工业生产的潜力，从而为提前完成七年計劃創造条件，首先应该發揮和大力支持劳动者的創造积极性，改善經濟領導的方式和方法。在这里，党組織、工会、共青团組織和經濟組織有着广闊的活动場所。

群众創造积极性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連續不断的过程。現在，对生产潜力进行社会检查，已經在各处普遍展开。許多企业从前也进行过各种社会检查，如设备的检查、工作地点的检查、采用合理化建議的检查、劳动組織的检查，等等。現阶段这种检查的新内容和特点是：全盘检查、检查遍及生产經濟活动的各个方面。例如，由于党組織和經濟組織的倡議，弗拉基米尔国民經济委员会各企业，进行了关于挖掘生产内部潜力的普遍的社会检查。弗拉基米尔拖拉机制造厂，决定在

七年計劃的最后一年用节省下来的金屬生产拖拉机。这就是說，必須在每一台拖拉机上节约六百到六百五十公斤金屬。該拖拉机制造厂的全体工作人員正在解决这个任务，检查潜力；在工厂、車間、科室的检查委员会里吸收了专家和生产革新者；編制了消灭“薄弱环节”的具体建議手册；給每个工人分发意見表，讓他們对于怎样在工地上更好地發揮潜力发表意見。全体工作人員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并且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績。汽車器材厂如果实现检查时所提出的建議，就能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完成本年度計劃。靠超計劃降低成本，該厂本年至少将节约二百七十万卢布。該厂的工人說得对：“潜力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列宁格勒金屬工厂在检查生产潜力时有大批的生产者参加。仅仅采用一部分建議，全年就可节约一百一十多万卢布。

爭取共产主义劳动集体和突击队员称号的竞赛，是社会主义竞赛中新的一頁。在这个竞赛中产生了卓越的首創精神。威士尼沃洛茨克棉織联合工厂紡織女工工作队队长瓦林金娜·加甘諾娃(她領導的工作队是工厂中优秀的工作队之一)，以身作則地表现出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她主动要求把她調到落后的工作队去，在一个短时期內，她教会了这个工作队的队员采用先进的劳动方法，因而使落后的工作队一跃而为先进的工作队。現在国内許多企业都来支持这种首創精神。不用多說，这种首創精神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在發揮群众的創造积极性方面，工会



組織的作用正在无比地增长。工会組織的神圣职责是把共产主义劳动队和突击队员的竞赛再提高一步，尽量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技术水平，积极支持革新者，改进定期的生产會議的工作。这里充滿了极其巨大的發揮内部潜力的可能性。

工会應該特別注意群众的合理化建議和发明創造。发明和合理化建議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但是不少有价值的建議还没有被采用，甚至还沒有經過审查。只要举出下面的数字就足够說明这一点了：在一九五〇年共收到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件建議，而采納实行的只有六十五万五千件；在一九五八年共收到二百七十万件建議，而采納实行的只有一百六十万件。采用合理化建議的效果是很大的：一九五〇年由于采用合理化建議，大約節約了五十亿卢布，而在一九五八年，大約節約了八十五亿卢布。著名的革新者，基輔“紅色挖土机”工厂的旋工弗·謝明斯基說，我們有充分可能在更好地安排合理化生产的条件下，一年節約五百亿到六百亿卢布。这种說法是完全正确的。

共青团員表現了动人的首創精神。全苏共青团中央和許多經濟組織以及社会团体，共同決定在一九五九年展开农村青年在农业中提出更好的合理化建議和发明的竞赛。爱沙尼亚共青团中央和国民經济委员会，共同組織了机器制造业企业提出更好的合理化建議和发明的竞赛。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的共青团积极分子建立了“共青团七年計劃基金”，全莫斯科和全省本年已經節約了十亿卢布。建立共青团十亿

基金的思想将会带来巨大的效果。全苏共青团中央所組織的“共青团的扑滿”，在两年內大約已經節約了一百一十五亿卢布。

加强科学工作者和生产者的創造性合作，对于挖掘潜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應該坦率地說，这种形式还没有随时随地加以推广。在这里，科学技术协会（工程技术人員、科学工作者和生产革新者自願的群众性組織）應該做許多工作。科学技术协会的任务是促进技术进步，尽量挖掘生产潜力。現在我国科学技术协会已有八十多万會員。善于利用这个巨大的創造力量就能取得很大的成果。

近来許多城市都在召开經濟會議。經濟會議的主要任务是：最充分地利用生产内部潜力，确定利用这些潜力的方法。例如，下塔吉尔的經濟會議研究了用軋制的車廂軸代替鍛造的車廂軸的問題；烏拉尔車輛厂采用这种方法就能騰出二百四十个工人和節約一千一百万卢布。奧爾斯克·哈里洛沃冶金联合厂的經濟會議研究了許多关于更充分地發揮内部潜力的措施，在今年就能节省四千万卢布。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許多企业的职工力求找到一种可以有系統地进行有关改进生产經濟工作的形式。“劳动报”在各个城市举行“星期二座談会”，許多企业同“工业經濟报”共同組織“星期四經濟座談会”，专门研究挖掘生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的方法。許多企业的定期生产會議、綜合創造工作队的工作都搞得很好。



國民經濟委員會對於發揮潛力起着特別巨大的作用。他們首先應該負起改進和擴大生產的責任。國民經濟委員會的真正職責是改進計劃制度和加強經濟核算，這是積極動員生產潛力的最重要條件。

經濟領導工作中還有許多缺點，這就使挖掘潛力的工作受到了阻礙。例如，測定生產總額和勞動生產率的一些指標，特別是總產值的指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許多經濟學家建議規定固定基金和流動基金使用效果指標，每一盧布現有基金的產量指標，以及其他一些指標。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國民經濟委員會和中央計劃機關特別注意。採用不準確或不正確地反映實際情況的指標，會阻礙生產潛力的發揮。

例如，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國民經濟委員會薩馬爾森林工業局，一九五八年的生產計劃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五，但同時卻使國家受到了七百萬盧布的損失，這未必能算做成績吧！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首先是該局把所謂一個人每一立方公尺的綜合產量當作主要指標，按照這個指標評價該局的生產活動。而這個指標往往不能反映企業活動的真實成績，因而這種指標在經濟上是站不住腳的。

各個企業及其所屬生產單位的計劃任務是根據報表材料來規定的，這是一個最大的缺點。不難理解，這種制定計劃的方法，好象使報表材料中所反映的損失和非生產消耗合法化了。這裡也有着同早就受到指責的、掩蓋真實的可能性和潛力的所謂經驗統計定額相同的情形。應該盡量推行在先進企業中行之有效的編制計劃的計

算方法，這種方法是以勞動、材料、工具、電力消耗的技术定額，儲備定額，生產周期的延續時間，以及估計到經濟效果而規定下來的各種組織技術措施為基礎的。有計劃地交流先進生產經驗，在這一工作中起着極大的作用。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這是很大的生產潛力。我們有編制組織技術措施計劃的豐富經驗，但是我們還沒有很好地利用這個經驗。什麼是組織技術措施計劃呢？簡單地說，這個計劃就是改進技術、工藝規程和生產組織的有目的的一整套措施，這些措施旨在挖掘潛力，盡量利用潛力，為提前完成計劃創造實際條件。早就到了總結和普遍推廣組織技術措施計劃的豐富經驗的時候了。

經濟幹部的培養，在這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現在我們特別需要熟練的經濟工作幹部。工程技術幹部在經濟方面的修養還不夠。許多企業簡直沒有人能夠研究有根據的計劃定額，確定經濟效果，制定組織技術措施計劃，進行計劃任務的經濟計算。許多企業早就不再對生產經濟活動進行有系統的分析了，但是要知道，這種分析在客觀上能夠幫助挖掘表面上看不見的潛力。而生產計劃和生產領導，如果沒有經濟分析，不但不能挖掘潛力，反而會隱蔽潛力。

加強經濟核算，提高企業的獨立自主精神，加強物質責任和物質關心等問題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發揮生產潛力的重要條件之一。例如，正如報刊上一再指出的，按照完成和超額完成計劃而發給獎金，會使企業壓低計劃，因



为这样计划就容易超额完成。如果能够按照实际取得的成績，譬如說按照产量的提高（同以前所达到的水平比較），或按照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某些工业部門），以及按照一定时期所达到的计划赢利指标和成本指标的水平来支付奖金（当然要在完成计划的条件下），那么，就可使企业更深刻地研究生产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以便挖掘潜力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潜力。但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委员会只是在不久以前才通过了一项決議，試行规定高尔基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屬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纖維造纸工业的企业工作人员，因增加生产总额、完成生产计划、超计划降低产品成本而給予奖励的制度。但是要知道，許多企业已經多多少少地有了这种經驗，而且这种經驗已被証明是正确的。現在可以普遍推广这种經驗。

在解决动员生产潜力的問題时，許多事情取决于我国的經濟科学。在七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中指出，現在“經濟学的意义日益增长。經濟学必須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共产主义建設的整个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七年计划提出一系列具有巨大国民经济意义的經濟任务。特别是建立工业生产经济和生产組織方面（或工业經濟研究方面）的专门科学研究所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这个問題實質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但实际上現在还没有得到解决。很早就有了运输經濟研究所、建筑經濟研究所、农业經濟研究所，但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門——工业，却没有这样的研究所。这在頗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实际上誰

也不去研究生产潜力、生产潜力的分析方法、计划和核算、供应和銷售、管理劳动的組織和机械化，等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許多研究經濟和部門經濟的科学研究所很少注意工业生产经济和生产組織方面的工作。

在發揮群众挖掘生产潜力的創造性方面，党組織起着重大的作用。对企业行政工作的經常监督，目的應該在于組織挖掘潜力的工作。对这一工作进行具体领导，在展开群众創造性活动方面对工会組織和共青团組織加以帮助，对一切革新創举給以坚决的积极的支持，同因循习惯和保守思想作斗争，所有这些都是党組織應該注意的中心。同时，做到实事求是和有计划，不容許轟一陣、嚷一陣，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样往往会使人对本来好的事情发生怀疑，妨碍挖掘生产潜力。

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者，懂得更充分地利用生产潜力、加强苏維埃国家的經濟威力和提高人民物質福利水平的重要性。在为超额完成七年计划进行斗争的同时，劳动者清楚地認識到苏联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赛中的巨大作用。他們知道，他們为了提前完成七年计划所付的努力，会使我們在这个历史性的竞赛中贏得一定的時間，而这一点也正是在解决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設的宏伟任务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就的可靠保証。

（潘培新、韓灵銳譯自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1959年第7期，5月18日出版）



共产党员是劳动人民的兒子

· 洪 禹 ·

几千年来，封建統治者在人民群众中間，造成了一种观念：“官为民之父母”。这种观念，反映了剝削阶级对待劳动人民的老爷态度，反映了劳动人民在他们統治下的被压迫地位。同这种观念相反，共产党人认为，一切共产党员，不論他們的資格多老，职位多高，无例外地都应当是劳动人民的勤务員，都应当成为劳动人民最忠实的兒子。

旧社会的“官”，絕大多数只忠于他們所屬的阶级（不論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官”都一样），或者只忠于他們自己（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他們的主要任务，就是代表他們所屬的阶级去压迫和統治劳动人民。有时候为了麻痹劳动人民，以便于他們的統治，他們之中有些人，偶尔也曾經为劳动人民做了一点“好事”，他們就认为，这是对于劳动人民莫大的恩賜，因而要向劳动人民索取几十倍以至几百倍的补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銀”，这就是旧时代的所謂“清官”的真实写照。在他們看来，劳动人民用血汗供养他們，是天經地义。共产党员恰恰相反，即使他們当了党

和国家的干部，即使他們办了許多好事，为劳动人民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他們认为这是他們的义务，除了劳动人民所給他們的一份作为維持生活的工資以外，他們不向劳动人民要求任何补偿。在任何时候，他們只觉得自己給劳动人民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鋒队——共产党的兒子；他們同时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兒子。因为，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解放工人阶级自己和全体劳动人民；如果离开了本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力量，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就不能实现他們的历史任务。共产党员是来自劳动人民，他們和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血肉相連的。共产党员忠于党的事业，也就是忠于劳动人民的事业；为党办事也就是为劳动人民办事。如果他們的工作做得不好，是党的損失，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損失。所以，决不当把党的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决不当把向人民負責和向党負責对立起来。毛澤东同志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負



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做任何事情的出發點。任何共產黨員，只有當他在實際工作中表現了向人民負責的時候，才可以說，他在實際上表現了向黨負責。

舊社會的“官”，做事決不同勞動人民商量，當然更說不上向勞動人民學習。由於階級利益的对立，為了忠于他們所屬的階級，他們便不能不和勞動人民經常处于对立的地位。他們根本不想，也根本不能同勞動人民進行商量。同時，在他們看來，人民是“愚昧无知”的，而他們自己既然是“民之父母”，當然比人民“高明”，當然可以任所欲為，作威作福，稱王稱霸。共產黨員恰恰相反，他們對待勞動人民只能恭恭敬敬，有事同群眾商量，虛心地向群眾學習。共產黨和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除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它再沒有什麼特殊的利益，所以無事不可以同群眾商量。而且，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根據毛澤東同志經常對我們的教訓，歷史歸根到底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只有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共產黨員，作為勞動人民中的先進分子，為了組織廣大人民共同去爭取鬥爭的勝利，的確負有領導人民和教育人民的責任。但是，“教育者必須受教育”。共產黨員如果不善於向人民群眾學習，不懂得有事同群眾商量，他們就不可能實現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力量，不僅在於“它有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思想武器，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和工作經驗”，而且，還在於它“善於把全國人民的智慧集中起來，並且把這種智慧表現為統一的意志和有紀律的行動”^①。

經驗證明，只要我們善於向群眾學習，隨時了解他們的困難和希望，盡力幫助他們實現一切合理的、正當的要求，堅定地相信他們的確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並且緊緊地依靠他們，那末，我們就一定會有無窮的力量，足以克服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難。

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無數優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曾經作了英勇的奮鬥和偉大的犧牲。他們的確能夠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善於接受人民的批評和監督，一刻也不脫離人民，在任何場合，都表現了他們對於勞動人民的無限忠心。他們的確當得起“勞動人民最忠實的兒子”這個光榮的稱號。但是，任何共產黨員，決不應當自滿。毛澤東同志說：“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並且，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要求，用最大的努力，孜孜不倦地去爭取永遠做一個勞動人民的最忠實的兒子。

^① 見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依靠群众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綫

記中共安徽省桐城县石南人民公社双溪大队支部依靠群众领导生产的經驗

冒弗君
秦聿震
陈立言

石南人民公社双溪大队共有二百三十六戶、一千一百零六人，却只有一千二百九十八亩水田和二百一十二亩旱田。不但土地数量不多，而且質量也不好。在全队一千五百一十亩耕地中，除三分之一是較好的夹沙地外，其余都是中下等土地。全队二百三十六戶中，在解放前要过飯的竟达百戶以上。这个过去經常鬧飢荒的地方，現在已經开始成了丰衣足食的幸福之乡。去年他們卖给国家六十九万六千六百斤余粮，今年三月間又卖给国家五万斤。此外，在今年一月間，他們还支援了兄弟队三万三千余斤种粮。在卖出了这些粮食以后，今年三月他們平均每人还有二百多斤口粮。社員們說：“双溪两条河，过去灾害多；自从来了共产党，幸福的日子多！”

为什么双溪大队的人民生活起了这样大的变化呢？一句話，那就是因为双溪大队的全体社員，在党支部的出色领导下，以惊人的努力，迅速地改变了这里的自然面貌，大大地发展了生产。特别是在合作化和公社化以后，他們的生产簡直是日新月异，扶搖直上。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四年間，他們的粮食产量增加了将近三倍。从他們現在的生产情况看来，今年生产还将大大超过去年。社員們說，今年庄稼比去年好多了。

在这里，我們不打算全面地叙述几年来双溪大队的生产是怎样一跌再跌的，而只想簡略地說說，党支部依靠群众领导生产的一些主要情况和經驗。雇工出身的支部書記张玉林同志，并不喜欢向人夸耀他們的支部工作，但是社員們在談到大队的生产发展情况时，总是把党支部摆到头里，他們說：“这是支部的功劳，沒有支部的领导，別說一跌再跌，就連一跌也跌不了！”是的，这話并不夸大，在組織双溪大队农业生产的跃进中，党支部确实是起了堡垒的作用。

双溪大队党支部是怎样組織和领导生产的呢？支部書記张玉林說：“千能，万能，群众最能，离开群众寸步难行！依靠群众，就是我們工作的生命！”事实正是如此。双溪大队党支部几年来领导生产的每一活动，无不貫穿着依靠群众的精神。

双溪大队党支部在领导生产中，凡是遇到比較重要的問題，都



要一再和群众商量；甚至已經作了决定的事情，也耐心地傾听群众意見，并且根据群众的正确意見，修改自己的决定。例如去年十一月份，支部决定日夜突击积肥。过了几天以后，許多群众提出意見說，夜战不行，既劳累人，又功效低，支部应当把积肥任务分給大家，讓大家自己想办法完成，不要死板地規定日夜突击。支部經過研究，接受了群众的意見，修改了原来的决定。結果群众非常高兴，干劲冲天，超額完成了积肥計劃。他們这种虚心听取群众意見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为他們正确地組織領導生产，带来了說不尽的好处。去年双溪大队的大丰收，就和他們这种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去年头半年的生产中，他們連破三大难关的事实，充分地說明了这一点。

去年一开春，他們就发生了肥料运不了的困难。因为肥料积得很多，运送工具却很少；再加上其他工作很多，人手不够，运肥就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問題。有人說，来个車子化就解决了。可是队上的木匠太少，就是全体动員，也是远水不解近渴。支部和大队的干部，想来想去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最后便决定发动社員討論，讓大家想办法。討論会上，木匠童启云很快地提出了“全队大小木桶一齐动員，安上临时木輪，代替車子化”的办法。結果运肥的工作不但沒有耽誤，还提前完成了。刚刚过了运肥关，一下又碰上了秧苗关；一場突然到来的寒流，使六十亩早稻秧苗发生了棉腐

病。这是关系着头半年生产的严重問題。可是全支部十九个党员和大队的所有干部，誰也想不出挽救的办法。难道看着头半年生产完全垮台嗎？他們和群众商量，終于从三十年前曾在江南帮过工的老农汪孔才那里，找到了用熟石膏水治棉腐病的办法。結果六十亩秧苗很快地又健壮起来了。真是“过了一关又一关”，秧苗插上以后，又碰到了九十天不下滴雨的大旱。起先还能用河里的水浇，后来河水也断流了。就在这时候，有人提出了河水太少、舍高救低的主张。許多人拥护这一主张，說不要两头都抓，到头来什么也沒有抓到。这意見說得有根有据，很是动听，可是支部認為，这样損失太大，應該想办法把全部禾苗都浇上。經過全体社員討論后，办法出来了：“全队动員找水源，挖河水，不到山穷水尽，决不放弃一亩地。”就这样，九十天的大旱，沒有旱死他們一根禾苗。这三关的突破，不仅直接保證了夏季的大丰收，并且也为秋季的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社員們說，夏季能丰收，秋季就更能丰收，难道还有比九十天大旱更大的难关嗎！

双溪大队党支部在依靠群众中，有些什么值得注意的經驗呢？概括起来有如下四点：一是坚决信任群众；二是关心群众生活；三是和群众同甘共苦；四是办事实实在在。

坚决信任群众，是双溪大队党支部在依靠群众中的头条重要經驗。坚决相信群众，就是要时时刻刻相信群众中的大多



数，相信他們有无穷的智慧，相信他們能够辨别是非，坚持真理，相信他們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前面所举的許多事实就是証明。当然，群众也会有缺点，他們的意見也有不对的时候；但是只要支部認真地分析群众意見，进行切实的說服工作，通过群众的討論和自我教育，大多数群众是会糾正缺点，修改自己的意見的。双溪大队的許多事实生动地說明了这一点。例如，去年春天，支部根据一九五七年別的大队的成功的經驗，决定推广早稻三六寸密植时，起初只有一小部分青年人同意，而多数的人反对，說是三六寸密植，連稻草也收不回。有些干部認為这个决定很难得到群众的同意，但是支部却坚决相信，只要这种方法是正确的，群众就一定会贊成。事实正是如此，当着他們經過摆事实，講道理，使群众弄明白了三六寸密植可以增产以后，群众便立即同意了这种密植規格。

支部書記張玉林說：“你不关心群众生活，群众就不关心你，还談什么依靠群众！”張玉林的語，正道出了他們依靠群众的另一条重要經驗。双溪大队党支部把关心群众生活，列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去年在抗旱运动中，社員們在工地上劳动强度很高，非常疲勞，支部为了搞好社員生活，专门分配一个負責干部去管理食堂，保証社員能天天喝到开水和天天洗热水澡，夜里还吃到稀飯。支部書記張玉林到各抗旱工地上检查工作時，經常带着一些

簡單藥品，供社員必要时使用，夜里还给社員們盖被。有些社員沒有蚊帳，張玉林等同志就把自己的蚊帳讓給社員用。社員汪胜才中了暑，張玉林和副支書蔣恩胜亲自把他送到卫生所，并帮助汪胜才抹澡和找专人看护。社員們感动地說：“張支書真是象母亲对待兒女一样关心社員！”支部对社員各方面的生活都极其認真負責。有一次社員汪其太到大队部支領香油，当时因为没有油，張玉林叫他第二天再来領。第二天張玉林到乡里开会去了，忘記向別人交代这件事。第三天張玉林从乡里开会回来，一进门就想起这件事，說：“不好，有一件大事沒有办！”有些人很驚訝，問他什么事。張玉林說：“汪其太要領的油还没有打！”有人說：“这点小事，何必这样发急。”張玉林說：“群众生活的事怎能說是小事？”他立即打了油亲自送到汪其太家里。汪其太的母亲感动地說：“張支書真是太关心我們了。”

双溪大队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第三条經驗，就是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双溪大队党支部的干部和黨員們，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高人一等的特殊人物，而是經常和群众同生活，同劳动。按上級規定，大队干部每年要做一百二十个劳动日，可是他們实际参加生产的时间远远超过这个規定。支部書記張玉林的腿有毛病，行走不方便，队里只要求他做一百个劳动日，可是他去年却做了一百二十七个劳动日。副支書、大队长蔣恩德，去年共做了一百八十一一个劳



动日。支委、团支書蔣恩胜，去年做了三百八十四个劳动日。党支部的干部是如此，其他党员也是如此。党员赵厚生同志，在去年带头車水抗旱的事情是十分动人的。他身体虽然不好，在去年抗旱运动中，他还是领着三十多人坚持抗旱。甚至在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去挖河泥，淘水。有一天，赵厚生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水車上一陣头晕，跌了下来，一直滚到河底。当他被人救起苏醒过来的时候，又立即去車水，直到社員們硬从水車上把他拉下的时候，他才休息。赵厚生的模范行动使社員們受到极大感动，他們发誓，人在稻在，一定要抗旱到底。在党员的影响下，群众的干劲很足。例如，社員黃学胜在去年育秧时，为了看护秧苗，在秧田边搭了一个草棚，睡在田边，整整三十多天沒有回家睡过觉。有一次晚上干部去检查工作，看到他身子在棚里面，头却露在棚子外面，这个干部很奇怪，問他为什么把头露在棚子外面，他說：“天要下雨了。头露在外面，雨点打到脸上人就醒了，就可以馬上給秧田上水保温；如果在棚里睡熟了，外边下雨我不知道，不是誤事了嗎？”他說：“育秧是一年的大事，大家要我負担这样大的責任，如果秧苗搞坏了，就对不起社員，对不起党。”

为了实实在在地領導生产，双溪大队党支部很強調試驗。支部書記、支委和許多党员，不仅种了高产試驗田，而且还种了技术試驗田，他們亲自在試驗田里劳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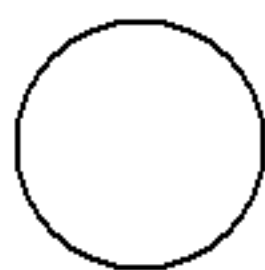
产，以便取得經驗。当生产中发现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問題的时候，他們不是主观主义地輕率作出决定，而是首先組織試驗，然后根据試驗的結果作出决定。因此支部作出的决定一般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得到社員們的拥护和欢迎的。例如，去年开始实行密植时，按照乡里布置的任务，平均每人每天要插二亩多。很多社員說，要实行密植，一个人無論如何也插不了二亩多。支部也認為二亩高了，但是究竟能插多少，心里也沒有底。少数人有急躁情緒，認為群众保守，應該好好批評一下。支部書記张玉林說：“大家还没有經驗，我們自己又沒有底，怎么能批評群众？”于是，支部决定組織几个組进行試驗。支書张玉林、副支書蔣恩德也分別带两个組試驗。試驗的結果，张玉林一个組五个人一上午插了二亩六分，平均每人每天插一亩多一点，蔣恩德一个組四个人一天插三亩八分，平均每人每天插九分多。根据这个情况，支部提出插秧的定額是每人每天插一亩。社員們馬上同意了這個定額，說这定額“在譜”。

双溪大队支部的領導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他們也并不是沒有缺点的。例如，在領導生产上，他們对多种生产和副业还注意的不够，在党內外的思想工作，对有的队也还做得不够。現在他們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点，爭取把工作做得更好。支部書記张玉林同志說：“我們有决心改正缺点，更好地依靠群众，發揮支部的堡垒作用，把我們的生产再向前推进一步。”



速度快 質量高

——武漢鋼鐵聯合企業在建設中



·曹葆銘·

还在去年五月，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記者到武鋼工地採訪，工地的幹部向他們介紹：原計劃一九五九年“七一”建設的一號高爐，要提前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投入生產；一號焦爐也要提前在一九五八年“九一”投入生產。他們不相信。可是事實上，這兩座爐子都已經分別提前在去年八、九月里投入生產了！工人們幽默地說：咱們把他們心上的“？”號拉直了，使它變成了“！”號。

在今年，那些懷疑我們的躍進速度的人，如果來到全面施工的武鋼工地，那就只有目瞪口呆了！

每次，煉鋼工地的同志總是謙遜地向人講：目前施工力量都集中到煉鐵系統去了，他們的工程沒啥進展。但事實上，不久前還在鋪沙石墊層的巨大的主廠房基坑，轉瞬間就扎起了密密層層的鋼筋網，澆起了城垣似的混凝土基礎。緊跟着，又回填了

十八萬土方，並在百多個磐石般的柱子基礎和立着几排拱門的平爐基礎上，開始了安裝工程。

在集中力量加緊建設的煉鐵工地上，速度快得就更令人難以想象。頭天中午，二號高爐的基坑才扎好鋼筋，支好模板和平台，第二天早晨就填滿了一千八百多立方公尺混凝土，築成了一個密實的巨型基礎。安裝工人剛舉行誓師大會，沒過五天，就從平地豎起了三座各有九公尺直徑、四十多公尺高的熱風爐。比一號高爐容積還大五十立方公尺的二號高爐爐體，只用十二天零二十五分鐘，便安裝起來了。築爐工人也在二十七天里，砌完了二千七百多噸高爐本體的耐火磚，比一號高爐工期縮短三十五天。這些工程都經過檢驗，質量優等！現在，這座二月十八日動工的大高爐已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工程量，要爭取在最近投入生產。

與這同時，武鋼還在加緊建設選礦廠、燒結廠、三號焦爐和許多礦山工程，並將



开始建設軋鋼系統。他們今年將生產成百
萬噸鐵，并且开始出鋼。鋼鐵聯合企業的
規模正在逐漸形成。

二

不了解武鋼的規模和作用，是很難理
解又快又好地建設武鋼對國家具有多么重
大的意義的。

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黨
已經提出：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除鞍
鋼外，還要籌建第二個大鋼鐵聯合企業。
當然這是吃力的，但是為了要改變我國鋼
鐵工業的落后狀態，却是完全必要的。武
漢處在我国的中心區（距海岸綫七百公
里），有長江水運之便，產品可以就近供
應中南、西南、華東廣大地區；武鋼建
成後，可以把武漢變成一個新的工業地
帶，在地域分布上將使我国有東北、武
漢一南一北兩個工業基地。這樣，鞍
鋼、武鋼和後來籌建的包鋼，就組成
了我国鋼鐵工業的三根梁柱。

偉大的盟邦蘇聯，用世界第一流的
新技術和新裝備來幫助我國建設武鋼。
被稱為“西歐最大的高爐”的英國威爾
斯鋼鐵公司四號高爐，只不過日產一千
五百噸生鐵，而武鋼建設的每一座高
爐都是日產兩千噸以上。被稱為“平
爐之王”的每爐產鋼五百噸以上的大
平爐，目前全世界只有很少幾座，而
武鋼將在今後若干年內陸續建起八座
這樣的大平爐。它的軋鋼機將具有這
樣大的威力，能把每個七至十五噸重

的鋼錠軋成各種斷面的鋼坯，然後再軋
成各種各樣的鋼板、鋼管和鋼材，供
給國家製造船舶、鍋爐、拖拉機、車
廂和架橋梁、蓋工廠。

在煉鐵工地，原來挂有一幅巨大的
圖畫，它用形象表明：如果提前一天
建成一座優等質量的高爐，將所增產
的鐵製成鋼材，就能用來製造十萬部
雙輪雙鐮犁，或七百輛翻斗汽車，或
建立一座大型熱電廠。早在武鋼籌建
期間，中央就指示要求提早完成該廠
的建設。武鋼正式動工不久，冶金工
業部也發出了關於確保武鋼工程質量
的指示，着重指出：“通過整風運動
大張旗鼓地向群眾進行保證質量的教
育，貫徹‘多、快、好、省’相結合
的方針是必要的，而且要把它變為每
一個工程施工過程中的群眾性的工
作。”

三

經過周密的準備，武鋼在一九五
七年四月八日正式動工。在建築基地
上集中了兩千多台施工機械，修建了
金屬結構廠、混凝土攪拌廠等二十個
工廠和車間。工地的運輸、構件安裝
基本上實行了機械化施工。在已經做
好的兩千多萬土方工程中，有一千五
百多萬方是由巨大的鏟運機、挖土
機群完成的。

從平地建起這樣一個巨大的鋼鐵
聯合企業，在我国的還是第一次，誰
也沒有經驗。武鋼黨委反復進行貫
徹“多、快、好、省”方針的思想教
育，在絕大多數職工心上留



下了这么几个深刻的印象：一个是“武鋼工程要建好，国家命根要扎深”，“必須把优等質量的武鋼交給国家”；一个是“提前建成武鋼，快馬加鞭赶英国”。大家都想尽各种办法使工程做到質上好、速度快、成本低。

在高爐建設的第一仗中，他們就遇到这样一个問題：高爐基础要承担一万四千多吨重量，質量要求特別严格。必須在二十五公尺直径的八角形基坑里，埋設一百二十吨鋼筋和地脚螺絲，并且一气澆灌上一千七百九十立方公尺混凝土，不許間歇。世界各国都选在初春深秋对混凝土适宜的季节里，全部机械化施工，連續澆灌五十多小时。而他們偏偏遇上在酷热的暑季澆灌这个基础，还是用皮带机加手推車，半机械半人工施工。据計算，这样热天必須在三十小时內澆灌完毕，才能保證工程質量。他們进行了四个月的准备，組織了两次大演习。临澆灌时，还发生了意外的皮带机被堵死的現象，急得当場的干部、工人都慌忙跪到皮带机前，用手扣混凝土。紧急間，民工們忘了将受料槽漏口的“插杠”插上，一車混凝土就要往里倒，眼看便会将皮带机砸坏，使工作停頓。机械工向世远猛一下跳进受料槽，用自己的身体当“插杠”堵住漏口，保护皮带机，他被混凝土压得满脸通紅，直冒汗。終于，皮带机被保护住了，施工沒有受到影响。为了使地脚螺絲附近的混凝土能搗得实，并且不撞歪地脚螺絲，近五十岁的老工人姜其斗

就赤身臥在混凝土上，用小震动棒一点一点搗固。結果，他們二十七小时就澆灌完毕，并达到了优等質量。

为了保証高爐爐体的焊接質量和速度，六級电焊工厉煥波在酷暑中練習“高压电焊”。他故意把一块鋼板安在四根矮棍上，从哪边伸手也够不着焊口，再将身子探进鋼板底下，躺着焊，鬧得渾身被汗水湿透，两手被火花燙得斑斑点点。队长見他这个模样，忍不住笑道：“好干的不干，偏弄成不好干的来干。”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說：“能把这不好焊的地方焊好，好焊的地方就更能保証質量，加快速度。”大家都这样認真地勤学苦练，使高爐爐体的焊縫經過透視檢驗，全部达到优等。

工人們还自动提出：“苦干猛干加巧干，白天黑夜輪班战。質量安全全保証，施工效率成倍翻。”他們从技术革新着手，做到又快又好。过去安装一台大型設備，都是采用“分件安装法”，即在基础上一件一件地拼装构件。在安装翻車机中，青年工长郭成志却建議用“組合安装”的办法，将构件在外面拼装成整体，再往基础上吊，这样可以使安装一台翻車机的工期由九十天縮短为四十五天。起初，这个建議被接受后，又被否定了；有些主管人員認為，“鞍鋼都沒用过这方法，我們怎么敢用”。但全国大跃进的浪潮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老工人郭黄金和徐茂珠又帮助郭成志找到了适当的吊装方法，这个建議才第二次被采纳，使这台翻車机在四十五天里安装



完，質量完全合乎設計要求。接着，安裝透平鼓風機的工人也經過一場辯論，用“先安輔助設備，後安本體”的方法，代替鞍鋼胡兆森先進工段所用的“先安本體，後安輔助設備”的方法，安裝效率比鞍鋼提高兩倍，使鼓風機提前開了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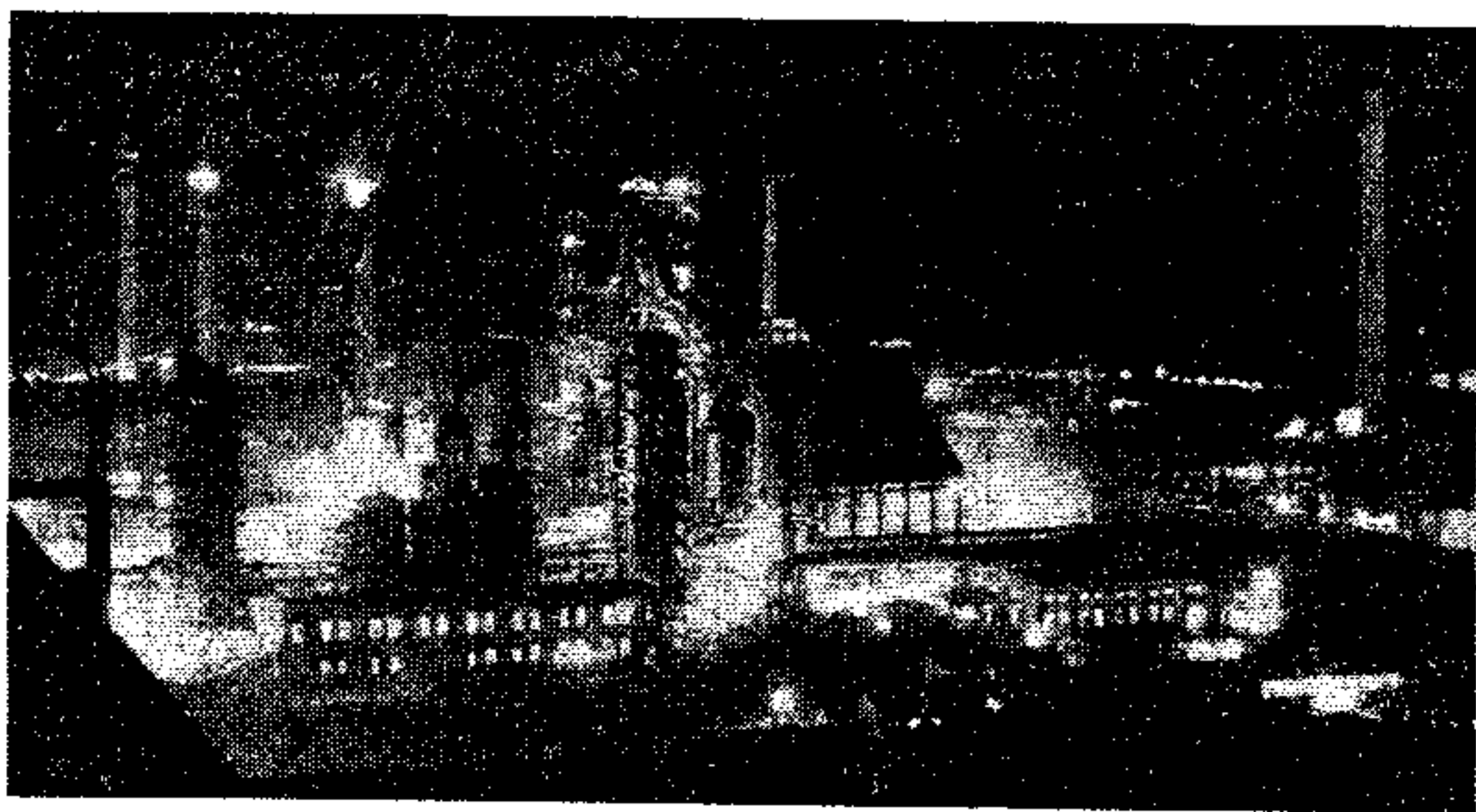
職工們苦戰巧戰的結果，武鋼的一座高爐和兩座焦爐都提前建成了，至今已生產出四十多萬噸生鐵和八十多萬噸焦炭。

四

在今年建設二號高爐的工程中，安裝工人曾提出保證：“七天建成熱風爐，多快好省數第一。”三座熱風爐共有七十八圈鋼板，而每安裝一圈鋼板，連吊裝、找正、焊接在內，得十二至十六小時，七天怎麼

能完成？他們首先運用了去年翻車機“組合安裝”的經驗，事先在地面將七十八圈鋼板拼裝為二十三圈，大大地減少了高空作業，既加快了安裝速度，又保證了工程質量。電焊工房煥波建議的“四邊點焊法”和工長張行烈建議的用千斤頂找正爐圈上部橢圓的辦法，使電焊和找正的時間也大大縮短。

但是，安裝工組長李登香卻遇到一個困難：九公尺直徑的爐圈一吊起來，鋼板就凸出凹進有些變形，對准了中心綫，可對不上錯口。他們用大錘將凸出的部分錘進去，別的部分又凸了出來，鬧得中心綫也移動了，個把鐘頭都對不好。安裝的第二天，就有一圈因為沒對准中心綫，又重新吊起，重新落位。在班後會上，地面的工人批評上面的工人找中心、對錯口的動



武鋼夜景

新華社記者 楊莊門攝



作太慢，影响进度。上面的人却說：“中心綫对不准，要快也快不了。”急得副組長陈全智直催李登香：“这样不行啊，得赶快解决！”这个今年二十七岁，但已在鞍山等地安装过七个大高爐的組長，就同陈全智、张晶澤两个技工一起留在工段办公室里琢磨了半天，找到了一个挺简单的办法：事先对着中心綫，在下一圈爐壳上焊两个角鉄，在上一圈爐壳上焊一个角鉄；上圈爐壳一落位，上圈的角鉄就象栓子一样插进下圈的两个角鉄槽里，任凭你怎么敲打鋼板，都固定得死死的，上下圈的中心綫也就始終对准不动。他这个改进立即和厉煥波、张行烈的建議組成了“边吊装、边找正、边焊接”的三管齐下的新的安装方法，使爐壳安得快，安得好，眼看着节节向空中伸长。他們四天零十九小时就将四十多公尺高的三座热风爐安成，其中心偏差还由設計允許的三十公厘降为九公厘，質量优等。接着，他們又以十二天零二十五分鐘，安起了更难安装的高爐本体，中心偏差由允許的三十公厘降为五公厘。他們还节约了塔式吊机費用三万六千多元。热风爐頂上写着一首描写他們快速优質施工的詩：“东风蕩漾紅旗飘，安装健兒逞英豪。猛干巧干十七天，四爐并立冲云霄。”

炼鉄工程指揮长方如玉同志每次都反复強調：今年能做到快速施工，同时保證优等質量，是吸收了去年大跃进的經驗。在建設一号高爐时，他們按照过去的施工程

序，先筑高爐基础，再筑热风爐和其他工程，将机械、电器安装工程都挤到最后去突击。今年，他們从去年的經驗中找到一个新的办法：先筑热风爐和主卷揚机室、料仓栈桥等安装工程量大的工程，讓金屬結構安装、机械安装和电器安装的工人們都提前进場工作。这样，在高爐本体快建設成功的时候，許多复杂的安装工程，如具有自动連鎖装置的电器操縱盘、秤量車等，都提前安装完毕，既縮短了总的工期，又避免了临时突击，保證了工程質量。

最近，高爐工地展开了群众性的質量检查运动，对每一个已經完成和正在建設的工程，都仔細地严格地检查，逐項交工驗收。他們的口号是：“百年大計保質量，二号要比一号强”，想尽各种办法保證二号高爐达到全部优等質量。

武鋼，这个鋼鉄工业的一支梁柱，在全体武鋼建設者的辛勤劳动下，正在逐步成长，豪迈地参加祖国夺取鋼鉄的行列。

一九五九年六月中旬

更 正

本刊第十期第三十五頁右栏第十五行“逐步地用更多的劣質煤和洗煤用的泥煤来发电”，“洗煤用的泥煤”系“洗煤后的煤泥”之誤。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援助”

願 以 信

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援助”，是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国进行对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武器，也是美国推行殖民主义的一种新方式。

美国对外“援助”的方式，是在先后两次世界大战中形成起来的。美国在两次大战的初期，都没有直接参加战争，而是向交战国大量出口军用和民用物资；及至参战之后，对同盟国的出口就更增加了。当同盟国的财力消耗殆尽或是外汇枯竭的时候，美国就用财政“援助”的办法，使这些国家继续向美国购买军用和民用物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外的大规模的财政“援助”，主要是通过“租借法案”进行的。

战后以来，美国的所谓对外“援助”，主要是根据美国国会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所通过的“共同安全法”进行的，其中包括“直接军事援助”、“防御支持”、“技术援助”、“开发援助”、“总统临时基金”等等，每年支出约四十到五十亿美元，侵朝战争时期曾达七十亿美元。没有包括在这些项目之内，但属于同类性质的，还有剩余农产

品的贷款或“赠予”，每年约十余亿美元。除此之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也应该列入美帝国主义对外“援助”之内。因为这两个机构，都是在美国控制之下，执行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由这两个机构经手的“援助”，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共约六十亿美元。将这三项加起来，从一九四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八年六月，美国对外“援助”拨款总额约为八百四十六亿余美元^①。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最近五年（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出口总值，等于到一九五七年底美国私人资本输出的二点二八倍^②。

直接为美国的 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

美国的各项对外“援助”，虽然名目繁多，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直接为美国

① 此数包括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未动用款项六十二亿美元在内。

② 根据美国现代商业调查一九五八年九月份统计，美国私人投资总数到一九五七年底是三百七十亿美元。



垄断资本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

根据所谓“共同安全”计划，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六月，美国向受“援”国提供了二百零五亿美元的直接军事“援助”^①。这就是供应各种武器、军火工厂的设备、训练军事干部、补助地面建筑和建设海陆空军基地等的费用。美国用这些钱，输出了四万辆坦克和各种战车、一千三百艘舰只、五万七千门大炮、一万架飞机和二百二十万支各种枪支。

接受这种“援助”的一共有四十多个国家，它们大多数被拖进美国所拼凑的军事集团。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美国先后策划组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美澳新公约、东南亚“防务”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等军事集团，并且同许多国家订立了双边军事条约。南斯拉夫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后不久，就在美国的慫恿下，同希腊和土耳其结成了军事同盟，间接地参加了北大西洋集团。

在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国家里，美国根据所签订的条约，都驻有享受外交特权的军事代表团。它们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决定这些“盟国”的军事预算和编制，掌握和训练这些国家的军队。美国把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看做是美国国防力量的一部分。今年一月，艾森豪威尔吹嘘说，美国以这些军事“援助”，搞起了“自由世界”的一支有四百九十万人的陆军，有二千五百艘舰只的海军和三万架飞机的空军。但是，必须指出，美国所供应给仆从国家的军事装备，多是在军备竞赛中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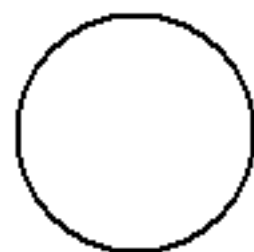
淘汰的装备。这种装备的供应时常不是根据对方需要，需要的有时供应很少，不需要的有时供应很多，零件的供应情况更特别混乱，这就必然对这种“援助”的实际军事效用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

除了直接军事“援助”外，“防御支持”是一种间接的军事“援助”。目前这种“援助”主要是给南朝鲜、南越和蒋介石集团以及土耳其等。这些美国的走卒由于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而经常有财政崩溃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美国特别向它们提供这种非军事性质的消费品和财政“援助”。它所提供的商品，很大部分是剩余农产品。“受援国”在市场上出卖这些商品以后，所得款项再用于军事开支。根据一九五八年度“共同安全”计划，这一项援助约为七亿美元，达直接军事“援助”的三分之一以上。

还有所谓技术“援助”。美国在向受“援”国提供所谓“技术知识”的借口下，派遣了大批“技术专家代表团”在受“援”国勘察资源和收集情报，为美国垄断资本的输出打下基础。

还有一种“开发援助”。过去是以赠予为主，一九五七年改为“开发贷款基金”，以贷予为主。这是用来拉拢那些尚未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的诱饵。美国还可以依靠这种基金，在这些国家里开发生产为美国所需要的战略原料。

^①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艾森豪威尔致美国国会“共同安全计划”执行报告。



“共同安全”計劃中，还有所謂“总统临时基金”。这是为了便利美国总统应付沒有預料到的“需要”，是临时的、不受法律限制的一种对外“援助”。一九五七年支持約旦右派顛复納布西內閣的軍事“援助”，就屬於这种性質。

束縛受“援”国的枷鎖

美国束縛受“援”国經濟的一个枷鎖是所謂“对等基金”。按照美国法律，凡是美国贈予的非軍用（包括“防御支持”）物資，由受“援”国在本国市場上出售后，受“援”国須以等值的当地貨幣存入一項称为“对等基金”的特別賬戶，其中百分之十归美国政府使用，其余百分之九十由受“援”国使用，但是必須經美国批准^①。美国又限制“对等基金”的用途，規定只能供軍事和国防經濟重要設施之用。應該指出，在美国“对外援助”中，名义上是“贈予”，实际变为“对等基金”的这笔資金，是美国在受“援”国可以运用的相当大的一笔資金，美国可以借此来直接干預受“援”国的經濟生活以至政治生活。因为“对等基金”的使用，必須根据美国法律的規定，而这些規定在許多方面是直接侵犯受“援”国的主权的。

还必须提到的是美国的剩余农产品的“援助”，这是根据两种法律規定进行的：一种是“共同安全法”規定的，指定“共同安全”拨款的一部分須用于輸出剩余农产品，

所得收入按“共同安全法”处理。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八年七月底，根据“共同安全法”輸出的剩余农产品，共值二十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另一种是根据一九五四年“农产品貿易发展及援助法”进行的。到一九五八年三月底为止，根据这一法律傾銷的农产品达五十七亿七千四百万美元，其中三十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貸予外国^②。剩余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場价格，而且必須用美国的輪船裝运，運費也高于国际运价。这就使受“援”国遭受相当的損失。剩余农产品出售之后，美国往往又以所得当地貨幣貸給受“援”国，这就使一块美元发生两次剝削作用。截止一九五八年三月为止，根据“农产品貿易发展及援助法”获得貸款在一亿美元以上的国家有十个，其中以印度为最多，有三亿六千二百万美元，南斯拉夫次之，为二亿九千三百万美元，西班牙为二亿五千三百万美元^③。一九五七年二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对这一法律的“庫利修正案”，規定將出售剩余农产品所得外币的百分之二十五交由进出口銀行貸予美国在外国的私人企业。这样就增强了美国公司在受“援”国的地位。

“共同安全法”是直接为美国的侵略和

① 美国“一九五四年共同安全法”規定。

② “国际合作署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第14頁。

③ 同上第70頁。



战争政策服务的，这一点，连美帝国主义者自己也并不隐讳。在这个“共同安全法”中，美国公然提出它的目的是对“友好国家给予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增强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和单独及集体防御，借以维持美国的安全和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还公然说，开发这些国家的资源，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和“便利这些国家有效地参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在这个“共同安全法”中明目张胆地规定，取得军事“援助”的条件是：履行它们所“承担的军事义务”，“对发展及维持它自己和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提供它的人力、资源”，“采取发展它的防御能力所需要的一切合理措施”等等。

由此可见，美“援”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国家资本输出，比一般垄断资本的直接投资更富有侵略性。在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幌子下，美国企图把受“援”国拴在自己的战车上，达到奴役这些国家的目的。

受“援”是名，受害是实

美国的对外“援助”是对受“援”国家野蛮的掠夺。接受美“援”的国家，常常是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为了取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受“援”国不得不支出巨额军费来进行军事化，它们必须花费几倍于美国“援助”的款项扩充军备。从一九五〇年度到一九五八年度，美国对它的“盟国”所给予的军事“援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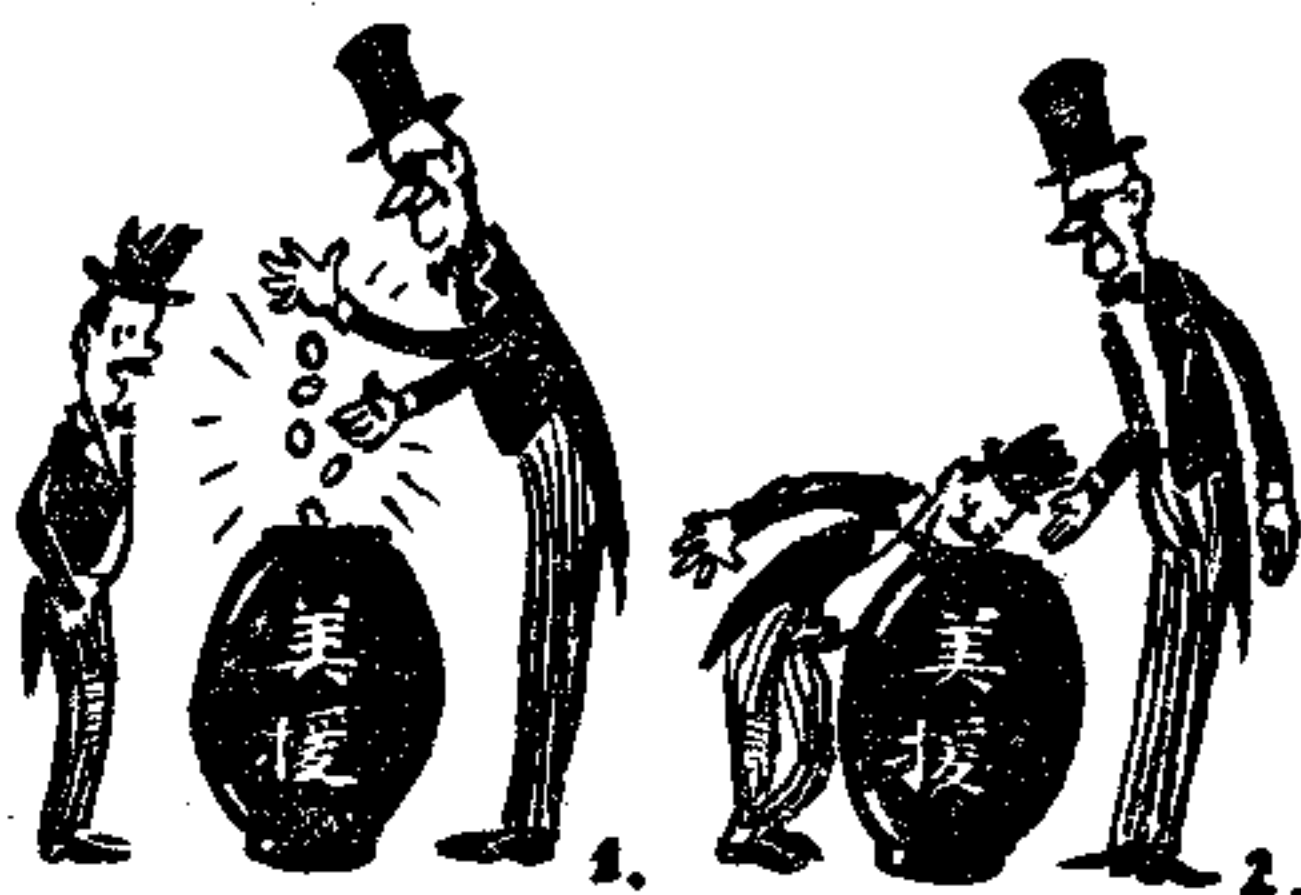
二百零五亿美元，而“盟国”所支出的军费则达一千三百亿美元^①。英国在一九五二年度中取得一亿六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但军费支出达三十八亿余美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占英国军费的百分之四点二。法国在一九五二年度的军费为美国军事“援助”的七倍。这不仅使这些国家负担沉重，而且由于经济军事化的结果，民用生产和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整个国民经济失调。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西欧各国对外贸易差额平均每年达六十五亿美元，六年共达四百亿美元。结果是通货急剧膨胀，货币贬值，外汇储备大大减少，生活费用上涨。

美国的军事“援助”，对不发达国家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例如泰国，自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六月，它从美国得到了军事“援助”二亿七千四百六十万美元，经济“援助”一亿三千七百三十万美元，共计四亿一千一百九十万美元。而泰国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年仅直接军费开支，就达七亿二千万美元，为美国全部“援助”总额的一点七五倍。到一九五九年三月，美国给予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共为二亿三千五百万美元，但巴基斯坦一九五八年度一年内的军费开支即达一亿七千万美元。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巴基斯坦即使能很快地生产出满足国

^①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艾森豪威尔致美国国会“共同安全计划”执行报告。



内所需的足够的粮食，但它仍将长时期地依赖美国的援助，原因在于它要給武装部队拨出大量军费。除了美国的直接援助以外，巴基斯坦每年的军费要占预算的百分之六十九到七十以上。”



但是受“援”国所遭到的灾难还不只这些。它们的工农业生产由于美货倾销而急剧减退。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到一九五七年六月，以美“援”拨款输出的非军用的商品共計为一百七十一亿美元，其中原料及半制品值六十一亿余美元，粮食和肥料等五十亿美元，燃料二十三亿美元，机器及車輛共計只有二十八亿美元，



入 魔 鞅 式

就是六分之五以上是消费品。在这些倾销的消费品中，剩余农产品的“援助”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一九五五年占八分之一，一九五六年占五分之一，一九五七年占二分之一。

剩余农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倾销，使受“援”国受到几重剥削和奴役，使受“援”国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摧残。向

来依靠农产品出口的国家输出也日见减少。现在南朝鲜每年粮食生产比美国占领前减少了三分之一。缅甸和泰国等出产大米的国家的主要市场也被美国夺去了。泰国从一九五〇年接受美国“援助”后，大米输出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木材输出减少了百分之三十，烟草输出减少百分之五十。这些国家的工业在美“援”物资倾销



的压迫下，也日益减产。泰国的纺织工厂关闭了四分之三。南朝鲜的工业生产水平现在还不及日本统治时期的一半，失业和半失业者达六百六十万人。

美“援”又是美国对受“援”国进行政治讹诈的资本。美国利用美“援”支持一些受“援”国的反动集团上台，把它培养成美国的傀儡。伊朗事件是洛克菲勒所亲自参与的“得意杰作”。一九五二年摩萨台首相采取了不依赖美国的立场时，美国就停止给予“援助”，并策动恢复摩萨台政府；在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美国以美“援”支持亲美的萨希迪政府，不但取得了石油利益，而且还迫使伊朗参加了巴格达条约集团。一九五三年美国利用巴基斯坦粮荒，拒绝给予当时的纳齐穆丁政府以援助，并且秘密策动阿里上台。事变成功后，美国立即给予阿里政府小麦一百万吨并增加其他“援助”。一九五四年巴基斯坦便参加了军事集团。

总而言之，美国的所谓对外“援助”，对于受“援”国说来只是受“援”其名，受害其实；而对美国说来则是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正如美国“幸福”杂志所炫耀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参与了好几国政府的建立和倒台。今天美国的驻外大使‘经管’的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通过美国新闻处，美国人不仅为了‘交朋友’，而且是为了把千百万人的思想改造成为美国型的。正式地或非正式地分布在全世界的美国人，正在为建立反共联盟和消灭亲共组织而努力。他们训练并

间接地指挥外国部队。他们管理和支持了其他国家的国民经济。”（一九五七年二月号）这段话概括地表明了美国垄断资本家的野心和目的。

英国象一个牡蠣，被剖开吞食

美国的对外“援助”的目的，既然是霸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打击的对象，不能不首先落到它的西欧的伙伴们，特别是英国的头上。

英国著名的保守党人埃莫里早在一九四六年就预感到：“不列颠帝国好象是一个牡蠣，美国要用贷款来剖开它。不列颠帝国的每个部分，……就将一块一块地为美国依次吞食掉，就将成为美国工业的剥削对象，成为美国财政体系的附属品，最后必将成为美国的附属国。”

英国成为美国占领下的军事基地已有十年。一九四八年，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并借口当年六月的柏林紧张局势，迫使英国工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秘密协定，美国开始派遣B—29型原子轰炸机队和空军人员驻扎英国。从此，一向征服别国的英帝国主义被美国征服了。一九五六年末，美国在英国有三十四处基地，美军人员五万名。驻在英国的美国轰炸机队，经常携带原子弹巡逻飞行，严重威胁着英国的安全。这些轰炸机基地的建筑和维持费用，美国还强迫英国负担百分之四十。一九五七年三月百慕大会议的决定和其后国防大臣桑迪



斯制定的以“核子威慑”为主的五年军事改组计划，进一步肯定了英国本土要充当美国海外的原子和火箭基地。一九五八年二月，英国又同美国签订了导弹基地协议，在东英格兰建立五处美国导弹基地，基地建设费用由英国负担。这样，英国就从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变为“易被毁灭的导弹基地”了。

美国垄断资本家已成了英国工业资本家的太上皇。英国财政部的各种经济计划和政策，华盛顿都要过问。美国在一九四九年公开强迫英国实行英镑贬值，为美国金融势力扩充地盘扫清道路。英国所欠美国债务，约占英国外债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到一九五七年年底，英国欠美国的借款总计四十六亿五千万美元（合十六亿六千一百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利息在内。光是一九五七年英国侵略埃及战争失败后，就向美国借了十一亿美元。这些债务估计在相当长的年代里是还不清的。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它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地球已经瓜分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对任何一块土地都是想伸手要的；第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对德国来说，比利时是一个特别

重要的反英据点；对英国来说，巴格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德据点等等）。”^①

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再分割的斗争中，美帝国主义当然要抢夺殖民地和经济不发达地区，但是它不能以此为满足。从世界再分割的战略部署来看，美帝国主义显然还需要控制已被战败的德、意、日帝国主义，而且需要继续削弱在大战中已被削弱的英、法、荷等帝国主义，夺取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据点，摧毁它们的霸权，以至将这些国家也放在它的控制之下。控制了这些工业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更可以为美国深入到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才能实现它独霸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目的。

老牌殖民帝国，首先是英、法两国，企图阻挡美国对它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进攻，斗争是剧烈的，但是美国还是在许多地方得了势。例如，英国想用自己的“援助”计划——“科伦坡计划”——来对抗美国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但没有成功。自从美国参加了“科伦坡计划”以后，这个计划实际上已变成美国渗入东方的补充工具之一。法国在战后年代对其殖民地的投资，大部分是依靠美“援”。在印度支那战争时期，法国广泛地运用了美国的军事和技术“援助”。现在，美国向南越政府提供“援助”的目的是，将法国从那里排挤出去，巩固美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1页。



位。目前，法国正广泛利用着美国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在阿尔及利亚进行肮脏的战争。

为资本输出开辟道路

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资本输出。美“援”除了本身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资本输出之外，它还为美国企业大量的资本输出开辟道路。美国已经成了最大的帝国主义。在战前，英国的国外投资是二百三十亿美元，美国是一百一十五亿美元，英国为美国的二倍。一九五七年，美国为三百七十亿美元，英国仅剩下一百八十亿美元，美国为英国的二倍多。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就是在英联邦之内，一九五〇年英国的投资还比美国大百分之二十，现在已经扯平为一比一。美国在英国本土的私人直接投资，到一九五七年底达十八亿九千万美元，控制了英国的汽车、机器制造、石油、化学、油脂及日用品的若干重要工业部门。现在英国已成为美国海外私人投资的第三位国家。

美国通过资本输出，进行殖民主义剥削的典型例子，是在拉丁美洲各国。美国的投资占拉丁美洲全部外国投资的百分之八十。美国海外公司全部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五是在拉丁美洲。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住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它们出口贸易的一半，迫使各国成为单一的原料供应地，使它们不得不依附美国，忍受最大限度的剥削。近两年来，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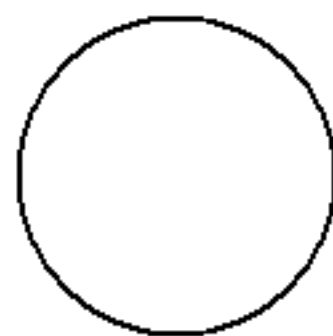
国又把拉丁美洲当作转嫁经济危机的对象。美国一面对拉丁美洲扩大资本和商品输出，一面又提高自己的关税壁垒，削减原料进口，更进一步压低原料价格，使拉丁美洲各国对美贸易逆差激增，工农业生产萎缩，企业大量倒闭，财政经济情况严重恶化。一九五八年，阿根廷、巴西等七国所欠外债，达五十七亿美元以上。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阿根廷人民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五，巴西上涨了百分之三十。

美国垄断资本今后将继续鼓励对外的私人投资。美国打算在十年内，把对外私人投资从一九五七年的三百七十亿美元增加到七百亿美元，发展的重点是亚非地区。作为美国对外扩张工具的对外“援助”的重点，当然也是放在亚非地区。

“援”外重点的转移

美国的对外“援助”，密切联系着美国侵略政策的部署，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重点。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时期，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美“援”的重点，就开始从西欧转向亚非地区。以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〇年相比，“美援”按地区分配的比重有了很大的变化：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从百分之五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六，中东从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七，西欧则从百分之七十九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七。

近年来，美国对西欧国家的“援助”日



渐减少。一九五五年以后，西欧已停止接受“防御支持”，直接军事“援助”也大大减少了。目前美国对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主要是提供现代化武器，把它们当作美国军火垄断资本的主要市场。

对于参加军事集团的亚非国家，美国认为它们已经是“上钩之鱼”，因而只给予军事拨款。至于什么经济和技术援助之类，就采取很吝啬的态度。这在洛克菲勒一九五六年一月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里，交代得很清楚，他说：“在这一类国家中，（美国）政府的补助和贷款主要可以采取军事拨款形式，因为已经上钩的鱼用不着诱饵。”如果还要给予一些“经济援助”的话，那“只能是为了使有关的合适政府继续执政并遏止任何政府的反对派而必要的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例如对土耳其的拨款（经济援助）可能在某种情况下造成同原来的意图恰恰相反的结果，那就是可能加强它的独立和削弱它的现有的军事同盟的倾向”。因此，土耳其想以美国贷款发展本国官僚资本工业的要求，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巴基斯坦想建立黄麻厂和钢铁厂，也遭到了美国“顾问”的拒绝。

美国企图以美“援”拉拢一些中立国家。美国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提出了所谓“援外”的“新面貌”，其主要内容是将“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分开，把“军事援助”列入美国国防部预算，由国防部管理，以便与美国战略、军备计划更紧密地配合。这样分开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为了便于对中立国家进行欺骗。关于这一点，在洛克菲勒写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里说得很清楚。他

说：“在这一类国家中（那些奉行或倾向于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经济援助的重点应该是创造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建立的经济关系最后会使这些国家自然而然地加入我们发起的军事条约和同盟。这种政策的实质应该是：我们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最后会使我们能够在地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立国家，我们应该支持任何想取得我们的帮助着手进行超过真正切实可行的大规模经济计划的倾向。（例如埃及那样——如果纳赛尔政府接受这个援助，那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埃及必定陷入过分庞大的工程上，从而长期需要我们的支持。）通过这种办法，我们可以希望使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转向比较合乎希望的方向。”“在鼓励对这些国家进行私人投资时，应该支持那些反对现政权的部分或者个人。这样，我们就能为使这些国家的政策转到比较健康的方向打好基础。”“这类国家中最重要的一个当然就是印度”。

目前美国正在向亚非地区的某些中立国家推行这种“经济援助”政策。一九五八年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将“共同安全”计划项下的“经济援助”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一并计算在内，共六亿四千万美元。美国不但“援助”印度政府，而且正象洛克菲勒所说的，也在“支持那些反对现政权的部分或者个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希望使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转向比较合乎希望的方向”。但是，实现这样的希望是很难的，因为它必然遭到这些国家广大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反对。



“援助”到那里，那里就反美

美“援”的目的既然是为了霸占资本主义世界，它就必然走向美国侵略者願望的反面，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制造了日益强大的反美力量。美“援”本身是很好的反面教员。美“援”到了那里，那里的人民群众甚至政府人士，都会从自己吃到的苦头中，逐步認識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在西欧，“馬歇尔计划”执行的結果不是“欧洲复兴”，而是經濟軍事化，和平工业縮小，出口下降，政府預算赤字浩大，生活費用高涨。在英国，“要貿易不要援助”的呼声得到日益广泛的响应。

一九五四年以来，美国减少对欧洲的“援助”，固然是由于亚洲形势的改变迫使它不得不轉移它的注意，但是西欧国家不欢迎美“援”，抵制美“援”，也是一个原因。

中近东和非洲的人民，鉴于一些国家接受美“援”后被拉入軍事集团，受到美帝国主义的詭詐和控制，因而把美“援”看做是一种灾难。一九五三年在貝魯特召开的保卫中近东各国人民权利大会通过的決議說：“我們各国要拒絕利用帝国主义的資本……摺弃美国的任何援助，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对于专为推行“技术援助”的所謂“第四点计划”，由于亚非地区的人民反对，使得美帝国主义者甚至连这个名称都不敢提了。一九五三年六月，美国技术合作总署的领导人安德路斯曾說：“‘第四点计划’这个名称将尽可能停止使用。”他說明这一决定是因为“落后国家”的人民

对于“第四点计划”的态度同他們对于早已厌烦了的美国可口可乐饮料的广告的态度一样。“艾森豪威尔主义”也沒有碰到更好的运气，美国派了特使，专门从事兜售，并未騙到更多的魚兒“上鉤”。在一九五七年底的亚非团结會議上，亚非国家一致表明了它們的反对态度，在會議的宣言中严正地譴責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自然，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中也有些人对美“援”还存在着幻想。但是，除了甘願依附美“援”以期苟延残喘的少数人外，許多人都对美“援”抱着怀疑的态度。許多国家因接受美“援”而受害的前車之鑒，不能不使他們寒心。他們所期望的是无条件的、建設重工业的援助，这根本不是美国的“援助”所能办得到的。

美国的軍事“援助”，已日益使它的政策，陷入了自身的矛盾。

美国的軍事“援助”的負担是很大的。在一九五九年度的“共同安全”计划拨款三十二亿多美元中，“軍事援助”和“防禦支持”占了二十二亿多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拿去填了李承晚、蔣介石、吳庭艳等反动集团的无底洞。“华尔街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社論說：“美国似乎承担了一种任何国家都不該承担的义务。”但是看来，美国的这个担子还是不得不繼續挑下去。

美国的政策就是这样地陷入了自身的矛盾。因此，在美国国内，不仅广大人民反对美“援”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在統治階級中攻击美“援”政策的人也日益增加起来。“华尔街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和以后連續发表的文章批評外“援”說：“接



二、三的国家不但没有被争取到美国方面来，反而倾向于中立主义或是亲共。……它往往是树立了敌人而不是争取了朋友。”这家报纸主张大大减缩美“援”的规模，对美“援”进行严格的管理，加强对受“援”国家的监督等等。美国统治集团虽然在利用美“援”进行扩张这一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集团之间利益极为矛盾，各集团所得利益不同，他们在做法、规模、重点、对象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以洛克菲勒集团为代表的“国外利益派”主张实行“广泛而代价很大的援外计划”，他们对于向亚非不发达地区进行扩张具有巨大的野心。但是，中西部和南方财团的主要利益是在国内市场，他们担心美“援”会导致受“援”国的工业发展，从而影响他们的同类产品的销路，所以他们竭力主张大大减少外“援”，强调“节约”。今年国会中新增加一批“自由派”的议员，主张增加国内的公共工程开支，增加住房建设、失业救济等经费，这必然会影响“援”外拨款的数额。艾森豪威尔等人必须考虑各个财团的利益和美国本身力量的限制。美国国会每年讨论拨款计划时，各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之间争吵极为剧烈。去年，艾森豪威尔结合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所有重要头目，采取各种方式向人民进行宣传，呼吁支持，并且组织了許多研究“援”外问题的委员会，进行专门的研究，写报告。即使如此，去年的“援”外拨款还是被国会削减了六亿多美元。这就说明，如果形势没有重大的变化，美国的“援”外拨款要想作更大的增加是很困难的。

当然，美国的对外“援助”今后还是要继续下去，但是它已日益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而更趋被动：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优势不断增长，美国想发动大战已日益困难，美国虽然还未放弃已破产的“实力地位”政策，但它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的挑战”。

二、美“援”的声名狼藉，欺骗面目日益暴露，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无私援助相对照，美“援”已大大丧失其吸引力。美国必须作更多的掩饰，使美“援”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

三、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巨大（一九五八年为三十四亿美元），垄断集团内部对“援”外意见分歧，“军事援助”负担又不能有很大的减少，因而更带欺骗性的“经济援助”数额，不可能有很大的增加。

美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对外“援助”，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金融帝国。经过战后十四年，它并没有达到它原来所预期的目标。它企图控制一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已经处在四分五裂之中。它企图控制一切经济不发达地区，但是在这些地区的反美运动正在高涨，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在迅速消失。美国最忠实的走卒是蒋介石、李承晚、土耳其和其他寥若晨星的反动朝廷，他们的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美国继续对外“援助”，继续对外扩张，必然使它陷于更加孤立的困境。美国的金元所造就的反美力量，终将成为埋葬美国反动派的坟墓。



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

(一九五九年五月在一个座談会上的講話)

陈伯达

在去年科学规划會議上，我講过厚今薄古的問題，引起了一些討論。有的文章写得很好，比如郭沫若同志、范文瀾同志的文章就写得很好，比我講的要好。但是，也有人对厚今薄古这个提法作了錯誤的理解，在思想上有点混乱。例如，有人曾經認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对历史遗产、文化遗产采取粗暴的态度，这就完全不符合我們原来的意思了。

要不要接受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問題，对我們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是在原則上早已解决了的。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就是：英国的政治經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列宁在“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那篇文章中，就講得很清楚。他說：“馬克思主义里絕沒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絕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頑固的学說。恰巧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經提出的种种問題。他的学說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經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說的直接繼續。”（“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頁）馬克思主义是伟大創造性的科学，但这个伟大創造性的科学是有所繼承的，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十月革命后，有一些人，以波格丹諾夫、卢那卡爾斯基为代表，他們主张抛弃文化遗产，企图建立一种所謂“純淨无产階級文化”。列宁在他起草的“論无产階級文化”文件中，严厉地批評了这种錯誤观点。在“青年团的任务”講話中，列宁也講过這個問題。他說：“无产階級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階級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說。无产階級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資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創造出来的全部知識发展的必然結果。”（“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4頁）可見，在无产階級当权以后，接受文化遗产，依然是无产階級的重要任务，那种否定人类过去一切有价值成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很有害的。

在接受历史遗产这一个問題上，毛澤东同志对于我們中国共产党员，同样作过很明



确的指示。他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学习问题的一段讲话中说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态度，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年前所提出的这个任务，对于目前的学术界来说，也还没有过时。

正如俗语所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既然要继承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要对历史遗产给以总结，为什么我们又提出“厚今薄古”的问题？而且在我国学术界中，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工作，已经出现一些活泼的气象，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厚今薄古的问题，是不是必要呢？

我想，厚今薄古问题的提出还是有道理的。道理何在呢？道理就是象上一次说过的，在我们的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中，有一种厚古薄今的偏向，而且在继承历史遗产的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所谓“厚今薄古”，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学术上、文化上的工作，必须有创造性的活动，敢于打破老传统的束缚。百多年来一些启蒙人物曾经先后提出过这样的思想。谭嗣同关于“冲决网罗”的口号，吴虞关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目的都是要求人们从老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追求新的知识。前人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以前那一批人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则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中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对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软弱性，使得过去那些启蒙人物不能彻底地、历史地解决古今的关系，还更缺乏在学术上的真正的独创。他们没有能力对于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在他们那里，或者企图调和古今，托古改制，对过去的批判，限在皮毛方面，而且仅仅采取温和的态度，否认社会事物新陈代谢的斗争；或者有时站在这一个片面的极端，有时又站在那一个片面的极端，把古今都绝对化，认为古代的一切事物都绝对地坏，资产阶级的一切事物都绝对地好，而其中许多人在作了一阵叫喊之后，又回过去，只埋头在旧书堆里面去寻求知识。总之，他们的方法，是折衷主义或者绝对片面性。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打破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按照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无产阶级用这样的世界观去观察自然界发展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对于旧社会进行了



最彻底的批判，揭起了两次社会革命的大旗，鼓舞了全民的觉醒，结果造成了几千年来伟大变化的新局面，而在中国地面上基本上结束“人类社会的前史”。就学术界、文化界来说，远在全国解放之前，已经被这个世界观改变了面貌。无产阶级的解放，形成了全民精神的解放。在全国解放以后，这个世界观正在促使学术界、文化界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而将为我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带来空前未有的繁荣和跃进。中国人民在两次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已经反映而且必然将继续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在学术界、文化界的战线上。新的伟大时代，需要一批又一批的灿烂的群星，需要许许多多新的多才多艺的人物，需要新的大学问。这种新的学问，不是孔子老子的学问，不是程子朱子的学问，不是顾炎武戴震的学问，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学问，而必须是超越中国一切前人所达到过的各种成就的学问，必须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问。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迅速改变旧中国经济贫穷和学术空白的面貌。这种学术的空白，难道仅仅依靠在故纸堆里面寻章摘句，就能够填补吗？难道仅仅依靠我们历史上那些旧知识，就能够填补吗？当然不是这样。旧的资料，旧的知识，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对于我们发展新的学术和文化，有各种不同的用处。但是，我们决不能采取抱残守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材料，而是要利用这些材料“推陈出新”，作为新的学问的养料。我看到有些人的文章引用了恩格斯以下一段话：“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分工部门，都具有由它那些先驱者传授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一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给史密特的信，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95--496页）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是对的。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人在记起恩格斯上述这段话时，却又忽视恩格斯以下的另一段话：“每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我们这一时代的理论的思维也是如此）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反杜林论”旧序，“自然辩证法”，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恩格斯的这段话当然又是对的。不知道这一点，更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但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整理大量的旧材料，旧知识，加以科学的、历史的新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在各种学术领域，各种文化领域，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继续不断地去掌握和整理大量的新材料，经过周密的、系统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作出新的概括。

掌握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识，这是一回事；从古代思想的圈子摆脱出来，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局限的范围摆脱出来，开拓学术文化的新领域，大踏步地把学术文化推向发展的新阶段，这又是一回事。对于后一件事来说，古代的材料，古代的知识，可以作为



启发，作为借鉴，并且，由于无产阶级世界眼光的照耀，在一定场合，象中国一句老话所说的，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但是，一般说来，我们主要地还是得依靠新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日益众多的新材料，新经验，来扩大我们的眼界，探索和揭露前人不能发现的世界和社会的秘密。同时，这也决不是单凭本国已有的历史成果就能济事。我们必须研究世界一切已经达到的伟大成果的基础上，来从事我们学术文化的革命工作。象那种故步自封、坐井观天的“国粹主义”，在这里是不能立足的。

苏联科学文化的伟大的创造性成就，是我们的榜样。解放了的中国人，为了尽快地建设自己的新国家，对于新知识的追求，如饥如渴。从大家努力向苏联学习这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点。

我们国家有很悠久的历史，这是幸事，但是，如果对待不当，又是不幸事。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越来越多地被发现的古文物，这些有吸引人的一定魅力。当然，对于这些，我们现代和后代的人民需要付出一定的力量加以研究、整理和总结，以便对新时代的一切创造性的活动提供有益的援助。但是，如果鑽进去的人过多，特别是鑽进去而不知道跑出来的人过多，成为一种流行的学风，这就成为问题了，这就不妥当了，这就不好了。

资产阶级制度被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可是，资产阶级的学风和习惯还残存下来。在历史研究的问题上，这种影响格外明显。

毫无疑问，在整个学术文化领域中，应该有各种专门的工作。单从社会科学来说吧，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现状，一部分人可以着重研究过去；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理论性的探索，一部分人可以着重从事资料的搜集，文献的整理，工具的准备，外国著作和古代著作的翻译，名物的考据，版本的校勘。我们的学术文化工作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做同类的工作。大家知道，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一些人在做，并且有一些工作进行得不坏，作了有价值的贡献。问题是现在学术界中有些风气是否完全适合于学术文化工作向前发展的利益，是否完全适合于进行理论性、创造性活动的利益，也就是说，是否完全适合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

有些人说：要接受历史遗产、文化遗产吗，很好，我们就是拥有历史遗产、文化遗产的人，你们就照我这个样子办吧。这些人在旧书堆里鑽来鑽去，往往对一些并不重要的事，甚至一个简单的字，也不必要地、不相适应地用了很多时间去考证，几个月，甚至几年，还可以把这些烦琐的考证写出许许多多的文章和一本又一本的书来，不但他们自己以此乐而忘反，而且影响一些青年也跟着一起乐而忘反。马克思主义者为要说明或解决问题，为要探讨某种历史的规律性，丝毫不反对必要的考证；相反地，倒是认为必须掌握大量的材料，做许多严格的考证。而且，只要有需要，对于某一个字，某一件事，



馬克思主義者也並不反對給以周到的考證。但是可惜，我們的學術界中有些人却不是引導自己或別人去認真地、有系統地進行研究問題，不是引導自己或別人去對於具體的歷史現象或歷史事變，從事具體分析的艱苦研究工作，而只是引導自己或別人去做那些並不能說明什麼社會現象或歷史事變、而且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用處的考證，從而浪費自己和在他們教育下的青年人的許多有用的精力。

我們很需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南，重新系統地研究中國全部的历史。可是，有些人却只啃着某些舊書里面的個別材料，甚至只在個別字面的看法上，也可以無休止地爭論下去。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法德文版序言中說過：“因為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隨時都可以找得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種意見”（“列寧全集”第22卷，第182頁）。我們有些歷史工作者的偏向，恰恰是這樣：他們愛在個別的例子、甚至在個別的字句間轉圈子，去證明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進一步地努力，用長年累月的工夫，去引用關於一定時代整個社會生活的材料的總和。這種做法，希望得到科學的結論，不就很难很难的嗎？是不是可以說，這種做法，主要是屬於煩瑣主義的興趣；在實質上並不是科學的興趣？

解放後各少數民族給社會科學工作者提供了關於研究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和農奴社會的極豐富的活生生的材料。憑藉這些新材料，就有可能使人們在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後，寫一部或幾部人類社會發展史的新續編。有些研究機關，有一批研究工作人員，在搜集這些方面材料的工作上，是辛勤而有成績的。就我看來，如果有人能夠再進一步地去利用這些材料，象恩格斯和摩爾根那樣去進行研究工作，其結果必將大大豐富我們的歷史知識，幫助我們在研究漢族歷史的問題上開闢新的眼界，使我們研究全部漢族歷史的工作更容易進行，或許還可以設想，這種研究甚至能够使唯物史觀的內容得到某些新的補充。我們只要讀讀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八六年英文版附注中對於摩爾根著作的估計，以及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怎樣注意利用摩爾根著作中的材料，那末，這後一種設想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並且，進行這樣的 research，使人們不可避免地將會繼續引出全國各族人民必須為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的結論，因此，這種研究工作不只有學術價值，還具有現實鬥爭的價值。但是可惜，我們的歷史科學工作者似乎還沒有充分注意、也似乎還沒有人認真地着手去做這種研究。對於老文獻的枝節考證興趣很濃厚，而對於各種活生生的材料、包括象少數民族這樣的材料的研究興趣不足，這或許也是“厚古薄今”表現的一種形式吧。

也有些人，他們倒不去搞許多煩瑣的考證，却是在繼承歷史遺產、文化遺產的名義下，在玄虛中繞圈子，把古代加以現代化，把現代加以古代化。例如馮友蘭先生曾經提過所謂“抽象繼承法”，在實質上就是這樣。他在最近所作的“四十年的回顧”，已經對這點作了自我批評。我們歡迎他這個進步。但他原來那種思想，並不是只屬一個人的，而



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我还可以在这里說一說。他提出的所謂“抽象繼承法”，其中有些个别論点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它的根本内容是錯誤的。他認為，古代留传下来的許多遺產，哲学史上、道德史上的許多概念，它們的抽象意义是不变的。或者又如他后来所說，它們的一般意义是不变的。他想剝夺哲学、道德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使这类概念成为超客观存在、超時間、超历史条件的某些絕對的、先驗的形式，公式，或名称。他的所謂繼承，就是把它們現成地拿来。按照馬克思主义的理解，如列宁所說，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經過个别而存在。或者如毛澤东同志所說，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实践告訴我們，一切正确的概念，科学的概念，都是从具体事物出发，而又回到具体事物。具体事物是概念的出发点，又是它們的終点。各种概念都是反映一定的相同事物的存在。概念反映具体事物間的联系和联結，反映事物的多样性的矛盾的統一。离开具体事物，就无从进行正确的抽象，就没有什么抽象的概括，就不能够构成什么正确的概念。但是，从馮友兰先生原来的說法看来，具体只能在抽象中存在，只能通过抽象而存在。这就完全顛倒了。抽象变成主体，具体变成从屬和派生的东西。于是，不論古今，任何哲学派別，任何階級道德，似乎都要屈服在馮友兰先生的所謂“抽象意义”或“一般意义”的支配之下。这样，也就可以方便地去磨平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界綫，磨平这个階級道德和那个階級道德的界綫。在这种所謂“抽象繼承法”里面，倒真正有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蘊藏着一种具体的复古主义，即企图經過某种形式保留中国历史上的唯心論体系，企图把中国封建时代統治階級的一套道德都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

有所繼承，必有所否定。我們要繼承什么，否定什么，那都是具体的。比如我們繼承唯物論，就要否定唯心論，能說这种繼承和这种否定都是抽象的嗎？列宁說过：“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嗎？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謨克里特的傾向或路綫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嗎？……”（“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8頁）列宁又說：“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實質來說，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頁）古今中外，哲学上两条路綫的斗争和这种斗争的党派性，具有普遍性。难道哲学史上繼承下来的这种两条路綫的党派性的斗争，在現在是抽象的嗎？在中国，比如說吧，从古代哲学史上一直繼承下来的关于名实关系問題的斗争，这是抽象的嗎？你所繼承的，或者是存在決定思維的觀念，实決定名的觀念，于是你就成为唯物論者；或者是思維決定存在的觀念，名決定实的觀念，于是你就成为唯心論者。繼承正确的东西是具体的，繼承錯誤的东西也是具体的。怎样能說这些是什么“抽象繼承”呢？

“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哲学上的真理，一切科学上的真理，都是这样。道德上也是这样。难道階級社会中各階級的道德是抽象的、超階級的，而不是具体的、階



級的道德嗎？

所謂“抽象繼承”，實際上是把概念孤立在具体事物之外，把概念同具体事物对立起来，否認概念是在人們認識客觀事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否認反映客觀事物和历史发展的概念本身的变化，否認概念的具体性。因此，什么“古已有之”呀，什么“古今是一样的”呀，就是这种所謂“抽象繼承”論必然引出的結論。这种“抽象繼承”論只能引向“頌古非今”的道路。

馬克思主义者認為必須把各种不同遺產的性質區別出来。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我們應該把它們區別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要吸收精华，排除糟粕，“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当我们說繼承是具体的，也就是說，我們对于繼承，是带批判性的。繼承和批判，是对立的統一。馬克思主义所以是伟大的創造性的科学，因为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說；因为它不是简单地繼承前人的遺產，而是对于前人的哲学、政治經濟学、和社会主义学說，都作了深刻的批判和革命。恩格斯曾經这样說过：“如果先前沒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自古迄今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便永远不会創立起来。”（“德国农民战争”一書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627頁）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也正如馬克思自己說的：“我的辯証法，在基础上就不只与黑格尔的辯証法不同，并且是它的正相反对。”（“資本論”第1卷，第17頁）馬克思对于費尔巴哈的唯物論，也是有批判的繼承。在政治經濟学方面，馬克思的伟大著作“資本論”的副題，就是叫做“政治經濟学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揭起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伟大旗帜的。

大家熟知，列宁在哲学、政治經濟学和社会主义学說的各个战线上，繼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事业，做了許多极其博大精深的批判的、革命的創造性工作。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經濟派、孟塞維克、經驗批判論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托洛茨基派以及各种“左”傾机会主义者等等的毕生斗争中，大大地丰富了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阶段。

我們中国共产党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的一系列著作中，在接受了中国前人各种优秀遺產的同时，同样也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态度去对待各种遺產。

在十九世紀末年，列宁在他同俄国民粹派爭論的“我們究竟拒絕什么遺產？”的著作中，对于馬克思主义在繼承和批判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作了很精闢的概括。他区别当时俄国有两种不同的遺產：“一种遺產是一般启蒙者的遺產，是对改革前的一切东西采取絕對敌視态度的人們的遺產”；“另一种遺產是民粹派的遺產”，是“宁肯停滞”、“宁肯讓农民繼續停留在自己陈旧的家长制的生活方式之中”的遺產。同时，他又說：“学生們（指当时俄国馬克思主义者）較之民粹派分子是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遺產保存者。……但是不用



說，‘學生們’保存遺產，并不象檔案保管委員保存舊紙那樣。保存遺產，并不等于局限于遺產”(以上引文均見“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50、52頁)。總之，第一，馬克思主義者要區別遺產中的精華和糟粕；第二，馬克思主義者既要有繼承，又要有批判。

在兩條戰綫上進行鬥爭：一條戰綫是反對右的復古主義。這種右的錯誤傾向是：只要拾古人的余唾，認為凡古皆好，加以膜拜，而否認正當的批判。一條戰綫是反對“左”的幼稚病。這種“左”的錯誤傾向是：把批判當作抹殺一切、割斷歷史的粗暴的簡便手法，用現代革命無產階級的标准去要求和責備古人，把過去的歷史看成錯誤的堆積，而否認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繼承。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兩條戰綫上的鬥爭是正確的，因為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歷史地看待一切，根據各種事物出現的具體歷史條件，它們包含的具體歷史內容，進行具體的分析。即使是遺產中的精華，如舊唯物論，朴素辯證法，各種帶有某種進步性的思想和文化，也都是歷史地看待它們，承認它們在歷史中所應得的地位，分別它們里面的正確部分和不正確部分，既不誇大它們的作用，也不縮小它們的作用。歸根到底，是在於鼓舞人們向上的創造力。

隨便引用中國歷史上的兩個例子來說。唐朝韓愈是在文體上進行創造性的革新者；他的主張是：“惟陳言之務去”。清初顧炎武是一代學術風氣的開闢者；他認為：“文章之病，全在模仿。”他還進一步主張：人們要著書，“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在這裡，我不想說到他們所達到的造就的問題。他們都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對於他們造就的看法，不能離開他們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我在這裡想說的，是這樣的事實：一方面，他們都力求精通古文、古書；另一方面，他們所以能夠有某些成就，就是因為他們畢生下過苦工夫，而在一定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傳統的束縛。

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歷史上那些有或多或少創造性成就的，也都是或多或少不受傳統束縛的。

解放了的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除了失掉帝國主義和舊社會的鎖鏈以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掉。歷史上有過的精神解放，再沒有什麼可以比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解放的時代更徹底的了。而且，在解放後，全國社會生活所提出的問題，同樣是前無古人的。“厚今薄古”的提法，實質上是反映了這樣的解放和解放後的這個新的局勢。

但是，一定的口號和公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象上面所說的種種內容，就不能完全由“厚今薄古”這樣簡單的口號充分表達出來。曾經出現過有人把這個口號加以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偏向，也發生過一些誤會，例如，似乎以為考古不必要了，古代歷史的研究不必要了，古書的校勘和注釋不必要了，古書今譯的工作不必要了，從事上述這些工作的老專家需要改行了，在學校里也不必給學生以必要的歷史知識，也不必讀古典作品了……如此等等。我原先沒有把問題說得很清楚，這是要由我負責的。



无论如何，实践是第一，实践是一切方针、口号的试金石。既然一定的口号、公式都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只在这个“厚今薄古”口号上空空洞洞地尽说尽谈下去，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并不会增加一些什么。我们想望的，就是要有一批一批的人真正能够好好地去做。而果真这样，也就会经过一段时间而出现许多出色的新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风报告中说过，“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逐步克服这个矛盾，是我们整个理论战线上、科学战线上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付出很大的精力。在科学上拣便宜，此路不通。想在这里一下子成名，想搞些什么投机，想赶些什么“时髦”，这就根本打错了主意了。必须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搞清楚一件事又一件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上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科学面前，就是必须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前人有过一副对联，联文是：“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用我们的话来解释：我们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战士，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满怀洋溢着战斗的乐观主义，这叫做：“心中别有欢喜事”。但是，要实现我们的目的，必须经历一系列曲折的道路，并且，必须夺取科学的堡垒，而夺取科学的堡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堡垒不容易夺取，小堡垒也不能轻易夺取。这又叫做：“向上应无快活人”。谁以为随便找一两件材料，说些空话，就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就能成为一个有贡献的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科学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应该以工人农民做自己的模范。工人造一个工具，造一所房子，农民种粮食和各种作物，都要有一系列的艰苦的劳动。任何生产成果都不是轻易取得的。对前人劳动的经验，在没有经过具体的分析、没有取得新证实的经验之前，也不好随便抛弃。剥削阶级是不劳而获的，但在历史上，一切科学家，一切有学问的人，是没有不劳而获的，没有不经艰苦劳动而能有所成就的。孔子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所谓“生而知之”，根本上没有这回事。孔夫子是封建时代的教育家，他也不承认自己是“生而知之”。世界上从来没有“生而知之”的科学家。那有不学，不困，而成为科学家的？当然，也不会有人因为只在厚今薄古这一口号上背得非常烂熟，而一旦忽然成了科学家。

我想，真正厚今薄古，真正看重现实的问题，看重各种还没有解决而正待解决的问题，就要认真看待学问的工作，而在工作上不会觉得是“轻松愉快”，而会觉得是一种很沉重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最现实的、最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总是较复杂的问题，总是较困难的问题，总是要求我们付出更大力量去反复研究的问题。思想有了一定的结果，可以有些“轻松愉快”，但在有“轻松愉快”之前，会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难产的过程。要研究一件事，必须经过很苦的思索。“皇天不负苦心人”。任何一个人肯劳动，



总会有结果，大结果或小结果。苹果有大有小，小苹果也是苹果。可以有大大苹果，可以有小苹果。无论如何，付出了劳动，就会给我们一个代价——一个果实。

否认条件，那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一种错误的想法。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要求正确认识各种具体的条件，正确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比如拿学问这件事来说，你要得到学问，就需要有一定的条件。肯劳动，继承中外前人的成果，向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先进国学习，这些就是条件。我们要向科学要东西吗？当然可以。有多少劳动，科学就会给多少东西。不经过艰苦的劳动，想成为科学家，科学就会关起门来，不让你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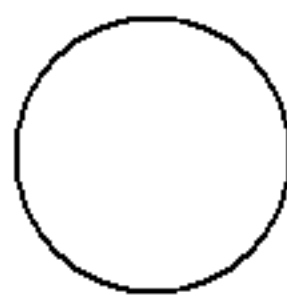
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上孙悟空吃仙桃的故事。据说，吃了仙桃，就可以长生不老。孙悟空是经过锻炼，经过奋斗，才能够到天宫吃到仙桃的。我们要吃科学的仙桃。但是，如果没有下苦工夫，没有艰苦的奋斗，从哪里去得到科学的仙桃呀？

恩格斯给史密特的一封信，可能大家读过。可是，好文章不厌百回读。我们不妨再读一读。恩格斯在信上是这么说的：

“一般说来，对于德国许多青年作家，‘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词不过是一个套语，他们用这个套语去处理各种事物，再也不花什么气力去作进一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一切都解决了。然而，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首先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生存条件，然后才可试图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至今都还很少作出什么东西，因为还很少有人认真作过这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领域极为广大，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有很多的创造、获得卓著的成就。但是，在许多青年一代的德国人那里，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须知，经济史还只在襁褓之中呵！）尽速构成系统，而后自豪地欣赏自己的功业。”（“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87—488页）

恩格斯这些话是在一八九〇年八月针对德国一些青年作者的情况而说的，离开现在快近七十年了，但这些话也象现在对我们说的一样。在解放了的中国，不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需要我们研究的领域，真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是无限广大，谁只要肯认真地去，就可以有很多成就，就能够出人头地。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有些人总是想把“唯物论”几个字象标签一样贴来贴去，而有系统地认真努力和刻苦工作却嫌不足。事实上，我就很担心有人会把“厚今薄古”这个口号当成一种“时髦”的空名词，把它当成一种概念的游戏而了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记忆并重新温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候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同志在那些著作中告诉了我们的基本途径。其中有两句话需要引起我们经常注意，这两句话就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附 录：厚 今 薄 古，边 干 边 学

（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以前报上发表过一个摘要，現在发表的，是經本人略加整理过的记录稿。——伯达）

今天講的題目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一年以来，思想战綫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在科学界取得了胜利。右派在群众中被孤立了，中間的向左轉。在学术界中情况很清楚，归根到底：或者是人民的朋友，或者是人民的敌人，中間道路是没有的。現在在工厂、农村里，人人在談跃进，大家在努力爭取我們的事业的跃进，这是在思想战綫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新的革命气氛。

有人問：科学界要不要跃进？能不能跃进？如何跃进？既然我們的国民經济都在跃进，如果中国科学界不跃进，那不是脫离实际太远了嗎？思想要反映社会的存在。跃进是可能的，是必要的；問題是如何跃进。一个題目可以写許多文章。科举时代，一个題目就有几千人应试，做出不同样的文章。对于“如何跃进”这个題目，大家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文章，我今天做的是其中的一篇。

在我看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虽然还是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但是八年多来成績还是主要的：有一批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对資产階級思想的批判很活跃；报刊上有不少好文章——馬克思主义的文章；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中有相当一批人已經轉到或者靠近工人階級这边来了，在学术資料的搜集上也是有成績的。所以应当說，我們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虽然落后于革命实际，成績还是主要的，并且正在进步中。

为了更好地前进，要能够看到我們的缺点，并且努力改正这些缺点。我們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上的缺点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缺点之一，就是“言必称三代”的煩瑣主义的学风相当盛。有些人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問題似乎不感兴趣，很少去研究，而对于过去的事情，几千年前的东西，討論得津津有味。历史是不是需要研究呢？当然是要研究的，但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充实我們的知識，而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有助于解决现实的問題。如果为历史而历史，为三代而三代，那就势必陷进无穷无尽的煩瑣的考据、猜测和假想中間。煩瑣主义，迷恋古代，这是資产階級遗留下来的风气。胡适就是如此，開了一下白話文，就去搞“国故”去了。在全国解放后，有一些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想逃避现实，脫离实际，脫离社会生活，把自己藏到“三代”的角落中去，把“三代”当作“象牙之塔”。这当然不是无产階級的风气，不是馬克思主义的风气。



我想引一段馬克思对于思想工作的根本看法的話。他說：“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來說，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頁）我們現在一些哲学家的文章就沒有做到这一点。离开社会主义大革命、大建設的时代生活，就不能表現我們时代的精华，就不是战斗的馬克思主义。

在喜欢研究古代的人里面，有些人以为，古代的問題，人都已經死了几千年，要怎么講，随便你，不受約束。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当然，死人的問題多得很，有些問題或許是搞不清楚的，而且也不值得我們去把它們搞清楚，即使搞清楚那些問題，博得死人点头，并不能幫助我們科学地了解历史的真象，更不能幫助我們解决当前现实問題。对于我們所必須搞清楚的历史問題和现实問題，要能真正搞清楚，都必須認真地花一番气力，不花气力是不行的。作为馬克思主义者，要向哪一个方面进攻呢？要攻最困難的問題，不要去攻那些得不到結論、而且得了結論也沒有什么用处的問題。

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不做考古的工作。恩格斯就考过古，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个著作。恩格斯研究古代社会是为了闡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向。他的这种研究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也具有现实的斗争意义。可惜我們有不少文章，远不是这样。我們应当和“言必称三代”的煩瑣主义的风气作斗争，扫除这种不好的风气。否則，它就会堵塞住我們馬克思主义前进的道路。

我們是人民的战士，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我們應該面对現在，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现实的問題應該是我們研究的主题。从现实的問題出发，对于古代的問題也更好解决了。沒有研究資本主义社会，或許恩格斯也很难写出他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馬克思講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鑰匙。在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征象，反而只有在已經認識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資本主义經濟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政治經濟学批判”，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頁）这就是說：对于資本主义社会的認識，給了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提供了一把鑰匙；有了关于現代問題的科学知識，对于古代的問題就更容易了解了。我們懂得了現代，就会更清楚地知道應該如何去研究古代。这是一个方法問題。

我們是不是可以作这样一个建議：对于整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布署，在哲学、經濟、历史等等学科，應該着重研究现实的問題。古代的問題，要研究，还要作專門的研究，还要出一批專門家，但應該是在唯物史观总方向的指导下从各方面来作有系統的研究。研究古代也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孔夫子說过：“温故而知新”。“温故”也有个目的，目的是了解新的东西。連孔夫子都知道这个道理，如果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反而不懂，这就太說不过去了。

至于学校中的教学，当然必須按照学生增长多方面知識的需要，逐步地使學生們学得必要的历史知識，获得必要的文化修养，而因此，教師們需要在自己教授的功課上，



尽可能地進行關於這些方面的充分準備工作，那是不用說的。

我們說，那種無目的的、煩瑣的歷史研究應該有個根本的改變，但是歷史學家並不會因此而“失業”。對於我國歷史的真正的科學研究還是很少；我國的古代歷史和現代歷史都需要認真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八年多了，每年都可以寫編年史。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還都沒有人認真地去寫。如果要寫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應該研究一下三反五反運動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中所提供的材料。寫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對於當前人民的教育，就很有好處。

學術要為一定的時代、一定的階級服務，要表現了那個時代，才能對那個時代起積極的作用。就是說，我們的學術界不要總是面對古代，背對現代和將來，要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認識中國人民鬥爭的新面貌，認識中國全局的新面貌，認識中國和世界關係的新面貌；要對於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所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新經驗，用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在各个方面，在哲學上、政治經濟學上和歷史科學上，作出新的概括，使中國的學術成就大大地高出過去中國一切歷史時代的水平。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厚今薄古。這樣，社會科學的發展就會對新中國的建設、對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

以下講第二個問題，即邊干邊學。

在這個問題上，我想引用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一段話。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革命隊伍內部對於如何學習戰爭，有爭論。有人說，戰略戰術在書本上有，只要從書本上學。毛澤東同志不同意，認為主要地是從實踐中學習。他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9頁）這是就當時的內戰問題而說的。但是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這個方法問題有普遍性的意義。不論是對於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邊干邊學這一條都適用。

似乎有這樣一種說法：你沒有進過大學，留過洋，得過博士學位，也不是國際上的名教授，搞什麼學問呢！有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瞧不起老干部，也瞧不起新幹部，大模大樣地看待學生。在某些方面，他們的學問可能很不少，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古今中外沒進大學，沒出過洋，沒得博士學位，而很有學問的人也很不少，有的連小學中學也沒進，還是發明家。進過大學得過博士學位的人，當中有很多人是有學問的，如在座的就有許多；但是，這不等於一切進過大學、得過學位的人都有很大學問。過去考狀元，狀元的卷子，沒有幾份流傳下來的。有學問的狀元是有的，但是可以說有很多考上狀元的人也不一定有學問，而許多“無名小卒”卻在實踐中得到很多的學問。

共產黨員是行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八年來，我們一個勝利接着一個勝利。沒有一批具有相當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員，不可能在我們這樣一個大的國家里領導



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有許多是在行動中學得的。當然，共產黨員都應當繼續邊干邊學，繼續在行動中不斷地努力學得新的知識，新的本事，不斷地提高自己。

任何人都應當有自知之明。即使有了一些成就，但同中國人民翻天覆地的成就比較起來，同一些偉大的科學家比較起來，有什麼可驕傲的呢？孔夫子說得不錯：“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我們共產黨員應該謙虛，不然，這個共產黨員就難有什麼出息。我們應該尊重有學問的知識分子。在科學的面前，採取傲慢態度，是不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謙虛，是不是希望很大呢？當然也不是。謙虛有好處。客客氣氣，口頭上講講我不行我不行，並不一定是謙虛，或許只是虛偽的“謙虛”。我們要說的，是實事求是的謙虛，是科學的謙虛。什麼叫謙虛呢？謙，兼也，就是要避免片面性。所謂虛心，就是要讓頭腦騰出些地方，不要自己裝得滿滿的，外面的東西才進得來。“心”（就是指我們說的頭腦）如果不“虛”，而是塞得滿滿的，外面什麼東西都裝不進去，這個人還能希望得到什麼新知識呢？我們共產黨員有必要謙虛，一切知識分子也有必要謙虛。中國人民做出了多麼偉大的成績，而我們學術界做的成績實在太少了，我們要趕上去，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跟着人民前進。

自卑是另一種錯誤。我們許多老干部、新幹部、知識不多的人，在求知問題上，並沒有什麼悲觀的理由。我想，任何人只要肯努力，就不必悲觀。郭沫若同志在“金文叢考”一書的“重印弁言”中，介紹了自己寫書時的一種心情，就是要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胡適之流挑戰。他說：“我要向誰挑戰呢？我準備向搞舊學問的人挑戰，特別是向標榜‘整理國故’的胡適之流挑戰。從前搞舊學問的舊人，自視甚高，……因此，我想搞一點成績出來給他們看看。結果證明：所謂‘國粹’先生們其實大多是假古董。”郭老提到胡適時，又說：“這位標準的買辦學者，你看他是怎樣盲目而無知！因此，我就準備拿點他們所崇拜的‘東西’來‘打’這個狂妄的家伙。結果呢？我們今天也已經看得很清楚，那自稱‘有東西’的家伙究竟有的是什麼東西了！”看來郭老這段話，到今天還很有意思。右派向我們挑戰，我們還要向他們挑戰呢！右派他們有什麼東西！我們邊干邊學，幾年來學得並不算慢。右派說今不如昔，說過去多好，“胡適文存”一本又一本。郭老拆穿了這類假古董。我們還應該經過認真的研究，繼續揭穿一些在人民面前大搖大擺的假古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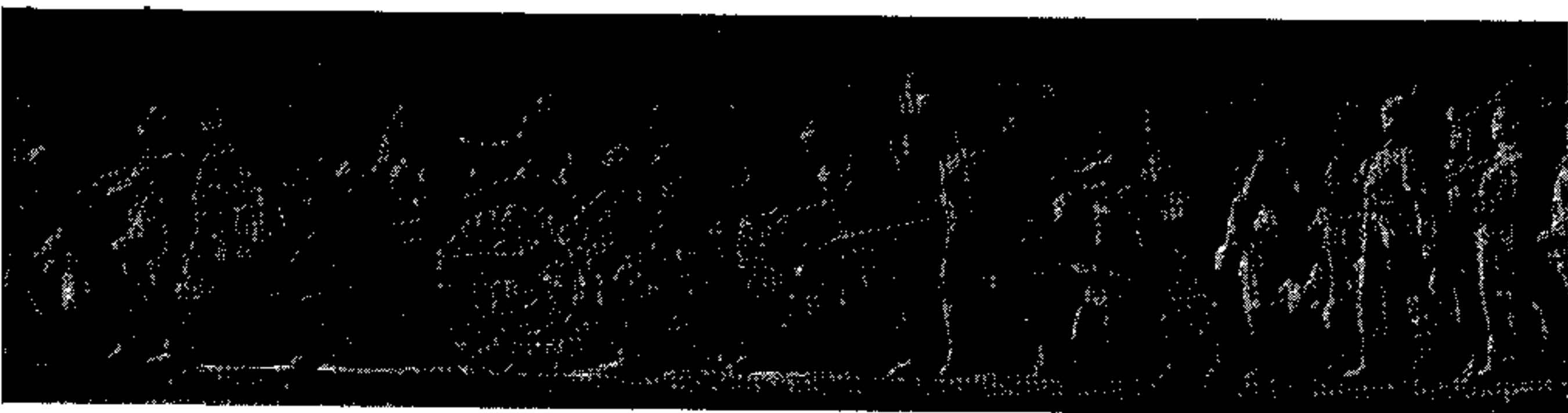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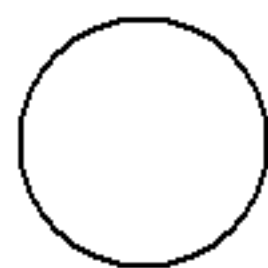
凡是在人民面前翹尾巴、藐視人民的人，人民就有權利藐視他。其實，那類人也不會在學術上有什麼真正的成就。我們的工作剛剛開始，但是在前進中。“誰笑在最後，才算笑得最好。”事實上，笑我們的人並不一定有學問，或者根本沒有什麼學問。而只要我們努力，我們的進步一定是很快的。

歷史證明，凡是共產黨員想學的東西，凡是真正為人民服務而百折不撓的人想學的東西，任何堡壘都是可以攻下來的。對自然科學如此，對社會科學也如此。在最短的歷史時間內，在共產黨員和黨外許多學術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的學術工作，一定可以躍進。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4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 ★

目 录

工业生产中的节约.....許幸学(1)

义理、考据和辞章.....施东向(6)

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要学习农业科学
.....施 平(10)

气象工作是向自然灾害作斗争的重要武器
.....饒 兴(19)

争取优质高产的几点体会
.....中共重庆建设机床厂委员会(24)

论宗教信仰自由.....牙含章(29)

“铜的王国”的贫困.....周而复(36)

读者来信摘要(三则).....(40)



工業生產中的節約

許 辛 學

節約，主要是人力的節約，也就是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節約。我們的節約工作做得好，我國經濟的發展就有可能快一些；節約工作做得不好，我國經濟的發展就會慢一些。每個單位產品的人力和物力消耗越少，那末，人們花費同樣多的人力和物力，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產品。所以節約本身，就是生產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

節約是一切部門都應當注意的，工業生產部門尤其應當注意。生產任何一件工業產品，都需要消耗一定的原料、材料、燃料、電力，消耗一定的勞動，消耗一定的管理費用。各個工業生產部門的具體情況不同，這種消耗在不同的產品中所占的比例也不一樣。在我國目前情況下，一般說來，在工業產品的生產費用里面，原料、材料和輔助材料的消耗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燃料和動力的消耗約占百分之三左右，固定資產折舊約占百分之二左右，工資和附加工資約占百分之十左右，管理費用約占百分之五左右。其中原料、材料、燃料、電力和固定資產折舊等，是屬於物力即物化勞動的消耗；工資、附加工資以

及管理費用中的一部分，是屬於人力即活勞動的消耗（管理費用的另一部分也是屬於物力的消耗，如辦公用具的消耗等等）。工業生產中的節約，就是要節約上面所說的各种消耗。

因為物力即物化勞動的消耗在工業產品的生產費用里面所占的比例最高，所以我們首先從節約物力說起。

在工業生產中節約物力消耗的潛力大不大呢？我們認為是很大的。拿小高爐的生產來說，有些先進的單位，例如山東省的濟南生建鋼鐵廠的小高爐，冶煉一噸生鐵只需焦炭九百七十公斤；雲南省的十三立方公尺的小高爐，冶煉一噸生鐵消耗的焦炭，最低的只有八百八十公斤。另外有些小高爐冶煉一噸生鐵所消耗的焦炭，卻將近兩千公斤。如果小高爐的焦炭消耗數量都能降低到先進單位的水平，或者接近先進單位的水平，那麼，就可以節約出大量的焦炭來。事實上，今年四月份全國小高爐的焦炭、石灰石的平均消耗就比二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六。其中唐山煉鐵廠的小高爐利用石灰代替石灰石做熔劑，每一立方公尺的高爐容積，每一晝夜出鐵的數量



就由一吨提高到一吨半；冶炼每吨生铁所消耗的焦炭也由一千九百公斤降低到一千二百公斤，生产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二。这个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地总结这些先进小高炉的生产经验，并且善于分析各地不同的具体情况推广这些先进经验，小高炉生产中的物力消耗是完全可以降低的，认为小高炉生产的物力消耗不能降低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小高炉生产的物力消耗可以大大降低，那么，大高炉、中高炉生产的物力消耗是不是就不可能降低了呢？当然也是可能的。例如，有的大高炉冶炼一吨生铁要消耗焦炭一千公斤，而象本溪等先进的高炉，只消耗六百多公斤。如果全国所有的大、中型高炉都能够降低到先进高炉的焦炭消耗水平，我们同样可以节约很多焦炭。这些例子证明了在我们的企业中有着节约物力消耗的很大的可能性。钢铁工业方面是这样，其他工业方面也是这样，小的企业是这样，大的企业也是这样。各个工业部门，各种类型的企业，都应当充分地注意物力的节约；由于大型企业的生产在我们整个生产中占着主要的地位，所以大型企业节约物力消耗的问题，更应当特别注意。

为了节约工业生产中的物力消耗，我们应当从下列几个方面来改进工作。

产品设计的好坏，对于产品制造过程中节约物力消耗的关系很大。不好的产品设计，用料大而效率低，或者用优等的材料，而制造出劣等的产品；好的产品设

计，用料少而效率高，或者用一般看来是次等的材料而制造出优等的产品。例如，在机器的体积和重量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它的效能；或者是在保证机器的效能的条件下，缩小它的体积，减轻它的重量。根据可能的条件，不断地采用新的技术和新的工艺方法，不断地改进产品设计，是节约物力消耗的一个重要措施。我国原来的工业基础很薄弱，解放以后，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下，我们建设了大批的近代化企业；但是，原有的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这些企业的产品设计有许多是陈旧的、不合理的。几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广大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一起，发挥了敢想敢做的创造精神，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产品设计，进行了修改，使很多产品的材料消耗大大降低，使用效能大大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有不少应当改进的产品设计还没有改进，已经改进的还可以继续改进。因此，如何使落后的产品设计向先进的产品设计看齐，如何使已经有了改进的产品设计继续提高，以便在提高产品使用效能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单位产品的物力消耗，这仍然是我们今后应当认真解决的任务。落后的东西变成先进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变成更先进的东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一切原有的落后的产品设计的改进工作已经完全做好了，这固然是不对的；以为先进的产品设计再不能继续改进了，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应当根据生产实践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不断地改进各种产品設計，节约物力消耗，提高使用效能。当然，不論对于落后的产品設計或者是先进的产品設計，在改进它們的时候，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謹慎負責的态度，經過反复試驗和試制，确实証明成功，并且由国家一定的管理机关鉴定以后，才能逐步推广。特别是对于那些先进的产品設計的改进，更要慎重。某些企业不經過認真的試驗，不报請有关的上級管理机关批准，就随意地、不慎重地修改先进的产品設計，結果不但降低了产品的使用效能，而且在实际上造成了物力的浪費，这个教訓是必須記取的。

提高产品质量，尽量减少废件和废品，这是节约物力消耗的另一項重要措施。在进行工业生产的时候，必須兼顧产品的数量和質量的問題，最近已經引起了各个生产单位的注意，并且在工作上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如果只注意增加数量，不注意提高質量，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費。因为用同样的材料，制造同样的产品，如果質量不好，就势必降低使用效能，縮短使用年限，造成物力的浪費；反之，如果产品的質量提高了，就可以提高使用效能，延长使用年限，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大的节约。在提高产品的質量方面，我們今后还要做認真的努力，保証每个企业出厂的每个产品都是質量优良的，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废件和废品。有些工厂出厂的产品的質量提高了，但是工厂內部生产的废件和废品却没有减少甚至增加了，这是很不好

的。我們决不能够用增加废件、废品的办法，来达到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相反，应当在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中，不出或者尽可能不出废件、废品，来实现提高产品质量的要求；应当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的合格率，最大限度地降低废品率和次品率。只有树立这样全面的观点，采取积极的措施，才能在产品制造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节约物力的消耗。

为着在生产过程中节约物力的消耗，我們还应当合理地使用原料、材料。在这方面，要注意两种偏向：一种是大材小用，优材劣用，废材、废料不回收利用，这当然会造成物力的浪費。这种浪費現象，在不少企业中还大量存在，还没有引起这些企业的领导同志們的应有注意。容許这种現象繼續存在，显然是不符合党的多快好省这个总方針的要求的。另一种偏向是，該用大材的用小材代替，該用优材的用劣材代替，甚至把一些废材、废料也当好材、好料使用。这种情况，表面上好象是节约了，实际上必然降低产品的質量和使用效率，反而造成浪費。克服这两种偏向，我們需要在思想教育方面做很多細致的工作，同时更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具体的組織措施。这就是：在原料、材料的使用上，要充分考虑到产品設計的合理要求，当时、当地的資源条件，本企业的設備和技术条件；同时，要加強科学研究和試驗工作，积极地創造有关的必要的新条件，发现新的原料和代用材料，并且扩大原有原料、材料的



新用途，推行綜合利用，從而做到材料利用上的最大限度的經濟合理。在原料、材料的供應和調度上，要充分了解不同企業的具体要求，按質、按量、按時地滿足他們的需要，盡量避免需要這種材料而供應那種材料的不合理的現象。在原料、材料的管理上，要尽可能地避免變質、損耗等現象，加強倉庫保管工作的責任制度，建立和健全領料、退料制度。

為了節約物力的消耗，還應當合理地提高設備的利用率，並且做好設備的保養和維修工作。大躍進以來，設備的利用率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是一件好事。當然任何設備的效率的提高，都不是沒有限度的。在限度以內，尽可能地提高利用率，這種節約是我們必須爭取的，而且就不少企業的情況來說，它們的設備利用率還是低的，繼續提高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我們還應當不斷地發掘這方面的潛力，提高設備的利用率。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指出，如果超過了設備能力的限度，任意地提高利用率，這就不但不會節約，而且可能造成浪費，使設備的使用年限大大縮短。同樣，任何設備都是需要保養和維修的，都是需要一定的備品、配件來經常補充的。該保養，不保養；該維修，不維修；該補充，不補充，帶“病”運轉，這就可能使“小病”變成“大病”，可能因為追求小的節約，而實際上造成很大的浪費。因此，我們必須採取下列辦法，來加強設備的保養和維修工作。這就是要加強技術管理，貫徹操作規程，嚴格執行定期的檢修制度，不能因為趕任務而推遲檢修的期限。

下面，我們來說一說節約人力即節約活勞動消耗的問題。這方面的潛力，同樣也是很大的。有人認為，去年增加了很多新工人，他們的技术不熟練，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困難，節約勞動消耗的潛力不大。這種看法是片面的。新工人技术不熟練，干起活來比不上老工人，這是暫時的現象。許多新工人學習技術的熱情很高，只要領導上經常注意加強對他們的政治和技術教育，老工人熱情而耐心地幫助他們，新工人的進步，往往是很快的。有的新工人，進廠不到半年，就和正式工人一樣地干活，並且干得挺好。這就說明，新工人多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人力的潛力，不是更小，而是更大。拿煉鐵來說，去年小高爐每生產一噸生鐵，從挖礦、運輸到煉出鐵來，有的工廠要配備七、八十個甚至更多的勞動力；今年以來，由於進行了定點、定型、定組、定員、定責任制等“五定”工作，並且提高了工人的冶煉技術，現在同樣的生產過程，只需要配備四、五十個勞動力就夠了，先進的小高爐用的人更少。不但煉鐵如此，采煤、製造機器等等，也莫不如此。例如，淮南煤礦最近由於調整了勞動組織，採用了先進的采煤方法，挖掘了企業內部的勞動潛力，生產效率就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今年二月份全礦每人每日平均生產煤炭一點四噸，四月份就提高到一點八噸以上。結果調整出來了九千八百多人，支援農業生產和加強其他需要勞動力的部門，而煤炭的生產總量却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七十六。煤炭工業部門是一個生產增長很快、需



要劳动力很多的部門，这个部門的企业經過調整劳动組織、提高技术之后，还能够挖掘出来这么多的劳动潜力，那么，其他工业部門所蘊藏的劳动潜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节约工业生产中的入力消耗，根据已有的經驗，主要地应当从下列两个方面来改进工作。

首先是改善劳动組織。各个企业应当根据今年的生产任务，并且考虑到明年劳动后备的需要，实行合理的定員工作，把目前多余的职工調整出来，以便加強其他真正需要劳动力的部門，首先是农业生产部門。每个企业都要按照各个車間、各个月份均衡生产的要求，合理地組織劳动力，尽量避免一时窝工，一时赶工，这个車間窝工，那个車間赶工的現象。每个企业要按照自己設備的情况和生产的需要，适当地安排熟練劳动和非熟練劳动、主要劳动和輔助劳动，尽量地减少那些生产上确实不需要的非熟練的特别是輔助的劳动力。同时，要确定每个工人在每个时期、每个生产崗位上的責任，加強工人和工人、小組和小組、車間和車間的协作，克服生产中无人負責和不协调的現象。

其次是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由于目前新工人的比重很大，許多新的、技术复杂的企业又在不断地投入生产，因此，加強对新工人的技术訓練，进一步提高老工人的技术水平是工业生产中厉行节约的一个重要源泉。只要工人的技术水平提高了，我們就可以用同样多的工人，运用同样多的設備，而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

为此，就要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組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生产者的經驗，根据生产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逐步地采用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設備，尽可能地减少笨重的手工劳动和半手工劳动。此外，还要在做好对工人群众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認真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工資政策。这样，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也就可以大大降低。

加強工业生产的計划性，对于节约入力、物力极为重要。合理的計划带来的人力物力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每个部門、每个企业都要按照可能和需要，制定符合于实际情况的計划指标，并且做好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綜合平衡工作，使企业内部的各个車間和企业外部有关生产单位之間，在生产、供应、銷售和运输等方面更好地协作配合，避免因为指标不落实而常常变动，以致发生产品不能成套、半成品积压和其他相互脱节的現象。

毛澤东同志說：“任何社会主义的經濟事業，必須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入力和設備，尽可能改善劳动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在这方面，必須进行許多工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我們必須認真地执行毛澤东同志的指示，使整个工业生产战线上的节约工作获得更大的成績，从而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設。



义理、考据和辞章

· 施 东 向 ·

从前有人說，做学問，写文章要从三个方面下工夫，那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①我們現在可以借用这种說法来談談写文章的問題。

义理和考据，是屬於文章內容方面的問題。在我們說來，講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論据充分；講究考据就是要求材料准确。辞章是屬於文章形式方面的問題。講究辞章，在我們說來，就是要求适合于內容的完美的形式。

义理、考据和辞章虽然是在三个不同方面的要求，但是这三个方面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着的。

观点和材料的統一

在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者中，义理应当是灵魂、是統帥。因为形式是为內容服务的，而材料是要由观点来統率的。

如果一篇文章，有的只是华丽的詞藻，有的只是庞杂的材料，却并不打算說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們讀过以后，根本不知道作者是在贊成什么，反对什么；那样的文章，人們通常就称之为“沒有观

点”的文章，也就是沒有灵魂的文章。

真正的好文章，一定要鮮明而有力地拥护那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鮮明而有力地反对那应当反对的东西。这才会是生气勃勃的好文章。

正确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我們在研究任何一个問題的时候，都要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給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才能在这問題上形成正确的观点。因此，我們要把正确的观点传达出来的时候，也是离不开材料的。

在这点上，我們講究义理，显然是和前人的說法在原則上不同的。从前写文章的人說到义理时，往往只是指“古圣先賢”已經說过的道理。在我們看来，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虽然是人类的实践經驗的科学的总结，是我們研究一切問題的指南針，然而也不能把它当成教条。正确的观点，不是簡單的教条，不是空洞的观点，而是和具体材料結合着的正确的結論。

^① 清朝学者戴东原曾提出了把“义理、考据、文章”这三者結合起来的說法（見“戴东原全集”中“与方希原書”和段玉裁所撰戴东原的年譜）。章实齋有“义理在乎識，辞章在乎才，征实在乎学”之說（見“文史通义”，“說林”）。桐城派文人如姚姬传也常以义理、考証和文章三者为标榜。但他們所說的意思和我們所說的，并不完全相同。



教条主义者以为他们既已从书本上接受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们就可以用简单的推理来获得关于任何问题的正确观点。教条主义的文章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在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但是因为它缺乏对具体材料的具体分析，往往只好装腔作势，大声喊叫，以此代替科学的论证；其实，越是这样，越是反映出这种文章的思想贫弱。

也有这样的文章，一方面提出了若干观点，一方面也举出了若干材料，然而不能通过这些材料使人信服地承认这些观点。原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从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中必然达到的结论，这些材料不过是为适应这些观点而任意拼凑起来的装饰品。结果当然会弄成材料是材料、观点是观点，正如水是水、油是油一样，不能合成一家。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鲜明和有力量，就在于它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逻辑，使人看到，什么是我们必须拥护，也不能不拥护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反对，也不能不反对的。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对写文章的一个根本要求；我们所要求的义理，不是搬弄一些空洞的观念，而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材料的准确性

在研究问题时，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但是在写成文章时，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所接触到的材料全部搬到文章中去。如何选择最恰当的、完全可靠的材料，对于

一篇文章的成败，常常有很重要的关系。

对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要求所使用的材料对于所说明的论点是足够的和必要的，并且是作了具体分析。堆积一大堆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要求所使用的材料是完全准确可靠的。不论是引用事实的材料或者文献的材料，或者是在批驳错误观点的时候引用错误论点的材料，准确可靠都应当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对于材料的准确性进行必要的审核，这可以算是考据工作。前人讲考据，多是指对古文献的字句文义的考订。我们所说的考据，范围要广得多。当然，我们并不赞成无目的地在文献的考证中转圈子，但是我们必须在使用必要的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论点的时候，要求材料的完全准确，一直到材料中的每一个细节。

有人也许认为，只要不妨害所要表达的义理，材料的细节有点出入是无所谓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即使细节的出入对于全部论证不发生直接影响，也会使人对于材料的全部可靠性发生怀疑，以至伤害了论证的说服力。有时看来是无关大体的细节上的马虎，却会造成关键问题上的错误，那当然更是要警惕的。把细节弄清楚或者作适当的交代，是可能的。对于可以做到的事不去做，这是一种懒散的作风，和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严肃认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

不久前，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的编者为了提醒撰稿人注意引文的确实，



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最近在該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引文完全确实的难得有一篇、两篇；有一篇题目叫“柳宗元的詩”的文章，全文才两千字上下，引文不确实却有十一处之多。（見光明日报 1959年6月7日第6版）引文要核实无誤，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有写作經驗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在文章写成之后，仔細核对，这类錯誤是很容易发生的。

对于在全部論証中帶有关鍵性的材料，当然更是应当花气力去考究一番。一个認真的作者总是要反复地考虑：他所引用的事实材料是否确实可靠？他所引用的文献材料是不是恰如原意？不論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材料，只要是他引用的，他就对它的确实性負責。为此他就要尽量搜集和引用第一手材料，决不貪图方便，随便录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一个材料，經過几个轉手以后，可能与本来面目大相径庭。对于比較复杂的事实材料，他总要花一番气力加以审查，或者把这一材料和另一些材料相核对，或者亲自作調查，解剖一个麻雀，来驗証一般材料的可靠程度。

在这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作风是我們的模范。在拉法格的回忆录中写道：“馬克思……引証的任何一件事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实証的。他从不满足于間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煩。即令是为了証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館去一趟”（“回忆馬克思恩格斯”第77頁）。恩格斯为了写作“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書，不只

閱讀了大量文献，而且亲自訪問了很多工人。恩格斯在他的書的标题下，还特地加了一句話：“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

列宁的作风也是如此。克魯普斯卡娅曾指出：“列宁并不靠自己的記憶，虽然他的記憶是很好的。他从不凭記憶‘大致不差地’来叙述事实，他叙述事实是极确切的。”“他对地方自治局統計材料的研究及整理作过很多的工作。在他筆記簿里仔細地写了很多的統計表。当涉及有巨大意义和巨大比重的数字时，他連已公布的数字表的总計也加以检查。仔細地检查每一事实，每一数字，是他始終用的方法。他的結論都是根据事实来作的。”（“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第2、3頁）

要有好的形式

如果一篇文章所講的道理錯誤，引用的材料虛假，即使在形式（辞章）上如何漂亮，也决不会被我們認為是好文章。

但是，好的內容要求有好的形式，拙劣的辞章必然使內容受到損害。以为形式不需要講究，形式好不好无关重要，是不对的。

我們所說的辞章涉及語言、章法和风格等方面。一个作者力求掌握丰富的詞彙和多样的句法和章法，目的是为了运用自如，能够把內容传达得准确而生动。把內容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对文章形式的基本要求。用詞不妥貼，造句不合文法，行文缺乏条理、拖沓冗长，就会把意思弄得含混晦涩，令人費解甚至誤解。在准确



之外，還要求文章写得生动。在辞章拙劣的文章中間，人們所讀到的永远只是干癟的詞彙，刻板的句法、章法，即使这种文章把意思大体表达出来了，也会因为它語言无味，面目可憎，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不願意亲近。所以古人說：“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真正严肃地对待文章的内容的人，一定也在文章的形式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李卜克内西回忆說：“馬克思在語言和风格問題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他对于語言的簡洁和正确是一絲不苟的”，“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化很多時間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回忆馬克思恩格斯”第104、108頁）

也許有人要担心，用心追求文章形式的完美，会不会犯形式主义的錯誤。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形式主义是用形式方面的追求来掩盖内容的空虚和謬誤。形式主义者并不是为了准确地、生动地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而講究形式的人。

我們提倡写文章注意修辞，当然是从切合内容的需要出发。如果作者本没有什么新穎独创之見，却勉强去雕砌一些警句、格言之类来等着讀者喝采，那就是舍本逐末的作法，同形式服从内容的要求相违背，是我們所不取的。

事实上，辞章問題虽然是个形式問題，却不只是單純的技巧，而是同作者的思想作风有密切关系的。語言的丰富多采，往往就是思想的丰富多采的反映。一个思想僵化、粗枝大叶的人，很难写得出生动活泼、严密周到的文章来。因此，不

从訓練自己的思想着手来加強辞章修养，将很难有大的效果。反过來說，如果我們在写文章的时候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使文章形式作到准确而优美，那也会有助于我們的头脑日趋精密和活泼。

有人認為，文章以朴素为貴，只要能把一个意思講得清楚明白就行了，不必費气力去打扮。对这种意見要分析一下。如果是說文章的修辞应当先求准确，应当恰如其分，不要矫揉造作，以辞害意，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以为随随便便写下去就叫做朴素，实际上使朴素变成了簡陋和寒儉，那是我們所反对的^①。真正的朴素的风格并不是不費气力就能达到的。

当一个人长期运用文字工具到十分純熟的程度之后，他在用詞造句布局等方面就有自己一套特殊的习惯，这种表現方式上的独特性，是形成文章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好文章朴素，有的好文章色彩絢烂，有的文章以含蓄取胜，有的文章淋漓尽致。同是向反动派作斗争的文章，魯迅的风格和聞一多的风格就很不一样。在我們的文坛上，应当使不同的风格百花齐放。

要把文字工具掌握得熟練，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經過长期的艰苦的学习。毛澤东同志說过，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語言，要下苦工学，要学人民的語言，学外国的語言，学古人的語言，从这些語言中吸取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为了能把文章写好，就应当这样地努力。

^① 茅盾先生的“夜讀偶記”中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很大一部分青年作者的作品朴素到了簡陋、或者寒儉的地步了。”（見該書第70頁）



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要学习农业科学

施 平

毛泽东同志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要想把工作做好，除了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种政策，学会利用社会主义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外，还要懂得有关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人掌握的自然规律越多、越深，就越能控制自然，就越能提高生产力。反过来说，人对自然规律掌握得越少、越浅，被动性就越大，生产力就不容易提高。

人类栽培植物的一万年到一万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向自然作斗争，力求掌握自然发展规律的历史。近代科学的出现，是人掌握自然规律的一个很大的跃进。在生物学方面，对有生命界和无生命界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许多过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有了更好的认识。这就为我们进一步地掌握农业生产的规律，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为了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毛泽东同

志在去年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我们要很好地贯彻执行“八字宪法”，没有农业科学知识是不行的。拿灌溉来说。大家知道，在干旱地区，农作物经过适当灌溉，能够大大发挥土地肥力，增加生产。但是如果沒有科学知识的指导，灌溉得不适当，不仅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不利，甚至还可能使好地变成坏地。在解放前，山西省临汾县附近汾河湾上，几十万亩肥沃土地，就是由于灌水不当，土壤盐碱化，大大降低了产量。因此，我们要把水用好，就要学习关于水的学问，懂得在什么样的气候、土壤等条件下，在什么时候，应当怎样灌溉。

施肥也是这样。大家知道，适当地施肥是使农作物获得丰收的重要关键。但是如果不懂得关于肥料方面的科学知识，不会区别各种不同的土壤，不同的作物，而施用不同性质和不同分量的肥料，那就不能增加产量，甚至还会降低产量和造成浪费。因此，要做到合理施肥，也必须学习有关施肥的学问。

土壤改良，种子选择，密植规格，以及植物保护，工具改革，田间管理等问题，



也同样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例如，深翻土地一般是能够增加产量的，但是如果不管各种不同土壤的不同性能，不分各种作物对耕层深度的不同要求，而一律深翻几尺，也会造成减产或浪费。又如，使用优良种子是能增产的，但是不分地区，不分条件，一律用一样种子，也会造成减产。合理密植可以增产，但是如果认为越密越好，就不对了。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在农业方面获得大跃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认真地在学习中应用了农业科学，贯彻执行了“八字宪法”。但是，也有一些同志，不大懂得农业科学，对有些农作物自以为是地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措施。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增产，但是，结果却是不好的。这也告诉我们，要想领导好生产，没有农业科学知识是不行的。

我国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必须善于利用这些经验。因此，干部应当经常和有经验的农民商量，向他们学习。但是，为了不断地总结农业生产中的经验，解决生产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的问题，进一步领导好农业生产，我们还必须学习农业科学，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

干部学习农业科学不仅是为了解决目前生产上存在的问题，而且还为了迎接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迎接农业技术的大革

命。我国农业现在正处在技术大革命的准备时期，农业生产将从手工的劳动逐步走向机械化，电气化。为了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必须有大量的具有一定农业科学知识的农业劳动者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

农业科学理论是农业生产经验的概括。学习它、了解它、运用它，就能够对事物的发展有一定的预见性，因而就能够预先创造条件，更好地挖掘自然潜力或战胜自然灾害。这样，人们在和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就会取得更主动的地位。

由于以上的原因，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学习农业科学，已经是一件很迫切的事了。

农业科学是研究农业植物、农业动物、农业微生物的生长和发育及其与外界条件相互关系的规律，从而发现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家畜的产量和品质的最好方法，以保证农业生产获得高额而稳定的产量。农业科学的内容，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农业动物和植物的生活和发育规律，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规律，物种形成和种间关系的规律，并研究如何应用这些规律来改善有机体的本性，定向培育新的有机体。

一粒冬小麦种子，在头年九月播到地里，到第二年六月成熟收到新的小麦籽粒，这是小麦的全部生活时间和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出苗、分蘖、拔节、孕



穗、抽穗、开花、灌浆、成熟等等发育期。每个发育期小麦的生活不同，它的内部活动和需要的外部条件也不一样。一切的动物和植物，都象小麦一样有它自己的生长发育的规律。

小麦种子只会长成小麦，水稻种子只会长成水稻；麦不会变稻，稻不会变麦；子代的形态和习性和亲代差不多完全相象。这是植物的本性，也就是遗传性。这种遗传性是巩固的，但并不是绝对不能变的。我们眼前的自然界有着那么丰富的、千差万别的动植物品种，并不是在生物一开始就这样的，它们是因变异、自然选择或人工选择而进化来的。比如我们吃的苜蓿，有一个多汁的肥厚组织形成的粗大部分。这并不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它的原始种是野生苜蓿，只有一个短而细的茎，经过人工的培育，才使它按照人的愿望长成现在的样子。达尔文用大量的材料来证明，在有机物的后裔中，不仅有着对双亲的某些肖，而且永远存在着变异。后裔不是其祖先的精密的复制，只是类似祖先。在自然界中，新种在不断形成，永远不会终止。

每一种动物或植物，又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的物种，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下一起生活着。这就产生了物种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规律。

我们学习农业科学，首先就是研究这些规律性，掌握这些规律，进而应用这些规律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来按照

我们的要求定向培育新的有机体。由于应用了这些规律，许多栽培学家获得了高产量，许多选种学家创造了优良的作物和动物品种。

第二，研究农业植物和农业动物的生长、发育与外界条件的相互关系。农业生产对象是活的动植物有机体。活的有机体是在一定外界条件下生长、发育起来的。所有的活的有机体，都是它的本性和外界条件统一的产物。所以相应的外界条件是动植物生长与发育所必需的，外界条件适合它的要求，动植物就不但能够产生按其本性来说所能产生的最高产量，而且能不断改善它的本性，产生新的更高的品质和产量；外界条件不适合它的要求，它就不能正常地生长发育，甚至于要死亡。所以农业科学在研究动植物本性的问题时，必须结合着研究动植物的外界条件，掌握外界条件作用于动植物的规律。

植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外界条件主要来自土壤和气候两个方面，包括五个基本因素：水分、矿物养料、日光、温度、空气。这些基本因素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栽培作物都离不开土壤。土壤不但支持着植物的生长，而且植物所需要的水分和养料，基本上是从土壤中吸取的。土壤不是简单的一堆灰土，它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物质，它有它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土壤的概念，是和肥力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土壤的肥力和土壤的物理性状、化学性状与生物活动因素分不开。这些性



状和因素，有其自己的规律性，它们相互间又按一定的关系相互制约着。土壤管理得好，就能使土壤肥力不断提高；管理得不好，就会破坏土壤的肥力，以至于变成不毛之地。因此，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必须十分重视研究土壤的问题，保证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一切植物的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分。首先，水是植物最大的组成部分；其次，植物养分的吸收，有机物的制造和物质运转，都需要水分参加。植物所吸收的水分，大部分从叶面蒸发出去，调节植物体内的温度，以保持植物的正常生长。

植物从土壤中除了吸收水分外，还需要吸收另一些物质来养活自己，使自己正常地生长发育。植物吸收量最大的有氮、磷、钾、硫、钙、镁等。另外也吸收一些其他元素：铁、硼、锰、铜、锌等等；这些元素，因为植物吸收的量很少，所以就叫它们“微量元素”。每一种植物，都按自己的需要吸收元素，这些被吸收的元素之间有一定比例，不能相互代替，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没有用，或者有害，少了就不能正常发育，以至于死亡。例如缺氮时，植物矮小瘦弱，叶子呈淡黄色；缺磷时，生长受抑制，下部叶子从边上开始变色，逐渐脱落死亡。有机物质对于植物也是重要的。复杂的物质，如粪便，要在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活动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才能吸收。同时，植物也能直接吸收少量的有机物质。

气候条件之一的日光，供给植物光能和热。没有光能，植物就不能形成叶子里的叶绿素，世界上就没有绿色植物。没有绿色植物，动物就没有饲料，也就没有农业动物。日光照在叶面上，小小的叶绿粒立即象一座工厂一样，利用阳光所给的能量，开始制造有机物。这是非常奇妙的。叶绿粒制造有机物的速度，在一定范围内与光的强度成比例。所以，栽培植物时，需要适当的“透光”。此外，各种作物为了正常地发育，对于日照长短有一定的要求，例如：东北的大豆，如果移到北京来种，因北京夏天的日照比东北短，所以大豆长得就会矮小，过早开花，产量就会很低。

温度，对于植物也不可缺少。每种植物在它的发育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有一定幅度内的温度；没有适当的温度，就不能生长发育。例如棉花种子，在土壤温度低于摄氏十二度下，发芽就困难，若低于五度，就根本不会发芽了。

空气对植物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供给植物制造有机物的原料二氧化碳（在普通空气中含有万分之三），另一方面，供给植物进行呼吸时所需要的氧气。此外，对大多数作物来说，需要疏松通气，以利于植物根系的生长及某些微生物的活动。

上面所说的这些，各有作用，缺一不可。但是它们又不是各自地作用于植物机体，而是综合地起作用的。因此，不能孤立地重视什么，不重视什么。此外，植物时常遇到不利的外界条件，如各种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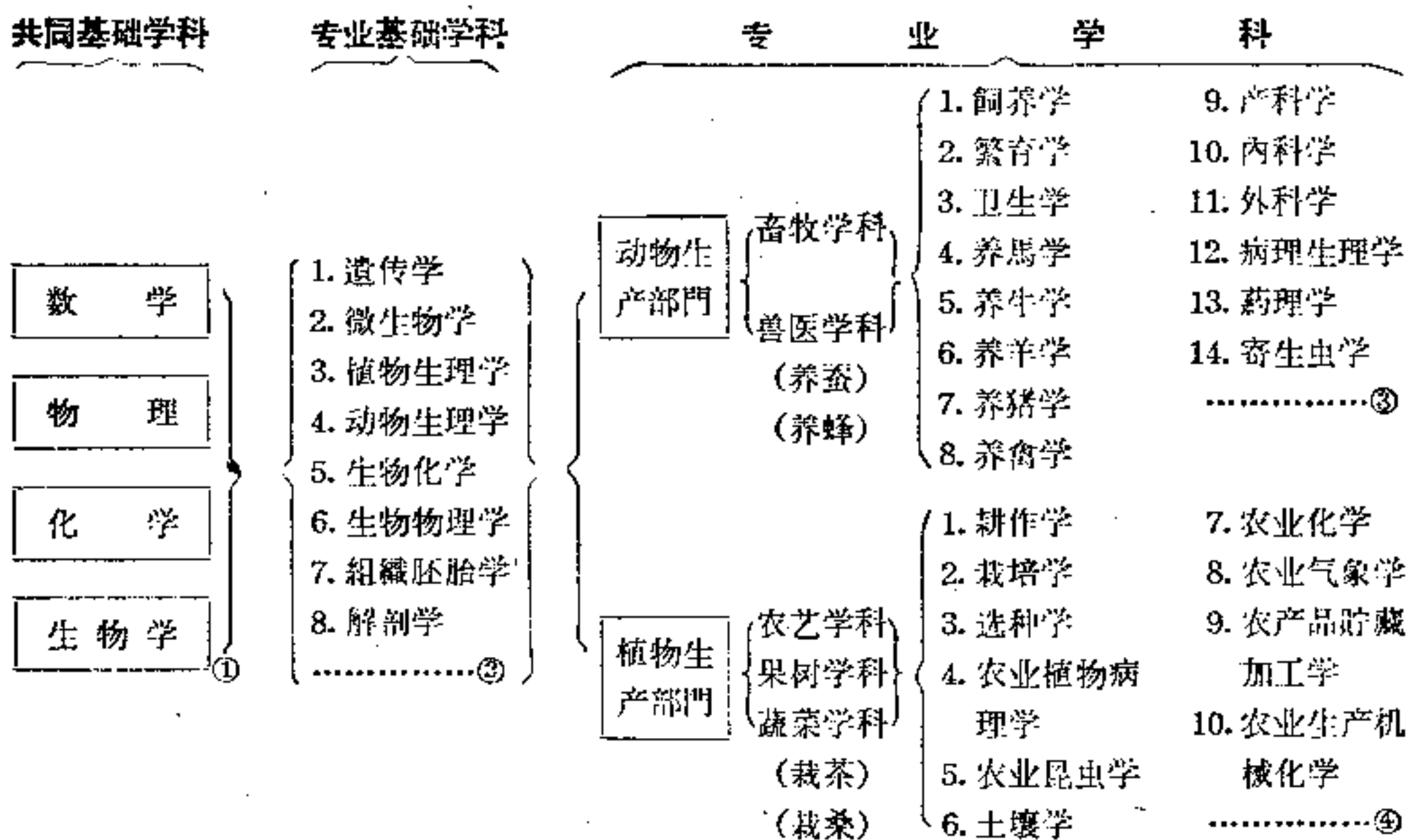


灾害：旱、涝、病、虫等等。栽培植物时，应积极发挥有利条件，排除不利条件。

第三，研究在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如何具体地运用自然规律。在懂得了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以后，如何在大规模的生产实践中运用这些规律，还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如何选育良种，如何耕作土壤与改良土壤，如何栽培作物，如何繁育家畜、家禽，如何防治植物的病害、虫害及家畜、家禽的疾病等等，还有一系列的专门的独立学科来阐述它们的理

论和方法。

农业科学是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之上的，即建筑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包括植物学与动物学)之上的。至于农业科学本身则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研究基础理论，叫作“专业基础学科”；另一部分研究技术理论与方法，叫作“专业学科”。基础理论部分分门别类地有许多学科。技术理论与方法的部分，分为动物生产部门和植物生产部门，各自分别发展出许多学科。为了便于了解，列表如下：



① 有人把生物学和数学、物理、化学同列为一般基础学科，也有人把生物学列入专门基础学科。由于生物的生命物质现象有它独特的一些规律，数学、物理、化学不能完全包容，所以这里把生物学同数学、物理、化学并列为共同基础学科。

②③④ 这里只列举了专业学科的一部分，所以用删节号表示未列完。

以上就是农业科学的内容和范围。这么多的内容从何学起呢？

学习农业科学的顺序，在一般学校

里，总是：共同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技术。这种学习程序，对于在职干部来说，是不完全适合的。在



职干部可以采取干啥学啥，由点到面的学习方法。就是说，可以先从和自己业务联系最密切的部分，先从直接的生产技术理论部分学起，然后逐步推及其他。为什么这样学法呢？因为干部的特点，一是“在职”，学与用更要密切结合，学了就要有用，边学边用，边用边学；二是有一定的生产知识，理解能力比较强，已经有许多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等待回答。所以在职干部学习农业科学，可以采取“由点到面”的办法。例如管大田作物生产的农业行政干部，可以先学栽培学，然后学耕作学、选种学、肥料学、土壤学，再后学习防治病虫害的农业昆虫学、植物病理学，再进一步学习专业基础理论学科：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等等。干部学农业科学，可以结合当前生产，抓住中心，向各门学科去“各取所需”。例如领导棉花丰产方的干部，栽培学可以先读棉花栽培的部分，然后看棉花的耕

作、选种、肥料、病害、虫害、组织、生理等等。从这样一点上进行突破，在什么地方有问题就查什么书。有一定生产知识而理解力强的人，采用这样的学法，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就是学习内容不完整，不系统。因此，最好还要同时适当地进行系统的学习，即用较长的时间，由基础理论到专业学科，循序渐进的学习。这样当然要多下些工夫，但是为了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不下苦工夫是不行的。

目前，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为了领导好农业生产，迫切地要求学一些农业科学知识，这就是学习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他们经常接触实际，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又和群众生活在一起，能及时吸收群众的实践经验，因此，只要决心学、刻苦学，就一定能学好。

附录：介绍几本有关农业科学的书

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要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地学习农业科学知识，目前还没有一套很适当的书可读。比较适合的，是中央农业部的“农业干部学校”所编的一套讲义，共八种，即植物生活、遗传选种、土壤学附耕作学、肥料学、作物栽培学、植物保护（上下册）、畜牧学通论、家畜传染病及寄生虫。现在除了作物栽培和畜牧学通论还没有出版外，其他六种已经出版。农业部干部学校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省和

专区农业行政部门的处、科级干部，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这套讲义是针对这些学员的特点写的。讲义的编写，注意到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地介绍了农业生产上比较重要的技术办法，并提高到理论上作说明，插图比较多，文字也比较浅显明白，有相当水平的干部都可以看懂。不过这套讲义也还有一些缺点和个别错误。现在把已出版的各书按照编者排列的次序扼要介绍如下：



一、“植物生活讲义”。这本书比较完整地介绍了植物整个的内部结构、生长、发育、繁殖以及植物内部的这些活动和外部条件的关系。这本讲义是阅读其他农业科学书籍的基础，有了这些关于植物组织、生长、发育、繁殖规律性的知识，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专业学科的知识。这本讲义只有一百二十九页，但是，内容相当丰富，插图简明清楚，文笔比较流利，容易阅读。这本书的缺点是：内容各部分的比重有些欠平衡；深浅不一致；前后有些重复；有些章节，如发育部分，讲得少了些；有的部分，例如有机物的转化部分，讲得多了些；还有个别问题没有很好地交代清楚。在书中第九章讲到酶的部分，有个别的地方已经有了新的资料，应当加以修正。

二、“遗传选种讲义”。这本讲义首先扼要地叙述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原理（在这里，要连带说明，在近代生物科学中，有米丘林学派和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他们对于生物的遗传性与变异性问题，有着针锋相对的、根本不同的解释。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广泛的知识，就需要另外阅读一些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书籍）。书中谈到了有机体遗传性和变异性的一些规律，揭发了遗传性的保持、稳定以及变异性的一些条件，接着就介绍了植物阶段发育的理论，说明了个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对外界环境的要求。讲义的后面几部分，介绍了选种工作中常用的几种方法，人工创造新品种的原理和途径，选种工作的一般程序以及良种繁育的一般原则。这本书的缺点是介绍我国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少，和当前的选种工作联系得不够密切，有关玉米选种工作的主要方法，例如玉米自交系的利用没有提到。因此，在看这本讲义时，对上述一些缺点应另找材料加以补充。

三、“土壤学附耕作学讲义”。这本书介绍了土壤学的基本内容，能使读者获得对土壤学的基本概念。例如谈到土壤肥力的问题，介绍了土壤肥力的实质，土壤肥力的发生，土壤的物理性与化学性，土壤的类型等等，把土壤肥力最基本的问题作了完整的介绍。这本书也还有一些缺点：例如在写到土壤微生物时，没有讲到微生物一方面吸取土壤养料，另一方面又解放土壤养料这个重要问题。对微生物的有机质分解所需要的条件，叙述得过于简单。其次，这本书在很多地方提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技术措施，但比较多的是从土壤学角度来谈土壤改良问题，没有充分说明人对于改良土壤的极大作用。还有，这本书因为编写的时间较早，关于土壤深翻问题，群众性土壤普查问题没有包括在里边，这需要从有关杂志上去吸取资料进行补充。

四、“肥料学讲义”。这本书介绍了有关肥料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知识，介绍了主要化学肥料的性状、作用和使用的方法，用了比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农家肥料，介绍了人粪尿、厩肥、堆肥、土粪、绿肥、饼肥及其他杂肥的性状、作用和使用方法。另外，对细菌肥料也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最后介绍了施肥的原理和方法。这本书主要是概括地讲肥料学的一般基本原理，因此，对实际运用中的一些问题，讲得比较少，对各地区的特点也照顾得不周到。因此，各地干部读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适合于当地的作法，不要一般地照抄搬用。

五、“植物保护讲义”上册，是虫害部分。这本书介绍了昆虫的形态、生态、生理、解剖生理学及分类。另外，用了比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一般的虫害防治法，并突出地介绍了三大类的害虫，即地下害虫，粮食作物害虫及棉花害虫的防治法。这



本書也有一些缺點：有一些應使讀者知道的基本知識說得不完全；蟲害防治的基本戰略不明確；對建立蟲害情報組織、預測預報的意義缺乏總的說明；各大類防治法的優缺點未作分析；有些重要害蟲如粘蟲、稻螟、棉鈴蟲的預測預報方法沒有提到或過於簡略；還有一些很重要的普遍的蟲害如倉庫害蟲、果樹、蔬菜害蟲都沒有列入各論講述。因此，讀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需要參閱一些材料，補充本書缺少的部分。

“植物保護講義”下冊，是植物病理部分。這一部分首先介紹了植物發病的理論，接着介紹了幾個主要作物的主要病害，以及病害的防治法。從理論到實際講的比較全面。但是，其中某些部分對於只具有初中化學水平的人可能深了一些，有高中化學水平才好。其次理論部分占得較多，實用部分講得不够。

六、“家畜傳染病及寄生蟲病講義”，系統地介紹了家畜傳染病及寄生蟲病的理論，介紹了各種主要的家畜病和防治方法。理論聯繫實際比較好，比較扼要。也有一些缺點，例如對名詞解釋不够，閱讀時可能吃力；在“傳染病的特性”一小節中，對病原微生物沒有作比較詳細的專門介紹，沒有學習過獸醫微生物的讀者可能吃力些；最好要增加比較流行的“豬氣喘病”的敘述和防治問題。此外，最好要增加一些我國防治家畜傳染病的一些成就和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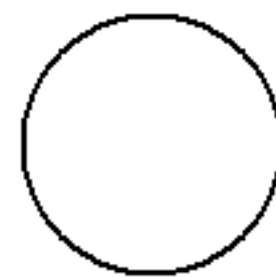
關於作物栽培學和畜牧學，除了希望農業部幹部學校的講義能迅速出版外，栽培學可以閱讀李竟雄、楊守仁等人集體編著的“作物栽培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本書雖然是大學用書，但是只要讀了農業部幹部學校的講義以後，就可以看懂。書的內容比較多，是一類一類、一種一種作物講的。看這本書時不一定每種作物都看，可

以選擇與自己業務關係最密切的看，一種一種作物分開來看。這本書編者在聯繫我國實際，總結農民經驗方面，作了相當大的努力。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的生產實踐經驗來看，這本書說理比較清楚，材料豐富；在技術方面，基本上也還是對的，或者是具有參考價值的。關於深耕、密植等問題，這兩年材料特別豐富，可以從雜誌報章上找材料補充。

關於畜牧學，可看湯逸人、艾廔編的“畜牧獸醫講話”（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內容簡明扼要，在畜牧部分，講了畜牧學方面的基本知識，牲畜的繁殖，人工授精，牲畜的改良，飼養和管理。畜牧學的重要的理論都講到了。缺點是沒有各種家畜分別論述的部分。另外，這本書的讀者對象是初級畜牧、獸醫幹部及人民公社的飼養員，因此，和農業部幹部學校的一套講義比起來，淺了一些。有人想在畜牧和獸醫方面，中西兼顧地吸取一些簡明基本知識，讀這本書是更適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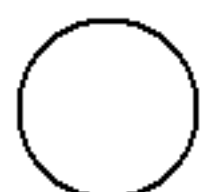
閱讀農業部幹部學校講義的同志，若採取循序漸進的辦法，在植物生產方面，閱讀次序最好是：植物生活、遺傳選種、土壤、肥料、栽培、植物保護。動物生產方面的書是獨立的，可以單獨閱讀。

有相當於高中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水平的人，可以閱讀П·Ф·謝孔著的“農業基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蘇聯專家П·Ф·謝孔在我國北京師範大學講課的講義。這本書的優點是系統地、扼要地敘述了農業基礎理論及一定的技術問題，很全面，比農業部幹部學校的一套講義還完整。全書共分五個部分：土壤學與農作學原理，植物栽培原理，動物飼養原理（包括養蜂），農業企業組織原理，中學生實驗園地的組織。



謝孔专家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情况，进行过一定的了解，在組織材料中結合了一些中国的情况。这本书的特点是簡明地介紹一般的基本理論与技术知識，貫串着苏联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观点，理論性强。讀完这本书，对于农业科学的近代成

就和理論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当然，謝孔专家主要是从苏联的先进农业生产經驗来闡述各項理論的，对于中国的实际問題談得不多，但是掌握了农业基本理論，要进一步联系中国实际就比較容易了。



麦收
(玻璃版画)

曾景初



气象工作是向自然灾害 作斗争的重要武器

饶 兴

气象工作的发展

人们生活在大气海洋里。人们和大气，好象鱼和水一样，关系极为密切。在人们的某些生产活动中，如果不掌握大气变化的规律，盲目行动，不仅摆脱不了大自然的支配，而且还会引起极大混乱；认识了大气变化的规律，就可以防止或减轻自然的破坏力，学会驾驭它，利用它来为社会谋福利。因此，如何认识和掌握大气变化的规律，就成为人们自古以来强烈的愿望。

大气的变化，虽然极其复杂，好象反复无常，但它还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变化、运动和发展着。揭露和认识大气变化的规律，并利用它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就是气象工作的根本任务。

人类开始是由于生产的需要而注意气象变化的；生产的发展，又推动了气象工作的发展。大气变化规律的揭露和认识是随着生产发展科学长期不断发展的结果。

一般说来，气象工作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天气谚语阶段 自古以来，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生产，就十分注意观测大气中

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几千年来，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看天经验。这些经验，是以观察当地的一些天气现象（如风、云、雨）、大气光声现象（如霞、虹、华、晕、声）和物候现象（如动物、植物生长情况和生活动态），作为预测天气的依据，并且往往用歌谣的形式表达出来。天气谚语阶段是气象科学的感性知识阶段，还不能系统地解释各种天气现象。要系统地解释各种天气现象，必须由感性知识阶段逐步上升到理性知识阶段。

单点气象预报阶段 十七世纪欧洲各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发明了水银气压表^①和温度表。有人就开始以一个地点的气压、气温、湿度、风、云等气象要素，来预报当地的天气。这种方法，能够对一地的气象要素的变化，作出连续细致的观测与分析，并根据总结出来的规律，进行短期（六到十二小时）的天气预报，获得一定的效果。

^①水银气压表 水银气压表是测量大气压力高低的一种仪器。它是用一根长约一米、一端开口一端封闭的玻璃管，在管内装有水银，开口部分向下，倒立在水银槽内，管内水银柱上部真空，水银柱随着大气压力高低上升、下降。



但是因为大气的变化是个整体，各地区的天气现象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不掌握大范围的天气变化，预报的准确率和时效，就难以得到提高。

天气图方法^①阶段 欧洲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用天气图方法预报天气。这时，已经有了电报，所以各地同一时间观测到的天气实况，可以迅速集中起来；根据这些材料，就可以绘制成天气图。通过对连续的许多张天气图的分析研究，就能基本掌握大型天气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做出较长时间的天气预报。二十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各国地面和高空观测网的建立和发展，天气分析技术的逐步提高，气象工作的经验和气象科学基本理论不断丰富，用天气图方法预报天气的效果，也随之提高。这种方法逐渐为人们公认为近代天气科学的基础。近年来，由于计算技术的发展，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以便更迅速地作出天气预报。但是，这种根据天气图进行预报的方法，终究只能了解和掌握一般的天气变化过程，作出大范围区域的天气预报，而很难完全考虑到在各种地形地理条件影响下的局部地区的天气变化，也无法反映大气物理状态的光声现象和物候现象，因而也就不能准确地解决具体的地方天气预报问题。所以目前世界各国的天气预报准确率，都还停滞在一定的水平上。要迅速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必须找寻新的天气预报方法，作为天气图方法的补充。

我国气象工作的回顾

我国在古代是气象科学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在世界气象科学发展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远在三千年以前，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阴、晴、雨、雪的记载。“诗经”里的“如彼雨雪，先集维霰”^②，“朝隰于西，崇朝其雨”^③，就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说法。这些大约是周朝前半期的人所做的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气象知识也得到了提高，就确定了二十四节气，并且有人定期地记录风雪，进行物候和气象关系的观测。以后，人们的气象知识逐渐积累，逐渐增多，在民间也出现了许多天气谚语，如“一雾三晴，十雾九晴”，“南闪火门开，北闪有雨来”，“蛤蟆哇哇叫，大雨就来到”等等。我国的天

^①天气图方法 天气图方法是把各地同一期间所观测的天气实况，通过电报，迅速集中起来，再用各种符号和数码，填在一张空白地图上，通过分析研究，根据高低气压、温度分布以及各种天气区域的气压和变化，按照已经掌握到的规则，来预报未来的天气变化。

^②如彼雨雪，先集维霰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冬天下雪以前，往往先要下一些霰（雪珠）。这是因为，初雪时空中温度还不十分低，云中除有雪花外，还有大量温度低于零的水珠。当雪花下降时，同低于零度的水珠相碰，就凝集成霰。霰下了一阵之后，云中低于零度的水珠，愈来愈少，以后就飘雪了。

^③朝隰于西，崇朝其雨 意思是说，早上看到西方有虹，这天就会有雨。这是因为，虹是日光射在雨滴上形成的光的现象，因此，虹必然出现在太阳相对的方向。早上西方出现虹，就说明西方已经有雨了。而我国天气的运行，一般都是从西向东的。所以，西方有雨，这一天本地也将会有雨。



气谚语是十分丰富的，是一份宝贵的气象科学遗产，应当认真地发掘、验证、总结和提高。在我国的历史上，除了用目测积累了丰富的气象知识之外，在气象仪器方面，我国还发明了风信器^①和雨量器^②。风信器是东汉张衡创制的，当时叫作“相风铜鸟”，比欧洲的候风鸡早了一千多年。雨量器的使用也较欧洲为早，在宋朝秦九韶所著的“数学九章”中，有一算题就是计算雨量的，而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开始用雨量器。

但是，由于我国在长期的封建制度的统治下，生产停滞，阻碍了气象科学的发展。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一八七三年耶稣教会在上海建立了徐家汇观象台，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海关还建立了一些气象观测点，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为帝国主义的军舰和商船服务。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建立了有限的气象站和气象台，但是，这些台站，和人民群众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反动政府根本不重视科学工作，气象科学当时也不可能作到和生产需要相结合，因而得不到发展。当时总的情况是，台站少而质量差，技术人员寥寥可数，而且一般技术水平很低，对中国天气和气候的基本问题研究得很少。一直到解放前夕，我国还没有一个气象台站网，也没有一套气象服务系统，更谈不上什么完善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方法。

新中国的气象事业

新中国的气象事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当时建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各地接管的气象台站和技术人员都很少，基础非常薄弱。气象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分区建设、集中领导”的原则，同科学研究部门和有关大学密切协作，搭架子，建台站，培训干部，开展日常业务，经过四年的努力，完成了天气情报网的初步建设，各级气象管理机构也相应建立起来了。党和政府对于气象工作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是十分重视的。一九五四年三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灾害性天气预报、警报和预防工作的指示”，普遍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从而为扩大天气预报为生产服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速了气象工作的开展。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十二年科学研究远景规划”中，分别确定了我国气象事业的基本任务，使全国气象工作有了宏伟壮丽的前景。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到一九五七年年底，全国气象台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二十一倍多，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工作，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经过八年的努力，我国气象工作虽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还落后于客观需要。气象工作在为生产建设服务，特别是为五亿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服务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① 风信器 是指指示风向的仪器。

② 雨量器 是测定雨量的仪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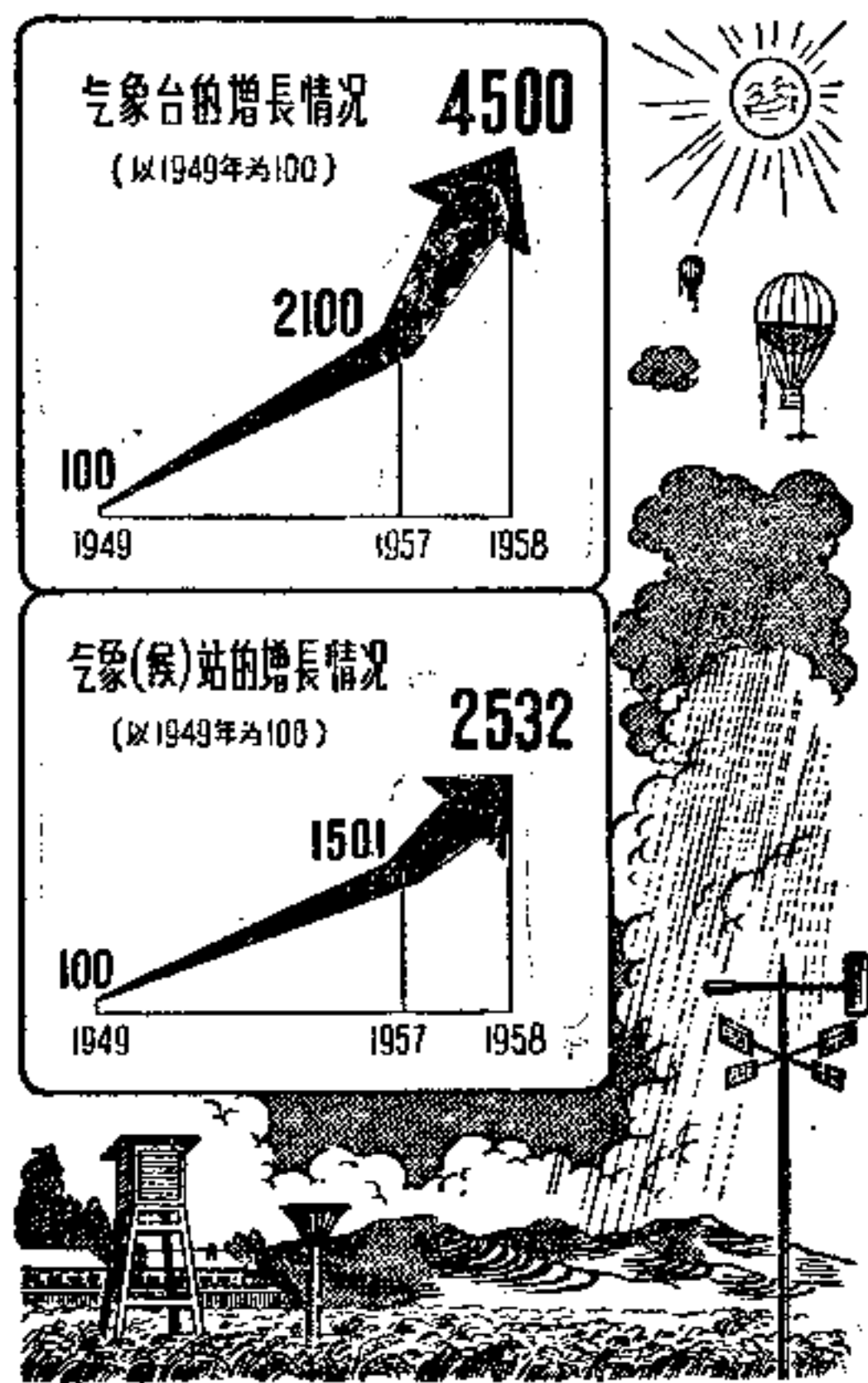


通过整风反右运动，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初步明确了：气象工作必须依靠各级党委，走群众路线，必须紧密地同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主要为农业服务，建立星罗棋布的服务网，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

一九五八年，我国气象工作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带动下，也走上了一个飞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这种新局面，集中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全国组织了相当稠密的气象服务网。到一九五八年年底，全国的气象台和气象站、气候站，同一九四九年相比，气

象台增长了四十四倍，气象站、气候站增长了二十四点三倍；同一九五七年相比，气象台增长了一倍多，气象站、气候站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点六。与此同时，在人民公社和公社的管理区、生产大队中，还根据“自愿、自建、自管、自用”的原则建立了很多气象哨和看天小组。全国气象服务网的组成，使气象工作在群众中开始扎下了根。第二，通过气象服务网，全国约有百分之八十的气象站、气候站开展了补充预报。许多气象哨和看天小组，根据群众的看天经验，也对气象站的预报作某些补充和订正。补充预报的开展，使气象站、气候站的工作和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专业的气象机构和群众性的气象服务网相结合，改变了过去气象工作冷冷清清的局。

“补充预报”是在我国把近代气象科学和劳动人民丰富的气象经验相结合的一种好方法。它是在气象台广播的大范围天气预报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天气演变、农民的看天经验、地形地理特点以及气象历史资料，作出的具体的地方天气预报。实行补充预报的方法，可以补充单点天气预报方法和天气图方法的不足。因为单点天气预报方法，有点无面，有特殊无一般，预报准确率不高；而天气图方法是有面无点，有一般无特殊，地形地理影响愈显著，预报困难愈多，也愈不准。而补充预报方法，则是点面结合，特殊与一般结合，既根据大范围天气变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了当



朱育蓮繪



地天气变化的特殊规律；既根据了近代的气象科学，又结合了群众的丰富经验。这样，不仅气象台的预报人员能作预报，而且广大的气象站、气候站也能作预报，改变了只有气象台才能作预报的传统。

实践证明，补充预报方法推广之后，我国天气预报准确率就有了显著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单纯由气象台用天气图方法作出的天气预报，全国平均准确率仅提高百分之二左右；一九五八年推广了补充预报方法之后，天气预报准确率比一九五七年提高了百分之十左右。不仅天气预报准确率有了提高，而且预报内容具体，能够结合生产需要，因地、因时、因事制宜，提出防御措施意见，因而改变了气象服务工作的面貌，深受群众的欢迎。广西农民唱道：“未卜先知气象台，风雨消息传下来，抢收抢种安排好，颗粒还家怎忘怀。”这首歌谣，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心情。

气象工作必须以 为生产服务为纲

经过十年来的实践，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实践证明，气象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从生产需要出发。这样，既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有利，同时也促进了气象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提高。

我国是一个幅员广大，气候复杂多变的国家。在目前人工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然灾害的条件下，农业受气候的影响极大，农业生产的产量常因气候的影响而不

稳定。为了战胜自然灾害，保证农业丰产丰收，必须预测未来天气的变化，掌握灾害性天气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因此，气象工作就成为农业生产的尖兵，成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农业生产的参谋和助手。所以，气象工作以为农业服务为主是必要的。但是除农业以外，其他许多行业也需要气象工作的配合。所以气象工作又要兼顾民航、渔业、交通、水电等部门。

从目前天气预报的技术水平来看，天气预报还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气象台大范围的天气预报，只能预报出天气变化总的趋势，不可能预报出每个地方具体的天气情况。目前气象台的预报准确率平均只有百分之七十六左右；气象台的预报，经过各地气象站、气候站和哨、组补充订正后，准确率虽然要高一些，也还不能要求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各级党政领导和生产部门在使用天气预报时，需要结合生产全面考虑，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采取各项必要的措施，千万不能存有任何侥幸心理。对天气预报的要求不应绝对化，既不能绝对依赖，也不能看成可有可无，可信不可信；应当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具体掌握和应用。上级领导部门在和气象有关的问题上下达决策性的指示时，特别需要注意留有机动余地，以便让下面多听取地方气象站、气候站和哨、组的补充预报，进一步采取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的具体生产措施，避免或者减少自然灾害的袭击。



爭取優質高產的 幾點體會

——中共重慶建設機床廠委員會

不斷提高產品質量，爭取優質高產，是機械工業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主要內容。在優質的基礎上組織豐產高潮，是當前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的重要任務。大躍進以來，重慶建設機床廠生產的產品，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今年我們擔負的新品種的生產任務，較前又有增加。在任務大、要求急的情況下，由於我們對產品的質量注意不夠，加上新工人多、技術低等某些客觀因素的影響，以致部分產品在一個時期內發生了質量下降的現象。在今年的第一季度中，我們已經感覺到這個問題，並且多次強調要提高產品質量；但是，由於我們對實現優質高產的意義仍然認識不深，抓得不緊，所以效果不大。在第二季度，我們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開展了以技術革命和技術革新為中心、以優質高產為目標的增產節約運動。在這運動中，進一步加強了職工群眾提高產品質量的思想教育，發動群眾建立、健全了各項管理制度，加強了技術領導，因而在實現優質高產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兩個多月以來，我們不僅按質、按量地完成了國家規定的各項產品指標，而且按質、按量、按期完成了製造六套冶煉設備的任務。拿產值來說，四月份完成了計劃的百分之一百零八點五三，五月份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八點五八，六月份上半月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七點九四。產品質量逐月穩步上升，良品率四月份為百分之九十四點三八，五月份上升至百分之九十四點六七，六月份上半月又上升至百分之九十五點三五。目前運動正在繼續深入。現在談談我們在爭取優質高產中的一些情況和體會到的幾個問題。

樹立優質高產的全面觀點

企業生產的產品既要求數量多、品種多，同時又要求質量高、成本低。優質高產，這是我們組織生產的目的。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優質和高產能否兼顧，有一

部分是表示懷疑的。

當我們開始提出必須既增加產品的數量、又提高產品的質量的時候，有的人過分強調任務重，學徒工多，技術水平低，設



备条件差等客观因素，他們認為：“要增加产量，就难于保證質量；要保證質量，就只能慢工出細活。”也就是說，要多快，就不能好省。因此，他們在工作中，只抓产量，忽視質量。还有的人思想上患得患失，对影响質量的技术問題，不敢坚持正确意見。某些檢驗人員，在进行产品檢驗的时候，忽略了同生产者一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共同完成任务。有的工人，不重視严格执行工艺規程。这些，就是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障碍。

为了进一步教育干部和群众树立数量、質量同时并重的思想和多快好省相統一的全面观点，我們通过召开干部會議、职工大会，反复講清道理，耐心进行教育，并且組織参观，举办展覽，发动群众計算产品质量不高在政治上、經濟上、時間上各方面造成的浪費，开展鳴放辯論，摆事

实，講道理，以提高干部，教育群众。原来認為数量、質量不能兼顧的同志，也漸漸認識到过去部分产品质量不高主要是思想認識上有問題。有的干部和群众，还自觉地进行检查說：“品种多、任务重是事实，但是思想不重視，也是事实”；“質量不高，主要是由于思想片面，安排生产不好，协作配合差，制度也不够健全。”有的工人在辯論中还說：“学徒工多，技术低，固然是質量不高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去年进厂的学徒，現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經能上机床干活，有的还能掌握两三道工序的操作，他們已經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况且，出废品的也不都是学徒工，学徒工中也有废品少的。因此，要优質高产，首先应当解决思想問題。”通过教育和辯論，基本上統一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認識，进一步树立了优質高产的全面观点。

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工作

要做到优質高产，管理工作必須相应地跟上去，当前首先是技术管理和責任制必須进一步加强，这是优質高产的基本措施和保證。去年大跃进以来，經過发动群众，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有些規章制度，旧的破除了，新的还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破得多，立得少。也有一些規章制度虽然沒有破除，但也沒有很好地执行。企业管理工作跟不上生产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技术

管理工作和贯彻执行責任制方面更显得突出，这就影响了生产的正常秩序，使某些产品质量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因此，当前要争取优質高产，必須相应地加强管理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我們認真贯彻执行了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結合的原则，在技术管理上贯彻执行了群众路綫的方法。在編制工艺規程时，我們采取了发动群众，按技术资料要求，結合实



际操作的方法进行編制，并由技术人員和老工人密切結合，逐道工序进行审查和修改，其中重要的并且报請有关的上級机关批审后执行。在建立責任制方面，我們采取了領导干部、技术人員、生产工人和檢驗人員一道討論研究的方法，按机床、按工序建立了以工人自檢、互檢和专职人員的檢驗相結合的“三檢制”，以及車間檢驗、材料檢驗、質量分析、半成品管理等技术管理責任制度。在研究資料时，也尽可能广泛吸收工人群众参加。由于采取了上述群众性的加强技术管理的方法，就使得管理工作更能切合实际，同时又教育了群众，使制度的貫徹执行更有群众基础。这样，爭取优質高产就成为群众自覺的行动，在組与組、班与班、机床与机床之間，展开了热烈的竞赛，相互抽驗，相互监督。

进一步發揮技术人員的作用，对于加强技术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設机床厂的技术人員，絕大部分来源于工人，一部分是解放后从学校出来的，也有一小部分原来的技术人員。上述各种人，虽然經歷不同，但是一般都經過各項运动的鍛炼，他們經常同生产接触，特别是經過去年大跃进的实际，都有很大进步。但是，从去年以来，有的干部，在鼓励工人群众进行創造革新的同时，对于技术人員某些正确的意見，尊重和支持不够；也还有些技术人員，因循守旧，患得患失。这对于生产工作是不利的。为了广泛調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最近以来，我們一面不断地教育干

部和工人尊重技术人員的意見，同时召开工程技术人員座談会，帮助他們，鼓励他們深入实际，大胆工作。对許多技术问题，都是采取“三結合”的办法研究解决。例如当車間出現重大技术问题时，即組織技术人員会同檢驗人員，深入車間，共同研究解决。就是車間內部一般的技术问题，也組織車間的技术人員，深入到每道工序，同操作者研究解决。事实証明，貫徹执行“三結合”，对于爭取优質高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比如切絲机和制釘机的質量，从第一季度以来始終达不到要求，推行“三結合”之后，仅在一个月的時間里，就全部完成了任务。

生产准备工作，是企业管理的一項重要内容。加强生产准备，是爭取优質高产的重要条件。有了一定的准备，才能保持生产的正常秩序，平衡生产，組織各个环节的协作配合，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优質高产。生产准备工作，包括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就当前品种多、任务急的情况来看，主要应当抓好技术准备、物資供应和核算生产能力这样三个方面。以往有一段时间，我們对生产准备工作抓得不紧，曾經給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今年四月以来，我們进一步加强了生产准备工作。对于某些还没有定型的产品，部分审定和校对了技术资料，并通过試驗作出鉴定。同时，进一步發揮科室的作用，組織計划和供应部門，上下摸底，內外結合，反复核算，摸材料、生产能力



和在制品的底，再同制造車間，共同研究，以便計劃安排和組織材料、坯件的供应，并且保證一定的儲备。特別是在承制冶炼設備中，我們讓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制造車間一塊研究資料，提材料計劃，提加工方案、技術標準、工藝裝置；然后再由制造車間組織群眾，一面研究資料，明确技術關鍵，一面准备工藝裝置；最后，反復核算生產能力，編日、班和机床的作业計

划，加强生产准备工作。同时，还經常重視加强設備的維護和检修。这样，准备工作虽然時間稍长，但实际效果却是大大地縮短了生产時間；任务虽重，時間虽急，生产秩序仍保持正常，并且基本上消灭了中断工时和返工退修。六套冶炼設備，能够在不到三個月的时间里就全部完成，加强了生产准备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推广先进經驗

提高技術水平，猛攻技術關鍵，是实现優質高产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近两个月来，我們在加强管理工作的同时，发动广大职工大鬧技術革新，不断提高技術，改进操作方法。这一时期，我們采用了許多經過試驗取得成功的新技術，比如，机工冲压化，多刀多刃多机床管理化，精密鑄造，一模多鑄，水玻璃快干砂，以及強力切削，精創代刮研，科列索夫車刀法等。所有这些，对于提高產品質量，爭取優質高产起了良好的作用。

为了解决生产技術中的關鍵問題，我們采取了以下办法：第一，用“三結合”的方法圍攻關鍵問題。領導干部、技術人員、檢驗人員，深入劳动現場，同操作者一起找關鍵問題，分析废品原因，找革新建議，制訂措施。这样作，效果很好。鑄造車間四月份担任冶炼設備鑄件任务时，采取“三結合”的方法，到現場研究，先后解决了十

大鬧技術革新

八个關鍵問題，废品率立即下降到百分之二，大件产品消灭了废品。第二，用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来圍攻關鍵問題，这是群众性技術革命的有效形式。仅在三十一車間，五月份就找出關鍵問題三十六个，六月份找出關鍵問題十一个。这些關鍵問題，經過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通过試驗，逐一解决之后，產品質量逐漸上升；良品率四月份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目前已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一。第三，“老将上陣，把住关口”。为了保證產品質量，在關鍵工序上，由一些有經驗的老工人担任操作，或者由他們深入關鍵工序，进行現場指導。三十四車間在新产品試制初期，“老将上陣”以后，就創造了多用夹具，使新产品的工藝裝置迅速地完備起来，同时也保證了質量。

为了加强对学徒工的培养，厂里还采取現場練兵的方法，一边讓学徒工实际



干，一边向他們講理論。开始的时候是：师傅講，学徒听，师傅干，学徒看；后来逐步发展到学徒講，师傅听，学徒干，师傅看。这种师傅上陣，指导学徒工操作的方法，迅速地提高了学徒工的技术水平，目前一般的学徒工都能够独立地操作，部分的学徒工还能掌握三道至五道工序的操作。这就使提高产品质量有了更可靠的保證。

在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中，需要經常注意总结和推广先进經驗，树立“标兵”。抓住先进，大力推广先进經驗，就能够取得“大面积丰收”，不断推动生产前进。我們將六年不出废品、月月超额完成计划的先进生产者老工人謝金洲，树立为優質高产标兵；又推广了五个月完成二十二个月工作量的優質高产小組——“巧姑娘小組”和五个月完成全年工作量的優質高产工段——青年四工区的經驗，这些都大大地鼓舞了群众。三十五車間板金工段第一季度虽然完成了计划，但是产品的质量不高，經過学习四工区的經驗以后，四、五两个月在制造冶炼設備中，不仅質量提高了，还提前半个月完成了全部任务。三十三車間一工段今年一月到四月，废品率占百分之十一点四二，浪費合金鋼料七吨以上，經過学习四工区經驗以后，废品率下降到百分之一，还提前十六天完成了五月份的计划。据初步統計，推广“巧姑娘小組”優質高产經驗以后，全厂到目

前为止，已經出現了優質高产小組七十三个。

两个月的实践証明了，優質和高产是統一的。当然，如果超越了实际可能，片面地強調某一方面，也会同另一方面发生矛盾。高产本来就应当包含質量的要求。如果忽視質量，也必然会影影响数量。比如卷揚机装配，以往由于忽視質量，返工退修多，三百余人一个月仅装成三十台；提高产品质量以后，减少了返工退修，三十几人一个月即装了二十台。第一台冷模車，由于重視質量不够，返工退修，沒有按计划完成；在制造第二台时，由于重視質量，建立了責任制，不仅質量完全合格，而且提前五天完成。在制造四十六台大型机床（包括車床、搪床、刨床）的过程中，以往废品率一般在百分之十以上；四、五两月，领导和群众树立了優質高产的思想，建立了責任制，废品率就降低到百分之一点五左右，設備利用率还提高百分之五十八以上。由此可见，那种把優質和高产对立起来，認為多快就不能好省的說法是錯誤的。

总的看来，我們的工作虽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还只是开始，今后，我厂职工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要在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繼續貫徹执行優質高产的方針，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滿足国家建設各方面的需要。



論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牙 含 章

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們党和国家对待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也是一項长期的政策，不但过去和現在执行这个政策，而且将来，只要有人信仰宗教，我們仍然要执行这个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从国家法律上保证了宗教信仰的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的全面解释是：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信教或不信教是个人的自由；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种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还有，过去不信仰宗教，現在信仰宗教有自由，过去信仰宗教，現在不信仰宗教也有自由。

承認任何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又承認任何人都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是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承認任何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曲解。

• • •

有人問：共产党人既然是无神論者，是不信仰宗教的，为什么又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呢？我們党和国家对宗教采取信仰自由的政策，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宗教問題的科学分析，根据宗教本身的客观发展規律而决定的；同时也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利益出发的。这两者是統一的，凡是符合客观发展規律的政策，必然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

宗教是社会意識形态之一。馬克思主义指出：“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們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們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間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这样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在往后的演变中，自然的力量在各国人民中，获得各种不同的复杂的人格化。……可是很快的在自然的力量之外，出現了社会的力量，——与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在人看来，也和自然力量一样是异己的，并且最初也是同样的无从索解，它也象自然的力



量一样，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的必然性支配于人之上。”^①

宗教在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那时的人们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对于严酷的自然现象感到无能为力，对于它的千变万化的奥秘不能理解，感到它们是如此奇特微妙；其威力之大，又是如此不可抗拒，如此可怕。于是人们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神灵支配；它可以给人以幸福，也可以给人以灾祸；人们就企图用符咒、巫术、祷告去影响它，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宗教——多神教。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大多数地方，宗教也由多神教发展成为一神教，认为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在那里创造一切，支配一切，决定一切。宗教的产生，反映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宇宙的运动、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被思维以幻想的形式所歪曲。

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压迫，宗教也被赋予了阶级的内容。在奴隶主和封建主的野蛮、黑暗、残酷的压迫剥削之下，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在现世找不到解脱痛苦的出路，于是就把解脱现世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信仰上，祈求死后升到“天堂”或“来生”得到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宗教是苦难者的呻吟”，“它是人民的鸦片”^②。

一切阶级社会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尽量利用并发展宗教，借以愚弄和欺骗人民，要他们甘心忍受剥削者的压榨和奴役，说这是“命里注

定的”，要他们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来生”，或者“死后超脱苦海，升到永生的天堂”。各个时代的不同民族的剥削阶级都利用对自己合式的宗教，作为统治、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一般说来，宗教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拥有完整的机构、强大的势力和众多的信徒，这和各个时代的剥削阶级的大力扶植是分不开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者把宗教当作侵略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有力武器，他们每年拿出大批的金钱津贴宗教集团，利用传教士深入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各个角落，在思想上麻醉当地居民，并且通过宗教活动，收集情报，收买特务，建立据点，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

在历史上，宗教有时也被劳动人民——奴隶或农民用来作为团结自己反抗压迫的旗帜，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是一例。那时由于群众的意识长期被宗教观念所支配，他们的革命思想往往只能是采取宗教的形式或隐藏在宗教形式之中。世界上，只有当觉悟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的时候，革命人民的思想，才最后解脱了宗教的束缚。

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自觉地进行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们愈来愈觉悟到，他们是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的，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2月新一版，第3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版，第2页。



是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于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废除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不会再有失业、破产、变成乞丐、沦为娼妓、死于饥寒的危险。这样，人们便开始摆脱了社会力量的压迫。在这个时候，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也就日益淡薄下来。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对于自然力量也还远不能完全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知识，也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宗教的发展已有长期的历史，宗教信仰在部分人民群众中还有相当深厚的影响，不是短时期能够消失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一部分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信仰宗教。

当然，宗教也同其他事物一样，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最终也是要消亡的。随着人类社会阶级压迫的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帮助人们理解和掌握自然力量，社会科学（包括对于宗教本身的科学认识在内）帮助人们理解和掌握社会力量，随着人们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信仰宗教的人必将越来越少。人们逐渐认识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发现了它们的奥秘，不仅不再感到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陌生、可怕，而且人们能够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使之为人服务，从而摆脱了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面前的被奴役的状态。在这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再相信“冥冥之中”还有什么“造物主”或“上帝”了。

我们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宗教的发展规律的上述认识而制定的。宗教信仰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个认识问题，是人们的思想问题。因此，必须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能使用行政命令来干涉和强迫别人放弃宗教信仰。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①

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既能团结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能团结不信仰宗教的人，以便把他们全部力量调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去，使人们不至于因为无神论和有神论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区别而妨碍在共同事业上的相互间的关系。

全国解放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坚决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央、省、市及部分专区人民政府都设置了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各种宗教的寺院、庙宇、文物、古迹，都受到政府的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都照旧进行。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僧俗官员照常供职，宗教信仰得到保护，宗教习惯受到尊重，中央代表每年还拿出专款给三大寺的僧众发放布施。政府为了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习惯，批准在他们的重要宗教节日额外放假，并免征节日自己食用的牛羊屠宰税。各级人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民政府对于宗教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作了必要的安排。

党和人民政府在宗教信徒中，进行了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启发和提高了他们的爱国思想。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基督教信徒，发起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基督教信徒和天主教信徒自觉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把我国的基督教、天主教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是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项重大成就。

必须说明，宗教信仰自由与利用宗教来进行封建压迫剥削，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封建社会里面，除了世俗的封建主（农奴主和地主）利用宗教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之外，还有一批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主，他们也象世俗封建主一样，通过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对广大的农民和牧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同时，他们又直接掌握了宗教，利用宗教特权，假借宗教名义，对劳动人民进行敲诈勒索。这种社会现象，在古今中外的许多民族中，都曾经存在过。恩格斯讲到十六世纪时的德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就曾指出，那时德国的宗教封建贵族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残酷程度，比世俗的封建贵族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僧侣中之封建的教权阶层，形成贵族的集团——僧正、大僧正、僧院长、方丈和其他的主教。这些高等教会官长或者其自身即是帝国诸侯，

或者象其他诸侯的家臣一样，管辖包含无数农奴和奴隶的广大领土。他们不仅象骑士和诸侯一样地残酷地榨取人民，而且实行起来，更达到可耻的情况。他们不仅用残忍的暴力，而且同样用宗教的一切阴谋；不仅用拷打的威吓，而且用逐出教会或拒绝赦罪的威吓；他们为从人民身上抽取最后一文钱计，为增加教会的产业计，用尽一切悔罪的诡譎伎俩。在那些收得人民封建的赋课、租税、什一税，还常常需要货币的狡黠者之手中，伪造文书是盛行的和受用的剥削手段。制造诞生奇迹的圣徒之肖像和遗物，组织解脱罪孽的祈祷所，贩卖赦罪符，都用来从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金钱。”^①

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曾存在着这样的宗教封建主。这些宗教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互相勾结一起，共同构成这些民族的封建统治阶级。

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主曾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森林、草原。如在西藏地区，寺院占有的土地即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直接剥削着数十万农奴和农牧民。它们和其他农奴主一样实行着惨重的剥削，劳役地租往往占去了农奴全年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时间。实物地租一般都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高达百分之七十、八十。对农民的高利贷剥削也非常苛重，年息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有的甚至是借一还二；还不起的，往往就成了世世代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解放社1949年5月版，第10—11页。



代的子孙债和由保人代还的连保债。广大的农奴和农牧民在他们的压榨之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不少宗教封建主统治压迫人民的残酷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他们私设监狱和法庭，任意侵犯人权，奸淫民间妇女，强夺人家财产。对于反抗他们的人民，随意施以酷刑：鞭笞、割鼻、割舌、割耳、挖眼、抽筋、砍去手脚，以至挖心、剥皮，残忍已极。不久以前，在一些反动的宗教封建主的住宅中，竟发现许多被害者的人皮、人头、人手和人心。他们的毒辣残忍真是惨绝人寰，完全是赤裸裸、血淋淋的中世纪的残暴统治。显然，这不是什么宗教信仰问题，而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问题，是封建主对于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它和一般的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这些封建主披着一层宗教的外衣而已。

在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是允许长期存在的，只要有人信仰它。但是，决不能允许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因为这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不管它是否披着宗教外衣或其他什么外衣。

因此，共产党人一方面坚决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要坚决废除宗教封建主的压迫和剥削。废除封建主的压迫和剥削，必须采取民主革命的方法，领导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起来推翻那些不管披着什么外衣的封建主的统治，废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一切压迫和剥削。因

此，全国解放以后，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宗教封建主的压迫剥削和世俗封建主的压迫剥削，一般都是同时废除了的。

在实行民主改革过程中，是把封建剥削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严格地区别开来的，在坚决进行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坚决执行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方针，并且在具体工作中充分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因为受了宗教封建主的长期的欺骗和迷惑，一时不容易认清这些人的阶级本质和丑恶面目。我们党为了照顾这些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宗教感情，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内部的宗教封建主的压迫剥削制度，没有勉强去废除它，让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有充分的时间，根据他们的亲身体验，去逐步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使这些宗教封建主，有充分的时间，了解党的和平改革政策，考虑自己的改造问题。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通过解放后的社会实践，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力争早日赶上汉族的先进水平；他们日益感到宗教封建主的压迫剥削制度处处阻碍和妨害着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这些少数民族发展道路上的严重的绊脚石。加以宗教封建主中的反动分子看到人民群众日益觉悟，他们不是考虑自己的改造问题，却更加拼命地压制人民群众，公然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各种破坏活动，就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更加使人民群众认清了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压迫者剥削者的真正面目，感



觉到这种野蛮、黑暗、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于是他们纷纷要求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他们彻底废除宗教封建主的压迫剥削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宗教封建主对于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当然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

在废除宗教封建主的压迫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对那些拥护改革、愿意放弃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进步的宗教上层人士，党和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赞同下，给他们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作了适当的安排。有些宗教封建主虽然对于旧的特权有所留恋，但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就不得不接受改造，放弃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些宗教封建主在放弃了压迫剥削以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正当的宗教活动，仍然受到政府的保护。

西藏地区的野蛮、黑暗、残酷的农奴制度，由于上层反动集团的阻挠，在西藏和平解放八年以来，一直未能实行改革。这次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叛乱当中，宗教的和世俗的反动大农奴主是勾结在一起的，他们在西藏广大人民面前撕下了自己的伪善的假面具，暴露了他们的凶恶本相，从而使西藏广大人民很快地认清了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质。在党的领导下，西藏人民已经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双减”（减租、减息）运动，并将分配土地，摧毁反动的农奴主的血腥统治，结束他们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对于参加叛乱的领主和没有参加叛

乱的领主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西藏人民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在土地改革时将采取赎买政策。

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党和国家对于西藏地区的寺庙、文物、古迹，和僧众的正当的宗教活动，仍和过去一样，予以坚决的保护。

一切反动分子对于废除宗教封建主的压迫剥削制度的民主改革，进行造谣诬蔑，说“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了”，这是不值一驳的。事情恰好相反，只有废除了封建的压迫剥削制度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得到彻底而全面的贯彻，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才能真正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

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内部，过去在反动的上层分子的把持下，实际上是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

在这些民族内部，宗教封建主不仅干涉本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而且利用宗教特权，干涉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婚姻、学校教育，以至娱乐、服饰等等。人们在幼年，甚至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命定地要成为某种宗教的信徒。一个人如果根据自己的意愿而放弃这种宗教信仰，那就犯了“叛教”的“大罪”，就要受到绳捆索绑，非刑吊打，或罚以巨款等“教法”的处分。如果有人进行反抗，那就会受到种种残酷的刑罚。全国解放以前，在这些少数民族内部，或这一民族与那一民族之间，为了一部分人或一部分人放弃这一种宗教



(或教派)而改信那一种宗教(或教派),经常发生“争教門”的械斗,有时酿成流血事件,結下血海深仇。不难設想,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之下,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根本談不到什么宗教信仰的自由。

为什么在这些少数民族内部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呢?就是因为在这些民族内部世俗的和宗教的封建主长期地利用宗教,实行野蛮、黑暗的封建統治。他們为了达到永远奴役和压榨他們統治下的劳动人民的目的,便采取了强迫信教的专制手段,把宗教当作一种无形的枷鎖,套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脖子上,决不让人民有权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問題。这种不准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强迫人民信教的野蛮制度,是封建統治制度在宗教方面的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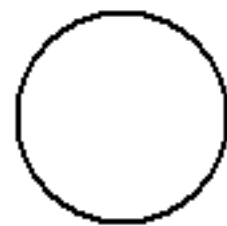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宗教信仰自由与封建制度是势不两立的,哪里还存在着封建压迫和封建剝削,那里的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宗教信仰自由。只有把封建制度的統治彻底摧毁了,人民群众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願,来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問題。

从历史上說,争取宗教信仰自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就提出过“信教自由”的口号,用以发动人民群众,共同反对封建制度的統治。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信教自由”,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教分离。他們認為,国家不应当跟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和政权联系起来,在公民間,完全不允許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权利方面的任何差别,国家

不应当对教会、宗教团体有任何出自国库的支出,废除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法律等等。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反对当时政教不分的封建制度的。但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統治,资产阶级一旦爬上了統治地位,他們很快也就把宗教当作麻醉、欺騙人民以及进行侵略的工具。

我国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大多数停滞在封建社会。这些民族的劳动人民,遭受着封建地主或大农奴主的压迫剝削,实际上是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我們党领导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剝削的斗争,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各民族的劳动人民从世俗的和宗教的封建主的压迫和剝削下完全解放出来。这样,也就在少数民族地区內造成了条件,可以切实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获得真正的全面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废除了封建制度的压迫剝削以后,为了全面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要做許多工作。应该做到每个人的宗教信仰,由他本人根据自己的意願去作决定,不受任何人的干涉和强迫。与此同时,也要教育不信仰宗教的人,尊重別人的宗教信仰,尊重那些爱国守法的宗教信徒和宗教职业者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的自由,坚决制止对別人的宗教信仰采取粗暴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人民内部的团结,有利于信仰宗教的人民群众与不信仰宗教的人民群众之間的团结,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銅的王国”的貧困

周而复

智利有两种矿产聞名于世界：硝石和銅。一八七九年，受英国資本家慫恿，智利和秘魯、玻利維亞发生战争，一八八三年智利获胜，得到阿塔卡馬沙漠，使智利变成世界上拥有最多的硝石矿藏的国家。硝石是肥料和軍火所必需的寶貴原料，是重要的战略原料。一九一三年，智利供給世界硝石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几乎独占了世界硝石市場。这当然引起华尔街老板眼紅，从二十年代开始，美国壟断資本就把智利硝石的开采和出口控制在手里。一九五〇年，智利产硝石一百六十一万四千多吨，絕大部分輸出国外，輸到美国的約占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华尔街老板，从經營智利的硝石中获得了大量的利潤。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德国化学家胡伯博士发明从空气中提取氮气，制造人造硝石。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相繼建立人造硝石厂，使得智利硝石工业受到很大影响，給智利带来严重的困难。

幸而智利还有銅矿。智利銅矿的蘊藏量是八千万吨，占資本主义世界已知的蘊藏量的第一位。一八七〇年，智利产銅五万二千三百零八吨，生产量占世界第一位。

任何一个外国人到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只要在馬路上逛逛，随时可以发现这样美丽的櫺窗：大小不同的銅盘，上面有的浮雕着智利的国徽，有的漆着紅艳艳的智利国花，还有的繪着智利民間流行的“規卡”舞，一男一女，都穿着典型的民族服装，色彩非常艳丽，男的手里拿着白手絹，弯曲着腿在跳。有的巨大銅盘里面还鑲着一只銅造的帆船，帆飽孕着风，船就好象在太平洋上航行一般。銅盘四周浮雕了各式图案，手工十分精巧。銅盘旁边陈列着各式各样的銅烟盒，銅烟碟，銅鑼，銅壶，銅杯……一切都是銅的，閃閃发着紅光，叫你看的舍不得走。

智利是銅的王国。

越过白雪皚皚的安第斯山，飞机降落在圣地亚哥机场。我下了飞机，前来欢迎我們的智中文化协会代理主席坎普斯議員問了我一些旅途的情形，話題就轉到智利的銅矿。他問我有沒有兴趣去參觀一下銅矿，我高兴地点点头。不到一个礼拜，我和坎普斯議員一块兒在杏花村吃飯，在座的还有坎普斯的好朋友瑪路尔議員，他是北方选出来的議員，給我安排了去智利



北部旅行五天的计划，其中包括参观世界著名的诺基卡玛达铜矿。他愿意亲自陪我去，坎普斯也有兴趣参加。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出发的头一天发生了变化，旅行延期了，以后就没有下文。不用问原因，一定是参观铜矿成了问题。

又一个礼拜以后，劳工党主席、前众议院议长卡斯特罗先生请我到他家吃饭。他家住在奥希金省的省会兰卡瓜。在他的葡萄园里吃了中饭，他热情地给我介绍奥希金省的名产。离兰卡瓜七十公里地方的爱尔·戴尼安脱铜矿是世界最大的铜矿之一，属于美国白拉登公司的。这个铜矿有一万多工人，公司里自己有铁路，从七十公里以外的矿上，把铜运到兰卡瓜的办事处，再转接到铁路干线，这样，铜就可以直接送到海港，运输出去。他希望我留出一天时间，到铜矿去参观一下。我们约好了，他先和公司去联系，订好时间，他陪我一道去。回到圣地亚哥，我等候卡斯特罗先生的消息。但是，音讯杳然。我知道卡斯特罗先生尽了努力，不过这次参观铜矿也成了问题。

但我参观了圣地亚哥的玛迭哥铜器制造厂。这次是智利大学教授阿吉莱先生陪我去的。智利有两个大的铜器制造企业。玛迭哥和另一个玛迭姆萨铜器制造厂是属于同一个企业，这是较大的一个企业；另一个企业叫赛利约铜器制造公司。两个企业都是智利民族资本。前一个企业一年可以制造铜器四万吨，后一个企业一年只有两万

吨铜可以制造铜器。玛迭哥铜器制造厂的规模不小，有三个大车间。我们首先参观的是铜丝车间。根据不同的要求，厂里制造各种规格的铜丝。另外两个车间制造铜管和铜板。招待我们参观的生产部经理告诉我：玛迭哥在一九四三年建立，兄弟厂玛迭姆萨早七年建设，于一九三六年成立。这两个厂只有一、二十年的历史。现有的规模虽不算小，但从智利铜的蕴藏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而现在生产量则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来说，这个厂的规模就太小了。

“为什么不发展呢？”有天晚上，智利工商界的朋友和我在圣地亚哥卡莱拉旅馆的屋顶餐厅吃饭，我问一个经营铜器制造厂的民族资本家。

他皱起了眉头，愤慨地说：

“没有铜怎么发展？我们的厂一年只有两万吨铜可以制造铜器。”

为什么一个以生产铜闻名于世界的国家缺乏铜呢？

远在一九〇二年，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血手就伸入世界著名的智利的铜矿。华尔街老板首先下手的是哥金波省的泊尔米约铜矿。接着白拉登铜矿公司在兰卡瓜占据了爱尔·戴尼安脱铜矿，这个矿的生产量占智利全国铜的生产总量四分之一以上。一九一五年，安那康达铜矿公司在安多法格斯达省控制了诺基卡玛达铜矿，这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铜矿，而且是露天矿，人们叫它是取之不尽的铜矿，占有世界全部铜的已知蕴藏量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二〇年，



安那康达铜矿公司又控制了波脱来里约斯铜矿。这样，华尔街老板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智利的铜矿。爱尔·戴尼安脱、诺基卡玛达和波脱来里约斯这三个世界著名的大铜矿的产量占智利铜的总产量百分之九十五。最近在离波脱来里约斯三十公里地方又发现了萨尔瓦多铜矿，可以年产十万吨左右的铜，又被华尔街老板侵占去了。智利其余的铜矿都是中小型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百分之二点五的铜矿又掌握在法国公司手里，真正在智利民族资本家手里的不过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二点五罢了。

美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铜矿，而且垄断了交通、机器和技术。我们看一看美国公司控制的铜矿和智利铜矿生产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两家美国铜矿公司所控制的三大铜矿的生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五，所雇的工人只占全国铜矿工人百分之六十二左右，平均一个工人每年生产铜二十八点四吨，而诺基卡玛达的露天铜矿一个工人每年就可以生产铜三十四点四吨；法国公司所雇的工人占全国铜矿工人百分之五左右，平均一个工人每年生产铜九点四吨；智利本国公司所雇的工人，占全国铜矿工人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一个工人每年只生产铜一点五吨。因为这两家美国公司享有许多特权，同时拥有最新的机器设备，掌握最新的技术，大量生产，并且还有自己的交通运输设备。智利本国公司也想购买最新的机器设备，用最新的技术开采；

可是华尔街老板垄断了，不让智利本国公司改进，使这些公司的铜矿处于落后的状态，这样他们才好完全垄断铜矿企业。

现在智利年产铜五十万吨左右，可是全部控制在华尔街老板的手里，绝大部分运到美国。这个世界上铜蕴藏量最丰富的国家，在华尔街老板的允许下，每年只能有八万吨左右的铜供自己使用。玛迭哥和玛迭姆萨分到四万吨，赛利约分到两万吨，剩下两万吨供给政府军事上运用。美国为了限制智利民族工业的发展，粗铜就运到美国，不让智利进行加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智利铜器制造厂没有足够的铜，怎么能够发展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五角大楼的主人说：为了消灭法西斯，要把智利铜贡献出来。把铜贡献于消灭蹂躏人类的法西斯野兽，这本是庄严的神圣的事业。可是华尔街老板在美丽动人的词句的掩饰下，进行强盗的勾当：当时国际市场铜的价格是二角七分五美金一磅，却把智利铜每磅的价格压到一角二分五，这样美国已经可以从中取得大量的利润。可是美国卖给苏联和英国每磅铜的价格却是五角七分。一转身之间，贪婪的美帝国主义获取了五亿美元的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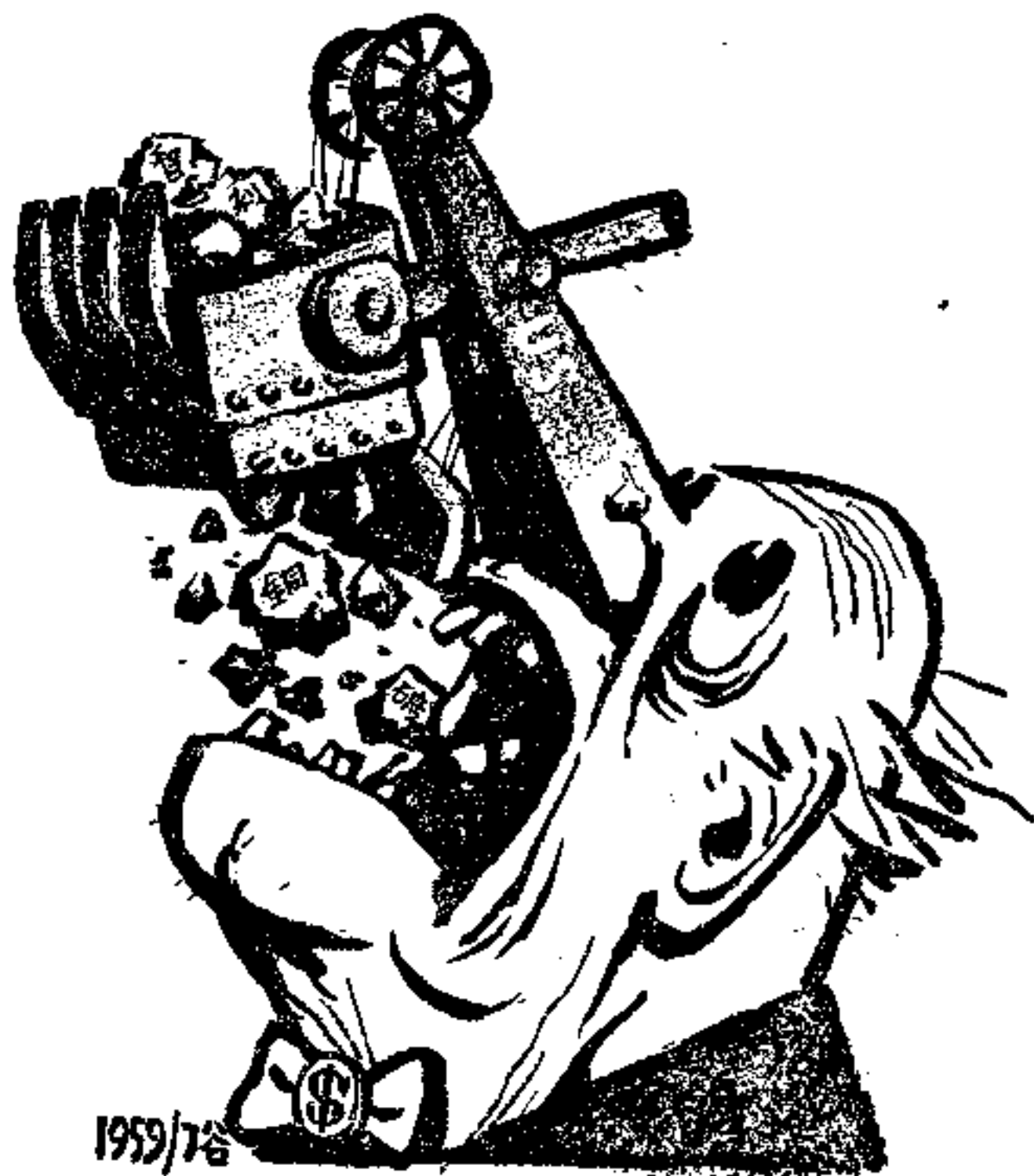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美国铜矿公司每年从智利三大著名铜矿攫取了一亿多美元的利润，这数字等于智利每年预算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美帝国主义还从操纵国际市场铜的价格中，获取超额利



潤。智利銅的价格完全决定于华尔街老板。去年八月，国际市场一磅銅是二角八，今年銅价在美国操縱下涨到三角二，而智利銅的价格，只有二角一分。这样，大量美元就滚进了美国老板的荷包。

不仅如此，一九五五年智利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还訂出便于华尔街老板掠夺的法律。这项法律主要是为了便于美国垄断資本对智利銅矿的投资；讓美国資本家榨取更多的美元外汇拿回美国；并且限制工人提出各种要求。美其名曰吸收更多外資，加速智利銅矿的开采，实际是彻头彻尾的出卖政策。

除了經濟的掠夺，华尔街老板还对智利內政进行了粗暴的干涉。一九四六年智利人民陣綫在选举上获得了胜利，激进党的魏地拉当选总统。在民主政府中有三个共产党员的部长。这当然震动了白宫。不到六个月，从华盛顿来了两位銅业垄断資本家，一个叫霍宾斯，是安那康达銅矿公司的董事长，一个叫史坦納，是白拉登銅矿公司的董事长。这两个控制智利經濟命脉的吸血鬼到智利进行官方性質的訪問。霍宾斯代表安那康达銅矿公司，计划在智利投资一亿二千万美元，建設一个硫磺厂，建成后一天可熔五百九十吨銅。他对当时



老鑿

米谷

智利财政部长赫尔曼·比各提出如下的投资条件：

1. 保証用严格禁止罢工或怠工的法律来“安定”智利工人，并且要修改智利劳动法，成立特别法庭。

2. 减少稅款，以便美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潤。这样就减少了智利很大一部分的财政收入和外汇来源。

3. 在收回生产成本时，采用不平等的外汇兌換率，兌換比价不是根据当时国际协定，一美元比三十一比索，也不是根据当时官价，一美元比八十比索，而是强迫規定为一美元比十九点三七比索。

被人民支持当选的魏地拉总统，在华



盛頓的美元压力下，背叛了自己的竞选綱領，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把共产党人排出內閣，同年九月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断絕了外交和貿易关系，第二年九月批准了“保卫民主法”，宣布共产党非法，鎮压工

人和民主运动，还建立了比薩瓜集中营。他完全按照白宮主人的命令办事，結果使得智利陷于更加贫困和孤立的境地。

美国銅矿公司在智利国土上，就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別的国家的人是不能进

✿ 讀者来信摘要 ✿

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几种不同商品交换关系的看法

最近，讀过几篇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关系的文章以后，总觉得有些蹊蹩似的。我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經濟生活中，不仅存在着象有人所列举的三种商品交换关系（即：1. 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或公社之間的交换，和这一合作社或公社同那一合作社或公社之間的交换；2. 国家把国营企业所生产的消費品和从合作社或公社购买来的消費品，經過交换分配給消費者；3. 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之間的交换），而且还存在着劳动者个人向国营企业、合作社或公社提供产品从而换来货币或某些消費品这样一种交换关系，以及劳动者个人与个人之間的某种交换关系。这两种交换关系（前者是主要的），都是在承認某些土、副、特产品的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前提下发生的，这是我国农村目前經濟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交换关系。每个社員，在不妨碍集体生产的条件下，都可利用业余时间搞些副业和飼养少数的猪、鷄、鴨、兔等。这些土、副、特产品，除少数留作社員本人消費外，絕大部分要通过商品交换关系卖给国家、合作社或公社或者其他劳动者。这种交换关系对我国城乡經

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提高，仍起着很大的作用。在目前，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是合作社或公社和国营企业所不能完全代替的，所以就不能无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及其应有的作用。

曹国权（辽宁新民县）

对胡鈞“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問題”一文的意見

工人以货币工資去購買消費品，按理說，一定量的货币换取一定量的消費品，这种等价交换是显而易見的。但是，胡鈞同志在“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問題”（“紅旗”1959年第12期）一文中却認為这是不等的。他說：“第一，假如这种等价交换，是指劳动与消費品的价值之間是等价的話，这不合理，因为劳动不具有价值，价值只是凝結的劳动；第二，假如說货币是体现着这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话，那么，这里同量的货币并不代表等量的价值，但它却能購買等量的消費品。因此，这也不是等价关系。”我認為，在这个过程中的等价交换，是指货币和消費品的等价。这里有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出現的，它充当了消費品的相对价值。这能說是不相等的嗎？这里并不



去參觀的，就連智利人也不能輕易插足。陪我到瑪迭哥銅器製造廠去參觀的阿吉萊教授，是智利研究銅礦的專家，他也不被允許去參觀。

智利是資源豐富的國家，在美帝國主

義侵略血手的掠奪下，國家的財富不斷地向華爾街老板的口袋裡流去，於是廣大人民過著極端貧困的生活。只有斬斷這隻侵略的血手，智利才可能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

存在什麼“同量的貨幣不代表等量的價值，但它卻能購買等量的消費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胡鈞同志從生產資料的優劣而引出的。這裡所指的等價交換，乃是一定量的貨幣和一定量的消費品相交換，並不牽涉到這個勞動者和那個勞動者他們獲得同量的貨幣而是否創造同量的價值的問題。兩個不同的問題，不能扯在一起。

胡鈞同志為了論證這種交換關係不是商品等價交換關係，用抽去貨幣的方法來進行分析。他說：“因為貨幣在這裡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交換的手段，有它或沒有它，對商品關係的本質絲毫沒有影響，物物直接交換同樣是完全意義上的商品交換。”貨幣能抽嗎？不能，決不能抽。因為貨幣雖然在交換中起媒介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是起一般等價物作用的特殊商品，如果貨幣不存在，那末交換的性質就變化了。

何培煜（江蘇無錫）

對薛暮橋“社會主義制度下 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一文的意見

“紅旗”今年第十期上發表的薛暮橋同志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分析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不同的三種交換，並肯定了三種交換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商品交換的性質。我認為把文章中所說的前兩種交換，說成是帶有商品性質的交換，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把第三

種交換，即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也說成是帶有商品性質的交換，並且強調指出它和一般的商品交換沒有十分重大的區別，我認為是不夠確切的。

首先從交換這個含義來看。1. 交換必須是雙方都享有產品的所有權。2. 交換後雙方即失掉原有物的所有權，取到新的物品的所有權。但是國營企業對其產品並沒有所有權，其產品所有權是國家的。兩個國營企業，不管物資如何轉換，它的所有權並沒有變更。因此，這只能說是國家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進行物資分配，而不能說成是一種交換。其次從商品的含義來看，商品是為出賣而生產的產品。國營企業的產品除消費品和一小部分小型工具外，其生產資料的產品是不出賣的。

這樣看來，怎麼能把國營企業的物資調撥說成是帶有商品性質的交換呢？

薛暮橋同志的文章中舉出的理由是：國營企業的經營要進行成本核算，產品要計算價值，國家調撥這些產品時要使企業在生產中消耗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得到補償。這實質上是說國家調撥物資也必須根據等價的原則。我認為不能因為有等價的基礎就把國家的物資調撥說成是帶有商品交換的性質了。國營企業所以需要計算，是充分利用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以便發揮職工的積極性，提高生產效率，提高管理水平，更快地加速社會主義建設。這種計算只是一種商品的外殼形式，並不等於說國營企業之間的物資調配是帶有商品性質了。

邢桂林（北京市）



红旗

HONG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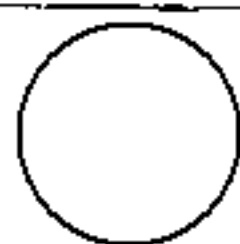
一九五九年

15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五期 ★

目 录

認識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 許瀚新(1)

参加国家建設是人民解放軍的光荣

任务 肖 华(8)

苏联人民为爭取提前完成七年計劃

而奋斗 刘 晓(15)

工业企业的专业分工和綜合經營 ... 张有贇(23)

农村中的工具改革 李燕民(28)

独立思考和服从真理 施东向(34)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修訂第三版) 李 云(36)



認識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

許 滌 新

为什么要学习政治经济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举出很多的理由，認識經濟規律的客觀性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經濟規律是以一定的經濟条件为前提的，它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經濟发展的客觀过程。在私有制度之下，特别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之下，經濟規律对于人們发生着强制作用。以商品生产來說吧，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經濟中，商品生产是由分散的、单独的私人生产者进行的，他們彼此竞争，总想排斥別人、保持并扩大自己在市場上的陣地。但是，他們中間的每一个人，誰也不知道人們对他所生产的商品的需求怎样，他能否在市場上卖掉这些商品，他所消耗的劳动能否得到补偿。只有到了市場以后，情况才能弄明白。在市場上，价值規律通过供求关系表现为不断波动的价格，使生产者知道：那些产品生产得太多，那些产品生产得太少。价格环绕价值的这种自发性的波动，迫使商品生产者縮减或扩大某种商品的生产，迫使他們退出那些商品价格低于价值

的部門，而涌向当时可以获利較多的部門。由此可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經濟中，商品生产者是被市場所控制的。价值規律在对人們起着强制作用，在自发地起着調節商品經濟各部門間社会劳动和生产資料的分配的作用。恩格斯說道：“商品生产，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它自己特殊的、它所固有的不能与它分离的規律，这些規律，不管无政府状态如何，还是在无政府状态之中并通过无政府状态来显示自己的作用。这些規律表现于社会联系的唯一保留下来的形式之中（即交換之中），并且作为竞争的强制規律，对个别的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这些生产者自己甚至并不知道这些規律，只有經過长期的經驗，才逐渐地发现它們；因之，这些規律是越过生产者并且违反生产者的意志而确立的，成为他們生产形式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規律。生产产品統治着生产者。”^①在資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商品生产的規律，就更突出地、有力地发生作用了。資本主义的生产是扩大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28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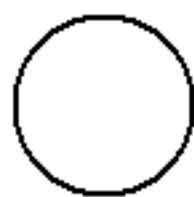
的商品再生产，而这种生产是以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以资本家剥削工人群众的剩余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阶级对抗的增长，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加剧。“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把大工业所使用的机器的无止境地改善的可能性，变成为每一个工业资本家的必须遵守的规律，这个规律，使他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之下，逼得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机器。”^①而机器的改进，就会使社会上一定数量的人被抛到十字街头，成为“产业后备军”，造成相对的人口过剩；就会使劳动人民的消费降低到最低水平，使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展赶不上它的生产上的扩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日益大规模地获取利润，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扩大的商品再生产的矛盾，就周期地变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了。危机象一阵大风暴，猛烈地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流通，这不但使大量的工人失了业，而且使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破了产。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都“丧失了控制自己本身的社会关系的权力”。劳动者固然被生产资料所支配；就是占有了生产资料并剥削生产者的资本家，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解脱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压迫而获得了自由，获得了支配自己的生产

资料和生产产品的权力，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社会的生产也就排除了无政府状态的统治，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计划之下进行。这样，过去那种“生产资料支配着生产者”的局面，就宣告结束了。恩格斯说道：“当社会掌握全部生产资料，使之可以根据社会的计划来运用它们的时候，社会就会消灭了直到现在居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对于人的奴役。”^②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客观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平均利润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等等，都因为失去存在的条件而退出历史舞台，失掉了效力。

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个体经济已经实现了合作化，而资本主义企业，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的形式下，基本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这样，在全国范围来说，我们就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就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生活中，日益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成为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的主人。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不能认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可以不顾客观的经济规律而随自己的主观意志任意行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是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手段，这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使全社会行动统一、保证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各部门和各个企业的必要比例的总计划，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大生产便不能进行；这样，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也就产生了。其他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也都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作为条件的。由于经济条件不同，由于生产关系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同私有制社会的经济规律，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在实质上是不同的。但是，无论私有制社会的经济规律，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着的，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客观必然性。斯大林说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是反映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生活过程的规律性的客观法则。”^①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而孤立地强调人们的自由意志。

二

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规律是客观地存在着的。现在把价值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作为例子，来证明这个论断。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着商品和商品生产，也就必然存在着价值规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在集体所有制各个单位彼此之间，存在一种互助协作的经济联系。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需要从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合作社或现阶段的人民公社）取得粮食和经济作物等等；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人民公社，需要从国营企业取得农业机械、肥料、燃料和日用工业品等等。要实现这种经济联系，在现阶段，只能通过商品交换的关系来进行，而不能由国家直接调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是属于它自己所有的，国家如果现在对人民公社或合作社的产品，就采取无偿地直接调拨的方式，在实质上，就等于否定了人民公社或合作社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在人民公社内部，各个核算单位之间，也同样不能无偿地直接调拨。

在实现商品关系的时候，需要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交换双方应得的利益，才能有效地鼓励集体所有制的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经验证明：正确的价格政策，是农业方面实现生产计划和完成收购任务的保证之一。解放以来，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以来，国家

-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6—287页。
- ② 同上书，第310页。
- ③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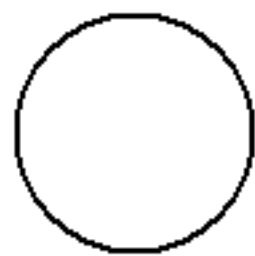
对于推动农民扩大种植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和完成收购计划，有了很大的成绩，其中的经验之一，就是利用价值规律，使农民感觉到增产这些东西，对自己有利。反之，如果国家在規定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时候，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那就会或者使国家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或者使生产合作社或人民公社的收入减少，使合作社或人民公社的积累和社员的个人收入受到影响，这样也就会妨碍社员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在集体所有制的各个单位之间，如果不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就会使发生经济联系的双方中，一方吃亏，一方占便宜，这样，就会妨碍彼此间的互助协作。由此可见，等价交换是商品关系的客观必然性。要在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在集体所有制各单位之间通过商品关系实现经济上的互助协作，就必须充分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严格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

在全民所有制内部，除了消费品生产是商品生产以外，国营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也是通过商品形式来进行的。价值规律在这些领域内，也发生它应有的作用。

(二)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组成为相互协调的统一体，这样，就使整个社会有可能按照预定的统一计划进行生产；而只有按照统一计划，保证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得到合理而节约的使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才有可能顺利地、高

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这种客观要求作为根据的。斯大林说道：“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才能进行。”^① 国家的经济计划必须以这个经济规律作为依据，必须反映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才能正确地领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的领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成分之间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不论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之间、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在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在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在农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等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配上，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行安排。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间，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主次和轻重，以便使国民经济的发展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如果不分主次，不分重点非重点，而要求各部门平均发展，或者只抓住重点，而丢掉了一般，都是不符合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



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是彼此联系的，是必須相互协调的。作为主要部門、主要行业的生产，如果在生产資料和劳动力的分配上，占得太多，就会影响其他有关部門的生产；而这些有关部門的生产，如果减少得太多了，也就会反过来影响主要部門、主要行业的生产，使主要部門、主要行业的生产，受到牵制而不能前进了。以鋼鐵为例吧，这个行业的生产是直接間接地需要煤炭、机器制造、电力、森林采伐、基本化学和交通運輸等行业的支援的。增产一吨鋼和鉄，就得相应地增加煤炭、冶炼設備、电力、木材、基本化学等方面的生产和供应；就得相应地增加交通運輸的一定貨运量。在这些有关的行业中，不管缺那一項，都会使鋼鐵生产受到限制。同时，要增加鋼鐵生产方面的劳动力，就得相应地增加这方面职工所需要的粮食、副食品和日用輕工业品等等。这种情况，說明重点部門和其他部門必須“統籌兼顧、全面安排”；說明重点部門和其他部門之間，必須保持着一个适应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当时的生产資料、消費品供应能力和当时的技术能力的比例关系。

不論那一个行业，甚至看起来不大重要的行业，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注意，也会影响其他行业的生产。例如松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是，如果缺少了它，不少行业的生产就会受到影响。制造一吨紙要用十公斤到十五公斤松香，一万件火柴要用一千二百公斤松香，

一吨肥皂要用一百公斤以上的松香。还有制造油漆、杀虫葯剂等也都要很多松香。少采一斤松香，則制造紙张、火柴、肥皂的工厂，也就缺少一斤配料。事实告訴我們：国民經济是一个复杂的統一體，在各个部門、各个行业之間，虽有重点非重点之分，主要次要之分，大宗小宗之分，但是，非重点的部門、次要的部門和小宗的生产，毕竟都是国民經济的构成部分，都是經济建設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方面。如果把非重点部門、次要部門和小宗生产，看成无足輕重、可有可无的东西，那是同客观存在的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相抵触的。

(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未达到能够提供丰富的产品实行按需分配的程度；在生产还没有实现完全机械化和自动化以前，劳动時間还比較长，劳动强度还比較高，劳动还没有完全成为人們生活的需要；全体人民还没有可能普遍享受高等教育，熟練劳动和簡單劳动之間还有显著的差别；人們的思想意識还不能完全摆脱旧社会残余的影响，在劳动态度上有的誠誠懇懇、有的敷衍塞責，——这些情况，使社会在劳动人民間分配絕大部分消費品的时候，只能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則，而不能采取按需分配的原則。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分配关系方面的客观經济規律。遵守这个規律去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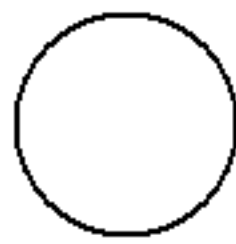


处理分配问题，可以鼓励劳动人民认真劳动，努力学习技术，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推动劳动人民在物质上关心自己劳动的成果，并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同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如果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企图过早地抛弃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采用按需分配的原则去处理劳动人民间消费品的分配，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如果不管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平均地一律付给同样的劳动报酬，那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而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平等，是大家都平等地摆脱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剥削，大家都平等地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和工作，大家平等地都有从事劳动的义务，对大家的劳动都按照其在工作中所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支付报酬。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①

三

经济规律既然具有客观必然性，那末，

人们在它的面前，是不是就完全无能为力呢？是不是就只能成为它的奴隶呢？那又不然。事实证明，人们在经济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人们不但有可能认识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而且有可能自觉地利用它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恩格斯早就说道：“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它直到现在还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与人们相对立——将被人们十分内行地运用了，因之，也将服从于人们的支配了。人们的社会生存，直到现在，作为自然和历史所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事物，而和人们相对立，现在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直到现在统治于历史之上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才受到人们自己的控制。”② 恩格斯在这一段话中，一方面指出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规律是能够被认识，能够被运用的。所谓“服从于人们的支配”，所谓“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所谓“受到人们的控制”，无非是说，人们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有可能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并自觉地利用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自觉地利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自觉地利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价值规律



等，去进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加强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经济联系，发展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自觉地利用按劳分配规律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去处理劳动人民间的分配问题，去推动劳动人民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

肯定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并不否定人们的自由意志，并不否定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人们的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必须以认识客观的必然性为前提。这就是说，只有在认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自由活动。恩格斯把人们的自由，叫做“被认识了必然性”。列宁说：“恩格斯一方面考察人的认识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考察自然界的必然性；他没有提出任何定义，只是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①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是第一性的；而人们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是第二性的。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并根据它们的必然性去决定政策、去处理问题的时候，社会主义事业就得到极其顺利的发展。反之，当人们不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而违背这种必然性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它们就会出来表示“抗议”，并且自发地发生强制作用。恩格斯早就说过：“社会的力量，正如自然的力量一样，在未被我们认识到和计算到以前，发生着盲目的、强制的、破坏的作用。可是一经我们认识了

它，研究了它的作用、方向及影响，那时就完全听凭我们来使它更多地服从于我们的意志，并且利用它来达到我们的目的。”^②

在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化以后，人们成了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这就不但有认识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而且有可能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这并不是说，人们都已经认识了它们并且善于利用它们。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我们必须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经常分析情况，经常研究问题，经常总结经验。认识从实践开始，离开实践是不可能认识客观的经济规律的。同时，我们还要从事理论学习，也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更好地总结我们的实际经验，帮助我们提高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以便在理论的指导下，把我们的经济工作做得更好。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符合于客观的经济规律，也才能充分发挥我们在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

-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8—299页。
- ③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93页。
-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3页。



参加国家建设

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 肖 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遵照这个指示，我军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发扬了过去长时期内形成的军队担任打仗、做群众工作、参加生产三大任务的传统。在胜利渡江、解放全国之后，我军就一面剿灭匪特武装，安定社会秩序，一面派出工作队，参加新区的社会改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军参加国家建设的活动更从多方面展开。例如：驻在各地的部队大都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建设，特别是参加了建工厂、筑铁路、修公路、修水库等基本建设工程；全国几个有名的重大工程，如鹰厦铁路、康藏公路、长江大桥、荆江分洪、淅沙灌渠、十三陵水库等等，都有部队参加，其中有的则由部队包建。各部队还以各种方式，支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十年当中，全军有七百多万战士、干部复员转业，参加了各个生产建设战线；其中包括大量的建制部队（三十多个师）和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仅铁道技术人员就有五万多）。

为了更好地参加国家建设，我军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在不同时期，军队都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了参加各项建设的具体方案，如“关于军队参加和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及农业生产的实施方案”，“军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纲要”，和最近颁布的把经常抽调若干干部参加地方基层工作，作为一项经常工作的规定。每年春节前后，全军都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在这个期间，各部队都系统地进行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的检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强经常的拥政爱民工作。军队在参加各项建设中，十分重视学习和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在参加各项建设工作中，各部队还贯彻执行了“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使军队在参加各项建设工作中，得到了地方党委的领导和支持。这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十年来，我军是坚决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保持并发扬了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和进行生产的光荣传统；象其他各方面的成就一样，人民解放军在参加国家建设方面的成就也是



很大的。

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和平时期，军队参加国家建设，对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支援。为了说明这一点，除了前面列举的一些事实以外，还可以看一看一九五八年的情况：在这一年，军队光是参加和包建的水利工程就达两万多项，其中沈阳地区部队修建的水库和渠道，就可以使二百几十万亩农田受益。在工业建设方面，不仅参加了若干重点工程的兴建，而且出动了八千八百多辆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参加了全民炼钢中的运输工作。在这一年中，全军支援工农业建设的劳动日就达五千九百多万个。除此而外，军队内部的农副业生产也有不小的成绩。在这一年，全军共收蔬菜四亿六千多万斤，养猪四十八万多头，不少单位的蔬菜、肉食已经达到大部或全部自给，有的还拿出自己种的菜、养的猪，支援当地市场。在这一年，我军所属的各个工厂和修理厂给地方生产的各种机床就有四千八百多台，拖拉机和其动力机共有三千多台。象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国家建设都发生着积极的影响。

诚然，国家建设的规模是巨大的，项目是繁多的，军队所参加的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六亿五千万人口中，军队只占千分之几，作为一个建设的力量，其数目也不是很大的。但是军队在建设上所起的作用，不能单从数量上看。由于我军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性，因此可以而且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在所参加的建设项目中，发挥突击作用。例如北京的十三陵水库，当雨季和洪水即将到来时，工

程仅仅完成了一半；由于投入了更多的部队，在军民协力之下，终于能够提前完工，把洪水抛在后头。在那些远处边陲，人烟较少的地区，人民解放军参加建设更给当地的工农业生产以很大的推动。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的农垦部队所起的作用，是大家所熟知的。军队在参加建设工作中，许多同志都善于想，善于钻，勇于创造。例如有的同志创造的“汽车牵引斗车运料法”，就曾提高了工效七、八倍。正因为这样，许多地方党委都把部队看成是完成某些最困难、最艰巨的建设任务的骨干力量。经过几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我军在技术上的潜力也是很大的。在保证完成军工生产和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把军队拥有的技术设备的潜力充分挖掘出来，用于承担地方工业部门所迫切需要的机器和配件的生产，也可以对地方工业起到一定的支援作用。同时，还要看到，军队参加国家建设，是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一个重要表现。我军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很高的信誉，他们积极参加国家建设的行动，对人民群众起了很好的影响。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军队派到一个地方的工作队可能只有几个人，但这几个人，却给了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以莫大的鼓舞。同样，军队参加炼钢铁，修水利，支援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对这些运动和工作来说，也不仅仅是人力的和物质上的帮助，而且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军队参加各项建设工作的诸多成就，不仅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有利于



国防建设，军队建设。这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而国家的经济建设则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如果没有现代工业的发展，没有化学、无线电和冶金工业，军队就不可能获得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交通运输的发展，没有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网和水上航运，军队就不可能具有高度的机动能力。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没有充分的粮食储备，任何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作战都将不可能进行。所以，军队参加各项建设工作，固然是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但从长远来看，从根本上来看，则又是加强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认为国家经济建设是地方上的事，同军队没有多大关系，显然是不正确的。对于这一点，军队干部已经从实践中自觉地认识到了。

通过参加国家建设工作，军队同地方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团结，也进一步加强了。大家知道，在建国以来的十年中，我军同地方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正如过去的几个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是融洽的、亲密的。但是，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也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全国的中心任务由战争转为建设，军队也由主要是作战转为主要是战备和训练，由散驻乡村进入集中的营房。这样一来，军队同地方政府、同人民群众的直接接触，就比过去减少了。与此同时，军队中有的同志，把“现代化”、“正规化”神秘起来，有些事情办得不够恰当，以致在过去一个短时期内，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军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密切。

这些错误观点和做法及时地受到了批判和纠正。军队积极参加了国家建设，保持和发扬了我们的老传统，扩大了军政、军民之间的接触，使军政关系、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为什么军队参加国家建设，就会增进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呢？因为，军队在参加建设工作的过程中，是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同地方干部、人民群众一起工作，一起劳动的。他们不仅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了建工厂、筑铁路、修公路、修水库等基本建设，参加了人民公社化和大办民兵师的群众运动，而且经常根据生产的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天旱了，庄稼种不上，他们就顶着炎炎似火的烈日，同群众一起抗旱抢种。雨多了，水涨了，他们又同群众一起排涝防洪。在收获的季节，他们就帮助突击收割；有时一听到大风暴雨将至的气象报告，就立即停止操课，带上工具，开到田间，同群众一起抢收。哪里的河道决口了，他们就星夜兼程赶去抢险堵口；村庄被大水包围了，就派出飞机空投粮食、物资，派出电船、汽船以及一切可用的船只进行营救；决口堵住了，大水消退了，又派出人员，捐献衣物，帮助受灾的群众重建家园。在这种肩并肩、臂靠臂的共同工作、共同劳动中，彼此的了解，逐渐加深了，而部队同志在工作中、劳动中的高度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更使人民群众受到很大的感动。例如，为了使所修建的工程早日完成，有的单位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天就开始施工，干部、战士们冒着风雪刨冻土，跳进冰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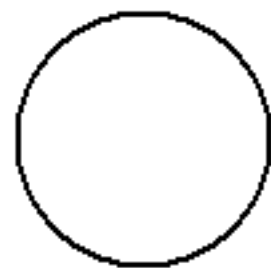
挖泥沙。在施工、抢险、护航、护渔当中，常常碰到一些紧急情况，甚至发生意外事故。每当这种情况和事故出现，部队的同志都不畏艰险，不顾生死，以最大努力抢救遇险的人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炸药眼看就要响了，但忽然发现有个别民工还没有离开危险区；汽车拖带着一大串斗车从上坡滑行下来了，但前面突然出现了几个民工，车既停不住，人又躲不及。当这种千钧一发的关头，许多同志冒着被砸伤、摔伤的危险，以自己的身体掩护群众，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群众的安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许多边防、海防部队，虽然担负着紧张、繁重的战备任务，但也积极地参加了当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例如，在紧张的炮战中的福建前线部队，去年仍然在保证完成作战任务的前提下，以二百几十万劳动日支援了国家建设。在西藏地区的部队，更是一面平叛，一面担负起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队的任务。许多驻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不仅积极参加了当地的许多社会改革和工程建设，为了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兄弟早日摆脱那种“刀耕火种”的落后局面，部队同志还手把手，把积肥、犁田、插秧、打谷等全套的耕作方法教给他们；把亲手打造的锄头、镰刀、抽水机、畜力车等各种农业工具送给他们。班是很小的建制单位，但驻守在黄海某小岛上的一个班，也以最大努力参加了岛上的建设；他们利用战备间隙，同群众一起修道路，办学校，帮助组训民兵，给居民治疗疾病。

为了解决岛上居民千百年来解决不了的吃水问题，他们又凿岩石，挖黄砂，一直挖凿了四十天，一、二尺长的十字镐都磨成斧头一样了，终于打成了一口井。

人民群众总是根据实际行动来判断好坏的。这样一些实际行动帮助了人民，使他们不仅从道理上而且从事实上，不仅从战争年代的记忆里而且从建设时期的行动中，进一步了解到人民解放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他们用“吃菜要吃白菜心，干活要学解放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党给我们派来了解放军”等等最热情的语言，来描述和歌颂自己的部队。“军爱民一尺，民拥军一丈”，各地人民由衷地关心自己的军队，热爱自己的军队，从少年儿童到白发老人，都以能够支援自己的军队为荣，决不是偶然的。

诚然，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是可以也应当从许多方面努力的。例如，经常进行群众纪律的教育和检查，对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就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如果认为军民关系问题只是一个纪律问题，只要进行一下纪律教育和纪律检查就够了，那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我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军同人民之间的关系是象鱼和水一样的关系；要保持这种关系，单是纪律教育和纪律检查，显然是很不够的。在有一段时间内，群众纪律的教育也进行了，群众纪律也检查了，但相互间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情况仍然客观地存在着。只是在军队更多地参加了国家建设工作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参加国家建设，更重要的是使军队受到了极其有益的教育和锻炼，提高了我军的觉悟，加强了我军的战斗力。

我军既然是人民军队，就必须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并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离开了这些，军队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失去生命力和战斗力。而在和平建设时期，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参加国家建设。通过参加国家建设，可以使我们的干部、战士学得生产知识，增强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并且从地方干部那里学习好的工作方法、工作经验。通过参加国家建设，可以使军队的干部、战士亲眼看到国家建设的巨大规模和美好远景，看到人民群众在各项建设工作中的冲天干劲和雄伟力量，进一步增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决心与信心。通过参加国家建设，还可以使我们的干部、战士丰富头脑，开阔眼界，进一步了解社会情况，同整个社会、同六亿五千万人民联结得更加紧密。

这种情形，在整风、大跃进以后，特别是在军队干部到人民公社学习和帮助工作以后，更突出、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整风之前，到公社学习和帮助工作之前，军队干部对于农村情况，对于公社情况，也不是一点不了解的。但是，由于同农村工作、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直接接触还不够多，对许多问题的了解，并不是很全面、很深透的。正因为如此，有的同志在复杂的社会变革中，就往往分不清主流与支流，辨不清真象与假象；而在对部队进行教育时，也往往由于了解情况少，

掌握材料少，使教育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每一个社会变革（特别是象人民公社化这样的重大变革）的意义都是很大的，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整个部队，都可以成为推动前进的力量；但是，如果缺乏亲身感受和比较深入的了解，就往往不能使这种力量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整风大跃进之后，在军队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对社会、对农村的接触，特别是军队干部深入到公社学习和帮助工作，通过这一工作具体接触了农村工作、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之后，情况就大大改变了。他们亲自看到：几年以来，农村工作有很大成就，各项事业有很大发展；亲自看到：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广大农民当中，特别是在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下中农当中，受到何等的拥护和热爱；亲自看到：大多数农村干部的作风朴实，立场坚定，积极工作，任劳任怨，是农民群众的好“当家人”；亲自看到：广大农民的情绪很高，干劲很大，觉悟程度的确提高得很快。他们从亲身接触和调查研究中，了解了这个基本方面，肯定了这个基本方面；同时也看到，某些具体工作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某些干部的作风上还存在或多或少的缺点，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觉悟水平，还需要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正因为如此，许多同志就从亲身感受中扎扎实实地弄清了一个问题，即哪是九个指头，哪是一个指头，如何正确認識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从而对农村工作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态度。

不仅如此，在公社学习和帮助工作的



过程中，通过与农民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使参加这一工作的军队干部，经受了一次新的锻炼。有些入伍不久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对于“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类的艰难困苦，过去是作为诗句，从书本上读到的；现在，经受了劳动的洗礼，也开始懂得了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并且从实际生活中理解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的伟大。经过“三同”，某些同志的官气、骄气、娇气都大大克服，生活更加俭朴，作风更加平易近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风貌也更加清晰了。与此同时，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对有关人民公社的一系列理论、政策问题，了解得更加具体、更加深刻。

这样一来，人们的思想更加充实了，意志更加坚强了，工作更加积极努力了；对部队进行教育，也有了丰富的材料。不但亲自到公社学习和帮助过工作的同志有了如此丰富的收获，其他同志也从这些同志所做的报告、所写的文章中，得到很多启发，受到很多教益。到公社学习和帮助工作得到很大教育和锻炼，参加其他的建设工作，其他的社会斗争，也有着大体相似的收获。当然，到公社学习和帮助一次工作，参加某一项社会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和各方面的一切问题。人的认识水平是不齐的，问题也是不断解决又不断发生的。要使干部更多地了解社会情况，更快地提高思想认识，还需要作继续不断的努力。但是，上述的收获毕竟是有目共睹的；不参加国家建设，不参加社会斗争，这些收获是难以得到的。

由此可见，即使从军队本身的需要来说，参加国家建设工作也是极端重要，不可缺少的。我们是党所领导的军队，不能离开党；是人民的军队，不能离开人民；是为政治服务的军队，时刻不能离开政治。资产阶级口头上总是强调军队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实际上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在压榨与迫害劳动人民的基础上，军队是维持这种血腥统治的重要工具；而军队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却又大多来自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完全明白，如果士兵和下级军官真正懂得了政治，懂得了阶级斗争，懂得了军队为谁服务的问题，将会产生何等的后果。我军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军队。我军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它同人民之间，不仅没有丝毫的利害冲突，而且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从来明确认定军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军人不应当脱离政治，而要重视政治和懂得政治。我们历来要求军队积极参加人民群众的社会斗争实践，从这样的斗争实践中接受教育。人民群众和实际斗争的教育，是我军力量的重要源泉。积极参加人民群众的社会斗争，是我军的历史传统，是我军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保证。只要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发现：当我们重视了这一点，并切实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部队在政治思想上就比较充实饱满，比较生动活泼，干部、战士们的进步也比较地快，比较地大；而当这个重要的传统被忽视、被削弱的时候，干部、战士们的头脑就比较闭塞，眼界也比较狭窄，部队思想就难以赶上形



势的发展，这样那样的不良倾向也往往趁机滋生。这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在建国以来的十年中得到再一次的证明。

对于军队参加国家建设，曾经有这样一些错误论调。一种是，“在和平时期，在全国胜利之后，军队同地方的分工明确了，再参加国家建设工作不必要了。”这种论调是不正确的。因为积极执行“工作队”的任务，参加国家建设工作，是我军人民军队的本质决定的。某些客观情况的变化没有也不会改变我军的这个本质。再一种是，“在军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阶段，训练任务繁重，参加国家建设会影响训练，得不偿失。”这种论调也是不正确的。持这种见解的同志，对于什么是训练，存在着片面的理解。我们认为，在操场上、课堂上进行的训练，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参加国家建设，参加人民群众的社会斗争，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训练内容。参加国家建设同进行训练在时间上是有一定矛盾的，但如果安排得好，这种矛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单位中，参加国家建设并没有使训练受到不利的影响，相反的使训练获得了更大的成绩。以上错误论调从本质上来看，都是轻视政治、脱离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反映。

当然，军队是一个武装的战斗组织，它的“工作队”任务，必须在不妨碍“战斗队”任务的前提下进行。在和平时期，军队必须不断地加强训练，提高素质，随时作好战斗准备，以应付敌人可能的侵略。这是军队的首要任务。其他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任务。事实上，军队的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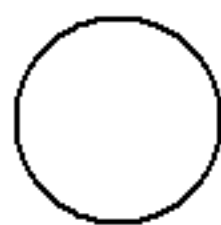
备和训练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以为既然不打仗，军队就应当以主要的力量搞生产建设，过高地提出军队参加各项建设和进行劳动生产的要求，显然是不正确的。对于战备和训练的任何削弱，都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当前毕竟是处于和平时期，全党全民都在紧张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内，让军队在战备和训练容许的情况下参加国家建设和进行劳动生产，这不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军队，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可以做好的。

党和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它“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把我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地打仗一项，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的正确性，不仅为过去几个革命时期的历史所证明，更为建国十年来的历史所证明。应当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根据军委关于军队每年以一、二个月的时间，参加地方的各项建设和进行军内生产的决定，把“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任务，更好地担当起来。把既善于打仗又善于做群众工作和进行生产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更高地发扬起来。参加国家建设是我军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把这个任务完成得更加出色！



苏联人民为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而奋斗

刘 晓



一九五九年，苏联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进入了苏联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

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勤劳的苏联人民以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和忘我的劳动热忱，展开了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斗争。由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由于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展开，苏联在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目前，大规模的技术革新运动已经展开，全国呈现出经济蓬勃发展 and 政治思想空前活跃的新气象，为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奠定了良好的、稳固的基础。

—

七年计划是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新时期的标志。这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开始，是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苏联人民在最近几年中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仅一九五八年的一年中，苏联基本建设投资额，就超过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支出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额的总和。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火箭的发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国民经济不仅在发展速度方面早已超过了美国，而且最近八年来，整个工业总产值和一系列最重要的工业生产部门的产品，在增长的绝对量方面，也超过了美国。在政治方面，作为苏维埃制度基础的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国内各兄弟民族的友谊、团结更加发展了，苏维埃社会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致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巨大成就，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和解决更巨大的任务提供了前提。

新时期的基本要求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根据这个要求，七年计划规定了进一步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任



务。七年中将大大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加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更充分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同时，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为逐渐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本质差别创造条件。七年计划就其规模来说，是苏联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七年中，工业总产值将增加百分之八十，农业总产值也将增加百分之七十，工人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将增加百分之四十。世界上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提出和完成这样的计划。在钢的生产方面，革命前的俄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之一，而到一九六五年苏联钢的年产量将达到九千万吨左右，即超过目前所有欧洲国家钢产量的总和。到了一九六五年，每一天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的产量，将等于一九一三年的俄国全年的产量。人们过去为德聶泊尔电站的建成感到自豪，而七年中发电能力将增加六千万瓦，这等于一百个德聶泊尔电站。化学工业的总产量在这七年中将增加约两倍。在七年计划期间，住宅建筑面积（集体农庄除外）为六亿五千万至六亿六千万平方公尺，而一九五六年全国城市住宅面积为六亿七千三百万平方公尺。七年中增加的住宅建筑面积相当于十五个莫斯科市，或一百个高尔基市。工业生产发展速度之快还可以用下面的数字来说明：在一九三二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一所代表的绝对数值

为八亿卢布，在一九五九年约为一百一十亿卢布，而到一九六五年则将增至一百九十亿卢布；七年中基本建设投资额约为三万亿卢布，几乎等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全部基本建设投资额的总和。七年计划的完成，将使苏联人民在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通过七年计划，苏联人民满怀信心地展望着自己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

苏联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七年计划，以它宏伟的规模和光辉的远景，大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的劳动热忱。还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全国人民就热情高涨地参加了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讨论，各地举行了各种会议约有九十六万次，参加讨论的人数达七千万人以上。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几个月来，从帕米尔高原到北冰洋，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在广大的苏联国土上，苏联人民为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竞赛。在这个竞赛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万多个单位获得了共产主义劳动队的荣誉称号。这个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人们要求发挥潜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在六年甚至更短的时期内完成七年计划。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机器制造工



人，乌克兰的矿工和冶金工人，乌拉尔的建筑工人，巴什吉尔的石油工人，哈萨克的有色金属冶炼工人和伊万诺夫斯克的纺织工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劳动者，成为全国人民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计划的发起者。最近，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召开以前，乌克兰等共和国和许多州的劳动者提出提前一年到两年完成七年计划的保证，哈萨克、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莫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等共和国提出五年完成七年的农业生产计划的保证。这个竞赛运动的开展，是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思想觉悟提高的结果；他们提出的这些保证并不是空话，而是以科学的计算和具体措施为基础的行动计划。他们按日、按月和按季度地完成和提前完成着自己制定的计划。

今年上半年，工业发展的速度直线上升。全国工业总产值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五，全国所有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国民经济委员会都毫无例外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而且有不少地区和企业在中旬就提前完成了上半年的生产计划。按照原定的计划，今年全年的工业总产值要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七，而今年上半年计划实际执行结果，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二，超过了去年上半年比前年同期的增长数。今年上半年从国家计划中指拨的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而建筑安装工程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工业和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九。降低

工业产品成本的计划已经超额完成，半年内超计划节约将近四十亿卢布。今年上半年的全国重工业的许多最重要的产品生产计划都已经超额完成：生铁产量达二千一百万吨，钢二千九百三十万吨，钢材二千三百一十万吨，煤二亿五千二百万吨，石油六千一百七十万吨，电力一千二百六十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七万三千一百台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飞速发展着的苏联工业，具有着巨大的潜力，苏联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无穷无尽的源泉。

苏联人民在农业生产战线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者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提前完成七年计划掀起了社会主义竞赛的热潮，争取更快地更充分地满足人民对食品和国家对各种经济作物的需要，为急剧增加农产原料，早日达到年产一百亿到一百一十亿普特的谷物而奋斗。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是人民对此充满了信心。例如按照七年计划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到一九六五年底谷物总收获量应达到十三亿七千万普特，而最近该共和国提出保证在一九五九年就争取达到十五亿普特的产量。今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执行情况很好，春季全国播种面积达一万二千六百万公顷，其中谷物播种面积占七千三百三十万公顷。畜牧业生产情况也良好，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同期比较，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牛增加七百一十万头，猪增加六百三十万口，羊增加七百五十万只。上半年的肉、牛奶、羊毛、蛋类的收



購計劃，都已超額完成。

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指出，為了增產二十億至三十億普特的谷物，今後主要靠全國平均每公頃單位面積產量提高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的辦法來解決。以俄羅斯共和國為例，如每公頃產量提高百分之二，即可增產十億普特的糧食。為了提高單位面積收穫量，全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採取了許多具體措施：保證播種和收割不誤農時，減少損失，普遍選用優良品種，增加肥料使用量，普遍推廣和應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經驗，擴大玉米的種植面積等。在畜牧業方面，為了迅速增加肉類、奶類和蛋類的產量，正在大量增加各種牲畜和家禽的頭數，提高畜產品率，擴大飼料基地，改進畜牧業的組織工作。在實現發展農業生產計劃的同時，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也不斷地改善和發展，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所指出的，集體農莊的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逐漸接近的過程正在發展。例如：集體農莊的公積金不斷增加；集體農莊的公共生產進一步全面地發展；各個集體農莊間各種形式的經濟聯繫廣泛發展；農業的電氣化，生產機械化和自動化進一步擴大。今年上半年就有五萬六千個集體農莊，即占百分之九十四的集體農莊向國家購置了農業技術設備。

在工農業生產蓬勃高漲的基礎上，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正在不斷提高。人們清楚地了解，黨和政府號召大力增產更多

的金屬、石油、機器和農產品，號召展開技術革新運動，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人民的物質和精神財富，進一步減輕人民的勞動。今年上半年消費品的生產計劃也已超額完成，比去年同期增產紡織品一億四千四百萬平方公尺，皮鞋一千六百萬雙，縫衣二千萬件，動物油五萬噸，純奶製品六十九萬噸。今年食品工業的生產能力將繼續擴大，不久將有五十所新建的奶廠、三十所肉類聯合廠和十七所製糖廠投入生產。到今年年底，紡織品將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摩托車增加兩倍，電視機增加三倍。蘇共中央六月全會還討論了進一步發展紡織工業的措施問題。調整工資工作正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職工的工資水平不斷提高。从今年十月起，蘇聯的機器製造和金屬加工等工業部門的六百萬職工將實行七小時工作日制度。最近，蘇聯政府決定降低若干商品的零售價格，如手表、照象機、自行車等商品平均降價百分之十六至二十一。這樣，一年內人民可節省開支六十餘億盧布。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僅表現在工資水平的提高和降低物價等方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對人民生活的關懷，還表現在興辦大量的社會集體福利事業，保證人們有舒適的住宅，發展公共飲食業，改善對人民的生活服務，改進醫療設施等。在今年上半年內，蘇聯人民獲得的免費和優待共值一千一百六十億盧布，比去年上半年多百分之九。國家撥款建成的住宅總面積



为一千三百六十万平方公尺，比去年上半年多百分之十三。最近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布了关于发展公共饮食业和改善对人民的生活服务设施，关于进一步发展学龄前儿童机构、改善学龄前儿童教育和医务设施等决议。国家将拨出巨额的费用来满足人民生活这些方面的需要，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这些措施，有助于培养和发扬人们在生活、劳动和人与人的关系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从而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成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

三

在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斗争中，苏联人民特别重视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技术革新。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国民经济中的技术革新——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者的文化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组织的更加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一切对建设共产主义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列宁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①为了解决同资本主义世界竞赛中最大限度地赢得时间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关键也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七年中，必须使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建筑业提高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铁路运输提高百分

之三十四至三十七，国营农场提高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集体农庄提高约一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革新。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新技术的广泛采用，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业化和协作，是顺利完成七年计划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决定性条件。

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以后，苏联人民广泛地展开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建议运动。现在，在全国生产战线上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数，已由去年的一百七十万人增加到二百万人以上。今年上半年有一百多万发明和合理化建议者，提出了一百五十万项以上的建议，已被采用到国民经济中的有一百多万项发明和合理化建议。最近，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从五月一日起实行了新的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建议条例，在各地成立了发明家与合理化建议者协会，在工农青年中组织技术革新比赛等，这对鼓励职工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是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它揭开了苏联技术革新的新的一页。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执行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关于加速工业和建筑业中的技术革新决议的问题，即在工业和建筑业中实行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运用新技术来进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8页。



一步扩大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等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加速发展化学工业和进一步发展纺织工业的问题。全会通过了关于加速技术革新以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决议，并发出了告全国劳动人民书。这次会议对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进一步发展经济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号召全国的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为技术革新而广泛开展全民性的社会主义竞赛，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反对技术上的保守、落后和停滞现象而斗争。六月全会要求大胆地推广新技术、使现有的设备现代化、完善工艺过程、更好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和挖掘潜力，厉行节约、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大力发展先进的科学，顽强地掌握新技术，广泛传播和采用竞赛中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开展发明创造和合理化建议运动。六月全会制定了全面进行技术革新的纲领，确定了党组织、国家机关、职工会、共青团组织、企业、科学研究机关和设计机关的具体任务。目前，各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正在大力贯彻这些决议。全国工人、集体农民、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们都在具体深入地研究全会的文件，并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予以贯彻。各个企业都在制定和实施关于掌握新技术、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能力和潜力的计划。

现在苏联人民加速技术革新的斗争，

正在几个主要方面大规模地进行中。

首先，大力进行生产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的全盘机械化、自动化是现阶段技术革新的基本方法，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苏联人民集中力量正在实现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在生产过程全盘机械化的基础上，消灭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农业中仍然存在的繁重的手工劳动。目前在苏联的黑色和有色冶金、化学、采煤、石油和煤气、机器制造、建筑材料等工业部门中，正在通过采用现代技术的办法，实现全盘机械化。在自动化方面，目前正集中力量实现下列任务：从个别的生产操作的自动化，过渡到建立完全自动化的工艺过程、完全自动化的车间和企业。在自动化能够保证最大的经济效果的部门中，将首先完成生产自动化的任务。现在，苏联的采煤和电力等主要工业部门已逐渐实现了全盘自动化，在机器制造业中已有三百五十多条自动化作业线。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等主管部门正在拟定关于在国民经济部门中实现自动化工作的具体建议，制定在各个部门中采用电子技术的计划。

其次，大力改建、扩建和在技术上改装现有的企业，进一步在技术上装备建筑企业。这对提前完成七年计划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六月全会召开以前，弗拉基米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州的劳动者、党的组织和经济机关提出倡议，通过更好地使用生产能力、改



建和扩建现有的企业的办法，挖掘生产潜力，以最少的投资达到最大的经济效果，并以此争取提前一年至二年完成七年计划。这一倡议迅速地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推广。六月全会赞成这一创举，在决议中强调必须尽力加速在各企业进行改建、扩建工作，并且规定在建筑企业中必须采用的工艺过程和改进办法；确定了在技术上改装建筑业、运输业和邮电业的措施；规定了加强与此有关的机器制造业的设计和试验等措施。

再次，进一步发展科学，加速把科学的成就运用到生产中去，提高科学在技术革新中的作用。目前苏联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不断的改善，全国的科学家正日益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最后，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专业化和协作，也是正在实现的任务。目前，工业和建筑业中的专业化正继续扩大，先进的生产组织方法正在推广，各个地区之间以及各个企业之间合理的协作关系正在广泛地发展。

四

在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中，苏联人民把深入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和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指出，向共产主义

过渡不仅需要物质技术基础，而且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水平。大会后，党进一步地加强了思想工作，各级党的组织、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等组织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用集体主义和勤劳的精神，用社会责任感的精神，用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用不懈地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的崇高原则的精神，来教育和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在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斗争中，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日益更新。

苏共中央提出，广泛和深入地宣传和学习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的文件，是苏联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心内容之一。目前，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广泛群众性的宣传和学习的浪潮。苏联全国各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学习，如报告会、讲座、讨论会、问答会等。中央和各共和国的党、政机关和科学研究机构纷纷派出大批的宣传鼓动员协助各地进行学习。全国的报刊、电台、电视、电影、文艺和出版等方面都作了巨大的配合宣传工作。今年三、四月间，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地方都举行了思想工作会议。最近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斯大林州劳动人民群众政治工作的现状及改进措施的决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群众性政治工作。

目前，共产主义教育正在全面展开，声势浩大的争取“共产主义劳动队”这个光荣称号的运动已遍及全国，“按照共产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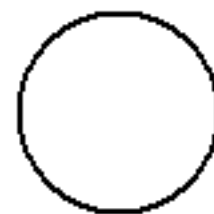
义精神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口号，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行动的准则。尊重和热爱劳动，已成为社会的优良风气。国民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正在有效地贯彻中，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同工业企业和集体农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苏联学校中早已开始的“自我服务”运动，在最近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就这个问题作出专门的决定后，得到了深入广泛的发展。广大群众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最近，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人民纠察队、同志审判会、街道委员会等群众组织，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还发布了关于群众参加维护社会秩序问题的决定。全国的社会舆论对流氓行为、游手好闲、投机倒把等不良现象展开了进攻，积极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各种表现，并且不懈地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整个政治思想工作的基础。用共产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教育和武装人民是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任务。在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学习，在广大群众中

有了进一步的开展。根据党的指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和各种正规的学习教育组织，都以学习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提出的共产主义建设理论问题为中心任务。社会科学界也围绕这些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全面的讨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发展和深入中。

政治思想工作的加强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深入展开，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的积极性，在社会上树立共产主义的新风气，从而保证七年计划的提前完成。

苏联人民在争取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以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在这一时期中可以看出，苏联共产党已更进一步团结和巩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已更加提高。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等群众性组织的作用日益提高。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以后，苏联全国全面蓬勃大发展的事实使人们深信，苏联人民必将胜利地提前完成宏伟的七年计划，实现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



工業企業的专业分工和綜合經營

· 張有萱 ·

社會生产的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实行最合理的生产分工創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因而，就能够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

随着經濟的发展，生产規模的扩大，企业数目的增多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現代工业部門和部門之間，企业和企业之間，分工也愈来愈細。这种分工的結果，将促使工业产品的品种愈来愈多，質量愈来愈好，成本愈来愈低，劳动生产率愈来愈高。苏联、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历史都說明了这一点。近十年来，我国的冶金、机械、化工等工业部門，由于生产規模大大地扩大，厂矿数目大大地增多，科学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企业的专业分工也愈来愈細。因而，我国的工业产品，無論在品种、質量、数量、成本以及劳动生产率上，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以，在工业上实行企业間的专业分工，是促进生产发展和提高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多快好省的一个重要方法。

工业企业实行专业分工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企业都应当有个专业方

向。但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业企业专业分工的程度可以高一些，什么条件下应当低一些，这个問題，是值得分析和探討的。有条件进行专业分工而不进行，对发展生产有損失；沒有条件实行精細的专业分工而勉强实行，对发展生产也有害。

决定专业分工程度的首要前提是經濟技术发展的水平。換言之，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来确定各行业企业的专业分工。所謂需要，就是国家对各行业产品数量大小和品种多寡的要求。所謂可能，就是各行业的产品在全国现有企业內安排生产的可能。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間在經濟上、技术上进行合作的需要和可能。

决定专业分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对产品需要量的大小。需要量大，各企业間的分工就可以細一些，讓一个企业生产一种产品，或者把一种产品分給几个企业，組織专业化流水生产。需要量小，各企业間的分工就应当粗一些，由一个企业同时生产几种型号或几种規格的产品；随着社会需要量的逐步增大，企业数目的增多，再逐步縮小該企业的专业范



围，分出一种或几种型号的产品給其他企业生产，进一步提高专业化程度。拿我国的机床工业來說，在經濟恢复时期，就很少有机床专业工厂，就是有几个，也不得不兼造其他产品。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随着机床需要量的不断增长和机械工业的发展，不仅有了許多机床专业厂，而且又分出了专门生产一类机床如車床、銑床、鉋床、磨床、鑽床、搪床等的专业厂，甚至在同类机床中，有些企业还按不同型号、規格进行分工。显然，沒有一定的需要量，就沒有一定的专业化水平。

决定专业分工程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各行业的产品在全国现有企业內安排生产的可能。如果同类性質的企业多一些，每个企业生产的品种就可以少一些，因而专业化的水平也就能高一些；反之，同类性質的企业少一些，每个企业生产的品种就会相应地多一些，专业化的水平也就低一些。

当然，所謂可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企业，就进行单品种专业化生产；沒有专业化条件的企业，就进行多品种生产。在我国目前經濟、技术条件下，大多数企业还是应该从事多品种生产。不顧具体条件，強調企业間的精細的专业分工，有条件多品种生产而不进行，是不对的。但是，不顧技术条件和管理上的困难，以及經濟上的不合理，勉强进行多品种生产，也会使产品质量降低，在經濟上受到損失。这同样是錯誤的。

国家根据需求和可能确定专业分工的时候，还必须考虑企业的地理分布和地区分工的必要。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不論生产資料还是生活資料，都有广闊的国内市場。随着經濟的发展，每个企业都有向专业化流水生产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幅員广大、資源丰富的国家，各个地区都有各自的自然条件、經济技术条件和資源特点。任何一个工业部門的企业分布，都必须結合这些特点，进行选择比較，以便充分利用資源和其他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同这些特点相适应的工业布局 and 地区分工。这种布局 and 分工，也是我們在确定企业的专业化程度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重要条件之一。不顧地区条件，只从全国需要出发，就去扩大企业規模，过早过分地組織专业化流水生产的簡單做法，是片面的。不从全局出发，不考虑专业特点，只从地区出发，分散布点，形成产品多点制造，重复生产，也是片面的。

前面已經講过，任何一个企业都应当有一定的专业方向。但是，把企业的专业分工看得过死，死啃住专业方向，一成不变，也是不适当的。一般說来，在专业方向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产品的某些品种、規格的調整和变动，不仅是难免的，而且是必須的。特别是象有些机械工厂，由于某些設備的通用性較大，由于某些产品的工艺差別不大，就有它一定程度变动的可能性。



有些工业部門的企业，由于工艺設備的特殊性，一般說来，不容易改变它的专业方向。这类企业因为灵活性、适应性差，人們不容易因局部或一时的需要，輕率地更改它的专业方向。紡織、制糖、造紙和某些化学工业行业等，都属于这一类。有些工业部門的企业，由于工艺設備的通用性，一般說来，容易更动它的专业方向。机械工业是这一类最突出的代表。这类企业虽然灵活性、适应性較大，但也不应当根据局部或一时的需要，輕率地改变它的专业方向。去年，在企业管理体制改变过程中，在大跃进过程中，企业的潜力大大地发挥了。但由于我們缺乏經驗，对后一类企业的专业方向变动过大。紡織工业和紡織机械制造业管理体制的改变，是在同一時間內按照同一办法进行的，但紡織工业的专业方向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与此相反，紡織机械制造业的专业方向，却受到了影响。其道理就在这里。許多修配业轉成制造业，影响了設備的維修和配件的供应，其道理也在这里。因此，我們对灵活性、适应性較大的企业，应当特別注意安排好它的专业分工。

有些行业的企业，由于产品的特殊性或者工艺的特殊性，生产必須高度专业化。这一类企业，除非在特定的情况下，一般是不容許改变它的专业方向的。如机械工业的工具、滾珠、紧固件等专业工厂，都是不带区域性的，而是全国性的专业厂。不能因为設置地点在某一地区，就可以按照这一

地区的需要，随意变动它的专业方向。

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是互为前提、密切联系的。现代工业企业既然必須有专业分工，就必須有相互协作。假如說，专业化是把社会生产分解为各个組成部分的話，那么，协作就是把这些部分联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生产体系。这里有地区内的协作和地区間的协作。这里有企业間的固定协作和一般性的供应关系的协作。无论那种协作，都是保証生产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不論眼前协作关系是否合理，当新协作关系还未形成以前，原有的协作联系就不容許割断。当然，也必須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改进旧的协作关系，建立新的协作关系，使协作愈趋合理。

总之，任何工业部門的企业，都必須有它的专业方向。它的专业分工范围的选择和确定，必須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則，根据需要和可能，根据該行业的专业要求和地区特点，把全国的需要和地区的需要結合起来。在执行专业分工和协作的过程中，必須根据企业的性質，在专业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具体規定哪些企业的活动性可以大一些，哪些企业的活动性小一些。

上面談的是在一个工业部門之內，企业之間专业分工的根据，和我們对待专业分工應該采取的态度。但是，在今天的經濟、技术条件下，有些工业企业为了綜合利用資源，充分利用“废物”，做到經營上的合理，除了生产一种或几种本行业的主要产品外，往往又同时生产几种其他行业



的产品，这叫做工业企业的“綜合經營”（本文討論的范围不包括农副业、职工福利事业等非工业性的綜合經營）。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很多工厂办了“卫星厂”，搞了綜合經營，经历了一段很丰富的实践，值得好好研究。

一个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能从事綜合經營呢？經驗証明，应当在以本企业的专业生产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国家計劃，充分利用本企业的有利条件，从事其他行业有关产品的生产，为国家創造更多的财富。这些条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該厂矿生产过程中，副产物的綜合利用和“废料”的合理利用；
2. 該厂矿生产设备的合理利用和充分利用；
3. 結合該厂矿的技术特点，生产在生产技术上相近似的产品；
4. 把生产过程紧密相連的不同行业，联合在一个企业內，以加速生产过程，节约运输开支。从社会供应的角度看，生产用的某些原料和輔助材料由自己生产是合算的，也可以从事这种生产。

总起来說，就是从充分地發揮物資、设备、技术的潜力，合理地組織原料、材料的供应等条件出发，从全局着眼，全面地权衡核算，使人尽其材，物尽其用，作到經濟合理。

在确定是否綜合經營，确定經營的范围和限度的时候，必須考虑企业的性質。

行业的不同和企业性質的不同，具备上述条件的程度就有不同，因而綜合經營的可能性和范围也就有不同。这是因为各行业、各企业的原料、材料、燃料和工艺装备不同的緣故。

同样是重工业，机械工业的綜合利用条件，就不如鋼鉄工业。鋼鉄工业可以利用炼焦系統的煤气，生产化学肥料和苯等化学工业产品，利用炼鉄的爐渣生产水泥；机械工业一般說来則不具备这些条件。

同样是輕工业，紡織工业的綜合利用条件，就不如食品等其他輕工业。制糖工业可以利用蔗渣、废蜜、滤泥等生产十几种輕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如用蔗渣制造紙张、建筑用紙板和活性炭，用蔗髓水解制糠醛，用废蜜制造酒精、丙酮、丁醇、檸檬酸、乳酸，用滤泥制蔗蜡、蔗油等等；而紡織工业則不具备这些条件。

同是一个行业，由于企业性質的不同，綜合利用的条件也有所不同。例如，同样是机械工业，車輛制造厂可以利用大量的废木料、木屑制造人造板，而机床制造业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因此各行业的企业，都应当分析各自的特点，考虑上述条件，权衡搞不搞綜合經營，以及經營什么，不經營什么。片面地強調专业分工，不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进行綜合經營，是不对的。譬如說，一个較大型的鋼鉄企业，如果不象鞍鋼那样利用焦爐煤气生产化学工业产品，不仅对国家是損失，就是对企业本身的經濟核算也是



不利的。同样，对鉄水渣、渣棉、瓦斯灰、瓦斯泥等，不加以充分利用，也是不对的（据粗略的計算，一个年产五百万吨生鉄的鉄厂，只要将这些废物加以利用，每年就可以增加約二千万元的产值）。反之，对企业的特點不加分析，对上述条件不加考虑，或者为了赶浪潮，或者为了一时的方便，或者为了获得假象的利潤，盲目地办一些同自己条件毫不相干的所謂“卫星厂”，企图把企业“万能化”，同样是不对的。这样，势必造成經濟上的浪费，产品质量的下降，管理上的困难，以及电力和运输的格外浪费。例如，有些机械工厂搞水泥、耐火砖、电石、矽鉄等的生产，就是如此。当然，在供应严重不足的特殊情况下，生产这些产品，作为权宜之計，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当作綜合經營的方向来提倡。

在确定是否綜合經營，确定經營的范围和限度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企业的規模大小，技术水平的高低以及其他条件。

同一性質的企业，由于規模的不同，綜合經營的可能性和限度，也就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任何原料的綜合利用、废物的利用以及企业自用輔助材料的生产，都有一个經濟合理的界限。譬如一个鋼鉄企业，当它的規模达到某种程度，并有炼焦系統时，可以从事化学工业产品的生产；但若規模小到綜合經營很不經濟合理时，除非在特定的条件下，一般說来进行綜合經營是不合算的。又如一个車輛制造厂或一个

木材加工厂，当它具有一定的生产規模时，可以利用废木料和木屑，从事人造板的生产；但是，当生产規模小到一定程度时，从事这种生产就困难了。因此，对企业綜合經營的要求，不区别大、中、小型的企业，一律等量齐观，也是不对的。

同一性質、同样規模的企业，由于在不同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不同，綜合經營的可能性、范围和限度，也会有所不同。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一物多用和变无用为有用的可能性和范围日益扩大，因而綜合經營的可能性和范围也必将愈来愈扩大。例如制糖剩下的蔗渣和稻谷加工的稻壳等，过去認为只能供烧火之用甚至是废物，現在却能把它变成财富了。大跃进以来，四川的資中、內江等糖厂，利用蔗渣等废物制成了紙张、活性炭等十多种产品；湖南、广东等地有些稻谷加工厂，利用稻壳制造可燃性气体（供內燃机用的燃料）和丁醇、丙酮等化学工业产品，使稻壳的身价一跃十几倍。由此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相应地对具备綜合經營条件的企业，加以扩大或者进行改造；因循守旧，墨守陈規，一成不变，是不对的。

同一性質、同样規模的企业，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由于所在地点的不同，分工和协作的条件不同，經營的情况也应当有所不同。一般說来，工业企业密集、行业齐全的工业城市，企业間分工协作的条件就优越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企业



綜合經營的必要性和范围，相对地就差一些（当然，由于技术协作的有利条件，有的企业反而有可能更有利于綜合經營）。反之，工业底子差、行业少的城市，就不得不在一个企业内搞綜合經營，以利用副产品和废物，利用設備，或者生产自用的輔助材料，避免长途运输（当然，由于技术协作条件差，有的反而有可能不利于綜合經營）。例如，有些工业集中的城市，有利用废物的专门工厂（有的就叫利废工厂），把各厂相同的废物集中起来，进行加工；有的可以为一些专业厂設立某些专门性的服务工厂，这样就可以免得分散到各个企业去綜合經營。而工业条件差的城市則不易办到。

由此可見，企业的綜合經營，必須从全局着眼，根据企业的性質、規模、技术

水平和設置地点，考虑利用物資、使用設備、發揮技术、核算供应等条件，进行具体分析，来选择經營的范围和限度。不利用有利条件进行綜合經營是不对的。但是，不适当地将企业“万能化”，甚至“喧宾夺主”，影响这个企业的主要产品的生产，也是不对的。

綜上所述，随着經濟的发展，生产規模的扩大，厂矿的增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专业分工将愈来愈細，另一方面，綜合經營的条件也不断地在发展。我們的任务是，在全国一盘棋的原則下，遵照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的要求，恰当地安排全国各工业企业的专业分工和綜合經營，并随着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加以調整，使其更加經濟合理，真正做到多快好省。

农村中的工具改革

李燕民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全国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紧张的情况。为了适应大跃进的需要，解决农村中劳动力不足的問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开展了規模宏大的工具改革运动。这个运动从大搞水利施工工具和积肥、运输工具开始，接着进行了排灌、耕作、收获、农副业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工具的改革。一

九五八年七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在农村展开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运动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十月之后，大搞秋收、秋耕、秋种工具；特别是深耕犁等深翻工具的改革和推广，获得显著成績。人民公社化之后，碾米、磨面和切菜等食堂工具的改革，也有发展。有些地方还开始利用沼气点灯、煮飯和进一步直接利用水、风等自然能源为农业生产服务。

一九五八年的工具改革，对于提高劳



动效率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紧张情况。例如，安徽省一九五八年全省完成水利施工土方五十八亿公方。按开工初期平均每人每天一点五公方計算，需要三十八亿多个劳动日；由于采取了各种措施，主要是大搞工具改革，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共用十二亿个劳动日就完成了任务，节省劳动日二十六亿多个。黑龙江省五常县安家人民公社，根据杠杆作用和原动机的变速原理，制成了由支架、轴杠、絞盘等三大部件組成的絞关动力机，可以进行打稻、碾米、飼料粉碎、鋤草、弹花、鼓风、切菜等十几項作业。用它带动脫谷机，十小时可脫稻谷一万五千斤到二万斤，比用人力脚踏脫谷机提高效率几倍。辽宁省开原县制造的絞关快碾，二人一審每天工作八小时，可碾米二千七百斤左右，比原来的石碾提高工效十倍多。

一九五八年的工具改革，为实行农业机械化創造了必要的条件。通过工具改革实现农业的半机械化，逐步过渡到机械化，是从技术上改造我国农业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幅員辽阔，气候极不一致，耕作技术精細，这就需要制造出适应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不同作物、不同耕作方法的多种多样的农业机械，尤其是作业机具。几年来，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各地創造和改良了成千上万的新工具，如东北地区創造的綜合号鏟耩机，西北地区出現的十六号山地犁和双行棉花播种机，很多

地区創造的各式各样的深耕犁、密植耩、簡易小麦收割机、玉米定向播种器、甘薯切片机、飼料粉碎机、噴霧噴粉器、水利施工工具、运土工具、提水和排灌工具等等，都是根据当地的耕作經驗創造出来的，都为农业机械的选型提供了宝贵的資料。

一九五八年的工具改革运动，促进了县社工业，特别是农具制造、修理工业的发展，并且在許多地区开始形成农业机具的修配网，这就为在农村中广泛使用农业机械准备了重要的条件。例如，河南省开封地区十五个县的統計，到今年三月中旬已經建立了农具制造修配厂六百六十多处，修配站一千八百处，巡迴流动修配組一千七百多个，基本上形成了以县、社农具制造修配厂为核心的制造修配网。

一九五八年工具改革运动的成績是巨大的，但是也有一些缺点。有的地方搞得急了一点，沒有充分吸收群众的意見，并經過反复的試制、試驗就去制造、推广；有的地方在制造时重視質量不够，沒有建立起一套保証質量的制度；有的地方制造了一些新农具，却沒有認真地推广，或者在推广时忽視传授操作技术，因而使用率不高，等等。对这些缺点應該認真地总结，从中吸取經驗教訓。

二

进入一九五九年后，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具改革运动的领导。各級业务部門在总结一九五八年經驗的基础上，丰富了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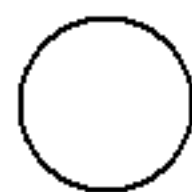
导經驗，改进了工作方法，建立和健全了专管机构。因此，今年的工具改革运动，比去年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第一，进一步加强了工具改革工作的计划性。今年二月全国工具改革办公室主任会议，充分地估计了实行工具改革的需要和可能，制订了全年的规划。规划中正确地规定了增补小农具和注意发挥已有动力机械的作用；把季节性最强、费工较多、劳动强度较大的农活所使用的工具，如收割、脱粒、运输、深耕、插秧等工具，列为工具改革的重点。各地根据会议的精神，研究了本地的具体情况，对工具改革进行了全面安排，适当地规定了改革的重点。例如，湖南省第一季度在农业生产上，运输用工占总用工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根据这种情况，他们确定第一季度围绕春耕积肥，以改革运输工具为重点。在三月底统计，全省新制各种车子六十七万多辆，木帆船一万二千多只，还修建了很多滑道、木轨道和索道。此外，许多地方还注意到提早动手，不误农时。例如，今年有些产麦的地区提早注意了小麦收割脱粒工具的改进和创造，黑龙江等省提早注意了中耕工具的改革工作，都已经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

經驗证明：要使工具改革运动更有成效地开展，必须加强计划性，把工具改革同当前的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根据生产季节统一规划，全面安排，抓住重点，及早动手，并且要做到高瞻远瞩，今年为明年，上季为下季。

第二，注意了对农具的评比选型工作。到目前为止，除了各地召开的小规模的评选会议以外，还召开了许多全国性的评选会议，对深耕农具、风力发动机、水利施工及土地平整机具、薯类收获及加工机具、麦类收割脱粒机和水稻插秧机等进行了评选。这些会议都是通过对实物的操作表演、田间试验，进行了评比选型。对优点较多、性能较好的工具，已向全国作了推荐，供各地进行试用，以便进一步改进提高，达到定型。这些会议一般有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土”专家参加。在会议上，大家交流经验，检阅研究成果，进行试验鉴定。这种群众路线的评选方法，也推动了工具改革运动中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无数的经验证明：任何一种新的工具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都要经过反复试验、不断改进和提高的过程。水稻插秧机的改进过程就是一个例证。一九五六年，全国第一次水稻插秧机会议，只有一台插秧机，第二次会只有两台，第三次会也只有三台，而且经过试验，都存在着分秧不均、伤秧、钩秧和漂秧等重大缺点。通过多次专业会议，交流经验，评比选型，用“拿上来，交下去”（评比一番，提出意见进行改进）、“再拿上来，再交下去”（再评比一番，再提出意见，再进一步改进）的办法，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提高，一次比一次改进。今年六月第六次插秧机会议，参加评比的各种类型的插秧机



已經增加到六十三台。經過技術測定，評選出十八種，繼續試驗，以求得進一步改進，爭取早日定型，然後逐步推廣。

第三，一九五九年工具改革特別注意了推廣和使用的實際效果。例如，湖南省邵陽專區今年新製造的車子，經過檢查合乎質量標準的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使用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七。衡陽專區十個公社的調查，今年第一季度新製各種車子一萬六千三百六十九輛，其中有一萬五千一百六十八輛已經使用起來，使用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二點七。僅使用新製車子這一項，就節省勞動力三百二十多萬個。

今年改革推廣的各種工具使用率之所以比較高，除了各級黨委加強領導和各級業務部門在工作方法上有了進一步改進以外，還在於：比較普遍地注意了提高工具的製造質量，比較普遍地注意了使用新農具的技術指導，加強了操作人員的技術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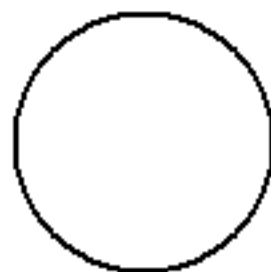
第四，及時抓住了對小農具的修配、增添和改制。在我國當前的農業生產中，由於農業機械所占的比重不大，而且在較短的時間里還不能夠充分地供應，因此，用手工操作的各種小農具、改良農具在農業生產中還有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公社化以後，開展了多種經營，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投入的勞動力大大增加，所需要的農具品種和數量也就更多。這樣，修配、增添和改制小農具，就成為當前工具改革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今年各地已經普遍地注意到這項工作。據山東、

黑龍江等十四個省三月底不完全統計，已經增修小農具一億三千萬件。這對春季的生產起了很大作用。在準備夏收工具中，各地對鐮刀、石礮等的改制也獲得很大成績。把舊石礮的兩端加上好的滾珠軸承，就比原來提高工效一倍多。河南省中牟縣的改良合鐮，在原来的基礎上安上三個竹弓，使收割下的麥子能很好地攏堆，減少了一道攏堆工序，提高了工效。

對小農具的修配、增添和改制工作，各地已經摸索到一套比較好的方法，這就是：調查摸底，確定任務，分類排隊，解決用料，安排修配生產。對於原料缺乏的困難，許多地區採取了清理倉庫、折價收購、帶料加工、以舊改新的辦法，基本上得到解決。許多地方把農具修配廠、站的修配力量，分出一部分，劃片包干，深入生產隊，邊檢查，邊修理，邊安裝，這就使得農具的修理工作，進展得比較快，保證了各種農活的適時進行。有些地方對小農具採取了由社員自備、自用、自修、自管的辦法，這也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三

開展工具改革運動的基本經驗，是要貫徹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就是，全面規劃，重點安排；以土法為主，土洋結合；以改舊為主，改舊和創新結合；改革和推廣使用相結合；群眾運動和專業隊伍相結合，等等。工具改革運動的任務，一方面是對舊式工具的改革、發展和提高，為當



前的农业生产服务；另一方面要为实行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即通过加强工具改革运动中的科学研究和试验鉴定，进行选样定型，以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创造出适合我国农业“八字宪法”的各项措施所要求的，性能好、效率高、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成本低廉的农业机具。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我们必须为实现机械化而积极努力。但是，实现农业机械化不能“一步登天”，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大大发展工业，生产出更多的钢铁、机器、化学肥料等等。要使工业高速度发展，又必须发展农业，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和市场。而在当前条件下，要发展农业，就必须搞好工具改革。有的人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重洋轻土、重大轻小，认为工具改革没有搞头，要搞就搞机械化。他们没有认识到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没有认识到工、农业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企图在今天就要全面地进行将来才能够大规模做到的事情。他们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应该引导这些同志，加强对我国具体情况的研究，使他们认识到当前工具改革运动的重要意义。

在对待工具改革的成就和缺点的问题上，也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一九五八年以来，工具改革运动的成就是巨大的，它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跃进起了显著的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同我们的任何工作一样，在运动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缺点。对于这些缺点，我们应当加以

足够的注意，并且引为教训，在实际工作中克服和纠正，而不应该采取指责、讥笑和埋怨的态度。但是，有的人抓住去年工具改革中的个别缺点，就否认工具改革运动的成就。这显然是错误的。湖南省永顺县采取了对比的方法来说明工具改革运动的成效。这个县在总结去年经验时，用两个公社作了对比。一个是塔队公社，大搞工具改革，大力发展牛车，短时期内运出了大量的木材等物资，增加收入十万多元。另一个是万坪公社，工具改革没有搞起来，积压物资三万多吨，劳力资金都很紧张，现在这个公社的干部和群众，都认为是一个教训。湖南省常宁县老屋公社的少数干部和群众怀疑工具改革的作用。公社党委具体算了一笔账：这个社去年修路造车花了四千多个劳动日，但是由于实现了车子化，节省了七千九百多个劳动日。除去修路造车的工以外，还节省了三千九百个劳动日。通过这些方法，就扭转了少数人对工具改革的错误的看法。

工具改革是一个改旧创新的工作，它同任何新事物出现时的情况一样，必然会遇到许多波折和困难。党组织必须对革新者予以大力支持和帮助。并且针对阻碍革新的守旧心理，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

为了更快地提高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不足困难，需要尽早地给农业提供一些动力机械和各种农具。因此，农用动力机械和农具的选样定型就成为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前面已经说过：从今年以来各地都注意了工具改革中的评选工作。但是大多数工具还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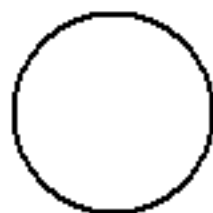
初創階段，迫切需要科學研究人員進一步地研究和提高。科學研究和試驗鑑定是農具選型工作中的兩項重要工作。在開展農業科學研究的同時，試驗鑑定工作必須緊緊跟上。根據幾年來的經驗，鑑定的步驟和鑑定的內容，大體是：（1）選型鑑定。主要是鑑定某種新型機具（仿制、改制或創造的機具）的作業質量是否符合農業技術要求。如各地召開的現場會，評比會等，都屬於這種性質。（2）生產鑑定，即區域性的試驗。在經過選型鑑定證明合格之後，為了摸清機具的區域適應性和經濟效益，而進行大面積的分区試驗。（3）定型鑑定。經過以上兩個步驟以後，在大量生產以前，應該進行定型鑑定，主要包括工藝設計，使用壽命以及是否符合物美價廉等標準。關於由誰鑑定的問題，一般可以根據農具適應範圍的大小，從中央到省、專區、縣分別進行。在那一級定型，即由那一級負責安排生產。

為了在工具改革中做到質量好，必須堅持製造工廠化，建立一套制度。例如在一九五五年開始大量推廣雙輪雙鋤犁和其他大型新式畜力農具時，製造工廠內部所採取的一套保證規格質量的制度，由工業、農業部門統一標定圖紙的制度，商業部門派人駐廠驗收的制度，工業、農業、商業聯合大檢查的制度等等，都應該認真貫徹執行。經驗證明：那一種農具的製造執行了這些制度，就能夠保證質量，達到物美價廉，好使耐用，受到農民的歡迎。反之，即使某種工具的性能原來是良好的，也會由於製造的時候不重視質量，不合規格，而

變成了壞東西，甚至廢物。例如，湖南省衡南縣的鷄籠式快速割禾器，經過試制、試用和在個別地區的大量推廣，證明是成功的收割工具。但是有的地區在仿制時，把割刀刃口的鋸齒做得粗了一些，結果就不能使用。其他如滾珠軸承等，也是如此。由此可見，忽視製造質量，就一定會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損失，甚至會引起農民對工具改革產生懷疑。

對工具在使用中的實際效果，必須切實注意。製造、推廣工具的目的是為了服務於生產。只管製造不管推廣，只管推廣不管使用，都是完成了應做工作的一半。後半完不成，前半工作也等於無用。在工具改革運動中，在保證產品質量的同時，必須認真地組織推廣工作。在推廣中，應當貫徹執行群眾路綫的方法，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提出推廣計劃。當發現某種農具確有缺點、不宜推廣的時候，也應該一面研究改進，一面修改計劃。同時還要加強使用技術的指導，根據推廣計劃，訓練好相應的操作手，建立修配網。這樣，才能保證製造一部，推廣一部；推廣一部，使用一部。

一件新的工具從改裝創制，到試驗鑑定，到大批生產製造，到推廣使用，在每個環節上都需要一定的技術人員參加。因此，每省、每專區、每縣都需要設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專區、全縣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改進，加以試驗；試制成功，在田間實驗，確實有效，然後再成批地生產製造，加以推廣。



独立思考和服从真理

· 施 东 向 ·

我們提倡服从真理，同时又提倡独立思考。二者并不冲突，而是互为条件的。

客观事物的本质，它在发展中的内在规律性，反映到人们头脑里来，才成为人们所掌握的真理。在客观事物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真理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要区别正确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有时不是很容易的。为了辨明真理，就需要在实践中开动脑筋，经过一番独立思考的功夫。

对一个真理，有了真正的了解，弄清楚真理之所以为真理，以及真理和谬误的区别，才能有坚定的信念，才能热爱真理，并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执行。在真理面前不动脑筋，采取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轻率态度的人，不能成为真理的自觉的战士。如果一个人并没有学会区别真理和谬误，也就很难保证他所服从的，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

宗教的信条要求人们盲目信从，因为它经不起人们的独立思考；当人们根据实践经验，用清醒的理智寻根究底地追问下去，宗教迷信就站不住了。科学的真

理和宗教的信条不同，是同盲目的信仰根本不相容的。

马克思主义不但经得起独立思考，而且要求独立思考。它之所以经得起独立思考，因为它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之所以要求独立思考，因为它的目的是改造

世界，而改造世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是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独立思考。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对于“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要经过独立思考，才能真正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我们由于自己的社会出身、工作经历、所受的教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等等，往往一方面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有利条件，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思想中存在着某些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的东西。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整理和提高自己的经验，并且批判和克服自己头脑中的错误观点的过程。帮助一个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也是要启发他进行独立思考。

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才能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



做教条。要使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千差万別的具体情况相結合，就需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独立的思考。毛澤东同志曾經写道：“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說，眉头一縐，計上心来，就是說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考，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953頁）

为了培养和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就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丰富自己的实际經驗，学习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习文化科学知識，注意吸取別人已經达到的正确結論。同时，思考的能力，也是要在不断思考的过程中才能提高的。

独立思考当然不是向客观现实關独立性，向真理關独立性，而是要以符合现实，也就是以服从真理作为最高原則。主觀和客觀的一致不是很容易就能达到的，然而逐步地达到是可能的，主觀上的正确和錯誤是有客观标准的。这是我們主张独立思考的出发点。馬克思主义的各式各样的敌人，有时标榜“独立思考”的口号，他們的所謂“独立思考”，其目的无非是使人們离开馬克思主义，离开客观真理，而成为腐朽的资产階級思想的奴僕。

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有时会犯錯誤，但是我們不能为了不犯錯誤而做思想懶汉。在自己的实践中遇到新的問題时，自己不动脑筋，坐待別人作出正确的結論，这是一种不負責任的态度。我們已經有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做指导，但是

我們的任务是要运用这普遍原理来解决不断地出現的新的問題，在每个具体問題上，仍然要經過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知到比較完全的知的过程，甚至要經過从犯錯誤到改正錯誤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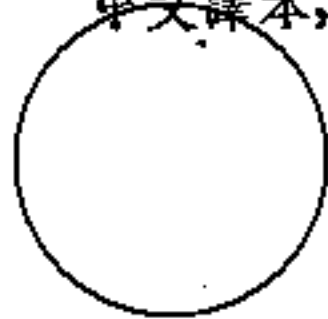
独立思考当然也不意味着一切問題都只是靠个人的經驗和智力来解决，恰恰相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总是估計到个人的所見所聞可能有片面性，因而总是严肃地对待前人和別人的經驗，注意吸取前人和別人的智慧，特別是依靠集体的經驗和智慧。“三个牛皮匠，变成一个諸葛亮”，是以三个皮匠都能独立思考为前提的。他們都努力从自己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見解，又承認自己的見解可能有片面性，因此他們能够取长补短，相輔相成，共同达到正确的結論。只要服从真理是独立思考的基础和目的，那么，独立思考的结果就不是在人們中造成分歧，而是造成一致，造成在共同認識了客观真理的基础上的高度的一致。

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是十分勇敢的。他敢于和任何陈腐的传统决裂，向一切錯誤的觀念“宣告独立”，当他看到真理是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勇往直前，毫不返顧。但是，他又是十分謹慎和謙遜的。他总是不断地根据实际重新审查自己已經得到的結論，反复考虑和自己不同的各种看法，当他一旦發現自己的見解并不符合客观实际，而真理是在另一方面的時候，他也最能毫不躊躇地放弃自己的見解。所以独立思考固然不是随风飄蕩，模稜两可，但也决不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見。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修訂第三版）

苏联科学院經濟研究所編
中文譯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



· 李 云 ·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目前全国广大干部都在开始学习政治經濟学。苏联科学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修訂第三版），是我們学习政治經濟学的一本很好的課本。

“政治經濟学教科書”（以下简称教科書）闡述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經濟理論。它按照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順序，闡述了資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闡述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物質資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規律，闡述了人类社会由低級阶段向高級阶段发展的客观規律性。

教科書第三版与前两版比較起来，在結構方面和在內容方面，都作了不少的补充和修改。从內容方面看，許多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闡明，某些規律和范畴的表述也有了一些改变，同时，补充了一些新的实际資料。例如，在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部分中，在闡述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問題时，对资产階級国有化的問題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闡明資本主义总危机問題时，着重地指出了世界社会主义經濟体系的形成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对加深資本主义

总危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并且考察了两个体系和平共处而在經濟上互相竞赛的問題。

教科書在闡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部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和范畴、它們的表現形式和在社会主义建設实践中怎样利用这些規律和范畴，都作了进一步的理論分析。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部分，包括两个部分：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的国民經济体系。

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部分中，教科書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論，根据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闡明了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經濟和政治的基本特点，闡明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途径。教科書在闡述这些問題的时候，既說明了建設社会主义的一般的、为任何国家所共同具有的規律性，同时也指出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上的特点。

在社会主义的国民經济体系部分中，



教科書全面地闡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論証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經濟規律的作用。

教科書闡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性質的問題。教科書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高速度的不断发 展开辟了广闊的道路。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又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地发展和改进。但是，两者之間也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矛盾。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有計劃领导經濟的形式会落后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不再适合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这就必須改变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改变經濟的领导形式，使其适应于已經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在不断克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間的非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发展的。

教科書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是：（1）以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存在的公有制占绝对統治地位；（2）劳动者不受剝削，建立了同志式的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3）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則，实行有利于劳动者本身的产品分配。

教科書闡明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級形式，它在整个国民經济中起着领导的和决定的作用。教科書中还談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

义全民所有制之間的区别，認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国有生产資料的所有者是由工人階級和集体农民这两个階級所构成的人民；第二，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劳动力与生产資料的結合，还必须貫徹物質刺激原則，社会还必须等价补偿企业所消耗的劳动量。

教科書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經濟作用，駁斥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縮小社会主义国家經濟作用的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路綫，闡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中的领导作用。由于生产資料公有制的绝对統治，国家有可能在自己的活动中依据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自觉地运用这些規律，对国民經济实行計劃领导，执行經濟組織的职能。教科書着重闡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有計劃领导国民經济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即把国家对經濟的集中的有計劃的领导 and 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結合起来。

教科書說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另一种形式——集体所有制在社会主义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合作社型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的主要形式，它能够通过充分和有效地利用机器拖拉机的方法，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补充公共基金而增加积累；同时，不断提高庄員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教科書指出，合作社型的企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集体农庄



财富方面，拥有巨大的、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的潜力。

教科書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是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水平。这个过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的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扩大，公有牲畜头数的增加，以及由此而来的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第二，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比重比个人副业的比重增长得快；第三，小集体农庄合并为大集体农庄；第四，新的大型国营农场的建立。

教科書还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财产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外，还存在着个人财产。社会主义社会产品中的消费品部分，是按每个工作者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成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对集体农庄农户来说，他们的个人财产还包括宅旁园地上的副业、住宅、产品牲畜、家禽和小农具。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副业，只有当集体农庄公有经济发展到高度水平，能够完全保证社会和庄员个人需要的时候，才没有存在的必要。教科書还指出，只有劳动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个人财产的源泉，个人财产所有权，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保护；个人财产与作为它的基础的公有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公共财产的增加，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用来满足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需要的产品将会愈来愈多，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

动成果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教科書作了详细的论述。教科書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其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最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前进的动力，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都表现在这个基本经济规律之中。教科書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方向，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这个问题，是很必要的。教科書阐明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指出这一规律要求一切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服从社会的统一计划领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教科書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首先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实现，在每个阶段上取决于业已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现有的物力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遵照这一点并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之间进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并确定国民经济的比例。教科書指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比例，首先是生



产資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間的正确比例，而为了正确地規定社会生产的这两大部类間的比例，就必须考虑到生产資料优先增长这一規律的要求。在講到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比例时，教科書強調一方面应保証工业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应当保証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教科書还指出，要不断发展社会生产，不仅工业和农业之間必須有正确的比例，在工业內部各部門之間和农业內部各部門之間也必須有正确的比例。教科書強調了社会主义經濟的平衡工作对国民經济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編制各种平衡表是規定正确的、合乎国民經济有計劃发展規律要求的国民經济比例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此外，教科書着重指出，要使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建立物質后备、財政后备和劳动后备，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后备是預防和消除比例失調現象所必需的。有了后备，才能迅速消除国民經济个别部門中的比例失調的現象或預防发生比例失調的現象，才能灵活地調动各种資源。为了保証把商品均匀地、不断地达到消費者手里，建立适应于社会实际消費的商品儲备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証新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伟大的創举”）教科書闡明了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根本改变了劳动的性質，这就为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造成了

客觀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規律，要求各个生产部門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各个企业和整个社会經常節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提高劳动的技术装备；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經驗；合理地組織分工和协作；利用各种与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竞赛有关的物質刺激和社会刺激；国民經济有計劃发展造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節約，等等。

教科書闡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的問題。这方面的許多問題，目前是特別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的。教科書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实行单一的生产資料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原則的水平；社会主义社会在劳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还利用商品貨币关系。对于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原因，教科書認為，除了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和集体农庄农业之間的分工以及社会主义生产資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以外，还因为存在着农产品的集体农民的个人所有制，以及由于和社会主义国家有經濟联系的外国所存在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相互联系决定的。教科書还認為，在社会主义社会，無論是生活資料或是生产資料都是商品。生产資料从一个国营企业轉移到另一个国营企业，虽然不改变所有者，但仍需通过商品买卖的形式。全民所有制內部流通的生产資料所以是商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社



会主义经济的统一性和全民所有制同其他所有制之间的相互联系；第二，全民所有制本身的特点和国营企业部门发展的内部需要，即工作人员和企业对其劳动成果的物质关心，每一个企业劳动消耗的等价补偿。

关于价值规律问题，教科書指出，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生产 and 销售应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消耗量来进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中起作用，而且在生产中也起作用；不仅对消费品的生产起作用，而且对生产资料的生产也起作用。因此，教科書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对价值规律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范畴的正确利用。教科書指出，价值规律的作用与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规律的作用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价值规律的作用可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费用，使生产的赢利得到保证。价值规律的作用又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分配，不是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通过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进行的，而是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依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并考虑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进行的。教科書还谈到了价值规律与商品价格的关系，指出商品的价值是国家规定计划价格的基础。

教科書提出，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有计划管理经济的形式，它是由价值规

律的作用所决定的，同时它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其他经济规律的要求的必要工具。社会主义企业的首要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以最少的耗费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因此，社会主义企业必需实行经济核算制。经济核算制，表现在用货币来较量经济活动的消耗和成果，用企业本身的收入来抵偿支出，节约资金并保证生产赢利。教科書指出，赢利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工作的经济效果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经济核算促使企业不得不尽量节约自己的资源，成为赢利的企业。但是，教科書也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的方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营方法根本不同。既然经济核算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活动的形式，它首先就要求每个企业严格遵守以实物和货币形式表现的国民经济产品生产计划，已定的生产定额和财务定额、固定的计划价格、对国家和国家机关应负的义务等。把个别企业的利益与全国的利益对立起来，从而给国家带来损失，这就会歪曲了作为服从全民利益的社会主义经营方法的经济核算制的基本实质。

教科書还谈到了在基本建设和集体农庄的生产中经济核算制的作用问题。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集体农庄的生产中，利用价值规律来进行经济核算，则是进一步大力提高农庄生产的



必要条件。

教科書詳細地敘述了按劳分配的經濟規律，闡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运用按劳分配来对劳动量和消費量实行严格监督的意义。教科書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还没有成为社会一切成員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們意識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还未彻底克服；还保留着不少的旧的分工的残余；社会产品还没有充分到可以按需分配等等原因，社会只能根据每个社会成員在国民經济中所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質量来分配消費品。实行这一原則，对于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逐渐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本質差別，对于消除某些社会成員对待劳动的不誠实态度，以及使每个工作者从个人物質利益上去关心自己的劳动結果，从而对推动生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教科書認為，实行按劳分配，既需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消除在劳动报酬上的毫无經濟根据的悬殊現象。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級阶段，它必然要在发展中过渡到它的高級阶段——共产主义阶段。教科書闡明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的經濟根源、它們的异同，并指出它們乃是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經濟形态成熟的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是社会經濟、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更高級的、在質上嶄新的阶段，因此，向共产主义过渡决不能認為可以一举而成，而只能是逐渐过渡到的。向共产主义

阶段逐步过渡，需要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質生产基础，共产主义物質生产基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在生产中占統治地位。教科書同时指出，向共产主义阶段逐步过渡，需要对社会全体成員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他們的共产主义覺悟水平。教科書还探討了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过程中消灭旧的社会分工的残余、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两种形式变成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及国家对內职能的逐渐消亡等等問題。教科書強調指出，在建設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国家应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国民經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規律、价值規律和按劳分配規律等。

此外，教科書还对集体农庄制度的經濟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預算、信用和貨幣流通、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經濟体系等問題，分別作了詳細的論述。

学习“政治經濟学教科書”这部書，对于提高我国广大干部特別是經濟工作干部的經濟理論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們必須認真地学习它。当然，在我們的学习中，必須密切地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使我們能够学会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濟理論，来解决我們在經濟建設的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問題。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16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十六期 ★

目 录

社論：克服右傾思想，掀起增产节约

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1)

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王光伟(4)

認真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康永和(18)

紅、勤、巧的竞赛运动在山西农村

.....史紀言等(20)

和平竞赛是大势所趋.....于兆力(24)

客观規律和主观能动性施东向(28)

关于小麦深耕、密植、施肥、复种的經

济效果的調查.....中国农业科学院調查組(31)

全民所有制經濟内部的商品生产和

价值規律問題.....苏 星(38)



社論

克服右傾思想,掀起增产节约 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一九五九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一年。在过去七个月中,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的跃进计划,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必须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目前的形势,对于完成今后五个月的任务是十分有利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用两条腿走路的整套方针,已经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条总路线的照耀下,一九五八年我们取得了我国国民经济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在今年前七个月中,工业总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在农业方面,战胜了水旱灾害,取得了夏季的丰收。商业方面,少数品种的供应虽然有些不足,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基本建设也比去年同期有很大的增长。这些成就,大大增强了今后继续跃进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执行总路线和实现国民经济大跃进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任何新事物总有许多问题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一步步地得到解决,大跃进也是这样。一年多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解决了许多新的问题,也不断地发现和克服了在前进过程中难于避免的某些缺点。这样,就使得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干劲更大了,工作做得更好了。

一九五八年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是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我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必然产物。经过几个月来的整顿,人民公社已经更加巩固,它的优越性正在日益鲜明地显露出来。它对于进一步地动员和组织五亿多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而且将会继续



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战线上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例如：政治挂帅，对各项任务 and 完成任务的措施进行鸣放辩论，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评比竞赛、按时检查，抓两头、带中间，以及工业企业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等。今后继续执行和发展这些方法，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地鼓足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

我国六亿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用排山倒海的英雄气概，藐视困难的无畏精神，在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中，做出了过去人们认为做不到的许多事情，克服了人们认为克服不了的许多困难。六亿多人民要求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迅速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这种意志和愿望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把这种意志和愿望同党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就将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这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

这些情况说明，我们充分具备了继续跃进的条件。尽管今后五个月的任务还是艰巨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定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干劲，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一定能够完成。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实现今年继续跃进的国民经济计划，是充满信心的。

目前经济战线上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是在一小部分干部中间滋长了一种右倾松劲情绪。他们怀疑今年继续跃进的事实，看不见上面所说的种种有利条件，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和已经克服的困难，仍然看作是前进道路上实际存在的严重障碍；把事实上可以解决的问题和可以克服的困难，加以夸大，认为无法解决、无法克服。他们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能力，站在群众运动后面指手划脚，不是鼓群众的劲，而是泄群众的气；不是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争取实现事实上能够实现的跃进计划，而认为计划和指标越低越好，好象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完成的计划和指标才是最稳妥的。这种右倾情绪和思想，虽然只是在少数干部中存在，但是如果不起注意，不坚决克服，听任它象病菌一样传染开来，就会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我们必须克服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右倾危险，帮助有这种毛病的同志认识错误，克服错误，振奋起来，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中来，这是保证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的一个重要关键。

在制订和执行我们的计划的时候，必须遵守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认识和尊



重客观规律，充分估计到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认真考虑群众要求，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决不可以违反客观规律，随意超越这种客观可能性，决不可以不同群众商量，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但是，在物质技术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经济工作尽可能地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毛泽东同志在论到战争问题的时候曾经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原理，也完全适用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面，由于人们对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态度不同，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不注意或很少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不充分利用客观有利条件，不积极创造必要的条件，做起事来冷冷清清，结果就是少慢差费；另一种是充分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充分利用客观有利条件，克服那些不利的条件，干劲十足，轰轰烈烈，结果就是多快好省。我们应当从这两种方法和两种结果的比较中取得教训，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已经形成的六亿多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局面，发扬光大起来。

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跃进计划，目前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各个生产战线上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工业战线上正在开展以高产、优质、低成本为目标的群众运动；在农业战线上正在开展抗旱防涝、抓紧秋田管理、发展多种经营、争取秋季丰收的群众运动；在基本建设战线上正在开展一个保证质量、降低造价、力争提前竣工的群众运动；在商业战线上正在开展抓紧收购和供应工作、力争市场情况进一步好转的群众运动；在运输战线上正在开展一个多装、快装、快卸的群众运动。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做好八、九两个月的工作，对于完成今后五个月的任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各部门、各地区和各个生产单位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抓紧时机，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任务和措施，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把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从一个高潮引向又一个新的高潮。只要我们坚决克服任何右倾情绪和思想，实事求是，信赖群众，充分发扬群众的干劲，就一定能够做出光辉跃进的成就，来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



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王 光 伟

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最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①。这两个部门是互相依存的，是不能单独地孤立地存在的。可以说，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就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农业；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农业，也就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就要求工业和农业这两大部门的相互协调。只有当这两个部门协调地发展的时候，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才能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正因为工业和农业具有这样有机的密切的联系，所以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就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的比例关系之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工业和农业相互支援，彼此适应，共同前进。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完全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客观发展的要求。在党的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我国工业和农业互相支援，共同跃进，并且把整个国民经济推上全面跃进的新时期。

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是对立的，它反映了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在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广大农民陷入了贫困和破产。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是一种新的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关系，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城市和乡村共同繁荣的愿望，它反映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要求。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引导农民走上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从而为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创造条件。

我国农业和工业的相互支援，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和农业的新的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七年），农业供应工业和城市的粮食达二千五百九十二亿斤，棉花达一亿零一百六十万

^① 国民经济的物质生产部门大致有六个，这就是一、工业，二、农业，三、建筑业，四、为生产服务的运输业（货运）和邮电业，五、商业（保管、修整、运送、包装等）和饮食业，六、其他部门（自给性手工业等）。



担，还有大量的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和大量的农副土特产品。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对工业的支援逐年增加，采购农产品的金额，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五。农业对工业的支援，保证了城市对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这是我国劳动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贡献。

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也日益加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业基础虽然薄弱，但是工业仍然用极大的力量支援了农业。工业不仅用大量的生活资料供应了广大农民，而且还用大量的生产资料支援了农业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支援农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总值共达九百五十七亿四千万元。工业支援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总值(拖拉机在外)，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三点七倍。我国的钢材虽然不多，但是使用在农业上的钢材的比例正在日益增加。初步估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上使用的钢材(土铁、土钢在外)占全部钢材消耗量的百分之六点四，一九五八年上升到百分之七点四。机械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有巨大意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制造农业机械消耗的钢材每年平均为七万五千吨，一九五八年上升到十五万六千吨，一九五九年又将比一九五八年有很大的增长。制造农业机械消耗的钢材的增加，这就意味着我国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将日益加快，我国落后的农业技术将逐步地被新的技术所代替。

由于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我国到一九五九年底，预计将拥有拖拉机五万五千台(折合十五马力的标准台，内有进口数)，机引农具十万部，谷物联合收割机四千五百台，机动脱谷机七千五百台，排灌机械二百八十万马力，农村电站二十五万千瓦，载重汽车一万三千辆。到一九五九年底农业拥有的全部机械动力，预计将达五百二十万马力。化学肥料的使用量，由一九五三年的五十九万二千吨，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二百七十八万吨。

我国目前拥有的农业机械，同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前景比较起来，当然还是很少的。这些机械，大约只能保证耕作上的百分之四左右的机耕面积，只能保证水利灌溉中百分之十左右的机械灌溉面积。但是，这比解放以前我国农业几乎没有什么农业机械的情况来说，确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农业机械不仅对农业增产起了作用，而且使我们看到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美好的前景。

二

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为发展我国农业和农业机械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实践证明：在我国合作化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强大的机械化，只要把广大劳动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农业也是能够迅速发展的。我国不论在合作化的初级阶段，或是在高级阶段，农业都是逐年增产的。在合作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出现以后，我国农业



更有了飞跃的发展。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比小农经济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迫切要求农业机械化。合作化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前提,没有合作化就不可能有机械化。有了机械化,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的物质技术条件更好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更好地运用农业“八字宪法”^①,就能够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已经把农业的技术革命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农村人民公社各种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兴旺,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拥有充沛劳动资源的我国农村,已经开始感到劳动力不足。这是一个极大的好事。这种情况不仅反映了我国已经根本消灭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而且也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村繁荣兴盛的新气象。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发掘劳动力的潜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是,更重要的方法是用工业支援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工业支援农业,已经成为农业继续高速度发展的重要关键。工业用更大的力量去支援农业,已经成为执行党的工农业同时并举方针的重要环节。

工业支援农业的主要内容,就是供给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就是逐步地用改良的、半机械化的和现代化的工具,去代替落后的农业手工工具,逐步地实现对农业的技术改造,把我国农业逐步地放置在现代化的轨道上,一直到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完

成农业生产的技术革命。

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使我国工农联盟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巩固和发展这个联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就是当前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重要措施之一。毫无疑问,在工业的大力支援下,我国农业生产将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将进一步改善,这样就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去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就会更加巩固和发展,从而把工农联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把落后的农业技术,改造成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这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只有当我国拥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又拥有强大的现代农业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需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极大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是还是较低的。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了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就需要工业以新的生产工具来支援农业。

开始走上农业机械化道路的黑龙省农

^① 农业八字宪法,就是土、肥、水、种、密、保、工、管。



村，証明了使用不同的农业生产工具，就会产生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使用农业机械的国营农场一个劳动力一年生产粮食二万二千斤，一个劳动日平均生产粮食一百斤，粮食的商品率是百分之七十五；使用新式畜力农具的人民公社一个劳动力一年生产粮食一万四千斤，一个劳动日平均生产粮食六十斤，粮食的商品率是百分之五十；使用旧式农具的人民公社一个劳动力一年生产粮食八千斤，一个劳动日生产粮食三十五斤，粮食的商品率是百分之四十。上述资料说明，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生产的一个劳动力，比使用旧式农具进行生产的一个劳动力，一年可以多生产一万四千斤粮食，多给国家提供一万三千三百斤的商品粮食；使用农业机械比使用旧式农具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粮食的商品量提高了四点一五倍。

列宁曾经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①

毛泽东同志也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②

因此，工业用更多的生产资料，特别是更多的改良的、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工具去装备农业，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成为工业部门的迫切任务。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使我国工业得到更充分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加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并且将把我

国人民生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

工业支援农业，不仅是农业的要求，而且也是工业本身的要求。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原理，我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一样，采取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也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性，不仅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也被我国实践所证明。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面貌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在开始用新的技术逐步代替旧的技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要求不断地用新技术去装备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重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一部分用于补偿本身的消耗，一部分用于本身的扩大再生产，再一部分就是去支援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帮助别的部门去扩大再生产。重工业不仅要在本部门内进行交换，而且还要同别的部门进行交换，才能顺利地实现本身的扩大再生产。重工业要从农业、轻工业换回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才能扩大重工业的市场，积累资金，为自己的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

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这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①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597页。

②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33页。



通过生产资料的优先发展，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生产，这样就可以达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目的。而农业正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源泉。

农业不仅是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同时又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农业一方面用自己的产品扩大本身的生产，一方面用大量的工业原料去供应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不仅生产生活资料，而且它的许多产品又是重工业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例如工业用布、工业用纸、工业用油、酒精、松节油等等，都是重工业生产离不开的原料、材料，缺少这些原料、材料，重工业的生产活动就发生困难。因此，工业生产是不能离开农业的。

工业支援农业，所以是工业本身的要求，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要求农业支援大量的劳动力。过去几年，每年都要从农村抽调上百万的劳动力支援工业。今后工业的发展，将更需要农村劳动力的支援。为了满足工业这个要求，就需要工业支援农业以机械动力。因为只有用农业机械去代替农业劳动力，才能从农村替换出劳动力去支援工业。

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是否会延缓工业化的速度？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早已作了精辟的说明。他说：“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

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支援农业的农业机械（包括机具）、农田水利和农村水电站设备、农村运输工具、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建筑材料、农具维修用料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值，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了近两倍。农业用生产资料的增加，并没有延缓工业发展的速度，却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一九五七年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二点二倍。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七上升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八。

由此可见，担心工业支援农业会延缓工业发展速度，是不必要的。

进一步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国不仅已经把分散的细小的个体的农业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的大农业经济，而且已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7页。



經在合作化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就为我国工业支援农业开辟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更加迫切。我国农业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农业的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已經打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是工业支援农业的可靠的物質保証。现在，我国不仅已經开始拥有現代冶金工业、燃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而且已經开始拥有拖拉机、谷物联合收割机、汽車、动力机械、机引农具、化学肥料、农药、生物化学等直接为农业服务的現代工业企业。由于我国机械制造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机械工业今后将逐步为农业提供更多的农业机械和装备更多的化学工业，以支援农业的发展。显然，我国重工业的发展是支援农业和加速农业发展的可靠的物質保証。同国家大工业企业发展的同时，地方工业、公社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地方工业和公社工业将提供适合当地需要的中小型农具和人畜力牵引的加工机械和各种肥料。工业的发展，就为我国农业技术改造开始建立了可靠的物質技术基础。

由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农业的发展，我国农业資金的积累能力已經加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农业合作社和农民的积累約为一百七十亿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間，随着农业生产的跃进，农业积累将会有較迅速的增长。再加上勤儉办社和国家財政的支援，

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資金是可以解决的。

經過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已經培养了許多农业技术人员。我国的国营农場、国营牧场已經发展到一千四百多个，培养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气象和农业机械的干部的大专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已經发展到三百所，人民公社的紅专学校以及农业科学研究的机关已經大量发展，这就为我国农业技术干部的成长准备了必要的陣地。

我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工业支援农业的一个有利的条件。以直接有利于支援农业发展的資源來說，我国蘊藏着巨大的水力資源，据估計我国的水力資源約为五亿八千万瓩，其中小型河流^①水力資源約为五千万瓩到八千万瓩，可以开发的估計为二千五百万瓩到三千万瓩。这种小型河流全国各县都有。这些巨大的水力資源，可以用来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我国許多地方都有煤炭，据估計我国的煤炭远景蘊藏量約为九万亿吨左右。全国一千六百八十七个县中，約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县都有煤矿。这些丰富的煤炭資源将用来发展电力、化学工业和燃料工业，直接支援农业的发展。我国有丰富的磷矿，磷矿是发展化学肥料和农药的重要資源。已知的磷矿远景蘊藏量为二百一十亿吨左右。鉀的儲量也很大，只是青海省的某些地区，就蘊藏着一千七百多万吨。此外，石膏、硫和水銀的蘊藏量都是极其丰富的。这些丰富的資源，在我国已經具备工业化初步基础

^① 小型河流是指河流长度在一百公里以下，流域面积一千平方公里以下的河流。



的情况下，将逐步开发起来，去支援农业的发展。

四

完成对农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全国人民努力的远大目标。我们应该鼓足干劲，为逐步实现这个远大目标而努力。

在我们走向农业机械化这个远大目标的时候，丝毫也不应当忽视小型农具和改良农具的重要意义。因为在目前，这些小型农具和改良农具，就全国范围来说具有普遍意义。迅速地、大量地、因地制宜地供应价廉物美的小型农具和改良农具，这是当前工业支援农业的迫切任务。在供应大量的小农具和改良农具的同时，还应该对已有的农具进行维修，把调走的农业机械尽量“归队”，把没有配套的农业机械尽量地配起套来，使已有的农具和农业机械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尽量地利用土铁、土钢，并且分配一部分优质钢材去支援小型农具、改良农具和农业机械的维修，是当前工业支援农业的又一个迫切任务。工业的生产部门、物资分配和物资供应部门，应当对这些迫切要求尽量给以支援。为了满足农村对小农具的需要，根据典型调查计算，大约每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需要钢铁二斤左右，今后在钢铁分配的时候，应该考虑农业的这个需要。

在发展农业机械动力的同时，应该大力发展脚踏、手摇和畜力牵引的技术简单的农

业工具。这种农具不仅技术简单，使用方便，容易操作，而且取材容易，制造容易，价格便宜，不仅适合当前的农村技术水平，而且也适合目前农村的经济水平，应该大力发展。

供应农业大量的动力机械，这是工业支援农业的主要内容之一。一个马力的动力机械，等于八个劳动力的力量。农业机械的使用，不仅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将大大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我国石油工业虽有极大的增长，但是目前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机械使用什么燃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九五八年排灌机械的各种比重是：汽油机为百分之十点七三，柴油机为百分之三十四，煤气机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三，锅驼机为百分之十三点九一，电动机为百分之十三，煤油机为百分之零点一三。各种动力机械，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从目前石油缺乏的情况来说，应当多发展锅驼机，但是锅驼机需要更多的钢材，而我国钢材目前也是缺乏的；煤气机的燃料虽然比较容易得，但是掌握煤气机的技术比较困难；电动机则受电源的限制，在全国电气化以前，也不能普遍使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各地应当根据自己的资源去使用不同的动力机械，例如在电源方便的地方应当尽量采用电动机，在煤炭多的地方应当尽量采用锅驼机和煤气机，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采用柴油机。但是，由于目前石油不足，除拖拉机外，应该适当控制农业用柴油机的发展。



为了发挥农业机械的效率，应该大力加强农业机械的综合利用。例如，拖拉机除用于耕作外，还应当利用到运输、水利、排灌、农产品加工等方面；排灌机械除用于抗旱排涝外，还应当利用到农产品加工等方面。

大力发展石油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有极重要的意义。在目前石油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发展、适当安排小型农村电站是解决农业动力来源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有水利资源的地方，应该尽量利用水的落差，建设小型水电站；在电机设备不足时，可以先办水力站。在煤炭资源丰富的产煤地区，应该尽量利用煤炭建设小型火电站。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小型煤炼油厂。在建设小型水电站的时候，应当注意水利资源的综合利用，应当把发电、灌溉、水运结合起来，全面规划，尽可能地发挥水利资源的经济效果。

我国肥料的主要来源是农家肥料。但是用大量的化学肥料支援农业，已经是农业的迫切要求，因为使用化学肥料不仅可以迅速地帮助农业提高产量，并且可以大大地节省农业劳动力。有许多地区，要求化学肥料比要求农业机械更为迫切的原因就在这里。一般地说，一斤化学肥料可以增产粮食三斤，可以增产籽棉一斤。许多地区的资料说明，积肥、造肥、运肥使用的劳动力约为农业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使用化学肥料就可以大大缓和农业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并且将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其他农事活动，有利于农、林、牧、副、渔的综合发展。为了迅速地增产化学肥料，除了靠已有的化学肥料工

厂发挥潜力外，还需要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各种化学肥料工业，并且使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在目前应该抓紧磷矿的建设，使我国的磷矿资源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增产化学肥料，在平衡和分配合成氨和硫酸的时候，物资分配部门应该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指导下，尽量照顾化学肥料发展的需要。鉴于我国硫酸产量目前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除了大力发展硫酸工业外，农业科学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应该努力试验氨水直接施肥。氨水直接施肥，不仅节约硫酸，而且还可以节省氨加工车间，减少建设资金和建设材料，降低氮肥的生产成本，这对工业和农业都是有益的。

化学工业对农业的支援，除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以外，还应当大力发展农药、植物生长刺激素、除草剂等等。我国农村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病虫害发生，这些病虫害严重威胁农作物、林业和水果的生长。粮食每年因受病虫害而遭受的损失，往往达产量的百分之五左右。如果供应充足的农药，每年将增加粮食几百亿斤和棉花几百万担的产量。这对于农业的增产将起重要作用。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要大力发展农药，首先应该发展农药原料，特别是苯、赤磷、水银和硫黄的生产。

防治兽疫，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化学工业方面，还应当积极地发展生物化学工业。

把油料加工工业尽量分散在广大农村，这不仅有利于油脂工业的发展，而且便于用



油饼去支援农业。

适应于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情况，工业需要对农业全面支援。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农业的需要，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把农业需要的生产资料，按照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分别列入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不仅列入生产计划，而且还应该列入分配计划和供应计划。因为我国生产资料是按计划进行生产和分配的，不纳入计划，就无法保证农业的需要。在物资分配计划中，应当尽量地考虑到农业的需要。在分配钢材、生铁、煤炭、石油、木材、水泥、橡胶、机床、交通工具等等生产资料的时候，应该把农业需要放在一个必要的位置。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保证农业得到必要的生产资料，应当作为物资分配计划的重点之一。大工业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应该通过国家计划加以妥善安排，但是为了适应我国广大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耕作条件不同的情况，各种小农具和简单机械，需要各省市自治区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安排，包括改进、试制生产以及推广等工作。

由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国家供应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不能直接调拨，而是以商品的形式同人民公社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是通过国营商业进行的。因此，为了保证农业得到必要的生产资料，不仅要有生产计划、分配计划，而且还应该有商业部门的供应计划。为了使商业部门的供应计划落实，商业部门应该把这种供应关系按照人民公社的需要和供应的可能，用合同形式固定起来。当国家的商业部门和人民公社订立供应合同

时，还可以同人民公社出售农产品的计划结合起来。就是说，把国家的供应和国家对人民公社农产品的采购，用合同的形式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使国家对人民公社生产资料的供应，和人民公社出售给国家产品的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就可以得到可靠的保证。

党和政府的农贷政策，对促进合作化和农业生产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仍然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这个对人民公社的财政扶助的政策，将有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为了使农业贷款更直接地扶助人民公社生产的发展，在贷款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去代替一部分货币的发放。

总而言之，为了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除了在思想上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外，还需要作一系列的具体安排。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时候，曾经号召全党在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中，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而奋斗。现在，我们应当进一步实践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号召，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来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造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認真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 康永和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奴役和压迫，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在过去被人们看作是卑贱的事情，现在变成了光荣豪迈的事业。解放了的人民群众，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奋勇地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人民群众中展开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动员广大劳动群众，发挥他们的劳动热情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方法。当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建立不久的时候，列宁就指出了劳动竞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参加工作，使他们能够在这种工作中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天才。”他还指出：“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①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列宁关于劳动竞赛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解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我国的劳动竞赛和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相结合，一浪高过一

浪地发展起来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竞赛，保证了我国历年生产和建设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的生产高潮中，在一九五八年的生产大跃进中，劳动竞赛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五二年的爱国主义增产节约运动，是解放初期开展的劳动竞赛的进一步的高涨。由于经过各项民主改革和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加强了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初步树立起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他们在生产中挖潜力、找窍门，制定增产节约计划，大力推广先进经验，使群众生产运动出现了高潮。这个时期的竞赛运动，已经开始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活动，它对于争取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支援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和准备进入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劳动竞赛继续深入，向着提高技术、革新技术方面发展，竞赛的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也进一步加强了。一九五六年，由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8页。



会主义改造和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胜利，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广大职工在經濟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按照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在运动中，先进带动落后，落后赶上先进，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使竞赛的目标集中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而为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提供了重要的保証。

一九五八年，在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全国出現了一个波瀾壮阔的生产大跃进。广大职工群众，在总路綫的鼓舞下，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發揮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創造精神，普遍地开展了“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大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并且在企业中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結合”的制度，調动了所有企业人员的积极性，为大跃进服务。这就使得一九五八年的劳动竞赛，目标更加明确，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内容更加丰富多采，在竞赛的規模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一九五八年的劳动竞赛，不仅促进了当年的生产大跃进，而且为今年的繼續跃进提供了丰富的經驗，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九五八年宣布的党的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它对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也同样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总路綫要求人們振奮精神，鼓足干劲，要求人們在尊重客观規律的基础上，充分發揮主

观能动性，力爭上游，要求人們多快好省地創造我們建設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質經濟基础。按照总路綫的要求組織竞赛，就是要調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先进、中間、落后三种不同群众的积极性組織起来，使大家的干劲鼓足，把苦干、实干和巧干結合起来，把学习先进經驗和发揚独創精神結合起来；就是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按質、按量、按品种全面地完成和超額完成生产計劃。我們的竞赛工作組織得好，就能使竞赛工作健康地深入地发展，真正成为在领导生产中貫徹群众路綫、大搞群众运动的一种好的形式，真正成为实现总路綫的一項有力的組織措施。

今年是繼續跃进的一年。入春以来，許多地区、許多工业部門、許多企业都組織了名称不同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后，广大群众响应了党的号召，掀起了轟轟烈烈和扎扎实实相結合的增产节约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广大群众进一步把苦干和巧干結合起来，他們在鼓足干劲和發揮敢想敢作的风格的同时，又強調了尊重科学的精神，遵守必要的規章制度。为了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广大群众正在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他們在各项生产建設的崗位上，你追我赶，比干劲，比鑽劲，比技术，比措施，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决心以出色的生产成績，全面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国家計劃，来庆祝十周年国庆。

为了使当前的增产节约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以下的經驗是值得十分重視的。



一、紧紧抓住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这一最为主要的环节

在竞赛当中，把群众的劳动热情引向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竞赛就有了无限的活力，就可以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地推动生产不断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总是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代替落后的生产技术，用先进的生产定额代替陈旧的生产定额。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能够加速生产发展的这种过程，使少数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生产水平迅速地变成全社会的生产水平。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祝词中，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他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的历史，是生产者的历史。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门中，总是有少数比较先进的生产者，他们采用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定额。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们的技术，达到了他们的定额，直至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因此，紧紧抓住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这个主要环节，对发展整个社会生产，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变少数先进生产者的水平为全社会生产水平的过程的快慢，决定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在旧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唯利是图，残酷

剥削工人，先进技术、先进定额的推广，往往给工人群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再加上资本家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彼此严守技术秘密，因此，使少数先进生产者的水平变成全社会生产水平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消灭了阶级剥削，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先进生产者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创造发明的传播和推广，不但不会受到限制，相反地还通过各种办法，组织推广。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就是推广先进经验、先进技术的一种好形式。这种竞赛要求，在表扬先进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鼓励人们学习和利用先进生产者的经验和技能，积极提倡落后的赶上先进，先进的帮助别人赶上自己，同时，使先进的更加先进。在职工群众中组织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热潮，就容易使少数先进生产者的生产水平迅速地变成全社会的生产水平。这种群众性的消除落后、力争先进的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我们必须十分重视。

在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的时候，要帮助广大群众认识到，在生产中，总是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的。当普通生产者和一般的单位赶上了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单位的时候，新的先进生产者和少数先进单位就又出现了，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又形成了。这种新的差别代替旧的差别的



过程是无止境的，而每一个旧的差别的消灭和新的差别的形成，都必然使我们的生产向前推进一步。弄清楚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認識到，在竞赛中，一些时候，这一部分人和若干单位走在前头，另一些时候，又一部分人和若干单位赶在前头，是生产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正常的现象。重要的问题在于：不管谁走在前头，都不要骄傲，要帮助走在后头的人往前赶。落在后边的人也不要气馁，不管走在前头的是谁，总要向他学习，力求赶上，争取超过。这样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结果，就可以使我们的竞赛达到不断推进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目的。

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运动中，必须引导职工在努力提高产量的同时，十分重视保证产品的质量。产品质量好不

好，品种全不全，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有直接的影响。只有按质、按量、按品种全面地完成生产任务，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要求。因此，在竞赛中，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加强教育，注意防止。

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运动中，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比先进，要和生产条件相同或者相近而生产指标最高的相比，也要和稍高的相比，有一技之长的就是学习的对象。学先进，要十分虚心，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任何先进的东西，不会是“天衣无缝”、十全十美的，对它的个别缺点不应当吹毛求疵，而要热诚地帮助克服。赶先进，要有向最高的标准看齐的雄心；也要有步步前进的恒心，赶过一个再赶一个。

二、必须大闹技术革命、技术革新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是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为了使生产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就需要经常革新技术，不断采用新技术。因此，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必须把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作为中心。在当前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必须发动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苦干、实干和巧干结合起来，把冲天的干劲和科学分析精神结合起来，引导和鼓励群众多动脑筋，多想办法，革新技术，大闹技术革命，使竞赛运动能够持久地健康地发展下去，使群众精神饱满地为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而奋斗。

在劳动竞赛中大闹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有了明确的目标，就不会浪费群众的精力，就能够尽快地取得预期的成效。进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应该随着生产部门和生产单位的不同特点，有重点有区别地以改进设备、改良工具、改革产品设计、改善工艺、改进操作、创造新产品、采用新的原料材料和寻找代用品、摆脱笨重体力劳动等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且要两条腿走路，把解决当前生产的关键和长远的规划结合起来。既要从现实出发，千方百计地突破当前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和克服生产中的薄弱



环节，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生产任务；也要长期打算，准备将来更大的跃进。不论解决当前生产问题，或者考虑长远规划，都应当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总方针。

大鬧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必須遵循“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試驗”的原则。应当繼續发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地想，大胆地做，大胆地提合理化建議；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人人动脑筋、处处鬧革新的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热潮。同时，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都包含着科学問題，必須尊重科学的原理，采用科学的方法。因此，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发明創造或者重大改革，都必須經過反复試驗鉴定。試驗成功了，鉴定合格了，才可以投入生产，然后逐步进行推广。

进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要互助合作，群策群力，发揚集体的智慧。去年大跃进中

出現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結合的方法，就是一个非常成功而长期有用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政治和技术、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群众路綫的方法，应当广泛地采用。

进行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需要有必要的技术知識和一定的生产經驗。如果没有这些知識和經驗，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的更好地发展。因此，学习技术，熟悉生产，对新工人固然十分需要，对老工人也很重要。学习技术，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要求，采取业余学习、脫产学习、在生产中学习等不同的方式。訂师徒合同、老手带新手、熟手帮生手、參觀訪問、观摩表演、技术互助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学习技术的方法，可以广泛地采用。除了技术学习以外，还應該加强职工群众的文化学习，使他們能够更好地去掌握科学知識，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必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是各項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証。竞赛是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更加需要重視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弱，决定着竞赛的广度、深度以及成效的大小。思想工作抓紧了，做好了，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会愈来愈高，生产的成績一定显著。思想工作放松了，竞赛不但达不到預期的目的，而且要迷失方向。

竞赛的一切活动，必須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职工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

是不会自发地发展成长起来的。需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根据党的方針政策，对职工群众不断地进行教育，启发和提高他們的共产主义觉悟。要利用国内外的重大事件，针对职工的主要思想，結合当前的生产任务，結合生产中的实际問題，反复講清形势，講清前途，使他們懂得“几年辛苦，万年幸福”的道理。今天为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奋斗，将来还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規律，总趋向，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前



途这样光明远大，处在国家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广大职工群众，应当勇敢地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职工们具有了这样的远大理想，就会有无限的信心和决心来从事劳动，并且能够把当前的劳动和远大的理想联在一起，通过竞赛活动为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基础，准备精神条件。在劳动竞赛中，广泛宣传先进的生产单位和先进生产者的事迹，树立学习的标兵，对启发职工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着积极的作用，也必须认真地进行。

在竞赛中对职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注意严格划清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优胜劣败思想的界限。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竞赛，两者之间有原则的区别。社会主义竞赛的双方是同志关系，要以互相促进、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活动，达到普遍高涨，不断前进。资本主义竞赛的双方是敌对关系，他们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不打倒对方，自己就不能独占。在竞赛运动中共产主义思想如果不占领和占稳全部阵地，资本主义的优胜劣败的思想就要相机入侵，扩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竞赛的领导，在各种竞赛活动中，认真分析群众的思想状况，通过群众性的批

评和自我批评，来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巩固工人阶级思想的阵地。堵塞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入侵的漏洞，大大发扬共产主义思想，是政治思想工作的经常的任务。

竞赛运动是一个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又是一个群众性的思想运动。竞赛的过程就是先进不断战胜落后的过程。通过竞赛运动，不但积极揭露了先进定额、先进技术和落后定额、落后技术的差距，而且使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更加明朗化了。在竞赛中显现出来的先进和落后的显明对比，常常促使人们这样自问：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在条件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下，为什么人家先进，为什么自己落后；为什么他生产的产品质量那么好，为什么我在生产中会出现这些废品和次品；为什么别个单位节约那么多资金，为什么我们单位浪费了国家的财物。群众的这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批评，最能焕发自身内在的力量来克服缺点，鼓足干劲，摆脱落后，争取上游。因此，领导上要善于利用竞赛来启发群众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批评，注意分析落后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寻求克服落后的办法，使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群众的自我教育结合起来。

四、切实加强竞赛的组织领导

竞赛是广泛的群众性的生产运动，一定要有坚强的领导。有了集中领导，大规模的群众竞赛运动才会循着明确的方向前进。如

同其他各种工作一样，竞赛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千条万条，党的领导是头条。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行政和工会、青年团要分工



协作，做許多具体的組織領導工作。在組織競賽方面，我們已經取得許多經驗，應該互相交流，認真總結，逐步提高。

要把千万人組織起来，为着社会主义建設这个共同目标而积极行动，就需要做許多細致的工作。如果不深入細致地进行有效的組織工作，竞赛就很难做到既轟轟烈烈，又扎扎实实。去年大跃进中出現的領導上向群众交任务、交办法，发动群众大鳴、大放、大辯論、写大字报，“两参一改三結合”，大动員、大檢查、大总结、大評比等等方法，已經証明是行之有效的成功的經驗。在組織竞赛当中，应当充分地采用这些方法。

竞赛是职工群众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具体表现。群众的劳动热情越高，領導上越要关心群众，要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办好食堂、托兒所、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宿舍的工作，使群众吃好、睡好、休息好，安心生产，努力竞赛。在竞赛中，要貫徹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則，适当地重視物質奖励工作。

在竞赛中，領導干部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摸清他們在生产、生活中所

遇到的困难，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竞赛，对群众的鼓舞很大。群众說：“干部下海，我們擒龙，干部带头，跃进不愁”，是很有道理的。

毛澤东同志說过：“任何社会主义的經濟事业，必須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在这方面，必須进行許多工作。”^①我們必須坚决执行毛澤东同志的指示，在所有的工矿企业中，在各个生产战线上和經濟战线上，展开轟轟烈烈、扎扎实实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額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8頁。



比先进(木刻)

李 桦



紅、勤、巧的竞赛运动在山西农村

——史紀言 刘山 武蕙——

一九五九年春天以来，在山西省农村中，开展了轟轟烈烈的紅、勤、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

近几年来，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在山西省广大农村中有了广泛的深入的开展。竞赛的范围，有地区和地区、单位和单位、个人和个人几种。竞赛的方法，主要是提出目标，挑战应战，参观评比，总结奖励。一九五八年，党中央规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给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山西省各个地区、单位和个人，在竞赛中都树立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思想。正是由于这样，一九五八年山西省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规模、深度和效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今年的紅、勤、巧的竞赛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今年春季，在工农业生产繼續跃进的形势下，山西省各地普遍感到农业劳动力不足。这时，有几个地区接连发现了做活多、做活好、做活巧的模范人物。壶关县出了个李天柱。他创造了个人做劳动日的新纪录，“一人干活顶两人”。沁县出了个王东果。她是个十

九岁的姑娘，人们称她为“女状元”。汾阳县出了个李锐。他是个能工巧匠，去年一年发明、创造和改制各种工具二十二种、三百零六件，给全村节省了四千一百多个人工、近两千个畜工。他本人还做了很多劳动日。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所领导的金星人民公社，出了个张江考。他是个生产队长，去年除领导全队争得大丰收外，还做了很多劳动日，成为工作好、劳动好的典范。

这些模范人物的模范事迹，对于提高劳动出勤率和提高劳动效率，克服农业劳动力不足困难，指出了一条途径。他们的事迹在报纸上登载以后，很快传播开来，轰动全省，成为广大农民学习的榜样。

中共山西省委经过认真研究，总结出这些模范人物的共同特点是紅、勤、巧。为了推广他们的经验，中共山西省委于四月十五日发出了在全省范围内（包括工厂和农村），普遍开展紅、勤、巧的竞赛运动的号召。

紅，就是思想紅，政治挂帅，就是要有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公社、热爱劳动的思想，就是要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李天柱说：“自从有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社会就越变越好了。从互助组发展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哪一件不是党领导的？没有党也就没有今天的幸福。公社是自己的家，自己是公社的主人。想到这些，我的干劲就来了。”王东果说：“过去被逼着为地主劳动，现在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动，还能不好好干！”这些话，道出了他们的真情实感，这也正是全体劳动人民应当具有思想和情感。先进的



实践，产生先进的思想；然后，先进的思想，又推动先进的实践。有了“思想红”这个动力，才能谈得上“勤”，作得到“巧”。

勤，就是干劲大，劳动勤，就是要苦干、实干，日日勤、事事勤、处处勤。“时不空过，路不空行，车不空跑，畜不空走”，是李天柱等对“勤”的概括。无论是李天柱、王东果，也无论是李锐、张江考，他们所以做得劳动日多，除了出勤率高、早出晚归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白天晚上有活干，家里地里两不误；上地捎带担粪，回家背回庄稼；雨天垫圈、修农具，晚上还搞些副业。这样，他们便把进行主要劳动和进行辅助劳动、干整活和干零活，密切地结合起来了。同时，他们在做各种活时，从不挑肥拣瘦，别人不愿干的活，他们主动地干。这种热爱劳动、以劳动为荣、劳动成习惯的高尚品质，反映了劳动人民勤劳的本色。

巧，包含着三个主要内容：巧改工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妥善地安排小段作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要干劲大，二要工具好，干劲加鑽劲，善于加巧干，一个人便能干两个人的活。农民群众，智慧无穷。李锐式的能工巧匠，到处都有。他们心灵手巧，生产经验丰富，只要加强领导，便会改制和创制出各种各样的好工具来。一九五九年，在改革工具上，各地一般都抓了三个方面：改进旧有的工具；尽量使用去年以来改制和创制的工具；继续试制新的工具。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上，最重要的是学会运用农业“八字宪法”。在这方面，长治市韩店东方红人民公社，按“八字宪法”培养、树立“标兵”的办法，人们一致说

好。它的好处就在于使这八项农业增产措施，每一项都有专门研究的人材，这样，在推广这些增产措施时，群众也就有了学习的榜样。小段作业安排，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确定了在一个小段中要作些什么活计，和由那些人分工来做，它是生产计划管理和劳动管理的具体化和结合点。

红、勤、巧，三者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只有思想红，才能干劲大、劳动勤；只有干劲大、劳动勤，才能逐渐做到技术巧。红、勤、巧的竞赛运动的发展，在过去的半年中，曾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勤为主，就是以提高劳动出勤率，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为主。随着运动的开展，各地的劳动出勤率大大提高以后，运动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以巧为主，以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阶段。当然，无论那一个阶段，都是政治挂帅，思想先行。

红、勤、巧的竞赛运动，既包括政治，也包括技术，体现了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和进行技术革命，密切结合起来。它要求人们既要有积极的劳动态度，也要有刻苦的钻研精神，把实干和巧干密切结合起来。

红、勤、巧的竞赛运动，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提高生活水平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很好的竞赛形式。它符合农民群众的上进心理和传统习惯，是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因而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巨大的鼓动性。

红、勤、巧的竞赛运动，既包括个人和个人的竞赛，又包括集体和集体的竞赛。集



体的竞赛，又是建筑在发挥每个成员的积极性的基础上的。

农村中的红、勤、巧的竞赛运动的开展，是和去冬今春整社整党工作的胜利分不开的。经过整社整党，进一步解决了人民公社的按劳分配问题，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问题，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问题，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得到解决以后，人民公社更加巩固了，广大社员爱社如家的思想增长了，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更加提高了，这些便大大促进了红、勤、巧的竞赛运动的开展。

红、勤、巧的竞赛的直接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管理区和管理区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在年终评比的时候，应该以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充分合理利用、完成统购任务、安排好群众生活为标准。小段评比，应该比完成各项作业的进度和质量，比贯彻执行农业增产技术措施是否适时和适当，比劳动力的使用是否充分和合理。社员和社员之间的竞赛，应该比出勤，比完成生产任务的质量和数量，比学习提高技术。在竞赛运动中，各单位可以因时、因地确定竞赛的中心内容，提出明确响亮的行动口号，以鼓舞群众的干劲。同时，要善于根据季节的不同，有节奏地、有劳有逸地组织竞赛。

目前，山西全省的红、勤、巧的竞赛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人人红、勤、巧，个个高工效”，“人人学习李天柱，个个多做劳动日”，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鼓动口号和实际行动。在运动中，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大量

涌现出来。据晋东南地区四月上旬统计，在参加运动的二百四十三万多人中，已经初步评选出优秀社员十万四千一百多人。此外，还评选出模范作业组三千一百多个，先进生产队两万四千零三十一一个。

六月中旬，中共山西省委为了总结和交流各地开展红、勤、巧的竞赛运动的经验，召开了由李天柱、王东果、李锐、张江考等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红、勤、巧的竞赛是个好形式，它把山西农村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实践已经证明，开展红、勤、巧的竞赛运动，对于提高社员群众的觉悟，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技术革命的进程，实现今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力，对于提高人民公社的管理水平，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具有重大的作用。

在提高劳动出勤率上，全省开展红、勤、巧的竞赛运动以来，大约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出勤人数约占农村劳动力的百分之九十五。许多管理区、生产队的社员们，在李天柱、王东果等红、勤、巧“标兵”的鼓舞下，打破了男人出勤一年不过二、三百个劳动日，女人出勤一年不过一、二百个劳动日的惯例，纷纷自动修订出勤计划。这样一来，许多地方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有的还由不足变成有余。以沁县、武乡县为例，按照原规划，两县缺两千多万个劳动日。开展红、勤、巧的竞赛后，社员自报出勤总数超过今年用工计划两千万个劳动日。这样，这两个县就比原计划增加四千万个劳动日。

在提高劳动效率上，据晋北五个公社的



典型調查，有三個公社提高了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有兩個公社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大泉山人民公社參加紅、勤、巧競賽的一萬多人，五天內就多做了兩萬多個勞動日，每人每天平均多做四分工。

在工具改革上，也獲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汾陽縣改革工具能手李銳，在最近四十天中，和四十二個青年技術員，整修改製了各種農具二百七十件。為了適應小麥快打快收的要求，他們採取就地取材，利用廢料的辦法，三天改制扇車（風車）兩部，每部每日可揚小麥一萬八千斤，提高效率兩倍。為了加強秋田管理，實現每人有鋤、鍬、鋤、鐮各一件，每五人有一輛車、一對籠担的要求，他們除新添鋤板四十二件外，還採取邊參加田間管理、邊整修農具的辦法，光鋤、鍬就整修了一百五十九件。據不完全的統計，從今年一月到七月，全省改革農業生產工具一百零一萬件。

在紅、勤、巧的競賽運動開展以後，領導作風也獲得了進一步的改善。幹部帶頭參加體力勞動，遇事和群眾商量。多數管理區幹部今年三月到五月所做的勞動日，比去年下半年做得還多。有的社員對幹部說：“你們帶頭和我們一塊兒勞動，遇事先商量後決定，我們干起活來也更有勁了。”在小段作業安排上，隊長們進一步加強了責任心。有的隊長說：“現在比以前操心大了，安排這一段的活，就得打算下一段的活，每天晚上還得盤算盤算第二天的活，有時已經睡下了，又想到有一兩件活安排得不合適，就得起來找有關社員訂正。”有的隊長說：“現在的隊長也好當，也不好當。說好當，是經常有社員幫助

出主意；說不好當，是一打算不到，社員就會提出一大堆意見。”根據晉東南專區的統計：全區已經有百分之九十的生產隊，比較認真地執行了小段作業安排制度。此外，在運動開展以後，幹部在領導生產中更發揮了實事求是，切實研究的踏實作風，他們同群眾一起認真研究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改變了許多生產過程不合理的現象。例如，臨汾縣賈得人民公社，採取了在遠地建立耕作點等七項改革措施，預計今年可節省人工十二萬三千多個，畜工十二萬多個。

紅、勤、巧的競賽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運動中也曾經出現過一些錯誤的看法和做法。如有的下部認為人民公社的管理體制和分配制度已經安排好了，群眾自然會積極勞動，用不着再開展什麼競賽運動；有的把競賽運動，僅僅看作是解決當前勞動力不足的權宜之計；有的降低定額標準，只追求多做勞動日的數字；有的只注意培養典型人物，不注意組織全面的群眾運動；甚至有的為了培養模範人物，隨意給他們加記工分；有的在工具改革中，仍然一味追求新花樣，不管實際效果。這些錯誤的看法和做法，雖然是個別的，但是對於運動的開展是不利的。各地黨委在領導紅、勤、巧的競賽運動中，已經切實地注意加以糾正。

山西省農村的紅、勤、巧的競賽運動，雖然開始不久，許多經驗尚待進一步總結和提高，但是，這個運動已經顯示了它的巨大作用。現在這個運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在這個新高潮中，必將出現更多的紅、勤、巧的幹部和紅、勤、巧的社員。紅、勤、巧的花朵將開遍全省。



和平竞赛是大势所趋

于兆力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访问公报的公布，受到全世界舆论的欢迎和称赞。苏美两国政府首脑决定互相访问，这是一件好事，它有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的对外政策。苏联为着缓和 international 紧张局势、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实现东西方国家高级领导人的直接会谈，从各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支持。全世界的舆论，包括美国的舆论在内，都公认，苏美两国政府首脑的相互访问的促成，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缓和 international 紧张局势，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谁要是违背世界人民的这个愿望，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结果一定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美国侵略政策的制定者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到处搞紧张，常常是事与愿违：到处“紧张”地把当地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反对自己，使

自己到处陷于当地人民群众的包围。美国制造紧张局势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不可动摇的；制造紧张局势来对付民族独立国家，只有更加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搞得过分紧张了，甚至会把自己的同盟国也吓得站远了一些；制造紧张局势的政策，还会促使本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可见制造紧张局势并不见得都对制造者有利。

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总是顽固地抱着紧张局势不放手呢？这是因为它陷于自身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战后的美国经济是建筑在军事化的基础上的。美国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基地网和军事集团，形成了新的殖民主义体系。他们要维持军火制造商人的巨额利润，要维持对国内人民的统治，要维持对自己的盟国的控制，要维持对外国领土的霸占和镇压民族独立运动，都要依靠紧张局势过日子。因此，要美国根本抛弃制造紧张局势的政策，那比“要猫儿不吃腥”



更加困难。

但是，形势逼人。在形势变化的逼迫下，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不得不做某些变化。由于社会主义阵营无比强大，硬碰硬不动，顿复又顿不破，美国的军事科学技术又远远落后于苏联，威懾政策只好宣告破产；在广大的中间地带，压服政策压不服，乱子层出不穷，事情越来越不好办了；加上自己的盟国，也越来越不听从美国的那一套强迫命令了；这样，在全世界人民的压力下，就迫使美国政府的决策人，不得不接受某些缓和的做法。美国同意苏美两国政府首脑互相访问，也就是这种缓和做法的一个尝试。

在美国当局表现一些缓和姿态的同时，却又在串演所谓“被奴役国家周”的丑剧。用自己的矛，攻自己的盾，这是一副尴尬相。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人们作进一步的观察，就会明白，原来，将这两件对立的事搅到一起，并不是偶合，而是美国对外政策陷于窘境的反映：既要紧张，又怕紧张，被迫缓和，又怕缓和，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这两颗丸子，吞下去都嫌苦，吐出来又都不愿意。看来紧张不能不要，而缓和也不敢拒绝。什么时候唱什么调子，还要看一看行情和市价。

被迫接受“缓和”，又对“缓和”存在着无穷的恐惧，这正是美国举办“被奴役国家周”的真实原因。这样一来，美国总统就太难为情了，不得不在全世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两重人格。一面要讲些“解冻”的言词，一面又要跑到长老会的教堂里去貽笑大方。一个自

称为文明大国的总统在那里低下头做祈祷，念咒语，又接连发出通告和命令，使用下流报纸惯用的冷战语言，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乞求上帝帮助他们去“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他们去消灭共产主义，甚至还说出“让我们鼓起勇气，做好准备来履行我们那一天的义务”之类动员战争的黑话。辱骂根本不是战斗，当然就不值得驳斥。用超出国际惯例甚至常识的范围之外的手段，粗暴地干涉别国的内政，是一种非常低级而愚蠢的行为。难怪，连李普曼这样的美国资产阶级政论家，也认为这种做法的“虚伪性”，“使自己国家处于难堪的地位”。

艾森豪威尔特别宣扬，他在教堂里做祷告时的位置，离林肯在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做祷告的位置，只隔几英尺。美国的那些扬言要“解救被奴役国家”的人，非常喜欢引用林肯的名言：“独立宣言不仅仅给美国人民自由，而且永远给全世界希望。也就是给了这样的希望：到一定的时候，应当释去所有的人身上的负担，所有的人应有平等的机会。”^①林肯的这句话至今并没有失去它智慧的光辉，可惜林肯的不肖子孙却把它用来作为实行侵略政策的理论根据。谁都知道，林肯所说的给予希望的世界，指的是在殖民主和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世界。美国的独立宣言，同英国的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一样，在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放射过光芒。但是，今天人类的历

^① 林肯1861年2月22日在费城独立大厅的演说。



史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早已衰老了。美国的和世界的资产阶级，至今并没有能够实现林肯的遗言，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了。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走到了林肯遗言的反面，成为剥夺人类的独立自由权利，压迫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的奴役主。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役主。一切在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人们，要释去“身上的负担”，得到“平等的机会”，都必须同这个奴役主进行斗争。而给予这个旧世界以光明希望的，正是社会主义新世界。林肯的不肖子孙竟然搬出这句话，作为反对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武器，真是对林肯的一个莫大的侮辱。

青年时代的美国，曾经以新生的共和国的姿态同那些欧洲的腐朽的专制王朝相对立。那时，美国资产阶级曾经在“北部联邦同盟文件”上提出了著名的论点，就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榜样”，向全世界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优点。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确实比封建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大鱼吃小鱼的特性，因而资产阶级国家当自己羽毛丰盛的时候，只要有可能，就要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并且是不择手段的。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腐朽的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同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已经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〇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于世界形势的发展，充满信心地做了极其生动的科学论断：“封建

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现在，时间过了将近二十年，在当时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国家，一部分已经垮了台，一部分遭到严重的削弱；而社会主义则已经在占全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许多国家中取得了胜利，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心。的确，帝国主义的寿命是不长了，快进博物馆了！帝国主义完全丧失了对前途的信心，这是美帝国主义害怕和平竞赛的根本原因。

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进行和平竞赛政策的人，是伟大的列宁。坚决执行和平竞赛政策的，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并且正在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榜样”，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然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并存在一个地球上，就只有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才是避免战争灾祸的正确政策。它符合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哪一种制度好？哪一种制度不好？让各国人民根据事实自己去选择。谁也不应该强迫别的国家的人民接受自己的社会制度，而且，那是根本办



不到的。还是各人走各人的路吧！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你信你的资本主义，我信我的共产主义。你信你的有神论，我信我的唯物论。在我们的国家里，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信佛教，信伊斯兰教，信基督教，信别的教，不信教，都可以。我们绝不会象美国反动政客那样蛮不讲理，非要别人信上帝不可，而且一定要信美帝国主义商标的上帝，不然的话，据说就要“组织十字军”了，这岂不是又要动武了吗？这样，你们又忘记了“圣经”上的话：“动刀者必死于刀下”。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在我们的国家里，也还有信仰资本主义的人，谁也怪不了谁。因为你们那里有工人，有人民，就一定会出共产主义，人民消灭不了，共产主义就消灭不了。而在我们这里，还有残余的剥削阶级的影响，所以也还有人信资本主义，甚至还有人要把这个陈腐观念一直带进棺材。只是，在我们的国家里，信仰资本主义的人，一定越来越少；在你们的国家里，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一定越来越多。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将是和平竞赛的必然结果。也许你们以为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总之，我们不怕资本主义，你们却象害怕末日来临一般地害怕共产主义，这是你们的根本弱点。可是，头脑还是清醒一点的好，因为恐惧并不能延长人的寿命，相反的，它只会缩短人的寿命。

口头上讲和平，讲共处，总比讲战争要好。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看实际行动。讲要“解冻”，就要看制造冰冻的人的行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此注视美国总统的言行，就是这个道理。美国侵略者到处设置军事基地，到处霸占别国的领土，并且赖在那里不走，本来就是一点道理没有的。要“解冻”，要共处，首先就应该撤消这些军事基地，放弃对别国领土的占领。全世界一切不是属于美国但被美国霸占的地方，美国侵略者都没有理由赖在那里不走。不走是不行的。早脱身，早主动；晚走，只有越来越被动。美国垄断集团的代表人物，现在还不可能懂得这番道理，也不会甘心这样办的。当他们认为有需要和有可能的时候，还会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但是，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日益强大的压力下，采取某些缓和的措施，还是有可能的。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美国政府今后的行动。

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每一步胜利，都鼓舞了全世界人民赢得和平的信心。帝国主义制造任何紧张局势，是吓不倒为和平而斗争的世界人民的。只要全世界和平力量保持警惕，加强团结，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不断地进行斗争，那末，就有可能束缚住战争狂人的手足。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已经是大势所趋。一切抵抗时代潮流的人，都将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 * *



客觀規律和主觀能动性

施 东 向

人能够認識客觀世界，并且能够改造客觀世界。动物只是消极地适应周围的环境，而人則有意識地和客觀世界对立，作为行动的主体，既适应于自然界，也改变着自然界，在自然界印上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痕迹。固然，动物也是以它們本能的活动作用于自然界，象老鼠鑽洞，蜜蜂造巢；但是，馬克思說过，即使最差的建筑师也胜过最巧妙的蜜蜂。建筑师之所以比蜜蜂高明，就因为他的工作是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动。这就是人所独具的主觀能动性。

人能够在观念中預先确定自己的劳动和工作的目的，并通过实践而实现預定的目的。这种本领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人类对客觀世界的科学認識不断提高的过程。随着自然科学知識的发达，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劳动生产中就越有把握，越有成效，也就是說，人类在这方面的主觀能动性也越发展了。社会生活本来是离不开人的有意識的行动的，但是人类在长时期中不能够真正懂得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觀規律，甚至不知道在这方面也存在着需要科学地認識的客觀規律。因此，

在过去的时代中，站在反动階級立場上的人，抱着违反客觀規律的主觀願望，固然要經常在实际面前碰壁；就是站在进步階級立場上的人，也不能不由于他們对客觀規律的認識不足，而在發揮主觀能动性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馬克思主义第一次揭露了社会历史的客觀規律。有了馬克思主义，以无产階級为首的人民大众就能够認識和利用社会发展的客觀規律，能动地粉碎旧世界和建設新世界。應該說，馬克思主义的产生，給人們發揮主觀能动性开辟了一个新的紀元，而我們今天建設社会主义的时代，更是人們主觀能动性可以得到空前發揮的时代。

談到主觀能动性，必須弄清它和客觀規律的关系。它們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觀过程，一个是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志所进行的活动。主觀能动性必須在認識和依靠客觀規律的基础上才能充分發揮。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必定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錯誤。

如果夸大主觀能动性的作用，認為人們可以超越一切客觀条件的限制而“为所欲为”，甚至認為客觀規律可以“消灭”或“改



造”，这当然是不对的。人们的行动，要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观能动性要能得到很好的发挥，绝不能违反客观规律。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就会和你“闹别扭”。

主观能动性，总是和一定的预见分不开的。只有预见到行动的后果，洞察事物变化的趋向，人们在行动中才能是自觉的。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客观事物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掌握客观规律，就不会有科学的预见。对客观规律认识得愈深刻，就愈能有远大的科学预见，实践中的盲目性就愈少，主观能动性也就愈大。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努力求得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但是这绝不是说，人们必须把未来事情的一切方面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以后，才能开始行动。正确的行动固然要有正确的认识做指导，但是正确的认识总要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但无利于发挥主观能动性，反而是束缚了主观能动性。

所以，主观能动性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要提高科学预见的能力，除了依靠已有的科学知识以外，还必须依靠新的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不断地探索，不断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才能了解过去所没有认识到的规律，并且使已有的认识更加充实和完善起来。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

级的程度。”这就是说，经过实践使认识不断提高，而认识的不提高又反过来使实践不断提高。这种实践和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上，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人们的行动诚然不能违反客观规律，但是如果认为，人们应当如何行动，都已经由客观规律所刻板地规定好了，因此，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只能消极地服从，不能有任何积极的作为，这种把客观规律偶像化的倾向，就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产生畏难情绪，松劲思想，他们缺乏克服困难的勇气，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只看到暂时的不利的因素，不去积极寻求完成任务和克服困难的方法。他们不懂得，人们既然能够认识客观规律，也就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客观规律来为自己服务。许多客观规律，当人们还没有掌握它的时候，是那么“桀骜不驯”，一旦被掌握之后，却那么驯服地为人服务。充分地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力量是无敌的，人完全可以作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所以列宁说：“‘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①

主观认识必需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要求；但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合乎规律地能动地改造世界。当然，人们改造世界的行动总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好比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86页。



說，任何人不能扯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到空中。但是有的人經過适当的鍛煉，却能够比一般人跳跃得更高，象那些运动健将所做到的那样。而人們利用飞行的工具，就能够使自己飞到几千公尺的上空，以至将来能够脱离地心吸力飞到宇宙的空间。这样的事情，在过去是不可思議的，但是现在却已經做到或将要做到了。这当然不是說人們可以超越客观規律，而是利用客观規律的本領更大了。客观規律是在人的意識以外独立存在的，但是利用客观規律的本領却要靠人們自己的努力才能鍛煉出来。

人們必須凭借一定的物質条件，作为自己活动的舞台，但在这个舞台上，究竟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演出什么样的戏剧，也就是說，人能够利用客观規律做出什么样的事业，做得好或是做得坏，就要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轉移了。为什么有些客观条件相当的生产队和工厂，会有完全两样的生产成績呢？为什么同样的舞台和道具，梅兰芳和其他名家的演唱，会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效果呢？这难道不是主观能动性起了重大作用嗎？

不顧客观条件，单凭主观願望做工作，这是我們从来反对的；但是又必須看到，在符合于客观規律的范围内，人們的活动范围是极其广闊的，人們利用客观規律的本領，是可以經過努力而不断提高的；主观能动性的發揮，就长远的人类历史來說，是无穷尽的。

我們党在实际工作中，从来都是遵循着这样的馬克思主义原則：当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的时候，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就

成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正是体现了这个原則。当我国几亿人民，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設中时，那种斗志昂揚、意气风发的革命热情，那种要求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雄心和气魄，是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动力。無論城市和农村到处呈現着轟轟烈烈、生气勃勃的景象，“人定胜天”已成为群众的普遍信念，因此有“讓高山低头，叫河水讓路”的豪言壯語。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大跃进，正是这种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發揮的結果。

列宁說，“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論不同，它精妙地結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靜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极坚决地承認群众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認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些阶级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組織和政党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义。”^①对于群众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的意义，不坚决承認，而采取任何其他的态度，都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率領群众勇往直前，和一切軟弱无力的消极情緒决裂，使高度的革命气概和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結合起来，更好地發揮主观能动作用。在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下，紧紧地依靠群众，我們是无往而不胜的！

^① 列宁：“反对抵制”，“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9頁。



关于小麦深耕、密植、施肥、复种的 经济效果的调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调查组
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农经室

去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今年的夏收，证明农业“八字宪法”是农业增产的根本措施。凡是全面地、合理地贯彻执行了“八字宪法”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增产。

我们在陕西省兴平县杨陵人民公社杜家坡生产大队，进行了小麦深耕、密植、施肥等问题的经济调查。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这个调查中的材料只是一个地区的一个生产大队的情况，但是，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在贯彻执行“八字宪法”的每一项措施中，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考虑到各项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把人力、物力用得更适当、更合理、更符合节约原则，既提高产量，又提高劳动生产率，收到最大的经济效果。现在把这个调查摘要介绍如下。

一、深耕问题

今年杜家坡小麦生产的事实说明，适当深耕是能够增产的。根据今年玉米茬小麦的调查，播种量和施肥量基本相同，铧翻一尺

的比耕深五寸的，产量一般增加百分之十左右。如果随着耕层加深，施肥量也适当加大，产量就增加得更多些。表一是我们对十块玉米茬小麦产量的调查。

表一

亩产量 (斤)	耕 深 (寸)	施肥量 (纯氮、 斤)	播种量 (斤)	产量比较	调查 田块
479	10	39	23	148.7	1
432	7	28	25	135	1
404	5-6	27	22	126.2	4
320	3-4	23	25	100	4

深耕结合增施肥料，虽然能够提高产量，但是究竟应当耕深多少，还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决定。

杜家坡大队耕地目前以旧式大犁耕为主，另外还有旧式独犁耕、旧式犁套耕、双铧犁耕和铧翻。旧式犁耕、套耕、双铧犁耕，一般耕深是五寸到七、八寸。要深耕八寸以上，除了使用拖拉机以外，就必须用人工铧翻。各种耕法的深度和用工数的比较如下：旧式独犁耕深三寸，每亩用工零点二五个；旧



式大犁耕深五寸，每亩用工零点三三个；双铧犁耕深六至七寸，每亩用工零点二五个（因为用畜工多，他们很少用）；套耕深七至八寸，每亩用工零点七个；铧翻八寸，每亩用工三点三三个；铧翻一尺，每亩用工四点五个。这样看来，铧翻虽然比旧式大犁耕深三寸到五寸，但是用工多九倍到十二点六倍；比套耕深一寸到三寸，用工多三点七倍到五点四倍。如果大量耕地都铧翻八寸到一尺，就会感到人力不足。

该队回茬小麦共计三百七十六亩，占小麦播种面积四百八十亩的百分之七十八。在秋收秋种适宜期二十天内，全队能参加农业生产的只有一百三十九人，折合标准劳力可出工一千七百一十个，减去收玉米、大豆、棉花和小麦运肥、施肥、播种等用工，只有三百四十四个工能用于回茬小麦整地。如果按铧翻八寸计算，每亩需工三点九八个（其中翻地三点三三个工，耙耨打土块零点六五个工），只能铧翻八十六亩，占回茬小麦面积百分之二十二点九；铧翻一尺每亩需工五点一五个（其中翻地四点五个工，耙耨打土块零点六五个工），只能铧翻六十七亩，占回茬小麦面积百分之十七点八。可见在当前工具条件和回茬小麦占较大比重的情况下，过高地要求深耕是办不到的。

还可以从经济效果上看一下这个问题。根据上述调查，耕深一尺比耕深五寸，每亩多用工四点一七个，多施十二斤氮肥，只多产七十五斤；而从耕深三寸提高到五寸，每亩只多用工零点零八个，产量可以增加八十四斤。在

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为了扩大一亩耕深一尺的地，而把好多亩耕深五寸的地降到三寸，增产远远弥补不上减产的数字。

那末我们是不是由此得出结论说，深耕的要求只能停滞在五、六寸的水平，而不应当再设法提高到七、八寸或一尺呢？当然不是。问题主要在于改革工具。杜家坡大队只要努力改革工具和增强畜力，是可以在多数地耕深五寸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的。根据西北农学院试验农场的经验，改双铧犁为单铧犁，使过去因土壤阻力大、役畜牵引困难而不天使用的犁充分利用起来，就可以大大地提高耕地工效。因为双铧犁改单铧犁后，不但耕深比旧式大犁提高一至两寸，并且每亩用工减少零点零八个（由零点三三个工，减为零点二五个工）。单铧犁耕和套耕比较，耕深虽浅一至二寸，可是人工和畜工却省得多。套耕每亩用人工零点七个，畜工一个，单铧犁耕却只用人工零点二五个，畜工零点五个。即使不用增加该队的牲畜头数，只要加强牲畜的饲养管理，增强现有牲畜的服役能力，就可以完全满足改用单铧犁耕地的需要了（当然，该队还是积极增加牲口头数的）。这样，该队过去百分之七十以上耕深五寸的耕地，即可全部提高到六至七寸，甚至到八寸。

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到，适当地加深耕层和扩大深耕面积，是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必须根据当地的工具、劳力、畜力和肥料等条件进行，并且应当按照可能，努力创造有利条件。

1959年



二、密植問題

合理密植也是一項重要的增产措施。表二是杜家坡生产大队不同播种量的小麦产量。

表二

播种量 (斤)	施肥量 (純氮、斤)	耕深 (寸)	每亩产量 (斤)	用工量 (工)	生产費用* (元)
22	25	5	450	19.6	27.1
25	19	5	550	19.6	25.3
40	115	30	600	46.1	163.5
80	294	50	575	154.6	227.3

*生产費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水費、人工費和畜工費等。

从表二可以看出，在当地条件下，每亩播种量二十斤至三十斤较为合适。因为在这个播种量的幅度内，产量比较高，经济效果比较好，而且人力、物力、财力的条件也是具备的。播种四十斤和八十斤，該队只是在个别試驗田中試种的。試种結果証明：播种四十斤，产量虽然高些，但是施肥量过大（折合标准肥一千二百七十五担），耕层过深，用工过多，生产費用过高，不但经济上不合算，就是从当地人力、物力、财力条件来看，也是不能采用的。至于播种八十斤，显然就更不能采用了。

从杜家坡大队的調查材料中还可以看出，播种量即使比较合适，但是由于其他

的增产措施配合得不当，也起不到增产的效果。

表三說明，播种量相近，如果其他增产措施不同，产量就相差很大。十号田比十六号田播种量少三斤，可是由于施肥量和耕深都增加一倍以上，所以产量也多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九。

表三

田块号	播种量 (斤)	施肥 (純氮、斤)	耕深 (寸)	亩产 (斤)
十六号	26	19	4	294
十号	23	39	8—10	479

从杜家坡生产大队的調查材料看，播种量和其他增产措施相差不多，如果延誤播种期，也会减产。当地小麦播种以十月五日到二十五日为宜，如果延至十一月份，一般要减产百分之十左右。

杜家坡大队的小麦密植及其经济效果，大致有如下三种情况。

一种是在实行了合理密植的同时，又适当地配合了其他措施，結果是：投資少，产量高，收益大，增产增收，经济效果最好。如十二号田块，播种量較上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三点七五，施肥量增加百分之十二，耕深增加二寸，各項措施配合得比较好，結果增产百分之

表四

項 目	增产技术措施			亩产 (斤)	生产投資		經濟效果比較 (以1958年平均数为100)		
	播种量 (斤)	施肥量 (純氮、斤)	耕深 (寸)		用工量 (工)	生产費 (元)	产量%	劳动生 产率%	生产費 %
1958年的 平均数	16	25	4—5	350	15	20	100	100	100
十二号田	23	28	6—7	451	18.7	24.7	128.9	103.4	96



二十八点九,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三点四,生产费用降低百分之四。见表四。

第二种情况是,实行了合理密植,但是其他措施配合得不好,结果是:投资较多,产量稍增,增产不增收,经济效果不大好。

如十四号田块,播种量较上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八点七五,耕深增加四、五寸,施肥量却减少百分之十二,结果虽然增产百分之二点九,但劳动生产率降低百分之十六点三,生产费提高百分之二十点七。见表五。

表五

项 目	增产技术措施			亩 产 (斤)	生产投资		经济效果比较 (以1958年平均数为100)		
	播种量 (斤)	施肥量 (纯氮、斤)	耕 深 (寸)		用工量 (工)	生产费 (元)	产量%	劳动生 产率%	生产费%
1958年的 平均数	16	25	4-5	350	15	20	100	100	100
十四号田	27	22	8-10	360	18.5	24.8	102.9	83.7	120.7

第三种情况是,实行了合理密植,但是其他措施配合得太不好,结果是:投资大,产量低,成本高,减产减收,经济效果最差。如十一号田块播种量较上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生产费用增加百分之十九,但是,降

低了肥料用量和耕深,结果减产百分之四十八点六,劳动生产率降低百分之四十八点九,生产费提高百分之一百三十一.二,使多投入的劳力和费用不但没有发挥效果,反而减产减收,造成经济损失。见表六。

表六

项 目	增产技术措施			亩 产 (斤)	生产投资		经济效果比较 (以1958年平均数为100)		
	播种量 (斤)	施肥量 (纯氮、斤)	耕 深 (寸)		用工量 (工)	生产费 (元)	产量%	劳动生 产率%	生产费%
1958年的 平均数	16	25	4-5	350	15	20	100	100	100
十一号田	22	19	3-4	180	15.1	23.8	51.4	51.1	231.2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播种量、施肥量、耕深、用工量、生产费和产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依存关系。如果只增加播种量,其他措施跟不上,既不符合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也不符合经济要求。足见密植问题,既是技术问题,又是经济问题;如果只作单纯的技术考察,不作经济效果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三、施肥问题

肥料对于增产的巨大作用是无庸置辩的。十三号田块和十一号田块,同样耕深三、四寸,同样是回茬麦地,播种量也都比较合适,增施了肥料的十三号田块,其产量比施肥料少的十一号田块,多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五。



見表七。

表七

田块	耕深 (寸)	播種量 (斤)	施肥量 (純氮、斤)	產量 (斤)
十一号	3-4	22	19	180
十三号	3-4	27	30	387

增施肥料能够增产，但并不是施肥愈多愈好。作物需要的养分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多的肥料，不仅作物吸收不了，会造成浪费，并且往往引起“徒长”或“烧死”的现象，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即使由于多施了肥，比一般田增了产，但也需要从经济上考虑是否合算。而且由于当前劳力缺乏，肥料不足，要想在大面积的土地上过多地增施肥料，也是不可能的。

该队有个别田块施肥量超过一般施肥水平很多，但是产量并不是相应地增加很多，从每斤纯氮肥所生产的小麦来看，反而降低。见表八。

表八

田 块	播種量 (斤)	施 肥 量		產量 (斤)	每斤純 氮肥產 小麦 (斤)
		标准肥* (担)	折純氮 (斤)		
十三号	27	331	30	387	12.9
一 号	40	1275	115	600	5.2
二 号	80	3378	294	575	2.0

* 标准肥系将各种肥料统一折合成牲口粪。

我們再进一步分析，如果不是把当地标准肥三千多担(折純氮二百九十四斤)都施入二号地里去，而是根据十三号地的施肥水平(代表一般施肥水平)，把这些肥料施入其他

麦地中去，就可以满足十亩地的肥料需要量，則收获的小麦可达三千八百七十斤，比二号地的产量要高出五点七倍。从这里可以看出，同样多的肥料，使用得是否适当，其经济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肥料的质量不同，增施肥料的效果也就不同。比如，同样施肥一百担，如果是家园肥(即人粪尿、猪粪尿和垫圈土的混合肥料)，就要比土肥(炕土和墙土)肥效高出五至八倍。因为当地一百担家园肥含氮四十至六十四斤，而一百担土肥，只含氮八斤。

家园肥不仅比土肥质量高，而且使用家园肥，劳动消耗少得多。一个旧炕，連拆带修，需要三个人工和两个畜工，积肥仅五千多斤，平均一个人工积肥才一千八百斤，折氮一点四四斤；而一个人工积家园肥可达三千斤，折氮十四点四斤。这样，同样一个人工，所取得的肥料效果就相差九倍之多。

如果该队把土肥的比重由百分之五十六降到百分之四十五，就可以节省一千六百八十个人工，折合四、五人的常年劳动。要是讓这四、五个人专门从事养猪，按每人养十五头计算，全队就可以多养六十至八十头猪，全年就可以多积家园肥四百多万斤。这样，土肥虽然减少，但是家园肥却大为增加，而每亩施肥的含氮量就可以由过去的二十五斤提高到三十五至四十斤。

在增加家园肥的同时，还须进一步改变家园肥的积肥方法。该队过去由于垫圈土太多，肥料中土占的比重过大，因此形成黄土搬家的现象。现在他们已采取提高纯粪比重、



就地积肥等措施，来改变过去肥料质量低又费工的情况：

增施肥料的关键是肥源问题。除了大力发展养猪增加家厩肥以外，还须广辟肥源，如推广刈青沤绿肥，收集各种牲畜和家禽的粪便等等。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为了配合深耕、密植等增产措施，就必须搞好施肥、积肥；在积肥中不仅要增加肥料的数量，而且还要注意提高质量。

四、单种和复种问题

杜家坡大队种植的小麦，有单种和复种两种。单种的叫正茬麦，麦收以后不种其他作物，经过一段时间的休闲，再种小麦。复种的叫回茬麦，是同玉米、大豆等作物换茬。过去，这里的回茬麦比重很小，近几年来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回茬麦的比重逐年扩大，到一九五九年已达麦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

正茬麦从六月麦收到十月冬播，有四个月的休闲期，整地比较精细，一般要整地三遍。麦收后先行浅耕灭茬，七、八月间在雨

后再行深耕，到播种前还要进行一次播前整地。再加上土壤肥力较厚，每亩产量一般较回茬麦高一百一十斤左右。

种正茬麦有三个优点：一是因为一年只收一季，土壤肥力厚，因此施肥量较少，一亩正茬麦比回茬麦一般少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肥料。二是正茬麦有四个月的休闲期，虽然整地遍数较多，耕作比较精细，用工较多，但施肥量少，积肥、运肥、施肥的用工都较少，一亩正茬麦比回茬麦的用工，一般少百分之三。三是正茬麦比回茬麦的产量高。

虽然种正茬麦有这些优点，但是回茬麦可以收两季，全年共收粮食七百六十斤，比正茬麦可多收二百九十二斤。全队三百七十六亩回茬麦，就可多收近十一万斤粮食。因此，提高回茬麦的比重，对增产粮食是有利的。

从正茬麦和回茬麦的全部投资情况来看，虽然回茬麦加复种玉米比正茬麦每亩用工和投资都要多些，但是从每百斤粮食的投资来比较，前者比后者还少些。因此，回茬麦比正茬麦的经济效益要大些。见表九。

表九

作物	产 量		用 工				投 资			
	斤	增减	每亩用工	增 减	每百斤粮食用工	增 减	每亩投资(元)	增 减	每百斤粮食投资(元)	增 减
正 茬 麦	468	—	18.06	—	3.86	—	25.78	—	5.51	—
回 茬 麦	360	-108	18.57	+ 0.51	5.16	+1.3	24.16	-1.62	6.71	+1.2
回茬加玉米	760	+292	29.43	+ 11.37	3.87	+0.01	40.09	+14.31	5.28	-0.23



既然种回茬麦有利，是否可以把全部正茬麦都变成回茬麦呢？不能。因为回茬麦是在收玉米以后马上进行播种的，当时农事忙，时间短；同样，在收小麦种玉米时，也是如此。在没有实行机械化和没有足够的化学肥料供应以前，要过多地扩大回茬麦面积，不但会使劳力更加不足，肥料更加缺乏，并且还会造成延期播种，贻误农时，影响产量的提高。去年该队部分回茬小麦未能适时播种，原因之一就是回茬麦的比重较大。

杜家坡大队，不论秋收秋种，还是夏收夏种，最突出的问题是劳、畜力和肥料不足。去年种麦时就是由于这些原因，大部麦

田只耕深五寸左右，施底肥每亩只有五至六车，还有一部分地为了抢农时没有施底肥，但播种还是延迟到十一月上旬才结束。

从以上调查中可以看出，多种回茬小麦是好的，但是，必须考虑人力、物力条件，尤其是要考虑到秋收秋种和夏收夏种两个农忙季节的人力条件。如果条件允许，就可以适当地扩大回茬小麦的播种面积；如果条件不允许，就不要勉强扩大。当然，在考虑人力条件时，不能机械地算死账，要看到人的积极性，看到工具改革等对提高劳动效率的重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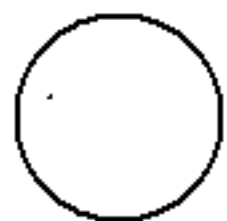


收 获 (国 画)

黄 潜



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的 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



苏 星

在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的討論中，对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体所有制經濟之間，必須通过商品交換实现經濟上的联系，大家的認識，已經趨向于一致。但是，对于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是不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还有比較大的分歧，有人說存在，有人說不存在。

由于对商品生产的認識有分歧，很自然地对于价值規律的認識也各自不同。有人認

为价值只是“形式”，价值規律有“良好作用”，因此不能忽視它；有人認為价值規律具有客觀性質，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分配、交換过程中，必須認識它，充分地估計到它的作用。

我認為全民所有制內部是存在商品生产的，并且認為价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規律，而不同意胡鈞同志在紅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发表的文章中所提出的論点。

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的商品生产

商品价值学說，是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認為，商品和一般产品不同的地方，是它具有两重屬性：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重屬性，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两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列宁在概括地說明商品生产时这样写道：“商品生产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其中各个生产者制造着各种各样的产品（社会分工），經過交換来使这一切产品互相比量。因此，一切商品所有的共同点，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門

底具体劳动，并不是某种形态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人类劳动。”^①我想，研究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的商品問題，也不能离开这个基本原理。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是为了滿足整个社会的需要的，这种有用性，使它成为一种使用价值。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絕大部分产品还不能实行直接分配，必須經過交

^① 列宁：“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莫斯科外国文書局出版局1949年版，第28頁。



换，经过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和别的使用价值相互比较以后，才进入消费过程。作为两种使用价值之间的比例的基础的，是产品的价值。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不是一般的产品，它具有两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

产品具有两重属性，是因为生产产品的劳动具有两重性。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劳动者加入了某一个生产部门，进行具体劳动（如工业劳动、农业劳动、建筑业劳动），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如机器、粮食、住宅）。这种性质不同的劳动，形成社会分工。同时，劳动者的劳动又作为抽象劳动来支出，创造出产品的价值，在这里，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一的人类劳动。

为什么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产品具有两重属性，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也具有两重性呢？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要供应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给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和公社社员；并且要从人民公社和社员手里换取大量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这部分产品当然是商品，具有商品的属性。但是，仅仅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还不能说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生产存在的全部原因。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一部分产品并不同人民公社相交换，它也具有商品的属性；而且根据现有的情况，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即使集体所有制已经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只要没有实现“各尽

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还不能直接地绝对地计算产品中的劳动量，产品也可能具有商品的属性。因此，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还需要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去加以考察。

商品，是人们把他们的生产物当作价值，并且通过这种物的形态来交换彼此劳动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是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作为基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商品生产，也是这样。从生产力的状况来看，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机器大工业，已经形成严密的分工体系。从经济关系上来看，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但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产品极大丰富的地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还有差别，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还没有极大的提高，因此，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还不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基本上还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都加入到社会总劳动当中，根据他所贡献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从社会总产品（扣除社会基金以后）里领得相应的一份报酬。在这里，按劳分配的“劳”，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每个劳动者所贡献给社会的劳动的差别，大体上决定消费品分配的差别；第二，劳动作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在质上必然是相等的，它不是劳动的具体形态，而是劳动的抽象形态。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从事的是具体形态的劳动，生产某种使用价值，



但是，这种使用价值并不直接归劳动者自己消费，一般的也不是直接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消费。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完了之后，取得的是货币工资，证明他做了多少社会劳动以及他在社会总产品中应当取得多大一个份额。劳动者在市场上经过购买，把货币交回给社会，才能获得自己所必需的消费品（使用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费品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通行着在商品等价物的交换里也通行的那个原则，即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可以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交换。”^①后来列宁简明地概括了马克思这个思想，把它称之为“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②的原则。因此，我认为，社会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化，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必然性，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存在商品生产的重要原因。当然，有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只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前提，并不是说单有社会分工就必然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有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又实行按劳分配，就必然会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则，就不可能解决按劳分配过程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

有些同志说：作为商品，总是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相交换，在这里职工仅仅是从全民所有制企业购买消费品，恐怕算不得商品交换。是的，在这一点上，它确实和一般商品交换不同。不过，如果我们细致地观察一番，就会发现，经过市场分配个人消费品，虽然从个人的角度上看是购买，从整个社会

再生产过程来看还是交换。例如，在第一部类造机器的工人，他的产品是机器，他所拿到的工资，实际上是他在生产机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他用这一部分价值购买消费品，使第二部类所生产的消费品在价值上得以实现，第二部类才有可能向第一部类购买机器，进行再生产。这就是交换。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经过这种交换，社会产品不从价值和使用价值上得到补偿，社会再生产就根本不能进行。

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生产资料的调拨，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问题有所不同。全民所有制经济，由于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换，一万年都会有的，这种交换不一定是商品交换；在生产、分配、交换过程中，劳动时间的核算，也一万年都会有的，这种核算也不一定借助于商品的价值。因此，今天国营企业之间调拨的生产资料具有商品的属性，不能只从交换和核算的必要性来解释，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消费品是商品。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是互相依存的，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里，消费品既然是商品，生产资料不可能不具有商品的属性。当然，这里所指的生产资料，是指进入交换过程的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些生产资料（如土地、矿山等等）并不是商品。

有的同志根本否认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3页。



有联系。例如，胡鈞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就专门有一节是批评根据按劳分配解释商品生产的意见的。他说：“这种论点错误的理论根源，简单说来，就在于他们只表面地看到了按劳分配与商品交换共同的地方，即它们都是一种形态的劳动与另一种形态的劳动的等量交换，但却没有看到二者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按劳分配所要求的等量劳动的交换是直接的劳动交换，而商品关系所反映的等量劳动交换是在物的形态上的劳动的相互交换，即等价交换。二者的本质的区别，正如上面所说的，就在于这个‘等量劳动’中是否包含生产资料的优劣所带给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在他看来，按劳分配不但不能实现等价原则，两者简直是对立的。

我认为胡鈞同志文章中的基本论点，有进一步商讨的必要。

按劳分配，是劳动者根据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从社会总产品当中取得一个份额，这个份额实际上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经过购买，这部分价值转化为包含相等价值的消费品，使得“他以一种形态给与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态全部取回来”。在这个分配和交换过程中，并不是劳动者之间等量劳动的直接交换。

胡鈞同志所说的直接劳动交换，如果指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互换其活动”，那他只是说明了一般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切社会生产都是人们的活动与能力的交换。如果说按劳分配，就是劳动者之间等量劳动的直接交换，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劳动是个过

程，劳动，一般说来，是不能在劳动者之间直接交换的，能够交换的只能是劳动的成果（凝结了的劳动），或者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劳动力被当作商品同资本家的货币相交换。退一步说，即使劳动可以直接交换，也必然发生按照什么标准交换的问题。由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不同，他们在同一时间内所提供的劳动成果是不一样的，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拿什么作为劳动的尺度呢？拿劳动者直接耗费的劳动时间作为尺度，显然是不行的。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本书里说得很清楚：“如果劳动时间的等价，包含这样的意义，以为每个劳动者在同一的时间内生产同样的价值，而不必预先定出任何平均的东西，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两个人在一小时内所生产的物品，虽在同一工业部门内，但因劳动的强度和劳动者的技巧程度的不同，也总是各不相同的；这样的不幸，——或许只有象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把它看成不幸，——不是任何经济公社，至少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任何经济公社所能挽救的。”^①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以劳动者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尺度，这里面就必然存在一个同一的东西，这个同一的东西就是一定量的抽象劳动。不管每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高低，他们的劳动都要还原为一定数量的抽象劳动。由于抽象劳动是不能直接体现的，它会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价值（货币工资）。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好和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相一致。前面说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8页。



过，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两重性。从具体劳动的角度来看，每个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单位产品上消耗的劳动时间也不同，但是，不管劳动生产率高低，所有的具体劳动，都会还原成为等一的人类劳动，即体现为价值。因此，馬克思在說到按劳分配的时候曾經指出：“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那个調节商品交換的原則，因为商品交換是同等价值的交換。”①

胡鈞同志从上面他自己所說的前提出发，引伸出来了如下的結論：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已經不存在商品关系。但是，他的理論和經濟生活的实践发生了矛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确实具有商品的屬性：价值。在这情况下，他只好找到这样一个出路：說全民所有制企业里虽然不存在商品生产，还是要利用商品形

式，利用价值形式。他認為这种商品形式“只不过是一种計算劳动时间的形式”，“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抛弃它而利用別的形式”，虽然在目前条件下，“商品形式是一种較好的形式”。

如果說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的商品，在內容上和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已經有所不同，或者說它已經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商品概念了，我并不反对，而且同意这种看法。我認為不仅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的商品，就連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体所有制經濟之間的商品，以及和商品相联系的所有范畴，如貨幣、工資、成本、利潤、价格等等，也都和私有制条件下的內涵不同了。但是，不能从此得出这样的結論：好象它們可要可不要，仅仅是一种人們凭主觀意志随便摆布的“形式”。恰恰相反，它們依然是客觀的經濟范畴。

价值規律和企业經濟核算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規律作为商品經濟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客觀过程在人們头脑里的反映。

关于价值規律，馬克思指出过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即“社会必要劳动的量，或生产一个使用价值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該使用价值的价值量。”② 这个定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下的商品生产都是适用的。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由于个别劳动者之間和个别企业之間劳动生产率不同，在同一时间所生产的使

用价值的量不可能完全一样，同样一件产品，劳动消耗是不同的，但是，商品交換并不是按照个别劳动时间交換，只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換。就是說，社会上只承認生产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承認个别劳动时间。这是客觀規律，不管人們同意不同意，它都要在經濟生活中发生作用。

在生产資料私有制条件下，特别是資本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21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頁。



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价值规律通过竞争，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恩格斯在为“哲学底贫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过：“在互相交换着的生产者们底社会里面，因竞争实现着诸商品生产底价值规律，恰正由于这个关系，它实现着社会生产在许多方面唯一可能的组织与秩序。全靠生产物底跌价或涨价，才使个别的生产者们底鼻子碰到需要或不需要那些生产物以及需要多少。”^①在那里，价值规律是统治着生产者的盲目力量。

社会主义社会情形就不同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自觉地有计划地安排生产，按比例地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值规律已经不再是统治人的盲目力量，人们只要认识了它，在生产、分配、交换过程中，正确地估计到它的作用，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当然，可能性还不是现实。全面地认识价值规律，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符合于这种认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原因是，价值规律虽然存在了几千年，却一直是统治人们的盲目力量。人们有可能自觉地利用它，是从有了社会主义社会才开始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还不很多。其次，价值是一种看不见也摸不到的东西，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价格、成本、利润等等。我们所规定的价格、成本、

利润等等，怎样才能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需要经过细致的分析研究。这里面有着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必须经过多次的实践，反复地用经济活动的成果检验我们的认识，才能使我们的行动符合于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认识价值规律，具体说来，有两方面的意义：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它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依据，我们可以利用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推动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它是精确计算投资效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重要杠杆。我们可以利用价值和价格的背离，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调整供求关系，促进生产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

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质量如何，都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在这里，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个别企业有组织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但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一般说来，各个企业需要通过交换才能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个企业的产品具有两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目的是，我们发展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了让社会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应当认真节省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争取用最少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

^① 马克思：“哲学底贫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页。



量的使用价值。

在我国，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产品的价格，基本上是国家有计划地规定的。国家在规定价格的时候，虽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总的来说，还是要以价值作为基础。

假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品的价格和价值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由于所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不同，就会产生如下的矛盾：有些企业的产品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产品的收入会超过产品的劳动消耗；有些企业的产品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产品的收入就会低于产品的劳动消耗，以致劳动消耗得不到补偿。

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代表个别企业在生产这种产品时所耗费的全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物化劳动的消耗是生产资料的消耗(用C代表)。活劳动的消耗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用V代表)，另一部分是为社会的劳动(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用M代表)。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前两部分(C和V)构成产品的成本，后一部分(M)体现为产品的利润。假定价格不变，成本的高低就会直接决定企业利润的大小。例如，在产品的价格是10的情况下，如果成本是8，企业利润就是2；成本是6，企业利润就是4；成本是11，企业就不但得不到利润，而且要亏本。可见企业要获得赢利，就必须降低成本。怎样才能降低成本呢？这就要加强经济核算，提高设备利用率；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消耗；开展技

术革命，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有促进作用的。不过，那是通过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来实现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使资本愈来愈集中，资本家的利润愈来愈膨胀，劳动者愈来愈贫困，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的比社会主义社会要缓慢许多，而且带有周期性的特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另外一种情况。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人们认识了价值规律，就可以利用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进行经济核算，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价值规律具有客观性质。人们认识它，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正确地估计到它的作用，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工作越做越细，领导生产的水平越来越高；相反的，人们不认识它，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不能正确地估计到它的作用，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就不能摆脱盲目性，不能精确地计算经济效果，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甚至会给经济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斯大林在谈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应当考虑价值规律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我国现今条件下，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进行生产，并使他们遵守纪律。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



生产量，精确地计算生产量，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现实事物，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塌它们。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断地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这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加速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的成长，加速把他们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领导者。”^①这一番话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反复研究领会。的确，在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当中，认识价值规律，自觉地按照规律办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要求我们企业领导者有比较完备的科学知识，真正熟悉企业生产、分配、交换的情况，并且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就拿经济核算来说，其中就包括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固定资产的折旧、更新和合理使用；流动资金的定额和周转速度；成本的结构和降低成本的途径；利润分配和利润率的计算方法等等。如何使这些项目的指标和定额符合于价值规律，争取用最少的投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绝不是“灵机一动”可以解决的，必须利用各种价值形式，精打细算，反复比较，才能使我们的主观符合于客观，预见到比较远的经济后果。在这里，价值规律真可以说是一所“很好的实践的学校”。

下面，我想讲一下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问题。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

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样的生产目的，并不排斥企业争取获得赢利。有些同志嘴上怕说利润，怕里面有“鬼”，好象说到利润就有点资本主义的味道，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体现着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则是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这部分价值是提高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经济和文化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四百九十三亿元，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依靠国营企业的税收和上缴利润，国营企业和事业收入占全部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不仅是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源泉，而且对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也具有一定的鼓励作用。我们的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发展生产首先要依靠政治挂帅，依靠劳动群众的革命干劲，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不顾物质利益的原则。我们应当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正确结合起来，既要坚持政治挂帅，又要学会利用物质鼓励的办法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例如，一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降低了成本，就应该得到利润和超额利润的分成；另外一个企业，成本过高，就得不到利润分成，在这种情况下，客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7—18页。



观经济生活会迫使它上进。在企业经济管理方面和别的事情一样，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永远都会有的。先进的企业最初总是少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促使那些落后的企业赶上先进，超过先进，使大多数企业达到先进的水平。这样，当然又会出现少数更先进的企业，那么，就再赶，再超过。如此不断前进，就能促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使生产不断地得到发展。

当然，看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不能使用资本家的狭隘眼光：“只要今天能捞一把，

那管明天寸草不生”。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利润是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一种条件，因此，对待利润我们应当有长远的国民经济的眼光。为了保证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生产，为了把最新的科学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去，为了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取得经验，某些生产部门，某些新投入生产的企业，在一定时期只获得很少的利润或者得不到利润，甚至亏一点本，应当是允许的。不过，这只是适用于一定的企业和一定的时间。任何企业都不应该长期亏本，老是依靠国家补贴。

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

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实际上就是指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比例。这里面包括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等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这些比例，除了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为依据以外，还必须考虑到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考虑到价值规律。

第一，积累基金的分配，要根据我们对于价值规律的认识，精确地计算经济效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分为两个部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其中积累基金是扩大再

生产的唯一源泉。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从物质条件上来考虑，主要看当年积累率的高低和积累基金如何使用。一定数量的资金，生产性的积累和非生产性的积累各占多少；固定资产的积累和流动资产的积累各占多少；投资回收期长但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大企业和投资期限短但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中小企业各占多少……所有这些，不单应当根据实物指标进行核算，而且应当根据价值指标进行核算，力争用最少量的劳动消耗，收到最大的经济效果，力争高速度。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由于资本家之间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从整个国民经济范围计算经济效果是根本办不到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才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范



围內，做到人力、物力、財力合理使用，做到最大的节省。

第二，安排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国民經济各个部門的比例关系，必須注意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統一，使整个社会的再生产不但在价值上能够补偿，而且要在使用价值上能够补偿。我們在財經工作上曾經总结过一些經驗，例如，基本建設投資应当和生产資料的供应相适应；工資水平提高应当和生活資料的供应相适应；財政、信貸和物資要爭取平衡。这些經驗，就是反映了再生产过程中价值和使用价值必須統一的客观要求。

第三，通过价格政策，調整国民收入的分配，調整供求关系，保証国民經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

在前面，我們曾經假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商品价格和价值是一致的。这种假定主要是为了分析方便，实际上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不能这样要求。我們只能要求价格接近价值，不能要求价格完全符合价值。价格和价值背离，正是我們利用价格政策調整国民經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种依据。

首先，价格可以調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品价值当中扣除补偿生产資料的消耗的部分以后，劳动者在当年所創造的新价值。这部分价值經過社会总产品在各个部門之間的交换，才能最后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因此，价格高低，可以对于国民收入在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之間，国民經济各个部門之間，国家、集体和个人之

間的重新分配发生影响。通过这种分配，可以調整积累同消費的比例，調整积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内部构成。

其次，价格可以調整生产資料和消費品，特别是消費品的供求关系。价格的基础是价值，价格的变动，主要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在資本主义的市場上，供求关系自发地調节价格，会造成經常的价格涨落。在社会主义的市場上，价格是有計劃地規定的，人們可以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地进行調整，使价格經常保持基本稳定。但是，基本稳定并不是永远不变，某些部門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某些产品的供求关系变化了，必須个别地进行調整。事实上，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無論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都是有升有降的。

供求决定价格，这是一方面；反过来，价格也会調节供求关系。社会主义經济总的发展是平衡的趋势，但是某些产品在生产和消費之間、供給和需求之間仍然会經常地出現不平衡。对于这种不平衡，我們可以采取两种办法进行調整：一种是实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应（統購統銷），那些对国計民生有重大影响的生产資料和消費品，必須采取这种办法；另一种是用有计划地提高价格和降低价格的办法进行調整，对那些品种复杂、消費領域比較窄的产品，只能采用这种办法。

价格調节供給和需求的关系，間接地也会影响生产和消費的关系。因为供求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費的关系在市場上的表現。所以，任何一种产品价格的升降，对于提高或



压缩购买力,对于促进或妨碍生产的发展,都会发生不同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我们可以听听几位做实际经济工作的同志的经验之谈。商业部门的一位同志说:“当我们把某一种纱、布品种的收购价格安排的偏低时,就会打击生产部门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安排生产的困难,减少国家的积累,影响再生产的投资。”^①商业部石油局的一位同志说:“国家规定煤炭出厂价格时,还要考虑到在煤炭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要考虑到生产成本,而价格高低,产销盈亏,仍然是产销双方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②商业部食品局的一位同志说:“国家为了扶植集体养猪的发展和鼓励个体养猪的积极性,除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生产方针和具体解决饲料问题以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调整了全国生猪收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三点六四,并具体规定农民养一头一百四十斤重的猪,收购价格要保证农民获利一百八十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粮的标准。这个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生猪生产的发展。到一九五七年末,养猪量已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头,比一九五六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左右。”^③这是不是说,价值规律在自发地调节生产呢?不是这样。相反的,这恰好是根据我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自觉地利用商品生产为计划经济服务。

如上所述,价格和价值的背离,在一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背离对计划经济并没有害处。但是,这种背离不是没有界限的。价格,一般说来是属于分配和交换领

域的范畴,它绝不能脱离生产,它必须以价值作为基础。对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来说,价格不能高于价值太多,高得太多了,企业利润过高(这主要是从其他部门转移过来的),不利于经济核算和企业经营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价格也不能低于价值太多,低得太多了,企业会得不到多少利润,甚至会亏本,这不但有利于经济核算,而且使企业的再生产受到影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财政补贴的办法,但是,这样的办法总不能长期采用,长期采用对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都是不利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和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又有所不同。人民公社是自负盈亏的核算单位,它们再生产的规模,社员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地要受价格的影响,因此,它们在安排社和生产队的生产、销售计划的时候,就更多的考虑市场价格。我们领导农业生产要强调政治挂帅,强调公社生产服从统一计划,同时,也要清醒地估计到这种经济趋势。这样才便于自觉地利用价值与价格的矛盾,调整农业生产服从国家计划。

对于供应个人所需要的消费品也是一样,必须认真考虑按劳分配和等价原则的关系。货币工资最终是要转化为消费品的,消费品价格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按劳分配的实现。消费品的价格过分低于价值,国家的一部分积累基金会转化为消费基金,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相反的,消费品的价格过分高于

① “经济研究”1959年第4期,第39页。

② “经济研究”1959年第3期,第28页。

③ “经济研究”1959年第3期,第33页。



价值，消费基金的一部分也会转化为积累基金，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当然，由于商品生产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某些企业发生追求产值、忽视产量、单纯追求利润，因而影响国家计划完成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不过，这种缺点不是来自价值规律，而是由于我们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缺乏全面的认识，或者由于某些人身上还残存着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样的缺点，是必须克服也是能够克服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同计划经济并不是不相容的

东西。相反的，我们越深刻地认识商品生产的特点，认识价值规律，就越能自觉地进行经济工作，越有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胡钧同志的文章，用不少的篇幅说明了利用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他否认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存在商品生产，竟把价值规律看作电子计算机一类的东西，认为由于它有“良好作用”，才不可忽视。我是不同意这种意见的。这种意见，在客观上会妨碍我们认识价值规律和更好地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繁荣的山城——南平（木刻）

陈 健

